秦宝琦 著

中国地下社会

第三卷 民国会道门与黑社会



學苑出版社

责任编辑：战葆红
封面设计：甄婷婷


ISBN 978-7-5077-3341-9
9 787507 733419 >
定价：200.00元（全三册）

中国地下社会



秦宝琦 著

中国地下社会

第三卷 民国会道门与黑社会



學苑出版社

目 录

帮会与黑社会篇

会道门篇

帮会与黑社会篇



民国年间的帮会与黑社会是从清末民初由秘密会党蜕变而来的社会组织。秘密会党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是传统社会下层群众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组织，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以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和江湖义气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虽然也从事打架、斗殴、绑架勒索和走私贩毒等危害人民群众的犯罪活动，但是，在传统社会，秘密会党毕竟是下层群众的组织，而且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往往带领群众反抗国内封建统治者或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其存在有一定积极意义。秘密会党包括以师徒传承结成的“帮”，和以异姓结拜弟兄方式结成的“会”。清末民初，秘密会党发生蜕变，其中大多数成为军阀、官僚的工具，如四川的袍哥和江淮一带的红帮；或者成为黑社会组织，如上海的青帮。所以，清代的秘密会党与民国年间的黑社会，尽管存在着渊源关系，但是，性质上已经发生变化，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民国年间的黑社会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初期也大量从事绑架、走私、贩毒以及烟赌娼等“黑色行业”，这一点与清代的秘密会党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黑社会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与当权者的勾结，特别是一些大的黑社会组织及其头目，一般不再从事鸡鸣狗盗、抢劫勒索一类犯罪活动。他们在拥有一定势力后，虽然仍然从事烟赌娼等黑色行业，但更主要的是通过洗钱把非法获得的资金，投入到从事工商、金融等行业，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他们因为拥有巨额的资金和经济势力，往往能够进一步与政坛头面人物相勾结，并得到他们的庇护。民国年间许多帮会蜕变成了军阀官僚的工具，已经不再是下层群众的组织，而成了统治阶级的鹰犬。因此，应该把清代的秘密会党同民国年间成为军阀官僚工具的帮会与黑社会严格区别开来。

第一章　民初会党的命运与遭遇

一、会党的横行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政权。清朝被推翻后，会党"反清"的目的已经达到，失去了斗争的目标，许多人便走上了歪路。正如曾经担任过会党首领的陈浴新所说："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所以到了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他们中就有很多人走上了歪路，逐渐蜕化变质。"在长沙起义后的一个短时期内，进出都督府（焦达峰任内）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要求安置。都督忙于接应，几至无暇治事。他们以为起义成功，就百事大吉了，根本没想到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和建设问题。衡阳以南各属会党更是风起云涌，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天下了"。他们就是这样庸俗地看待革命的。因此，各地流氓、痞棍就乘机假冒会党之名，破坏社会秩序，为人所诟病。① 一些会党甚至企图复辟帝制的旗号，图谋不轨。安徽有个"大把子会"，"实系洪帮改组"，其宗旨乃是反对共和，其头目所刻伪印上镌有"黑龙山大皇帝"字样。② 安徽芜湖的"海龙会"，刻有"中华帝国海龙会"之关防，提出"现在民国是我们建造成功的，到如今我们都无事可做，非推翻民国不可"。③ 在苏、浙、皖地区的"九龙山会"，其众"上联衙厅差警，下至一般无赖匪徒"，"声势浩大，党羽千人，白日结队横行"。总之，秘密会党本身的落后性、封建性，乃是民初秘密会党蜕变的内在根源。秘密会党认为打天下就是为了坐天下的封建性传统观念，最终导致了它们的蜕变。

---

① 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34页。

② 《神州日报》，1913年3月15日。

③ 《神州日报》，1913年3月15日。

部分会党，如天地会和哥老会，因为在辛亥革命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们认为既然自己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方面有过功劳，那就应当在新政权里分享一杯羹。所以在一些省份，新政权建立之初，会党便以革命的“功臣”自居，要求分享革命成功的果实。他们对于革命党人提出的“民主”、“共和”缺乏了解，认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无非是传统的改朝换代，在他们看来，民国的总统与清朝的皇帝，只不过是名称上的差别，或者干脆认为总统就是皇帝，只不过不再是满人当权，改成了汉人当权而已。一些地方的会党便利用手中掌握的武装，在新政权中争夺权力和地位，不少会党首领在新政权里占据了重要地位，使得会党的势力一度大为膨胀，其弱点和劣根性也充分暴露。湖南省在宣布独立后，由于与哥老会有密切关系的焦达峰出任军政府都督，湖南各地的哥老会分子便闻风来到长沙，认为：“焦大哥作都督，今日我洪家天下矣！”[①]会党分子可以自由出入都督府，直呼都督焦达峰为“焦大哥”。他们“无器械，无戎装，则高髻绒球，胸前拖长带，以为汉官威仪，若戏之武伶装然。自都督府以至市廛街巷无处无之”。[②] 以至有人称湖南都督府是“梁山泊和瓦岗寨”。[③]

在陕西“光复”的过程中，哥老会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当时，革命党人起义的决定过于仓促，没有来得及制定完整的部署与起义计划，因此，新军中的起义者进城后，各营都单独行动，而且又不是原来陆军的建制，难以指挥。于是，军事指挥权就落到哥老会各级舵把子手里。革命党领导人对于起义军各营的位置和哪个地区有多少队伍，皆不清楚。[④] 所以，使得哥老会在军政府中占据了很大优势，军政府的副统领万柄南、兵马都督张云山等皆是哥老会首领，财政和军权都掌握在哥老会手中。[⑤] 兵马都督张云山发布的告示，不仅要盖兵马大都督的关防，而且要加盖“洪会公议”的哥老会印记才能生效。[⑥] 在商州、临潼、三原等

---

①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5页。

② 子虚子：《湘事记》，《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7页，转引自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民国卷），第50页。

③ 张奚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207页。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④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页。

⑤ 张奚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154页。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⑥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页。

许多地方，哥老会遍设码头，而且“广收弟兄擅用公款，处理词讼，干涉地方行政事宜，俨然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有的甚至于勒索抢劫财物，闹得民怨沸腾，激起地方民众义愤”。[①] 这些地区甚至“但闻洪会命令，几至不知其他”。[②] 哥老会首领们“恃功骄恣，气焰日张，既以为纯系会党之功，且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误以为会党出头之日也”。[③]

四川独立后，在省城成都内外驻有哥老会的同志军10余万人，他们自恃对革命有功，把哥老会公口牌子公开挂出来。“会众刀枪往来如织，每街公口设公座，每户贴公口红片如大汉公、多福公、共和公、熙庆公之类。”[④]四川军政府的正副都督尹昌衡、罗纶认为哥老会的武装同志军难以控制，特别设立了“大汉公”，作为哥老会的总公口。尹昌衡为了使哥老会听命于军政府，稳定政局，只好亲自参加，并自任大汉公的“舵把子”。[⑤] 军政部长周骏甚至在军政部门口，挂出了“大陆公”的牌子。[⑥] 城内各街道、各警署也挂出公口的牌子。[⑦] 同长沙一样，成都的哥老会也提倡恢复汉族衣冠，“于是头扎英雄髻，身穿戏装，腰佩宝剑，脚登花靴，招摇过市者随处可见”。[⑧] 这样，在许多地区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使新政权的权威受到损害。

在贵州，由于哥老会在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中出了不少力，辛亥革命成功后，各地哥老会大肆活动，鼓吹“非公口不足以立国，贵州之政府及社会非公口不足以辅助而保全”。军政府首领黄泽霖无法维持社会秩序，于是利用哥老会来驾御哥老会，倡导支持公口。军政府首脑也大开公口，设立斌汉公、黔汉公、大汉公等公口，招兵买马，甚至“设大堂，提公案，俨与政府对埒”。[⑨] 而且，“自

---

①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6页。

② 《西北革命史》（征求意见稿）（中），第20页。

③ 《近代史资料》第51期，第72页。

④ 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51页。

⑤ 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08页。

⑥ 卫聚贤：《中国帮会》，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第118页。

⑦ 张奚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109页。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⑧ 张奚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110页。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⑨ 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14—215页。

光复以后，省内外公口开设，凡数百处。汉刘（留）权力，侈然伸张，一泻千里，有不可复遏之势矣”。“上至都督，下至微职以及军队大小职官，无一非公会中人。搒磕邪淫，肆行无忌。”[①]在贵阳，哥老会“明目张胆占领民房衙署以立公口。在城外各地，各公口之间，为争夺地盘，械斗时有发生”。[②]

秘密会党作为一种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落后组织，其政治理想是取封建统治而代之，在推倒清王朝以后，他们要求建立“洪家天下”，即建立以会党首领为首的专制王朝，这与革命党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便反对共和政体。四川大足哥老会首领余栋臣甚至提出“扫除新政，灭洋复清”[③]的反动口号。罗江哥老会首领谢厚鉴也“假立前清旗号，聚众数千人于罗江、绵竹、德阳等处，谋为不轨”。[④] 1913 年 6 月，洪江会成立“振兴哥老会”，宣言说：“民国定难长久，必须仍归清廷。”并向会众们鼓动说：“近日满洲某某数人已统兵南来，没有战争，我等即行率众占据城池，将来清朝还旧，我等受其招安，亦不失为功臣元勋。”[⑤]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时代潮流完全背道而驰。另外，民国初年，那些未曾参加过革命的会党分子，则仍然以打家劫舍，抢劫夺财为宗旨，成为扰乱社会治安的土匪。如广东三合会在增城大肆抢劫，附近居民被惨杀者甚多，商民只好逃避他处。[⑥] 陕西哥老会在各地抄家破寨，强奸勒派[⑦]。贵州哥老会进省后，“估买估卖，抢劫居民。”而且大开山堂，“敲罗打鼓，成员多穿戏装，头扎包巾，两绺头发分挂两耳，身披鹤衫，腰佩刀剑，招摇过市，弄得人心惶惶，居民不敢出街买物，夜里不敢脱衣而睡，不知几时大祸来临”。[⑧] 哥老会的公口还大肆抢劫，甚至连北伐军的 10 万军饷也被他们抢劫一空。[⑨] 陕南安康一带哥老会，在民国初年“以号召洪汉为名，由是哥弟云布，

---

①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影印本，第 174 页。
② 冯祖贻、顾大全：《贵州辛亥革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34—135 页。
③ 《申报》，1912 年 7 月 31 日。
④ 《神州日报》，1912 年 5 月 10 日。
⑤ 《民立报》，1913 年 6 月 12 日。
⑥ 《神州日报》，1912 年 4 月 6 日。
⑦ 张奚若：《辛亥革命回忆录》，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⑧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3 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年，第 447 页。
⑨ 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95 页。

码头星罗，抄家破寨，强奸勒派之事，层见迭出，不可言状”。[①] 在贵州遵义，哥老会会众“佩刀披红，招摇过市，杀人越货，视若当然”。[②]

二、对会党的打击与镇压

帮会这些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纷纷要求军政府予以镇压。当时有人指出了革命党人利用会党的消极后果：“黔、蜀则公口山堂，两粤则洪门、三点，百货滞运，民不聊生，军队比之前日而行色，兵械较之昔时而更备，盗贼则比之从前而更多者，何也？无他，成功之速故也。当未成功之始，凡所谓运动、造谣、暗杀，其种种破坏进行之方针，不论智愚贤不肖，倘有一稍知流血主义者，皆收罗之，一以排斥满虏为目的。孰知汉阳一役，不数月而共和局成，是前日所收之破坏者，今日反以为建设焉。此流血所为见于共和之后也。”[③] 有的革命党人也对会党在革命前后的作用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如贵州的革命党人胡刚认为：“运用哥老会力量，虽也是革命过程中的一种策略，但是，在运用之先，就要熟计利害，于革命成功后，如何安顿这种力量，改造这种力量，使不致动摇革命的基础，影响社会的秩序。”[④]

因此，民国政府于 1912 年 11 月 9 日发布命令，宣布解散秘密结社：“近闻各省秘密结会之风仍未稍戢。名目繁多，宗旨毫无，并有骗取重资，设会结党，以图暗杀破坏大局者。现在局势甫定，人心未安，凡我国民，均应联合一致，谋新制之进行，期国基之巩固，方为正办。且查秘密各会，结集之初，多出明代遗老，愤痛神州陆沉，迫而为此。今民国告成，五族联合，皆如一家人，若再图同室操戈，岂非自相图害，以速灭亡，祸及全国，甘为罪魁，此而不惩，何以立国？”[⑤]

会党的存在及其活动，不仅挑战了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而且为各省欲稳定地方秩序的新统治者所无法容忍。各地军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恢复社

---

① 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54 页。

② 胡刚、胡雪侍：《贵州辛亥革命史略》，载《近代史资料》第 4 期，1958 年。

③ 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86 年，第 530 页。《陈警天呈孙中山论广东弥盗之法折》。

④ 胡刚、胡雪侍：《贵州辛亥革命史略》，载《近代史资料》第 4 期，1956 年。

⑤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 1912—1928》卷二，第 1363 页。

会秩序，只好采取了对会党进行打击的政策。

广东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十分突出，是辛亥革命在广东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在广东独立后，由于部分会党分子游民习气未改，甚至胡作非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而遭到排斥和镇压的，却多为追随革命较久，觉悟较高的会党首领及其部下，最为典型的是王和顺的惠军。这支以会党群众为骨干的队伍，很少被吸收入同盟会，甚至连会党首领出身的老同盟会员王和顺、黄明堂等人，也遭到排斥。在新成立的革命政府里，不仅都督、副都督等高级职位轮不到会党分子担任，连军政府各部的主要职务也无一委派给他们，甚至把这支队伍分批遣散。1912 年 3 月，军政府还对王和顺的惠军发动大规模镇压，以会党分子为骨干的仁字、协字两军，也遭到打击。连在广东辛亥革命中有过巨大贡献的许雪秋也惨遭枪杀。

1912 年，云南都督蔡锷发布了《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照得开山设堂，结盟拜会，在当初时候，都是为宗国沦亡，异族专制，不敢显然反抗，故苦心志士组织一种秘密的社会，抵抗恶政府，其用意很好的。但是，日子久了，越聚越众，伙党太多，流品太杂。有一种狡黠的，借了此种缪名目，哄骗良家子弟，磕诈钱财；有一种凶悍的，结党成群，奸淫抢掠，毫无一点人理。这两种人，便失了原来的宗旨，你们是不甘心的。于今清朝也亡了，共和政府也成了，无论贵贱贤愚，只要守得正当的法律，造得相当的学识，各个都是自由的。你们岂不是同胞么？大家趁此时代，要努力为一个良民，不要蹈以前的覆辙。"①要求所有的公口、山堂一律解散，布票自行交出，并且规定："凡群众聚合立公口、开山堂，歃血订盟，结拜弟兄，图谋不轨者，从左之区别处断：一、首魁处死刑；二、参与谋议，居该党重要之职务者，永远监禁；三、其他从事于诸种职务者，处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之监禁；四、附和随行其他干预公口、山堂事务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之监禁。"②要求百姓："从今以后，父戒其子，兄戒其弟，未入会的，勿再失足(入会)。已入会者，早早回头，只要改得前非，就是一个好人。从前的公口山堂等名目，都要一律解散。那些票布标志，都要自行交出。""你们若不晓得利害，执迷不悟，隐瞒票布，不肯交出。或已经交了，还不肯解散会党的名目。一经别人告

---

① 曹业英：《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306 页。

② 曹业英：《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306 页。

发，或被地方官察觉，本都督府只有按律惩治一法，你们也改悔不及了。"①

贵州军政府也指出："公口之设，究其最初之用意，殆为推倒满清而起，就始有利无害；满清已踣，即为目的已达，亦应立时解散。何况末流之弊，罄竹难书，烧杀淫掠，时有所闻，共和国家岂容有此？"②贵州都督唐继尧接连发布取消公口的告示，宣布："公口一项，无论其危害地方已否，均着即日取消，曾经入公口之人，迅将所得证据烧毁，倘能从此力务正业，苟非积恶匪徒，本都督亦不深究。"实际上仅仅对参加宪政党的哥老会未加追究，有的还委以重任，③对于参加自治学社的哥老会则"一概不与赦免"，于是派出各路清乡司令巡行各县，"命各县地方官吏和宪政分会，开出当地公口人员名单，按名捉拿，不加审讯，一概枪决"。④

在湖南，新任都督谭延闿为了维护新政权，也于 1912 年发布文告，禁止会党活动。文告称："所有洪江会、哥弟会以及三把香所发生之富有会、大摆队、铁摆队、十字会兼未及指明之各种名目马元帅、大元帅、坐堂、陪堂等项名称。无论发源于何时，布散于何地，均应自行取消"，不然"唯有立即严拿，尽法惩处"。⑤ 而洪江会却仍继续活动，同年 8 月，在长沙散售票据 2000 余张，并扬言"不日有第三次革命之举"。⑥ 为此，湖南军政府先后逮捕了洪江会成员三四十人，并处决了其中的 28 人。8 月下旬，都督谭延闿又发布命令说："近日忽有愚顽匪徒，假冒军官名姓，散放票据，伪造军旗，暗发口号，造谣惑众，谋为不轨。似此目无法纪，有意扰害安宁，倘非严诛首要，曷足以维持风化而儆凶顽。"⑦表示了对会党的强硬态度。

在湖北，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的会党也纷纷起而响应，他们在安陆、襄阳等地还建立了政权，这使新建立的湖北军政府非常不安。1912 年 1 月，军政府招讨使季雨霖杀死安陆的会党首领全明汉，2 月，又派人刺杀了江湖会首领李秀

---

① 曹业英：《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306—307 页。

②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22 页。

③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 年，第 215 页。

④ 《近代史资料》第 4 期，1956 年，第 119 页。

⑤ 《申报》，1912 年 1 月 13 日。

⑥ 《申报》，1912 年 8 月 30 日。

⑦ 《申报》，1912 年 8 月 30 日。

昂,迫使总司令官张国荃接受改编,夺回了由会党首领控制的安陆、襄阳两地的地方政权。但是,湖北的帮会势力很大,而且在军队里有很大势力,所以不肯罢休,1912年2月,帮会首领向海潜(松坡)带领群英会会众,在武汉发动部分官兵包围了都督府,赶走了军务部长。此后,帮会头子应桂庆、何海鸣等又在武昌"蛊惑军队,联络会匪,约期举事"。计划"先据武昌,此图江宁,进攻北京",①企图夺取湖北军政府的政权。军政府对此已经有所觉察,遂下令禁止军人秘密开会结社,规定"各处不得设同胞社之分会,违者定即重究"。② 9月24日,黎元洪派人将帮会的据点摧毁,将拿获散放布票的顾斌等多人"讯明正法"。③ 同时通缉应桂庆等人,并令同胞社社长"公请解散,并呈明此后如有假该社名义在外招摇滋事者,请以军法治罪"。④

在江西,省会南昌接连发生会党分子聚众抢劫案件,各界人士纷纷派代表赴南京临时政府请愿,孙中山遂任命李烈钧为新任督军。李烈钧上任后,指出:"各府县之劫抢掠夺,时有所闻,究其祸根,皆洪江会、三点会、自强会、连合会、哥老会诸匪之私集党徒,扰害治安所致。"⑤认为"欲治赣必先清匪",首先把前任都督派往办案的彭志仁以"勾结匪类"、"售卖布票、饱敛钱文、扰害人民"之罪予以枪毙。并将潜逃在湖北的帮会首领龙正文等拿获归案,解省处决。⑥ 并发布命令,禁止会党活动,禁令称:"近者孙大总统命令,除有政党性质者可自由集会外,其余各会党一律解散。""凡有扰害人民生命财产者,即予缉拿禀办,并随时出示开导。以前被逼入会斩香者,或经送贽拜门者,准其改过自新,自具结词,并将布票呈送本都督府,或就近地方官处毁销,前罪盖予豁除,决不再加研

① 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4—165页。

② 武汉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65页。

③ 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4—165页。

④ 武汉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68—669页。

⑤ 《江西民报》,1912年5月25日。

⑥ 徐辉琪编:《李烈钧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0页。

诘。如有甘心为匪，不思悔过者，一经察觉或被人告发，定即从严究办，不稍宽容。"①

在陕西，军政府成立后，大统领张凤翙手下的四个都督"好像全是哥老会的人，至少有三个是；张凤翙没有实权，财政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② 哥老会在各地的滋扰，使地方治安和财政都受到严重影响，对当时的军事、政治都很不利。哥老会各码头的非法行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不满。在此情况下，同盟会陕西负责人井勿幕只好致函黄兴，军政府都督张凤翙也发了一封正式公文给湖北都督黎元洪，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到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③ 后来，张凤翙密令各部队秘密逮捕受哥老会首领万炳南煽动企图暴动的帮会分子，每日杀10余人，先后杀了数百人，万炳南手下驻扎岐山、凤翔各县的部属，也大部分被改编或被消灭。

在四川，1912年2月，成、渝两个军政府合并，重庆的军政府都督、革命党人张培爵自愿担任合并后军政府的副都督，由成都方面的都督尹昌衡任都督。他看到都督尹昌衡提倡袍哥，以至成都"全城大街小巷，公口林立，奸淫霸占，时有所闻"。认为"若不迅速制止，恢复秩序，使人民安居乐业，那么我们革命不知为了何事"。于是与尹昌衡商量，令巡警总监杨雄出示，限日撤销公口，如有不尊者，即严拿办。④ 结果，很快取消了成都的200多个公口的牌子，并且扫荡了附近各县的哥老会势力。

三、民初改造会党尝试的失败

由于会党人数众多，又在辛亥革命中起过积极作用，是一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对于会党问题，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一些革命党人，在民国初年曾试图

---

① 《江西民报》，1912年5月24、25日，转自周育民等：《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2页。

② 张奚若：《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13页。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 张奚若：《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14页。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④ 但懋辛：《四川辛亥革命亲历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37页。

采取积极的办法，对会党的组织加以改造。如陈其美、于右任、李燮和、谭人凤、宋教仁等36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和平会"附设崇正团，试图把会党改造成新式社团，把会党成员破坏社会秩序的不法活动，引导到正常的生业方面，以减少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规定："一律取消旧会名，改为本会崇正团团员，由崇正团代谋生计，设法安置。"该会章程的第四条明确规定："凡以前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天地会、八卦会、大刀会、小刀会、安清道友帮、红帮、在理教，凡未光复以前种种会党，无非同抱复仇主义。今目的已达，俱须一律取消旧会名目，改为本会崇正团员，以合成一大团体。由本会发给徽章，会齐册结，呈请政府承认，一体优待。凡入本团后，即由本会会员考核，果系知识超远者，即可分任本团职务。如无职业者，即由本会代谋生计，设法安置。或编为民团，以仿市町警察之制；或贷其资本，以归农、工、商贩之途。必使其个畅生机，无虞失业。倘仍各分党派，扰害公安，或并秘密结盟，行为不轨，即系甘堕下流，为民国公敌，本会既负维持和平之责，即有保卫治安之权，得以公共法律制裁之，迫令改[解]散。"[①]

谭人凤也曾独立致力于会党的改造工作。

谭人凤在辛亥革命前就从事联络和引导会党的工作，加上他本人也是会党首领，所以，当他看到会党的种种不法行为时，客观地指出："吾国社会夙称复杂，而纠结蟠踞足以为国家和平障碍者莫如会党"，[②]但认为不应把会党一脚踢开，而应当进行改造。他于1912年9月发起建立"社团改进会"，并且向内务部警政司进呈《社团改进会发起意见书暨章程二十册》，以期达到通过对会党成员的教育和改造，使之适应民国的社会。他既肯定了洪门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指出："在辛亥革命之初，唯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唯洪门兄弟能听指挥。"而且"人无论远近，事不计险夷，人人奋勇，各个当先"。所以，"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力也"。同时也指出洪门会党的弱点："党徒既众，良莠不齐，目的一差，祸机将烈。禁之则法律难于遍及，听之则不戢必致自焚，载舟覆舟，可不深惧?"因此，他在《社团改进会章程》中提出，要以"改良旧有会党，维持地方永久治安为宗旨"。章程共分九章四十二条，并制定了《社团改进会会员守则》，包括：孝敬父母、忠爱祖国、勤

① 《中华和平会章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载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390页。

② 《谭人凤等致内务部警政司呈》，载《历史档案》第1期，1982年。

俭治生、和平接物、公私分明、言行一致、力求进步及革除旧习。[①] 谭人凤筹划"社团改进会"的原因,在于他认为会党既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其宗旨就是要通过对会党的"改进",以达到"联络为同化之具,寓解散于归并之中"的目的。也就是把旧式会党变成新式社团,所以,"章程"要求废除会党的一切旧式组织形式,采用当时流行的政党形式。由于会党组织庞杂,谭人凤在全国范围内改造会党的目的难以达到。1912 年 11 月 9 日,谭人凤又备文呈报湖南总督谭延闿,请批准《社团改进会湘支部章程》,共十一章三十三条,并请谭延闿饬财政司拨款白银两万两,作为经费。谭延闿于 1913 年 3 月 16 日发出《准予社团改进会湘支部立案布告》,要求洪门改进后:"抱定宗旨,恪守法律,保全治安,各地方官一体保护。至凡在该会人员,尤宜洗心向善,认定改组宗旨,毋得再蹈前愆,方不负本都督提倡之至意。倘有阳奉阴违,罔知自爱,或不法之徒假借名义,违反法律,扰害治安,一经查实,国法具在,决不姑宽。"[②]所谓"各地方官一体保护"云云,不过是一句空话,实质上是要对会党的活动加以限制,对于危害社会治安者予以严惩。加上湖南立宪派和士绅们的反对,谭人凤只好停止社团改进会湘支部的活动。

帮会首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希望把旧式帮会改变为新式社团。1912 年 7 月,青帮首领应桂庆拟把哥老会、青帮和洪帮等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中华国民共进会",以期"组织纯粹民党,实行取缔会员,各处支部成立后,不准在外私开香堂,另立码头,剪除其旧染之习惯,免致与民国法律相抵触"。[③] 旋因应桂庆涉嫌刺杀宋教仁一案而被捕,共进会随即停止活动。

由于"中华国民共进会"仅仅是想把原来的三大帮会简单地融为一体,并未对其成员进行教育和约束,所以共进会成立后,江浙一带的会党,纷纷打起该会的旗号进行活动,其中不乏破坏社会治安的违法活动,导致该会不断受到外界的质疑和抨击。而共进会总部又没有能力制止各地会党的不法行为,从而受到地方当权者的打击。不过,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朱瑞,最初仅仅对肇事

① 苏缮如:《谭人凤与洪门会党》,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186 页。

② 苏缮如:《谭人凤与洪门会党》,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187 页。

③ 《申报》,1913 年 2 月 17 日。

地区共进会的组织勒令解散，后来，各地会党继续用该会的名义进行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如浙江海宁的共进会，在解散后“仍袭该会名目，在外卖票开堂，敛钱惑众”。[①] 浙江都督朱瑞于是下令在全省禁止共进会的活动：“查该会发起宗旨，原欲改革旧习，勉为良善，用意无可厚非。无如入会者，莠多良少，恃众横行，如已经获办镌造伪印、聚众谋逆之俞昆、管伟；私藏炸弹、招徒放票之包田芳；伪造旗令之黄云，及通令缉拿之刘金兰等，均或搜有共进会证书，或系共进会会员。”“乃官厅之文告频颁，而匪徒只猖獗更甚”，因此决定：“为本省秩序计，所有浙江各属之共进会，决计概令解散，以弭巨患而保治安。”[②]

总之，民初改造会党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① 《神州日报》，1913 年 1 月 27 日。

② 朱瑞：《解散共进会示》，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567—568 页。

第二章　四川军阀混战与袍哥之蜕变

一、四川军阀的形成

民初军阀混战及其造成的社会危机，乃是秘密会党蜕变的根源。“护国战争”打破了袁世凯的皇帝梦，也使由袁世凯所维系的统一局面破碎了，而用武力推翻袁世凯的人们，还没有力量建立起新的统一局面，于是，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军阀割据意味着以武力分割地方，他们把以武力占据的地盘，看做是私有之物，成为一个个独立王国。为了争夺更多的地盘，便要互相征战，以便掠夺到更多的财富，拥有更大的势力范围，享有更大的权力。因此，在袁世凯死后，便开始了军阀混战，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在民初军阀混战中，最有实力的是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北洋军阀主要来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旧人。袁世凯在清末以新陆军为基础扩编成的北洋六镇，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来自小站。据统计，在民国初年从小站练兵的军人当中，先后出过总统2人，总理3人，陆军总长、次长10人，巡阅使2人，护军使、镇守使23人，还有大量的师长、旅长和团长。所以，有人说：“民国所谓北洋军阀者，若大总统、副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以及军长、师长、旅长都出自小站。”[①]后来，随着北洋军事力量的扩展，小站出身的军人就布满了全国，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在袁世凯被推翻后，北洋军阀中的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等，继续把持中央政权，并在地方上形成割据势力，使中国从表面上的统一，转为公开的分裂。军阀混战，造成“政争兵乱，无年无之”的混乱局面。

西南军阀（主要指四川、云南和广西的军阀）则多由辛亥革命后的都督演变

---

① 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第16页。

而来。从武昌起义到南京政府成立,各地称都督者,先后多达100多人,他们中间许多人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或护国战争,甚至参加过同盟会的人,许多也转化为军阀,其中以西南各省为最多。[①] 这些新军阀与北洋军阀的阅历有所不同,其中大多数和革命有过或深或浅的关系。如滇系军阀唐继尧、川系军阀熊克武,都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当他们蜕变为军阀后,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性和封建性,为了巩固已经拥有的地盘和权力,或者拥兵自固,或者弱肉强食,互相征战。章太炎曾说西南军阀不过是"自成部落作方镇割据之势"。[②]

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尽管各有特点,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破坏,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却是完全相同的。大大小小的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和财富,当彼此间的利害关系一致时,就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当这种关系消失时,则彼此间以兵戎相见,互相征战。有人把当时四川军阀之间的关系,概括为"时离而时合,亦友亦仇,随合随战。要之,万变不离其宗者,为扩张私利,保存实力,诛求无厌,剥削地方"。[③] 于是造成"一年三小仗,五年一大仗"的混乱局面。据统计,民国初年到1932年,仅四川各派军阀的混战,即达470余次。[④] 其中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双方动员的兵力多达数十万,作战地区遍及数十个州县。在战区内,造成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仅荣县境内,直接作战的两方军队在10万以上,死伤3万左右。"[⑤]连年军阀混战,田赋预征达几十年到百年。其中安次县地方税共征收88年半,绵阳县预征了15年,更有预征到"民国一百多年的"。大批农民由于不堪重负,只好逃亡或流入城市谋生。而未流亡者则要替流亡者均摊粮税,以致"转徙流离者日见其多"。[⑥] 而城市里的工商业者,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受到苛捐税和兵匪的掠夺,凋敝的工商业,也难以为进入城市的破产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大量无业游民的出现,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秘密会党的首领,就是利用这种危机,为自己谋取利益,把会党组织演化为

---

①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359页。

②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584页。

③ 《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④ 黄淑君:《军阀割据混战与四川农民》,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3页。

⑤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19页。

⑥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第414—416页。

军阀官僚的工具,或者投靠新军阀或当权者,使之蜕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而军阀、官僚、豪绅的头面人物,也正好利用会党首领的这种投机愿望,使之成为实现自己某种政治或经济目的的工具,从而加速了会党的蜕变历程。

二、四川袍哥(哥老会)概况

1. 袍哥的组织

民国年间四川袍哥的组织,是在清代哥老会组织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其内部组织在西南各省大体一致。

开山立堂

袍哥创建一个新的组织,称为"开山立堂"。"开山立堂"最初是仿效梁山泊忠义堂聚义的故事,发起人必须是有智有能之辈,平时所收兄弟甚多,声名远播,且可以得到本山山主之许可和其他山主之赞成,才有资格"开山堂",建立新组织。开山堂的地点一般选在僻静的山区古庙,时间多在夜间举行,以示秘密。事前要秘发通知,送达素有联系的码头、公口,后者有的送礼,有的派人前来祝贺。主办方要负责交通接送、住宿饮食。届期先行巡风查山,派人秘设卡哨,安置放风瞭望,戒备意外,以防"空子"闯入窥视。

开山立堂的仪式颇为隆重,会场布置得严肃壮观,张灯结彩。门卫为辕门,堂为"忠义堂",正中安置龙头宝座,两旁设虎皮交椅、大哥、客座交椅,各级兄弟在两旁设立座位。时辰一到,由红旗管事任司仪,龙头大爷主盟,音乐齐鸣,迎圣接驾:行拐子礼,说许多赞词,由两位二哥捧关羽牌位安放上面。接着是安位、焚香、上祭、开光、点像等一套繁文缛节。安圣完毕,主盟发开山结拜令,宣布山名、堂名,接着宣读山堂正福龙头、盟证、座堂、陪堂、正印、副印、礼堂、香长、监堂、远堂、新副各位大哥名单,宣读圣贤、桓侯、管事、六、八、九、幺牌名单,依次入座。接着盟誓,讲十条、三把半香、传三刀六眼。最后歃血、赞酒、宰牲、开宝用印。龙头按名单点名盖章,大家道贺,龙头受贺、传赏、谢赏、送圣、送客,至此礼成。

开香堂

开香堂是为了接受新兄弟,是仅次于开山堂的一种隆重仪式。开香堂有大小两种,开大香堂比较隆重,必须全堂兄弟到齐,开小香堂比较简便,只须承兄

(保举)与二、三大爷到场即可。会堂屋中悬挂关公圣像,像前点大红烛一对,巨香三支,神灯一盏,敬茶三杯,供品四色,由红旗管事主持,例规性地请示掌旗大爷有无指示。如果没有,宣布大会开始,全体起立,整齐衣冠,面对圣像,鸣放鞭炮。红旗管事恭读迎圣令:"眼看天空彩云飘,圣人夫子下天朝,弟子今日来迎圣,恭请圣人坐中堂。"接着红旗管事宣布参圣:"请龙头大爷来参圣、请钱粮三爷来参圣。"大哥、三哥参圣时,身穿中式长袍、马褂,免冠。

"请执事五哥参圣"、"请执事幺大参圣"。

五哥穿长袍或短装,幺大一般均短装,免冠。一定要将扣子扣好,否则失礼。参圣的人各行三跪九叩礼,一般也请外码头公口的代表参圣。他们多敬而谢之。

参圣完毕,鸣放鞭炮,红旗管事朗诵安位词(参圣时所有与会人员均系站立,故要安位)。"大哥请登龙虎座,二哥宿请登上将台。虎皮交椅三哥座,五哥红凳往上抬。六八九江金阶上,幺满十排两边排。三十六把金交椅,七十二座软八抬。金交椅,软八抬,愚弟早安排。龙归龙位,虎归将台,列位哥弟请得位。"

安位完毕,红旗管事即行"拐子"礼。行礼毕,红旗管事宣布人事戒律令:"洪旗大令执在手,在缘哥弟听从头。奸盗邪淫不能有,一切坏人不能留。要想人流不能够,除非认母把胎投。非是小弟言语陡,前传后教一脉流。"

大令传毕,红旗管事则向掌旗大爷请大哥赏示(指示工作)。大爷一般不讲话,将手里的新学、顺社、提升、调步的红纸名单交由红旗管事宣布。宣布时,被宣布的人面向圣像,宣布后,先参圣,后向恩、承、保、引四大拜兄谢恩,均行四礼八拜礼。拜兄站在圣像右侧面举手答礼,连呼"高攀"、"请起"、"诸事顺遂,步步升高"。

人事宣布完毕,红旗管事迎宾。迎宾词是:"今天是敝公口举行盛会之期,承蒙城乡内外邻坊各场左中各社,老拜兄、老恩兄赐步光临,敝公口未能五里铺毡,十里结彩,迎风接驾,谨备菲酌,以表谢忱。少时席罢之后,不能临桌一一致谢,只得席前一礼(丢个拐子)敬请原谅。(此时来宾起立,鼓掌致谢)如有招待不周,礼仪不到,请各位老拜兄、老恩兄,一齐龙哥虎弟,回龙转驾之时,花花旗,龙凤旗,日月旗与兄弟敝公口打个好字旗(丢拐子)。"来宾齐声说:"谢了!谢了!"

致辞完毕，介绍本公口执事人员和本公口与会人员同来宾相识。[①]

公口与堂口

哥老会按照其城镇所在地建立“码头”，以字号区分公口，下设堂口。其字号有十字，即仁、义、礼、智、信、威、德、福、智、宣；又有仁、义、礼、智、信、松、柏、一、枝、梅之说。实际上这些仅仅是代号，并未正式成立过组织，一般只设立仁、义、礼、智、信五个公口，亦称五个字号，又称五杆旗。其组织分为八个排行，排位称内八字，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按此设立大、二、三、五、六、八、九、幺八个小排位。只分公口不分家，其内部组织都以码头为据点，以茶馆为活动中心，对外朕系。

哥老会虽然口头上标榜“四海之内皆兄弟”，在会内人与人之间不分高低贵贱，一律平等。实际上各地公口的界限和字号的辈分特别严格，以仁字旗力最高，以下依次低一辈。义字对仁字称大爷、三爷、五爷……幺爷等。礼字对义字亦复如此，称伯、称叔，以信字为最低。直至民国十二三年，方改为平等称呼，不分公口、辈分。仁字旗号讲“顶子”，其成员是以士为主要成分，包括士绅、财主、机关首脑等有权有势和有学问的人。加入义字的讲银子，以富商大贾、工厂主、教职员、医生等中产之家为主，人数较多，最为活跃。参加礼字的讲刀子，是提刀枪，使棍棒的人多，形容其好勇斗狠，大部分为军人、警察、特务、跟差、衙役、船工、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烟赌、扒窃、诈骗等，成员比较复杂。参加智字的一般为贫苦劳动者、失业工人、破产农民等。参加信字的则为“下九流”人物。因智、信出现得较晚，很多地方不设智、信公口，即使有，参加者也是寥寥无几。

在哥老会内拥有百数十人，即可开设一个公口，推兄弟中威望较高的粮户、士绅、秀才等为掌旗大爷。哥老会大爷的“龙位”多半是由幺大逐步提升的，也有初次加入即取得这种地位的，叫做“一步登天”。但必须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否则不可能得到。所以，要“嗨大爷”就得有一定的条件，人脉方面需要有上层人物的支持，在年龄上要比较大的，在码头上要有号召力的，说话有人相信或者有一定的学识、官阶，在经济上要有雄厚的基础，对过往客人或兄弟，要洒脱大方不吝啬，舍得花钱应酬。

哥老会要成立新的公口，必须取得附近公口的赞成，并将这种赞成意见，用

① 蔡墩：《话说哥老会》，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230—244页。

书面转达到能够传达到的地方，没有反对意见，才能开成立大会，接收新兄弟，走言语（对外交往）。初期的成立大会多在山野秘密举行，公开以后，始在城镇举行，气氛仍十分肃穆庄严，由掌旗大爷主持大会，红旗管事司仪行令，多用切口语言，行跪拜礼。

哥老会最初设有十个排位，后因其中四排企图奸污兄弟眷属而被处刑。七排因在同清军战斗中出卖火线，使兄弟蒙受重大损失，故后来便不设四、七排，只设大、二、三、五、六、八、九等八排。后世人据此把排位冠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哥老会所有成员均按排次定位，除二排以外都有几人至几十人。公口推选德高望重的贤达名流一人担任舵把子，掌管公口内外的一切工作，负公口的全部责任。其组织体系和职责区分如下：

行一：称龙头大爷、掌旗大爷、舵把子、座堂大爷、正印大爷等。还有副印（副龙头）、盟堂、礼堂、陪堂、执堂、总印、座堂等大爷，亦推选有名的乡贤担任，协助正龙头工作。其次还有不执事的闲大爷（新一和退休的人），会客时自称闲一。开了印的可以提拔兄弟任“恩”拜兄。

行二：称圣贤二爷，推选品端学粹，谨言慎行的人担任，否则宁缺毋滥。二爷是个受尊敬的闲散位置，唯一职务是开会时敬神，随时随地都要穿长袍加马褂，显得文质彬彬。

行三：称桓侯，又称粮台三爷，亦称当家，设二人，推选恩威并具，品学兼优者但任。主管全公口的钱粮、法纪、规约、调查等事务。不执事的对外仍称三爷，会客时自称闲三。开了印的可以提拔兄弟，叫“承行”拜兄。

行五：称五爷、管事，有红旗、黑旗之分。名额不限，一般设执事的红旗管事一人，黑旗管事一人，码头大的设帮办管事二人。红旗管事是公口的关键性人物，他上辅拜兄，为拜兄分忧解愁；下管拜弟，与兄弟铲高削平；内管开山设堂、人事调升，功过奖惩；对外管迎宾赴会、访友，解决纠纷、协调地方关系等。所以红旗管事很难挑选，既要看资历深浅，是否按步递升，又要看对本公口有无功苦勤劳的贡献，以及工作作风是否正派，办事有无威信，能否铁面无私，秉公执法。黑旗管事则分管纪律检查，公开场合无人直呼。有很多公口是一人而二任。不执事的仍称五哥，会客时自称闲五，开了印的可以提拔兄弟，尊称“保举”拜兄。

行六：称“护律”、“巡风”，又称蓝旗管事、帮办管事、金阙、副六等，掌握书册，香规、仪注，帮助管事办理会内事务，并司采询团体内外消息等。

行八：称“纪纲”，受大哥、管事之命，执行纪律事宜。会内有触犯纪律的，经公众及拜兄认为应受刑罚者，由其执行。

行九：“挂牌”，又称“监哨”，负责栽培、引导新进及公布提升调拨升级等事。

行十：称“营门”，传达报告一切事宜。初加入或未提升的称幺满十排，又称辕门，凤尾幺大，率领大小老幺充当护卫执事，听候指派差遣。

五排以上称上五排拜兄，六排以下称下五排哥弟。关于这些品级，不论仁、义、礼、智、信各公口，都可同样配备，视其成员多少而有所增减。[①]

要取得哥老会“大爷”的地位，必须在当地拥有相当多的权势，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家的财富或特殊权益而参加哥老会，平日对兄弟们施以小恩小惠，在兄弟中能主持“公道”，因此，能得到兄弟的信任和拥戴。在取得哥老会大爷的地位后，在地方上也就更具权威了。会内或社会上各种人事纠纷，常常在哥老会茶馆中求得解决。大爷的威信有时比法官还高，有的人在法院打了几年官司得不到解决，只要哥老会大爷出面，就可以“摆平”。哥老会的兄弟中如违犯了帮规，则由大爷在茶馆召集弟兄来讨论，先由举发人陈述违犯者的犯罪事实，然后由大爷交付兄弟共同议论。如果情节较轻，即由犯事者赔礼并交付茶钱即可了事，情节重大的要按规矩制裁，这时，大爷拥有惩处和决定生死之权。哥老会兄弟中妻子被外人奸淫，则由哥老会大爷指派会中兄弟将奸夫淫妇杀掉。

在同一地区内，往往有几个堂口，这就有几个大爷同时存在，其中威望最高的为大爷之首，名为“总舵把子”。所以有当事的大爷和不当事的大爷。由当事大爷管全面，排解兄弟中的一切纠纷，处理大爷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各大爷都开有各自的茶馆，作为各自的码头，并利用它作为哥老会兄弟的活动中心和送往迎来交际之所。各大爷之间亦互相拜访，互相标榜，但如有嫌隙亦相互排斥互相攻讦。各公口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往往大动干戈。

民国年间的哥老会也同清代一样，领导机构分为内、外八堂。

内八堂

内八堂是哥老会的领导阶层，可以决定本山堂的宗旨和方向，行使主持开堂放票、发展会员等职能。对外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代称，具体职位分为：

---

① 蔡墩：《话说哥老会》，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240—242 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帮会要录》，档案出版社，1992 年，第 186—190 页。

总堂　堂口的最高负责人,即山主,或称总龙头大爷或舵把子,统辖全部。
座堂　副龙头或副舵把子。
陪堂　掌管公口经济。
盟堂　掌管公口盟誓。
管堂　掌管人事升迁调补及调节内部纠纷。
执堂　掌管执行任务。
礼堂　管理礼节、司仪。
刑堂　专管执法。

外八堂

心腹大爷　负责管理社内外事务,招待好同党。
圣贤二爷　相当于"军师"角色,要求有文化,具谋略。
当家三爷　管理公口的账目,负责经济收支。
红旗五爷　是公口的执事,辖有蓝旗、黑旗,协助捉人、执法。
巡风六爷　负责巡逻。
先锋八爷　负责探听消息,通报传达。
江口九爷　负责公口日常事务。
幺满十爷　负责接待和通风报信。①

入会

加入哥老会者必须"身家清白,己事明了",即三代人没有红疤黑迹。从清代到民国初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准加入哥老会,即使蒙混过关,一经查出,也要被清洗出去,并要追究责任,即"身家不清问引进,己事不明问承行"。具体规定为:家庭道德败坏,门风不正。本人品质恶劣,作风不好。哥老会宣扬"忠孝节义",反对"奸盗邪淫"。因此,凡偷盗扒窃、衙役、娼妓、鸨母、吹鼓手、跟班、看门、烧水烟、修脚、擦背、男旦、男妓、演[员]、宫娥、彩女、幺姑、妻子偷人、母亲再嫁等,都认为是下九流的下贱人,不准参加。其中许多是劳动人民,遭到鄙视;而抢人劫货的土匪、流氓之类反而欢迎入会,并允许抢皇饷、劫贪官与为富不仁者。

① 刘师亮:《汉留全史》第十一章《汉留之职名》,成都球新印刷厂,1938年;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3—54页;王纯武:《袍哥探秘》,巴蜀出版社,1993年,第36—38页。

理发工人曾替清王朝强迫汉人剃发，裁缝曾为清政府强制汉人缝制马蹄袖衣服，故不能参加。民国年间尺度逐渐放宽，理发及缝纫、小偷、扒手、诈骗、理发业、娼家、唱戏、巫人等可以参加“礼”字以下公口或自己组织分社，由原有礼字以下公口，遴派品级在排行第一的大爷主持“开香堂”。

参加哥老会时要当众发誓：“兄弟如有三心二意，违规乱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参加者必须有四大拜兄的栽培，即介绍入会的引进拜兄（执事幺大），负担责任的保举拜兄（红旗管事），复查、了解身家、己事的成人拜兄（当家钱粮），批准入会的恩准拜兄（掌旗大爷），然后才能开香堂的拈香拜把仪式，正式加入哥老会。恩、承、保、引四位拜兄是新入会者的负责人，拜弟必须崇拜和接受拜兄的教育、指导。拜弟有事情，拜兄也要帮助。

印信证件

参加哥老会要领取公口发出的公片、宝札、拜兄的红片，才能取信于人。一般新加入者，要取得这些证件，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长者三年，短者一年，有特殊情况的人，也可立即发给。领取这些证件，要根据本人的财力大小，举行一次集体或单独的酒宴，招待公口里面的拜兄和执事人员。

公片：代表哥老会的堂名，用优质的红色道林纸做成。正面用黑色正楷印上公口名称，背面盖上两句有关公口名称相切的祝福语（八字木印章）是哥老会对外的代表。

宝札：代表本公口的山名、堂名，和公片同等重要，是哥老会对内的凭据。用红绫子裱糊而成，并根据当地的山名、堂名，印成彩色图案和赞誉公口的诗句。

红片：是哥老会新学或提排人的恩、承、保、引四大拜兄所发的片子。表示这些人都是参加哥老会的人或提排人的证人。其片小于公片，也是红色道林纸做成，正面印黑字姓名，背面印本人堂号的红色小章，一般五哥背面是方印，有功苦勤劳的五哥背面是一条龙（长方形）的印章。大哥、三哥、五哥的红片，叫幺、二、三片子，俗称三大宪片子。有了公片、宝札加三大宪片子，才能正式拜码头、求张罗、请保护。

开印：加入袍哥久了，对本公口有一定贡献，经红旗管事商请，舵把子同意，

可以开印,开印后才可以收纳兄弟。[1]

2. 袍哥的活动

内部活动

哥老会对内打着维护"忠孝节义"的招牌,以排难解纷、教育化贤、扶危济困等口号来笼络人心,其基本做法是:如遇哥老会内弟兄之间发生口角纠纷,请哥老会大爷出面调解,便到茶馆评理(俗称叫言语),理屈者责令开茶钱。如果双方理由各有屈直,地位相当,彼此倔强都不认输,舵把子则拿出绝招,把双方理由讲清楚,然后自认对兄弟帮助不够,管教无方,以"不看僧面看佛面"为结论,自己把茶钱开了。并说:"把今天的事情丢塔(罢了),今后和好如初,不许再提。梁山弟兄,不打不亲,袍哥人不讲不明,理明气散,哪里说哪里丢,哪里讲明哪里休。今后若双方再提此事,就是不给我的面子。"这样既使双方不伤和气,又得人心。

凡会内兄弟不和、儿子不孝父母等事情,由红旗管事先行劝说调解。如一再不听开导,则由舵把子出面,召集当事双方,先把儿子"矮起"即跪下讲话,讲明不孝父母是大逆不道,责令儿子向老人磕头请罪。较重者,要向众人磕"转转头",再不改悔者,把袍哥"搁了",改正了再行恢复。

哥老会也做了一些对兄弟有益的事情,如邀会集资,协助兄弟渡过经济难关,给没有职业的兄弟介绍工作,以解决生活出路。会内兄弟办理红白喜事,是哥老会的一项基本活动,也很能收买人心。有钱的兄弟要办丧事,首先请"帮忙酒",把要办丧事场面的大小告诉管事五哥,五哥便每天派兄弟轮流值班,接待客人,不论烟、茶、酒、饭及送葬等,都安排周密细致。贫困的兄弟办丧事,首先向本堂口的执事大、三、五爷磕头拜孝,说明无钱办理丧事,请求帮助解决。公口的舵把子便通知管事五哥,找兄弟凑人情,并招呼兄弟送情、帮忙,不吃酒饭。有的公口还制备若干套孝衣,由会内兄弟穿起来送葬,显得风光气派。

本"堂口"的大爷或有声望的会众,遇有婚丧喜寿诸事,本堂口的兄弟,必须送礼。

哥老会组织在本地区一般不干坏事。为了能得到本地人们的称赞,往往还要倡办一些慈善事业。遇到天灾人祸,还要救济贫病老弱孤寡。

---

① 蔡墩:《话说哥老会》,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年。

对外交往

哥老会如遇“外堂口”某大爷祝寿，或邻近州县场镇的哥老会开山设堂，只要得到相邀请帖，必须派出以大爷、当家、三爷、红旗五爷、幺大等为代表的队伍，打起写着“公口”名称的大红灯笼，携带匾对等礼物前往祝贺，参加“开山堂”的仪式。主办者除私自宴请特邀客人外，还要举行数天的“迎宾会”，欢迎各地前来祝贺的兄弟。

按照哥老会的规矩，凡兄弟流落在外，一时生活无着或缺乏路费，可由本人出示名片，拿言悟（自己申明）向当地码头找自己公口的本字号（仁字找仁字，义字找义字）的红旗管事，请求周济，当地公口不能拒绝。如招待不周，接待不当或遭到轻视，这个当事哥弟回去拟了盘（反映情况），以后这个码头的兄弟便会受到同样待遇。

越边过道，走州闯县的哥弟持有本公口的“穿眼公片”（用香火烧了孔，在孔中插一鸡毛），见此者，明知是逃亡罪犯，但碍于江湖规则，不但不能向当地政府报案，反而要资助其旅费，派人护送出境。

会期

袍哥每年都有三次盛大的例会：一次是单刀会，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纪念关羽单刀赴东吴的事迹，各公口多在此日举行大会，以示敬仰和追念。一次是中元会，又称盂兰会，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或中旬举行，以悼念死亡的哥弟，仪式颇为隆重。还有一次是团年会，每年农历腊月初一至二十日之间，任选一日举行。又称吃团年饭，由当家钱粮报告收支情况，并列单逐笔公布。红旗管事报告新进人数、顺社人数、死亡人数以及提升调出、功过奖赏、明年执事人员等名单，张贴红榜，并请舵把子总结全年兴革事宜。

另外还有小会，一是新年团拜会，只有部分人参加，多为哥老会兄弟请公片、请宝札、请拜兄红片、开印、送印、送片等。二是茶会，哥老会公口多设于茶馆内，由执事人轮流值班，早晚碰头联系，解决日常事务。[①]

民国年间四川的哥老会，也同清朝时期一样，按其性质和行为分为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

清水袍哥多属仁字公口，大多由学界、退职政界或社会贤达掌握。其成员

① 蔡墩：《话说哥老会》，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年。

多数居住在城镇、农村从事正当职业，或暂时没有职业但也不惹事生非的本地人，经人引进，公口承认即可参加。成员中没有明显的抢劫行凶、杀人越货行为。凡遇"越边过道"，"慕名拜访"或专程前来投奔某公口某大爷的，都要用袍哥的礼节招待，绝无违礼行为。

浑水袍哥大多属于义字公口，由武人居多的团派、团阀掌握。但也有清水袍哥中混有浑水的。至于纯粹的浑水袍哥，则是土匪袍哥的专门组织，其组织形式、人员配备、交际往来都与普通哥老会有明显的区别。

礼节和闯码头

哥老会成员之间除参加组织及提升的成员采用作揖磕头外，彼此间会晤、开大会等，均采用丢"拐子"的形式。如"开山"、"设堂"、"开戳"、"迎圣"、"安位"、"开光"、"点像"之类的隆重仪式，均要行"三个拐子两个揖"的礼。"丢拐子"的方法是：左脚斜伸，右腿微屈以支撑上身的重量。右手拐必肩微低，右手握拳，左手握拳放于右手颈上，这是行一的"歪子"；左手放置于右手臂中部，这是行三的"歪子"；左手握拳放于右手臂弯上，那是行五的"歪子"；舵把子丢拐子，是脚左伸右屈左手握拳，大指上伸置于胸前，右手拐直、握拳，大拇指向上伸，表示龙头大爷。动作要干净利落，衣服要甩得虎虎作响有生气，不能委靡不振。[1]

哥老会外出闯码头时，一般要在茶馆酒肆"挂牌"，亮出身份，以便同当地的哥老会组织取得联系。挂牌的方法是：在当地的茶楼、酒肆找一个位子坐下，两腿平放。当茶房端上茶壶、茶碗后，要把茶壶放在桌角上，壶嘴对角，或朝向自己。左手要将手指弯二伸三，食指与拇指呈开口椭圆形。递烟时，右手食拇二指放在烟杆或烟卷的中间，竖着递过去。同时左手点在右手盘当的位置，以表示自己在会内的身份和地位。地位低接烟的下头，地位高者接烟的上头，地位平的亦接下头以表示自谦。手拿茶杯时，不可把手掌覆盖在茶杯口上，也不能捧茶杯的底端。[2] 负责接待的人员看到上述动作后，就会前来探询，说一套哥老会的"礼语"，表示欢迎："怪道昨夜仃花爆，却系来了大英豪。小弟迎驾来迟了，还望仁兄要谅高。"端茶送水时说："清水一杯浪悠悠，光天之下接拜兄。接兄不

---

① 杨楚湘等：《泸州袍哥》，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348 页；蔡墩：《话说哥老会》，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

② 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67 页。

为别一件,同心同德解烦忧。"如果会内哥弟因发生重要案件,处于困难危急中,需要赠送盘费时要说:"手执金多条喜非常,新福大哥择凤凰。择凤凰来送凤凰,去效桃园刘关张。咱兄弟来接待,择凤摆凰看吉祥。"

3. **帮规、誓约及赏罚**

哥老会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有严格的戒律以约束其成员。袍哥有十大帮规、四条誓约及十六条赏罚。

十大帮规:不准泄露帮务、不准同帮相残、不准私自开差(抢劫)、不准违反帮规、不准戏嫂欺妹、不准引见匪人、不准扒灰倒灶、不准吞没水头(赃物)、不准违抗调遣、进帮不准出帮。

四条誓约:验收秘密、谨守帮规、患难相共、与帮同修。

十六条赏罚:泄露机密者斩,抗令不遵者斩,临阵脱逃者斩,私通安清者斩,引水带线者斩,吞没水头者斩,欺侮同帮者斩,调戏妇女者斩。忠心帮务者赏,拒敌官兵者赏,出马最多者赏,扩张帮势者赏,刺探敌情者赏,领人入伙者赏,施仁义者赏,同心协力者赏。①

哥老会中人如果立了功,或替拜兄个人做了使他称心快意的事,都同样叫功苦勤劳,给予提拔升级或现金等不同程度的奖励。其中如果功劳突出,本人又有才干,还可以越级升为红旗管事。

哥老会对于违反帮规、誓约者,根据其情节予以惩处,具体办法有以下一些:

挂黑牌。即将触犯了帮规者的名字用白纸写黑字贴于墙上,并停止其开会等各种活动,交会中监督反省。经考察一段时间,看其改悔程度,再行拆除黑牌,准其恢复活动。

赔情道歉及经济惩罚。这是对犯小过错的最轻处分。如酒后骂人,无意间冒犯妇女等,只要知过改错,赔情道歉或开茶钱即可。若情节重的就要设酒宴道歉、挂红、放火炮才能了事。

矮起。哥老会成员中有不孝父母、打骂兄长等,经查属实,首先叫犯错误的人"矮起"(跪下)来说明道理,辨别是非,到认错改过为止。

传堂训戒。即召集全公口哥弟当众教育,实行打手心、打屁股等体罚。

---

① 吴有梧:《袍哥帮规、令词及茶碗阵》,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510页。

磕转转头。会中人犯的错误影响面宽,经教育自愿改者,龙头大爷命令其向周围在场的不分男女老幼都要一一磕头。

走知会。犯错误而逃跑外地的哥弟,由公口通知当地哥老会组织,协助劝其返回原地,将错误说清楚、讲明白,请求原凉者,可从宽解决。如逾期拒不返回,悬牌宣布开除,并通知所逃奔地方的哥老会,必要时当众宣布其所犯错误事实。

搁袍哥。凡是做了对不起公口和哥老会兄弟的事,经查证属实,把袍哥搁了。本人承认错误悔改后,可予以恢复,叫暂时搁袍哥,永不恢复的叫连根拔搁袍哥。

放河灯。对于谋杀哥老会中人的亲夫的奸夫淫妇,用门板将奸夫淫妇合钉其四肢,或将其奸夫杀后割下的头放于淫妇钉后的下身处,再写明罪行及不准哥老会人施救,放置河中,顺水漂流。

草坝场。兄弟犯了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由本公口龙头大爷传堂,在深夜荒凉而又阴暗的地方送行。四周安置警戒,龙头大爷抹红脸,当家三爷及管事五爷抹花脸,宣布罪行后,被处死者提出照顾家小等要求后,龙头大爷交匕首一把,逼其自杀,三刀六个眼,胸、心、腹对穿,或自己挖坑自己跳下进行活埋。[①]

三、四川袍哥蜕变为军阀混战的工具和土匪

四川袍哥的蜕变,主要原因是四川的军阀本身大多都参加了袍哥组织,而且几乎都是袍哥的"舵把子"。邓锡侯是四川最大的袍哥,其次是王陵基、王缵绪、杨森、唐式遵等大军阀。[②] 大军阀刘文辉也是袍哥头子。[③] 刘文辉手下的高级军官也多是袍哥的头子或骨干,如他的师长邓和、李宗煌等都是袍哥的舵把子。四川大军阀刘湘手下的旅长、曾任雷马屏司令的穆瀛洲,是袍哥义字旗的舵把子,拥有三四万人的武装。大军阀刘存厚和田颂尧也是袍哥大头子,并充

---

① 蔡墩:《话说哥老会》,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杨楚湘等:《泸州袍哥》,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

② 《四川帮会调查》,1949 年,转引自赵清:《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17 页。

③ 《川康地方派系概况》,社会问题研究所,1949 年,转引自赵清:《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18 页。

当袍哥组织的后台。驻扎在川东和重庆一带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当初为了革命而参加袍哥,所部官兵大多是由起义的袍哥组成。川军第二军、第三军及其他川军部队,也有很多师、旅是袍哥队伍。[①] 有的大军阀虽然本人不是袍哥,但是也与袍哥有密切关系。如刘湘属下的高级军官,与重庆著名的袍哥大爷冯什竹、唐绍武、李祝三等,不仅与该部袍哥出身的师、旅长范绍增、陈竹兰、邓国璋等称兄道弟,而且与其他军官也有来往。[②]

四川的大军阀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扩展地盘,也需要袍哥的帮助与效力。刘文辉在担任四川帮办时,为了巩固自己在川西的统治地位,千方百计笼络各地有势力的袍哥头子,作为他的社会基础。为此,他趁办花会的机会大肆宴请各县的袍哥首领,出席者多达 63 桌。出席宴会的袍哥代表致辞称:"当今刘帮办扶持袍哥不遗余力,吾人感谢主人的厚意,殷切招待。今后能为四川建设出力之处,应当尽力为之。"[③]可见袍哥与当地军阀官僚关系之密切。

1. 袍哥与地方军阀的结合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四川袍哥也以功臣自居,认为如今应该是帮会的天下。"多数(袍哥)大爷成为包庇作恶,坐地分赃的脏主。"一些袍哥大爷还嫌坐地分赃难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更采用做生日的办法,每年要做生日三到四次(包括父母和妻子的生日),借此大肆敛钱。那些无钱送礼的穷袍哥,便去拦路抢劫。那些有政治野心的袍哥大爷,则利用袍哥势力,暗中购买枪弹,建立武装,在偏远地区,霸占要口,征收货税,或者贩运食盐和烟土,有的甚至称霸一方。[④] 1915 年袁世凯称帝以后,四川袍哥积极参加了反袁护国运动,其势力也趁机再次兴起。当时,袍哥首领张达三高举护国大旗,自任川西护国军司令,发动讨袁战争。在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中,四川的将领刘存厚、熊克武等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在斗争中增强了政治和军事实力,滋长了政治野心,企图利用在护国战争中得到的声威,在四川建立新的独裁统治,从而变成了四川的军阀。其中著名人物还有邓锡侯、衬洪范、赖心辉、田颂

① 唐绍武等:《重庆袍哥史话》,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272 页。

② 唐绍武:《解放前重庆的袍哥》,载《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③ 侯少炫、邹善成:《袍界"三开"人物李安帮》,转引自赵清:《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21 页。

④ 范绍增:《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 84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年。

尧、陈过栋、刘成勋、但懋辛、向传义等。军阀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则需要得到袍哥的效力和支持。而军阀的混战，更进一步促成了袍哥蜕变为军阀的工具和土匪化。

护国战争后，四川形成了军阀割据的“防区制”。军阀们在“防区”内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可以擅自任命官吏，发布政令，设立独立的警察和司法机构，任意关押群众，甚至发行货币，开设银行，加捐加税，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各地军阀为了在防区内扩充队伍，便借助于袍哥的关系，招募游民或招安土匪。据统计，20 世纪 30 年代四川的军队最多时曾经达到三四十万，其中袍哥就约占 1/5。[①] 袍哥中那些掌握兵权的“龙头大爷”，则变成了新军阀。[②] 不仅大军阀如邓锡侯、王缵绪、王陵基、杨森、唐式遵、刘文辉等都是袍哥首领，而且连军队里的军长、师长、团长，也多是各地袍哥里的大龙头。熊克武在护国战争中，曾在川南、川东收编袍哥队伍，组成川军第五师，其中很多中下级军官都是袍哥，士兵中袍哥更多。熊克武做了四川督军后，第五师系统扩编为川军第一军，其中的第六师全部是由原江防军改编而成，而江防军四个区的司令杨春芳、陈兰亭、范吉祥和刘鹏程，全部是袍哥首领。该军的一个混成旅扩展成的独立师也都是袍哥队伍。川军刘湘、杨森的第二军、刘成勋的第三军系统，也有很多师、旅是原来的袍哥队伍。[③] 刘文辉不仅本人是袍哥头子，而且他的五哥刘文彩、侄子刘树成也是袍哥首领。袍哥队伍与军阀相结合，使袍哥势力又有了新的发展，袍哥首领范绍增成了新成立的第九混成旅旅长。1925 年四川军阀刘文辉、邓锡侯等击败杨森后，所辖三个军中负责市区治安的，也大半是袍哥分子。

军阀利用袍哥作为互相争夺势力范围的工具，袍哥则趁机发展组织。重庆的袍哥码头，对于前后驻防的军阀队伍，无论是川军、黔军、北洋军，均采取逢迎的态度，为其销售烟土，贩卖枪支弹药，甚至代办招安，代拉队伍。袍哥大爷唐绍武利用同军阀勾结的机会，经营枪支弹药生意。1920 年秋，唐绍武结识了大土匪头子、招安军的司令邓国璋，再通过邓结识了邓锡侯的部下黄逸民等许多袍哥分子，军火生意销路更广。邓一次就付给唐绍武 4 万元大洋，由唐绍武到

① 唐绍武等：《重庆袍哥史话》，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272—273 页。

② 王纯五：《袍哥探秘》，巴蜀书社，1993 年，第 148 页。

③ 赵清：《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01 页。

上海打开直接从外国洋行进货的管道，大发其财。在川军中，除刘湘外，其他各军购买枪支弹药，也大多是由唐绍武经手，因而获利甚多。刘湘部队驻防重庆最久，重庆袍哥与其部下的关系尤为密切。著名的袍哥大爷如冯什竹、唐绍武、李祝三等，不仅同该部袍哥出身的师、旅长称兄道弟，而且同其他军官也有来往。1934 年，刘文辉带领二十四军撤退到西康，让他的五哥刘文彩到西康建立袍哥组织，并指派军部副官长陈耀伦和旅长袁国瑞、省财政厅长文和笙等人协助筹备。又派人专门到宜宾邀请袍哥的仁字旗叙荣乐大舵把子宛玉庭、义字旗大爷李绍修来到西康的雅安，主持成立雅安袍哥总社，由刘文彩等 5 人担任“总舵把子”。由于当时雅安所属各县普遍栽种鸦片，运输和销售皆需要武力保护，于是，纷纷建立武装，而这些武装皆控制在袍哥手中。二十四军为了掌握这些袍哥武装，师旅长也都纷纷加入袍哥，从 1941 年起，在雅安先后建立了 9 个袍哥的公口，社长皆由现任或退役的军官担任。[①] 此外，还有许多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同时也是当地的袍哥大爷。

2. 四川袍哥的土匪化

四川袍哥在与军阀结合的同时，也在走向“土匪化”。

四川袍哥中的“浑水袍哥”，多由没有正当职业的下层群众组成，主要从事打家劫舍等活动。民国年间四川由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不聊生，造成土匪肆虐，哥老会中的浑水袍哥趁机大肆活动。他们不仅打家劫舍、绑架勒索，甚至截击军队，占据县城。各地军阀为了扩张势力，不惜把他们招安成军。许多土匪头子在被军阀招安后，便成为某某军的师长、旅长、团长。如当过师长的范绍增、陈兰亭、杨春芳、魏甫臣、喻海清等，当过旅长的邓国璋、龚纬清、羊仁安、邹善成、石肇武、陈凤藻等，都是以袍哥头子、土匪身份一跃而当上军阀，走上显宦达官宝座的。另外，哥老会、土匪亦是依赖军阀、官僚作为靠山、护符，互相利用。到了民国中后期，大多数的哥老会组织与军阀、官僚和本地的封建势力串通一气，为反动政权所利用，有些头头本身就是统治阶层的地痞恶霸，如金堂县的巨匪赖金廷就是川西的浑水袍哥头子，他的叔父和三哥、姐夫都是浑水袍哥的头目“老幺”。赖金廷最初给他们充当管事，后来跟随姐夫彭执其接受川军师长刘斌的招安，当上营长。但是，他匪性不改，继续为匪。他一方面偷走大批枪

---

① 杨国治:《西康雅属的袍哥》，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336—338 页。

支，另一方面又通过吃掉溃军来扩大势力，在金堂、中江、简阳、新都、广汉、德阳等地进行抢劫活动，并与川北、川西、川南各地30余县的匪首结拜弟兄。[①] 再如川西的吴之镐也是著名的浑水袍哥，他幼时家境贫寒，加入袍哥后，于1916年当四川护国军发动讨袁之役时，他与二哥前往投军。在当兵期间，经常仍与一些土匪出身的官兵到乡下抢劫。后来所部被收编，他便脱离军队，纠集一批人回到家乡为匪，最多时曾拥有2000多人。1922年被川北清乡军招安，初任营长，后来升任县城防司令，以后又被川军十四师师长委任为旅长。再如陈兰亭，少年时加入袍哥，曾在云阳一带游荡，广交朋友。后来回到家乡，以三支步枪起家，打家劫舍。护国之役，陈兰亭投入江防军担任连长。1920年，川军与滇军、黔军作战失败，江防军向合川撤退，陈兰亭不愿离开川东，遂命令心腹率一排人返回石柱，并将一批枪械弹药存放在重庆义字袍哥李祝三家中。在江防军退走途中，陈兰亭又分散所部，携带武器返回石柱。之后，又吸收几股队伍，发展到千余人。后来江防军回到重庆，改编为第一军第六师，陈兰亭担任团长，后升任旅长，以后又投奔杨森，仍任旅长。1931年投向刘湘，并在范绍增的帮助下，通过袍哥的关系受到潘文华接纳，出任潘部师长。

四川的袍哥从清末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在民国年间蜕变为军阀或土匪的情况，在吴福辉所著的《沙汀传》中有十分形象的描述："辛亥前，安县袍哥的主要成员是城镇无业游民、摊贩、手工业工人。""百姓参加袍哥，是为了保护自己，也偶有破落子弟，或急公好义的小粮户侧身其间。"他们虽然偶尔也从事贩烟、路劫，但都认为是面对为富不仁者，其主要活动还是"重仁取义，济困扶危"。他们所处的被压迫地位，使他们在辛亥革命时期，能够在保路运动中与同志会共同举义。当时"无路可走的农民大量涌入，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过去瞧不起袍哥的乡绅，也纷纷加入"。乡绅加入，不必从老幺十排做起，"他们只需捐了钱，便成为辈分最高的'一步登天的大爷'"。这样，袍哥的实权落在了乡绅的手里。而且这些人很快又当上团总、乡长之类的角色。许多拥有武装的袍哥头面人物，往往被招安，"这就使得四川形成了官府、乡绅、军阀、袍哥四位一体，互相联结又互相争夺的局面。哥老会可以是执政的势力，也可以是在野的势力，无论哪一种，它都变了质"。[②]

---

① 金堂县文史资料组：《金堂巨匪赖金廷》，载《成都市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② 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7—28页。

3. “袍哥大爷”的代表人物

“袍哥大爷”兼军阀范绍增

四川袍哥最著名的“袍哥大爷”范绍增(1894—1978),原名舜典,号海廷,四川大竹县清和场人。曾担任过川军军长,在袍哥组织中混迹了三四十年。他自幼不爱读书,时常跟随祖父打鸟捕鱼,到茶馆里听评书,所以,对于江湖豪侠、打富济贫之事,很感兴趣。[①] 他又喜欢赌博,家里人送他到私塾读书,他却把2/3的时间待在赌场里鬼混。其祖父当时在青和场当镇长,觉得孙子整天在赌场里鬼混,败坏了家风,在气愤中让范绍增的伯父把他拉到山里活埋。还是母亲把他偷偷地送到舅父家,才免于一死。他在赌场曾听说达县有个摆赌场的“张大爷”,就前往投奔,从此便在张大爷那里帮忙。由于他对赌场里的事情样样在行,因此深得“张大爷”的喜欢,并让他加入了袍哥组织,更成为张大爷的得力助手。[②]

那位赌场的“张大爷”名叫张作林,是个清朝的秀才,是渠河袍哥的礼字号“舵把子”。他表面上“嗨袍哥”,开赌场,暗地里却在招兵买马,利用赌场赚的钱,买了几支手枪,并且让手下的弟兄们出去抢劫。又把抢来的钱,一部分作为买枪的资金,两三年内,竟发展成一支1000来人的队伍,还打出了“革命”的旗号。1916年,这支队伍被编入四川讨袁的护国军,张作林担任连长,范绍增当了排长。讨袁战争结束后,四川的护国军归属熊克武,在整编时,张作林的队伍大多被遣散,张隐藏了100多支枪,并暗中进行反对熊克武的活动,被熊的部下侦知后,将张杀害。张死后,范绍增被公推为礼字号袍哥首领,他纠集了200多人,取出隐藏的枪支,占据达县、渠县、大竹交界地带,“就地筹款,扩充势力”,实际上是在当地充当土匪。据范绍增回忆说,他们当时“筹款”的办法有三种:一是收货物税,对过往船只按照所载货物多少、贵贱不同收税,保障船货的安全,实际上就是收取保护费;二是“摆赌场”;三是“包绅粮收租子”。当时地主、乡绅为了躲避军阀混战,都躲到城里,不敢回家收取地租。范绍增就派部下承包

① 陈章文:《范绍增》,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范绍增:《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载《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199—200页。

他们的地租，抽去 1/5 的“包收费”；四是公开抢劫。[①]

范绍增利用上述办法，筹集到很多钱，并拿这些钱到当地驻军中与当兵的相勾结。“凡拖来一支枪，即奖洋一百元。”在两三年之内，这支土匪队伍竟扩大到七八百人，拥有四五百支枪。不久，队伍又被“靖国军”收编，范绍增当上了营长，以后又升任团长。后来，范绍增所属的队伍被打垮改编，范绍增又到熊克武手下当团长。1917 年，范绍增在绥定（今达县）与罗君彤结识，此后二人互相依靠达数十年之久。1920 年，熊克武任四川督军，范绍增改任川军第六师的团长，旋因与旅长不合而辞职。1923 年川军内讧，杨森败逃湖北，不久又返回四川，委任范绍增为旅长，范绍增遂成为杨森的得力干将。1926 年杨森参加统一之战失利，由湖北返回四川，成立讨贼联军，范绍增任第七师师长。1927 年春，杨森奉蒋介石之命，率领范绍增等，前往湖北驰援，受到武汉革命政府的反击，范绍增受伤。但他在这次援鄂中，收编了三个混成旅的队伍，实力大增，受到杨森的猜忌，并欲借抓赌将他枪杀。范绍增绰号“范哈儿”，意指其外表憨态可掬，傻里傻气，但却颇有心计。相传他在杨森部当师长时，杨森因他出身袍哥、绿林，又风闻他有背叛之心，因此设下鸿门宴欲寻机解决这个外表憨厚的师长。范绍增在客厅里等了两小时，不见杨森出来，心知有异，便大声说：“人家说我反对军长，实在是岂有此理！部队好比家庭，军长好比父亲，师长如同儿子，哪有儿子公然反对老子的道理？”杨森在内室听见范绍增在那儿自言自语，一腔猜疑都化为乌有，不由喜上眉梢，跑出来接见。但他仍然对杨森存有戒心，遂与刘湘手下的潘文华等结盟讨杨，并被蒋介石委任为“川鄂边防军总司令”，从此便投靠刘湘。抗战开始后，因为向蒋介石告密刘湘、韩复榘勾结一事有功，又因为得到孔祥熙、顾祝同的支持，被任命为第八十八军军长。

范绍增早在杨森手下时就同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拉上关系。据范绍增本人称：“当时我是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当第七师师长，驻防万县。杜是上海青帮头子，我早已听人说过。我是四川的袍哥大爷，他也知道。由于这一关系，他便经常介绍他的徒弟们来找我，要我帮助他们在我的防区内收购鸦片。我每次接到他的介绍信，总是尽力帮忙。1928 年前后，我在刘湘部下当第四师师长时，他还介绍他的同门弟兄、吗啡大王陈坤元到我的防区邻水县来开设了一座吗啡工

① 范绍增：《我与四川袍哥及川军混战》，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399 页。

厂,由我给以保护。当时在鸦片出产地设厂制造吗啡,所获的暴利比从四川运鸦片到上海要大十几倍。1929 年我第一次去上海和他见面,他除了对我盛情欢迎外,还和我换了庚贴,结为异姓弟兄。"①

"五毒俱全"的袍哥大爷冷开泰

四川的袍哥头子冷开泰,是一个集袍哥、土匪、毒贩、国民党特务和巨商大贾于一身的袍哥头子,可谓"五毒俱全",成都袍哥称他为"冷大王"。冷开泰是四川省仁寿县观音寺木泥寺村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少年时代曾在丝行里当学徒,因为嗜赌不务正业,且偷窃丝行里的生丝,被发觉后逃往合川,依靠舅父王某在"卡子"(基层收税机关)当"卡员"(收税员),其间学会了勒索贪污的手段。后来回到成都,投入清巡防军当兵。他因受恩拜兄、成都新巷子罗大爷的栽培,在加入袍哥后成为一名"小老幺",学会了一套仗势欺人的本领。他常对人说:"我是赤身露体而生,死时能有稿帘子裹身,已有赚了!"②辛亥革命时期,他趁巡防营哗变的机会,积极参加抢劫藩库银的活动,他带头开仓,将库银 700 万两(一说 300 万两)抢劫一空。事后因怕追究,远走甘肃碧口,开始了贩运鸦片和土匪生涯。当时做鸦片生意,必须依靠袍哥,冷开泰经过多方钻营,投靠了袍哥的"川西三杰"——灌县袍哥首领刁青云、申介屏和宋辅卿。他凭借这层关系,除了自己贩运鸦片外,还允许别的烟贩搭帮,搞起"保商"勾当,获得大量不义之财。在发财之后,他便大肆挥霍,狂嫖滥赌,很快把钱花光,而且得罪了刁青云等三位舵把子,在当地无法立足,只得跑到重庆。1916 年,他在重庆结识了著名匪首彭氏三兄弟,又开始了抢劫和贩运烟土的土匪生涯。不久,彭氏三兄弟或死或被枪毙,冷开泰又利用袍哥的关系,与一些土匪换帖拜把,在成都、华阳、简阳、仁寿一带形成一股恶势力。不久,他接受赖心辉的招安,驻防龙泉驿、茶店子、山泉铺等地,继续干着抢劫行旅和住户的勾当。某次,他探得遂宁商帮将护送一二十挑银锭进城,于是带领队伍,在山泉铺抢劫了这批银锭。他们既抢劫,又贩烟。贩运云贵烟土,每次达几十挑,用洋油桶伪装,外用草捆上,以"靛脚子"(染料)伪装,沿途有袍哥掩护,又与土匪通声气,所以

① 范绍增:《关于杜月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载《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年,第 243—244 页。

② 熊倬云:《五毒俱全的袍哥冷开泰》,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447 页。

可以顺利运到成都。

1921年,冷开泰在重庆帮助彭氏三兄弟手下的"杨破老壳"购买手枪时,结识了来自上海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邱伯垣,邱是青帮头头,当时恰好有三支新式手枪,冷开泰以高价购得再转卖给杨。后来杨被人告发并枪毙,官府下令追查卖枪之人,冷开泰被捕后未将邱伯垣供出,出狱后受到邱伯垣的邀请前往上海,受到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黄金荣等的热情宴请。冷开泰则趁机吹嘘四川袍哥的力量及与军阀之间的关系,得到上海青帮头子们的青睐。当时汉口的洪帮帮主杨庆山也在上海,通过邱伯垣的介绍,冷开泰结识了这个把持汉口的洪帮人物,两人相见甚欢,邀请他加入洪门。从此,冷开泰便成为了长江沿岸赫赫有名的地头蛇。其后,冷开泰又利用青帮的关系,帮助川军第三混成旅的"游击司令"易吉三(原是土匪)购买到一批枪支,并由洪门(实为沿江一带的哥老会)平安护送到四川。从此,冷开泰就有了青帮和袍哥两种护符,更是如鱼得水。有一次,四川军阀刘湘从上海购运大批枪支弹药入川,在途经万县时,竟被杨森指使范绍增令部下冒充土匪将枪支劫走,使刘湘大为恼火。恰好刘湘的谋士刘从云知道冷开泰有通天的本领,便向刘湘推荐冷开泰。冷开泰听说是从上海购买武器入川,便亲赴上海托青帮购入大批枪弹,沿途用法国兵舰护卫,大批枪弹平安运抵重庆。刘湘想不到一个袍哥头目居然有如此手段,便把冷开泰留在身边,先让冷开泰当了宜昌办事处副处长,后来又升为四川航检处长、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情报处长。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撤销后,冷开泰又投靠了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组织,此事被刘湘觉察,将他一脚踢开。

冷开泰下台后,便利用自己与军阀和袍哥的关系,筹组公司,从事经济投机和诈骗活动。

他首先开办了恒泰字号,自任总经理,并邀请一些川军高级军官来公司任职。特别邀请曾担任范绍增经理处处长的李汝恒任协理兼会计主任,并把川军二十八军的财务处长张明岩、旅长龚渭青、经理处长谢秉钧等人拉来担任监察。该字号经营的业务,除放款和投机外,就是公开贩卖鸦片。他们派人到云南、西昌等地采购鸦片。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公司只讲铺张,不务实际,对外交涉应酬,不惜花费,对内注重排场,烟榻赌具,一应俱全,供股东和来往宾客尽兴玩乐。虽然经营中获利不少,但开支数额同样庞大,加上冷开泰把公司的鸦片几十挑用来偿还私人所欠的3万银元债务,又在崇宁县私置田产200亩,以致入

不敷出，前后仅存在了一年时间就告结束了。

其次是组建西宁公司。该公司的全名是“西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刘湘主政时期，由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向刘文辉建议下筹划的，而二刘又是在冷开泰的撮合下合作的，所以，刘航琛就推荐冷负责西宁公司的筹备工作。公司正式成立后，总部设在雅安，并在成都、富林、西昌、昆明等地设立办事处。公司由刘航琛任董事长，傅真吾任总经理，刘航琛因为深知冷开泰用钱挥霍，又不善于经营，所以，只让他负责运输。公司成立不久，便因为派系纷争而陷入困境。冷开泰在公司内部的主要助手是熊雨时等人，运输方面所依靠的社会力量则是袍哥、土匪，在成都、雅安道上依靠巨匪张明清，他拥有200多人，担任运输大队长。后来运输折本，贸易也不兴旺。1941年撤销运输部，总公司也由雅安迁到成都。因为业务不好，便以开发冕宁、越西大红山森林为词，由羊仁安出卖林木，骗潘昌猷承买，名义上说冷开泰是买主，潘昌猷付款几十万元，结果未得到一根木料，实际上是个大骗局，所以也仅存在一年多即行解体。

第三是组建蜀和公司。西宁公司垮台后，冷开泰利用袍哥的关系又组建了蜀和公司。他邀请成都附近各地袍哥码头入股，每个码头20万元，一共40个码头共凑成800万元。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存放款、代粮食部运输粮食和购买四川的红白糖、烟叶，运销陕西。当时四川不仅征购粮食的数额巨大，而且政府专卖的烟、酒、糖等，也需要有人承运销售。而当时四川境内遍地土匪，运输很不安全。冷开泰自恃有袍哥与土匪的关系，认为蜀和公司完全可以承担运输任务，于是携带巨款到重庆，向有关部门进行活动。可是，他在一夜之内竟把蜀和公司的股本几乎全部输光，只好通过关系，得到戴笠和孔祥熙的关照，终于获得承运粮食的业务，并以制造板车和预拨经费的名义，获得2000万元的巨款。由于他惯于挥霍，且大权独揽，不善经营，公司很快就出现了亏空。最后导致公司信誉扫地，被迫关门。

第四是组建汉华公司。蜀和公司结束后，冷开泰于1946年春在成都御西街邹善成宅内成立“汉华公司”，成立袍哥山堂汉华社。公司成立后，冷开泰自任理事长，邹善成任监事长，筹股的办法是，每股股金一万元，给予优厚利息，并以复利计算。15年后每股即可取得15万元。他利用人情关系，尽量拉拢袍哥兄弟入伙当股东。但是收效甚微，加之法币急剧贬值，公司的股金、存款，即使用复利计算，15年后每股也仅能购买包香烟，公司随即垮台。

第五，开山堂建立汉华社。他当了多年的袍哥却从未开过山堂，也未成立过自己的码头。1946年春，他邀请著名的老袍哥王蕴滋、彭光烈、吴毅侯等作为主要发起人，他本人则担任舵把子。王蕴滋对袍哥源流及内幕了解颇多，遂为"汉华社"撰写了一本《海底铨真》，彭光烈则动员群众参加袍哥，冷开泰本人则到康定警备司令邹善成处，将《海底铨真》在天全、芦山、宝兴一带推销，使自己大发其财。①

尽管冷开泰在"事业"上多次失败，但是，他利用袍哥和土匪的活动却并未停止。他庇匪拉肥，坐地分赃，入股诈骗，强行勒索，最后，他又投靠国民党，参加旨在反共的"游击干部训练班"，把一些袍哥、土匪、恶霸拉入训练班受训。四川解放前夕，又阴谋聚众暴乱，1950年被人民政府处决。②

范绍增和冷开泰两人的经历，非常典型地说明袍哥在清末民初是如何蜕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或黑社会组织的。

---

① 熊倬云:《袍哥舵把子"发迹"之谜》，载《民国帮会:秘闻与纪实》，团结出版社，1994年，第229—244页；熊倬云:《集军匪特为一身的冷开泰》，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卷二十，第424—434页。

② 熊倬云:《五毒俱全的袍哥冷开泰》，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447—467页。

第三章　民国年间的青帮

民国年间青帮逐渐从下层社会的互助性组织，蜕变为黑社会，或成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鹰犬，或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其基本情况，如开香堂、帮规诫约等，同清代相比较，已经有不少变化。特别是抗战时期，青帮中一些头面人物，有的直接落水当了汉奸，有的迁居西南后方或寓居香港、澳门，也有许多暂时隐迹潜踪，不肯公开活动。于是那些下层青帮分子或冒充的“空子”，也开堂收徒，俨然成了青帮的“老头子”。他们开香堂收徒弟，并不注意帮规仪式，也不一定有通晓帮规仪式的“传道师”来主持，而是随意安排。①

一、开香堂和赶香堂

青帮把吸收新成员的仪式称作“开香堂”，凡“同参兄弟”或老头子的前人前来参加开香堂仪式的，称为“赶香堂”。民国年间青帮开香堂的仪式比之清代已经大为简化。具体情况如下：

正规的香堂一般利用朝南的厅堂，堂内正中摆设供桌和牌位，牌位写“天地国亲师”（清代为天地君亲师），在供牌位的供桌以南一米许处，正中又设一较小的供桌，供“小爷”牌位。加入青帮需要有三位师父，即“本门师”（自己拜的老头子）、“引进师”（介绍人）和“传道师”（主持仪式的进行，负责传授青帮的帮规等内容）。本门师所邀请的另外两位师父，必须属于不同的帮口。所谓“帮口”，是因为青帮来源于粮船水手的行帮，如“江淮泗”、“兴武六”、“嘉海卫”等。开香堂时，三位师父要分别交代他本人所属的帮口，和本人三代师父的姓名籍贯。由于三位师父分别属于不同的帮口，每位师父又有三代师父，所以构成“三帮九代”。每个青帮成员都必须熟记自己的“三帮九代”和“十大帮规”，以备外出闯

① 杨方益：《漫谈清洪帮》，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75页。

码头时接受查问。

开香堂行礼称作"孝祖",不管什么字辈,都要严肃地站立在各自的行列。在所有人按班肃立后,由传道师点烛烧香,发号施令,每个动作,传道师都要高声朗诵几句似诗非诗的词句。点烛烧香后,在传道师指挥下,先由本门师等先后向牌位和供桌叩拜,接着所有人皆按照字辈依次叩拜。最后由新入帮者叩拜。新入帮者叩拜时,必须先微微弯腰,将左手按在左大腿上,再将右手按在左手背上,然后先跪右腿,继而放开两手,再跪左腿。双膝跪齐后,三次叩首,起立;再这样跪拜,共计三跪九叩首,在三处供桌前都是如此!拜过牌位后,再向三师进行一次跪拜。接着站在三祖师香案前,由三师各自交代三代,再由传道师传授十大帮规及帮内简单的行话。在开香堂的正式仪式完成后,由本门师介绍赶香堂的前人班子和同辈的"家里人"。至此,新入帮者就正式成为青帮中人了。

不论北洋军阀或国民党时期,开香堂都是秘密进行的,故一般选在乡村或城市里的深宅大院里,并且在深更半夜里进行。

开香堂收徒弟称为"上大钱粮",这是相对于"上小钱粮"而言。上大钱粮一般花费较多,因为在事先隔晚办一餐酒席,事后清晨供一餐点心、茶水(还有供鸦片烟者),加上香堂陈设、外地客人的车船旅费,数目惊人。所以,不在开香堂期间,若有人希望拜有名望的人为师,也可以向师父投递一个帖子,附上压贴费若干,再加上一两桌酒席,邀请师父一些朋友和同门弟兄,就算入帮了。这种较为简单的入帮仪式,称为"上小钱粮"。[①]

也有记载说,加入青帮要经过两道手续:第一道,上小香堂,先拜师父作门生,算是加入了青帮的外围组织,是师父考核徒弟的阶段,要经过三年或更多的时间,才能转为徒弟。称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第二道,师父认为门生可靠,便准许门生上大香堂,在行过收徒弟的大礼后,才能称作徒弟。[②] 据崔锡麟回忆他拜张镜湖为老头子的经过时说:1933 年他在原西北军二十五路总指挥部工作时,由师长戴潘周和军长杜凤举作为介绍人,崔锡麟用红字写了拜门帖子:"门生崔叔山(军中用名),三十二岁,江苏省高邮县人,承杜凤举军长、戴介平师

---

① 杨方益:《漫谈清洪帮》,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71—80 页。

② 崔锡麟:《我所知道的清洪帮》,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128 页。

长介绍，自愿拜在张老太爷镜公麾下为徒，终生聆训，听候驱策。三代：曾祖崔福、祖崔阳春、父崔瑞亭。门生崔叔仙叩呈。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崔锡麟在杜凤举陪同下来到张镜湖家里，二人就地向张行了一跪三叩见面礼。由张的门徒罗鑫泉在佛堂燃烛焚香，口称：崔老弟向祖师爷行大礼，面向如来佛三跪九叩。又称：崔老弟向张师父行拜师大礼，崔遂向佛前三跪九叩首。又称：向师兄杜大哥行大礼，崔先面向佛前一跪三叩，接着杜凤举说：向罗师兄行大礼，崔即向佛前一跪三叩首。入门礼至此完毕。大约未过三年，崔又参加了张镜湖的大香堂。其经过崔回忆如下："上大香堂的仪式是非常隆重的，大约在此前十天，张镜湖门下各省的徒弟都先后赶到上海来参加。所有门生和徒弟都给张镜湖送“贺仪”，一律送钱。仪式就在张宅举行，参加者有100多人，以军政人员为多。”香堂的布置比较正规，堂正中是罗梦鸿的画像，供桌上设黄纸书写的翁、钱、潘三位祖师之牌位。神桌前供干果四包，荤素菜八样，供桌上置有香炉、烛台。门外桌下又置一香炉，供奉陈四小祖之位。仪式开始时，众门生和徒弟随张镜湖（本门师）和传道师樊锦臣、引进师高士奎进入香堂。张的老徒弟排在前面，新入帮者排在后面。张镜湖属于江淮泗帮，樊锦臣属于嘉海卫帮，高士奎属于兴武六帮。张、樊、高三位师父进入堂后，有两位先进弟子担任司仪，燃烛焚香，又焚五束香，插在桌下香炉内，名为五指抱头香。接着又焚一束香，插在陈四小祖神位前。司仪口称：请本门师张师父孝祖，张镜湖遂在翁、钱、潘三位祖师神位前行三跪九叩礼。接着引见师樊锦臣、传道师高士奎相继孝祖，都是三跪九叩礼。然后，司仪请三位师父在门外陈四小祖神位前行一跪三叩礼。等三位师父回到香堂后，坐在香堂上首，司仪口称：各兄弟孝祖。这时，堂前100多位徒众，一同跪在堂前地毯上，面向祖师神位行三跪九叩礼。接着，众人再原地向门外陈小祖行三跪九叩礼。之后，司仪请三位师父在香堂正中就座，口称：各位先进老大参师，新进兄弟陪拜。于是全体跪下，面向三位师父行三跪九叩礼。礼后，先进老大立于两旁，新入帮者立于中央，向三位师父行三跪九叩礼。最后，司仪口称：各位新兄弟跪着听训。张镜湖训示：

问：你们是自愿入帮的还是别人指使入帮的？

答：我们是自愿入帮的。

问：十大帮规你们能遵守吗？

答：自愿严格遵守，誓守十大帮规。

张镜湖说：请引进师、传道师训话。

三位师父训话后，大家起立，依次把手上拈的香插入香案上的香炉内。张镜湖将印好的三帮九代的名单发给新入帮者每人一份，随即指示说：这是我们门里的绝密之宝，不得对外泄露，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就是你们终身的饭碗，切记切记。司仪等张镜湖讲完话，口称：各位先兄弟向三位师父谢恩，行三跪九叩首礼。

司仪焚纸马宣布礼毕，继称：各位新老兄弟上楼拜见师母并道喜，新弟兄在前，老弟兄在后，也就地向师母行一跪三叩礼，至此仪式结束。

后来，黄金荣把开山堂收徒弟的办法进一步简化。

首先，他把所收徒众分成"门徒"和"门生"两大类。"门徒"主要是社会下层的流氓无赖，这些人加入青帮，仍然需要投红帖、开香堂，拜过老头子；而"门生"则是比较有地位者，他们入帮不必开香堂，只要由介绍人搭桥，欲入帮者投一份红帖，封一份贽金（数额比门徒高一倍），帖内称"黄老先生贵台"，自称"门生某某百拜"，只向黄金荣磕三个头即可。对于那些高档的门生，则只需通过介绍人备了红包，包一份更高的贽金，向坐在关帝像前的"先生"三鞠躬就算入帮了。更高档次的门生，只要备上红帖，附上贽金，托介绍人把红帖投递给"先生"就可以了。以后，黄金荣又把收徒弟的办法进一步改革，它建立了"忠信社"（荣社的前身），干脆取消了门徒和门生之间的界限，凡自愿投入黄门者，只要加入该社，缴纳社费，办理入社手续就成为帮内之人。到杜月笙建立"恒社"后，入帮手续更为简便，只需入社者用红帖写上自己的三代祖先，择日备礼，前往杜家行鞠躬礼，礼毕照相，就算加入恒社，成为青帮弟兄了。[①]

二、青帮阶级构成的变化

民国年间上海青帮人物的阶级构成，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不再属于下层社会，其首领多跻身于上流社会。从青帮首领社会地位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上海青帮已经从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逐渐演化蜕变为上层社会的工具，最终蜕变为黑社会组织。

---

① 胡训珉等：《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71—72 页。

青帮大字辈中的著名人物除徐宝山、张仁奎等典型人物外（详后），还有众多的人物：

高世奎

高世奎字涉扬，山东鱼台人，是青帮江淮泗的大字辈，土匪出身，曾在徐宝山手下任团长，后任北洋军阀时期的直隶水警厅长。定居在上海后收徒甚多，著名的有大军阀石友三、韩复榘以及马祥生、杨仁铨等。他为人粗暴，嗜毒品如命，整日吞云吐雾，曾率部横扫豫陕一带的白朗起义军。亦传说他并非真正的高世奎，他真名王三，在徐宝山被刺时，趁真高世奎身亡之机，假冒高世奎之名。

汪禹丞

安徽人，豪绅世家子弟，与叔父、堂兄弟均为大盐商。辛亥革命时曾任临时大总统府卫队长，后来在淞沪警备厅及申报馆任职多年，既是上海青帮的重要人物之一，又是洪门五行山山主。

曹幼珊

名焕智，字幼珊，山东历城人，因排行第三，帮内兄弟尊他为“曹三爷”，也是青帮江淮泗的大字辈。他早年曾在扬州当过马快（警探），后来投在徐宝山手下，但未受到重用。清末民初来到上海后，广收门徒，以便与湖州帮争夺地盘。所收徒弟多为人口贩子、开妓院的老鸨以及在码头上行骗的“翻戏党”。这些人多是属于下三流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是青帮“大字辈”，在社会上却没有多少影响。[①]

樊瑾成

字宝瑜，江苏徐州人，人称“樊大胡子”，私盐贩出身，加入青帮后，成为兴武六帮的大字辈，形成一股势力。后来经大字辈的汪禹丞牵线，接受招安，成为淮北“缉私统领”。辛亥革命后，被收编为湖南军阀赵恒锡部下，担任第七军军长。1920 年皖系垮台后，先回到扬州当寓公，后来迁居上海，是张啸林的老头子，由张啸林供养。

袁克文

字克寒，袁世凯次子，为了逃避袁世凯诸子争夺“太子”之位而从天津前往上海，通过“灵前祭祖”的方式，加入青帮并取得大字辈的辈分，以便使人身安全

① 郭绪印：《青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51 页。

得到保护。他自幼喜爱书法、诗词和古玩，成为青帮大字辈后，在上海文艺界收有大量门徒，后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自任主席兼审查。他对于同一字辈的人，不问职业高低，都与之结为异姓弟兄。他曾对弟子陈惕敏说："切不可轻视下流社会，因为下流社会的知识虽然简单，但只要不轻视他们，对我们就很有帮助，这是我在上海孝祖后的经验。我自对你张爷爷孝祖之日起，随时随地都有人做我的临时保镖，这些义务保镖都是上一流的人派来保护我的。因为我对他们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他们都服从我的指挥。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南市城隍庙去玩，刚说出这句话，其中一个义务保镖说：'我去布置一下，可以使大家安心。'他出去一会儿回来对我说：'布置好了，等您吸足了烟，我们就随您去玩。'我抽好烟，带着他们到新北门下车，就见到有人和布置的人耳语，我一路走，一路看着玩，也一路留神注意我的前后左右，都有人在暗中保护我。"①

张树声（与上重名）

江苏人，有南"天王老子"的外号，以区别于北方冯玉祥部下的张树声。1919 年，袁克文等 17 名青帮大字辈人物在上海举行恳亲会时，张树声以"耆德龄高"被推为"老大"。

张树声

张树声字俊杰，生于 1881 年秋，原籍河北沧县，清末曾在冯玉祥所在的第六镇第十一协第二十一标当哨官（相当于连长）。辛亥革命时充当营长。参加冯玉祥的滦州起义失败后，逃到上海，参加了青帮和红帮。后来当冯玉祥由四川回到河北廊坊后，张树声也从上海回到廊坊，被冯委任为高参。1918 年在湖南常德被冯委任为冯玉祥旅的团长。1925 年春，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张树声在军中任帮办。1930 年西北军瓦解，张树声来到上海，黄金荣为他准备了一处住宅，他便在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蚌埠、徐州、开封、汉口等地招收青洪两帮的徒弟。② 他每到一处，就开一次香堂，由徒弟们照顾吃住，临走时由徒弟迎送。由于他在青帮里的辈分高，抗战时期，他来到重庆，当时大字辈是辈分最高的，1940 年他在重庆的徒子徒孙约有 9 万之多。上至蒋介石周围，下至中统、军统、各机关、水旱码头都有他的徒弟。他在重庆时，总是在两家饭馆开

---

① 陈惕敏：《我的老师袁寒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18 页。

② 孙玉田：《清帮头子张树声》，载《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年，第 322—324 页。

香堂，每次开香堂，他都要讲一套帮会的历史，也就是帮会“反清复明”的一套。张树声虽然主要搞青帮，但是也搞洪帮，这同四川的袍哥有一定关系。张树声在重庆被称为“无冕之王”，他一次患病，在一所教会开办的宽仁医院做手术，这所医院是当时重庆最阔气的医院，他居然包了二楼整个一层的房间。从病床到大门，都有便衣“副官”站岗，并且佩带着新式的美式左轮枪。每天前来询问病情者川流不息。有坐汽车的，有坐滑杆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送的礼品，就摆满了两间屋子。①

徐朗西

1885 年生于陕西三原县东里堡，家资殷富，在四川拥有几处盐井和茶叶庄。早年留学日本，是东京同盟会首批会员之一。既是青帮大字辈，又是洪门峪云山山主。所收门徒以知识分子居多。②

陈兆丰

山东人，江湖艺人出身，属于青帮兴武六帮大字辈。因与张仁奎交好，曾在张手下当过团长，后来跟随张来到上海，此人能力较弱，虽然是青帮大字辈，却没有什么作为。只能靠向帮内之人求索为生。

阮慕白

江苏扬州人，世家子弟，其祖父是曾任清廷太傅的阮元。他凭借世家子弟的财力，不像其他青帮首领在收徒时要向徒弟收香规钱，他反而向徒弟赠送钱财。属于青帮兴武六帮大字辈。

米占元

山东济南人，行伍出身，回族，青帮嘉兴卫大字辈，是徐宝山的同参兄弟，曾任两浙及两淮缉私统领。

青帮通字辈

金九龄

江苏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探长，兼营人力车行。

马祥生

江苏人，贩卖烟土起家，是“大八股党”成员之一，后开设金门大戏院，是黄

① 王冶秋：《记张树声二三事》，载《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年，第 325—328 页。

② 徐晓耕：《先父徐朗西生平时略》，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26—130 页。

金荣的亲信之一。

陈世昌

江苏人，最初是苏州青帮大字辈陈彪的徒弟，又曾拜过“三十六股党”的郑子明做老头子。早年以制作鸦片烟扦子谋生，在上海十六铺一带兜售。后来靠小型赌博生意套签子为生，因而获得“套签子福生”的绰号。后来因为所收徒弟杜月笙出了名，觉得陈彪没有名气，于是改拜张仁奎为师。①

常玉清青帮兴武六帮通字辈，原是湖北荆州驻防旗人，清亡后到上海，在日本纱厂做搬运工头，后升至总稽查。在敛钱得手后，开设江苏旅馆、大观园浴室。1932 年淞沪抗战时，他联络大汉奸胡立夫、姚子都策应日寇。后逃往大连，躲在日寇卵翼下。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又随日寇到上海组织“黄道会”，为日寇效劳，被汪伪授予“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之职。②

高鑫宝贩卖鸦片起家，是小八股党成员之一，号称“白面大王”，除贩毒外，还经营赌台，从事绑票、杀人越货等勾当。曾任丽都花园经理。

戴步祥江苏南京人，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探员，曾开设中华大饭店。

顾竹轩原名松茂。排行老四，因为鼻子大，故人称“顾四鼻子”，苏北盐城人，人力车夫出身。后来买了几辆黄包车，租给别人，自己坐收租金。为了托庇于青帮，他借同乡关系拜法租界的青帮大字辈曹幼珊为老头子，成为青帮的通字辈。③ 曾任上海天蟾舞台经理、上海市参议员。曾拜黄金荣为师，在上海进行过多次谋杀凶案，其中有七位有名望的，两位是律师。他收徒多达 1 万余人，包括两租界的便衣探员和黄包车老板。他为了同唐嘉鹏争夺大世界游艺场经理的职位，唆使其徒弟王兴高杀死唐嘉鹏。事后王被捕，判刑 10 年。起初讲定由顾竹轩负责王家属的一切开支，三年过后便不按时付给，大有毁约之意。王兴高趁饶伯泽密告此案内情（饶精通华语），揭发顾竹轩乃是此案之主犯。经调查属实，饶伯泽亲自同公共租界总巡商量，直接将顾竹轩拘捕，移解上海市第二特务区地方法院审办，结果顾竹轩被判刑 10 年，直到抗战开始，才由顾祝同出面保释。④

---

① 胡训珉等：《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7—88 页。

② 胡训珉等：《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9 页。

③ 王德林：《顾竹轩在闸北发迹和开天蟾舞台》，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57—359 页。

④ 薛畊莘：《我所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34—335 页。

顾嘉棠上海人，贩卖烟土起家，是大八股党成员之一，黄金荣的得力助手。

周思忠江苏人，曾任中国旅行社副总经理。

徐逸民广东人，西医，广收门徒，又是洪门五行山山主。

汪英宾安徽人，汪禹成之子，曾留学美国学习新闻，回国后曾任申报馆经理、时事新报馆总经理。

张竹平江苏人，抗战前曾任大陆报等四报社管理处负责人，抗战期间在香港开设大华饭店。

姜怀素曾任国民党上海市执委兼书记长，上海义务警察副总队长。

曹立功安徽人，曾任上海市商会秘书、上海市药政处处长。

徐学禹浙江人，招商局总经理。

孙百群安徽人，阜丰面粉厂经理。

庄叔遐江苏人，曾任国民党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秘书长、国货银行总经理。

杨　虎又名啸天，安徽人，曾任淞沪警备司令及中华海员工会主任委员等职，所收徒弟以海员居多，也有国民党的军政人员。

黄金荣江苏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探长，贩卖烟土起家，是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

张啸林浙江慈溪人，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

程俊观江苏人，江海银行总经理。

董显光浙江人，上海英文大陆报负责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郑希涛浙江人，曾任时事新报馆经理。

萧宗俊广东人，曾任新新公司总经理。

葛福田江苏人，抗战前曾从事马路商界联合会活动，曾任上海金谷饭店总经理、江海银行经理。

姜　豪上海市宝山县人，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上海市参议员等。

青帮悟字辈

在上海的青帮悟字辈，除杜月笙外还有：

谢葆生江苏苏州人，驴夫出身，后到上海开设卡德浴室、卡德旅馆何仙乐斯舞厅，曾任伪江苏省警察厅长。

陆连奎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督察长。

徐铁珊浙江绍兴人，曾就读于上海同文书院，后在山西警务学校担任翻译教师，曾收多名日本浪人为徒。①

仅从民国年间上海青帮著名人物的职务和社会地位即可以看出，青帮已经不再是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而是军阀、官僚和大商人手中的工具。

民国年间上海的青帮，已经从下层群众组织的帮会，蜕变为黑社会组织。这可以从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和青帮所从事的活动中清楚地看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最初无非是上海滩上的流氓瘪三。在北洋军阀时期，上海青帮头子虽然已经演化为黑社会组织，但是，基本上还仅仅在上海的法租界逞其淫威，青帮三大亨作为帮会首领，其社会地位仍然卑下。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由于同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当局相勾结，成为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打手和工具，青帮也从一般进行打架、斗殴、抢劫夺财、绑架勒索的犯罪团伙，变成了国民党当局反对共产党，镇压工人运动的工具。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逐渐完成了从帮会向黑社会组织蜕变。

---

① 姜豪：《青帮的源流及其演变》，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246—252页。

第四章　上海青帮的崛起与演化

一、民国年间上海青帮崛起的原因

民国年间上海青帮的崛起，也就是青帮从下层群众组织向黑社会蜕变的转折点。上海青帮的崛起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到恶性膨胀，并蜕变为黑社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漕运改道导致靠漕运为生的青帮成员大量涌入上海。

19世纪后半期，清朝当局把漕运从大运河改为海运，上海成了漕运的重要转运点，从上海到天津，整个航程仅仅是通过大运河所需时间的1/3，[①]结果原来的漕运水手、纤夫及其他与漕运有关的人员，便随之移往上海。而这些人当中，许多都是青帮的成员。"青帮者，即盐枭及光蛋，如安庆道友是也。其徒始皆以运河漕粮为业，及漕粮改由海运，无所衣食，遂集于大族潘氏兄弟下，组织团体，密行贩盐，或以偷税为业。"其中一支是来自浙江的湖州、嘉兴、杭州一带的杭嘉湖地区的"湖州帮"，另外一支是来自镇江、扬州和苏北运河沿线的"苏北帮"。[②] 民国初年，青帮大字辈的首领，大量进入上海，并且在上海扎下了根。自从苏北帮（江淮泗总帮）的首领徐宝山死后，这一支青帮的势力便开始进入上海，在此建立自己的地盘。其中仅"大"字辈的头目就有张仁奎、曹幼珊、高士奎、樊宝瑜、陈兆丰、王德邻、阮慕白、米占元等。他们来到上海，成了青帮的台柱子，据统计，当时全国青帮大字辈的"老头子"仅存100余人，上海就有39人，占到大字辈总数的1/4。[③] 民国初年移居上海及原籍上海的青帮著名人物合计

① ［澳］布赖恩·马丁：《上海青帮的崛起》，载蔡少卿主编：《中国秘密社会概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48页。

② 胡训珉等：《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页。

③ 胡训珉等：《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页。

有129人，其中由外地移居上海者有75人，占总人数的58.13%。[①] 各地青帮仅"大"字辈的人物移居上海者，就有：兴武四的马玉祥、陈云忠、米传忠、阮薪川；兴武六的王永安、王鸿寿、白玉山、朱秉政、朱绩成、李涛、汪禹丞、吴省三、周荩臣、步章五、马玉山、梁绍棠、柏玉山、张锡臣、翁铁庵、陈永康、陈万兴、陈锡恩、程孝周、樊瑾成、蒋尊盈、穆恩魁；嘉海卫的邱现嵘、段燮臣；嘉兴卫的王九皋、米占元、赵岑楼、刘登阶、边怀周；嘉白的贺文朝；镇前的张树声；双凤的钟三和等。[②]

第二，移民的大量涌入。

20世纪初，上海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而且是海内外交通的枢纽，繁荣的工商业，像磁铁一样，吸引大量四面八方的移民来此谋生。据统计，从1910年到1930年，短短的20年内，上海的人口就从100万猛增到300万。移民中除了附近农村的农民、手工业者外，还有大量非主流社会的群体，如退伍的士兵、盐枭、土匪、地痞和乡丁等来到上海寻找生活出路。这些人当中，也有不少是青帮的一般成员，他们的到来，又加强了当地青帮的群众基础和实力。

大量移民的进入，既为上海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也为上海城市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带来诸多的消极因素。移民们在上海人地生疏，需要互相帮助，帮会的互助性特点，正适应了移民们的需要，便纷纷加入其中，使帮会迅速发展。经济的繁荣，财富的增加，诱发了人们的贪欲，导致犯罪率的上升。从各地来到上海的淘金者，为了便于谋生和从事各种犯罪活动，便利用师徒传承或歃血结盟的办法，组成有组织的犯罪团伙。那些在经营工商业或金融业中的失败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被迫或投靠这些恶势力。那些进入上海的弱势群体，形成一个游民阶层，迫于生计而被迫从事娼妓、抢劫、赌博等行业，也成为黑社会滋生的温床。

第三，上海的分治为黑社会造成了生存空间，促使帮会迅速向黑社会蜕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并不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城市，而是分别由中国政府控制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三部分构成。每个控制区都有自己的一套行政、立法和治安机构，彼此间不仅不可能互相配合，甚至互相冲突，这就为黑社

---

① 郭绪印：《青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7页。

② 李国屏：《清门考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第281—289页。

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在租界区域内,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①]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公共租界招募了大批印度巡捕,法租界则由安南调来大批安南巡捕,借以维持社会治安。但是,这些外籍巡捕同当地居民语言不通,难以有效地执行治安巡逻任务。租界当局于是又开始招募华人巡捕,尤其是热衷于招募熟悉当地黑社会内幕的地痞流氓、帮会分子,为他们充当"包打听"。这样,黑社会和帮会分子不仅没有成为治安机构的打击对象,反而成了租界当局维持社会治安的依靠力量。所以,当时上海帮会和黑社会头目,大多是依靠在租界充当巡捕起家的。著名的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皆是如此。帮会和黑社会也就随之发展起来。20 世纪最初 10 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华裔探长沈杏山便是著名的"大八股党"的主要头目,正是大八股党控制了公共租界的贩毒活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法租界的主要贩毒活动也是由巡捕房的华裔探长黄金荣集团所把持。当时帮会成员的人数约有 10 万之多,约占总人口的 3% 以上。在 1919—1949 年期间,上海共有 48 个著名的青帮头目,其中最著名的有公共租界的张仁奎和"大八股党"、闸北、虹口地区的顾竹轩集团,法租界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集团。当时,租界当局也为帮会和黑社会的崛起,提供了经济条件。租界当局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和官员们中饱私囊,便在"合法"外衣掩盖下,利用帮会和黑社会组织从事包烟(鸦片)、包赌、包娼及贩卖人口等活动。法租界为了维护经营鸦片的巨额利润,决定集中统一鸦片专卖。为了确保鸦片贩运的安全以便获取暴利,租界当局便依靠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筹办"三鑫公司"。该公司具有保险公司的性质,凡是中外鸦片商人把贩卖的鸦片,向该公司交纳保险费以后,由该公司发给保险凭证,加盖公司印戳为记,即可保证鸦片不被盗窃,如果发生损失,即由公司赔偿。每箱鸦片的保险费是价值的 10%,这样,三鑫公司每年可以获得数千万元的收入,也为租界当局带来大量税收。

第四,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和怂恿。

1927 年"4·12"事变后,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因为反共卖

---

① 上海的公共租界,从 1895—1910 年,人口增长了 3 倍多,1910 年到 1930 年又增长了 2 倍。法租界从 1895 年到 1915 年增长了 3 倍,1915 年到 1930 年又增长了 3 倍多。见[澳]布赖恩·马丁著:《上海青帮的崛起》,载蔡少卿主编:《中国秘密社会概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

力而得到犒赏,被委以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的头衔,成为国民党当局反共反人民的得力工具。不仅如此,国民党还用经济实惠对青帮进行笼络。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禁烟委员会,实施所谓“寓禁于征”的方针,结果导致鸦片的公开销售。在各级禁烟委员会中,国民党当局有意安插青帮分子,杜月笙本人便担任了上海市禁烟委员会的常委,负责处理禁烟的日常事务及执行禁烟委员会的决议。在江苏各地的禁烟委员会内,也多为杜月笙的爪牙所控制。1931 年,杜月笙等利用赴南京参加会议之机,又同国民党当局达成一笔交易:由青帮首领提出鸦片垄断人选,由国民政府加以任命,由杜月笙及其门生继续控制江南地区鸦片的分配和销售。而杜月笙等则帮助国民党破坏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后来,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又把杜月笙拉进“法币发行管理委员会”,使得杜月笙等得以获得重要经济情报,大发其财。由于国民党的抬举,使得上海青帮三大亨从一市井流氓,一跃而成为“党国要人”。

二、上海青帮的来源及其演化

早在清末,上海的帮会已经拥有相当大的势力。19 世纪中叶,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后,天地会系统的帮会势力受到严重打击,之后,上海的帮会就主要是青帮和红帮(哥老会)的势力。上面提到,最早来到上海的青帮主要有两支:一支是来自浙江湖州、嘉兴和杭州的湖州帮;另外一支是来自镇江、扬州和苏北运河沿线的苏北帮,苏北帮在清末势力颇大。青帮的蜕变,是同其首领的演化密切相关的。其中关键性人物以徐宝山和张仁奎为典型。他们都是从私盐贩和青帮首领起家而跻身上流社会的。

徐宝山(1866—1913),字怀礼,丹徒南门人,生于 1866 年。其父以贩竹为业,本人做过篾匠。15 岁时,父病逝,因家贫,游食四方,广交朋友。他性格伉爽豪侠,好打抱不平。凡知交有急难之事,必全力营护支持,“虽抵触法网弗顾也”。其身材魁伟,臂力过人,长于枪法,双手均能发枪,百发百中,能在黑暗中击中香头,故有“神枪手”之誉。在江湖闯荡中,人畏之如虎,人称“徐老虎”。

清光绪十九年(1893),他参与江都仙女庙抢劫案。案发后潜回镇江,躲在宝盖山下,被丹徒县拿获。后经江都县移提归案审办,发遣甘肃。途经山东时,

他盗驿站骏骑逃走，跑回高资。为躲避追捕而亡命江湖，参加武装贩卖私盐，从而加入了青帮。[①] 他依附于枭魁孙七，获重用。时有一伙以柏氏为首之盐枭，与孙有宿仇。孙七以力量不敌，每每退让。一日，徐宝山遇柏氏两子共掠一女于途，忿不可遏，而斗于道。柏党徒闻声赶来，集300余人，将徐宝山包围。徐寡不敌众，恰好孙七也率众赶来，徐宝山将柏氏之二子劈于刀下。此事使徐宝山名声大震，前来投靠和依附的人络绎不绝。徐宝山遂移聚于十二圩和七濠口一带。当地原有以朱福胜为首的盐枭盘踞。朱闻徐宝山来此，遂率众攻击，结果被徐宝山击败，狼狈逃走。徐宝山不仅有了自己的地盘，而且手下的青帮分子，个个凶悍善斗，官兵畏其骁勇，遇有大帮贩私盐队伍，不敢阻拦捕捉，往往听任黑夜通过。实际上，贩私和缉私双方也往往互相勾结，共同渔利。一般预先由帮会派人和港口缉私官兵头目接洽好，等大帮盐船将抵港口时，缉私队伍出去巡逻，让盐船浩浩荡荡开走，等到盐船过去，巡逻的官兵就赶上来开枪，盐船上也假意抵抗，同时丢下一些盐包，让缉私头目去报功领奖。徐宝山因人多势大、再加上这种互相勾搭的关系，所以贩运私盐畅通无阻。他们往来于三江口、两马、大桥、七濠、十二圩等处，上自大通、芜湖、汉口、江西，下抵江阴等处，长江千余里，时有其私盗船出没其间，多至700余号。[②] 徐宝山由于出身贫寒，"久经患难，深知闾阎疾苦"，而"倡议于所贩私盐，每船抽两包或四包，储为扶济之资"。每年冬天，给穷苦的百姓施舍一些衣粥，遇到水、旱灾荒则散给米粮饼面。所以，徐宝山在里下河一带颇有影响，投靠他的人也很多，党徒达数万，连盐城一带的武秀才、监生杨瑞文、马玉仁等亦投奔到徐宝山门下。因此，从淮河两岸到沿长江一线均为其势力范围。[③] 另外，由于这些私盐贩大多来自农村，往往农忙时回家种田，农闲时结伙贩卖私盐。平时官兵人少，则与之相拒，若见到官兵势大，则四散而逃，这样一支聚散不定的队伍，显然难以持久。徐宝山觉得仅仅依靠私盐贩尚不足以成事。他听说泰州城内有个洪门首领任春山，于是带上心腹随从，来到泰州与任春山结交。任春山是湖北黄陂人，是洪门的首领，在当地靠算命测字为生。徐宝山遂与之结为异姓弟兄，任春山介绍徐宝山加入洪门，而

① 郭绪印：《清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②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04页。

③ 蒋顺兴：《徐宝山生平》，载《扬州史志资料》第2辑，扬州市编史修志出版社，1981年。

徐宝山则介绍任春山加入青帮。两人决定合开洪门山堂，于 1899 年在七濠口开山立堂，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名曰“春宝山”。参加结拜者还有黄文祥、王海丰、李祥、周义楚、赵春霆、申彪、李沛、张老八等。由徐宝山和任春山共为山主。这样，徐宝山既是青帮的兴武泗帮的大字辈（一说礼字辈）首领，又成了哥老会的山主，从而达到了青洪两帮联合的目的。[①] 新成立的山堂又称“红帮”，后来，由青红两帮融合而成的帮会，又被称为“青红帮”。

徐宝山一伙以武装为后盾贩运私盐，获得高额利润，势力发展迅速，在千余里的长江之上，拥有走私盐船多至 700 余号。东南地区的当权者，对徐宝山的活动颇为恐惧，两江总督刘坤一便以功名富贵诱徐宝山就范。徐宝山被招抚后，竭力帮助清朝当局控制地方治安，成了清政府镇压会党的工具。徐宝山虽然是青帮大字辈，在接受了清廷招安后，回过头来消灭本门弟兄。为此，青帮特地定下严厉的律法，“提春字挖眼睛，提宝字，割舌头”，将徐宝山这一派人，全部驱逐出帮外。谁敢再拿春宝山招摇，立刻处以挖眼、割舌的酷刑。[②]

在辛亥革命前夜，由于徐宝山在维持地方治安中有功，深得地方当局的信任。两江总督张人骏为了防止革命，要他招兵买马以编练成军。不久，升为巡防营统领，负责江北的防务，从而成为一支实力相当的地方武装，称霸一方。辛亥革命时期，徐宝山见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开始倾向革命党人一边。镇江光复后，一江之隔的扬州也立即沸腾起来。当晚，孙天生发动定字营一部分士兵举行起义，宣布光复。徐宝山随即组织敢死队连夜过江，血洗了孙天生起义，并登上了扬州军政分府都督的宝座。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徐宝山又投靠袁世凯，接受了袁世凯 25 万元的赠款。他为了表示对袁的效忠，而“以其子进往北京为质”。一直到他死始终追随着袁世凯。徐宝山最爱古玩，特别喜欢瓷器。1913 年春天，沪军都督陈其美设计以古瓷花瓶为诱饵，把一颗炸弹装在一个木匣内，伪装古董，将他炸死。[③]

张仁奎（1859—1944），号镜湖，山东藤县人，是青帮兴武六帮的大字辈。他是贩卖私盐出身，早年跟随盐枭徐宝山闯荡江湖，后来加入清军，隶徐宝山部，

---

① 胡训珉等：《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2 页。

② 章君谷：《杜月笙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63 页。PDF 文本。

③ 蒋顺兴：《徐宝山生平》，载《扬州史志资料》第 2 辑，扬州市编史修志出版社，1981 年。

成为徐宝山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①] 徐宝山死后，其部下即由张仁奎接管，他的部下大多参加了青帮。他在来到南通后，便开始开设香堂，大量收徒。由于南通警界早已有青帮渗入，这时，警界的青帮分子也大肆发展。如当地青帮大字辈、县公署的薛金仁，青帮通字辈、县警察大队副官刘志直，中队长顾凤城、县公安局督察员秦昆山等人，均纷纷开设香堂，接收徒弟。

"二次革命"后，北洋军阀冯国璋考虑到张仁奎在江北的影响，将他的部队收编，经过直系军阀李纯、齐燮元的提拔，让他担任了在江苏的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兼通海镇守使，驻防江苏南通，曾获得陆军上将军衔。[②] 张仁奎在南通，拜著名企业家张謇为老师，每日必到张謇的"濠南别业"请安问好，尽弟子之礼，张謇对他也以上宾待之。他在南通，不仅结识了不少名人，而且积累了大量财富。为了避免露富，他秘密把钱财转移回山东老家，置买了很多地产，以为终老之计。

在第一次江浙战争（直系齐燮元与皖系卢永祥在上海以西作战）期间，张仁奎奉齐燮元的命令，从南通开往前线增援，驻防在嘉定、南翔一带。他的部下宫邦铎，受到卢永祥部下何丰林部的攻击，几乎不支，在紧急的情况下，张仁奎率部赶到，终于稳住了阵脚。1927 年北伐军到达浙江，张仁奎宣布归向北伐军，但属下曹万顺部趁机在南通发动兵变，抢掠商店，张仁奎曾亲自出面弹压，甚至处死了参与兵变的亲侄子。北伐军进驻浙江、上海后，张仁奎虽然投靠了国民党，但是仍然有所顾忌。因为他乃是徐宝山的旧部，徐在辛亥革命后杀害了不少革命党人。所以此后，张即退出军界，告老寓居上海。

他在上海时大开香堂，广收徒弟，一些上层社会的名人，也趁机拜他为师。如大和轮船公司的买办朱筱竹、上海银行兼办大业公司总经理李桐村、上海银行分行经理徐而康、上海电话公司总工程师华某、中国旅行社总经理陈香涛等。许多官僚也拜张仁奎为师加入青帮。如当时担任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的葛光庭，不仅拜张为师，并且把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也推荐给张，拜张为师。此外还有蒋鼎文、朱绍良、中央造币厂厂长韦敬周、江苏印花烟酒税局局长

---

① 洪维清：《张仁奎与仁社》，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275 页。

② 崔锡麟：《我所知道的清洪帮》，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111 页。

盛升颐,以及苏北海门警察局长陈楚均等。张仁奎所收徒弟,一般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没有一般地痞流氓。

张仁奎在上海,作为青帮大字辈的"老头子",颇有威望,众多的弟子也使他一时门庭显赫。崔锡麟回忆说:"他(张仁奎——引者)是当时中国青帮最有威望的首领,全国各省市都有他的门徒,有些是省长、军长、师长。"这些拜他为师的军长、师长们加入青帮后,在拜见他时,还要向他行"一跪三叩首"的"见面礼"。[①] 张仁奎一次在上海家中开香堂收徒弟时,许多在外省的军政界名流,如蒋鼎文、韩复榘、陈铭枢、黄琪翔、孙桐萱等,皆派代表参加。[②] 在这次开香堂的晚宴上,席间有人提议把张的门徒用社团的形式组织起来,称为"仁社俱乐部"。事后很快筹备成立,由于上海市市长吴铁成乃是张仁奎的"门生",因此很快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批准。[③] 由于张仁奎在全国拥有3万多徒弟,重要的就有三四千名,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已经从最初的私盐贩,跻身于上流社会了。

---

① 崔锡麟:《我所知道的清洪帮》,载《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38—39页。

② 崔锡麟:《我所知道的清洪帮》,载《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40页。

③ 崔锡麟:《我所知道的清洪帮》,载《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47—48页。

第五章　上海青帮三大亨的发迹

上海的青帮三大亨是指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他们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取代上海青帮大字辈而成为上海最有势力的黑社会头子。因此，要了解当时上海青帮如何蜕变为黑社会组织，必须从青帮三大亨的发迹说起。

一、黄金荣

黄金荣，字锦镛，原籍浙江余姚，1868年12月14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一日)，生于江苏苏州。其父黄柄泉曾在浙江余姚县衙门刑事监狱当捕快，因为成功地侦破了苏州富豪葆青丢失三件祖传至宝：碧玉如意、彩绿翡翠如来佛和荆轲刺秦王立轴一案，深获知县的青睐。后来又破了几起案件，于是升任班头，全家搬到苏州。最后，却因为办错了一件案子而丢了饭碗，只好全家离开苏州。后因大女儿黄凤仙嫁到上海城内梅家弄的邹家，于是全家来到上海，在漕河泾开了一家“悦来”茶馆，所以黄金荣自称“自幼生长在上海的漕河泾”。[①] 黄金荣9岁时被送到私塾去上学，但他并不认真读书，而是喜欢到住所附近听捕快们讲述破案的故事，或到赌场去观看赌博。不幸的是，由于苏州天花流行，黄金荣因染上天花而落下一脸麻子，后来就有了“麻皮金荣”的绰号。



上海青帮三大亨

光绪七年(1881)黄柄泉病故，黄家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黄金荣一家陷入了贫困之中，只能靠母亲替人家洗衣服勉强维持生活。

① 黄振世口述：《我所知道的黄金荣》，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309页。

年仅14岁的黄金荣也只好到外面做杂活混口饭吃，以减轻母亲的负担。17岁那年，黄金荣进入一家裱糊店当学徒，每月只有400文(40个铜板)的"月规钱"，[1]只能勉强糊口，而且每天除了学手艺，还得干杂活，一天下来，已经是筋疲力尽。后来学徒期满，有了一些工资，他便到茶馆区去同一些流氓鬼混。这时，他结识了上海青帮的头目之一陈世昌，绰号"签子福生"。陈世昌也是苏州人，是上海青帮通字辈，在小东门(现在的中华路、东门路)一带靠套签子骗人为生。他吃喝嫖赌样样精通，麻将、牌九、押宝等赌术门门高明，在上海赌博行业颇有名气。他教黄金荣赌博，带他去玩女人，甚至一起抢劫分赃，把黄金荣完全带入了黑色世界。经过陈世昌的指点，黄金荣很快掌握了全套赌术和嫖妓女的本领。一次，黄金荣勾引上绰号"黑皮长贵"的妹妹程杏花。"黑皮长贵"没有固定职业，有时摆地摊，有时卖苦力，时常偷拿扒窃，或寻衅敲诈，甚至拦路抢劫。他整日在外面鬼混，直到夜深人静才回家。一天晚上，黄金荣正在同杏花在床上鬼混，未想到"黑皮长贵"突然回家来，黄金荣慌忙穿好衣服，从后窗跳出逃走。杏花在"黑皮长贵"的追问下，不得不承认与黄金荣的事。结果黄金荣被"黑皮长贵"的弟弟堵在路上毒打了一顿。黄金荣只好到师傅陈世昌那里诉苦，请求帮助报仇。陈世昌立即找到在衙门当捕快的青帮弟兄，把"黑皮长贵"绑到衙门下了监狱。"黑皮长贵"获释后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只好卷起铺盖搬走。黄金荣感到衙门的差使十分了得，特别是他自幼受到当捕快的父亲的影响，回忆起父亲当年当捕快时的威风，和对黑白两道各色人物的崇拜，使他对捕快这个差使十分羡慕。尤其是对于帮助他对付"黑皮长贵"的李捕快，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后来，他向陈世昌和其他兄弟借了一笔钱，准备了一份厚礼，终于使自己也当上了一名捕快。但是，日子久了，他又觉得捕快的工作太辛苦，因为，那时上海县属于松江府管辖，他每天要把公文送到松江府去，往返150多里路，经常穿着蒲鞋，背着雨伞，提着灯笼，从凌晨三四点钟出发，要到深夜八九点钟才回到衙门。捕快虽然可以仗势欺人，找些外快，但是毕竟太辛苦了，因此，又想找别的出路。[2] 黄金荣22岁那年，遇到了一位"贵人"，就是法国驻上海副领事兼

---

[1] 程锡文口述：《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287页。

[2] 黄振世口述：《我所知道的黄金荣》，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311页。

法租界总监的翻译官曹显民。当时,黄金荣正在老北门当差,对每天经过这里的曹显民,毕恭毕敬,给曹显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1893 年,法租界为了推行"以华治华"的策略,需要招募 120 名华捕,黄金荣前往报名。结果被曹显民看到,将他录取。租界的巡捕分为两类:一类是巡捕,包括巡士、巡长、巡官;另一类密探,俗称"包打听",包括探员、探目和探长。中国籍的巡捕简称"华捕"。经过一阶段的训练,黄金荣被分派到油水较大的十六铺地段值勤。正如黄金荣自己所说:"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①

黄金荣在当上华捕后,时常到城隍庙得意楼去喝茶,趁机结识了那里的地痞流氓和青红帮分子。当时人们通常把地痞流氓称为"郑家木桥小瘪三",黄金荣逐渐同这些人混熟了,便利用他们来为自己服务。

现在上海的延安东路,原来是一条宽阔的小河,是黄浦江的支流,名叫"洋泾浜"。位于"洋泾浜"的郑家木桥是英租界与法租界的交界处,商贾云集,十分繁华,也是地痞流氓活动的场所。因为法租界的巡捕不能到英租界捕人,反之,英租界的巡捕也不能到法租界办案。这样,流氓、小偷在法租界作案,便跑到英租界躲避,反之亦然。黄金荣为了得到法国主子的青睐,显示自己侦缉的才能高超,便用小恩小惠收买了流氓瘪三和小偷惯窃的头目丁顺华和程子卿,作为眼线。同他们讲明,如果同他合作,有事被捕可以保释。于是让眼线们到租界内去抢劫,黄则密报法国人,将眼线们一网打尽,然后他又设法把他们释放出来。如此连续侦破几次窃案后,法国人果然对他另眼相看。为了对商店老板进行敲诈勒索,他又唆使一班小流氓到当地商店去捣乱或假装打架骂街。黄金荣便随后赶到,将小流氓赶走,他在店主人面前充当好人,让人感到小流氓们见到黄金荣如同老鼠见猫一样,以为黄金荣果然本领高强。他又让门生对老板们说,遇到任何事,只须托黄老板出面,一定可以平安无事。一些商店老板或富户,为了保平安,只好逢年过节向他送礼,有的还拜他做"先生"。黄金荣在晚年回忆说:"在租界时候,巡捕房是外国人专制管理的,租界里的百姓,因为我是巡捕房里包打听,所以认为包打听能有法子可以与外国人接近,讲的[得]上话。所以,卖烟土的、开赌台的人,都来与我商量,托我去运动法国头脑,谋求太平。等事体成功后,他们送些钱给我。还有一辈子做生意的人,因为怕被人欺负,也

① 《黄金荣自白书》,载《文汇报》,1951 年 5 月 20 日。

托人介绍，拜我做先生。希望能够依靠我的情面不被人家欺负。但是，里面难免有行为不好的人，时常借我的名义，在外面讲斤头，做不好的事情。我在旧法大马路聚宝楼做茶会间（这是包打听平时碰头的地方），用了不少伙计，在外面打听盗贼线索与行动，每天在茶会间报告我，好去破案。"①

对于不肯买账的富豪，黄金荣则用绑架的办法进行敲诈勒索。他曾唆使徒弟丁永昌把富商荣德生绑架，向荣家勒索了几十万元的巨款。并威胁荣家说，如不把钱送到，就对人质下毒手。荣家无奈，只好如数支付，荣德生才获释。②光绪二十四年法租界发生了一起"四明公所案"，黄金荣又乘机勒索到一笔巨款。四明公所地处法租界内，是上海宁波人同乡会寄放棺木和埋葬死者的地方。1849 年法国租界建立后，四明公所被划入法国租界，法国人对租界内的坟墓十分反感，千方百计想将其霸占。光绪二十四年（1898），法国租界当局借口修建医院，要求四明公所搬迁，并且与宁波人发生冲突，法国士兵开枪打死 15 名中国人，最后以法国租界当局妥协而结束。宁波人因为在事件中有 15 名同胞被打死，而且公所的围墙也遭破坏，于是纷纷捐钱，法国租界当局也答应给予赔偿。黄金荣得知这些钱都掌握在公所的甘董事的手中，于是指使徒弟将甘董事绑架，然后向甘家勒索到 2000 块银圆。

黄金荣在处理四明公所的事件中，玩弄"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手法，引起了法国人的不满，加上有人向巡捕房总监督报告，说黄金荣有与流氓盗匪串通一气的嫌疑。巡捕房总监督便趁华捕们在新年拜年的机会，当面向黄金荣提出了自己的怀疑。黄金荣当时已经小有名气，无法忍受这种侮辱性的指责，于是同巡捕房总监督顶撞起来，最后干脆辞职不干了。

离开巡捕房后，黄金荣想起苏州尚有父亲的老朋友，于是决定到苏州去闯荡。黄金荣回到苏州后，先是在一家天后宫戏馆当管事和保镖，后来摸熟了情况，干脆自己开了一家共和戏馆。他自己既是老板，又是保镖，生意非常兴隆。这时，他又认识了大胆泼辣的女人林桂生。

林桂生的父亲做当铺生意，母亲曾经是烟花女子，她出生在农历的八月十五日，故父母给她取名曰："桂生。"后来父亲去世，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时常遭人欺侮，所以，希望找个上门女婿作为靠山。母亲看中了苏州衙门里的马捕

---

① 《黄金荣自白书》，载《文汇报》，1951 年 5 月 20 日。

② 王辉强：《青帮大亨——黄金荣》，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48 页。

快，招赘为上门女婿。马捕快是个胸无大志的人，只求过平常的日子，而林桂生却不安于这种平常生活，对自己丈夫的无能颇为不满。恰好这时黄金荣出现了，黄金荣在上海县衙当捕快时，因为公务曾与马捕快有过交往。黄金荣来到苏州，便来拜访这位老朋友。黄金荣拜访马捕快，一来是为了看望老友；二来是请他帮忙，免得流氓到黄金荣的戏馆捣乱。可巧那天马捕快不在家，黄金荣说明来意，林桂生便痛快地替丈夫答应下来，并且唆使丈夫去找那些流氓头头，告诫他们，不许到黄金荣的戏馆去捣乱，倒可以去捧场。果然，此后那些流氓来到戏馆，不仅大把掏钱买茶买烟，而且开唱后还大声叫好捧场。黄金荣明白这是马捕快在起作用，于是备了礼物到马捕快家里去表示感谢，并热情地邀请林桂生到戏馆看戏。正好林桂生是个戏迷，平日总喜欢到戏馆看戏，遂成了黄金荣戏馆里的常客。每逢上演新戏，黄金荣便在台前中央给她预留座位，摆满茶点水果。林桂生一到，黄金荣还亲自出来相陪。林桂生也时常邀请黄金荣到家里来吃饭，作为回报。时间长了，两人便产生了爱慕之情。最初是偷偷摸摸，后来干脆赶走了马捕快。不久，黄金荣又应巡捕房总监督之邀请，与林桂生一同重返上海滩。临行前，二人在苏州正式结为夫妻！

黄金荣重返上海滩之后，在巡捕房官复原职，又召集郑家木桥的流氓瘪三，相互配合，使黄金荣的办案本领，更加显现出来，不仅很容易追回赃物，而且能顺利抓获盗贼。先后破获了数起大案、要案。

先是破获了太湖大盗“黑风”。“黑风”是19世纪90年代末江苏常州的一个太湖大盗。他武艺高强，又有一群凶残强悍的弟兄，各个都是身怀绝技的亡命之徒。他们打听到常州有个巨富，家中藏有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于是带领弟兄们将该巨富的家里抢了个一干二净。受害人觉得当地官府无能，便向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报案。此案本来不该巡捕房受理，但巡捕房的总监督觉得此案涉及巨富，肯定有利可图，于是派黄金荣侦查此案。黄金荣派手下的丁顺华和程子卿去侦察“黑风”的下落，丁、程二人又找到徐福生等人，派出诸多个小瘪三作为眼线，到各处去打听，很快就找到了线索。他们发现苏州城西的枫桥镇上的一家人，最近来了许多生人，而且行动诡秘，原来这是“黑风”的姘妇翠喜的家。黄金荣接到情报后，立即带领丁顺华和程子卿等几名精干的巡捕，携带枪支弹药和刑具，从上海赶往苏州。在同苏州衙门接洽后，衙门表示愿意鼎力相助，共同破案。黄金荣亲自带领巡捕来到“黑风”藏匿的翠喜之家，指挥大家

将宅院包围起来。黄金荣本人纵身越过院墙，潜至窗下，发现“黑风”正在与姘妇偷情。“黑风”发觉外面有动静，急忙将灯熄灭，跳出屋外。黄金荣见状，立即冲上擒拿。经过一番打斗，最终将“黑风”制服，逮捕归案。

破获间谍谋杀案。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住宅，发生了一起英国间谍丈夫杀害法国间谍妻子的谋杀案。在法租界杜美路94号住宅，一位法国籍中年妇女被谋杀，身上共有三处刀伤。经过现场勘测，黄金荣认为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这家的男主人。法国探长由于人地生疏，很难将案件侦破。黄金荣觉得这正是显示自己技高一筹的好机会，于是立即召集手下人，带上男主人的照片，四出打探。巡捕房的人手不够，他便派人去找郑家木桥的流氓瘪三，让他们帮助寻找线索。经过几天的侦查，在英租界终于有人从照片上认出了这位男主人。最后查明那位男主人，经常在英租界里的一所住宅出入，住宅里住着母女二人，母亲并未结婚，却有一个18岁的女儿。当黄金荣找到那位女孩后，得知照片上的人正是女孩的父亲，她说父亲在法租界还有一个妻子。最后，黄金荣终于查明事情的真相，原来那位男主人和他在英租界的情妇都是英国间谍，被杀的法国妇女则是法国间谍。

侦破宋教仁被刺案。1913年，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袁世凯为掩盖事情真相，便派人到处造谣，说刺杀宋教仁是革命军沪军都督陈其美所为。革命党人对于宋教仁的被刺，本来已经十分悲痛，又遭到袁世凯的诬陷，更是义愤填膺，决心抓住凶手，报仇雪恨。于是一面邀请英、法租界当局缉拿凶手，一面联络各地同志侦破此案件。陈其美本人乃是上海青帮首领，又同黄金荣有些交情，于是请他帮忙，并且悬赏1万元，加上沪宁铁路也悬赏5000元。如此巨大的赏金，促使黄金荣和英、法租界巡捕房的探子们，积极行动起来寻找破案线索。英租界巡捕房首先发现了线索，一个名叫王阿法的古董商人来到巡捕房指控一个名叫应桂馨的人，曾经拿给他一张照片，要他去行刺此人，答应事成之后，付给他1000元报酬。宋教仁遇刺后，他从报纸上看到，照片上的人，正是宋教仁。英租界巡捕房的探子发现，应桂馨经常到英租界的妓院去嫖娼，于是来到妓院将应桂馨逮捕。经审讯得知应桂馨住在法租界新北门外的文元坊，确实与刺宋案有牵连。黄金荣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带领探长金九龄和程子卿，连夜赶到文元坊搜查。他们首先将应桂馨的住宅团团包围，然后闯入宅内清点人口。这时，发现有一个操山西口音的矮个男子，突然扭头逃

跑，黄金荣立即追赶。那人穿过客厅，来到一堵后墙下，迅速翻上墙头，跳向墙外。黄金荣也翻墙扑去，正巧砸在那人身上。两人在墙外扭打起来。这时，巡捕们也纷纷赶到，将那人捉住，押回应宅。黄金荣看那人觉得有些面熟，忽然想起那人不久前曾犯案在巡捕房坐过一个月的牢，名叫武士英。那人最初仍想抵赖，黄金荣向他点出他曾在巡捕房坐过牢的事，那人只好坦白了自己作案的经过：他原名叫吴福铭，山西人，曾在清军当兵，清朝覆亡后，到上海谋生，经朋友介绍加入了共进会，认识了应桂馨。一天，应桂馨找他，交给他一项任务，拿出一张宋教仁的照片和一支手枪，要他去刺杀宋教仁，保证事成后给他1000元酬金。当黄金荣再次搜查应桂馨住宅时，找出了那支行凶的手枪，枪中残留的子弹，与从宋教仁身上取出的子弹完全一样。又从当中发现谋杀案幕后的主谋乃是当时的政府总理赵秉钧和洪述祖。是赵、洪二人命令应桂馨具体执行的。至此，刺杀宋教仁案便真相大白了！这件事使黄金荣的权势和地位更加巩固。但是，真正促使黄金荣发迹的，还是他设法侦破了一起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也就是山东临城土匪抢劫津浦铁路的大劫案。

1923年5月6日在山东峄县、临城、沙沟车站之间，发生了一起有计划、有组织的抢劫案。被劫的是由浦口开往天津的蓝钢皮列车，该列车由美国制造，设备豪华。车内被绑架的中外旅客有200余人，其中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国的40名外籍旅客，特别是有法国籍神父姚主教和一位法国公使馆的参赞。此案发生后，立即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大新闻。

劫持列车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是当时活动在山东峄县（今枣庄市）抱犊崮一带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家原来是当地的富户，家里拥有良田六顷，房舍甚多，骡马成群。孙氏弟兄五人，老大孙美珠是清末秀才，足智多谋。老五孙美瑶性情粗鲁。孙家因是当地望族，当地土匪时常向孙家借粮，官兵也借口进行敲诈勒索，使孙家不得安宁，于是同友人王翼民和孙美瑶商量，决定变卖家产，购买武器，招兵买马，逐渐把峄县及其附近的土匪集中起来，选择峄县城北60里的抱犊崮山区为根据地。抱犊崮四周为悬崖峭壁，顶上有平地数顷，因为路险无法牵牛上山，只好抱个小牛犊上去，养大后再用来耕地，因而得名抱犊崮。孙美珠在一次同北洋官军的战斗中被击毙，北洋官军又加紧了围捕，孙美瑶一伙土匪的活动范围日益减少，觉得同北洋官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决定在津浦铁路上打主意。如果劫持国际列车，车内有洋人，北洋官军投鼠忌器，不敢轻

易对他们剿捕。而且可以趁机要挟北洋政府,走招安的路,于是决定劫持这列国际列车。他们把劫车地点确定在临城与沙沟车站之间,时间为 1923 年 5 月 6 日清晨。所劫持的列车为从浦口到天津的第二次蓝钢皮国际列车。届时,土匪们先从铁路检修工的住房里抢得工具,把铁轨卸下一根,等火车司机发现,早已刹车不及。导致车头及三等客车车厢出轨,后面的头、二等客车及卧铺尚安然无恙。列车停下后,早已预伏在铁道两旁的匪徒们,便飞快地扒上列车破窗而入,在列车上伪装成旅客的匪徒,在内接应。整个劫持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①]

被劫持的姚主教,去天津以传教为掩护,实际上是进行间谍活动,同法国驻上海领事关系密切。由于姚主教负有特殊使命,法国领事不惜重金将人质赎回,上海法租界当局也限令巡捕房火速破案,将姚主教营救出来。巡捕房出动了所有人员,四处打听,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只得高价悬赏。凡提供姚主教下落者,赏银洋 3000 元,有能救出姚主教者,赏银洋 1 万元。黄金荣认为此案虽然难破,但却也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时机,于是接受了破案任务。恰好,这时有一个从山东来到上海的军官韩荣浦,他是临城人,又是军阀吴佩孚的副官。他从山东临城到上海买东西,在车站附近丢失了 100 元钱,只好来到法租界,到巡捕房找到一个姓隋的同乡,请他帮忙。姓隋的巡捕帮他报了失窃案,并介绍他同黄金荣认识。黄金荣听说他是从山东临城来的,便向他打听临城的劫车案和法国神父的情况,韩遂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告诉黄金荣。黄听说后大为高兴,便立即付给他 150 元,让他回到临城去仔细打听被绑架者的下落,一旦打听到确切消息,赶快到上海报信,再给 500 元赏金。如果破案成功,还另有重赏。韩荣浦回到临城之后,很快就打听到姚主教的下落,立即重返上海,与黄金荣联络。黄金荣便先从巡捕房预支 2000 元,其中 500 元给予韩荣浦,1000 元让韩去收买姚主教的看守人员,并答应在事成之后再付 2000 元,让看守人员逃往外地。他让巡捕房的陶翻译用法文写了一个便条,告诉姚主教,请他放心,黄金荣会亲自到临城营救。一切都安排好后,黄金荣便带领十几个便衣人员,从上海乘火车到达临城。他们只花费了几千元买通了看守人员,就趁夜晚把姚主教救了出来,安然返回上海。这一事件使黄金荣的名声大震,不仅得到 1 万元的赏金,而且得到法国巡捕房的破格重用,提升他为原来只有法国人才能担任的督察长,

---

① 河北文史书局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土匪实录》(中),群众出版社,1993 年,第 487—502 页。

还派了8个安南巡捕作为他的保镖，这一职务一直担任到他在60岁退休。[①] 上述情况是黄金荣管家程锡文所述，当属可信，因为是黄金荣在烟榻上对他讲的。不过，程锡文把抢劫者说成是军阀张宗昌的部下所为，显系错误。此事在张占军整理的《津浦路大劫案》一文中，称该事件乃抱犊崮的土匪孙美瑶所为。该文系根据万伯龙《临城劫车案始末回忆》、刘子衡《孙美瑶临城劫车案的如是我闻》及方椒伯《一九二三年的临城劫车案》整理而成。三文对临城劫车案均言之凿凿，当属可信。程锡文所述劫车案为张宗昌部下所为，当属讹误。

黄金荣作为上海青帮三大亨之首，却从来未曾正式加入青帮，更没有拜过"老头子"。当他觉得自己在上海滩的权力、地位已经巩固，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就需要利用帮会这个工具，藉以广招门徒。当时上海既有青帮，又有洪门，他经过比较，觉得自己少年时期曾经接触过许多青帮中的人，对于青帮的情况也多有耳闻，于是觉得还是按照青帮的规矩收徒为好。但是，按照青帮的规矩，凡没有正式加入青帮被称为"空子"，不得开堂收徒。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众人的劝说下，黄金荣拜了当时青帮辈分最高的"大"字辈的张镜湖（张仁奎）为老头子，于是成了青帮的"通"字辈。[②] 上海正宗的青帮分子们，虽然明知黄金荣是"空子"，而且他开香堂的仪式也不规范，他甚至自称"天"字辈，比大字辈还多一横。但是，鉴于他在上海滩拥有的势力，也就只好默认，无法同他较真。他为了扩大势力，招收徒弟多多益善，只要愿意充当他的徒弟，写上一张帖子，上写"拜黄金荣为老师"，下写"门生某某敬拜"即可。只要肯送礼，他就来者不拒。在升任法租界督察长以后，他一次就收了二三百个徒弟，这些徒弟大多是法租界巡捕房的骨干或小头目。有些演艺界的人士，为了自身安全，也被迫拜他为师。据黄振世说，黄金荣的弟子当中，军、警、工商、文艺、科技以及星相、医卜，各色人物一应俱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英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员：如陈三林、丁永昌、鲁锦臣、曾九如（法捕房探目）、金九龄（法捕房督察长）、程子卿（法捕房政治部主任）；陆连奎（英捕房督察长）、尚武、冯志明（英捕房探长）、汤坚（英捕房探目），韦钟秀、乔松生、卢英（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张荣（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副队长）。

---

① 程锡文口述：《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288—290页。

② 王辉强：《青帮大亨——黄金荣》，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5页。

流氓、封建把头：顾竹轩（天蟾舞台老板）、马鸿魁（法租界粪大王）、朱顺林（赌场老板）、刘怡章（烟土贩子）、姚松如、颜伯颖（饭店老板）、唐嘉鹏、水果荣生（大世界经理）、孟禄久、娄炳章（星相把头）。

工商界"生意白相人"：郑仁业（正泰橡胶厂老板）、张子廉（三星棉铁厂老板）、谢克明（仁丰染织厂老板）、张善琨（新华影片公司经理）、陈菊生（华欧制糖厂老板）、乐宝成、乐汝成（泰康饼干厂老板）、黄振世（渔业公司经理）、邱子嘉（仁丰染织厂厂部经理）等。

文化、新闻及医药界：吴玉荪（弹词艺人）、王振川（西医内外科）、平襟亚（小说家，开设中央书店）、沈菊隐、任衿苹、杭石君（报社编辑）。

在黄门弟子中，以顾竹轩最为典型。他原为人力车夫，后来在英租界巡捕房当巡捕，以敲诈勒索所得赃款，开设了一家车行，出租给贫苦的人力车夫，他作为巡捕，自然不怕工人欠租。而且他向站岗的巡捕打招呼，凡是他出租的车辆，偶有不遵守交通规则，也可宽容放过。后来看到车行生意大好，就干脆辞去巡捕职务，扩大车行生意，以后又开设"天蟾舞台"，成为黄门的台柱子之一。①

黄金荣第一次开香堂收徒弟是在 1901 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日，也就是黄金荣 33 岁生日那天。这次一共收徒 99 名。按照青帮的规矩，开香堂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凡属收徒者同辈（同参）都要到会祝贺，表示对收徒者的认可。可是，黄金荣本来就不是青帮中人，虽然临时才拜了张仁奎为老头子，可是并没有同参兄弟，只得邀请了杭州、上海等处的一些青帮头子，以及金廷荪、曹显民、陈世昌等，巡捕房的头目前来凑热闹。黄金荣开香堂的仪式，既不像青帮，也不像洪门，可谓不伦不类。可是，黄金荣的势力强大，青帮中人也就只好认可。而且一些真正青帮通字辈的人，如黄振世、顾竹轩、卢英等也拜他为老师。按照青帮的十大帮规，拜同参兄弟为师，是违犯帮规的。另外，还有些正式进过青帮的人，如贞英、董明德、何国梁等 30 多名黄门弟子，又联合拜青帮大字辈的曹幼珊为"老头子"，然后又开设香堂，接收徒弟。而这些徒子徒孙们，又拜黄金荣为师，这在青帮中称为"爬香头"，也是违反了十大帮规。可是，黄金荣却不管这些规定，因为接收徒弟可以得到大量金钱，他也就不顾这些。在他 60 岁生日以后，每年都要过生日，借此向徒弟门敛钱，徒弟中稍有地位者，至少要送 100 元的礼

① 黄振世：《我所知道的黄金荣》。

金，多者往往要送500到1000元，成为他的一大财源。所以，收徒时往往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凭借他的权势，对此也无人敢过问！

黄金荣还广交名流，攀附权贵，拉拢政客。黄金荣虽然有了法租界督察长的地位，也成了青帮三大亨之一，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进一步攀附权贵，拉拢官僚政客作为靠山，以抬高他的社会地位。

他首先结交了孙中山先生。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斗争正处于困难时期。1918年，广东政学系和桂系军阀串通一气，在广州非常国会上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用来排斥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愤然辞去军政府大元帅的职务，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有一批革命者也跟随他来到上海。黄金荣的徒弟徐福生在跟随黄金荣做鸦片生意时，认识了一些广东人，又通过他们认识了那些革命者。孙中山知道徐福生是黄金荣的弟子，也想利用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势力，掩护革命者的活动。于是给徐福生题写了一个扇面，请他去约见黄金荣。徐福生拿着扇面去见黄金荣，向他说明孙中山是个极有声望的革命家，希望来拜访他。黄金荣一向喜欢结交名流，于是高兴地答应，并约定了见面的日期。当徐福生陪同孙中山来到黄府时，黄金荣热情地邀请孙中山到楼上的会客室叙谈。孙中山向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称赞他在上海很有办法，在法租界有很多关系。向他表示：今后我的朋友和同志到上海，请他多加帮助和保护，黄金荣一口答应。后来，孙中山又写信给他，指出帝国主义支持军阀之间的混战，造成民生凋敝，使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军阀之间的战争。而革命需要有人参加并得到经济上的援助，希望黄金荣能够联系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人才和经济上多加援助。黄金荣接到来信，就拿出1000元，交给徐福生，转交孙中山，并通知虞洽卿也拿出一笔钱。日后，黄金荣曾对徒弟们说："我一生中讲义气，重朋友，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我也曾出过一些力。"[①]

黄金荣结交最多的还是军阀和官僚。他先结交了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又进而勾结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与他们一同贩卖鸦片。他在勾结军阀官僚后，吃到甜头，又进而攀附更大的人物。1913年，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宋教仁，并准备进一步镇压国民党，国民党方面则准备"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为此，在上海方面必须首先除掉徐宝山这个拦路虎。徐宝山早年是个私

---

① 程锡文口述，杨展成整理：《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298—299页。

盐贩子出身的帮会头子，凶残骄横，人称“徐老虎”。辛亥革命时期，他假意加入革命，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次革命爆发后，他一面与驻沪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虚与委蛇，一面与袁世凯相勾结，他接受了袁世凯25万元的赠款，并送自己的儿子到北京做人质，充当袁世凯的侍卫武官。他率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驻扎在扬州一带，成为国民党进行讨袁二次革命的巨大障碍，因此决心把他除掉。

1913年5月，陈其美派王柏龄到上海会见黄金荣，向他提出刺杀徐宝山的要求。黄金荣考虑到陈其美、王柏龄都是青帮弟兄，当即答应。他与林桂生、杜月笙商量后，先派人了解到徐宝山喜爱古董，经常有人专门送货到其府上供他选择，因此决定利用这种机会炸死徐宝山。1931年5月24日下午，一位中年男子，手提一只小铁箱，来到徐宝山的公馆。他向门卫递上一张署名“上海顾松记文玩店”艾某某的名片和一封艾某某写给徐宝山的亲笔信，说明箱内装有艾某带给徐宝山的一件元朝花瓶，请徐宝山看货验收。门卫遂将货物送进房内，并报知此事。徐宝山一听有人送宝物前来，既取来观看。他看过名片和书信后，随即从信封中拿出开箱的钥匙。当他把钥匙插进锁孔后左右转动时，突然听见箱内刺刺的响声，立即意识到这乃是炸弹，急忙将铁箱抛出，但是，箱子已经爆炸，当即将徐宝山炸毙。[①] 国民党给黄以重谢，黄从此也同国民党建立了联系。

黄金荣之所以名声大噪，还由于他同蒋介石有着不寻常的关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从日本留学回来，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担任第五团中校团长。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加入讨袁军，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失败后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只好逃到上海避难。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刺杀后，蒋介石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蒋在上海交易所当小职员，收入微薄。1921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信交风潮”，蒋本人负债数千元，处境艰难。在被讨债人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离开上海，到广州去投奔孙中山先生。可是又缺少盘费，于是去找担任上海商会会长的同乡虞洽卿商量办法，虞洽卿便介绍他去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为此，虞洽卿专门来到八仙桥黄金荣的府上，向他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希望黄金荣收蒋介石为门徒。黄金荣则因为虞洽卿当时在上海商界地位高，便立即

① 王辉强：《青帮大亨——黄金荣》，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答应下来。蒋介石拜黄金荣为老头子的方式不同于其他人。黄金荣收徒弟时，投拜者需要送贽敬钱，还要填写门生帖子，并且要举行正式的收徒仪式。而虞洽卿并不熟悉黄金荣收徒弟的这套规矩，当他带领蒋介石拜见黄金荣时，只携带了一张红帖子，内写："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因为黄金荣事先已经了解蒋介石的情况，知道他将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为了讨好虞洽卿，不仅对此不加计较，反而赠送给蒋介石 200 元大洋，帮助他去广州。事后，还由虞洽卿和黄金荣出面，将蒋介石的债主请到酒店，指着蒋介石说："如今我已经收志清为徒弟，以后有得罪的地方，请诸位多多包涵！志清如真的欠哪位的债，请来找我要！"虞洽卿接着说："一点点事体，就不用提了，我看买个面子就算了。"于是替蒋介石了结了那些债务。

蒋介石到达广州后，做了孙中山的侍从武官，不久，被派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1923 年，蒋介石又跟随孙中山回到广州，先后担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大本营参谋长和行营参谋长。1925 年担任东征陈炯明的总指挥，1926 年 7 月，又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

在北伐军经过上海时，黄金荣才知道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原来就是当年自己的徒弟蒋志清，颇为得意。这时，虞洽卿等人提醒黄金荣说，如今蒋介石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号大人物，如果说出过去曾经拜过黄金荣为老头子，一定会使他感到没有面子。不如隐没这段师徒关系并把门生帖子亲自送还给蒋，说明过去只是凭虞洽卿一人自说自话，并未接受过拜师收徒之仪，仅以朋友看待，今后仍希望蒋介石承认黄金荣是他的朋友。这样，一定会使蒋感激，将来可以受用不尽。黄金荣觉得有道理，就决定如此办理。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由虞洽卿陪同去黄金荣家探望。使黄金荣受宠若惊，改变了过去的师徒称呼，对蒋介石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帖子我找出来交虞老送还！"蒋介石则谦逊地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只金怀表，送到黄金荣面前说："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①从此，黄金荣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了。

正因为黄金荣在法租界有了如此业绩，加上结识了众多名人，所以，租界的

① 黄振世：《蒋介石拜师黄金荣内幕》，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335—338 页；史海：《四大帮主的最后结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年，第 174—176 页。

法国人便需要利用他，使他虽然担任法租界的华捕头目，却可以不必上班，不须穿号衣（制服），尽管经常捉小偷、强盗，逮捕各种犯人，却从来不带手枪、警棍、手铐。别的探目、警长需要在马路上巡逻、站岗，而他却在家里悠哉悠哉，早晨起床很晚，吃过中饭，便同几位赌友，一连三四个钟头玩“铜旗”（一种赌具）。其实，他采取的是“有事便管，无事不问”的全天候制度，一天 24 小时都在家里办公。无论吃饭、玩铜旗、洗澡甚至睡觉时，只要巡捕房有人来了，俯身凑近他的耳朵，低声报告出了啥事，他只需在报告者耳边简单吩咐几句，报告者连连点头应诺，旋即离去，黄金荣照旧吃、喝、玩、乐。黄金荣之所以能够如此，原来他在家里供养着十几个人，一旦有事，这些人便帮他侦查、抓人、办交涉，他只要动动嘴皮，吩咐几句，便可以了结！更主要是他在外面有着极为广泛的人事关系，从达官显要到小偷乞丐、三教九流，几乎每个社会阶层都有他的朋友，遇事可以帮忙，甚至出钱出力，替他冒险卖命。而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则来源于鸦片。

1927 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日，黄金荣年满 60 岁，为了给他祝寿，黄公馆上上下下 30 余人在寡媳李志清的指挥下，忙碌起来。大堂中放置了巨大的寿字，黄金荣还特地让仆人把他历年来得到的委任状、奖状和勋章、奖章展示出来，进行炫耀。当天不仅为来宾准备了丰盛的宴席，而且安排了四五桌麻将牌，供爱赌者消遣。弟子们知道他十分爱钱，因此，尽量奉献钱钞，少则上百，多则上千，一天下来，黄府收入的钱财多得惊人！黄金荣发现庆祝生日原来可以敛取大量钱财，于是此后每年生日那天，均要举行寿礼，藉以敛钱！

可是，按照法租界当局的规定，在租界里服务的最高年龄是 60 岁，任何人只要年龄一到，就必须退休。所以，60 大寿过后，黄金荣便到法租界巡捕房总巡乔辨士提出辞职，并推荐弟子金九龄和程子卿作为督察长和政治部主任的人选，以便在自己退休后继续控制巡捕房。可是，乔辨士仅仅接受了黄金荣的退休要求，并未接受黄推荐的人选，而是委任一向同黄金荣不对付的沈德福来继任督察长，以免黄金荣的势力过大。黄金荣却不甘心，使出浑身解数，终于把沈德福拉下马，乔辨士不得不任命金九龄为督察长，程子卿当政治部主任，黄金荣于是又控制了巡捕房。他先让自己在巡捕房的弟子，为沈德福破案制造障碍，然后到苏州设法救出关在监狱里的著名飞贼——水上飞。水上飞原名胡老七，太湖边上洞庭东山人，自幼练就一身轻功，擅长飞檐走壁，驾起小舢板在水上行进如飞，江湖上人称“水上飞”。黄金荣利用他的盗窃功夫，先后作案多起，特别

是偷窃了法国驻上海领事夫人的宠物猫，又盗窃了巡捕房总巡乔辨士珍藏的拿破仑金币及钻戒，而沈德福却对破案束手无策。而且从沈德福家中偷出几箱鸦片。破案后，水上飞供出从沈德福家中偷窃鸦片一事，经警方到现场勘查，证实鸦片确实系从沈德福家中所偷，至此，乔辨士只好撤掉沈德福巡捕房督察长的职务，而由黄金荣的心腹弟子金九龄继任，他的另一亲信弟子程子卿也当上了巡捕房的政治部主任。[①] 事后，法租界当局感到租界的治安，必须依靠黄金荣，为此，法国驻上海领事杜来和巡捕房总巡乔辨士不得不亲自登门造访黄府，邀请黄金荣担任法租界治安的特别顾问。这样，黄金荣退休后，仍然控制着租界的巡捕房！

二、杜月笙

杜月笙，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农历七月十五日，这天俗称中元节，因此他的原名叫"月生"，意为月半而生。以后发迹了，用他本人的话说是："阴沟里的泥鳅，跳进了龙门。"马屁文人根据《周礼·大司乐疏》中"东方之乐谓笙，笙者生也；西方之乐谓镛，镛者功也之义"，而把"月生"改为"月笙"，并为他取名为"镛"。[②]


杜月笙

杜月笙祖籍浙江海宁，出生在上海浦东的高桥镇，幼年家贫，父亲杜文庆曾在茶馆当过"茶博士"，码头上干过"扦子手"(查验货物的丁役)，所得甚少，难以养家活口。因此，杜月笙生母朱氏不得不时常帮人洗涮衣物，赚几枚铜板，贴补家用。杜月笙出生时，杜文庆正为谋生计与人合伙在上海杨树浦经营一家小米店，收入微薄。1889 年夏秋之际，上海地区阴雨连绵，加之霍乱流行，稻米、棉花大量烂在田里，贫苦人家无不陷于饥饿威胁之中。朱氏遭此灾祸，无异雪上加霜，只得抱着刚满周岁的

① 王辉强：《青帮大亨——黄金荣》，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77—182 页；司马列人：《黄金荣秘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年，第 388—392 页。

② 杨威：《杜月笙外传》，台湾宏育出版社，1967 年，第 132—133 页。



青年时期杜月笙

儿子，步行20余里，到杨树浦投奔杜文庆。

杜文庆与人合伙开的小米店，本小利微，天灾之下，米价暴涨，无力进货，朱氏到了杨树浦，只好带着身孕，抛下尚未断奶的杜月笙，进了纺织厂当女工。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后，便因贫病交加，操劳过度死去了。杜文庆因无力抚养子女，只得忍痛将女儿送给别人。杜文庆丧妻后，不久就与张氏同居，杜月笙也因此有了继母。这位继母待杜月笙不错，在她的关心下，杜月笙总算衣食有着。1892年冬，杜文庆病故，张氏带着杜月笙又返杨树浦，继续靠小米店为生。因不善经营，不久被迫关门，只得再带着杜月笙回到高桥镇，替人浆洗缝补谋生。杜月笙6岁时，张氏将其送入一家私塾读书，但只读了四个月，到第五个月时，张氏实在无力交付学费，杜月笙只得辍学。1898年，上海地区大地震，接着瘟疫再度流行。杜月笙继母张氏突然于某日神秘地失踪了，此后杜月笙便由姐姐和姐夫抚养。[①] 他从小就爱好赌博，经常出没于茶馆赌棚，过着游荡生活。由于常偷姐夫的钱去赌，姐夫发觉后就同他姐姐吵闹，姐姐只好托人把他送到上海去自谋生路。临走时姐姐曾给他做了一身新衣服，但是，在途中就被他输掉了。

他来到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十六铺。十六铺当时是上海的水陆交通要冲，从外滩到大东门，沿黄浦江建有各大轮船公司的码头，往来各地的轮船，均在此停泊。因此，这里商店林立，且有众多的赌场、烟馆、妓院，是流氓、地痞出没的地方，他便同那里的一些小流氓混在一起。后来，他来到南市大码头远房伯父杜庆云开的“鸿元盛”水果店当学徒。十六铺的水果店，大多是中盘批发，或者直接从轮船上的客商手里，或者从大盘水果行中批发各种新鲜果品，转手倒卖给上海各处水果店、水果摊及肩挑设摊的水果贩，间或也向外地来沪采办的客商推销。杜月笙初到水果店，因为年纪小，又识字不多，生意上的事一点也沾不着，只能服侍师兄、跑外，后来服侍老板娘，每天从早忙到深夜，倒夜壶、涮马桶，吃尽了苦头。光绪三十年(1904)，上海爆发抵制美国货的游行，杜月笙也

---

① 郁咏馥:《我所知道的杜月笙》，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408页。

跑去参加，结果被水果店老板逐出，只好又回到高桥。但是，在老家仍然无法存活，于是又返回十六铺，恰好遇到当年在"鸿元盛"水果店里当学徒的王国生。王国生当时已经满师，自己另开了一家"潘源盛"水果店，让杜到他店里当店员，可以按月领到一份薪水，生活可以维持。该水果店的账房黄文祥看他可怜，就背着老板把较次的水果，当烂水果批发给他。[①] 他又和一些流氓、小偷，在水果船上半偷半抢地得到一些水果，到大街和茶楼、烟馆去卖。他帮客人削水果皮，由此练就一套削水果的本领，因为贩莱阳梨出名，而得到一个"莱阳梨"的绰号。他在此时也与流氓们一起开赌摊，或为妓院拉皮条，常常设法对商店进行勒索。为了在江湖上立足，他拜了青帮"通字辈"陈世昌为"老头子"，被排为"悟"字辈，正式成为青帮的一员。"潘源盛"水果店老板王国生听说杜月笙拜上老头子，入了青帮，以为有了这层关系，非但杜月笙外出提货销货可以顺畅通行，而且水果店也可以受庇护，不受地痞流氓的欺侮。可是，杜月笙加入青帮之后，自恃有了靠山，于赌、嫖两事更加肆行无忌。有时在赌棚赌红了眼，自家输光了，便开始挪用店里款项作赌本，结果亏空越来越大，只好离开潘源盛水果店，从南市转移到法租界郑家木桥一带替赌场充当打手。杜月笙也常常指使小流氓夜间去偷商店的招牌，第二天再去勒索。有时又指使一群小流氓到商店门口互相打闹，抛粪便，弄得顾客纷纷躲避，影响商店的生意，店主只好给他钱了事。[②]

不久，陈世昌的同辈弟兄、绰号"饭桶阿三"的黄振亿受黄金荣之托，要为黄公馆物色一个打杂的，他便相中了杜月笙。向黄金荣推荐杜月笙的，还有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黄金荣亲信当差"大头阿发"等。所以，黄金荣见过杜月笙之后，便同意留下他在黄公馆当差。见面那天，是下午四五点钟，黄振亿同他来到黄公馆的客厅，黄振亿对黄金荣说："我介绍个小囝子给你！"黄金荣看杜月笙衣着朴素，蛮有气魄，在黄金荣面前站得笔直，于是说："蛮好！"当问到姓名时，杜回答："姓杜，名月生。月亮的月，学生的生。"黄金荣于是大笑道："真是奇怪，来帮我忙的，各个都叫生，苏州有个徐福生，前面有个顾棠生，厨房有个马祥

---

① 郁咏馥：《我所知道的杜月笙》，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409 页。

② 范绍增：《关于杜月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342 页；另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卷二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年，第 81—84 页。

生!"杜月笙于是被分配到与厨房相连的一个房间,恰好同在黄公馆唯一的熟人马祥生住在一起。

杜月笙在黄公馆里,最初只能作为一般佣人,干些杂务,进出只能走后门。他沉默寡言,事事留心,平时除了奉命应差,很少出门。他形容自己当时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存有战战兢兢的心情,给人的印象是做人诚恳,头脑灵活,很快便得到黄金荣的赏识。杜月笙又费尽心机,揣摩黄金荣及其周围重要角色的性格、脾气以投其所好。因此,不久就博得黄公馆上下的好感,黄金荣也开始派他做些贴身差使,视为自己的智囊和亲信,使杜月笙很快成了黄金荣手下的得力帮手。①

有一次,黄金荣老婆林桂生得病,提出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看护,以取其阳气镇妖邪。杜月笙被选中,因此得以进出黄金荣的内室。林桂生精明强干,敢作敢为,是上海滩有名的所谓"白相嫂",黄金荣对她言听计从。杜月笙深知林桂生的利用价值,因此照顾林桂生十二分尽力,殷勤备至,把林桂生服侍得非常满意,把他当作贴己心腹,连背着黄金荣在外面用"私房钱"放债的事也交给他掌管,于是决定好好提拔他。恰好一次机会使杜月笙获得了重用,使他从打杂的小伙计,一跃而成为老板娘的得力助手!

一天,一麻袋鸦片在送回黄府的途中,被运送者盗走。当时恰好黄金荣出去了,几个武脚色也不在家里,其他人面面相觑。这时,杜月笙觉得是天赐良机,于是鼓起勇气向林桂生毛遂自荐,要求亲自前往。当时林桂生无人可派,只好同意他去。杜月笙觉得成败在此一举,于是决定一个人前往。他问清楚运送鸦片所走的路线,向老板娘借了一支手枪,跳上一辆黄包车,叫车夫快跑!他在车上琢磨,偷鸦片者绝不敢到法租界来自投罗网,一定会先找一个藏身之处,不可能跑得太远。他断定偷鸦片者一定正在冒险穿过法租界前往英租界。他令车夫加快速度前往洋泾浜!那里是法租界与英租界的接壤处。不久,果然发现前面有另外一辆黄包车。那辆车因为载有一百多斤的鸦片,加上偷鸦片贼本身的重量,使得车辆走得极慢。杜月笙的车很快赶上那辆黄包车,他亮出手枪,枪口对准车上的人说:"朋友!你失了风!"偷鸦片贼惊得魂飞天外,便声音颤抖地问:"你是谁?"杜月笙这时发现对方手里没有武器,否则一定会向他开枪。于是

---

① 范绍增:《关于杜月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对车夫说:“没有你的事,请你把车子拉到黄公馆,我赏你两块洋钱。”杜月笙于是人赃俱获,把那个偷鸦片贼带到了黄公馆。① 杜月笙为黄金荣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便开始参与黄公馆的机要,更成了林桂生的心腹大将。

杜月笙在黄家一方面替黄金荣办事出主意,一方面也为自己日后自立门户做准备。他后来的发迹,主要得力于走私鸦片,这是从他指挥“小八股党”抢夺鸦片开始的。鸦片烟土从外洋运来,为了避开从吴淞口到英法租界码头一带的军警,必须先将鸦片烟土从轮船上卸下,而卸鸦片的办法是,将装载鸦片的麻袋,抛到海面,等到海水退潮时,再用舢板捞起,或者由在岸边的高手,用竹竿挠钩把麻袋钩上岸。一些人便趁机抢劫鸦片烟土。当年上海最狠的抢土角色,前后共有16位著名人物,就是所谓“大八股党”和“小八股党”。而黄府抢土的勾当,主要是由林桂生主持。

1918年冬,杜月笙为了抢夺鸦片贸易的控制权而指挥“小八股党”(由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杨启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8人组成)与以英租界巡捕房探目沈杏山为首的“大八股党”(包括沈杏山和季云青、杨再田、鲍海筹、郭海珊、余炳文、谢葆生、戴步祥等)发生争斗。

小八股党中人各个身怀绝技。顾嘉棠,小名泉根,世居上海赵家桥(现在的常德路)一带。早年曾在北新泾当花匠,故绰号“花园泉根”,懂武术,有肋力。发迹以后,在静安寺一带广置房地产,其门徒党羽,也多分布在此,因而号称“沪西半爿天”。叶焯山,广东潮州人,自幼生活在上海,小名阿根,及长,曾在美国领事馆充当汽车司机,故绰号“花旗阿根”。他会使斧,枪法颇准,据说在房间内,别人向天花板抛一铜板,他拔枪而出,便可将其击中。高鑫宝,出生于上海马立斯路(今延安中路与成都南路)一带,曾在网球场上代外国人拾球,会一些英语,曾在美国人开设的飞星车行当司机。他组织了马立斯路远近闻名的“斧头党”,经常聚众斗殴,敲诈勒索。钱增福,在马霍路(今黄陂路)设了一个赌台,不让高鑫宝分成,高鑫宝便砍伤钱增福赌台的一个赌客,以示给钱增福颜色看。高鑫宝发迹以后,在麦特赫司脱路(现泰兴路)开设了丽都花园舞厅(今上海市政协所在地),被人称为“丽都之狼”。芮庆荣,世居上海漕河泾,以打铁为业,残暴异常,曾将自己的老婆用门闩活活打死。孙传芳统治时期,当过军阀李宝章

① 章君谷:《杜月笙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PDF文版。

的“大刀队”队长。他到了哪里，便将灾祸带到哪里，人以不祥之物“火老鸦”称之。除这四人之外，杜月笙还先后物色了杨启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四人。以这八人为核心，建立了一支流氓武装，便是“小八股党”，成为杜月笙在上海滩打天下的基本力量。

大八股党因利用了英国租界的巡捕房、缉私营和水警营的力量，把持着走私鸦片从公海到英租界的水陆运输，很快超过了黄金荣，并切断了其他帮会靠鸦片贸易的生路。为了对付“大八股党”对鸦片贸易的垄断，黄金荣责成杜月笙去争夺鸦片承运的垄断权。杜月笙立即回到十六铺召集顾嘉棠、高鑫宝等八人，组成“小八股党”，进入英租界，先抢劫那些已经向“大八股党”交纳过保护费的鸦片商，然后又直接抢劫“大八股党”所经营的鸦片。他们常常利用月黑风高、大雨降临之机，把握时机，把鸦片抢下运到事先买通的三马路潮州会馆，放入空棺材里，然后再伺机运回法租界。[①] 一次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杜月笙根据从黄金荣处得到的情报，带领“小八股党”的兄弟们，划着小船，停泊在吴淞口江面的黑暗处，等候“大八股党”运送的鸦片。当载有鸦片的远洋货轮进入港口抛锚后，船上灯火即全部熄灭，于午夜时分将装有鸦片的麻袋丢入江中。这时，“大八股党”便派小船前来取货。而“小八股党”的小船则飞快地接近装有鸦片的麻袋，当“大八股党”的船只到达时，“小八股党”已经将麻袋夺获并迅速返回江边。

1920 年 7 月 20 日，“小八股党”再次夺取鸦片成功。在前一天傍晚，日本日清公司的一艘“乐阳丸”号轮船驶入浦东码头，旅客中有人夹带了 1 万余两烟土，分装在两个大皮箱和一件行李当中，由湖北人雷鸿见负责保价运送，与“大八股党”相约登岸取货。杜月笙早已获得情报，次日凌晨 2 时许，他纠集了 10 余名弟兄，各执斧头、棍棒，乘船在江中埋伏守候。雷鸿见等人将皮箱和行李从轮船上卸下来装在旁边的小船中，准备划向岸边时，这时，杜月笙等迅速将船截住，抢得了全部烟土离去。[②] 经过几次较量，“小八股党”终于夺得了鸦片运输的垄断权。黄金荣看杜月笙精明过人，便把法租界里最大一家鸦片行承包给他。当时，杜月笙不仅亲自运销鸦片，而且派人去查拿别人的“私土”。由于他经营得法，法租界的 10 家大鸦片商，全部由杜月笙控制起来。鸦片生意虽然可以财源滚滚而来，但却是严重违法的勾当，杜月笙之所以敢于大胆经营鸦片，主要因为他有后台。

---

① 苏智良：《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79 页。

② 王辉强：《青帮大亨——黄金荣》，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14 页。

为了使鸦片生意得以不断扩大而且能够合法化，杜月笙便伙同黄金荣、张啸林于1918年成立了“三鑫公司”，垄断了鸦片的运输和保险、包销等业务。凡是从国外或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军阀贩运到上海的鸦片和其他毒品，均由三鑫公司负责运输、包销，每年从中获得几千万元的暴利。（三鑫公司的情况详后）

杜月笙另外一个生财之道，便是开设赌场。黄金荣见杜月笙一天比一天老练，加之林桂生经常在身边吹风，便将当时法租界的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交给杜月笙经营。一天，林桂生对杜月笙说：“月笙，公兴记那个台子，就在巡捕房隔壁，你去寻他们老板，就说我喊你来的，要帮帮他们的忙，照例吃一份俸禄。”杜月笙第一次去却碰了钉子，赌场老板说他“空口无凭”。结果林桂生带他亲自前往，对赌场老板说：“你要凭据，现在凭据自家来了！”赌场老板只好低声下气地赔罪。当场决定给杜月笙吃一份长生俸禄，每月支领30块钱。她又在一张推牌九的台子旁停下来说：“我来推几副”，结果赢了不少钱。于是对杜月笙说：“我还有事，你帮我接下去！”三个钟头下来，杜月笙竟赢了2400多块！他便雇了一辆黄包车，急忙回到黄公馆，向老板娘交账。林桂生却对他说：“这笔钱统统归你，我一文也不要！”杜月笙急忙说：“我是代你推庄的，赢钱是你的运气。”杜月笙一再推辞，林桂生随后说：“我拿四百块的红钱，那两千块你拿走！”其实，这是林桂生对他的一次考验，看他如何使用这些钱！林桂生对黄金荣说：“假使他拿那两千块钱去狂嫖烂赌，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个小白相人的材料！假使他拿那笔钱存银行、买房子，那么他就是个不合我们行当的角色。而他拿这笔钱去清理旧欠，结交朋友，我断定他一定是我们最得力的帮手，我们一定要好好培养他、扶植他！”杜月笙果然把这笔钱既没有挥霍，也没有存银行或买房子，而是用来送给昔日的穷哥们和清理欠债，林桂生得知后非常欣赏，于是把杜月笙当作心腹来培养。不仅把法租界的一爿赌台拨给他，而且帮他完成了婚礼，还帮他在黄公馆附近租了一幢房子，以便于同黄金荣随时联络。①

要经管赌台，必须首先保证赌台的安全，赌台老板则定期送他巨额款项，以为报酬。这虽是件无本万利的美差，但要干好，却也不易。因为输红了眼的赌徒，可能铤而走险，杀人夺财。因此，负责赌场安全的大流氓，既要有管理一大批打手以维持赌场秩序的手腕，更要能摆平各方面的关系。

① 章君谷：《杜月笙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PDF文版。

杜月笙走马上任时,正面临各赌场时常遇到的两大难题:一是"剥猪猡";二是"捉大闸蟹"。

"剥猪猡"是指抢劫单人赌客。因为赌场打烊一般都要到晚上12时以后,那些赢了钱的赌客,往往成为"剥猪猡"的对象。不仅抢走赌客的全部钱财、首饰,往往把衣服也剥光,所以叫做"剥猪猡"。这类事情几经发生,赌客自然视赌场为畏途,止步不前,影响赌场的生意。杜月笙上任后,凭借黄金荣及青帮势力,找到了那些专干"剥猪猡"勾当的头目,答应由赌场每月在盈利之中抽出一成,交给他们分润,使之不再抢劫赌客,甚至还成了赌客的义务保镖。

所谓"捉大闸蟹",是指租界巡捕捉赌。巡捕房虽然按月收取赌场巨额"孝敬",但为了应付舆论,有时也故意兴师动众地捉赌。捉住赌客后,将他们用绳子连成一串游街,其状类似用绳串起的螃蟹,因而戏称为"捉大闸蟹"。凡是到赌台玩的人,大多有点身价、名声,当众游街,当然难以承当,所以,使得赌台的生意一落千丈。对赌场来说,赌客不能少,巡捕房也开罪不起,因此是赌场老板很头痛的难题。

赌场行话日场称"前和",夜场谓"夜局",大赌客多数参加"夜局"。杜月笙托黄金荣在巡捕房打通关节,如要捉赌,"只捉前和,不捉夜局"。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捉赌,既有利于巡捕房作秀,又因网开一面,众赌客可以放心赶"夜局",一举两得。同时,杜月笙还安排若干流氓弟兄在"前和"场内专充被捕角色,巡捕房只捉他们,其他赌客保证无事,"前和"场因此也可以拉到一定数量的赌客。杜月笙解决了公兴俱乐部赌场的两大难题,赌客依旧,黄金荣于是夸奖杜月笙"绝顶聪明"。

三、张啸林

张啸林原名小林,乳名阿虎,后改名张寅,以啸林为号,清光绪三年五月初四日(1877年6月14日)生于浙江慈溪县一个偏僻的山村。父亲张全海是木匠,因为收入微薄,难以养家,在张啸林10岁那年,举家来到杭州拱宸桥,开设了一家"张记箍桶铺"。这时,张家的生活有所改善,张全海把大儿子张大林送到一家织造绸缎的机房当学徒,而把张啸林送进私塾去读书。私塾里有不少纨绔子弟,张啸林同这些人为伍,很快就学会了偷、摸、赌、色以及打架等本领。

张啸林13岁那年，江浙一带遭受天灾，疫病大作，张全海由于积劳成疾而病故。张啸林的母亲和兄长张大林，只好重操父亲的旧业，勉强维持生活。张啸林则离开私塾，进了机房学习织纺绸缎，但他习于游手好闲，喜与流氓地痞为伍，不久便弃工考入杭州的浙江武备学校，在此期间，他与同学张载阳等人结为密友。他在武备学堂待了两年，没有毕业就离开了，然后找到杭州衙门的探目李修堂，并且拜他为"先生"。从此，他除了充当李修堂的跑腿外，就在拱震桥一带从事敲诈、勒索的勾当。[①] 后来因为与当地一伙赌棍为仇，寡不敌众，只好离开拱震桥，跟着吴鸿跑到上海鬼混。吴鸿是原浙江省警务厅厅长夏超的旧部，当过杭州蒙古桥第二警署署长，在上海青帮中有很多熟人。到上海后，吴鸿四处奔走，遍访青帮中的头目，托人把张啸林先后介绍给市区宝裕里的低级烟馆及沪西大赌台"荣生公司"当稽查（俗称"抱台脚"）。不久，张啸林用得来的不义之财，在重庆路马乐里租到一处房屋，每天聚赌抽头。1912年，他结识了上海英租界的著名流氓头子季云卿，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张啸林跟随季云卿在五马路（今广东路）满庭芳一带吃赌台和妓院的"俸禄"，专门干勾引嫖客、串赌、贩卖人口和逼良为娼的勾当。不久，他邂逅其父生前的友人唐观经，经唐介绍，拜青帮大字辈樊瑾承（成）为"老头子"，成为青帮通字辈成员。[②] 从此，他利用帮会势力，与人合伙贩卖烟土，同时广收门徒，扩张势力。由于他身材魁梧，臂粗力大，打起架来异常凶狠，且自比奉系军阀张作霖，于是被门徒们称作"张大帅"。张啸林读过一些书，对于青帮的秘籍颇为熟悉，因此受到帮内兄弟的尊敬。


张啸林

后来他与杜月笙结为莫逆之交，并且拉拢日本浪人土肥原，又经土肥原介绍，认识了日本军人永野修身，经常在一起秘密活动。军阀混战时期，张啸林以"实业救国"为名，联络青帮中头目范回春、周邦俊、黄楚九等，共同组织大赛马场"远东公共运动场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是个大赌场），又在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共舞台对面设立杭州饭庄。并与杜月笙合作组建"霖记木行"，

① 朱剑良、许维之：《张啸林的一生》，载《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314页。

② 俞云九：《我所知道的张啸林》，载《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319页。

由张啸林任董事长，杜月笙任总经理，独家经销苏联的木材。由于他早就与东北的日军有所勾结，故与汉奸殷汝耕取得默契，把从苏联运来的木材，全部调到沈阳，由木行业务主任派一心腹办理卸货与交接事宜。后来，又在木行内组织"长城唱片公司"，拉拢文艺界、新闻界的人物捧场。①

张啸林早年上过浙江武备学堂，与后来的浙江省长张载阳、军阀周凤岐等人有同学之谊，遂通过张载阳的关系，又结识了浙江督军卢永祥。这对张啸林日后的发迹有很大作用。当时上海滩的帮会各霸一方，互相争雄。张啸林为了夺取码头上贩运水果的权力，和广东帮的流氓大打出手，最后终于夺得在码头上贩运水果特权。后来，他又与南市的流氓范开泰（绰号乌木开泰）、范回春（绰号象牙回春）、苏嘉寿等，为了抢夺鸦片贩运权，而同法租界的流氓金廷荪等发生斗殴。金廷荪乃是黄金荣的徒弟，而张啸林则与当时浙江省张载阳和督军卢永祥有私交，双方都不愿把关系搞僵，于是，请出青帮大字辈出面调停，提出租界各帮会互相合作，合伙贩运鸦片的约定，遂把事情"摆平"。

① 俞云九：《我所知道的张啸林》，载《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319页。

第六章　上海青帮从旧式帮会到黑社会的蜕变

一、政治上投靠国民党当局

上海青帮从旧式帮会向黑社会组织的蜕变,首先表现为政治上投靠国民党反动当局,成为反共的急先锋。

1927 年以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为首的青帮三大亨,尽管在租界里已经与当局相勾结,具备了黑社会的规模和特点,成为上海滩最大的黑社会组织。但是,他们当时还仅仅是外国殖民者手下豢养的奴才,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还没有形成气候。他们尽管可以在租界以至上海滩上为非作歹,为所欲为,大赚黑钱,成为暴发户,但是,社会地位仍然卑下,仅仅是黑社会的"老头子",还没能登上国内的政治舞台。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以三大亨为首的上海青帮投靠了国民党当局,成为反共的打手,为国民党当局反共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从此便成了典型的黑社会组织。青帮三大亨也从一般帮会头子,变成了国民党当局的"党国要人"。所以,"四一二"事变可以说是上海青帮从旧式帮会向黑社会蜕变的标志。

1926 年 6 月,蒋介石被广州的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以摧毁北洋军阀的统治,完成对全国的统一。为了把上海从军阀手中夺回来,蒋介石于同年 9 月,派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议钮永建秘密前往上海,负责策应北伐军进攻上海的使命。钮永建到上海后,找到黄金荣,要求他立即组织一支队伍,听候他的调遣。这支由黄金荣召集来的乌合之众,在一次进攻北洋军阀驻军的战役中,仅放了几枪,就匆匆逃遁了。同年年底,杜月笙又利用自己的关系,把军阀孙传芳派驻上海的淞沪警察厅厅长严春阳和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等介绍给钮永建,互相谈判投降条件。这样,黄、杜等人便与国民党方面建立起密切关系。与此同时,他们也千方百计地与中共方面接触,中共当时因为担心国

民党可能背叛革命,也希望黑社会势力能够在未来的斗争中保持中立,减轻武装起义的阻力。于是,双方通过杜月笙与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保持联系。杜月笙还悄悄筹集到一笔款子,交给中共领导人、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表示愿意资助上海市总工会。杜月笙还充当中共与法租界当局秘密对话的牵线人,向中共提供北洋军阀的活动情报,保护租界内的中共党员,协助他们建立机关,提供开会的会场和安装电话等。[①] 对于黄、杜等人来说,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的趋势尚不明朗时,按照帮会的一贯信条:"多个朋友多条路"的原则,希望一旦共产党得势,自己仍然可以保有既得利益。所以,杜月笙一再向汪寿华表示,尽管军阀与租界当局都曾要他们参加对抗上海总工会的行动,但均被他们拒绝。并对汪寿华说:"无论你有与没有,(即是否存在——引者)始终保护你们,但以后你们要帮助我。"[②]当汪寿华进一步问他将来需要共产党帮什么忙时,杜月笙却狡黠地回答:"现在谈论为时尚早。"[③]帮会头子们是十分善于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进行投机的,所以,当1927年2月,白崇禧率领的北伐军到达上海附近,奉蒋介石停止前进的命令,并多次拒绝共产党的要求,延缓进攻上海时,杜月笙等人便逐渐弄清了蒋介石的意图,知道蒋介石不会同共产党合作,于是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完全倒向了蒋介石一面。1927年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杜月笙从陈群那里了解到蒋介石反共清党的准备。有关国民党准备驱逐共产党和解散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阴谋,也已经被泄露出来。杜月笙又从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和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那里得到通知,要他立即动员上海帮会参加反共清党活动。杜月笙首先说服了张啸林,然后又去说服黄金荣。黄金荣开始拿不定主意,担心国民党对付不了共产党,要看准以后再说。杜月笙认为机不可失,只有参加反共,将来在政治上才会有地位。于是向黄金荣提出:"共产党胜利了,决不会对他们有好处,只会同国民党同归于尽。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取胜,才有前途。"[④]黄金荣权衡利弊后,决定投靠国民党。

三大亨鉴于当时上海总工会拥有一支3000人的武装——上海工人纠察

---

①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0、262、273页。

②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8、450页。

③ 胡训珉等:《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1页。

④ 范绍增:《关于杜月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队，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为了对付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又联络其他各股的青帮和洪门，以及其他黑社会的团伙，共同行动。首先，由洪门龙头张伯歧等牵头，组织“上海工商界联合总会”，企图取代上海总工会。其次，是以黄、杜为后台，宣称由青帮通字辈的金廷荪和浦锦荣为会长的“中华共进会”“恢复活动”，上海市警察厅立即“准予备案，并给以保护”，而且拨款5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这样，一大批青帮、洪门的头目和骨干分子，便麇集在这两大组织里，成为蒋介石对付工人纠察队的两根棍子。1927年春，北伐军来到上海后，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总工会，并建立了武装纠察队。工人们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收回租界的口号，受到上海人民的欢迎。

当蒋介石到达上海后，黄金荣便积极充当蒋介石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牵线人，他设法为蒋介石搞到一张法国总领事签署的在法租界内的特别通行证，允许蒋介石出入法租界时，可以带领武装士兵10名。蒋介石在上海刚刚住下，便亲自接见三大亨，并对他们说：“将来有些重要工作，还希望借重你们！”[①]然后便派亲信杨虎、陈群去找黄金荣等密谋镇压上海工人运动和屠杀共产党人的罪恶勾当。经过密谋之后，蒋介石同帮会方面商定，立即停止对共产党的一切帮助，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武装对武装，以群众对群众的策略来“一举加以解决”。

“以武装对武装”的办法由杜月笙负责秘密进行。因为在上海进行此事，必然涉及租界。三大亨便积极与租界当局接触，杜月笙要求法租界提供枪支弹药，公共租界也应允杜的武装通过。然后又加强帮会的流氓队伍，由蒋介石派来的王柏龄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所谓“以群众对群众”，就是杜月笙派出大批青帮分子，事先仿制了许多总工会的标志，混入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中，为他搜集情报，散布谣言，藉以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一切准备就绪后，蒋介石于4月9日留下白崇禧等具体执行“清共”计划，自己则前往南京。4月12日，三大亨开始行动，首先设计杀害了上海工人领袖、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企图使上海工人群龙无首。并且于当晚举行了共进会的“歃血结盟”仪式，来为共进会打气。由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陈群和王柏龄六人金兰结义，称

① 胡训珉等：《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2页。

为誓共生死的结义弟兄。他们宣称:“因为共进会的弟兄,天不亮就要出动,冲锋陷阵,危险得很,所以大家事先约好歃血为盟,吃血酒,表示从今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当有人提出:吃血酒乃洪帮的规矩。顾嘉棠解释说:“管它哪一家的规矩,只要大家表示诚心就好!”参加结盟仪式的除了黄金荣等六人外,还有共进会的成员,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大厅。大厅正中,高悬“刘关张桃园结义”的绣图,一对巨烛、三支线香,八仙桌上摆有三牲祭品及香花鲜果。当天深夜,黄、杜、张、王、杨、陈六人及其他共进会分子,一同祭告天地,同饮血酒,立誓共患难,同生死,结为异姓弟兄。[①]

4月12日,凌晨4时许,三大亨分别聚合了帮会流氓武装15000余人,全部工人装束,佩戴工字臂章,携带武器,乘汽车通过租界,分别前往闸北和南市,向工人纠察队驻地及电车工会、三山会馆、湖州会馆、申新纱厂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起进攻。然后由周凤岐率领的第二十六军紧随其后,借口工人“内讧”,前往“调停”,用武力和欺骗的手段,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当天上午8时,二十六军第二师用欺骗的手法,占领了纠察队的指挥总部。在这场有预谋的大屠杀中,120多名工人遭到杀害。当晚,三大亨得到工人将于次日举行罢工的情报,便通知陈群,让二十六军做好大屠杀的准备。并且派遣大批流氓武装前往配合。4月13日下午,数万工人到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三德里时,反动军队突然向群众开火,工人来不及躲避,顿时尸横遍地。当场杀死100多人。[②]

反动当局对于三大亨屠杀工人的行动十分赞赏,对杜月笙提供准确的情报,尤为满意。由于三大亨积极参加四·一二政变,协助捕杀共产党人,于是同蒋介石、宋子文、戴笠等结下了特殊关系,并且得到了奖赏。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均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的职务。三大亨的党徒也被委以要职,张伯岐当上了二十六军义勇队司令、淞沪警察厅副厅长;黄金荣的徒弟董明德当上了“清党委员会行动大队长”。杜月笙同国民党政府的许多“党国要人”都建立了密切关系。他同孔祥熙的关系尤其深,孔祥熙曾亲自到杜月笙在华格臬路的住所看望他。杜月笙同宋子文也有来往,孙科等人

① 章君谷:《杜月笙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9页。

② 范绍增口述,沈醉整理:《关于杜月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2—213页。

因为在上海开银行、做买卖、玩女人,也都需要得到他的保护。杜月笙与国民党政府里的特务头子戴笠、杨虎、陈群等,还是结拜弟兄。为了做鸦片生意,他与各省的军阀也都有勾结。

总之,通过与国民党当局的勾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既是上海的青帮三大亨,又成为当时的"党国要人",逐渐完成了从帮会头子到黑社会首领的转化。

黑社会作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如果不得到当权者的庇护或与当权者勾结起来,就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与当权者勾结方面,也是以杜月笙最为突出。杜月笙之所以能够在上海滩以至全国成为黑社会的老大之一,与他同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不寻常的关系,密切相关。

杜月笙与戴笠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戴笠在上海过流浪生活的时候。那时,戴笠刚刚来到上海,寄居在表姐家中,他表姐很讨厌他,常常闭门不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戴笠经常同杜月笙在一起鬼混。后来,戴笠在上海当上了特务处处长,为了监视上海的进步人士,需要得到杜月笙的帮助。1937 年上海淞沪抗战后,戴笠向蒋介石建议,利用杜月笙把上海青红帮的力量组织起来,以便在日军占领上海后,开展敌后工作。蒋介石批准了这个建议,戴笠便到上海和杜月笙商议,决定由杜出面,召集上海青红帮头目杨虎、向松坡、刘志陆等开会,成立一个"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并在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别动队,后来归军统领导,成为特务武装。1931 年以后,戴笠为了扩充军统特务组织,经费感到紧张,杜月笙也常常给予资助。杜月笙在重庆时,还曾为军统局拨给上海秘密单位的经费。[①]杜月笙正是利用和戴笠的特殊关系,在从事各种非法活动方面,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默许。

二、从一般帮会活动到从事黑色事业

上海青帮从帮会到黑社会的蜕变,在经济方面表现为从帮会经营的烟赌娼,发展为大规模的"黑色事业"。

---

① 郭旭:《杜月笙与戴笠及军统的关系》,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21—341 页。

1. 从抢劫烟土到组建“三鑫公司”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从一般帮会头目到青帮三大亨;从一般帮会非法活动,到从事黑色事业,在经济上的标志,就是从抢劫烟土到组建的“三鑫公司”。三鑫公司的组建,实际上是帮会和烟贩们争夺上海鸦片的贩运权而被迫达成某种妥协的产物,所以是青帮三大亨集团形成和上海青帮向黑社会蜕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黄金荣既是法租界的督察长,又是青帮的“老头子”,表面上他是代表警方维持社会秩序的,实际上却是有组织犯罪团伙的首领,成为典型的黑社会“大哥”。他利用黑白两道的地位,不仅大肆从事鸦片走私,经营赌场、妓院,而且也经营合法工商业、金融业,并且把触角深入到演艺界。所以,30 年代的上海青帮,已经逐渐完成了从帮会向黑社会的蜕变。

宣统元年(1909),清朝当局与英、法两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禁烟条约,上海的英、法租界当局宣布在租界实施禁烟。实际上乃是个大骗局,表面上关闭了一些烟馆,但是又成立了“洋药公司”,使得鸦片的经营合法化、垄断化,租界当局从“洋药”即鸦片的税收中获得巨大利益。原来的烟馆名义上关闭,实际上仍在暗中继续出售鸦片。这样,在 20 世纪初,上海的鸦片走私活动仍异常活跃,为了获得巨大的暴利,烟贩们冒险贩运、倒卖烟土,并且发展成许多贩卖外国烟土的大烟商,如郭子彬经营的“郭鸿泰土行”、“郑四太爷”经营的“郑洽记土行”等。这些大烟土商行,都集中在公共租界境内,形成著名的“潮州烟帮”和“大浦烟帮”。由于贩卖烟土可以获得高达 3 至 4 倍的暴利,所以,受到帮会分子的觊觎,希望从中分得一杯羹。黄金荣于是和妻子林桂生商量,用抢劫的办法获得烟土。他派手下的徒弟们,在租借的交界处进行抢劫,然后逃入法租界,英国巡捕和华捕都不能进入法租界,被抢者因为是非法经营,也不敢在英租界报案。抢劫的手法有三种:第一种是所谓“抄把子”,也就是警匪合作,警察、巡捕以查抄烟土为名,搜查烟商的烟土,将部分上缴,其余部分私吞。有一次黄金荣侦察到江苏一位米商购买到 10 包烟土,准备从徐家汇返回家乡,于是派徐福生和一名华捕到徐家汇路上等候。当该商人到达后,二人立即从行李内搜出 10 包烟土,便要以走私烟土的罪名将他拘捕。商人十分害怕,慌忙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交给他们,并连连求饶,徐福生等人私分了钱,把 8 包烟土送到黄金荣家,其余两包交给巡捕房。第二种是所谓“硬爬”,也就是拦路抢劫。他们事先在烟商

经过的地方埋伏若干人，待其到达时，突然前去抢劫烟商携带的烟土。当时，有个名叫蔡乃煌的禁烟员，和广东、江西、江苏等地的烟商勾结在一起，以调查、转运为名，频繁地从各地往上海私运鸦片，以获取暴利。黄金荣查出此线索，便派遣他的弟子，拦路抢劫他们的烟土，或软硬兼施，迫使他们上当，使得蔡乃煌和烟贩们获得的暴利，相当一部分落入了黄金荣的手中。杜月笙在投入黄门之后，最初就是带领十六铺和南市的流氓们进行抢劫烟客的勾当。杜月笙看到华界里那些有钱的烟客，每天都到法租界来购买烟土，于是就指挥他的弟兄们在两地的交界处等候，当烟客购买烟土后从法租界出来进入华界时，立即上前抢劫，然后又迅速跑回法租界。被抢烟客既不敢向华界警方报案，也不敢向法租界巡捕房报案，只能自认倒霉。第三种办法是所谓“套箱”。鉴于贩卖烟土在当时表面上属于违法，所以烟土行一般都把烟土装在煤油桶里伪装起来。抢劫者则乘坐马车，事先准备好木头匣子埋伏在预定地点，待运送烟土的人到达时，抢劫者突然快速上前，用木匣子套住煤油桶，搬上车子快速离去。[①]

黄金荣也往往直接抢劫轮船上的走私鸦片，这就是利用其弟子中在上海码头的所谓“水老虫”。因为黄浦江水浅，轮船无法靠近码头，同时也为了逃避关卡的盘查，必须用小划子把鸦片一箱箱运到陆地。“水老虫”便趁机把小划子弄翻，然后把鸦片捞起偷走。

大量烟土被抢劫，严重影响了租界当局的收入，法租界的巡捕房便让黄金荣设法破案。然而无论是陆上的流氓瘪三，还是那些海上的“水老虫”，都是黄金荣的徒子徒孙，黄金荣只好拖延应付。但是，这终非长久之计，于是就和杜月笙、张啸林等商量，成立了“三鑫公司”，像保险公司那样，对外国走私鸦片的轮船收保险费。凡经过三鑫公司保险后，如果被盗，由公司赔偿。保险费是鸦片价值的10%。这些保险费，每月收入可达几十万到上百万元。保险费的收据不仅由公司盖上条戳，而且还有法租界巡捕房的收条。由于黄金荣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不便公开出面，只充当后台老板，由杜月笙任公司经理，张啸林和范回春任副经理。

三鑫公司的运作方式带有典型的黑社会特点。鸦片的押运，是由法租界治安当局以武力进行。黄金荣派出巡捕房几百名安南巡捕押运鸦片，并且出动警

① 王辉强：《青帮大亨——黄金荣》，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1—114页。

车巡逻开道，声势浩大，鸦片从起运到入库房，都有严密的保护措施。公司除了包销法国军队的鸦片外，还包销部分土商的鸦片，然后再由公司把鸦片批发给租界里的烟馆经销。公司利用自己的特权，向各个烟馆收取烟枪执照费，发现隐瞒，则进行罚款，甚至吊销执照。[①]

1923 年，三鑫公司达到了鼎盛时期。《字林西报》报道说："近来私运之范围渐大，每月吴淞一处上岸之土，在一千箱以上，每箱平均二千八百盎司，每盎司该机关收费一元，每箱二千八百元，每月收入，有二百二十五万元，或一年三千万元之多。"[②]以黄金荣为首的三鑫公司从鸦片的提运中获得了难以估计的好处，而且与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勾结在一起，建立起极为密切的关系。黄金荣曾三次被法国东亚全权大使、安南总督褒奖头等和二等金银质宝星。同时也被北洋军阀引为知己，被聘为咨议、顾问，黄金荣曾被黎元洪授予陆军上校衔侍从武官，被淞沪护军使衙门聘为上校督察。[③]

2. 从事其他黑色事业

除了走私鸦片外，青帮大亨们还经营其他黑色事业，主要有开设赌场、妓院、经营戏院、浴池等。

开办赌场

经营赌场同样可以获得暴利，所以是近代以来中外黑社会经营的主要黑色事业之一，黄金荣、杜月笙等自然要涉足其间。

黄、杜最初是为了合伙诈骗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的钱财而同他赌博的。他们陪同袁克文玩麻将，开始时总是让袁克文赢钱，使得袁克文的赌瘾越来越大，最后把从北京带来的几十万银钞输得精光。这也使黄、杜逐渐对赌博发生了兴趣，而且发现赌博是个发财的好办法。他们本人虽然并不精于此道，但他们的门徒当中却不乏个中高手。1920 年前后，有一天黄金荣在同几个徒弟一起玩麻将，正在兴头上，他提出开设几家赌馆赚钱的主意，立即得到几个徒弟的赞成。其中有个名叫王茂廷的，还介绍了国外开设赌台和多轮转盘的内幕。黄金荣的另一门徒马祥生出身赌博世家，精通赌道，对黄金荣讲了一大套赌博的奥秘，还

---

① 程锡文口述：《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295—296 页。

② 转自王辉强：《青帮大亨——黄金荣》，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17 页。

③ 苏智良：《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1 页。

介绍了如何做赌具和在骰子内灌铅等,使师父大为高兴,当即拍板,让马祥生前去筹备,多开几家赌场。马祥生利用黄金荣的招牌和租界巡捕房的权势,很快找到了合适的地点,开始“营业”。他们不仅购置了中国传统的麻将等赌具,而且从国外引进了新颖的“轮盘”,由于赌法新颖别致,很受赌徒门的欢迎。为了欺骗一般赌客,他们还在赌具上做手脚,安装绝密的机关,使庄家赢得更加容易。至于赌场的安全问题,则由帮会弟兄们分头负责,必要时则请巡捕房出面干预。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先后在英、法两个租界交界的地方开设了四五家大型赌场。他们还学习欧洲摩纳哥的经验,融吃喝嫖赌为一体。赌场门口戒备森严,由几名彪形大汉把门。楼内每一层都有两三个流氓,配备有匕首、短棍和手枪,不停地巡逻。每一层还都开有单间客房,供嫖客、妓女和烟客们使用。后来,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又以每月4000两白银的租金,在福煦路(今延安路)181号开设了一家上海滩最大的赌场——上海高级俱乐部。由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金廷荪、顾嘉棠、王茂亭、马再度等担任董事。赌场设在一座三层英国式的洋房里,周围是占地60亩的花园。双扇铁门,汽车可以直接出入。建筑是英国式的,进门处是一座有亭台楼阁的大花园,中间是一片碧绿的草坪,四季常青。坪后面建有一座三层楼的大洋房,一楼是赌场,里面中西赌具一应俱全,仅三十六门的轮盘赌台就有八张,环绕中间广厅的四周,有数不清的大小赌室,牌九麻将。三楼是赌客休息之所,免费供应上等中西大菜和各种名点以及上等鸦片,还可以免费乘坐小轿车回家。由于赌具中使用的骰子被灌了铅,轮盘下面安放了吸铁石,所以,赌客几乎没有赢钱的可能。偶尔赢了钱,出门后也会被跟踪,用各种办法把钱抢回。甚至派巡捕把赢钱的赌客押往法租界的巡捕房,交纳罚款才能保释。[①] 在杨威所写的《杜月笙外传》里,对该赌场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赌场)地点坐落在法租界,前门临巨籁达路,后门临福煦路,占地数十亩。大门进去,一座花园,竹木扶疏,亭台掩映。中间为一广坪,浅绿铺茵,丛花织锦。坪后矗立起三层大洋房。”“这是洞庭山席姓的产业,他们以4000两银子一月的高价租赁下来。楼下楼上放着八张三十六门轮盘赌台,其他摇摊押宝、牌九、骰子色色俱备。三层是属吞云吐雾之所,摆上几张烟榻,供设着晶莹灯火,福寿清膏。来往伺候的全是花讯娇娘,打火装烟,奉巾献茗,百依

① 王辉强:《青帮大亨——黄金荣》,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百顺地随人呼唤。厨房里日以继夜地准备着中西菜式，苏扬美点，以及洋酒咖啡，任由随意取用，不费分文。赌客们自下午三四点钟起陆续上场，入夜以后，男的女的，纷至沓来，更是门庭若市。其中豪赌自是欢迎，小试亦无不可。先将现款换成筹码，再由你喝雉呼卢。赢了鸿运当头，尽可拍拍屁股走路。输了是自寻烦恼，跳黄浦（江）也不还钱。赌饿了，只消一声吩咐，自会一盘一盘的端到跟前。赌倦了，跑上三楼，横陈下来，自会一筒一筒的送到嘴里。在腹饱神旺以后，便又像飞蛾扑火般，赶到赌台落注。如此这般，在几个回合里，包管你祖宗三代都不认识。这真是一片快活林，也就是变相的活地狱。"[1]范绍增回忆说："他（指杜月笙——引者）另一大宗收入是包赌，上海的许多的大赌场，都是由他负责包下来。我只去过其中一家最大的，是在同孚路181号，那里由顾嘉棠派顾根苗等十几个人，携带手枪，担任保护。这是一座相当大的花园洋房，铁门经常关闭着，只有认识的汽车才能直开进去，对不认识的人，他们还要抄一下身，怕带手榴弹等物进去出事。他们对前去捣乱的小流氓，轻则殴打，重则杀害。""那种赌面相当大，一次输赢都是几百到万元。"[2]

开设妓院

在旧上海，娼妓也是黑社会的重要财源，黄金荣等人作为上海青帮三大亨，自然不会放过妓院这个赚钱的行当。上海滩的妓院称为"堂子"。法租界效仿法国的法律，允许在租界里开设妓院，然后向妓院老板收税，称为"花捐"。黄金荣不仅承包了法租界的全部"花捐"，而且让徒弟们也去开设"堂子"，使自己成为这些妓院的总老板。另外，他又让巡捕房的徒弟对其他堂子进行管理和控制，进行敲诈勒索，对于不如意的，则让徒弟们打砸。在巡捕房里设立"正俗股"，专门负责对妓院的控制和管理，黄金荣因为承包了花捐，就能代表正俗股行使权力，征收花捐，同时，他又能以巡捕房督察长的名义，调动华捕，对各个堂子进行检查和罚款。他的众多徒弟，则在各处配合，打着黄金荣的旗号，对堂子进行敲诈勒索。各堂子因为害怕黄金荣的权势，则不敢对他们有所得罪。不仅要如数上缴花捐，而且时常用金钱去"孝敬"黄金荣和他的徒弟们。黄金荣还利用所开的"大世界"，作为娼妓公开的活动场所。他的门徒丁永昌管理的"大世

---

① 杨威：《杜月笙外传》，台湾宏育出版社，1967年，第56—57页。

② 范绍增：《关于杜月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界”，还高价雇用舞女和妓女，上演所谓“裸体歌舞”，藉以招徕嫖客。①

经营娱乐行业，开设戏院和浴池

黄金荣先开了“共舞台”，也就是男女演员共同在舞台上表演，有别于以往只能由男演员或女演员分别在舞台上表演的传统。以后又陆续开办了“大舞台”、“黄金大戏院”、“金荣大戏院”以及“大世界”等娱乐场所。由于他在戏剧、娱乐业的势力最大，无人能够与他抗衡，因此，娱乐界的人要想在上海滩立足，只好投在他的门下。他开设的戏院，不仅在规模上最大，而且增设了包厢，并从北京、南京等大城市邀请来众多的名角，来戏院献艺。他们演出的戏目新颖，在上海戏迷中受到欢迎。而且，对于名角和新上演的戏目，新闻界也以醒目的大标题大肆吹捧，结果总是场场爆满，票房收入越来越高。他还派得力的弟子、巡捕和华探，日夜在大舞台巡逻，防止其他流氓捣乱。

黄金荣还在上海开设了两三家浴池。开浴池是个赚钱的行当，黄金荣在上海开设了两三家浴池，设有共享的大浴池，也有单间的小浴池。服务项目有搓背、修脚、按摩等，不仅供应洗浴用品，而且还有茶点水果。黄金荣本人也经常到浴池去洗澡，同时与门徒商讨或处理一些重大事情。他最满意的是其得意门生金廷荪开设的“逍遥池”，经常来这里洗浴和处理事情，他与徒弟争夺黄楚九的“大世界”的阴谋，就是在这里策划的。

恶霸行业

三大亨作为黑社会头子，还让其徒子徒孙经营各种恶霸行业。

首先是贩卖人口。他们把贩卖女孩称作“摘桑叶”，贩卖男孩称作“搬石头”，贩卖成年妇女叫做“开石头条子”，贩卖华工出国叫做“贩猪仔”。他们干这种罪恶勾当，一般都有后台。如法租界贩卖人口的总头目，就是租界巡捕房的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他乃是杜月笙的徒弟，后台是法国人范浪打(Volenti)(法租界的刑事科科长)。英租界贩卖人口的后台是龙阿根，他是老闸巡捕房的刑事股探长，身在青、红两帮。贩卖人口的活动，由青帮头目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具体操作。他们一般从苏北农村将妇女诱骗到上海，然后卖与妓院，甚至卖给专门接待外国水兵的下等妓院。贩卖男孩者的后台是虹口巡捕房的刑事股探长尚武，他利用广东和东南亚一带华侨富商历来有购买男孩做“养

① 苏智良:《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8页。

子"（实际上是家内奴隶）的传统，与潮州帮相勾结，将拐骗到的男孩卖到广东或华侨中的富商做"养子"。贩卖华工的是名叫陈鹤鸣的浙江温州人。他是杜月笙的徒弟，神通广大，竟然与浙江青田县政府、上海市警察总局的护照股以及葡萄牙、法国的人口贩子相勾结，以旅游、找工作等作为诱饵，诱骗浙江青田的男女青年出国。男青年被迫用青田石雕刻石像，女青年则被迫从事色情行业，以从中牟取暴利。

其次是走私。走私是中外黑社会从事的主要黑色事业之一，上海黑社会也精于此道。他们的走私活动，一般是与洋人勾结起来共同进行的。黄金荣的徒弟吴志龙就是专门干走私勾当的行家。他利用与外国走私贩的关系，进行走私活动。外国轮船常常把一些走私货物，放在船上等待偷运，如果遇到险情，则将走私货物抛入江里，然后由"潜水鬼"乘夜色朦胧时，将其捞走。这些"潜水鬼"的组织庞大，多属帮会控制，吴志龙同他们关系密切。

三、从黑色事业转向白色事业

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并不满足于作为黑社会头子，而是要跻身于工商界，以使自己的名声变得"正派"，地位更加巩固。他们利用从事黑色事业赚到的大量金钱，转而投向正当的金融业和工商业，也就是从黑色事业转向白色事业。1928 年杜月笙筹办了中汇银行，自任董事长，随后又插足别的行业，如证券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纺织厂、面粉厂等。到 1947 年，他在工商界的董事长、理事等头衔，不下 20 个。为了笼络各路文人、贤士，他的智囊人物向他出谋划策，成立了一个社团——恒社。其成员中，有的是他初期的弟子，多为以往的小流氓、包打听、巡捕和赌徒；有的是商家殷实富户的子弟，他们是因为害怕被绑架而寻求庇护；三是寄希望于恒社，以求得发展的人。恒社最初只有几十个人，后来发展到近 2000 人。为了得到报纸的吹捧，杜月笙还设法进入新闻界，担任了上海《申报》的董事长，《新闻报》的董事、《中央日报》的常务董事。

黑社会的特点，就是由黑色事业转向白色事业。一般是从事黑色事业起家，在拥有相当的实力后，黑社会头子们，自己便不再干那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而是把从事黑色事业赚到的钱财，用于金融或工商业，从事正常的经济事业。清末民初，当帮会组织从秘密结社蜕变为黑社会时，他们所从事的黑色事业也

在向白色事业过渡。

首先是进军金融业。



杜月笙　任上海中汇银行董事长

青帮三大亨在进军金融业方面，以杜月笙最为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和政府中担任要职的青帮人物陈群，劝告杜月笙今后应该以投资金融和工商业为主要活动，以便洗刷以往经营烟、赌场的流氓形象，并可借此跻身上流社会。1929年2月，杜月笙在上海金融界的巨头之一、青帮门徒钱新之的建议和帮助下，开办了"中汇银行"。杜月笙鉴于自己对于金融业并不熟悉，而且缺少足够的资金，担心没有人来存款，最初颇为犹豫。钱新之告诉他：上海的银行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凡有新银行开业，其他各银行都要先去存上一笔钱，称为"堆花"。上海的各大银行的老板们，得知你杜月笙要开办银行，自然要前来"堆花"。加上租界里的烟赌两档都是银行的大客户，凭借你的名气，肯定会把钱统统存入你的银行。杜月笙在钱新之的开导下，便决定开办银行。杜月笙用这个办法，开起了"国民银行"（后来改名为中汇银行）。一些富豪为了讨好他，便纷纷前来投资，如大富豪徐懋棠就向该银行投入了一大笔资金。另外，该银行还得到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支持，从而使杜月笙不用动用自己的资金，就开办了一个资金雄厚的"国民银行"。后来，当国民银行改名为中汇银行时，上海银行业老板陈光甫一次就存入白银50万两，存款时间，从一般堆花的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而且不取分文利息。"中汇银行"带有明显的黑社会性质，它把经营的重点，主要放在收付烟赌两项游资和押款等业务方面。那些资金雄厚的烟土商，只要付给中汇银行巨额的费用之后，即可以使烟土保提、保运和保销，从中获得巨额的利润。后来，杜月笙又利用和国民党的特殊关系，被当局指定为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不久又当上了上海市银行工会理事和浦东、国信两家银行的董事长，成为上海银行界的巨头。

其次，涉足实业界。

青帮三大亨利用各种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又投资于实业界正常的工商业，成为上海的大企业家。在这方面，三大亨中也以杜月笙最为突出。

他首先把手伸向面粉业。他趁30年代上海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负赌债数十万元难以偿还，而打算出售面粉厂的机会，以109万元的低价收购了该面粉厂。1936年5月，上海面粉交易所因为业外大户朱如山、钟可澄等大量囤积面粉，导致面粉价格猛涨，交易所的经纪人大多面临破产的危险，只好向交易所仓库主任黄柄权求救，请他转托杜月笙帮忙。在得到杜月笙的首肯后，他们以杜月笙的名义在市场上抛出面粉50万包，他们自己也抛出80万包，致使面粉价格下跌。迫使朱如山让步，经纪人也免于破产。这件事终于使杜月笙当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①]

1931年，在杨管北的帮助下，杜月笙又成功地打进了上海的航运界。杨管北是江苏镇江人，大学肄业，北伐军到达上海后，他成为北伐军政治部交际股的政工人员，因为善于辞令，受到杜月笙的赏识，逐渐成为杜门座上宾。为了使杜月笙的势力打入轮船航运业，他为杜选中了著名的大达轮船公司。该公司是清末著名事业家张謇于1904年所创立，垄断上海至扬州的航线达24年，拥有四条江轮，总吨位在4000吨以上，还有若干条拖船和木驳船。1925年张謇去世，其弟张詧因支持北洋军阀而被国民党指为反动分子，遭到通缉，张氏的势力一落千丈。经理鲍心斋把企业的利润存在南通得记钱庄，1930年得记倒闭，存在钱庄的银钱化为乌有。次年，公司拥有的两条轮船又在航行途中失事，死亡船员和旅客1000多人，公司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杨管北看准了机会，设法替杜月笙和自己大量收购大达公司的股票，使自己和杜月笙成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然后二人又使尽各种手段，进入公司的领导核心，最后，杜月笙当上了公司的董事长，杨管北出任公司副经理，掌握了公司的实权。[②]

再次，深入报界。

杜月笙为了便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运作，开始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新闻界。为此，他不仅同报界的老板拉关系，结交了上海的两大报纸《申报》的史量才和《新闻报》的汪伯奇，而且笼络编辑和记者。他首先笼络《新闻报》的编辑唐世昌。唐世昌是上海报界最有势力的人物，既压得下惊天动地的新闻，也可

---

① 黄柄权：《杜月笙出任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经过》，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3—299页。

② 黄永言：《杜月笙打进大达轮船公司经过》，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4—292页。

以无中生有掀起大浪。杜月笙在结识了唐世昌以后，便不断有更多的编辑、记者成为杜门的座上客。许多新闻界的著名人物甚至干脆拜杜月笙为师，而杜月笙则对这些弟子给予安全保证。杜月笙在控制了新闻界以后，原来一些达官显要和富商巨贾也来向他暗送秋波，使得杜月笙的身价直线上升。

杜月笙在进入实业界后，很快又成了上海工商业的领袖人物，在抗战前后，他拥有的官商合办、私营工商业网和各行业公会的职务，包括董事长、理事、主席、经理的名义，不下 150 多个。[①]

张啸林也打着“实业救国”的旗号，不仅同杜月笙一同创办中汇银行，还当上常务董事。此后，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纷纷找到张啸林，请他挂名，成为交通银行、通商银行、江浙银行等六七家银行的董事、监事，又经杜月笙推荐，当上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理事。他又联络范回春、周帮俊、黄楚九等，组建大赛马场“远东公共运动股份有限公司”，又在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大舞台对面开设杭州饭菜馆。并与杜月笙合组“霖记木行”，独家经营从苏联运来的木材。[②]

上海青帮，经过清末民初的风风雨雨，终于从一个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逐渐蜕变成了黑社会组织。

① 黄柄权：《杜月笙出任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经过》，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② 俞云九：《我所知道的张啸林》，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48 页。

第七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青帮三大亨

1937年7月7日，日寇挑起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8月13日，中国军队为了抵抗日军对上海的进犯，组织淞沪会战，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被迫于11月11日从上海最后的阵地南市撤退，上海除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南地区外，全部落入日军手中。从此，上海便沦入日寇的统治之下。

在此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帮会也发生了分化，大多数帮会成员出于爱国之心，不甘心成为日寇的奴隶而奋起抵抗；少数人则认贼作父，成为汉奸。作为青帮三大亨的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在如何对待日本侵略者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表现。

日本侵略者深知青帮三大亨在上海拥有的势力，企图利用他们帮助其统治上海。所以在上海沦陷前夕，三大亨就面临着是否撤离上海的考验。当时黄金荣以年老多病为由不愿离开，杜月笙则在戴笠等人的劝说下，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避难，张啸林却留在上海当了汉奸。

一、装病蛰伏的黄金荣

在"三一八"淞沪抗战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已经成为"孤岛"，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便企图利用黄金荣为其充当傀儡，统治上海。

1938年夏，日本驻华海军武官、海军少将佐藤要亲自到黄金荣府上拜访，黄金荣得到消息，便让护士为他注射了一针冬眠灵。当佐藤到来后，黄金荣穿上一个夹袄，又在身上裹了一条呢毯，昏昏欲睡地由龚天健和俞永刚搀扶下来。佐藤在向他致意后，向他提出："本人来府造访是来请老先生助皇军一臂之力，出任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长之职。"黄金荣急忙推辞说："佐藤将军和贵国政府看得起我黄金荣，心里非常开心。本应为皇军效劳，只是我年老多病，你看，大热

天着了夹袄还怕冷，连路也走不来，哪能当好市长，再说，我也不识字呀！”佐藤回答说：“老先生放心，只要您出面担任此职来稳定上海民心，一切步骤和计划，您都不需要操心，我们皇军会给您安排就绪的。”黄金荣感到不可能立即回绝，便采取拖延的办法说：“这件事至关重大，容我考虑一下再答复。”[①]1939年8月汪精卫投向日寇成立汪伪政权后，曾在日本人开设的乐山花园大酒店宴请黄金荣，宴会上佐藤又对黄手下的龚天健试探说：“我们盛情邀请黄老先生当顾问，协助搞好上海工作，黄先生在上海名气大，说句话就能算数的。”龚天健回答说：“黄老板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早已退休。”黄金荣便从椅子上站起来表示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接着便故意摇摇晃晃地让手下人扶着离开宴会。汪精卫并不死心，又派大汉奸周佛海亲自到黄金荣家，邀请黄金荣充当伪上海市市长。黄金荣躺在椅子上对周佛海说：“谢谢周先生，我身体实在不行，加上自己没有学问。现在不用说站起来，就连坐上一个钟点也不行！”手下人见状忙帮腔说：“老太爷，我扶您到床上去休息吧！抽上几筒烟，提提精神。”龚天健接着说：“周先生，今天黄老板身体不好，改天再说吧！”于是把周佛海送出门外。[②]

黄金荣为什么会拒绝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利诱呢？原来他有自己的考虑。他曾经对程锡文和龚天健等几个心腹徒弟说：“给日本人做事名声臭，性命不安全！”又说：“土地是中国的，日本人虽然打进来，占据了上海，但它不能把上海搬到日本去。我能得势窜上去，同蒋介石有关系，他好我也好。现在他在重庆，我只能帮他，不能同日本人打交道，遗臭万年，应当为子孙后代着想。”而且黄金荣老于江湖，惯用“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伎俩，他可以自己不出头，而让门徒去帮日本人办事，他则坐享其成。如介绍门徒卢英当了伪警察局长，介绍“上海三老”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担任伪职，由他遥控，以达到左右逢源的目的。[③]

二、参与抗日救亡与锄奸的杜月笙

杜月笙在上海沦陷前，并不愿意离开，还想利用租界作为保护留在上海不

---

① 司马烈人：《黄金荣秘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457页。

② 程锡文口述，杨展成整理：《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303页。

③ 程锡文口述，杨展成整理：《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群众出版社，1992年。

走，后来在戴笠和钱新之的劝说下才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他之所以不去重庆而滞留香港，也是另有打算。他原来以为中日之战，一两年便可以见分晓，要是日本人打胜了，因为他没有去重庆，回到上海照样可以保持住原来的地位，因为他同日本人还有不少关系；要是中国打胜了，更不会有问题，于是呆在香港，静观时局变化。所以，他在离开上海时，也把他的秘书徐采成和管家万墨林等一批人留下来，既可以保住他在上海的地盘，又可以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帮助戴笠搞情报，将来无论哪方面取得胜利，对他都有好处。他在香港也是采取两面手法，既和敌伪有联系，也替戴笠做过不少工作。[①]

日本人早就想控制杜月笙，早在"八一三"之前，日本海军部部长、海军大将永野修身就曾专门拜访杜月笙，提出由日本政府拨出3000万元，和他合办"中日建设银行公司"，以便把他控制在日本人手中。杜月笙只好以"一个平民百姓同外国政府合办公司不合体制"为由加以婉拒。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杜月笙曾同上海《申报》老板史量才和黄炎培共同发起"上海地方维持会"，由史量才担任会长，杜月笙担任副会长，向市民呼吁向前线将士捐钱、捐物。《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地方维持会"改组为"上海地方协会"。"七七事变"后，全民抗战热情高涨。1937年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成立抗敌后援会，杜月笙担任了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杜月笙曾多次慰劳抗日部队，并且为八路军做过一些好事，他把1000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捐赠给八路军。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中国军队撤离上海，日本侵略者开始考虑占领上海，并在上海建立傀儡政权的问题。他们鉴于杜月笙在上海的特殊地位，便把杜月笙作为拉拢的对象。在上海沦陷前，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对杜月笙进行威胁和利诱，企图不让他离开上海。向他提出："你既然已经失去离开上海的一切希望，就应该彻底而充分地同皇军合作！"并且威胁说："如果杜先生不肯为皇军效力，我们要列举你对皇军的敌意行为，然后施以膺惩！"而且派飞机在杜月笙住处低空飞行，对杜月笙进行实际威胁。[②] 但这件事反而促使杜月笙下定了离开上海的决心。1937年11月26日，杜月笙突然接到宋子文的电话，告诉他船票已经买好，明晚登轮。至此，杜月笙最后下定了离开上海的决心，于当天深夜，他只带

---

① 范绍增口述，沈醉整理：《关于杜月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 章君谷：《杜月笙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07—823页。PDF文本。

了一名随身侍役，雇了一辆出租车，悄悄向码头驶去。法国的邮船阿拉美斯号正停泊在岸边，登船看去，原来宋子文、钱新之等已经在船上，顷刻，代理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也姗姗而来。杜月笙终于离开了他的发迹之地——上海。[①]

杜月笙当初不愿意离开上海，无非担心一旦离开他经营了多年的根据地，难免会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下场！他到香港之初，因为港英当局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对黑社会的活动严加控制和打击，对于杜月笙也一直加以限制，甚至因为没有公开职务而受到警方的查询。1938 年初，蒋介石下令扩大中央赈济委员会，委任杜月笙为“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的官衔，使他大为高兴，于是积极为蒋介石效力。

首先，为了避免一些失意政客被日本人拉拢利用，杜月笙利用赈济委员会，先后把段祺瑞临时政府的交通总长曾敏隽、陆军总长吴光新、外交总长颜惠庆等接到香港，打击了日寇扶植伪政权的图谋。

其次，上海沦陷后，国民党在上海的组织几乎瘫痪，国民党留沪人员中又有大批投靠日本人和汪伪集团。国民党中央虽然派遣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潜回上海，收拾残局，但一直未能打开局面。于是成立上海统一委员会，由杜月笙担任主任委员，戴笠等人任委员，吴开先任秘书长，负责协调上海沦陷后党政及情报方面的关系。

最后，参与上海的锄奸活动。在杜月笙留沪管家万墨林的支持下，军统局在上海建立了锄奸行动小组，由杜月笙的得意门生陈默担任总负责人。陈默奉杜月笙之命，加入军统后，上海行动小组和“忠义救国军”紧密配合，制裁敌伪的锄奸工作自此展开。1938 年 1 月 14 日，陈默首先除掉了专替强盗开脱的所谓“强盗律师”范罡。接着，“上海市民协会”负责人尤菊荪、“市民协会委员”杨福源、“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市民协会主党”顾馨一，还有日本人、绥靖第三区特派员中本达雄，都先后遇刺。就连杜月笙的老朋友陆连奎、法捕房的副探长曹炳也未能幸免。当年与杜月笙一起同心协力开公司的知己心腹俞叶封，也因为参加了张啸林所组织的“新亚和平促进会”，主持棉花资敌工作，也被杜月笙的弟子用机关枪扫死在更新舞台的包厢里面。最重要的是刺杀了投靠日本的伪浙江省省长张啸林、伪上海特别市长傅筱庵等重要汉奸头目。

---

① 章君谷：《杜月笙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826 页。PDF 文本。

三、卖身投靠日寇的张啸林

1927年“四一二”事变时，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国民党打击共产党、镇压工人纠察队的打手。事后，蒋介石为了酬谢他，委任张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1930年张啸林“衣锦还乡”，回到杭州时颇为轰动，当地土豪劣绅、反动政客、地痞流氓纷纷为他摆酒接风。杭嘉湖一带的流氓盗匪，纷纷投靠在他的门下。他则在杭州西湖畔购买土地，建造别墅，并在滨湖路上开设天然饭店。1931年，他又与杜月笙在上海合伙开设一家赌场，并利用非法得到的大量金钱，投资于银行和工商业，由流氓变成了“实业家”。因为他同国民党集团的孔祥熙、宋子文有来往，上海金融界、工商界中便有人请他作靠山，纷纷请他挂名。1932年，经杜月笙推荐，他当上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监事，这样，张啸林也就跻身于工商界了。

1937年，上海沦陷前夕，蒋介石指示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同去香港。当时，黄金荣以年老多病为由留在上海，杜月笙决定前往。“八一三”松沪抗战开始时，张啸林正躲在莫干山的别墅里避暑。日本特务早已打听到张啸林的行踪，所以在张啸林来到莫干山的次日，日本人永野修身就前来造访。交谈之中，永野观察到张啸林急切地希望得到日本人的支持，藉以巩固自己在上海的势力。于是向张啸林表明来意，提出上海战事一结束，马上要成立“中日亲善”的政府，希望张啸林能够出任市长。这番话虽然正中张啸林下怀，但嘴上还是假意推辞说，自己是生意人，难以担当市长大任。“八一三”松沪抗战失败后，上海处于沦陷前夕，由于杜月笙已经前往香港，黄金荣在上海因年老多病，不问外事，张啸林认为正是他依仗日本人势力，独霸上海的好机会。于是离开风景优美的莫干山，回到上海，决心当汉奸，一心想当一任“上海市长”，以过足官瘾。可是，上海市长的宝座已经被汉奸傅筱庵抢占。这时，日本人恰好正在筹划在浙江成立伪政府，于是张啸林希望回到家乡浙江“弄个浙江省长玩玩”。他甘心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成为大汉奸。

第八章　上海青帮的覆亡和三大亨的结局

一、愿意悔过自新的黄金荣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结束了国民党政权，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准备进驻上海。4月27日，杜月笙、王晓籁、金廷荪等人已经前往香港，黄金荣究竟何去何从？他面临着十分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明白他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个有罪的人：在“四一二”事变中，他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屠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后来自己又为法租界当局服务了多年，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充当青帮头子的几十年当中，干了大量欺压百姓和危害社会的事，成为上海黑社会的龙头老大。因此，担心如果留在上海，共产党肯定饶不了自己。当时很多人劝他前往香港，但他担心身体吃不消。他说：“我的年纪已经80多岁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又对心腹说：“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条子，交给杨虎转交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①]这样，黄金荣最后还是下决心留在上海。不过，他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决定不参加国民党撤离前的大搜捕、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并且让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将一份400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交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以便对其进行控制，防止他们进行捣乱；又让黄振世将他知道的国民党财产加以登记，请杨虎转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弟子不要参与国民党逃离前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他则让儿媳李志清把他所有的金银、外汇等财宝带往香港。尽管黄金荣自称他对李志清携带钱财前往香港一事并不知情，但从后来的许多事表明，这乃是黄金荣的另外一手准备。李志清在香港不仅汇钱给他，而且还按照他的指示，在香港、澳门购买了房产，甚至

① 程锡文口述，杨展成整理：《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黄振世口述，何国焘整理：《我所知道的黄金荣》，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307—308页；333页。

还拍了登记照片，在照片后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要李志清在香港为他申请了去台湾的入境证。①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黄金大戏院出租给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每月收入约数百万元（旧币）。黄金荣还有几处房产，也都由门徒承包，对外出租，租金数目可观。黄金荣在生活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鸦片照抽，澡堂照泡。解放初期，人民政府之所以没有对他加以惩处，是因为解放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对帮会组织有过明确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采取"观察一个时期再说"的方针，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市长陈毅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认为黄金荣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他至少对人民政府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就不必把他当做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所以，解放初期一直没有动黄金荣。1951 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递向上海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对黄金荣加以处治。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处理黄金荣的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黄金荣让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自白书，1951 年 5 月 20 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

---

① 章君谷：《杜月笙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126 页。PDF 文本。

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

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使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据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循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做为人民服务的人。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

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黄金荣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①



黄金荣扫大街

黄金荣在生活上也必须有所改变,不能再继续抽鸦片,而且,政府派人告诉他,应该参加劳动。考虑到他已经80多岁,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早晨可以到"大世界"门口去扫马路。黄金荣对于在自己昔日独霸的"大世界"门前扫马路,自然极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当他拿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门口时,众多的记者为他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刊登在上海主要报纸上后,很快传遍了全国乃至世界!

黄金荣由于心情恐慌,不久即病倒了,最初整天坐在太师椅上,后来只能躺在床上。1953年6月9日下午,黄金荣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终年86岁。

二、客死香港的杜月笙

1945年9月3日,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事先,他得知上海方面已经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不少人准备到车站迎接他,使他颇感踌躇满志。他觉得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又有昔日长期反共拥蒋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加上孔祥熙对他的积极支持,杜月笙想蒋介石理应把上海市长给他,他留在上海的门徒也大肆宣传他即将被任命为抗战胜利后的

① 《文汇报》,1951年5月20日。

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可是,蒋介石这时已经不愿让杜月笙这个黑社会老大继续插手上海的事情,因此在杜月笙到达上海之前就发表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使他十分失望!更令他难堪的是,杜月笙到达上海时,不仅没有热烈的欢迎场面,冷冷清清,没有一名政要前来迎接。而且上海北站上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南站下车。下车时杜月笙得知,这一切竟是他的门生吴绍澍所主使。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澍因为得知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便急于摆脱同杜月笙的瓜葛。而杜月笙却仍然期待着吴绍澍能够前来拜见他这位昔日的老师,但却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却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只好强压怒气,他很清楚,如今已经是"虎落平阳"。接下来的打击是: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他的总管家万墨林被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以"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之罪名投进监狱。甚至,杜月笙本人也被宣铁吾变相扣押8小时,被迫出钱才获释。他悲哀地发现,他如今已经辉煌不再!他知道抗战胜利后,外国租界已经消失,昔日他在租界的特殊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而国民党当局如今可以直接利用军、警、特务来控制上海,无须黑社会的帮助,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然而,毕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杜月笙在不断地被动挨打之中,逐渐缓过劲来。他一面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一面努力重建昔日的辉煌。

首先,他通过在国民党上层的密友戴笠收拾了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而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吴绍澍闻讯后多次求见戴笠,戴笠则对他置之不理,经过多次哀求,戴笠才接见他,当他请求戴笠免予追究时,戴笠怒斥说:"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最后他请求戴笠对他法外施仁,准许他到重庆亲自打点,也被戴笠严词拒绝,并吩咐手下人:"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票子给吴绍澍!"不久,严办的电令下达,先是免了吴绍澍的上海市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吴开先继任。这使杜月笙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所以,1946年当他得知戴笠的死讯时,他如"丧考妣",一时呆若木鸡,定定地坐着不动、不哭、不说话。家人大声喊他,使他

如梦方醒，于是放声大哭，热泪滂沱，泣不成声，这是他平生最伤心悲痛的一次号啕！哭过之后便继之急喘和剧烈的咳嗽，但见他青筋直暴，泪与汗俱，脸孔涨得绛紫，不停地急喘与剧咳，使他死去活来！①

其次，借60岁生日大搞“花甲之庆”来炫耀在上海的权势，其门徒特意组织了“庆祝杜公寿诞筹备委员会”，延请上海一些有权势者担任筹备委员。在泰兴路的丽都花园舞厅举行隆重的祝寿仪式，大厅正中悬挂着蒋介石送的寿匾“嘉乐延年”，两边是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院首要人物及各界名流送的寿联、寿幛。第一个前来祝寿的便是蒋介石的代表、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随之而来的有：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夫妇、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以及专程从南京赶来的国民政府要员吴铁城、王宠惠、宋子文、莫德惠、孙科、白崇禧的代表，共有达官显贵5600多人。除了宴会之外，还连唱了10天堂会，从而显示了落日的余晖。②

然而好景不长，倒霉的事情接踵而至。先是跟随他多年的管家万墨林被捕。1947年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万墨林利用经营的米店，囤积居奇，大发横财，被称为“米蛀虫”，国民党当局下令将他逮捕。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又以“连续在非其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罪，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抓了起来。③ 虽然杜维屏不久就被释放了，但这件事仍然对杜月笙是一次沉重打击。他感到捧了蒋介石多年，最后竟然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于是闭门谢客，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养疴”。其实，他此行既是为了以此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也是为了及早安排自己日后的出路。他在香港时，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和夏衍曾看望过杜月笙，并向他申明中共对他的希望。杜月笙也向潘、夏保证自己一定“安分守己”！杜月笙在香港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担心他投向共产党，于是派人促其早日返回上海，杜月笙便于1949年3月23日回到上海。当人民解放军兵临江南时，杜月笙又与黄炎培、钱新之、章士钊、盛丕华、沙千里、史良、张澜等民主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与个人前途。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明确表示“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的工厂、船只和飞机“不受损失，不使南迁，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

---

① 章君谷：《杜月笙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11页。PDF文本。

② 章君谷：《杜月笙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88页。PDF文本。

③ 范绍增口述，沈醉整理：《关于杜月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385页。

并表示："杜月笙如果能这样做，不仅中共可以与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将宽恕他的既往！"[1]杜月笙虽然曾经一度考虑过留在上海，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他难以完全相信共产党能不咎前嫌。同时，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适当的时机到台湾去。吴开先也告诫他："杜先生，你不要忘记民国十六年清党的时候你那一幕，你杀过什么人共产党清楚得很。杜先生，你也晓得'血债血换'是共产党一直在喊的口号！"[2]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既不敢留在上海，也不愿前往台湾，而是决定脱离政治旋涡。于是，以台湾天气热又潮湿，不适宜他的气喘病为由，选择留在香港。1949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的40万大军已经兵临上海城下，杜月笙带领全家离开上海，拥上一艘荷兰渣华公司的客轮"宝树云"号前往香港。

杜月笙一家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坚尼地十八号的住宅，"不但不很理想，而且不成格局，厅不像厅，房不像房，真正派上用场的简直数不出几间"。而且既无庭园，又缺围墙，外面人朝里看，可谓一目了然。正房只有三间，其余小房都是将就把走廊空隙隔出来的。杜月笙此时由于精神体力的关系，心情萧索，早已失去创办实业，养家糊口的雄心。一大家人的生活所需及他自己每月两万以上港币的医药费，使经济上更加拮据。据姚玉兰、杜美等回忆，光坚尼地一处每月的开销，至少需要6万港币，有时姚玉兰只得自己掏腰包补贴。杜月笙离开上海时，一共拥有两笔钱。一笔是为子女准备的教育经费10万美元，已经交给宋子良在美国代营生意；另一笔是出卖杜美路那座豪宅，卖给美国领事馆获得45万美元，在上海用去一部分，尚存30万美元。杜月笙为了避免坐吃山空，曾经朋友介绍，投资四川的蚕丝，结果由于"两航"起义，蚕丝无法运出，又损失了10万美元。杜月笙最后就靠剩下的钱，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道路，于1951年8月16日病逝于香港，终年63岁。

三、死在军统枪口下的张啸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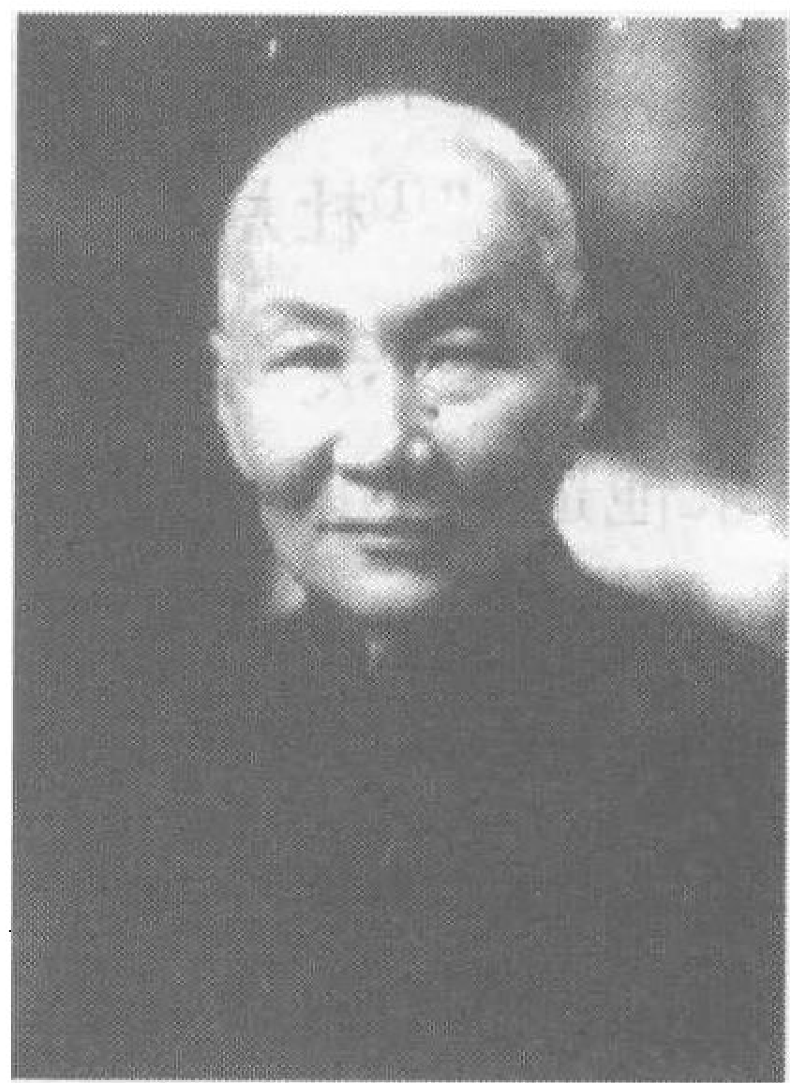
在日本人的卵翼下，张啸林的生意越做越大，大发国难财，于是被军统和杜月笙的弟子们锁定。1939年秋，他从莫干山回到上海后，发现杜月笙的一批弟

---

① 赵宏：《青帮》，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280页。

② 章君谷：《杜月笙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29页。PDF文本。

子奉命惩奸除害，正在上海滩大开杀戒，他的汉奸搭档已经被暗杀了好几个，使他暗自着慌。尤其张啸林回沪不久，他的好朋友，伪上海市财政局长周文瑞便在四马路望平街中被枪打成重伤，两星期后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又被刺伤。相传军统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从此他便不敢到公开场合露面，只是每天到大新公司五楼的俱乐部玩一玩。1939 年 1 月 15 日，张啸林应俞叶封的邀请，前往更新舞台为新艳秋捧场。台上正唱得热闹，突然一阵机关枪响，全场秩序大乱，俞叶封已经倒卧于血泊之中。张啸林恰好临时有事，才躲过了一劫。[①] 经过了这一次惊险的刺杀事件，张啸林更是闭门不出，连俱乐部也不敢去了。同时加强了警戒，雇用了二十几名身怀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公馆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守卫，日夜巡逻。



张啸林

1941 年夏天，军统关于铲除张啸林的命令下达上海后，奉命执行暗杀张啸林的杜门弟子第一次出动。虽然情报相当准确，就连张啸林几时几分要坐汽车外出，经过哪些条十字口，在哪一分秒，红灯一亮，汽车非停不可，都计算得十分准确。可是，枪手却偏偏早了半秒钟，枪响后，司机猛踩的将油门飞似的闯过了路口，张啸林又躲过了一劫。此后，张啸林不仅不知悔改，反而更加坚定了当汉奸的决心。不久，军统局又发来电报，督促他们迅速杀掉张啸林。军统上海负责人陈默针对张啸林所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觉得必须改变方法。于是用 5 万块银元和锄汉奸的民族大义，争取到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林怀部是张啸林的贴身保镖之一，系山东大汉，枪法准确，能击中抛在空中的银元，又能在三五十步外射中扑克牌的红心。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就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超群的保镖。在阿四的说明下，林怀部连发三枪，枪枪从红心穿过。就这样，他取得了张啸林的信任，成为张啸林的贴身保镖。1940 年 8 月上旬，陈默约见林怀部，让他在近日内下手，得手后军统总部设法疏通，会将他安排为法租界巡捕房当捕办。

1940 年 8 月 14 日，张啸林正和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在华格臬路三层楼

---

① 章君谷：《杜月笙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878 页。PDF 文本。

上商量事情,听见楼下天井有人高声争吵,他探身窗口向下俯望,发现是保镖林怀部正在同一名司机互相辱骂。张啸林的脾气一向毛焦火燥,见此情景大发雷霆,便把上半身伸到窗户外,向楼下保镖厉声喝骂:"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干,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是毫无体统!统统滚蛋!""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大家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一甩手,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啸林当场毙命。林怀部为了确认张啸林的死活,提着枪冲上楼,发现客人正在打电话给法租界巡捕房报警,于是又枪杀了他。林怀部确信张啸林已死后,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刚到楼梯口,被张的保镖拦腰抱住,另几个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赶到,林怀部把枪一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法租界判处林怀部 15 年徒刑,抗战胜利后林怀部被释放。

第九章　民国年间的洪门(1912—1949)

洪门实际上包括两大支派:一是天地会系统的组织,二是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在长江下游各地称红帮)系统的组织。这两大系统本来有着不同的渊源和组织,前者是乾隆年间福建漳浦高溪(今属云霄)僧人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所创立,最初主要流传在福建(包括台湾)、两广、江西、云南、贵州、湖南等省,后来又蔓延到其他省份和海外;后者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雍正、乾隆年间四川的啯噜,川江中上游木帆船水手中的啯噜,在沿江顺流而下,经过两湖、安徽、江苏等省时,融入天地会等秘密会党后,于咸丰、同治年间才逐渐形成的。最初主要在沿江各省流传,后来一部分从四川传入云南、贵州,另一部分从安徽、江苏传入浙江、福建等省。晚清时期,青帮、天地会与哥老会(红帮)三大帮会互相渗透。天地会系统的洪门,主要在两广和海外华侨、华人中活动,而哥老会系统的洪门则除东北地区外,几乎遍布于全国各地。所以,民国年间的洪门,实际上以哥老会系统为主,天地会系统的洪门仅仅存在于海外,后来建立的中国致公党,便是由天地会系统的海外洪门所组成。

洪门中两大系统天地会和哥老会,在辛亥革命中都曾起过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洪门等会党的消极作用,使革命党人和各地军政府,均把洪门等会党看作是新秩序的破坏者而加以打击。"洪门中人也以反清目的已达,逐渐涣散,仅少数洪门分子为了个人的目的,结拜弟兄,无非搞些生活互助,无革命目的的结合,也起不了政治作用。"①

民国年间的洪门,虽然仍分为天地会和哥老会两大系统,但是,天地会系统的洪门,在国内已经鲜有活动,主要是海外的洪门致公堂仍然在华侨、华人中间从事互助性活动。因此,国内的洪门,主要是哥老会系统的洪门。

---

① 樊崧甫:《我所知道的洪门史实》,载《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年,第 13—14 页。

一、天地会系统的洪门

1. 民初海外洪门致公堂的立案参政问题

民国时期天地会系统的洪门，主要就是海外洪门致公堂，在国内的组织和活动已经不多见。

在辛亥革命时期，海外"洪门致公堂"曾动员洪门成员和海外华侨，积极为国内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1912 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这时，海外洪门致公堂自恃在辛亥革命中有过功劳，要求回国立案参政。1912 年 1 月 9 日，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在祝贺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贺电中，提出了在国内组织政党的要求，电文提到："前本总堂所委谢秋君偕公同至各埠筹饷事已经完成，是以今日本堂谢秋君回国办理，偕翼汉君共为本堂代表，组织一完全政党。故望大总统回念当日花亭之事，需要扶持完全政党之事。"[①]不久，维多利亚致公堂再次致函孙中山，提出："同人等愿牺牲公产为民军国用，求大总统早日北伐，直捣幽燕"，"故特命谢君秋、梁翼汉君回国见大总统，办理政党事宜。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况且大总统是洪门总领，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成功之灵，慰同仁仰望之心。"[②]是年三月，美洲致公堂首领黄三德还亲自回到国内，向孙中山正式提出海外洪门在国内立案活动的请求。孙中山认为海外洪门虽然在推翻王朝统治的斗争中作出过贡献，但是，它毕竟仅仅是个旧式会党，难以适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特别是清统治被推翻后各省会党的胡作非为，更加深了孙中山对海外洪门回国参政的疑虑。而且认为洪门向来以恢复汉族统治为宗旨，如今目的已达，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也就没有在国内立案活动的必要。因此，对于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的信件未加答复，对于黄三德的当面请求，也虚与委蛇。这样便引起了海外洪门的不满和日后致公堂首领黄三德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

2. 中国致公党的成立

1920 年陈炯明叛背孙中山，占据广州。于 1923 年初又被滇桂联军逐出广

---

① 《孙中山藏档选编》，中华书局，1986 年，第 431 页。

② 《孙中山藏档选编》，中华书局，1986 年，第 437 页。

州。为了维持叛军的经费，陈炯明便利用海外洪门致公堂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同香港的致公堂取得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香港致公堂便派人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向当地洪门人士进行游说，帮助陈炯明，但遭到当地国民党势力的强烈反对，收效甚微。1924 年，陈炯明又亲自致函美洲致公堂首领黄三德，希望帮助筹措军饷。黄三德因为民国初年在回国立案问题上与孙中山结怨，也乐于同陈炯明合作，这样陈炯明便同海外洪门致公堂建立了联系，并促成了中国致公党的建立。

早在 1923 年 10 月，海外不少洪门团体就派出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许多海外洪门团体派代表出席了大会，洪门大佬黄三德、司徒美堂等也亲自参加。讨论把堂改为党，成立“中国致公党”的问题，并决议成立一个筹委会，负责有关建党的准备工作。会上还讨论了党纲草案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为后来正式建党作了准备。1925 年 10 月 10 日，美洲致公堂部分人士和在香港、澳门的洪门代表，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会上根据旧金山致公堂总堂的建议，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正式成立“中国致公党”，并宣布 1925 年 10 月 10 日为驻美旧金山致公党总部成立的日子。由筹备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发布了《通告洪门全体书》，内容如下：

一、设立筹办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于金门（即旧金山）为海外洪门总机关，以资提挈。所有各洲中国委员会分会，由总委员会当地昆仲筹办，而收统一之效。

二、中国致公党党纲，悉依第三次恳亲大会代表决议通过之党纲草案公布，以尊重旅客各国致公党代表之公意，而符合洪门本身自组政党案。

三、中国致公党委员总分会成立之后，即为筹捐救国费机关，捐款由驻在各国致公党汇收，直接汇回内地致公党总机关，以进行救国工作。

四、本年十月十日为驻美金门致公党总部成立开幕之期，各地如不能及期派出代表，亦须函电致贺，以表同庆。是日起，各洪门团体致公堂均悬党旗三日，以昭大典。

五、本总委员会决议，举陈公竞存（即陈炯明——引者）为致公党领袖，唐继尧副之。

六、各地中国致公党总分部（如前日致公堂所定之七大区域及南洋、欧洲、非洲），应每部派代表一二人回国协助，参与救国大计。

七、凡我党党员应领到本党领袖发之证书为据，方为纯粹真正党员。

八、本年十月十日以后，各地致公堂一律改称致公党。[1]

这次洪门恳亲大会，实际上就成了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炯明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并由朱逸庭等代表洪门致公堂总会，向陈、唐二人发出正式推选证书。当时海外致公党的组织，由堂改党组成的党部有300余个，分布在5个洲，仅香港总支部即达10万人左右。不过当时致公党在组织上和成员的思想上并没有抛弃帮会的组织形式及传统。致公党成立后，关于改堂为党的决议未能在海外各地洪门团体普遍地执行，一些地方存在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状况。1931年10月，陈炯明在香港设立致公党中央党部。同年又在香港召开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来自美洲等海外各地的代表数十人参加，美洲洪门致公堂负责人司徒美堂也专程前来参加会议。大会通过了以反对国民党独裁、实行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纲。大会接受了陈炯明提出的"三大特质社会主义理论"，即以中国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共同消费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并继续推举陈炯明、唐继尧为党的正、副总理。会上本来打算解决党、堂不分的问题，但是，考虑到历史及现实的各种因素，只好仍然保持党、堂并存的现状，但是，将党、堂分开，以党领导堂。从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1933年，除了在美洲的原有组织外，又在澳洲、南洋群岛及香港等地建立了地方组织，拥有党员约40万人。

1933年，陈炯明故后，致公党中央决定暂时设立中央干事会，维持现状。[2]抗日战争开始后，致公党号召党员抗日，并通过致公党等洪门团体发动华侨积极支持祖国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进一步动员并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致公党总部的活动陷于停顿。1942年初，致公党的负责人之一陈其尤在重庆偶然在街上遇到其了少年时代的好友，时任《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的黄鼎臣，由此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久又遇到《新华日报》社秘书长徐迈进，他不仅给陈其尤讲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抗击日寇的业绩，而且介绍其阅读《新华日报》和《群众》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进步报刊。由此，陈其尤开始对中共领导的新民主

① 《公论》创刊号，1947年12月，第5页。

② 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37—338页。

主义革命有了崭新的认识。在此后的三年中,陈其尤还秘密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进行了更深入的联系和交流。特别是1944年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中共南方局曾通过黄鼎臣向陈其尤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海外华侨的爱国行动具有一定的影响。""致公党应尽快恢复起来并多做工作,以便为战后实现和平民主及复兴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都更加促使陈其尤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致公党应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以及如何改组和发展等重大问题,开始了认真的思考。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等人于1946年初,在香港恢复致公党总部的工作,并于1947年5月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致公党进行改组。这次大会,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中国致公党的"三大"是在20世纪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在对致公党进行改组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我们时代的召集人"和"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新中国"的重要政治主张而载入史册。从此,中国致公党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奋斗的道路。

二、哥老会系统的洪门——洪帮

早在晚清时期,天地会与哥老会就在一些地方融合,二者皆称为"洪门"。尽管如此,二者仍然有各自独立的活动,其结盟仪式与组织结构也有所差异。后来,天地会系统的洪门,主要在两广和海外活动;而哥老会系统的洪门,除了东北之外,几乎全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踪影。哥老会沿长江顺流而下,来到安徽、江苏一带后,也主要从事贩运私盐的走私活动,成为盐枭的一部分,称为"围帮",俗称"红帮"。据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件佚名奏片称:"向来枭贩有清帮、围帮两种:清即安清道友,半东皖、徐海一带青皮光棍;围帮俗号红帮,即哥老会匪。"①正如蔡少卿先生指出:"红帮一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到民国以后才流行。"②

民国年间,哥老会系统的洪门,在组织形式、结盟仪式、帮规家法等方面,基

①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04页。

② 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2页。

本上同于清代，如均有“四柱”：山、堂、香、水及有内、外口号，并在组织形式上也采取哥老会的一排到十排的等级和内外八堂。

一排

称为大哥或大爷，其中有山主、副山主、香长（开香堂时的主香人）、盟证（开香堂时的盟誓人）、坐堂（或称佐相大爷，管理山堂事务）、陪堂（或称右相大爷）、刑堂（执掌刑罚）、执堂（负责组训）、礼堂（负责教导礼节）、管堂（负责升降赏罚）、护箭（保管令箭）、护印（保管印信）、新服（又称心腹）。其中山主、副山主为山堂首领，称为龙头大哥、副龙头大哥；香长、盟证是开香堂时的临时职务，称为有位无职。自坐堂至护印，凡是有职有位的称为“内八堂执事”，再下面是“外八堂”，新服在内八堂是末位，在外八堂是首位。

二排

称为圣贤二爷，或称京外军师，负责谋划；

三排

称当家三爷，或称京外粮饷总管，负责财务收支；

五排

称为管事五爷，或称红旗，负责总务事宜。

六排

称化冠六爷，或称巡风、巡哨，负责巡查。

八排

称贤牌八爷，或称纲纪，负责功过登记。

九排

称江口九爷，负责新进弟兄和提升职务、公布名单。

十排

称辕门，又称大老么或称大满，负责各项杂务，其余都称小满。

天地会、哥老会和民国年间到的洪门，都忌讳四和七。相传四、七两排以前出过奸细。均不设四、七两排。以上十排中实际上只有八排，称外八排。

结盟仪式

新成员入盟的仪式，按照哥老会的称呼，称为“开香堂”，只有上过香，才算正式入门。香堂分为大香堂和小香堂。前者适用于新入盟者人数较多时，其礼节繁杂，费时甚久。后者较为简单，适用于入盟人数较少时。辛亥革命后帮会

可以公开,但开香堂仍不公开举行。国民党统治时期,表面上禁止帮会活动,因而采取社团组织的形式,开香堂也以半公开的形式举行。

香堂设置

大香堂比较隆重,开香堂的大厅称为"红花亭",正中设关帝牌位,上悬"忠义堂"牌匾,中间设置供桌三层,上层设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牌位,中层设梁山宋江牌位,下层设始祖(洪英、傅青主、顾炎武、黄梨洲、王夫之),五宗(文宗史可法、武宗郑成功、宣宗陈近南、达宗万云龙、威宗苏洪光),前五祖(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中五祖(杨杖佑、方惠成、吴天成、林大江、张敬之),后五祖(李式地、洪太岁、吴天佑、林永超、姚必达),五义(郑君达、谢邦恒、黄昌成、吴廷贵、周洪英),五杰(郑道德、郑道芳、韩龙、韩虎、李昌国),三英(郭秀英、郑玉兰、钟文君),男军师(史鉴明),女军师(关玉英)和先圣哲等之位,牌位各用红纸或黄纸书写。香堂设置有香炉,上写"反汸复汨"(反清复明),另有烛台、七星剑、算盘、尺、斛与秤、镜、剪刀、桃枝等。又挂红灯,外层 3 盏,中层 8 盏,内层 21 盏,意为"三八二十一"。①

上述内容大多采自天地会系统的《会簿》,说明民国年间哥老会系统的洪门,在香堂设置方面也吸收了天地会的部分内容,但也有新增加的内容,如所谓"文宗"、"武宗"等内容,均为民国年间哥老会系统洪门中人所创造。

开香堂仪式

开香堂仪式一般有以下步骤:接五祖、开堂令、安慰令、斩凤凰、宣誓、斩香令、喝血酒、扫堂令、送五祖。

仪式举行时,执事、行令者要分别拉文、武拐子,一举一动,皆要念诵规定的诗句。如开堂就念诵"天开黄道日,金兰义气香,英雄同聚会,奉命开山堂。"接着按照仪式依次念诵安位令、斩鸡令、斩香令等。新入会者称为"新丁贵人",入会要举行问答、对神盟誓和饮血酒。入会后由山主发给腰凭、票布,作为入会凭据。仪式举行完毕,由新贵人主办筵席,招待与会的弟兄。②

开山堂后,要取一个堂名和"四柱"即"山、堂、香、水"及诗句。如周寒僧参加的江西洪江会的四柱是:中华山、志士堂、五岳山、四海水。并且要把山堂香

---

① 姜豪:《洪门历史初探》,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7—8 页。

② 徐桂生:《略述洪帮》,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39—42 页。

水写在红纸上，作为加入洪门的凭据。

民国年间洪门因为包括天地会和哥老会。因此，其誓言、帮规和家法，也融合了两者的内容，如保留了天地会系统的三十六誓、二十一则、十禁、十刑、十条、十款等，但增加了哥老会惩处违反帮规的“三刀六眼”。

拜码头

民国年间洪门成员闯荡江湖，大体上同清代相同或相似。洪门成员来到异地他乡，人生地不熟，要同当地码头取得联系，就需要先“挂牌”。一般在茶馆酒肆进行。会内成员看到有人挂牌，就前来探询、盘问，彼此用手势表明身份，亮出山头。然后进行问答。如来访者说：“小的初到贵码头，长腿不长，短腿不短齐，未带草字草片，向各位老哥请安问候，一切不周，恕过，海涵！”本码头接待者回答：“不知你老哥驾到，未曾远迎，理当三十里路铺毡，二十里路挂彩，十里路摆茶担，五里路摆香案，迎接老哥，才是我兄弟的道理。招待不恭，还望海涵！”经过进一步考察后，确认是会内弟兄后，来访者提出要求解决的问题。最后道别时说：“山儿不转路儿转，案儿不转船儿转，关公千里走单骑，兄弟古城有会期。再会！”①

民国年间哥老会系统的洪门即红帮（也写作“洪帮”）在国内各地得到迅猛发展。而天地会系统的洪门，则仅仅在海外（包括香港）活动，在国内几乎被哥老会系统的洪门所淹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哥老会系统的洪门（洪帮），最著名的是“五圣山”。1922年前后，洪门中几个上层人物想以上海为基地，为洪门打开一个局面，于1923年4月于上海成立。之所以取名“五圣”，乃是为了纪念洪门的前后五祖。最初参加者有五人，他们是：朱卓文、梅光培、明德（字润身）、向海潜（字松坡）、张子廉。

五圣山分为五堂，分别是：仁文堂、义衡堂、礼德堂、智松堂和信廉堂。后来发展，内八堂的大爷及心腹背榜下山，自行设社开分堂者甚多。山主为双龙头，背榜下山的为单龙头。

各堂的发展情况如下：

仁文堂

堂主朱卓文是广东人，在香港及广东发展组织，朱卓文死后，后继无人，便

---

① 徐桂生：《略述洪帮》，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41—42页。

自行消失了。

义衡堂

堂主梅光培，广东人，也在香港和广东发展，有众数千人。日本军队进攻香港时，曾组织义勇军抗日。

智松堂

堂主向海潜，湖北大冶人，进洪门之初是在徐朗西标下，后来脱离徐而独立活动。在长江流域，上溯四川，下至江浙，均有发展。吸收成员以军政界为多，上海各大寺庙的住持或当家多属于该山头。他反对蒋介石，蒋就令戴笠派特务徐亮进入他的山堂，对他进行控制。他虽然反对杜月笙，但生活上靠杜给他生活费，因此也不敢公开得罪杜。抗战时期，他被蒋介石羁縻在重庆，给他一个人民行动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名义，每月给他300元车马费，勉强度日。1946年，他回到上海，办理洪门复原事项，改组洪兴协会，他自任理事长，九个常务理事五圣山占了四个。但实权控制在上海市社会局派来的王知本手中，所以也无所作为。

礼德堂

堂主明德，湖北人，在郑州陇海铁路局所办学校任教，故发展组织，以铁路员工为主，旁及工商、文教各界。陇海铁路局的副局长、工程师、段长、副段长、站长、副站长等，大多是他的结拜弟兄，无论哪方面派来的局长，遇事都要同他商量，他可以使全路罢工，不通过他，办事就不顺手。1944年，戴笠派人秘密将他活埋。

信廉堂

堂主张子廉，浙江杭州人，曾当过机械工人，后自营机器修理店。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光复会。他文化水平低，却领袖欲高，虽结合一些群众，但漫无组织。他加入恒社，受到杜月笙的挟制。①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洪门

1933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全面侵略，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识，国内外洪门组织也纷纷要求把各地洪门弟兄组织起来，

---

① 樊崧甫：《我所知道的洪门史实》，载《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1—20页。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上海洪门天华山主龙襄三，在帮会手册《海底》的序言中提到："'九一八'后，洪门前辈志士，以国土丧失，民族意识消失殆尽，洪门团体仍有再行组织的必要。长江各埠纷纷倡议，尤以海外各埠及南洋群岛诸志士，咸主张严密组织，加紧团员训练，以为政府后援。"这一说法，基本属实。

1. 内地洪门的抗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新的洪门团体纷纷成立，这些洪门山堂虽然多为国民党政府所控制，但是，在动员洪门弟兄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34年冬，上海的洪门"五圣山"成员徐逸民等人，提出应当发扬洪门先辈"反清复明"的精神，创立一个新的洪门山堂，以便团结洪门弟兄抗击日本侵略，收复东北失地。几位发起人中，大多是留美学生，在上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如韦敬周是财政部造币厂厂长、杨宝璜是英国怡和公司上海海洋轮船部经理、徐逸民是著名外科专家、范文藻是著名建筑师、邱汉评是有名的大律师。他们认为自己虽然不能拿枪杆子打日本鬼子，收复东北三省，但也不能甘心做亡国奴，作为帮会的上层人物，应该发扬洪门老祖宗"反清复明"的精神，创立一个新的洪门山堂。徐逸民提议拥戴年高德劭的洪门老前辈汪禹丞担任山主，崔锡麟等担任副山主兼内外八堂职位。为了表示抗日的决心，他们按照哥老会系统洪门的传统，确立了"山堂香水"的名称，取名为"五行山"，于1935年春节后，在一个寺庙里举行开堂大会。大家拟定了四柱：五行山、卫国堂、团结香、保家水。而"五行山"这一名称也含有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来消灭日本侵略者的意义。而且在《出山柬》中更明确提出："九一八、一二八，我大好河山，竟被日寇侵略，东北沦陷，沪江喋血。倭奴小鬼，俨同野兽。鲸吞我土地，掠夺我财富，杀害我同胞，奸淫我妇女。我无辜人民，白骨如山，血流成河。""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洪门哥弟皆炎黄之子孙，不能坐以待毙，爰创立五行山，高举义旗，联合中华之豪杰，聚合天下之英雄，誓扫东夷，还我河山。为此呼吁三山五岳之袍哥，协力同心，浴血奋战，灭此朝食，痛饮黄龙。"还制定了十条主张："一、打倒日本小鬼；二、继续反清复汉；三、收复东三省；四、消灭满洲国；五、反对投降卖国；六、铲除一切汉奸；七、反对外国侵略；八、不做外国奴隶；九、义气团结，互相帮助；十、有福同享，有祸同当。"[①]为了团结洪门的力量共同抗日，五

① 崔锡麟：《我所知道的青红帮》，载《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行山又提议筹建一个洪门的联合团体,经过努力,终于成立了由30几个洪门组织构成的"洪兴协会",由汪禹丞、向海潜二人为理事长。协会成立后,曾在工人中间进行团结抗日的宣传。1937年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洪兴协会被迫停止活动。

1939年在四川重庆成立了洪门"皕华山",其宗旨是"反对日本异族,还我河山"。其"四柱"是:皕花山,抗日堂,四海水,义气香。其《出山柬》是:"东夷日寇逞猖狂,犯我河山夺我疆;关外沦为新傀儡,南京屠杀血汪洋;强抢财物伤人命,奸淫妇女剖胸膛;黄帝子孙齐努力,誓把倭年奴一扫光。"皕华山由韦作民为山主,蒋锄欧、崔锡麟为副山主兼陪堂大爷,由韦作民指定蒋锄欧、崔锡麟、李范奭、庄仲文为四大盟兄,封蒋锄欧等八人为内八堂大哥。会后,又商量联络其他山堂山主及四川各堂口的舵把子。如长白山山主张树生、五圣山山主向海潜、太华山山主杨庆山等。①

2. 中国致公党和海外洪门致公堂的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号召各地党员以实际行动拥护抗日战争,各地的致公党组织,也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集中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同全国人民一道承担抗日救亡的任务。美洲各地致公堂重建"洪门筹饷局",改名为"华侨筹饷总会",募集捐款5400多万美元,并和当地华侨一起认购数以亿计的爱国抗日公债,捐赠许多飞机、坦克、救护车和大批衣物。② 洪门首领司徒美堂先生在美国辞去了其他工作,专门做纽约华侨筹饷总会的工作,他每天从早晨10点工作到深夜12点。当时募捐的名目有:额捐即每人每月捐15美元、飞机捐、散捐、餐馆的自由捐和公债票等。八年抗战期间,仅额捐一项就达1400万美元。从1936到1946年,美洲20多万华侨,捐款、购买公债等,共计4.8亿美元。③

1932年"一·二八"事件中,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抵抗日寇的侵略,中国致公党曾对上海抗日军民给予声援,在"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尽力勉励侨胞,捐款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伍,所谓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之本质。"在海外的美洲致公堂在获悉上海淞沪抗战的消息后,洪

---

① 崔锡麟:《我所知道的青洪帮》,载《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31—33页。

② 俞云波:《海外天地会浅谈》,载《中国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123页。

③ 中国致公党中央研究室编:《司徒美堂》,致公出版社,2001年,第189页。

门元老们立即于2月初在美国纽约洪门堂口“安良堂”召集会议，决定慰劳和声援上海的中国守军。会议作出三项决议：一、以致公堂名义发出支持上海的中国军队的电报；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三、组织青年航空救国。3月6日，美洲致公堂首领司徒美堂代表纽约致公党参加“美东华侨航空救国大会”，并在会上通报了致公堂的三项决议：一、立即组织华侨救国义勇团，回国参战；二、致公堂洪门人士捐机两架；三、继续捐款，筹办航空学校。会后，司徒美堂还特意从美国赶到上海，把华侨捐赠的款项和财物带到上海，慰劳在上海抗日的十九路军。[①] 香港被日军占领后，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无法开展正式工作，遂宣告停止活动。

3. 与日寇勾结的汉奸组织“中华洪门联合会”

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日本侵略的日益加深，洪门组织本身也发生了分化。除了上述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洪门团体之外，在洪门内部也出现了为虎作伥的汉奸组织，“中华洪门联合会”就是其中之一。该组织是由大华山山主陈亚夫勾结日本兴亚书院特务阪田发起的，从1942年11月开始筹备，1943年1月4日在上海国际饭店成立筹委会，同年冬正式粉墨登场。筹委会的主要人物，都是洪门各山头的龙头大哥，如李炳青是“终南山”的大龙头，许凤翔是“五龙山”的龙头。有的还担任伪职，如昆仑山山主李凯臣担任汪伪交通航运局长，岳麓山山主周拂尘是汪伪财政部侦缉队长，大罗山山主项佛时任汪伪监察委员。所以这一组成本身就具有汉奸性质。该组织成立后便以日寇和汪伪作为靠山，企图凭借日寇与汪伪的势力，统一全国的洪门组织，以便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在其成立大会宣言中，大肆鼓吹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战争顺利进展”，无耻地宣称“动员我们洪门所有的雄厚潜在实力，在汪主席领导之下，内而对于国家民族期有伟大的贡献，外而协助友邦盟国，本同甘共苦，互相提携的精神意志，努力本位工作，俾有裨于东亚新秩序的树立与共荣圈的结成。”[②]宣言中所说“本位工作”，就是“协助（汪伪）政府完成全面和平运动”，“努力遵行及实践新国民运

①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1页。

② 《中华洪门联合会成立纪念特刊》，1934年，转引自郭绪印：《洪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4页。

动","以整个力量完遂大东亚圣战"①。要协助的"友邦盟国",就是指日本侵略者,其汉奸嘴脸,跃然纸上。1943 年 4 月,该会在第二次筹委会上,决定聘请朱琳、陈国屏等 15 个国民党帮会分子为"设计委员"。朱琳曾著有《洪门志》一书,书中把 1940 年他为"天龙山"所写的《开山檄文》编入,而《开山檄文》中有不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文字,如:"外侮侵凌,人民惨遭浩劫,匹夫有责",要求洪门弟兄"互信互助,精诚团结,保存炎黄之土地,恢复汉室之河山",及"复兴民族,振兴中华"等。因而在排印时,作者在上海法租界遭日本宪兵队逮捕,不久,朱琳便变节投敌,成为汉奸。该组织完全被陈亚夫所把持,听命于日本特务阪田。这个汉奸组织在洪门内部也十分孤立,有人质问其头子说:"洪门的唯一目标既以民族独立生存为前提,为什么不到后方去抗战呢? 反而与日本携手合作呢?"1945 年随着日寇投降,"中华洪门联合会"也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四、抗战胜利后洪门的分化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实现和平民主,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倒行逆施,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在美国的帮助下,挑起大规模内战,撕毁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力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建立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在此情况下,洪门组织本身也发生了分化。

1. 中国致公党的新生

1945 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领导下,逐渐摆脱了以往帮会的性质,在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中得到新生。1946 年初,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先后由内地前往香港,与当地老致公党党员陈演生、严锡煊等,酝酿恢复致公党活动,提出整顿党务并加入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陈演生等利用原致公党党部的档案室开展对外联络活动,与美洲、南洋等地的洪门组织就恢复致公党活动交换意见。许多国外的洪门组织纷纷成立"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和整理党务。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下,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 1947 年 5 月在香港召开,到会的代表有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沃梅、萧重光

① 《中华洪门联合会成立纪念特刊》,1934 年,转引自郭绪印:《洪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84 页。

等40余人。美国旧金山、马来西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英国利物浦、美国波士顿以及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的致公党组织，则委托在港的成员参加这次会议。大会讨论修改了致公党的《政纲》和《党章》，发表了《宣言》、《告海外同胞书》，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选举李济深为中央主席，因为李当时兼任民革主席，决定暂时不公开宣布。选举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为秘书长，李济深等九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纲》规定："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而奋斗"，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观点。大会通过的《宣言》，提出了解决国是问题的具体步骤和主张。大会还通过了对致公党今后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并作出许多原则性规定的新《党章》。指出：党员必须"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内革命运动"，"对一切损害本党及国家民族利益者进行斗争"。《党章》规定：致公党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党内各级机构的负责人概由普选制产生"，"凡党员必须服从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些都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此可见，中国致公党的"三大"不仅指导思想已由旧民主主义上升到了新民主主义的高度，开创了中国致公党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纪元，而且还较好地解决了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使中国致公党真正成为一个新型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跟上了伟大革命时代的步伐。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致公党已经完全摆脱了旧式帮会组织的性质，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政党，带领党员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2. 中国民生共进党的组党及夭折

1945年日寇投降后，各地洪门团体中一些首领，幻想在中国实现多党政治，通过议会选举而参政，遂纷纷组建政党。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将军官的洪门首领樊崧甫，也跃跃欲试。1946年秋，他趁述职到重庆之便，与军界中的洪门人物樊光等，约同政界、学界中人，共同商议组建中国民生共进党。为了制造舆论，他还在《中央日报》上著文，敦促蒋介石"开放政权"，允许组党。可是，参加发起者大多畏首畏尾，害怕得罪蒋介石，而樊崧甫本人又是现职军官，也不敢放手去干，所以在重庆时仅仅是议而未行。但是，樊崧甫并不肯就此罢休，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怂恿国民党中央委员方觉慧脱离国民党，另组由帮会构成的新党。方

党慧认为帮会情况复杂,不敢应承。不久,樊崧甫以国民党"军风纪巡察团主任"的身份,前往西安,受到当地帮会首领的欢迎,表示"拥戴新堂主"。樊崧甫受到鼓舞,便冒险进行组党活动。他以青红两帮为骨干,联合其他帮会,建立"民生共进党"。1946 年 3 月,在西安成立筹委会,宣称宗旨为"团结青红汉礼白各帮及回教教胞,努力工商业之发展,以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打倒国民党之贪官污吏,反对共产党之武力攫取政权。"[①]该党标榜走"中间路线",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因此,在西安发展很快。樊崧甫一面招收洪门弟兄,一面扩张西安的地方筹备会,并改称"西北执行部筹委会"。不久,军风纪巡察团调驻河南郑州,樊崧甫又在河南各地发展组织,并利用陇海、京汉铁路沿线洪门的关系,在西安成立"同德运输企业公司",在郑州成立"五伦企业运输公司",为民生共进党建立经济基础。正当樊崧甫兴高采烈地扩展势力时,蒋介石突然通过军事委员会给刘峙、胡宗南发出密电,让他们下令将民生进步党取缔,并逮捕了该党的秘书长。成立不久的"中国民生进步党"就此夭折。

3. 中国洪门民治党

1945 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的局面也即将来临,以司徒美堂为首的美洲致公堂也希望在胜利后回国参加政治活动。他们感到与其另起炉灶组织华侨政党,不如将致公堂改为致公党更有群众基础,可达事半功倍之效。遂于同年 3 月 12 日在纽约举行全美洲洪门恳亲大会,有旅居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秘鲁、牙买加等 9 国的洪门致公堂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将美洲致公堂改称"中国洪门致公党"。[②] 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的主席,党内设有组织、宣传、联络、财务各部,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对时局宣言,表示要"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由洪门人士主持的报纸《五洲公报》等,联合其他爱国华侨报纸,发出《十报宣言》,号召"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各国的洪门致公堂也随之改称"致公党",不过,这一改变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帮会气息。党内开会时,会场仍然挂着"五祖神位"和洪门旗帜。日本投

---

① 转自郭绪印:《洪门秘史》,第 290 页。

② 这是美洲致公党,与国内成立的中国致公党是两个不同的组织,见司徒丙鹤:《司徒美堂与洪门美洲》,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162 页。

降后，司徒美堂等领导人仍然热衷于国内政治，并作出决议，由各地致公党派出代表，在司徒美堂带领下回到上海，准备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并且借大会的召开，在国内成立洪门政党。

1946年4月，在司徒美堂回国之前，上海虹口的洪门头子杨文道便与华北地区的帮会头子张书诚、段剑青，上海滩的帮会头子吴纪舜等30余人，曾商谈过召开“全球洪门恳亲大会”，争取“青洪合流”，电告司徒美堂等人，欢迎他们归来，企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旋因杜月笙的反对而未果。司徒美堂到达上海后，洪门恳亲大会成立了筹备会，发函邀请国内洪门人士前来参加，但是响应者并不多，而且有大批CC特务进入其中，企图包围司徒美堂。

1946年7月25日，“中国洪门恳亲大会”在上海贵州路湖社礼堂举行，到会者有300余人。开会仪式具有浓厚的帮会气氛，在会场门前贴有对联：“义气待兄弟，忠心报国家。”会场内正中高悬绿、白、紫、红、黑的洪门五色旗帜，象征仁、义、礼、智、信“五德”，巨幅横幅额上书写“洪门是我们的家庭，要情同骨肉，亲如兄弟，”“我们要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杜月笙和司徒美堂皆称病未参加开幕式，大会由主席团主席程壮致开幕词，赵昱报告洪门历史，杨天孚报告了美洲洪门的情况。秘书长姜豪提出以下议案，提请大会追认：建立洪门先烈祠一座；筹办洪光中学；上海设立洪门通信处二处：海外在华山路476号致公总堂（五祖祠）；国内在威海卫路207号洪兴协会。临时动议有二：以大会名义向蒋介石致敬，用娱乐方式筹募洪门福利基金。

“中国洪门恳亲大会”后来又搬到丽都花园举行，由于CC事先布置了力量，最后闭幕时用多数表决的办法，强行决定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司徒美堂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致公党的名称不能改，否则是出卖祖宗，但是，大会还是通过了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大会便成了“中国洪门民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政纲和宣言。由于民治党实际上已经被国民党“中统”（CC）所控制，司徒美堂知道上当，遂于1946年9月对各报发表谈话，声明“本人主张联合各党派和爱好和平的人民，建立民主统一的政府，然后再以经济从事建设。我们并不是任何党派的尾巴，我们愿以人民的意志为行动”。1947年7月14日，蒋介石下达“戡乱”总动员令，正式挑起内战，司徒美堂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乃令其子司徒健庭起草了一个“脱离民治党声明”，刊登在上海各大报纸，内容是：“本人对民治党年来所作所为，不表赞同，自即日起脱离民治党的

一切职务，转赴香港，重返美国，致力于华侨福利工作。"[①]司徒美堂退出后，民治党由赵昱继续领导，经过改组后，把活动中心转移到华南和海外。

4. 洪门忠义会

洪门忠义会是由"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演化来的。设立在广州的"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最初称为"五洲华侨洪门大同盟"，后来改用此名，是广州沦陷时期由汉奸头子李荫南（伪广东省省长并兼任伪广东省建设厅厅长）、冯壁峭（伪广州市警察局局长）等人，在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联络部长矢崎勘二少将的首肯下组织起来的汉奸组织。由李荫南担任会长，会长下面设有总务科、组织科、宣传科、调查统计科等，是个颇为庞大的组织。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寇宣告无条件投降后，这个汉奸组织也陷于瘫痪。当时，蒋介石为了防止在日军占领区附近活动的人民武装抢先进入城市，便发布命令，禁止非他指挥的队伍进入城市。但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武装"中美合作所别动队"却抢先进入广州。当时驻扎在广东三水县一带的葛肇煌（"军统"武装）也想闯进广州发一笔财。葛肇煌在得知"中美合作所别动队"进入广州后，也带领一部分心腹进入广州。但是，主要油水已经被别动队抢走，葛肇煌颇为懊丧。于是有人便向他建议说，广州有个洪门组织"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是日伪建立的汉奸组织，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如今已经瘫痪。该组织的本部设在一座三层的大楼内，目前尚没有人去接收。如果把它抢到手，不但可以得到一座大楼及大批家具，而且还可以继承这个洪门组织，作为将来的一股势力，为自己所用。葛肇煌十分高兴，立刻行动起来。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控制了"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鉴于该团体本来是个汉奸组织，名声太臭，遂改称"洪门忠义会"，并且把会址迁到广州宝华正街 14 号。由于葛肇煌过去并未加入过洪门，为了充当该会的首领，便于 1946 年 3 月间，由一个在"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充当过"传斗师"的吴一峰，把他封为"双花红棍"（会内最高职务）。从此，他便成了洪门忠义会的"大哥"。

葛肇煌是广东省河源县人，1900 年生。其先世曾经在清朝做过低级武官，世代精于拳术，家中藏有祖传跌打刀伤的秘方。他早年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后来脱离军队，加入"军统"，在广东缉私处惠阳查缉所担任专员。1943 年"军统"派他到江西担任"江西独立行动大队"的大队长，任务是到日军占领区进行骚扰

① 司徒丙鹤：《司徒美堂与洪门美洲》，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170 页。

活动。他把大队部设在三水县的一个安全地方,并不去骚扰日军,反而大搞走私活动。日寇投降后,他便接收了广州的洪门组织“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并把它改名为“洪门忠义会”,并成为首领。1949年国民政府逃到广州后,葛肇煌又得到逃到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的暗中支持,便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与影响。由于农历六月十七日是传说中洪门创始人陈近南的诞辰,每年这一天洪门都要举行庆贺仪式。葛肇煌便利用这一天,为洪门忠义会举行半公开的“传斗仪式”和为各分会授旗的仪式。事前,他大量发送请柬,邀请其他洪门组织、洪门前辈以及各机关团体的熟人,出席参加,起到了为葛肇煌造声势的作用。

会场一端临时用木板搭了一个两尺高的台坛,葛肇煌身穿一套新西装,独自一人坐在一张交椅上,神气十足。仪式由寇世铭主持,他也穿一套西装,手执三角令旗,逐一传喊分会会长的名字。他们走到台边,由葛肇煌发给每人一面小旗,当时忠义会有14个分会,分会的名称,1—13是按数字顺序排列,即第1到13分会,另外一个分会称长江分会。忠义会属于洪门三合会(天地会)这一系统,故总会和13个分会所用的仪式、动作,是按照三合会的传统;唯独长江分会是按照哥老会的传统。因为长江分会的会长李日全原来是洪门大洪山的人,他兼入忠义会,但仍保留用哥老会的传统礼仪动作。授旗仪式完毕后,有来宾讲话。仪式结束后,举行宴会。

广州解放前夕,葛肇煌于1949年10月初先将家眷送往香港,本人与心腹随从三四人,于10月13日化装逃往澳门。他在澳门逗留了10天左右即前往香港,此时已经是走投无路,只好再次投靠“军统”。但是,投靠“军统”必须有资本,于是又窜到香港,召集逃到香港的忠义会骨干分子,作为筹码。在一次忠义会骨干分子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葛肇煌等被香港警方逮捕,并且被法院以从事非法秘密结社罪,驱逐出境,永不许回香港。葛肇煌这时只好希望前往台湾投靠“军统”。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对于进入台湾地区控制的非常严,非事前批准,不得登岸,他便暂时前往当时尚未解放的海南岛。他在海口找到了原“军统”广东站站长郑星槎,向他吹嘘自己尚有多少洪门弟兄留在大陆,可以听从他的指挥。郑星槎便把此事报告给台湾的“军统”局。这时国民党正需要一批亡命徒到内地进行破坏捣乱,便令郑将葛肇煌送往台湾。葛到台湾后,见到当时台湾的“大陆作战处”处长郑介民和军统局(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声称要联络

内地隐蔽的洪门忠义会分子和派人潜入内地，都必须在香港建立据点。而他本人已经被香港当局驱逐，不能回去。郑、毛二人答应可以想办法解决。后来，由台湾驻港人员同港英当局秘密接洽，使葛肇煌再次回到香港。

在葛肇煌回到香港后，一些忠义会分子也陆续逃亡到香港，葛便把他们重新纠集起来。但是，洪门忠义会属于三合会系统，而三合会在香港是非法的，为了不使香港警方尴尬，葛肇煌只好把"洪门忠义会"的名称暂时收起来。由于"洪门忠义会"在广州时会址设在西关宝华正街14号，成员们到会所去，就说是"到14号去"。后来，在洪门忠义会内部，就把"14号"作为对外的代称。又因为当时广州有低成分的金饰，称为"14K"，于是"14K"便又成了"洪门忠义会"的代称。"14K"与香港的三合会同属洪门系统，虽然有时也因为利害冲突而互相排挤，但是，往往又互相勾结。特别是葛肇煌在广州时，香港三合会有时到广州有求于他，他也乐得给予帮助，所以，当葛肇煌和洪门忠义会逃到香港后，当地的三合会对他们也未加排挤。尤其是葛肇煌又得到"军统"的暗中支持，因而使"14K"不仅得以在香港生存下去，而且逐渐发展为当地最大的黑社会组织。[①] 1954年葛肇煌在香港病死，"14K"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出殡仪式。参加者除"14K"全体人员外，还有香港的三合会分子和其他黑社会分子。

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对待帮会的政策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上海的青帮充当了反共的急先锋。事变后，青帮的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以为反共卖力，而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以少将衔、"行政院参议"，青帮也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认可和扶植，并成了它的统治工具，从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青帮三大亨也成了国民政府的"党国要人"。李宗仁先生曾对此感叹地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自以为与蒋有旧，于清党更有微劳，遂居然以绅士姿态出现，周旋于党国要人之间。而我党中枢领袖，不自觉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严，竟与这批流氓称兄道弟，不以为耻。官箴全失，斯文扫地。以视北洋军阀，犹等而下之，实堪浩叹！"上海青帮在国民党当局的庇护怂恿下，大肆进行走私贩毒、赌博及经营色情行

---

① 何崇校：《广东洪门忠义会始末》，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卷二十，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96年，第366—383页。

业。然后再把非法得来的黑钱，投向工商业及金融业、娱乐业，使青帮成为上海工商业中一个特殊阶层。

1927年以后，四川袍哥的势力也在不断发展。四川袍哥中一方面与军阀相勾结，在军阀混战中充当炮灰，并且成为国民党围剿红军的重要打手。另一方面则为害地方，进行各种非法活动。有的公开抢劫，袍哥中的"浑水袍哥"便是职业土匪，专门靠打家劫舍和绑票勒赎为生。有的则利用权势囤积居奇，经营油米等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低价买，高价卖，牟取暴利。有的还进行毒品走私，霸占土地或投资企业。总之，袍哥已成为四川的一大祸害。

袍哥为害地方的行径，如不加控制，将会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因此，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各级政府，都发布了许多命令，禁止袍哥的活动。

1936年8月6日，四川省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有关精神，制定了《四川省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暂行条例》，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呈请核准。该条例共计七条：

"第一条　四川省政府为禁止哥老会缔盟结社，维持社会治安起见，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各县政府应将各该地哥老会一律解散，由会中首领出具切结，并销缴戳记名册。有底金者，应提作该县救济事业基金；

第三条　哥老会不遵命令解散，或再有缔盟结社者，得拘捕其首要，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三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条　哥老会于命令解散时，以暴力抗拒者，得按照刑法条例治罪；

第五条　各县政府应密派探警报告，并设密告柜，准由当地人举发。但不得挟嫌诬陷，如经查明不实，应以诬告治罪；

第六条　本条例自呈奉委员长行营核准之日公布施行；

第七条　本条例如未尽事宜，得呈准委员长行营修正之。"①

中统局于1938年向蒋介石提出书面报告，建议党政军公职人员不宜参加帮会，已参加者，限期退出；但政府只采取隔离政策，不宜硬性取缔，以免"反滋乱萌"。1940年国民党中常委又发出《帮会问题应付原则三点》，主要精神是：国民党不与帮会发生直接关系，而推选少数熟谙其中情形之党员，以个人资格

① 原件藏四川省档案馆。

与之周旋，各地帮会呈请备案者暂时不予置理，并设法使之不公开活动，由社会部严加督导。后来又颁布了《严禁党员、团员及公职人员参加帮会办法》，各省有关部门纷纷落实。1942年11月20日，四川省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向四川省主席呈报落实各级公务员具结退出哥老会情况的报告。报告称："窃查哥老会品类复杂，流毒社会，为害最烈。举凡包庇烟赌，妨碍役政，招摇撞骗，以及抢家劫舍，啸聚山林。种种不法行为，无一非哥老会为之。"虽经严厉禁止，但"日久顽生，积重难返，时至今日，尚未彻底根绝。"全区各县，"此种非法组织，仍属繁多。甚至有身为公务人员，亦侧身其中，伙同扶隐，相缘为恶，一切政令之不能推行尽利，哥老会实为其重大阻碍之一因。若不及早铲除，其滋蔓则危害社会，影响抗建。俱非浅显。故特重申禁令，通饬区属各县，凡属各级公务员，如有早经加入者，一律饬令具结退出，否则立予撤职。其未加入者，亦应出具永不加入切结，并分别觅人保证，统限于本年12月底以前，办理完竣。限满准由人民指名检举，经查属实，立予严惩。其保证人及直属长官，俱应受连带处分。"[①]1943年，四川各地纷纷制定查禁哥老会及党政人员退出哥老会的具体办法。如四川省营山县县政府与县党部经过秘密协商，制定了六项实施办法："一、凡本县各种集会结社，均须遵照总动员法，呈由当地主管机关许可后为之，如未经许可而擅自举行者，得实行查禁或制止之；二、凡县属以下之公教人员及党工人员，均须由党部、县府分别集中，公开举行'不参加或退出哥老会之宣誓'，其宣誓人姓名并于县政旬刊公布之；三、恢复邮电检查，以防乱萌，……；四、由党分令各区分部各党工同志，随时刺探各地哥老会及奸伪之活动，并须于每周呈报情报一次；五、分令各治安机关负责人随时注意查禁，以制止哥老会之蔓延；六、加强党之组织，并大量吸收优秀青年为本党党员，以免其加入哥老会组织。"[②]同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向各省发出《严禁党员团员及公职人员参加帮会办法》的通知，国民党陕西省执行委员会与陕西省政府，又制定了本省的实施办法，要求各县贯彻执行。涉及国民党"党工人员"及三青团团员的具体办法，包括：凡省执行委员会之党工人员及各县书记长，皆由人事科以个别谈话的方式，询问有无参加帮会者。"如发现有参加帮会者，饬即停止活动。如不经本会呈报许可暂缓退出者，应一律自动宣布脱离，并具切结以保证之。"各县市党

① 原件藏四川省档案馆。

② 原件藏四川省档案馆。

部各基层党务工作者中有参加帮会者，也限一个月办理脱离帮会手续，宣布脱离，并具切结以保证之。凡在省政府直属机关、县政府各机关服务之国民党党员中有参加帮会者，亦按照上述精神，停止活动并宣布退出。另外，还规定："凡不遵守中央法令，阳奉阴违者，得以党纪法纪制裁之。"①

国民党政府的这些政策，实际上仅仅对帮会中的中下层分子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至于帮会中上层分子，特别是其中的头面人物，根本不起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为了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又企图把哥老会等帮会变成其反共反人民的"外围组织"。为此，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会同国民党政府社会部，制定了对待帮会问题的五项原则："一、变消极的防范为积极的领导，使(帮会)成本党外围组织；二、遴选帮会中有地位及领导能力之本党同志，组织党团发挥核心作用，以领导及掌握帮会之活动；三、务须各地帮会不为奸党及民主同盟所利用；四、防止各地帮会之组党运动，如万一不能办到，则运用党团组织，从中发生作用；五、防止海外及国内帮会组织合流。"②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根据上述精神，又制定了《四川省处理哥老会及非法组织实施纲要》，其具体办法分为"积极的措施"与"消极的管制"两方面。其中"积极措施"计有六项："一、无论哥老帮会及其他未经依法组织之人民团体，均为非法组织，应予分别纠正或取缔；二、各地哥老帮会分子依照现行人民团体法令规定发展组织团体，恳请政府立案时，可依现行人民团体组织法规程序，按其性质，予以许可，并派员指导组织，借资统制而收逐渐利导改善之效；三、哥老帮会依照前项规定所组织之团体，应注明其中尚未退出之本党同志，组织党团，作该团体，以资应用；四、发动舆论及加强民教工作，以潜移一般社会参加哥老帮会之错误情绪；五、兴办地方生产事业，以容纳游民，根绝其依靠哥老帮会为生之心理，而减少其分子之来源；六、防止哥老帮会操纵的组织，以免势力集中，滋蔓难图，而进谋组党之运动。"其"消极的管制"包括七项内容："一、哥老帮会分子，均属中华民国之民，均应受国家法律之制裁，故其团体及个人之行为，触犯法律者，一律依法严予惩处；二、凡党员、团员、政府官吏及国营事业机关员司、军警、教职员、学生等，均不得参加哥老帮会组织，其已参加者，限期由主管机关饬令退出；三、严禁政府机关利用哥老帮会作施政之协助，以免

① 原件藏陕西省档案馆。

② 以部长谷正纲名义发出之"社会部密令"，藏四川省档案馆。

声张其势力;四、严禁哥老帮会侵越行政及司法职权,在茶坊酒肆裁判人民纠纷,以减削其权力与信仰。前项人民纠纷,应加强乡保调解委员会之组织与工作,以资代替;五、土匪集团大半即为哥老帮会集团,今后对于本省各地治安,应积极推进其工作,以收正本清源之效;六、未经登记携枪人员,绝对禁止携枪,并严厉执行,以免哥老帮会携枪擅作威福,侵凌善良同时更为无知民众所重视而助长其趋附之热情;七、调查各地哥老帮会之实情,处理之依据。"①

由于国民党许多上层人士皆与帮会有密切联系,有些帮会头子甚至成了国民党当局的"党国要人",所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关禁止帮会的政策和措施并未真正执行,帮会问题始终未能真正得到解决。

---

① 原件藏四川省档案馆。

第十章　20世纪港澳台及海外华人中的黑社会

一、香港的黑社会

1. 从三合会到最早的黑社会组织

对于香港的黑社会,往往有两种误解,一是认为香港的黑社会就是香港的洪门,过去港英当局便将"三合会"作为黑社会加以打击,而三合会属于洪门,于是,洪门也就被视为黑社会,遭到禁止。港英当局把三合会视为非法组织,是因为英国在占据香港后,三合会曾发动过反抗英国的斗争,于是在英国占据香港后的第三年,便制定了禁止三合会的条例,不仅禁止市民参加三合会及三合会的集会,甚至不得拥有三合会的书籍或器具、旗帜。所以,英国统治期间三合会一直被禁止活动。另一种看法认为,"香港的黑社会是自成系统的,同大陆的洪门组织并无直接联系,大陆的洪门组织也从未承认香港的黑社会组织是自己的分支"。这两种看法皆不准确。关于第一种看法,只看到了洪门与黑社会之间的历史渊源而忽视了两者间的区别。从洪门到黑社会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蜕变过程。历史上的洪门乃是下层民众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的民间秘密结社,辛亥革命时期有些洪门首领,还接受了革命党人的引导,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清末和民国年间,部分洪门受到军阀的收买与控制,才逐渐蜕变为黑社会,所以,洪门不等于就是黑社会。第二种看法也不准确,因为这种说法实际上忽视了洪门在历史上的具体情况。在洪门早期的历史上,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严密的规程,各个洪门组织之间也不存在互相统属的问题。任何人只要了解洪门(天地会)内部的隐语暗号,或持一件洪门的《会簿》或传会花帖,就可以建立天地会的组织,别的天地会组织也不会反对,并且承认彼此都属同会,遇事可以互相帮助。所以,不能因为香港的黑社会同内地洪门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就认为不是内地洪门的分支,因而得出香港黑社会与内地洪门之间毫无关系的结论。

实际上香港最早的黑社会组织“和乐安”，就同内地已经演化为黑社会的“洪盛会”有关。“和乐安”的创始人是一名广东东莞籍的小贩，绰号“卖鱼祥”的人，他在内地已经加入了广州的黑社会组织“洪盛会”。我们从该会的名称可以断定它原属洪门，后来蜕变成了黑社会，这在内地是非常常见的。所以，不能因为香港的黑社会与内地没有直接联系而否定它曾经属于洪门。

“卖鱼祥”来到香港后，看到小商、小贩们为了谋生，彼此间互争地盘，争抢顾客，小者口角吵闹，大者聚众斗殴。于是，模仿内地洪门组织“洪盛会”，在香港创建了“和乐安”。这样，既可调解内部的纠纷，又可遇事互相帮助，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很快得到发展。别的行业见到“和乐安”可以团结起来，拥有一定力量，于是纷纷仿效，很快建立了 10 多个类似的组织——堂口。堂口建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原来小商贩之间的争斗，参与者人数不多，仅仅是少数人或个人之间的事。如今有了堂口，一旦发生争执，便成了堂口之间的事。所以，不久便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械斗，闹出了好几起命案，从而引起了警方的关注，堂口被迫从公开转为秘密。到清末宣统年间，在众多的堂口之中，有一个名为“勇义堂”的堂口脱颖而出。其首领绰号“黑骨仁”，他发起把众多的堂口联合起来，彼此间和平相处，提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内部发生争执，可以用“讲数”的方式加以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不得使用武力。即使到了非动武地步，也需要到指定的地点，一决雌雄，绝不可惊动官方。这一提议得到了各堂口的一致同意，并于同年的端午节，召开香港的第一次堂口大会。由于“黑骨仁”本人曾经是内地洪门“天宝山”“碧血堂”的成员，因而大会便称为“洪门大会”。黑骨仁在会上讲述了洪门的帮规，并出示了他本人是内地天宝山、碧血堂“红旗五爷”的证据，在获得与会者的信任之后，他又提出建立一套帮规与入会仪式。他还提出，大家离别家乡无非为了谋生，万事应该以“和”为贵。所以，在堂口名称之上，一律加上一个“和”字。如“洪盛会”便称为“和洪盛”，“勇义堂”便称为“和勇义”。这些堂口后来便成了“和”字头的黑社会组织。从其组织情况看，该组织属于哥老会系统的洪门。此后内地洪门人士来到香港，便把他们视为洪门弟兄，彼此称兄道弟。

香港另外一些主要的黑社会组织是属于天地会系统的三合会。如潮州人所组成的黑社会——福义兴就是天地会系统的洪门。福义兴最初是清光绪年间南洋归侨陈玉廷在香港为南洋洪门组织——义兴公司所建立的分支机构，任

务是为义兴公司在香港、澳门两地筹措经费。后来，福义兴逐渐演变成了潮州人的帮会。义兴公司便是南洋一带天地会系统的洪门。

民国初年在香港兴起的黑社会组织"和安乐"（并非上面提到的"和乐安"），也是属于天地会系统的洪门。"和安乐"又名"汽水房"，简称"水房"。最初成员多为从事茶楼酒肆或熟食摊档的人员，原名"安乐堂"，后来参加黑骨仁的洪门大会，在堂名之前冠以"和"字，故称"和安乐"。其开山祖师李胜等12人，号称"十二皇叔"，皆是无能之辈，故成立初期，默默无闻。1921年，在组织中出现了一位颇具组织才能的人物，名叫温贵，他虽然学文不成，习武不就，但是却具有组织和指挥才能。他在帮内最初仅仅是一名"四九仔"即普通成员。后来因为在同"和胜堂"的械斗中，他先设计瓦解对方的士气，然后又暗设埋伏，一举将对方击溃，使整个九龙最大的地区——油麻区都被置于"和安乐"的控制之下，于是在帮内名声大噪，由香主"蛇王南"下令举行"平地一声雷"的仪式，把温贵推举为该堂的"白纸扇"即军师。温贵在成为该堂的主要人物以后，便开始大展拳脚，把整个"和安乐"划分为十条线，分别由一名红棍和纸扇统领。在线之下，又分为若干个"堆"，在"堆"之下，又由若干个小头目联络若干个成员。在短短的三年之内，便把"和安乐"从一个仅仅有300多人的小帮会，扩展至3000余人。又通过推举的方式，选出红棍一名，作为"坐馆"，白纸扇2名，作为"揸数"，草鞋2名，为常住执事。还编制了"海底"，印发了收条，作为收取会费的凭据，把帮会事务搞得有声有色。堂口遇事，他便像指挥军队一样，层层控制，指挥自如；在经济方面，要求成员不论在业、失业，每人每月交纳一定数量的会费，聚集起来交给有实力的人去放高利贷。一时间，堂口经济上也大有起色，成员人数更是直线上升，使得"和安乐"成了香港黑社会的盟主。

"和安乐"属于三合会（天地会）系统的洪门，其职级称谓也同于内地天地会系统的洪门。设有：

香主——又名"489"，每个字头的最高掌门人，也称"大路元帅"，某个字头（如和字）的各个堂口，只能有一名香主，总管某个字（如和字）头所有单位的事务。

二路元帅——又名"438"，每个堂口均有一名或多名二路元帅。

红棍——又名"415"或"十二底"，是"打手领班"。开大香堂时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内地洪门的红旗五爷。

白纸扇——又名“415”或“十底”，是每个堂口的军师，全权处理该堂口的事务，遇有对外交涉，负责调兵遣将，运筹帷幄。

草鞋——又名“432”或“九底”，是堂口里最低一级职员。

四九——一般成员。

香港三合会也同内地其他天地会系统的洪门组织一样，也受到哥老会的影响，发展组织也称做“开香堂”，但其结拜仪式仍近似内地天地会系统的洪门。开香堂时在厅内在四方桌上置三层供台，最上层供羊角哀、左伯桃，中层供梁山泊一百零八将，下层供前五祖与后五祖，供桌之前设一纸塔，上写“高溪庙”。供桌两旁放置刀棍各一件，称为洪门刀及龙凤棍。供桌中央设一“木杨城”的木斗，其下横放木板二块，称为“二板桥”。进入厅内的门称为“洪门”，由扮演“天佑洪”的人物二人分别把守。仪式开始时，先由“白纸扇”上香，然后跪下献刀、献棍，起立后高声呼叫：“恭请坛主。”这时坛主进入会场，端坐在供桌前特设的坐椅之上。坛主就座后，转身向供桌上“三把半香”，然后率众下跪。此时，所有“收马”的大哥及观礼的叔父，均需下跪，拜毕仍分列两旁，各就各位。此时坛主大喊：“传新人！”把守门口的两名“天佑洪”高声答应，然后带领新入会者鱼贯入场。新人入场时，要经过一番盘问和回答：

问：这是什么？

答：洪门。

问：入来做什么？

答：投奔洪门。

问：投奔洪门有何目的？

答：金兰结义，保主登基。

问：是别人逼你来的还是诚心自愿来的？

答：诚心自愿。

问：既然自愿，请入洪门，受坛主恩典。

新人进入会场后，便向供桌下跪，“执事红棍”即拿起红刀，分别向新人背上轻轻一拍，然后大声传授洪门规则：“身入洪门，不得勾结官府，不得欺兄霸嫂，不得出卖手足，不得吃里扒外，不得调戏妹妹，有事不得畏缩不前，不得泄露秘密，不得勾结外人出卖兄弟，不得三心二意，不得欺师灭祖。否则三刀六眼，势不容情。”每当“执事红棍”传谕一句，新人即高声答应一声：“是”。传谕完毕，

"执事红棍"便挥动"洪门刀",高唱:

"此刀本是非凡刀,昔日老君炉内造。七七循环圣火炼,方能炼成三把刀。头把掌在关公手,取名青龙偃月刀。二把落在晋王手,取名开国定唐刀。三把落在洪英手,取名本是除奸刀。有仁有义,共结金兰,无仁无义,三刀六眼。"

至此,洪门刀归案,坛主命新人起立,介绍在场的弟兄互相认识,然后"斩凤凰"。由"执事红棍"请出洪门刀,口念"斩凤诗":"凤凰生来四头齐,五湖四海尽归依。有仁有义同福祸,脱去毛衣换紫衣。"念毕,手起刀落,鸡头落地。将鸡血滴入盛有白酒的大碗中,上至坛主,下至新人,一一以指头沾酒,往口内一吮,歃血为盟。仪式结束。①

有人认为香港洪门同内地洪门在组织形式、职级方面存在巨大差别,是因为两者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大陆洪门由于创设时带有"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组织必须极为严密,故而在职级方面分为:"香主"、"大爷"、"二哥"等11个职级。而香港黑社会则"一点点政治意识和民族观念都不存在,为的仅是地盘、势力、金钱而已,"故在职级上把11个职级缩为"香主"、"二路元帅"、"红棍"、"纸扇"、"草鞋"、"四九仔"六个职级。②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内地洪门中只是哥老会系统的组织,分为"香主"、"大爷"、"二哥"等职级,而天地会系统的洪门,也分为"香主"、"红棍"、"纸扇"和"草鞋"等职级。香港黑社会也存在着天地会系统与哥老会系统的差别。两者在组织形式方面的差异,并非两者在性质上有所不同,而是因为属于洪门的不同系统。上面所述"黑骨仁"倡议建立的"和"字头的黑社会组织,就属于哥老会系统;而"和乐安"则是属于天地会系统的洪门。

2. 香港黑社会的崛起

香港黑社会的大量崛起,主要是在1925—1926年省港大罢工期间。当时,整个香港成为一座死城,完全处于瘫痪状态。那时居民用水尚依靠街上的水井,港英当局为了镇压罢工工人和恫吓一般居民,令英军荷枪实弹在街头巡逻,致使一般居民不敢外出取水。于是,帮会组织"单义"便出动人马,代为担水,每担水价与50斤白米等同。如此暴利,引起了其他黑社会的垂涎,纷纷起而效尤。水费虽贵得惊人,但最初购买者尚属自愿。由于黑社会人物纷纷染指,导

① 章盛:《香港黑社会内幕》,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第63—64页。

② 章盛:《香港黑社会内幕》,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第28页。

致水供过于求,黑社会分子于是强行供水,不管你要不要,反正水到收钱,弄得居民叫苦连天,无处申诉。后来,又从强行供水,发展到强行“代客购物”。黑社会组织趁军警忙于镇压罢工工人,无暇顾及社会治安之机,对那些因店主躲避而返乡的店铺,破门而入,大肆抢劫。然后将抢得的物品,不管是否需要,强行卖给居民,而且还要收取一份“服务费”。由于港英当局只顾镇压罢工,对于黑社会的无法无天行径不加理睬,黑社会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各个黑社会组织全部出动,大肆抢劫。据当时参与其事的人回忆说,他们每人每天可以得到黄金四两的收入。由于罢工导致工商业萧条,工人、店员大量失业。黑社会于是大量招兵买马,经过一年多时间,几乎所有黑社会组织都较以前大为壮大了。特别是后来与警黑挂钩,警方往往借助于黑社会人物作眼线,使得黑社会人物的地位相对提高,黑社会组织也更加猖狂。黑社会又广收门徒,一些富家子弟,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有不少投身于黑社会。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大约有30多个。其中“和”字头的计有“和安乐”、“和利和”、“和洪胜”、“和群英”、“和勇义”等;非“和”字的计有:“福义兴”、“同新和”、“新同乐”等;外来的有“粤东”、“马交仔”等;50年代以后又有“14K”等。

3. 日本占据时期香港黑社会的发展

1941年12月,日军开始南侵,香港成为其目标之一。驻港英军屡战屡败,同年末,香港被日军占据,开始了香港3年多的苦难岁月。当时,黑社会中人许多回到内地,另谋生路。而留下来的黑社会人物,许多成了日寇的走狗。当时“福义兴”的红棍林满,同日本占领军宪兵部的久宫传一郎拉上了关系。他利用日本人作为后台,在上环街开设赌局,发了大财。其他黑社会人物,也纷纷通过林满与日本宪兵部搭上关系,以至于各地区赌档林立。后来,日军又从各地运来大量鸦片,黑社会又帮助日军销售鸦片。1942年7月,日军在香港、九龙设立了600多处“慰安所”,以解决日军的性欲问题。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又帮助日军强迫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人重新回到香港,战时逃出的市民纷纷返回,而离开香港的黑社会成员,也回到了香港。他们又重新招兵买马,活跃起来。其中最活跃的便是“14K”。[①]

① 章盛:《香港黑社会内幕》,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第40—46页。

4. “14K”的兴衰

香港的黑社会组织“14K”是由内地的“洪门忠义会”演化而来的。1949 年 10 月，解放大军从湖南进入广东境内，在广州的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逃离。葛肇煌便召集洪门忠义会的骨干开会，商议应变计划。葛肇煌在此之前已经把家属送往香港，10 月 13 日，他本人也偕同三四名随从，化装逃往澳门，途中遇到土匪，被抢劫一空。他到澳门后，向熟人借钱暂住下来，然后前往香港。他在香港召集逃到这里的忠义会骨干，秘密开会，结果被香港警方侦知，将葛肇煌捕获，以非法结社的罪名，驱逐出境。葛肇煌只好逃往海南岛的海口，又辗转到达台湾，见到“军统”头子、保密局的局长毛人凤和“大陆作战处处长”郑介民，得到他们的支持，不久，葛肇煌便又回到了香港。这时，一些忠义会的骨干也陆续逃到香港，葛肇煌便把忠义会重新建立起来，并且同当地的三合会取得联系。由于三合会在香港是作为黑社会组织被取缔的非法组织，所以，他们都把名称改为“四和”、“联益”等，葛肇煌的洪门忠义会当然也不敢使用原来的名称。他们想起洪门忠义会在广州时，会址设在西关宝华街 14 号，成员到会所去，便说是“到 14 号去”，于是，14 号便成了忠义会总会的代称。进而又成了忠义会的代称，后来又称为“14K”，这时便干脆称为“14K 党”。由于“14K”得到国民党特务的支持，所以很快成了香港最大的黑社会组织。[①] 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14K”已经发展到 8 万多人，70 年代又扩展到东南亚及欧美各地的唐人街。

二、澳门的黑社会

1. 澳门黑社会的缘起

19 世纪中后期，澳门成为葡萄牙殖民当局从事鸦片贸易和贩卖人口两项活动的中转站。从事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在鸦片的装卸、搬运、包装存库、转手等方面，需要雇用大批华人苦力。为了争夺就业的机会，华人苦力之间时常发生冲突。为此，当时有一名华籍工人林阿发，组织了一个名为“友联”的团体。这个组织不像内地的帮会那样，进行成员间的互济互助，相反却是秉承主子的意旨，成为控制和剥削其他工人的御用组织。由于有洋人雇主作后台，加入者

① 何崇校：《广东洪门忠义会始末》，载《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年。

工作可获保障,但加入者需要交纳工资的1/10,作为会费,不入会者即予以解雇。这样,"友联"便很快得到发展。后来,另一个得到洋人撑腰的陈光,也效仿"友联"的做法,建立了"友乐馆"。虽然不强迫工人交纳1/10的工资作为会费,但是,在堂口内设立赌局,工人们往往把工资全部输掉。既有两个堂口,就难免互相摩擦,在几场流血拼斗之后,又各自招兵买马,并且都有当局作为后台,遂成了名副其实的黑社会。

澳门黑社会的崛起,也与贩卖华人劳工即所谓"卖猪仔"和赌博业的发展有关。自从15世纪葡萄牙人以欺骗的手段攫取澳门后,便经常进行掠卖人口的勾当。鸦片战争后,"卖猪仔"成了澳门的"新兴产业",大量华人劳工被贩卖到南美的秘鲁、古巴、巴西及英、美等国。其中有些人是因为遭受天灾人祸,无以为生而自愿去国外出卖劳动力;有些则是被"猪仔馆"欺骗或胁迫而被卖往国外,如有的猪仔馆便利用赌博,使许多人上当受骗,赌输后自卖自身,成为"猪仔"被卖往国外。澳门的黑社会组织,像"利庐"、"友乐"、"友联"等,皆靠此起家。到了20世纪30年代,澳门的烟、娼、赌业蓬勃发展,黑社会也随之昌盛起来。当时的澳门人口仅有18万多,而著名的黑社会堂口,已经不下10余个。澳门的烟赌娼概由葡澳当局包办,因此,黑社会人物的谋生之道也与香港不同,主要是受雇于赌场、烟馆和妓院,充当跑腿,另外就是从事诈骗、盗窃、拐卖儿童、售卖假药等。澳门警力有限,警察多为葡人或印度人,对华人社会的事情,一窍不通。华人之间发生纠纷,也不去找警察,于是,黑社会人物往往以街道地保的身份出现,进行一些"排难解纷"的工作。他们把事情摆平后,自然要得到报酬。到了40年代,由于香港沦陷,葡萄牙保持中立,澳门未被日本人所践踏,人口骤然增加,香港的黑社会人物也纷纷来到澳门,使得澳门的黑社会更加复杂。进入20世纪50年代,更由于1956年香港黑社会大暴动,许多香港黑社会人物被港英当局递解出境,他们便纷纷来到澳门。他们在澳门相继成立了"14K"、"和乐安"和"和胜义"三个堂口。在澳门广收徒众,为非作歹。当地原来的黑社会组织,反而甘拜下风,把自己的地盘拱手相让。20世纪60年代,澳门的赌博业迅猛发展,兴建了豪华的葡京大酒店,使澳门从原来一个破落的小市镇,一跃成为"东方的蒙特卡罗"。

赌博与黑社会往往相伴而生。赌场为了安全,往往要聘请若干"纠察",这些人大多皆由黑社会堂口派人担任,借此分配利益。每一堂口派若干名,轮流

出任纠察，这样便可以减少黑社会的捣乱活动。经营高利贷也是黑社会的重要财路，借贷者往往是嗜赌的家庭主妇，经营者由于有黑社会背景，所以借贷人很少敢于借债不还。此外，经营毒、娼也是黑社会人物的主要财源。①

2. 澳门黑社会概况

澳门黑社会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如“14K”、“水房”、“和胜义”等，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主要活动就是从事有组织犯罪，如操持赌场、妓院，放高利贷，走私毒品和军火等。第二种是对外以“体育协会”的名义出现，内部效仿洪门的职级、名称、隐语，如“罗梁”、“同义”等。第三种是表面上没有黑社会的名称，但行动上却贯彻黑社会的基本准则，从事有组织犯罪活动，如“八区仔”、“三巴堂”等。此外，还有香港的“新义安”、台湾的“天道盟”、“竹联帮”，甚至日本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在澳门也有所活动。澳门回归前大约有50多个各类黑社会组织，人数多达3万人。②

澳门黑社会所从事的黑道事业有以下几种：

介入赌博业

赌博业向来是澳门黑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石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赌博业迅速发展，1990—1996年间，赌博业的收入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黑社会的头子竞相通过承包和经营赌厅的方法，攫取巨额利润。“14K”的尹国驹本人拥有四家贵宾赌博厅的经营权，每月收入多达数百万美元。

操纵色情业

在旅游业的带动之下，澳门的色情业也迅速发展起来，诸如夜总会、舞厅、蒸汽浴室等色情场所大量增加。这些色情场所，有的直接由黑社会组织所垄断，有的由其监护，收取保护费。

贩卖毒品

毒品走私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几乎为澳门黑社会所垄断。澳门吸毒者甚众，毒品价格也高于其他地区，因此澳门黑社会便趋之若鹜，尤其是摇头丸，在澳门毒品市场颇为风行。据估计，毒品走私每年可以获得数千万美元的绝对利润。

---

① 彭帮富等:《港澳台黑社会实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155—157页。

② 彭帮富等:《港澳台黑社会实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161页。

其他走私活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到回归前,澳门黑社会组织利用澳门同珠海、中山临近和海岸线长的有利条件,大肆向内地走私香烟、电器等商品,以牟取暴利。后来甚至发展到走私汽车。走私活动主要由"14K"和"水房"两个黑社会团伙所垄断。

组织偷渡

黑社会操纵"蛇头"组织偷渡,并且大量伪造内地通行证、护照、回乡证、船民证及澳门身份证供内地偷渡人员使用。而且组织内地女青年偷渡到澳门,由他们控制在赌场、酒店、夜总会等场所,从事卖淫活动。

此外,澳门黑社会也如同其他地方的黑社会组织一样,把经营活动逐渐向正当企业方面转移,使其头面人物取得合法身份。

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澳门的赌博业大受打击,完全倚赖赌博业的澳门经济已经连续三年萎缩。加上港台黑社会的介入,黑道上也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导致港台黑社会、澳门黑社会之间因为利益争夺而不断发生火并。黑社会组织为争夺对赌场和娼妓业的控制权而大打出手,在光天化日之下相互枪击,进行爆破,甚至谋杀政府官员和警察,遭谋杀的包括澳门赌博业总监、水警负责人等。

由于香港的"新义安"、"和胜和"、"联公乐"来到澳门发展,便同澳门本地的黑社会组织"14K"、"水房"、"和胜义"等产生矛盾。澳门本地的四大黑社会组织便联手对付来自香港的黑社会。1996年10月,"14K"老大、外号为"崩牙驹"的尹国驹手下的"桂仔"与香港"和胜和"的头目文龙发生冲突,文龙寡不敌众,逃回香港向本帮求助。适值尹国驹只身前往香港办事,约请一班朋友在伊丽莎白大厦的"天天渔港"吃晚饭。刚好碰到文龙的兄弟、"和胜和"的"座馆"——"鸡脚黑",后者希望通过大哥与他谈判,以了却文龙的事。但尹国驹不肯让步,并把"鸡脚黑"痛打一顿,"鸡脚黑"回去立即召集手下500多人,兵分两路。一路直扑"天天渔港"和尹国驹下榻的酒店,一路奔赴港澳码头,断其归路。尹国驹则离开"天天渔港",电召百名保镖来港,在港的"14K"人马也前来助阵。尹国驹先一步赶到码头,在保镖的簇拥下扬长而去。此后两帮的冲突更加升级,仇杀事件不断。①

---

① 彭帮富等:《港澳台黑社会实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165—166页。

三、台湾的洪门与黑社会

1. 台湾的洪门

台湾的洪门与台湾黑社会的关系，如同香港洪门与香港黑社会的关系一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台湾的黑社会不等于就是台湾洪门。虽然郑成功在台湾创立天地会的说法并不可信，但是，台湾很早就有洪门存在，却是事实。而且天地会历史上最早一次规模较大的造反活动——林爽文起义，就是在台湾发生的。

台湾的洪门，大多同国民党军政人员关系密切。1949 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许多洪门成员随同国民党来到台湾。他们在台湾各地建立山头，发展组织。据台湾报刊透露，20 世纪 80 年代，台湾共有洪门山头 50 多个，成员约 37 万人。这些山头大约分为四个系统：一是从大陆去台的原洪门山堂堂主在台湾重新建立的；二是山主未去台湾，由原洪门骨干所建立的；三是台湾土生土长的；四是旁人借洪门之名建立的。所以，台湾洪门的成员结构也很复杂。士农工商一应俱全，从国民党政要到流氓、赌徒，无所不有。各山堂之间，明争暗斗，互不服气。山堂内部也经常发生内讧。据统计 20 世纪 80 年代台湾的主要山堂约有 16 个。这些山堂仍然恪守洪门的帮规和仪式及隐语暗号。不过，为了得到当局的认可，除遵守旧有的《三十六誓》外，开山堂时还要宣誓："拥护最高领袖，发扬三民主义，维护伦理道德。"

台湾洪门每年要举行两次大型聚会，一次是农历七月二十五日纪念红花亭起义，另一次是农历五月十三日纪念关圣的单刀会。1989 年 6 月 28 日（农历五月十三日），台湾洪门五圣山礼德堂在台中市举行一次单刀会，为新加入洪门的龙兄虎弟举行入会仪式；同年 8 月 26 日（农历七月十五日）"台湾洪门联合会"举行纪念红花亭起义 315 周年的大会。如今台湾的洪门已经不再使用传统的茶碗阵，但是，仍用倒茶、接茶的方式，进行联络。倒茶人将茶壶嘴对准自己的胸口放置，接茶人以右手拇指放在茶杯边沿，食指放在茶杯底部，左手以三把半香手势，与倒茶人相迎，双方即可确认为同会弟兄。

台湾洪门因为充当国民党的重要票源而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台湾洪门山堂的堂主，大半是国民党的退役将领，多数洪门成员也是国民党党员，所

以，对国民党十分效忠，成为国民党的铁票源之一。洪门除了利用洪门成员控制选票外，还使用暴力手段，对其他候选人进行威胁。1989 年底，台湾举行县、市长、省议会议员，及增额"立委"选举。洪门总会号召洪门成员大力支持国民党籍的候选人。面对洪门组织的浩大声势，候选人纷纷前往洪门山堂去"拜码头"，宣称自己已经得到洪门的支持。同年 8 月，洪门举行纪念红花亭起义大会，不少候选人前往会场表示敬意。台北市的候选人林某还在选举前，先后拜"中国洪门总会"会长尹立言为义父。台中市的省议员候选人蒋某，还在选举前，匆忙托人引荐，举行仪式，加入洪门。

不过，由于台湾洪门组织神秘，行动诡异，民众仍将其视为黑社会。1987 年台湾解除戒严前，当局表面上也明令禁止帮会的活动。但是，对于洪门的活动则持默许态度。台湾宣布解严后，洪门首领四处奔波，希望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先后以"护国安台会"、"忠义联谊会"、"海内外洪门总会"、"海内外洪门忠义自强联谊会"等名义，向台湾"内政部"申请成立社团。当局因为这些组织的江湖气味太浓，未予批准。后来在国民党社工会的撮合下，各山头通过协商，终于以"中华民国社会事业建设促进会"的名义，获得批准。召开成立大会时，国民党政要多人亲往致辞或赠送花篮，以表示祝贺。

台湾洪门的山堂多属哥老会系统，较大的有 16 个：

五圣山

由大陆迁移台湾。1932 年成立于上海，(详见本书第 116 页)。由向海潜任总堂主。向海潜去台湾后，继续在台湾成立山头，但一直未公开活动。1974 年向海潜故后，由其遗孀李志芬接掌山堂，先后在基隆、桃园设立分堂，并在台北市士林区设立"五圣国术馆"。20 世纪 80 年代初，该山堂大量接纳成员，并于 1983 年举行创立 50 周年的活动，台湾各洪门山头纷纷到会祝贺。1984 年李志芬病逝，张燕林继任山主。该山堂的成员大多来自工商界，包括旅游公司、电子公司、建筑公司及法律、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士。

大同山

开创于 1952 年，山主尹立言原为国民党派驻澳门的要员，由副山主徐天华实际主持工作，成员大多为知识分子，也有来自情报部门的特务。该山堂致力于联络台湾各洪门山堂，尹立言曾把台湾各洪门山头联合组成"中国洪门总会"，但由于各山头内部矛盾不断，也难以真正实现联合。

西华山

1933年开创于大陆，山主蒋伏生是国民党军队的退役将领，1980年蒋伏生去世后，由黄震继任山主。黄震为了发展组织，广招人马，分别在台东、台中两地设立分堂，定期举行活动。黄震认为要办好山堂，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于是创办了“龙铸实业公司”，经营药材、五金和清洁剂等进出口业务。该山的“管堂”陈金森于1958年创办了“忠义论坛台北县读友娱乐中心”，进行各种有关洪门成员的联谊活动。

太华山

开创于台北市，总部设在台北市的士林区，下设21个分堂。首任堂主刘伯琴，江苏江都人，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要职。抗战时期在戴笠、杜月笙建立的“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中任指导委员。去台后，刘伯琴利用与南洋洪门的关系继续为国民党效劳。1978年刘伯琴故后，由淳于棪继任山主。淳于棪毕业于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曾担任情报部门的将官，退役后在港、台经商。接手山堂事务后，在国民党情报部门的支持下，积极向海外发展。因反共得力，被当局破例允许在岛内发展组织。到20世纪80年代，该山堂已经拥有近5000人。该山堂成员结构复杂，大多来自社会下层，特别是退伍老兵以及地痞流氓中为了逃避打击而加入其分堂者。该山堂在刘伯琴死后，不少“内八堂”的大爷“下山”另开山堂，于是派生出不少新的山堂。如栖霞山山主张太谋、春宝山山主胡少和、一华山山主吕保生、锦宝山山主曹敦发等，都曾经是太华山内八堂的“大爷”。

中华山

台湾洪门山堂中组织上较为健全的，成员多为中上层人士，有工商业者、民意代表等，并且以联谊会的名义，建立了许多分堂，如基隆市的“天仁联谊会”、台北市的“复兴联谊会”、台中市的“同心联谊会”及“天龙联谊会”，该山堂还创办有征信公司、法律地政事务所及《忠义论坛》杂志社。

春宝山

原为大陆的洪门山堂，于1985年在台湾“复山”，山主胡少和原为太华山内八堂大爷。该山堂同演艺界关系颇深，有多位女影星同该山堂有关系，遇到麻烦就请该山堂洪门成员出面解决。该山堂也同地下舞厅等特殊行业有关系，常充当其保镖。不过，该山堂在处理娱乐界的事情，并非诉诸武力，而是以“和谈”为主。胡少和很重视洪门的传统礼仪，曾请人把开香堂的活动内容录像保存，

作为数据流传后世。

天目山

山主徐松山，有成员600人，堂口设在台北市，在高雄、澎湖设有分堂，有的分堂又另立山头。

栖霞山

堂口设在台北市，主要在台湾北部活动，山主张太谋熟悉洪门历史、掌故。

南华山

山主崔震权，堂口设在台北市，在中坜设有分堂，该山堂同美国旧金山的“五洲致公堂”联系较密切。由于崔震权曾任台湾省警务处主任秘书及铁路警察局长，故活动范围以警界为主。

洪发山

原为“军统”特务葛肇煌在广州所创立，广州解放前夕，葛肇煌先逃往香港，后来又到台湾，堂口设在台北市，山主为盘达生，成员多为酒店、餐馆业主及服务员，以广东籍为多。

锦宝山

堂口设在台北市，山主曹敦发。1983年曹敦发曾赴香港与海外洪门联谊。1984年，该山堂成员曾参加影片《洪门兄弟》的拍摄。

楚荆山

原山主委刘耀棠，后来由王桂林、朱果山、李国华等先后担任山主。主要在台中一带活动，成员中有的同台中的流氓、黑道人物关系密切，有的成员因屡屡犯案而遭警方逮捕。

九龙山

原山主王春和，1981年王死后由潘贵珍接任，该山堂活动极为秘密，在各地建有分堂，帮助弟兄解决生活困难。

同德堂

山主杨运涛，是洪门“新生代”的代表之一，曾发起成立台湾中部地区的洪门联谊会，主张洪门企业化、组织化。

金台山

山主张能标也是台湾洪门新生代的代表之一，也主张通过企业化的经营方式，恢复洪门昔日的风采，办有瓷土矿公司、文化活动中心、医院及茶艺馆。因

采用传说中郑成功在台湾创立的“金台山”名称而受到同门的非议。

大陆山

山主柳岳生，因“大陆山”系孙中山当年在檀香山所开创的名称，柳岳生取此名称亦受到洪门的批评。

除上述16个主要山堂外，台湾还有许多小的洪门山堂，如大洪山、武当山、青龙山、荩忠山、大亨山、大蜀山、大华山、峨眉山、大汉中华山、大梁山、华山、义华山、龙虎山、精忠山等。①

2. 台湾的黑社会

台湾的黑社会与台湾洪门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另外建立的一些有组织犯罪集团，其中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四海帮”

该帮是1955年5月，由王姓、刘姓两名青年，在台湾大学校园里，召集44名青年所结成，取“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意，是台湾第一个较具规模的青少年帮派组织，成员多为国民党官僚的子弟。他们模仿父辈们治军、治政的方式，管理帮派。设立了交际、联络、经济等组。他们的口号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打平台北市。”他们凭借着各自的家庭背景，很快打进了台北的闹市区，一度成为台湾北部的第一大帮。1959年该帮重新举行结盟仪式，开除了胆怯分子，1960年该帮准备要在台湾摆“长蛇阵”，以显示从高雄到基隆均有其组织和成员。旋因骨干分子被捕而未能如期举行。“竹联帮”兴起后，各自以对方为对手，互相打斗。1962年，“四海帮”被警方瓦解，“竹联帮”乘机占据了“四海帮”的地盘。9年以后，一些原“四海帮”的人物因为经商有成，便常常在一起聚会，商议重振“四海帮”，1970年终于重出江湖。这时，该帮以蔡冠伦为老大。蔡冠伦毕业于空军军官学校，有过三次飞机失事而大难不死的记录，在台湾外省籍的帮会成员中颇有威望。他要求“四海帮”的弟兄不再在餐馆白吃白喝和收取保护费，而效仿美国黑手党的办法，以发展企业作为帮派的生存基础。除开设赌场、舞厅外，还在台北开设了一家期货公司，从事买空卖空的活动，大发横财。后来，又组建了营造厂、建筑公司和传播公司。这样，便与“竹联帮”再次发生冲突，多次发生血案。

① 陈龙城等：《台湾黑社会内幕》，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19—22页。

“竹联帮”

前身“中和帮”，是由流氓孙德培纠集一些不良少年，于1953年成立，因主要活动在台北中和一带，故名。当时，台北市的中和一带，乃是国民党官员们的居住区，其子弟中有不少纨绔子弟，在学校里聚众滋事，打架斗殴，甚至向摊贩们收取保护费。后来，“中和帮”与“古亭帮”进行械斗，杀死该帮的一个成员，老大孙德培以杀人罪被捕入狱，帮中群龙无首。1956年6月，该帮的赵宁召集残余分子，为了同其他帮派对抗，在台北市竹林路尽头的竹林区，模仿洪门的仪式，歃血为盟，成立“竹林联盟”，简称“竹联帮”。他们建立堂口，制定帮规：专门对付“四海帮”；不得叛帮；自己的兄弟要团结；每周缴纳帮费5元。帮内最初实行辈分制，以鸭、鹅、狼、蛇、鹰来标定。后来因为组织发展，人员太多而取消。由于“四海帮”出道较早，成员年龄也比“竹联帮”大些，所以根本瞧不起“竹联帮”。“竹联帮”少年气盛，对“四海帮”霸占大量地盘，极为不满。两帮为了争夺地盘，不断发生械斗。1962年3月，“四海帮”因为犯案被警方勒令解散，“竹联帮”遂趁机扩大地盘，并对“四海帮”加以报复，号称“旱鸭子”的陈启礼，带领弟兄直捣“四海帮”老巢，导致“四海帮”的瓦解。在这次活动中，陈启礼立下汗马功劳，于是成了该帮的首领，而且，该帮也从此名声大震。1964年，绰号“白狼”的张安乐，带领“南海路帮”的一部分人加入“竹联帮”，使“竹联帮”的势力伸展到了台湾南北各地。“竹联帮”头目杨剑平又率领“竹联帮远征军”横扫台北大小帮派，名声大震。到1965年，该帮已经拥有五六百人，号称“天下第一帮”，提出“拳打一省”的口号。他们连续与“文山帮”、“宇宙帮”、“飞鹰帮”等团伙，展开火并，终于拿下了台北的黄金地段。1968年4月，张安乐召集了一次重要会议，决定建立“新竹联帮”，模仿清朝八旗制度，制定红、白、黄、蓝、灰各色旗号，下用虎、豹、狮、熊、风、狼、鸟等动物的名称立堂，确立堂口制度。堂设堂主、护法等职名，张安乐仍尊陈启礼为“大哥”，并规定各堂口的赌场收入必须交出一部分作为“母金”，以应付紧急情况。1970年发生帮内陈仁私吞“母金”事件。陈仁因赌场收入颇丰，便欲脱离竹联帮，于是携带60余万元的“母金”，向警方投降，寻求保护。陈启礼遂指使一名弟兄，将陈仁砍死，警方随后将陈启礼捕获，送绿岛监狱关了6年。1976年陈启礼刑满获释回到台北，重整“竹联帮”，使该帮的队伍迅速扩大，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拥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天、地、至、尊、万、古、长、青、东、西、南、北”20多个堂口。每堂有二三百

人,最大的有800多人,总人数约有三四万人。其主要堂口及其头目如下:

总堂:

总堂主——陈启礼

总护法——吴敦

执法——陈功

总巡查——黄少岑

巡查——汪沛雷、林庆增、张启民

分堂:

忠堂堂主——董桂森

孝堂堂主——花继忠

仁堂堂主——向美华,副堂主——冯在政

爱堂堂主——刘振南,副堂主——张恕隆、汪裕弘

信堂堂主——邱文钦

义堂堂主——杨榕顺

和堂堂主——周士弘

平堂堂主——黄云龙

天堂堂主——王国庆

地堂堂主——李宗奎,副堂主——张被华

至堂堂主——张伟华

尊堂堂主——彭荣沪

万堂堂主——不详

古堂堂主——陈永南,副堂主——郑文斌

长堂堂主——不详

青堂堂主——何根成①

“竹联帮”不仅开设赌场、向店铺和娱乐业征收保护费,而且直接控制了电影界、戏院、夜总会、舞厅,此外,还拥有各种合法企业,从事建筑、水电、桥梁、铁路及商店等。他们承包施工,开设银行,代办运输。为了扩大影响,他们还侧身于新闻传播业,出版专门报道黑道人物、事件及演艺界的桃色新闻的报纸杂志。

---

① 陈龙城等:《台湾黑社会内幕》,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43—45页。

此外,"竹联帮"与台湾情报部门也有密切联系。1984年8月,经电影界制片人岳凤和导演白景瑞的介绍,陈启礼与国民党情报局长汪希苓结识,不久便制定了暗杀华裔作家江南(刘宜良)的计划。

"竹联帮"在鼎盛时期,其势力曾扩展到香港和海外。在香港,"竹联帮"设有分堂——侨堂,有成员150人,大多栖身于娱乐界与体育界。在美国,其成员遍布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休斯敦、费城等大城市。在菲律宾还占有一个小岛,作为运送枪械和转移犯案弟兄的据点。

"牛埔帮"

该帮是台北市仅次于"竹联帮"和"四海帮"的第三大帮。该帮的名称来源于台北市一条街,该街在日本统治时期称为"牛埔仔",该处赌场、妓院林立,一些流氓分子便在该处收取保护费。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爆发后,大批美军来到台湾"度假",台湾趁机发展"无烟工业",牛埔仔一带酒吧、歌厅、夜总会纷纷设立,老板们为了安全,便要雇佣保镖,"牛埔帮"于是成了"镖头"。并向商家收取保护费。如此便与其他帮派发生冲突,曾与"竹联帮"因争夺地盘而发生流血事件。后来,该帮也从事经营酒廊、理发厅、宾馆及赌场。

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娱乐场所大量出现,黑社会组织也随之膨胀。出现了专门为妓院充当保镖的"芳明馆帮"、"太湖帮"。在台南出现了号称"南台霸主"的"七贤帮"和号称"疯狂大杀手"的"西北帮",还有靠钢笔手枪起家的"三山国王庙帮"。其他还有"血盟帮"、"文山帮"、"飞鹰帮"等,其中"飞鹰帮"还把势力伸向了海外。①

四、台湾警方的扫黑行动

1973年台湾警方采取温和的方法,要求黑帮进行登记。由警方和情治单位联合发表《告台湾黑帮书》,要求不良帮派在限定时间内,自动向当地治安机关登记,宣布解散,否则后果自负。这次自动登记解散的帮派组织共有568个,3000余人。5年后又再次登记,又有189个。但是,黑社会并未销声匿迹,而是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继续存在和发展。他们涉足于赌场、舞厅、酒楼、茶馆、私

① 陈龙城等:《台湾黑社会内幕》,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第38—57页。

娼、演艺业、地下钱庄等。经过取缔之后，帮派活动有增无减，而且大的帮派丝毫未受影响，从而引起舆论的非议。特别是1984年“江南命案”发生后，不仅舆论哗然，而且，使台湾当局受到美国的压力，加上刺杀江南的“竹联帮”堂主陈启礼与骨干吴敦、董桂森，因觉得事情有异，而将案件经过口述录音。台湾“国安局”为了灭口，遂决定于1984年11月12日开始在全省施行“扫黑项目”，即所谓“一清项目”。在事先保密的情况下，对全省黑帮组织突然袭击，先后逮捕了1000余人。然而，不久黑帮成员们又纷纷回巢，照样活动。不过，由于这次扫黑的矛头主要指向“竹联帮”，所以，该帮损失惨重。堂主陈启礼与骨干多人被捕入狱，该帮几乎溃不成军，仅由一名大哥级人物组建了“竹联帮捍卫队”，以地下投资公司、讨债公司和收取保护费为主要经济来源。1988年，“一清项目”中被捕的大哥们刑满出狱后，已经成为大哥的原小老弟，并不把原来的大哥放在眼里，于是，又展开了新老大哥间的明争暗斗。那些难以重新掌权的原大哥们便组建了新的帮派。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天道盟”，因为该帮是由原来黑道头领所组成，实力雄厚，已有取代“竹联帮”为“天下第一帮”之势。

面对黑社会势力的再度膨胀，与台湾社会治安的恶化，台湾警方又开始实施“二清项目”，包括“净安项目”和“安民项目”。以消灭罪犯，净化社会环境，确保社会治安为宗旨。重点是“检肃黑道帮派”、“查缉非法枪弹”。由警备总部策划，刑事警察局执行。可是，经过半年的实施，被列为帮派老大的138人当中，没有一人被捕获，仅搜罗到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喽啰。相反，抢劫杀人、绑架勒索的事件，层出不穷。警方难以交账，于是又采取“扩大临检行动”，结果，消息早已走漏，黑道大哥已经逃逸，结果还是只抓到一些无名小辈交差。

进入20世纪90年代，黑社会的犯罪活动，也提高了档次。黑社会老大自己已不再去参加打斗、抢劫，而是西装革履，坐在商业大楼的经理室内，对黑社会犯罪活动进行指挥，并且嘲笑当局的无能。更有甚者，台湾当局大搞黑金政治，根本无法彻底根治黑社会犯罪。

五、海外华人中的黑社会

1. 唐人街的“堂口”

在许多国家，都有华人聚居的小区，一般称为“唐人街”。在唐人街内，一般

都有双语学校、社会服务机构,银行、商店、医院等。唐人街实际上是华裔移民的社会及文化中心。在唐人街内,一般设有三种不同类型的互助性组织,一是由同一姓氏组成的"宗亲会",二是由同一籍贯者组成的"同乡会",三是不问姓氏和籍贯的"堂口"。在美国唐人街的堂口,最早出现在旧金山(三藩市),主要由在铁路或金矿上工作的华人参加,在1845年成立。1850年又成立了由洪门人士组成的致公堂。

堂口的成员一般都拥有正当的职业或生意,定期交纳会费,堂口也组织会员举行宴会和交游。当洪门组织介入堂口之后,堂口也接受了洪门的价值观和帮规。加入时需要举行仪式,宣读36誓。不同的堂口之间,也常常发生争斗,称为"堂斗"。

2. 20世纪的华人帮派与黑社会

20世纪50年代末,在旧金山首先出现了所谓"街头帮派",第一个名为"臭虫",由出生在美国的华裔青年组成,多从事盗窃活动。1964年,又出现了由年轻移民组成的"华青帮"。最初是为了保护新移民免受美国土生华裔学生的骚扰。他们不断从新移民中吸收会员,势力逐渐壮大。后来,他们又成为"和胜堂"的一部分,从原来青年人的街头帮派,变成了成人组织的青年支会。以后,"华青帮"的一名首领因不满于"和胜堂"的控制,脱离原来的"华青帮",另外成立了"友利帮",与原来的"华青帮"成为当地的两大帮派。两者常常发生街头暴力事件,甚至发生凶杀案件。

1965年,在美国洛杉矶也建立了"华青帮"。当时该地高校华人学生经常被一个墨西哥青年的帮派所骚扰。这时,恰好有一名华裔学生从旧金山迁来洛杉矶。他便模仿旧金山的"华青帮",建立了洛杉矶的"华青帮",与墨西哥裔的青年帮派互相争斗。

美国纽约的华人帮派"红花亭"。在美国纽约唐人街附近上学的,绝大部分是非洲裔或西班牙裔的学生,华裔学生在校园及附近地区的运动场上,常常遭到其他族裔学生的欺负。而学校教师和学生父母也无法对他们进行保护,为了免受欺负,他们便于1961年建立了第一个街头帮派——"大陆帮"。当时有100多人参加,与其他族裔的学生为敌。他们除了互相保护外,也参加赌博和逃学活动,但是并不参与街头犯罪。他们白天上学,晚上回家补习功课,并不与华人堂口联络,也不受雇于人去保护别人。

在纽约也有与堂口紧密联系的青年人帮派组织。1964年,安良堂的一名头目,建立了一个由新移民组成的团体,名为"安良青年俱乐部",主要活动是在堂口成员带领下,练习武术。该俱乐部后来转化为"白鹰帮"。白鹰帮与小区联系紧密,但不介入学校、家庭及美国社会。他们关注的是小区内非华裔游客在小区内对华裔游客的种族骚扰和不轨行为。当时,外来者在华人商店或餐馆,常说华人的坏话,或拒绝付钱。白鹰帮便专门对付这些外来的游客。与白鹰帮同时出现的还有"群义帮",宗旨与白鹰帮相似。他们成为唐人街的两股主要帮派势力。后来,又开始把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青少年,驱逐到小区外面。

1969年,在纽约又成立了一个名为"义和拳"的帮派组织,主要由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青少年组成,他们与非洲裔的帮派结盟,反对定期驶进唐人街的旅游巴士。因为外来游客在唐人街一面推挤华人,一面拍照以满足好奇心。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唐人街的一些帮派组织,开始与某些堂口紧密结合起来。他们住在堂口租给他们的公寓内,在堂口的餐馆进食,与家庭和学校几乎脱离。不过,堂口也难以完全控制这些帮派,结果,帮派分子在小区内的敲诈勒索及抢劫事件不断发生,甚至与堂口发生冲突。

8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华人帮派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时,不少福建人从中国内地或香港来到美国,成为唐人街中的有力集团,建立了"福青帮"。该帮主要吸收福建籍青年加入,并且与福建同乡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打算在发展极快的商业区东百老汇街发展地盘,结果遭到东安帮和飞龙帮的攻击,但是,福青帮仍然在那里生存下去了。①

3. 海外华人黑社会形成的社会原因

海外华人黑社会的形成,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其中既有华人青少年的学校问题、家庭问题及就业问题,也有三合会亚文化的影响问题。

首先,学校问题。

在美国的华裔学生往往成绩优异,但是,他们都是在美国出生或幼年就移民美国的孩童。而在青少年时才移民美国的学生,在学习方面则往往遇到许多困难。为了学习英语,许多学生都必须与比自己年龄小的本地同学同班上学,从而产生自卑感。学习中的困难,又很难得到不懂英语的家长的帮助。本地华

---

① 陈国霖:《帮会与华人次文化》,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第105—122页。

裔同学或白人学生也往往对他们加以歧视。所以,这些受到歧视或排挤的学生,便开始结合在一起,因此,许多帮派组织最初都是在种族歧视严重的校园中产生的,然后,又与成人社团挂上钩。

其次,家庭问题。

以往在美国的华人家庭,许多是不完整的。许多是父亲先到美国闯天下,母亲和幼孩留在国内。即使父母亲都在美国,也会因为经济原因,整天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孩子。孩子往往很难见到父母亲。孩子遇到困难,也很难得到父母亲的帮助。结果,孩子只好求助于帮派组织。

最后,就业问题。

许多华裔学生中途辍学后,很难找到工作。而且由于语言问题,很难被美国老板雇用,于是只好到不需要英语的华人小区去找工作。华人雇主往往利用他们无法在主流社会立足的弱点,对他们十分刻薄。这样,辍学的青少年既得不到家庭的理解,也得不到社会的帮助,只好聚集在一起,在娱乐场所或赌场跑腿。

以上是直接原因。

也有间接原因,就是受到黑社会的影响。那些很难找到工作,并且不为家庭理解,又得不到社会关心的青少年,如果受到三合会一类黑社会的影响,就很容易加入帮派组织。正如一位加入帮派的青年人所说:"我们希望小区能够提供工作给我们,如果我们都有工作,便不会犯罪。"一位新移民开始时因为没有工作而在赌场工作,后来加入帮派的经过是:在移居美国初期,在叔叔所开的杂货铺工作。由于待遇低,工作时间长,对工作不满意,对恶劣的生活环境也颇失望。一天,他正在公园里散心,正好遇到一位在香港的同学,那位同学已经加入帮派,得知他处境困难,便介绍他到一家赌馆工作,只需要在赌场门口看是否有熟人,工资是原来的三倍。某天,他在门口制服了一个不讲理的赌客,受到称赞。几天后,他的同学便介绍他去见那位老板,那位老板正是一个帮派的大哥,他于是就参加了帮派,并被立刻提拔为"三哥"。所以,许多青少年成为帮派分子,大多是因为受到三合会亚文化的熏陶。

4. 海外华人黑社会的犯罪类型

收保护费

在华人小区唐人街,随着经济繁荣,有许多商店和娱乐场所,如歌舞厅、影

剧院等，同时也有许多赌场和色情场所。赌场、色情场所都需要保护场地和赌客、嫖客，防止受警方的突然袭击。也需要有人维持秩序，更要防止其他帮派的骚扰与侵袭。商店也需要保护，以免受到其他帮派的勒索。帮派负责保护，当然就要向被保护者征收保护费。

勒索钱财

一是明目张胆地向商店要“利市”，一旦店主付了第一次，他们便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再来，要求店主按期付钱。另一类是较为含蓄，如逢年过节，他们到商店给店主“拜年”，店主就会明白是来要钱，只好付钱给他们。为了达到目的，有时让一群年轻人来到餐馆占据一张桌子，声称约人来聚会，一坐数小时不走；或大声喧哗，吓走顾客，店主只好付钱给他们。有时他们在餐馆大吃一顿，然后在账单上写上帮派的名称，扬长而去，或表演一场戏，先派一群人在餐馆吃喝而拒绝付账，接着，另一群人帮助店主，强迫前者付钱，然后要求店主请他们保护。否则，就会对该商店进行破坏、抢劫。

霸占地盘

为了对商店、酒吧、歌舞厅进行勒索，征收保护费，各个帮派都霸占一定的地盘，其他帮派则不来此处骚扰，否则会发生帮派间的打斗。

抢劫

抢劫一般是帮派成员的个人行为。多为抢劫赌场或色情场所，受害者很少向警方报案。

贩毒

据统计，在1980年以前，华人黑社会只偷运很少的毒品到美国。1983年以后，则急剧增加，估计大约进入美国的海洛因，有20%是华裔黑社会所为。这一点可以从被捕的华裔黑社会分子身上得到证明。

经营娼妓业

1970年以后，由于大量拥入美国的单身华人和越南难民，增加了对娼妓的需求。娼妓业的需求最初多由韩裔移民经营的按摩院来满足，后来华裔帮派势力也涉足其间。同时也有华人与韩国人开设的夜总会，也经营娼妓业。许多按摩院、夜总会皆受到华人黑社会的控制，或由他们直接经营。

5. 海外华人黑社会与亚文化

海外华人中的帮派、堂口与三合会之间，并不一定有组织上的关系，但是，

它们都可以归入“亚文化”的系统。社会学家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社会里，某一部分人因其独特的社会地位而不再遵守传统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因而脱离主流社会，成为非主流社会。这些非主流社会的组织，都各自具有其独特的思想系统与处世方式、具有独特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这就构成了该团体的文化，因为它不同于主流社会的文化，所以称为“亚文化”（Subculture）。海外华人中的堂口、帮派和黑社会，均属于非主流社会的亚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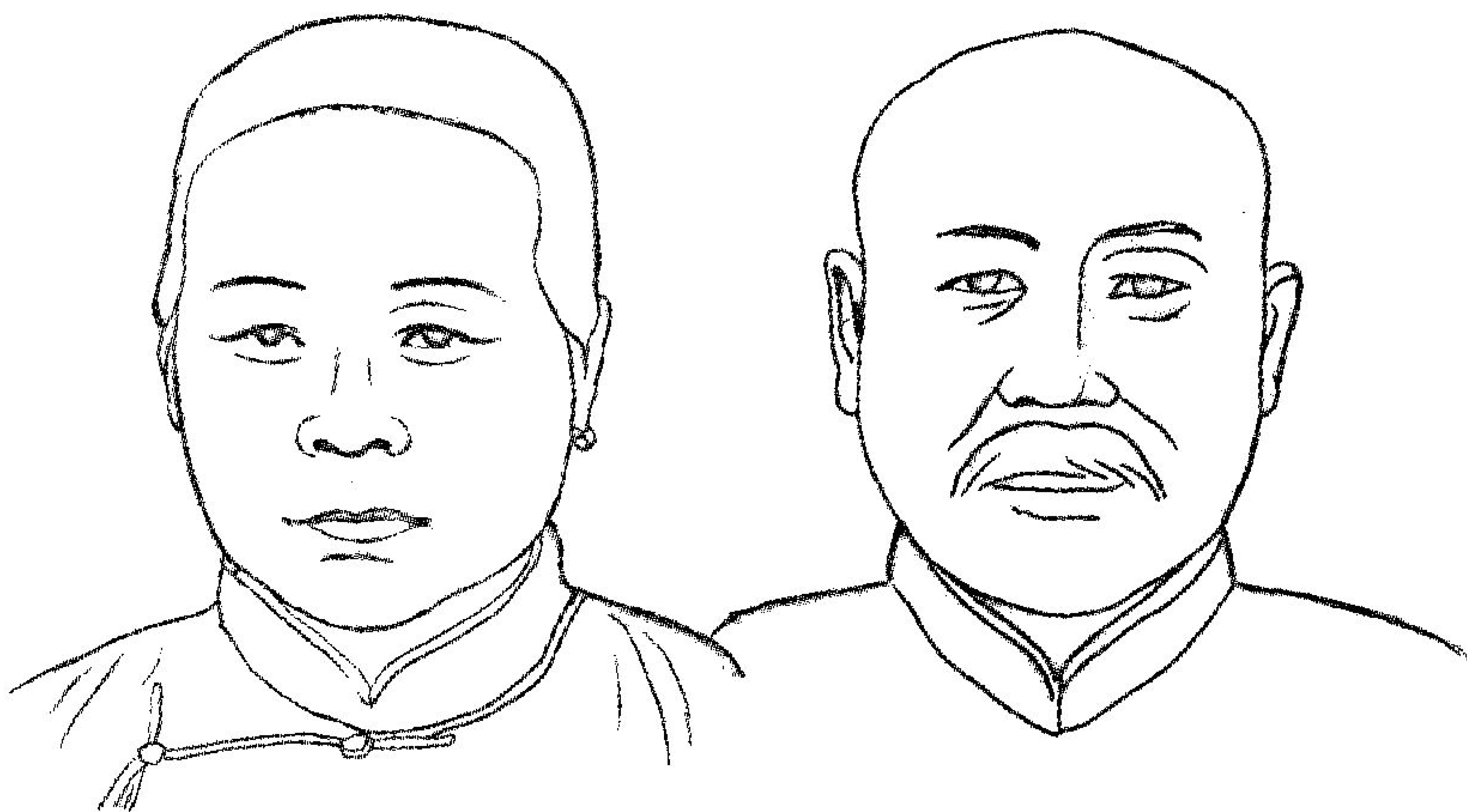
在美国，华人堂口的成立，最初同受到美国社会或华人宗亲会、同乡会排斥有关。而华人帮派组织的建立，则与那些对美国社会有疏离感，又被其他族裔学生所排挤、歧视有关。总之，那些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移民，最容易接受三合会亚文化。他们由于无法在主流社会立足，只好进入非主流社会，加入具有三合会亚文化色彩的组织，是他们生存的主要途径。

亚文化规范有两类。一种是被主流社会所容忍，这种亚文化虽然与主流文化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有差异，但是，对大众社会没有干扰，也不对主流文化产生危险性和破坏性。第二类不被主流社会所容忍，因为这种亚文化不但与主流文化相冲突，而且也具有干扰性和破坏性及危险性。前者如某些温和型的民间教门，并不从事非法活动和反社会活动，但是，他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同主流社会不同。后者如黑社会中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皆与主流社会相冲突，他们从事反社会的活动，因此为主流社会所不容。[①]

---

① 陈国霖：《帮会与华人次文化》，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2 年。

会道门篇



辛亥革命以后，虽然1912年元旦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不久就被袁世凯窃取了政权，使得“中华民国”仅徒具形式，政权完全控制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一些专制帝制的余孽，仍不断演出复辟的丑剧。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仍然笼罩着全国。那些保皇守旧的清朝遗老遗少们，大肆宣扬“光复旧物”、“尊孔读经”、“恢复帝制”。一时间，复古尊孔的喧闹声，甚嚣尘上。有一个清朝遗老，甚至还编了一副对联，来讽刺和咒骂民国。“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咒骂民国“不是东西”。一些封建迷信团体，纷纷出笼。一贯道等会道门正是在这种复辟封建专制君主制的政治形势和“尊孔读经”的文化氛围下，打着“提倡儒家的伦理纲常”以“拯救世人脱离苦海”的招牌，开始兴起和蔓延到各地的。这样，从民国初年起，一贯道等会道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原来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蜕变为会道门。

第一章　民国初年秘密教门向会道门蜕变的社会环境

一、民国初年的清朝遗老和军阀官僚的复辟活动

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毕竟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这无疑为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可是,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却不愿失去自己的"天堂",拼命反对共和制,企图复辟君主制,以至民国初年不断发生企图复辟君主专制制度的活动。这些复辟活动的群众基础还颇为广泛,不仅有清朝的遗老,也有民国政权里的军阀官僚和醉心于旧思想、旧道德的知识分子,而且包括以下层群众为主的秘密社会。秘密社会作为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落后组织,他们在政治上拥护君主制,反对共和制;思想上提倡封建伦理道德,反对科学和民主思想,他们同清朝遗老、军阀官僚已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反对共和制,拥护君主制;提倡迷信,反对科学;维护旧思想、旧道德,反对民主、自由的新思想、新道德,于是从以前传统社会的反对者,蜕变成旧制度的维护者。其中以往一向标榜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秘密教门,这时则站在维护旧思想、旧道德的立场上,竭力反对共和制,企图借维护君主专制政体来达到其推翻世俗的民国政权,建立以其教主为首的神权君主政权的目的。它们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必然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1. 宗社党与秘密社会的复辟活动

民初的所谓"宗社党",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政党,它既没有固定的组织,也没有确切的成立时间,仅仅是民国初年清王朝的一些宗室和王公贵族,为了复辟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而纠结在一起的小团体。主要头子有载洵、良弼、溥伟、善耆、载涛、铁良、毓朗等人。1912年元月,清廷鉴于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危亡在

即，急忙召开御前会议，以商讨对策。会上反对清廷退位的溥伟、善耆等人后来就形成了宗社党。溥伟还变卖家产，作为复辟清室的活动经费。清廷退位后，溥伟、善耆等人，先后前往旅顺、青岛等地，号召满族贵族和汉族遗老，致力于复辟清王朝的活动，当时的新闻媒体遂称他们为“宗社党”。他们的复辟活动，在民国初年十分猖獗，其党羽遍及奉天（辽宁）、吉林、湖北、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他们的活动，主要包括举行武装叛乱、暗杀民国政要、宣传复辟清朝统治等。其成员除了原清朝的宗室和王公贵族外，还有前清时期的文武官员、失意军人（原清廷在各地的驻防旗兵首领），以及无业游民和秘密社会的成员。

1912 年到 1913 年期间，在北京的宗社党头子玉均纠集该党的骨干分子，召开秘密会议，为党徒鼓气，并拟延请一日本陆军退役军人，作为武装叛乱的顾问。其后在北京便不断发生宗社党的破坏活动，以致人心惶惶。1912 年 4 月，京师警察局搜获炸弹多枚，据供系宗社党为了暗杀当时的国务总理唐绍仪而准备。同年 8 月，宗社党人拟于孙中山由上海进京时，以炸弹进行暗杀。1913 年 2 月，宗社党人德亮在热河驻军中煽动叛乱。同年夏，东三省一带秘密教门也大肆活动，其中以黄天教的活动最为猖獗。该教早在民国元年便勾结宗社党，共谋反对共和制度。在“二次革命”及南北交战期间，该教在各地散布谣言，称“此次南北之战，正天假之缘，大清将借以恢复，对剪辫者将有所不利。一些人受到煽惑，多思留发。以致“人情殊为汹汹”。该教总部设在吉林省双阳县的灵岩阁，附近的榆树、宾县、新城、长春等地，入教者颇多人。[①] 同年 8 月，当局在该教密室内搜获六棱印章两颗，入教人名册三本，该名册记载该县入教者多达 4000 余名，并搜获枪弹及其他违禁品，该教首领“蔡老爷”还在北京、大连等地与宗社党相勾结。[②] 黑龙江省海伦县议员李德明是黄天教的教首，他自称“弥勒云霞主”，在该县招致多人入教，手下有“五大元勋”，其中由崔德礼执掌财政，并到北京联络宗社党，拟于当年 8 月中秋在海伦各属兴兵举事。[③] 秘密教门中还有大乘教即如意门，以反抗共和制与保护发辫相号召。该教当时在东北三省已经拥

---

① 《民立报》，1913 年 8 月 6 日，《哈尔滨通讯》。以下有关《民立报》的内容，皆转引自胡平生所著：《民国初期的复辟派》一书，特此致谢。

② 《民立报》，1913 年 8 月 25 日，《吉林通讯》。

③ 《民立报》，1913 年 7 月 29 日。

有教徒5万余人，每人一年纳捐36元，教徒划分等级，有兵丁、秀才、状元、知县及封侯拜相等名目。首领王春风，绰号王馅饼儿，官衔为“督办大臣”；其次为“吏部尚书”李绍先、“吏部侍郎”乔云福、“侯爵”李小辫、“海军大臣”王竹山、“外交大臣”张连山等人。该教首领多匿居哈尔滨租界内，并制有黄袍、龙衣及前清种种官服，如黄马褂之类；该教曾与宗社党首领升允晤商，约期起事。后得知张勋盘踞山东，志在恢复清朝，即于1913年7月中旬派其“吏部尚书”李绍先带领教徒附路西下，以期与张勋面商机密，并将筹集之款带具若干，以助张勋之饷需。[①] 另据1913年7月29日《民立报》《哈尔滨通讯》报道，黑龙江省滨江县有“杨梅教匪徒左一峰、韩宫等四人，受宗社党首领、前恭亲王委派，到奉天省城，寓西门外凰觉寺，会商机密。并拟派人至东三省、蒙古交界地方招募胡匪（马贼）两万人，均自带枪马，饷需优厚，由宗社党重要人物分担，共70万元，冀与库仑（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方面联合，以图大举”。1914年，宗社党制造谣言称，首领铁良派出党羽30余名，持有大连总部的委任状，分布吉林、黑龙江两省，秘密运动大股马贼及黄天教徒，拟首先发难，其长春、大连各处同时响应，占据东三省为根据地，并向外国洋行购得军火，铁良不日赴哈秘密布置。以此制造混乱，煽惑人心。

1912年，湖北大冶人、帮会头子向海潜在黄石港组织富国公司，召集江湖会党，发给徽章，约期起事，该会与宗社党有密切关系。黎元洪派人将该公司干事倪国等三人拿获，搜获快枪70支，向海潜闻风逃往上海。[②]

1912年4月，驻南京的赣、湘、浙军哗变，查系受宗社党及张勋之煽惑而酿成。事后查获大黄龙旗四面，系黄绸新制者，并当场拿获乱兵40余名，搜出票布，上有“忠义堂”三字，并盖有“同心协力”四字之图章。[③] 1912年6月5日，南京留守黄兴派卫兵捕获宗社党多人，经审讯发现与一〇二团兵士有牵连，该团团长章武以前曾组织同盟改进党，后来该党与渔业统一党合并，而后者成员全部由青帮组成。统一渔业会曾以保护渔业为名，购得大量枪械弹药，分配给同盟改进党、一〇二团、大公党、自强党等，势力逐渐强大，趁黄兴退职之机，由一〇二团发起兵变。后经黄兴派兵将哗变平定，并以军事法庭进行审讯。据供，

① 《民立报》，1913年7月29日《哈尔滨通讯》。

② 《民立报》，1912年6月4日。

③ 《天铎报》，1912年4月16日。

该党人数众多,期以沿海、沿江一带为举事区域,预定先将举事区内各官贞公署烧毁,将官员斩杀,占领各地后,再与北京的宗社党联合,颠覆共和政府,奉戴大清皇帝正位。渔业统一党购买武器的经费,乃宗社党提供。①

1912 年 5 月 15 日,杭州警方在宗社党人身上发现"上海共进会"票据及入会人的誓言,其文曰:"立誓书:李建章,年三十九岁,住上海麻忽路,原籍直隶保阳人,系汉种人。素抱'剪除民贼,挽救瓜分,酬报皇恩,推倒民国'宗旨,愿在共进会部下舍身立业,一切听大皇帝指挥。入会之后,严守秘密,决无反复,如有违背情事,照会章处罚,立此誓书是实。宣统四年二月二十六日。"②

1913 年 3 月 20 日,山东济南城内发现大批告示,内称:"现在革命党虽举奸臣袁世凯为大总统,创立共和政府,然实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曾有过的政体,无君臣之别,父子之情义,比起所谓鬼畜等没德背理的政体犹有过之。""当此万分危急时期,亟应诛戮叛臣袁世凯,并讨伐持革命思想的朝野官民,力图恢复大清皇室,违者将格杀勿论,累及九族。"③

2. 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

民国初年,在紫禁城里还保留着一个以溥仪为首的小朝廷,溥仪仍然拥有皇帝的尊号,每年享用着 400 万元的巨款,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一批前清旧官僚则以清朝遗老自况,成为当时从事复辟活动人数最多的部分。这些人都是汉人或汉军旗人,大多属于进士出身,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颇深,既是旧政权的维护者,又是旧思想、旧道德的卫道者,他们拥有官僚和文人学士的双重身份,因此,他们的活动空间比宗社党更为广泛。其著名的有劳乃萱、胡思敬、刘廷琛等。他们中间,有的反对过洋务运动,有的反对过戊戌变法,有的反对过清末新政,也有的则曾是戊戌变法的支持者。清朝灭亡后,他们都以清朝遗老自居,抱"亡国之痛",其"悲愤"和对清王朝的眷恋之情,不亚于那些清朝宗室和满族贵族,力图复辟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民国初年,他们散居在全国各地。他们中间,除了组织诗文社,借诗酒排遣时日,发抒对清王朝的怀念外,还利用一切机会毁谤和攻击民国政权。溥仪在回忆自己的师傅陈宝琛时说:"在他嘴里,革命、民

---

①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湾学生书局,1985 年,第 26 页。

② 《民立报》,1912 年 5 月 18 日。

③ 山椅诚轩:《支那的宗社党》(下),第 4 卷 13 号,第 15 页,转引自胡平生:《民国初年的复辟派》第 1 章,台湾学生书局。

国、共和，都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和这些字眼有关的人物，都是和盗贼并列的。”“记得他给我转述过一位遗老编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他加上一个横批：‘旁观者清’。他还议论说‘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二百多年深人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①]遗老的另外一项活动就是提倡尊孔读经。他们认为民国建立，废除尊孔读经，乃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沦亡。有人说：“自光绪庚子而后，国人群怵于外患之乘，而愤然变计。内讧益剧，遂成宣统辛亥之大变，缙绅儒族咸入异流，礼教法物一切荡然，激愤之士辄谓国非其国，人类尽矣！”[②]杨圻也说：“国变以来，士子简陋不学，益以邪说，遂无父子男女之伦。今且争议不读经，废孔祀矣！悠悠沧海，我其济乎？”[③]他们借提倡尊孔读经，宣扬“三纲”、“五常”，作为复辟专制帝制的舆论准备。1912年夏秋之交，梁鼎芬、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建立“孔教会”，借以反对共和政体。1913年，北京成立“孔社”，有社长徐琪等知名人士100余人参加。同年，王锡蕃在北京组织“孔道会”，由康有为任会长，会员有梁启超等200余人。陈焕章还在山东曲阜召开全国孔教大会，郑孝胥在上海与遗老组织“读经会”。

遗老们还积极进行复辟的具体活动。1913年2月，广东的遗老温肃前往青岛与在那里寓居的前清恭亲王溥伟会晤，然后转赴兖州与张勋密谋复辟之事。他们“谈及时局，引为同志，复返青岛恭邸与张绍帅（张勋）密谋讨贼，期于三月一日举义。旋改初三袭济南，事为贼将侦悉，断兖济铁路车轨。绍帅急弥缝灭迹。幸檄文告示皆王领衔，绍帅未盖印，遂诿于王，其檄文实晦若（于式枚）、幼云（刘廷琛）、诒重与余四人主之”。[④] 溥仪回忆说，“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孤臣孽子感到兴奋的事情越来越多：袁世凯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被袁世凯任命为清史馆馆长后，宣称“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劳乃萱在青岛写出了正续《共和解》，公然宣称“还政于清”。“据说在这个复辟

---

①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4年，第89—90页。

② 章梫：《一山文存》卷九，文海出版社，第14页。

③ 杨圻：《癸丑北游诗五十首》即注，载《江山万里楼诗抄》，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24页。

④ 《温文节公年谱》，第5页，转自《民初的复辟派》，第60页。

年里，连四川一个绰号叫十三哥的土匪，也穿上清朝袍褂，坐上绿呢大轿，俨然以遗老自居，准备分享复辟果实了。"[①]复辟的思想必然导致复辟的行动，不久，果然出现了两次企图推翻共和制，复辟君主专制政体的复辟活动。

3. 军阀官僚的两次复辟闹剧

首先是袁世凯的"洪宪帝制"。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窃取了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就开始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势力进攻，以实现其复辟帝制的美梦。他首先破坏了国会和《临时约法》，无限制地扩大总统的权限，取消了内阁总理，而代之以完全听命于总统的国务卿，把参议院作为总统的咨询机构，总统实际上已经是皇帝了。但是，袁世凯仍不满足，还企图当真正的皇帝。为此，他让党徒们建立了一个"筹安会"，并发表宣言，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声言："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促之中，指定共和政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摸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②]筹安会的召集人杨度进而提出："富强无望，由于立宪无望，立宪无望，由于共和"，因此，"今欲救亡，先去共和"。[③] 并提出一项有关国体问题的请愿书。1915年9月1日，参政院开会审议筹安会的请愿书，并拟订"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0月7日，朱启钤等发出电文，要求"国民代表大会拥戴电中须有荣代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字样。[④] 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汇查了国民代表大会就国体问题的表决结果，全体代表一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并"拥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遂以国民代表大会的名义，向袁世凯上书"劝进"。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宣布：如今"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⑤] 经过一系列准备，袁世凯于1915年12月31日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准备正式登极称帝。

正当袁世凯兴致勃勃地准备登极称帝的时候，全国各地也掀起了反对帝制

---

①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4年，第89—90页。

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第174—176页，转自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2页。

③ 杨度：《君宪救国论》，载《东方杂志》，第12卷第10号。

④ 李钊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第209页。

⑤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第283页。

的怒潮。1915年12月25日,"护国军"起义在蔡锷的领导下在云南爆发。接着,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以日本为首的列强也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做法不予支持,袁世凯的一些心腹军阀也电请袁世凯取消帝制,使袁世凯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最后只好宣布撤销帝制,仍想继续当大总统,但是,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只好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中死去。

其次是张勋复辟。

张勋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张勋任头等先锋官。1910年任江南提督,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两江总督张人骏逃跑,张勋时任江苏巡抚,继而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竭力反对辛亥革命。12月,张勋在南京被革命党之江浙联军击败,退走徐州。1912年初,他又自徐州带领残部3000人逃至兖州。他对民国政权一直极为仇恨,所以,民国成立后他虽然表面上接受民国政府的任命,却时刻梦想复辟清朝统治,他和部下全部都留着辫子,被时人讥为"辫子军",他则被称为"辫帅"。他在率军驻扎山东兖州时,经常与清朝遗老和宗社党头子相往来,曾于1913年举兵复辟,因事泄流产。在二次革命期间,袁世凯利用他仇视革命党的心理,命令他进攻南京,他在攻占南京后,袁世凯任命他为有名无实的长江巡阅使,但他却借此驻兵徐州,壮大实力,为日后复辟准备物质基础。他在此大肆招兵买马,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他自兖州南下,击败江苏讨袁军,攻占徐州、南京,军队扩至1万余人,1914年,北京政府任命他为定武上将军兼长江巡阅使,驻兵徐州,其势力逐渐壮大。

当时,张勋与以"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名义驻守南京的冯国璋,皆有复辟的思想,加之一些遗老从中筹划,二人遂携手以图复辟。据史料记载:辛亥革命后,清朝"遗老旧臣,志图复兴者",计有升允、刘廷琛、沈曾植、王乃征、胡思敬、温肃等。他们"六年以来,奔走筹划,未尝一日懈其志。而诸将中可与谋者,唯张勋一人"。[①] 这次复辟活动的主要参加者,除张勋、冯国璋外,还有宗社党的升允、东北的张作霖等人,并得到日人宗方小太郎的巨款资助。后因冯国璋态度犹豫,加之新任长江巡阅使倪嗣冲受段祺瑞之命,充当说客,并携带巨款至徐州收买张勋部属,从而导致复辟行动流产。但是,张勋并不死心,又利用黎元洪

① 陈冷汰:《丁巳复辟记》,载《近代史资料》,第1期,1958年,第109—110页。

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于1917年6月7日率领4000多名辫子军北上复辟。当时在北京、天津两地集中着一大批复辟派分子，在为张勋的复辟活动进行筹划。宗社党的升允得知张勋北上的消息后，急忙致函，鼓动他趁此机会实行复辟。信函称："自试办共和以来，官邪民贼，毒痛四海，公见共闻，无可讳隐。今贼党内乱方剧，以足下宗旨素定，正宜立建龙旗，宣言复辟，使薄海远近，望风兴起，忠义愤发，必将天旋地转，旦夕遂定。""伏望足下电布誓师复辟，将共和政体一概铲除。"[①]张勋到达天津后，一面致函黎元洪，要求他解散国会，一面派军队进入北京，驻扎在天坛和永定门。黎元洪被迫屈从后，张勋于6月14日来到北京，纠集康有为、王士珍、劳乃萱等，联合奏请溥仪复辟。6月16日，他头戴红顶花翎，身着黄马褂，带领文武官员300多人，涌进清宫觐见废帝溥仪。觐见时，"一切礼节，悉依旧例，即所递职名柬，亦仍称奴才"。[②] 6月30日下午，张勋出席江西同乡会举行的欢迎会，会后以京戏助兴。午夜归宅后，立即与步军统领江朝宗、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陆军总长王士珍及康有为等，连夜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复辟的具体步骤，决定派人劝告总统黎元洪退位。凌晨三时，张勋偕同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等50余人同进清宫。溥仪"升殿"后，张勋率领众人伏地行三拜九叩大礼，三呼万岁，奏请溥仪复辟称："臣等反复密商，公同盟誓，仅代表二十二省军民真意，恭请我皇上收回政权，复御宸极，为五族臣子之主，定宇内统一之规。"[③]把13岁的废帝溥仪又扶上了皇帝宝座。溥仪随即发布由康有为起草诏书，宣布自即日起"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治，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④] 宣布把民国六年七月一日，改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设置了旧有的官僚系统，封张勋为"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封康有为为"弼德副院长"。[⑤] 当天，张勋对《顺天时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民国成立以来，纷扰不绝，生民罹涂炭之苦，皆由共和不

---

① 《郑孝胥日记》，载《近代史资料》，总35期，第74—75页。

② 《复辟始末记》(上)，第24页，转自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212页。

③ 《张勋等奏请复辟折》，载《内阁官报》，第2号。

④ 《复辟诏》，载《内阁官报》，第1号。

⑤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3651页。转自《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224—225页。

适于中国，故遍商同志，断行宣统复辟，以救国危。"[①]但是，复辟专制帝制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各省督军也纷纷声明反对复辟，就连曾参与1913年和1916年两次复辟活动的冯国璋，也看到复辟必然失败而对张勋的倒行逆施加以反对，表示要"誓扫妖氛，恭行天罚，刻日兴师问罪，殄此元凶"。[②] 最后，张勋众叛亲离，兵败后逃入荷兰使馆避难，康有为逃入美国使馆，溥仪逃入英国使馆。这场仅上演了14天的复辟闹剧，终于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下被迫收场。不过，复辟专制帝制的思潮和活动并未就此消弭。张勋复辟时的"文圣人"康有为（张勋是复辟的"武圣人"）仍前往各地联络清室宗室、遗老和复辟分子，继续进行复辟活动。他在鼓动军阀吴佩孚的信中透露了他的活动："仆连年漫游，与士大夫语，无不疑民国而主复辟，与各疆帅谈言尤激，盖未见有一主民国者。"[③]并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军阀身上，1926年，康有为鼓动吴佩孚复辟，在致吴佩孚的信中称："今美国、日本之报，言明中国之大乱，非复辟不能救。若英人之言中国事者，亦无不主复辟，公使尤多主之，此外交之同心也。若国内情，除国民赤党外，无不望复辟者。"[④]

总之，民国初年，清朝遗老和守旧分子，一直在企图推翻共和制，复辟君主专制政体。这也为秘密社会的蜕变，创造了适合的政治环境和生存土壤。

二、守旧派的尊孔思潮

辛亥革命后，虽然建立了共和制，但是，袁世凯很快窃取了政权，尊孔立教和复辟帝制的活动，在最高权位者、军阀与守旧派中，一直在或明或暗地进行着。袁世凯在就任大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就提出勿忘儒家的传统，不久，又以大总统的名义，命令在全国实行春秋两季举行祭奠孔子的大典。袁世凯为什么要尊孔呢？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袁世凯主张尊孔"，他"寄托的是帝王之想"。[⑤]

---

① 《顺天时报》1917年7月2日。

② 《顺天时报》1917年7月5日。

③ 康有为：《致吴帅书》，载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686页。转自胡平生：《民国初年的复辟派》，台湾学生书局，第367页。

④ 康有为：《致吴帅书》，载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686—687页。转自胡平生：《民国初年的复辟派》，台湾学生书局，第370页。

⑤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367页。

在袁世凯等当权者的提倡下，尊孔派的活动更为嚣张。1913 年 2 月，以康有为为首的尊孔派，创办了《孔教会杂志》，鼓吹立孔教为国教，反对共和政府的有关措施，特别是对教育部命令全国把孔庙学田充公，补助小学的经费一事，极力反对。认为这是"犯全国之怒"，"直欲废黜孔子之举"，"为洪水猛兽也"。他认为孔子之教，乃"中国之国魂"，如果废弃孔教，"则举国四万万之人，彷徨无所从，行持无所措，怅怅惘惘，不知所之，若惊风骇浪，泛舟于大雾中，迷惘惶惑，不知所往也"。[①] 康有为尊孔，实质是为了复辟帝制，他在 1917 年 7 月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说出了自己当时的心态："仆既受先帝之知，为救中国之政，因夫人心只愿，故决复辟之举。袁世凯篡盗专政，故先倒之，然后可以收北军而言之复辟也。张上将勋，义勇冠时，乃心皇室。昔在癸丑，曾与之密联诸镇，欲复本朝，不幸事泻，中道而废。"[②]他在参与张勋复辟时，曾致函徐世昌，力请维护复辟的残局。他说："公曾着黄罗，眷念故土，日思复辟"，"若公不能力争，致撤销复辟，则咎攸归，请同附逆。公何以面对天下人，面对先帝于底下乎？"[③]他认为要拯救中国，"惟有举辛亥革命以来之新法全进火之，而还其旧"。[④] "审察国情，非复辟不能救中国，遍考人心，皆思复辟而念旧朝"。[⑤]

守旧派反对从西方引进的先进思想和科学

民国初年，守旧势力不仅在政治上大肆进行复辟君主专制的活动，而且在思想上反对先进思想与科学。伦父君在《迷乱之现代人心》中提出："中国周、孔以来，儒家统一，思想界未闻独创异说者，此我国之文明，即我国之国基。乃自西洋学说输入，思想自由，吾人之精神界中，种种庞杂之思想，互相反拨，遂至国基丧失，可谓精神界之破产。"又说："吾人在西洋学说尚未输入之时，读圣贤之书，审事物之理，出而论世，则君道若何，臣节若何。……关于名教纲常诸大端，则吾人所以为是者，国人亦皆以为是，虽有智者，不能以为非也，虽有强者，不能以为非也。"[⑥]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竭力反对当

---

① 康有为：《复教育部书》，载《孔教会杂志》，第 1 卷 5 号，1913 年 6 月。

② 康有为：《复大隈侯爵书》，载《不忍》杂志，第 9、10 期，1917 年 12 月。（信中所说癸丑，为 1913 年）。

③ 康有为：《与徐太傅书》（1917 年 7 月 7 日），载《不忍》杂志，第 9、10 期，1917 年 12 月。

④ 康有为：《中国还魂论》，载《不忍》杂志，第 8 期，1913 年 11 月。

⑤ 康有为：《与徐太傅书》（1917 年 7 月 7 日），载《不忍》杂志，第 9、10 期，1917 年 12 月。

⑥ 转引自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载《新青年》，第 5 卷第 3 号。

时代表民主与科学的西方文化。他认为自从西方文化输入后,破坏了吾国之"国有文明"和是非标准,造成国基之丧失,精神之破产,人心之迷乱。甚至攻击宣传新文化是输入"猩红热和梅毒"。自西学输入,使得"吾人思想界种种庞杂之思想,互相反拨,遂致'国基'丧失,精神迷乱"。[①]

1912年,陈焕章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创办《孔教会杂志》。他在该杂志的发刊词里说:当时"以教育部而废学校之祀孔,以内务部而不认孔教为宗教,"乃是"倒行逆施,自乱其国"。[②] 1913年,《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7号上发表顾熏的文章《毁孔驳议》,文称:"不谓今之毁孔者,视(商)鞅(李)斯而尤加焉。或欲罢其祀,或欲废其经,或欲拆其庙,或欲夺其产,或假学梦之名以扼之,或借崇墨之说以淆之,丧心病狂,以至于此。瞻斯怪状,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清朝遗老张尔田也说:"一年以来,恣睢暴烈之徒,创为非怪诬天之莠言,举四万万人心所系属之国教,敢于铲灭之。新学小生,一唱百和。"[③]孔教会会长康有为也说:"惟自共和以来,百神废祀,乃至上帝不报本,孔子停丁祭,天坛鞠为茂草,文庙付之榛荆。……呜呼!中国数千年以来未闻有滋大变业。"[④]总之,守旧派所掀起的维护旧传统、旧道德,反对新思想、新文化的风浪,一时甚嚣尘上。

三、迷信活动的猖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于鬼神的迷信一直是很盛行的。在民国初年,依然有相当多的人信仰鬼神。1917年秋,上海一帮旧文人打着"信仰自由"的招牌,筹划成立一个迷信团体,叫做"上海灵学会"。他们设坛扶乩,并取乩书所得,汇集成册,刊印成专门宣传鬼神迷信的《灵学丛志》。甚至利用现代科学的成果进行鬼神研究,声称该会"专门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以及立身修养种种要义"。胡说什么"灵学者,实为凡百科学之冠,可以睿智慧,增道德,养精神,通天地"。甚至宣称辛亥后的一切混乱现象之根源,就在于"鬼神之说不张"。

① 《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1918年4月。

② 《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1913年。

③ 张尔田:《论孔教与东南兵祸只关系及一年来对于孔教诋毁者之心理》,载《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8号,1913年。

④ 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享天坛议》,载《不忍》,第3期,1913年4月。

灵学会与孔教会不同,灵学又称心灵学、神智学、灵魂哲学等,来自西方。它虽然不是科学,但是,却以科学为名。中国的灵学虽然来自西方,却又与西方的灵学不同。中国的灵学在移植西方灵学的过程中,又加入了中国国有的"神道设教"、"天人感应"、"修道成仙"、"灵魂不死"、"因果报应"等迷信观念,以及"扶乩"、"求鉴"、"招神问鬼"等迷信方式。[①] 迷信必然导致愚昧,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就是针对迷信和愚昧而说。当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陈大齐、鲁迅等纷纷著文,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对弥漫于社会上的迷信思潮加以反击。陈独秀提出,所谓科学,就是要提倡西方国家兴起的自然科学,要反对旧的封建迷信和旧的传统观念。《新青年》的许多作者针对当时的鬼神迷信思想,特别是以上海一帮封建文人所创立的迷信团体"上海灵学会"及其宣传的"乩文",加以批判。如一篇乩文上提出"周末诸子居然能作七绝诗,孟轲能作大草"。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陈大齐在《辟灵学》一文中指出:周代尚没有七绝诗,草书是在东晋以后才出现,可见"乩文"中所说全是扶乩者的作伪。他还根据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一些原理,举出大量事实,论证乩文并非圣贤仙佛所为,"扶乩所得之文,确是扶者所作。有意伪作者,出自扶者意识之我,无意作伪者,出自扶者下意识之我"。陈大齐还指出《灵学丛志》"其内容之荒妄离奇,真足令人捧腹绝倒"。"该志所载,所设之乩坛曰盛德坛,由孟轲主坛,庄周、墨翟二人为之辅,下置'四秉十六司',此种说话已属滑稽之极。而某日'圣贤仙佛'临坛时,各有题诗,周末诸子居然能作七绝诗,孟轲且能作大草,又李登讲音、韵,能知 Esperanto(世界语)之发音。此真荒谬、离奇之尤也"。[②] 钱玄同在《随感录八》一文中也指出,《灵学杂志》所刊文章,"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诸如"颜回、孟轲、杨雄这些人,都会作齐梁以后的七言绝句"。而且这些诗中,"百分之九十五都用清朝'试贴诗'时所用的诗韵合璧的韵"。所以,他在文章的末尾大声疾呼:"青年啊!如果你还想在20世纪做一个人,你还想中国在20世纪算一个国,你自己承认你有头脑,你自己还想研究学问。那么,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的胡说八道的妖魔!"[③]刘半农更是直斥《灵学杂志》乃是"奸民作伪,

---

①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370页。

② 陈大齐:《辟灵学》,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

③ 《新青年》,第4卷第5号。

用以欺人牟利"的"妖孽杂志"。并举出《灵学杂志》第一期所刊文章中有关扶乩、关羽、济颠所作字画等诸多"妖人作伪之铁证",认为该杂志实乃"妖言惑众"。[1] 当时的先进分子对于宣扬鬼神迷信的邪说,给予了有力的反击。鲁迅也在《新青年》上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些讲鬼话的人反对科学的实质。他说:"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

四、新旧思潮的斗争

复辟封建君主专制帝制,必然要恢复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便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提出的王权神授说,把皇权推向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君主独裁的理论根据。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忠君孝亲",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有力工具。孔子的学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绝对真理,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思想。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失败后,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盘踞在一些人的心灵深处,他们继续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诋毁民主共和思想和自由平等观念,大力提倡封建礼教,宣扬"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观念。但是,这一切毕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不得人心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切地感到,正是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礼教,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才造成了袁世凯与张勋两次复辟封建专制帝制的闹剧。要想使中国摆脱贫困,走向富强,就必须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旧思想、旧观念彻底决裂,从而彻底摧毁复辟封建专制帝制的逆流。为此,他们发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当时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封建礼教和复辟逆流以强有力的冲击。他们提出,要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同时必须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陈独秀说:"欲建设西洋式的新国家,组织西洋式的新社会,以求适合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建立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信仰不可

① 刘半农:《随感录九》,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

兼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他们还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反击猖獗的复古尊孔思潮，指出"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乃是"奴隶之道德"，是同"今世之社会国家"根本不兼容的。他们认为，"孔子虽好，必不能合现在的时候了"。他们用西方自由民主和平等博爱等思想，对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要求用革命手段扫除封建的伦理观念，实现民主自由。他们还指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思想与文化，乃是中国几千年专制度的基础，尊孔必然导致复辟帝制。不摧毁封建文化，就不可能摧毁封建制制度。所以，当时革新与守旧两种思想的对立，本质上乃是坚持民主共和制，还是复辟倒退为封建君主专制的斗争。而这些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被一些守旧分子视为洪水猛兽。秘密教门的首领们，为了招徕信众，特别是那些守旧分子，便打着维护传统文化的旗号，大肆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他们为了寻找清朝遗老的支持，便大力宣扬专制帝制，反对民主共和，拥护清朝遗老和军阀们的复辟活动。

在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缓慢地向近代化社会前进的历程中，顽固保守的旧势力一再掀起复辟逆流和反对科学与民主的逆流，以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20世纪初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给了那些热衷于提倡封建文化，企图复辟专制帝制的反动思潮以有力冲击，使它们在知识界已经名声扫地。于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提倡旧思想、旧道德的任务就落到了会道门头子们的身上。他们竭力维护封建专制帝制，反对共和制与民主，提倡迷信，反对科学。其结果，使以往要求变革的下层群众组织秘密教门，这时却变成了旧制度、旧思想和旧道德的维护者。在20世纪30年代，一贯道头子张光璧等人便以封建文化的卫道者自居，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和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大肆攻击新文化运动。他在为一贯道制定的《暂定佛规》序言中大肆叫嚷，如今"正值三期末劫，人心不古，世风颓坏。又兼欧风东来，崇尚科学。先王之纲常扫地，圣人之礼教废弛"。因此，由"皇母"对他"畀以重任"，"阐扬一贯以醒世"，"讲仁说义，效法古圣先贤"，以反对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和科学为己任。张光璧为什么要反对"欧风东来"和"崇尚科学"呢？那就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共和思想和科学世界观，也就是当时提出的"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与"赛先生"（科学"Science"），给了中国旧的封建专制主义与封建迷信思想以有力的

冲击，造成在张光璧之流看来是“先王之纲常扫地，圣人之礼废弛”的局面。九宫道也大肆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并且竭力攻击民国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在一篇所谓《招贤真经》里说：“中华民国兴自由，平头分头发不留；人不留发忘父母，无法无天任意游；不讲三纲圣人礼，失去五常也不究；失去三纲把恩忘，忘了五常把义丢；忘恩负义感天怒，天降恶劫把人收；刀兵灾难一齐起，天下世人都发愁。”①充分说明了秘密教门在历史潮流面前的无奈和反动心态。

五、官僚、军阀和失意政客的倡导和支持

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批官僚、军阀和失意政客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也是促使秘密教门向会道门蜕变的重要原因。历史上的秘密教门原本是下层群众因为不满自己的地位与处境，希望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而自发结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秘密团体，因此基本成员大多是农民、小商贩、穷苦知识分子以及差役、兵丁等属于下层社会的人。秘密教门所宣扬的“弥勒佛救世”说教，既迎合了下层群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又使他们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加上秘密教门宣扬：劫难将至，只有入教才能获救，并且可以生活在未来美好的“白阳世界”，因此，许多下层群众便纷纷加入其中。晚清以来，秘密教门本身发生的重大变化，首先是一些下层知识分子纷纷加入以后，不仅逐渐改变了秘密教门的阶级结构，更主要的是，在其所标榜的“三教合一”教义中，儒家的思想影响越来越突出，因而更加适应民初军阀官僚的政治需要。他们大力提倡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君孝亲”等旧思想、旧道德，主观上是在为教首登极称帝做舆论准备，而客观上却适应了守旧派企图维护旧的君主专制，反对共和民主的政治需要。

再从民初政坛情况来看，当时军阀割据，为了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那些官僚政客们，在政坛的沉浮中，乃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拨军阀官僚垮台了，另外一拨又掌握了大权。那些在政坛上被赶下台的失意政客和军阀官僚们，一时间门庭冷落，只好把失落情绪，在会道门那里得到排遣。会道门所宣扬的劫难即将来临，加入其道，在劫难来临时，可以得到无生老母的拯救等说教，使失

① 《弓长出世招贤真经》，上海宏大书局石印本，第9页。

意的官僚政客们从会道门那里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梦想入道后,在劫难来临时不仅可以得到神灵的庇佑,而且在未来的新世界里,还可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可以利用会道门的力量,东山再起。那些台上的军阀官僚们,为了扩展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也需要乞灵于各种神灵的庇护,秘密教门为了适应这种政治形势的需要,也使自己的"教义"更加适应军阀官僚和失意政客的需要。大量军阀官僚和失意政客的加入,大大改变了秘密教门的阶级结构,于是逐渐从原来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逐渐蜕变为官僚政客的工具——会道门。所以,当时从总统、部长、军阀官僚到失意的官僚政客,纷纷为会道门捧场,甚至直接加入其中,有的还成为会道门的"护法"。

第二章　民国初年的一贯道

一、路中一掌道时期

民国初年，路中一被一贯道尊为继刘清虚之后的第"十七代祖师"。路中一(1849—1924)号通理子，是山东济宁县五里营人，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农历六月二十四日[①]，1924年农历二月初二因喉癌身故。他幼年家贫，粗识文字，以务农为生。清同治九年(1870)，朝廷招募兵勇，路中一到直隶天津小站投军入伍，充当骑兵，曾在天津营盘担任德国操的教习。光绪二十一年(1895)47岁时离开军队，在青州拜刘清虚为师入一贯道。他在成为一贯道道首以后，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神化自己，特意编造出一段神话故事。张英誉回忆说："我在幼年时，曾听到我父亲与别人讲说此段经过，说十六代祖师刘清虚在求坛时，坛训上指示，将来有弥勒佛在刘清虚坛下求道，叫刘清虚到'燕南赵北求大贤'。于是，刘清虚即前往。此时有路中一者，山东济宁人，自幼从军在天津营盘中教德国操，为教习。不知因何故辞职南返，将所得薪金百余两银带在身边。当时因为交通不便，步行至某山边休息时，遇见刘祖清虚，由闲话而劝其入道。路中一该时以为求得真道，遇上明师，即将辛勤所得百余两银子，一文不留拿出来作功德费，交与刘清虚，同时随刘清虚同到青州，就在刘清虚家中打柴烧饭的效起劳来，如此约有十余年之久。一日，刘清虚在乩上求训，问到底弥勒佛是否求道，后身在什么地方。坛训上说：'若问弥勒在那里，燕南赵北观仔细，头戴羊绒帽，身穿俗家衣，张口吐真宝，人工手中提，如问弥勒在那里，时还未至难对尔提。'在下坛后，大家议论纷纷，并各看手中，是否手纹上有人工二字。此时路中一因做生活，亦跑来听训，见大家如此，于是自己也伸出手来，看是否有此人工。在他左右端详下，他的手纹好像有点"人工"的

① 一说他生于咸丰三年(1853)农历四月二十四日。见慕禹著:《一贯道概要》，台南靝巨书局，2002年，第52页。

意思，于是就跑到刘清虚的面前，伸开手请他看。哪知刘清虚将他一推，说不用看，谁手中没有几个道子呢？于是将他推开。此后，刘清虚心里已经明白，就对路中一说：你在我家若干年，我也不白用你，与你天命（即是点传师），你离开此地去传道吧！"这样，路中一就只好外出传道。这段故事，其实是模仿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的事迹编造出来的，仅情节稍有改变。路中一在离开刘清虚后，举目无亲，在青州办道，信奉者寥寥无几，1918 年，回到老家济宁，去找妹妹"老姑娘"。路中一妹丈是个傻子，家中非常清贫，生有两个孩子，长者陈兴龙，次者陈兴海，均在童年，家计生活全靠"老姑娘"一人，以手工所得供养全家，苦不堪言。"此时，'老姑娘'已达绝境，预备到自己娘家上坟后回来自杀。而在这个时候，路中一来到，兄妹相见以后，路中一说明自己已得天道如何如何，并劝'老姑娘'不要悲观，帮助传道吧！于是就办起道来。"路中一便自称"弥勒佛转世"，其妹则自称"观音老母转世"。刘清虚死后，路中一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弥勒佛自居，掌握了道盘，接续刘清虚成为一贯道的"十七代祖师"。他在济宁先后收了 25 个大徒弟，又假借"鸾训"，给这些徒弟均以"然"字命名。其中有郝宝山、赵怀中、陈礼月、褚庆福、郑振宝、粮兆功、聂某和张光璧等。[①]

在路中一掌教时期，一贯道的各级职位分为十个等级：

总领——总揽道务；

领袖——资深之代传人，且是"领有天命之果位者"；

代传人——即传道师，由总领任命；

堂主——临时佛堂的主持人；

承办——家庭佛堂及公共佛堂之堂务领袖，总持堂内事务；

协办——职位在承办之下，担任佛堂的庶务、账务、管理、书籍等工作；

帮办——工作与协办同，唯职责较轻，且地位在其下；

宣讲员——以善于讲道义者充任；

乩生——扶乩时执乩笔在沙盘垂训者；

道子——对道友的称呼。

路中一终生未娶，没有后裔。他死后，其妹担心道权被夺，便诡称路中一还要"七日还阳"。她在路中一的棺材上开一个洞，每天早上她要用清水为路中一

① 王同：《一贯道述略》，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566—567 页。

的尸体洗脸。但是,过了十余天仍未见路中一"还阳",而且尸体也已腐烂发臭,只好又找来一个 12 岁的小孩,说是路中一的化身,道首们不信也只好作罢。[①]这样,道权就暂时由其妹"老姑娘"路中节代掌,家产则由其侄路成华继承。路中一从继任十八代祖师直到去世,道务也未得到多少发展,仅在济宁及山东境内的金乡、鱼台、单县、嘉祥、汶上、宁阳、东平、定陶、城武、邹县、滕县、邑县、曲阜以及河南的开封、巩县等地传布。"自路中一逝世后,济宁与附近各地道务大部零落,路、陈亦分家,路成华继承路祖一部分产业,而"老姑娘"两个儿子亦各自为政。长子陈兴龙号华青,系济宁城内的伪镇长,人情非常圆滑,河南道务均握于他手。次子陈兴海乃系堂迂子,世故人情一概不通,自兄弟分家后,不懂生产家计,闹得一塌糊涂。"[②]此后,一贯道遂分裂为三派:以路中节及其子陈兴龙、陈兴海为山东派;郝保山为山西派;张光璧与孙素贞为一派。1930 年路中节死后,道统传与其子陈兴龙和陈兴海,仍称一贯道,又名"老姑道",此派仅在山东流传,没有大的发展。郝保山也自称十七代祖师之遗托领袖,称"三宝道",主要在山西的介休、汾阳、孝义、临汾等地活动,郝保山颁布有《一贯布道大纲》,更多地保存了路中一的旧规;张光璧与孙素贞一派在济南设立总堂,名为"崇华堂",道名仍为一贯道。[③]

二、张光璧掌道初期

继路中一之后担任一贯道第十八代祖师的张光璧(1889—1947)字奎生,道号天然,后来又称"天然子",被教内尊为"弓长祖师",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十九日生。他家祖居山东济宁县南乡大流店村(今属济宁郊区唐口乡),出生在当地一个地主家庭,有田两顷多,在邻近村庄中堪称富户。父名张永清,母乔氏。张光璧是独生子,自幼娇生惯养,顽皮捣蛋。其父死后,随母亲生活,不听母教,8 岁开始上学,但不好好读书,常常偷闲逃学,到处浪荡胡为,喝酒赌博,是

① 山东济宁市公安局藏《一贯道资料》。

② 武秉谦、于谦:《忻县一贯道》,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605 页。

③ 武秉谦、于谦:《忻县一贯道》,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605 页。

村里有名的"浪荡公子"。虽然读了5年私塾,仅念了一部《四书》。这段记载出于张光璧同族哥哥张光华之手,应当比较可信。[①] 据其子张英誉称,张光璧在16岁时与一朱氏女子结婚,二人生有子女数人,仅有一女儿存活,后因难产而歿。其后,张光璧又与刘率贞结婚,先后生育九个子女,仅张英誉一人存活。

张光璧于1915年26岁时,投入北洋军阀的江防营当兵,因身体魁梧,不久被选拔入北洋军阀张勋卫队充当卫兵。张勋是以其发动反对共和,复辟专制帝制而臭名昭著。张勋复辟失败,张光璧只好逃回家乡。经过两年的兵营生活,他已不再愿意留在农村,于是便在济宁城内结交一些纨绔子弟,整天吃喝嫖赌,不几年,他家的祖遗田产竟被他变卖了大半,家业逐渐凋零。1919年,他把最后一点家产变卖以后,用所得银钱在济宁城里永丰街开了一爿三间门面的杂货铺,将全家迁入城内,从此便彻底脱离了农村,成为城市居民。他在经商时因为发财心切,兼营行商,往来于济宁、济南一带,贩运鸡蛋,幻想一举发财致富。于是大量囤积鲜蛋,结果因为在购、运、销等环节上需时过长,加之天气炎热,致使鸡蛋大部变质,以至资金亏尽,店铺倒闭。在穷愁潦倒的情况下,他又突发奇想,企图走升官发财的道路。他通过其襟兄郝凤城(当时在济宁任律师,是山东省参议员)的介绍,于1921年在济宁县警备队当上了一名便衣稽查。这个差事虽然可以欺诈百姓,但是既不显耀,又无大利可图,难以满足他的虚荣心与挥霍需求,不久便离职回家。他把全家搬到皇经阁街赁房居住,生活奇窘,几乎断炊,只能靠借贷勉强维持生活。这时,他结交了当地一些流氓无赖,其中有安青帮的杨桐梅、一贯道的曾兆华等。为了寻找生活出路,他便请曾兆华引见,拜当时正在济宁传道的一贯道道首路中一为师,加入了一贯道。张光璧在入道之初,为了吸引徒众,常常在自己家中招待信徒,生活颇为艰苦。据张英誉称:在他幼年时,"先父(张光璧)回家有时已入深夜,全家已然入睡,家母尚得起身做饭。有时冰雪连天中,先父同胡桂金冒着雨雪,满身泥水,衣衫尽湿。家母一方烧饭,一方烘衣"。当时济宁交通不便,为了到附近各县去发展道徒,张光璧常在"霜晨烈日下,胡桂金推着行李来往奔驰着"。[②] 但是,随着徒众的增加,实力的扩大,张光璧的生活日渐奢侈,野心也随之膨胀。

---

① 张光华:《一贯道大道首张天然》,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575页。

② 《张英誉笔供》,载《一贯道的兴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5—166页。

第三章　一贯道从秘密教门到会道门的蜕变

一贯道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张光璧掌道时期，已经从以往一个秘密教门，逐渐蜕变成会道门，并且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政治野心的地下神秘王国。

一、地下神秘王国的形成

1. 张光璧成为一贯道的第十八代"祖师"

张光璧在路中一死后，就萌发了夺取教权、充当教主的野心。1926年张光璧在济南旧东门里租房开设"忠恕坛"，作为在济南发展道务的基地。1927年夏，张光璧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在嘉祥县杏花村设立"分金炉"，以培养骨干，让窍手通过"借窍"说："张光璧应接天命"，以此来为自己夺取教权做舆论准备。1930年，张光璧迫不及待地要夺取道权，于是利用"坛训"，把路中一遗嘱中有关让其妹路中节掌道12年，改为6年。他让人编造的"坛训"说："道盘已转，天命攸归，路中一之妹掌道十二年，按阴阳合璧，六年即满，路之遗嘱，适届其时。"又说："天时紧急，老母有命，（令张光璧）普渡三曹，人鬼仙一齐渡。上天不留一佛子，西天不留一菩萨，都临凡打说明道。"正式向"老姑娘"夺权。为了避免有"欺师灭祖"和"制造分裂"的罪名，张光璧又利用所谓"上方垂训"，替自己的分裂活动制造借口。据齐铭周称：当时"入道者甚众，迨一九三一、二年间，上方垂训，催促我们师尊到省城（济南）开道，并指示独立门户，与老姑娘脱离关系。（张）痛辞不获，勉强应命，仍用崇华堂名义。自是道运一日千里，而陈大老师处则日益消沉。"①



张光璧
一贯道第十八代祖师

① 《齐铭周自白书》。



孙素贞
一贯道第十代师母

张光璧为了增强实力以便于夺权，便同路中一的女弟子孙素贞勾结在一起。

孙素贞（1895—1975）又名孙慧明、孙明善，道名“广德”，山东单县人，1895年生。早年入过“归一道”，1915年拜路中一为师入了一贯道。未婚的丈夫施继五死后，她曾表示要“立志修道”，并带领单县一些女道徒修持，成为当地一贯道的女“领长”。1925年路中一故后，她到济宁奔丧时与张光璧邂逅相识，便邀请张光璧到单县与她一同办道。张光璧此时正欲夺取教权，为了增强实力遂与孙素贞一拍即合。由于当时孙素贞是个丧夫未久的寡妇，二人在一起在行动上颇不方便。为了掩人耳目，二人便想出一个“奉路祖之命”“天作之合”的妙计。据张光璧的第二个妻子刘率贞称：“孙素贞男的叫施继五，死了不久就嫁了，还穿着孝。”另据一贯道内重要道首徐秉钧即徐衡甫在20世纪50年代供称：“其（指张光璧——引者）二老婆孙月慧五十多岁（道中称为月慧菩萨），单县人，其实还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女人。她本人系单县县大队列兵（二十年前）的老婆，她还是后续的，虐待前有女孩。其夫死后，被张天然看中，即说神定有缘，需要帮助办道，因此即相结合。”①

1930年张光璧与孙素贞在单县西关一王姓道徒家中开设所谓“八卦炉”的“法会”，以训练道内骨干。张光璧趁此机会，唆令“天才”金宝林扶乩，假借路中一的名义，发出一道“坛训”：“奉上帝命，由无极老母主张，金公祖师做媒，张、孙应结为夫妇，日月合璧，乃天作之合。”二人为了避免有奸夫淫妇之嫌，还演出了一幕幕推辞不受的闹剧。据齐铭周供称：“迨1930年间，在单县西关王姓道亲家中成立研究班，上方定名为八卦炉。其时张老师与孙师母等皆参加此炉，共相砥砺。事未完毕，路祖降批训，并借窍宣称，奉上帝命来作伐，着我们师尊师母二人成亲，以了前因，而办将来之道务。”为了掩人耳目，张、孙作了如下表演：“时二人痛哭叩恳誓难从命，饮食不下，哭辞数日，未能解决。”“路祖屡来催逼，云是天道逆行，违天不祥，必须如是方可。然师尊师母决绝难从，已成僵局。

① 《徐衡甫供词》。徐衡甫称孙素贞为张光璧的“二老婆”不确，张光璧的原配朱氏早亡，刘率贞为其第二个妻子。

时太师母为此事忧虑万分，曾煞费脑筋，以信仰天命弥笃，终于毅然代为应承，始克解决。”[①]又据一贯道主要道首潘华龄称：当路中一坛训让张、孙二人结为夫妇时，“孙素贞坚决不答应，就去上吊，当时吊绳断了两三次。孙想天意不可欺，没有办法，后来也就答应了。”这个深悉个中真相的潘华龄解放后证实说：“孙素贞不惟用这等等的鬼话来掩盖他们的丑恶面目，而且自述与张光璧是清白的名义夫妻，用这些骗语来骗取人家对他的尊重，好当道首，易惑人心。”[②]

尽管张、孙二人利用“坛训”并作了种种表演，却难以瞒过那些道首和骨干的眼睛，使得当时道内舆论哗然。人们纷纷议论，对于张光璧本来已经有妻子刘率贞，又身为道内首领却引诱刚刚死去丈夫的寡妇孙素贞为妾，加以耻笑。以至“舆论大哗，哪有佛门善道奸骗寡妇女人者？尤其孙之亲戚、族人，更为愤恨，扬言要处置他们。”[③]张、孙二人因为受到当地舆论的谴责，难以容身，只得前往济南发展自己的势力。[④] 从此，一贯道便分裂成了四派：一派是以路中节、陈化清母子为首的“老姑娘派”，主要分布在山东济宁、曲阜及河南巩县一带；另一派是以郝宝山（郝震东）为首，主要在山西孝义、介休、太原、汾阳、临汾等地活动。郝宝山是山西汾阳人，1913 年在山东拜路中一为师加入一贯道，成为路中一门下的主要大弟子之一。1919 年他奉路中一之命，返回汾阳办道，翌年被路中一任命为点传师。在张光璧自任道首和“十八代祖师”后，郝宝山对张、孙二人的行为十分气愤，拒绝与之合作，他还以正统自居，也自称十八代祖师，倡立“白阳一贯道”，道内称之为“遗脱领袖派”。1932 年在山西孝义县成立总佛堂，由郝宝山自任领长。第三派是以褚敬福为首的济宁地方派，势力较小。四派当中以张光璧、孙素贞为首的“师尊派”势力最大，最初主要活动在鲁西南及济南市，以后逐渐发展到全国，张、孙二人也就成了全国一贯道的总首领。张光璧为了在道内树立自己的权威，以区别于路中一时期的一些做法，他首先把路中一时期尊奉的十四代祖师，由金祖林一秘，改为姚鹤天。他还改变了路中一时期的称呼，如把“领长”、“代表师”改成“点传师”。又授意天一坛的“天才”把原来

① 《齐铭周自白书》。

② 《潘华龄自白书》。

③ 张光华：《一贯道大道首张光璧》，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576 页。

④ 宋光宇：《天道传灯》（上），台湾三扬印刷企业有限公司，第 56 页。

的“合同手式”也做了更改。原来的合同手式是右手在外，左手在内，双手环抱。改为左手在外，右手在内，左手搭在右手背上，两手放在胸前。

张光璧与孙素贞二人勾搭成奸的丑闻，在济宁道内遭到强烈谴责，以致使得二人难以在济宁安身，只得于1930年躲往济南开辟新的地盘。张光璧与孙素贞带领亲信徒弟胡桂金、阎步隆、马玉华等人，来到济南，正式打出一贯道“十八代祖师”的名号，自称“济公活佛下凡，奉天承命，普渡三曹，平收万教”，“渡尽九二原子归根认母”，“办理末后一着急收圆”。并且又以道内原有“三十年前师度徒，三十年后徒度师”的传统为据，自称当年路中一渡他为徒，现在应该是他渡路中一为徒了，所以他应当成为十八代祖师。为了替自己充当“祖师”作宣传，张光璧还让手下人传出“坛训”：“渡万国九州岛，渡尽九六方罢休，三期末劫一贯传，领命祖师张天然，九六佛子哈哈笑，携手同登返理天。”

2. 张、孙结合：地下神秘王国的形成

张光璧尽管打着一贯道“十八代祖师”和“济公活佛转世”的招牌，最初在济南传道也并不顺利，入道者寥寥无几，手下仅有少数几个人。据张英誉称：“济南入道较早者是李麟斋，高唐人，起先在他家办道。同到济南的除先父外，还有我的庶母孙素贞，还有南阳的马玉华、济宁的王学尊。”后来在济南宽厚街栗振鲁家中开设了佛堂，以后又有徐衡甫、齐铭周、宿子臻等人建立佛堂，为在济南发展道务打下基础。当时跟随张光璧的，还有胡桂金，为他家做饭，阎步隆帮助传徒。张光璧与孙素贞住在东城根街，在那里设立中枢坛，称为“忠恕坛”，对外称“崇华堂”，作为总佛堂。这时，张光璧逐渐开始在上层社会中发展道徒，重要的有：拜把兄弟、商人宿子臻（宿志真），济南李洪臣（李麟斋）、盐商栗振鲁（号仲肃）、曾任低级军政官员后经商的齐铭周，以及曾经当过嘉祥县县知事的中学教师徐衡甫及中学校长郝书暄等人，作为道中的骨干。经过几年的发展，济南逐渐形成了四个大坛：“南坛”即“礼化坛”，设在纬一路的福增里，以徐衡甫为坛主；“东坛”即“敦仁坛”，设在东门外的后坡街，由郝书暄任坛主；西坛即“金刚坛”，设在永庆街，由李洪臣任坛主；北坛即“天一坛”，设在西擀面巷，由齐铭周任坛主。各坛的名称是张光璧按照八卦所取的。如东方为甲乙木，属仁，故东坛称为“敦仁坛”；西方为庚辛金，属金，故西坛称为金刚坛；南方为丙丁火，属礼，故南坛称“礼化坛”；北方为壬癸水，天一生水，故称“天一坛”。1934年宿子臻又在济南城内芙蓉街金菊巷成立“明德坛”，并自任坛主。1935年李洪臣死后，金刚坛停止活动，便由明德坛取代其

地位，成为济南的四大坛之一。

1935年，济南离化坛的主持徐衡甫到山东青岛，引渡了他的好友董玉泉入道。董玉泉早年曾在青岛日本租界的警察局当过巡捕，又当过青岛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后来弃官经商，在青岛开设一家“杏林堂大药房”，兼营“玉华报社”。入道后因为办道积极，且善于交际，三教九流中，皆有朋友，故颇受张光璧的青睐。他于1935年3月，在药房的楼上开设佛堂，后来成为青岛的总佛堂。到1939年为止，董玉泉陆续在青岛开设了以下一些佛堂：

董氏佛堂：1936年5月成立，位于胶州路82号楼上，堂主董玉泉；

高氏佛堂：1936年3月成立，位于嘉祥路观海楼楼上，堂主高学礼；

东镇公共佛堂：1938年3月成立，位于东镇历城路16号，堂主许晓云；

李氏佛堂：1938年5月成立，位于安徽路28号2楼，堂主李星成；

许氏佛堂：1938年5月成立，位于山东路25号，堂主许书年；

沧口佛堂：1939年9月成立，位于沧口保合号公纱厂隔壁，堂主王化周。

在道务有了一定基础后，董玉泉又派点传师到各地去传道。其中有江苏人李性澄，于1939年10月将一贯道由青岛传入威海，发展伪看守所所长张昆泉、盐务处主任姚金坡，在联合里设坛。1937年张光璧、孙素贞来到青岛时，对董永泉在青岛的表现十分满意，遂将他放为“点传师”，几年后又升任道长，代表张光璧在青岛执掌道中大权。[①] 由于董玉泉的积极活动，从1935年到1949年，一贯道在青岛共发展了108名点传师，设立了4个分坛，8个直属坛，62个支坛。董玉泉还在胶县、高密、即墨、潍县等地，设立了41个分坛，发展道徒11万多人。其中有不少是当时的富商、士绅或军政人员。

总的看来，一贯道在山东的发展，是以济宁、济南及青岛为中心，然后再向其他各县市发展。经过张光璧及其亲信、骨干的积极活动，使一贯道从济南、青岛发展到山东全省。这时，他便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神秘王国并进而夺取政权，妄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专制王国。

---

① 白季恺：《我在一贯道之经历》，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582页。

二、一贯道的教义和活动方式

1. 所谓“道统”

一贯道是从清代青莲教分裂后逐渐形成的，因此它继承了青莲教的所谓“道统”。不过，它为了标榜自己源远流长，又对青莲教的道统作了篡改。关于道光年间青莲教的“道统”，据陕西巡抚李星沅奏称：“李一源即依微子素习青莲教，以达摩为初祖，供奉无生老母。”“据张利贞供，原名周位抡，湖南清泉人，道光十三年拜吕文炳为师，演习坐功运气，亦以达摩为祖，至十二祖为袁祖。”①那么，从二祖到十一祖又是谁呢？道统的编造者，把佛教传说中的禅宗前六祖，即初祖达摩、二祖慧可（神光）、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奉为自己的前六祖（实际上禅宗前六祖包括北宗的神秀和南宗的慧能）。又把白玉蟾和马道一并列为“七祖”。白玉蟾（1194—1229）是南宋道士，又名葛长庚，字如晦，号海南翁，琼山道人。道承北宋张伯瑞，被道教奉为全真道“南五祖”之一。马道一（709—788）（一贯道称他为马端阳）唐代禅宗僧人，俗姓马，名道一，又称“马祖道一”。因为曾在江西弘扬禅学，又称江西马祖。初在四川出家，后随怀让学禅，死后被唐宪宗敕谥“大寂禅师”。道统编造者，把一位宋代道士白玉蟾，同一位唐代禅宗僧人马道一硬拉扯到一起并列为该教“七祖”，实属荒唐。至于八祖罗蔚群，一贯道称他是唐代北直涿郡人，②但是从清末和民国初年云南流传的《罗八祖五部六册大乘真经》来看，罗蔚群应是明代罗教创始人的罗梦鸿。在由“泰然子青阳氏”于清末宣统元年为该经所撰写的序言中称：该经“乃罗公八祖合佛道三藏、儒书四库而一以贯之者也。其名为大乘正宗者，乃罗公苦悟十三年以我有形之性入此真有之境，仍以真有之境而返我无形之性”，“故罗公八祖以人人性受太虚空，即人人都是先天无极大道化生而来的。因之人人可以成仙成佛，为圣为贤。以故分层依次，著此五部六册真经。”③在由黎炳南所作校勘记中称，“查是书内，分苦功悟道真经为第一部，叹世无为真经为第二部，破邪显证钥匙经上下为第三部，正性（信）除疑真经为第四部，泰山巍巍不动深

① 清档《朱批奏折》陕西巡抚李星沅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②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 年，第 54 页。

③ 《罗八祖五部六册大乘真经》序，第 2 页。

根结果真经为第五部。合之共五部六册。”“皆罗公蔚群氏苦功十三年所发明者也。”[①]可见罗蔚群是罗梦鸿的可能性较大。九祖黄德辉，清代宣统元年刊行的《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中对黄德辉生平有如下记载：“黄九祖名德辉，清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八日生于江西饶州府，雍正十年开创金丹道，乾隆十五年六十七岁时没世。”[②]一贯道内传说称：“黄德辉道号桥湾先师，江西饶州府鄱阳县人，明天启四年二月八日降生，谓元始天尊化身，自幼德慧双美，佛性不昧，好道心切，九岁得神仙金丹口诀，及长开始授徒。顺治年间在庐山蒙神仙授为九代祖，正式开创先天道。康熙六年制定礼本、愿忏、雷三经，作为阐道章程。康熙二十年归隐，康熙二十九年归西，享年六十七岁。著有《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作为三会收圆凭证。”[③]学者中有人认为黄德辉乃是清代雍正年间江西圆顿教的黄廷臣。[④] 不论黄德辉是康熙时人还是雍正时人，他是个秘密教门中的人物是可以肯定的。总之，青莲教的道统编造者所编初祖到七祖中出现的谬误，乃是因为编造者文化水平不高，尤其是缺乏有关佛教与道教历史知识所致。而八祖与九祖，则是把罗教与圆顿教的创始人拿来充任。正如深悉一贯道内情的张英誉所说：“至于道的系统，因为无正确经传记述，当然传说纷纭，又兼有善于揣摩造作的修道者道听途说，滥加解释，可以说杂乱无章。”“又兼大多数修道人知识有限，附会其说，所以愈演愈奇。”[⑤]不过，青莲教道统中有关十祖以后的“祖师”，倒是皆确有其人。

首先，关于“十祖吴子祥”与“十一祖何若”。吴子祥与何若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清档里保存着有关他们的资料。

我们从清档可知，吴子祥与何若间有着师承关系。嘉庆年间被捕的教徒龙海燕供：康熙六年有素习大乘教之直隶民人罗维行，四传而至西民人何若。另据道光二年吴子祥之侄媳吴张氏供称，乾隆四十八年，吴子祥编造《大乘大戒经忏》及斋单，并用盘装果供神，名“斋盘”。立有天、地、人、神、圣五等名色，取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之义，祛病延年。并以吃斋念经，期在超凡入圣。遂以圣盘

① 《罗八祖五部六册大乘真经》校勘记，第12—3页。

② ［日］泽田瑞穗：《增补宝卷的研究》，日本国书刊行会，1975年，第110页。转引自马西沙：《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98页。

③ 林万传：《先天教研究》，台南靝巨书局，1984年，第130页。

④ 马西沙等：《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04页。

⑤ 《张英誉笔供》(二)，载《一贯道的兴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5—166页。

为首，由吴子祥之侄吴清远供圣盘，何樊英之父何若供天盘。[①] 可见吴子祥与何若确有师徒关系。再从青莲教、先天道和一贯道等把黄德辉尊为九祖，吴子祥尊为十祖，何若尊为十一祖来看，黄德辉、吴子祥与何若之间的师承关系也很明确。据《道统宝鉴》记载："吴子祥号静林，乃文昌帝君化身，于康熙五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降生于江西抚州府贵溪县，遇九祖在江西说法度人，遂参拜九祖门下。"这里所说的"九祖"，便是一贯道所说的黄德辉。关于何若，《道统宝鉴》写道："何若号了苦，生于乾隆年间三月初九日降诞。世居江西广信府贵溪县南乡石林三板桥。""生性好静，意淡名利，立志修道。忽遇神童传以采取功夫，授以大药丹法。又遇吴祖心投意合，同修同徒，给经十二本，内载《榜文》。"[②]可见，吴子祥确实与罗维行一支大乘教有密切关系，说明吴子祥作为一名姚门教的骨干，这时又接受了来自北方的罗祖大乘教，并把教名改称"大乘教"。

其次，关于"十二祖袁志谦"、"十三祖徐继南(阑)、杨守一"。

大约在徐继南、杨守一担任教首时期，青莲教编造出了以达摩为祖师，袁志谦为十二祖的"道统"。据《道统宝鉴》记载：在徐、杨被捕后，袁志谦又一度重掌道盘。道光十五年袁志谦故后，暂时由陈玉贤代理教主。这时，教内十分混乱。道光二十三年，李一元与陈文海、彭超凡、林祝官等人在汉阳孟家巷设坛商议整顿教务之事，并在武昌洗马池改立新坛，"请袁祖降乩示"，出现了所谓"五老掌道"时期。他们把无生老母改称"瑶池金母"，尊徐、杨为"十三祖"。[③] 道光二十五年，青莲教再次遭到破获，陈文海与李一元被逮捕后处决，彭超凡继任教首。咸丰八年彭超凡去世，由林一秘接掌教权。林一秘性格柔弱，手下头目争权夺利。同治四年，教内曾子评另创圆明道，黎国光自称接续徐杨为"十四代祖师"，姚鹤天也自称接续徐杨为"十四代祖师"。但是这些皆未得到正式承认。光绪年间山东人王觉一拜姚鹤天为师，建立东震堂，自称十五代祖师，不过他并未把姚鹤天尊为"十四代祖师"，仍然尊"金祖林一秘"为十四代祖师。后来，王觉一的弟子刘清虚成为十六代祖师后，并正式改称"一贯道"，并确认了上述"道统"，刘的弟子路中一也就成了一贯道十七代祖师。

---

① 《朱批奏折》江西巡抚阿霖折，道光二年七月初一日。

② 《道统宝鉴》，转引自王见川《台湾斋教研究之一：先天道前史初探——兼论其与一贯道的关系》，载《台北文献》第108期。

③ 庄吉发：《清代青莲教的发展》，载《大陆杂志》，第71卷第5期。

总之,从历史实际来看,一贯道的所谓"道统",真正可信的是从黄德辉开始,在此之前的所谓道统,皆是为了抬高自己身价而编造出来的。

民国初年到1930年期间,一贯道在路中一和其妹"老姑娘"路中节掌道时期,一贯道仍沿袭青莲教关于尊达摩为初祖,直到徐杨为十三祖,林一秘为十四祖的道统。到张光璧时期,他为了表示该道源远流长而把儒家所推崇的帝王,如:太昊、黄帝、帝尧、帝舜、大禹、成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奉为"祖师",实际是拉大旗作虎皮,借以吓人。为了标榜"三教合一",又把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奉为"祖师"。并且把十四代祖师从林一秘改为姚鹤天。还编造出一套说法:"未有天地,已有此道,伏羲氏出,仰观俯察,究天地之胜利生理,而画先天八卦,以显天地之奥妙,此为大道降世之始,继由轩辕氏遇广成子指点,大道始得阐明。嗣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继续道统,心法相授,一贯相传。周初道祖老子降世,发扬道宗,东渡孔子,复由孔子传之曾子,一贯名称已载在经传。以后辗转递传,忽隐忽现。迨至宋朝,希夷首出,濂洛关闽,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相继而起,真宗赖以复昌。然而运不相逢,究未得继道统。因为孟子以前业已盘转西域,释教接衍,所以宋儒虽然辈出,不过应运阐发道旨而已。西域自释迦佛渡大弟子迦叶,单传至二十八代为达摩。梁武帝时,达摩初祖西来,真道又得一脉相传。至十五代祖王觉一归空时,瑶池金母降坛批示,东震堂改为一贯道。再传至十六代刘祖。遂转东鲁,三教合一。十七代路祖应运普传,现在弓长师,奉承道统,继续办理末后一着,此一贯道发现时期之沿革也。"①

2. 供奉的神祇

一贯道标榜"三教合一"和"万教归一",因此所供奉的神祇,也是杂乱无章,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最主要的神祇有以下几个。

无生老母

一贯道最主要的神祇,全名是"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又称"无极老母"、"育化老母"、"维维上帝"、"明明上帝",简称"老母"。一贯道将"母"字横写做"中",按照一贯道的说法,把申字拆开是口和1,加上两点。口便是0,两点表示太极的阴阳鱼。"1"又叫做"一画开天",其义曰"无极",即至极而无以复加的意思。又因为无极有生育天地万物和人类之功能,是

① 张光璧等:《一贯道疑问解答》,台北县正一善书出版社再版,1937年,第2—3页。

由无形而生有形，因有形而有名，是为母，所以又称为“无极老母”。无极既然能生天地万物，故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因此又称为“上帝”。又因人类降生之初，具有灵性，极为光明，后因为物欲所蔽，失去本来灵性，故如欲恢复本来灵明，必须去恶为善，清心寡欲，使灵明恢复，所以又称“明明”，也就是《大学》所说的“再明明德”的意思。① 其实，“无生老母”这个神祇，并非一贯道所创造出来的，而是来自明代产生的罗教。

济公活佛

按照一贯道的说法，济公活佛乃是无生老母派遣到尘世执掌教盘的祖师，张光璧从路中一之妹路中节手中夺得道权成为一贯道十八代祖师后，便自称“济公活佛”转世，因此，济公活佛在道内的地位，几乎不下于无生老母。他的别名有不下二十余种，如“济公禅师”、“活佛师尊”、“西湖道济”等，简称济公。济公即道济（1148—1209），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南宋僧人，原名李心远，字湖隐，号方圆叟，世称“济公”。他是台州（今浙江临海）人，曾从杭州灵隐寺佛海远禅师出家。平日不守戒律，嗜啖酒肉，醉则与孩童嬉戏于沟壑间，举止如痴如狂，被称为“济癫僧”。后世佛教徒把他神化为罗汉，世人称他为“济公活佛”，小说《济公传》流行后，他在民间更为有名。张光璧为了神化自己，便自称“济公活佛”转世，借以欺世盗名。

弥勒古佛

一贯道称弥勒佛也是无生老母派遣到尘世执掌“天盘”的祖师，在一贯道内，他的地位比济公要高，但是却没有济公活跃。他的别名有“金公祖师”、“白阳教主”、“通理子”、“大肚金公”、“儒童祖”、“儒童金公”、“布袋罗汉”，简称“弥勒佛”。其实，弥勒佛原是佛教的神祇，弥勒是梵文 Maitreyad 的音译，也译作“弥递隶”、“梅怛丽药”等，意译为“慈氏”。此为姓，名为“阿夷多”。按照佛教的说法，他出生于婆罗门家族，后来成为释迦牟尼的弟子，他将在释迦牟尼生前命终时上生兜率天，经过 56 亿 5 千万年以后降生人间，在龙华树下成佛。所以，他乃是释迦牟尼之后的未来佛。他降生人间后，尘世将出现一个到处充满光明，人民过上丰衣足食，欢乐幸福的日子。② 这一说法来源于佛教的《弥勒下生经》，不过该说法在印度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传入中国后，特别是魏晋南北

①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 年，第 36 页。

②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卷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589—604 页。

朝时，由于战乱频仍，人民向往太平生活，弥勒降生说才在民间盛行起来，并且成为农民反抗统治阶级的工具。他们打着弥勒佛降生后将会出现新世界的旗号，进行反抗活动。明清两代秘密教门便以弥勒佛降生相号召，进行反抗斗争，这一思想后来又为会道门所继承，成为其反抗世俗政权的工具。

一贯道因为标榜"三教合一"、"五教归一"，所以把佛教的神祇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及达摩、八大金刚、四大天王等加以供奉。除佛教的神祇外，还把道教的老子、文昌帝君、三官大帝以及城隍、土地，道教传说中的"八仙"：吕洞宾、李铁拐、何仙姑、钟离权、韩湘子等。道教中人物，如白玉蝉、邱长春（丘处机）、张三丰等。把儒家的孔子、孟子、曾子、子路、子思、颜渊等，皆加以崇拜。此外，还把中国通俗小说中人物，如《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关公、孔明、关兴、关平、周仓等，《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作为供奉的神祇。为了标榜"五教合一"，又把基督教的耶稣、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也奉为自己的神祇。

张光璧不仅自称"济公活佛"，而且把孙素贞封为"月慧菩萨"，使她成为一贯道崇拜的"活佛"。另外，张光璧还把已经死去的两个儿子张茂田、张茂猛分别封为"镇殿将军"和"镇殿元帅"。张茂田因身兼"三天考试院长"，故又称"三天考主"。所谓"考试"，就是指老母的"魔考"。张光璧的女儿张茂金被封为"教化菩萨"。

3. 主要"教义"

一贯道标榜"三教合一"、"五教合一"和"万教归一"，所以，把儒释道三教，再加上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教义，加以选择，把其中符合自己需要的内容，拿来作为自己的"教义"。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无生老母信仰

明清时期所有秘密教门皆把"无生老母"供为主要神祇。在青莲教时，一度将对无生老母的崇拜，改为对"瑶池金母"的崇拜。一贯道产生后，又把无生老母供为主要神祇。到张光璧掌道时，又给无生老母加上了"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的尊号。并宣称人间的众生皆是"无生老母"的儿女，共有96亿，称为"原人"，与"无生老母"生活在无极"理天"，无忧无虑，无比快乐。在天地生成后，原人降临人间，在人间流落了6万多年，因为迷恋红尘，轮回生死而忘却归家路。如今时届"三期末劫"，天地即将毁灭，大劫即将来临，理天的"无生老母"万分着急，终日流泪满面，盼望在红尘的儿女早日回来。于

是降下大道来搭救原人，诸天仙佛纷纷下界搭救原人。张光璧领命为一代明师，担任普度众生的任务。他所传的道，就是"玄关法门"，只要他一指点，开玄关一窍，就能超了生死，返回无极理天。

"三期末劫"说

一贯道所说的"三期末劫"实际上来源于明清时期的"天盘三副"说。张光璧等在《一贯道疑问解答》中解释说："自开天辟地以至天穷地尽，其间谓之一元。一元共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会。一会有一万八千年，每会因气象之变迁，而有数期之劫运。现在午会告终，未会始起。自开天以来，共有六万余年，已有三期之分。第一期曰青阳劫，应于伏羲时代，第二期曰红阳劫，应于文王时代，第三期曰白阳时代，应于午未交替之际。每期道劫并降，以便善良之人进入道中，恶孽之辈打在劫内。溯自寅会生人，以至于今日，众原子生生死死，贪恋红尘假景，迷失本来灵性，既不知从何而来，复不知寻路而归。愈生愈迷，愈迷愈坏。世风衰微，人心险诈，已达极点。因之酿成空前未有之大劫，故曰三期末劫。"由"无线痴人"撰写的《一贯道新介绍》又补充说："青阳时期，燃灯古佛掌天盘，红阳时期，释迦文佛掌天盘，白阳时期，弥勒古佛掌天盘。"如此，便把明清以来的"天盘三副"说，演绎成了"三期末劫"说。而这一说法的本质，就是要"改换世界"，夺取世俗政权，由一贯道道主登极称帝，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王国。

"三教合一说"

"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我国由来已久，而且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统治思想的支柱。一贯道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便也标榜自己信奉儒释道三教合一。可是，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乃是为巩固历代国家政权服务的，而一贯道却是企图推翻世俗政权，建立神权统治，是同真正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教义相背离，于是一贯道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改造和歪曲。

一贯道首先按照自己的需要，对"三教合一"加以解释。张光璧等在《一贯道疑问解答》中说："三教原是一理所生，虽分门别户，言论各有不同，然而究其实际，概属一理。故三教具是因时而设，应运而兴。无非代天宣化，挽救人心，化恶为善，化莠为良而已。况道家以虚无为本，注意保养虚灵，返回无极。释家以寂静为根，注意返观静寂，灭除杂欲。儒家之明明德，则注意私欲净尽，天理纯全。天理就是至善，亦可说他是静寂。静寂便是无极，无极便是真理。三教

宗派皆由无极一理而生也。”“虽三教之传法不同,要皆以一为本源,自是由一理而化三教,犹人之一身而分有精气神焉。现在三教合一,乃收元之象,犹之返本还原,具为不昧之灵性,则又合为一也。”[①]按照张光璧等人的说法,儒释道三教原来都是“一理而生”,而这个“理”,就是“无极”。他又假借老子对于“道”的解释,把“无极”这个理,说成是“未有天地”就已经存在的“道”,它在形成后,从伏羲,经轩辕、尧舜禹汤周公等,后来到老子以后才分为儒释道三教,一直传到王觉一时,又“三教合一”,改称“一贯道”。说来说去,儒释道三教皆是从“未有天地”以前就存在的“一贯道”分化而来,成为儒释道三教,到王觉一时才又把三教合而为一成为一贯道。这些说法完全是对儒释道三教合一说的歪曲和伪造。三教合一本来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教化的手段与工具,是为维护正统主流社会的正常社会秩序服务的。秘密教门和一贯道,作为一种以宗教信仰为掩护的民间秘密结社,则是与正统主流社会相对立,一直要取而代之的,因此,秘密教门和一贯道绝不可能真正信仰儒释道三教合一,只能是歪曲和篡改三教合一。

“理气象三天”说

一贯道把宇宙分为“理天”、“气天”和“象天”三个层次。所谓“理天”又称“无极理天”、“极乐理天”,乃是“无生老母”居住的地方,也是入一贯道者将来的归宿。它处于地球大气层的外面,既没有空气,也没有地心吸引力,只有无穷无尽的善与美。在《圆觉浅说》中解释说:“理天是灵性本居地,亦是吾人之故乡,无极老母为主的至清至静、至灵至明的西方极乐世界。无形无象,为佛仙圣真之域也。”张光璧解释说:“理天就是真空,没有形色,没有声嗅,只是一团虚灵。潜的时候至虚至灵,寂然不动,大无不包。现的时候,至神至灵,感而遂通,微无不入。虽是没有行色,而能生育形形色色。虽是没有声嗅,而能主宰声声嗅嗅。虽是视之弗见,听之弗闻,却是物体不遗,没有生他的,他也不死不灭。他是永远灵明,永远存在,并且永作万类的根本。无论气体物体,都没有脱离他的可能。万物生存,他固然生存;万物消灭,他仍然存在。”其实,说来说去,也就是罗教所说的“真空家乡”。罗教自从创造出“无生老母”这位宇宙的创造者和人类的始祖以后,总要再给她安排一个住处,于是又创造出所谓“真空家乡”,既是无生老母居住和创造人类的地

① 张光璧等:《一贯道疑问解答》,台北县正一善书出版社再版,1937年,第29页。

方，又是流落到尘世的96亿“失乡儿女”将来最后的归宿。一贯道从罗教那里引进了这个概念，不过把它改称“理天”而已。

“气天”是乃是仙佛居住的地方，它处于大气层的里边。人们入道后如果能够修成仙佛，就可以居住在那里。不过，那里的仙佛仍然不能享受到理天的清福，而且仍有可能堕入轮回。《圆觉浅言》中说：“气天是灵性之家乡，亦是为人修成气天客的寄留地，享有五百年之仙位，后来仍然再下凡投为人的。气天是玉皇大帝为主，日月星河斗之气界，有形无象之气天仙域也。”张光璧等也解释说：“气天是宇宙间的气体，普通也称为天。因为气体是轻清的，地是重浊的，轻清属阳，重浊属阴，阴阳对待即为乾坤。乾为天，坤为地，我们常说‘天地万物’，这个天就是气天。”

“象天”就是现在人们居住的尘世。《圆觉浅言》中说：“象天是吾人之业地，亦是吾人所居住地球上的旅社，有男有女，有五谷，有鬼神，有六畜，有形有象，有生有死之地界，以人皇为主。”张光璧等也说：“象天就是形形色色，有实质可见的一界。在天日月星辰，在地山川动植矿。换句话说，凡是有形体的物件，无论有情无情，都是属于象天。”一贯道之所以要把宇宙划分为理天、气天和象天三个层次，是为了向人们说明“气天”和“象天”都是要毁灭的，而“理天”则是永恒的。人们为了脱离轮回之苦，摆脱“罡风大劫”，就只有加入一贯道，进行修炼，以达到超升“理天”。

“三曹普度”说

三曹普度也叫做“三曹齐度”，是张光璧掌道时期才出现的说法。所谓“三曹”，就是指天曹、人曹和地曹。在《一贯修道须知》的序中说：“夫道者，三曹中至尊至贵之事业，非至善不足以契合，间有三乘之义：化愚为贤，化贤为圣，化圣归天。又有三乘之位：明理者为仙佛圣，守理者为贤哲，背理者为凡庸。又有三乘之别：上度河汉星斗，中度有情万类，下度九幽亡魂。”[①]李世瑜先生认为这段话乃是一贯道给三曹普度所下的定义，但是尚缺少如下内容：“所以能度三曹，是因为老母当此三期末劫，大发慈悲，欲唤回她留在气、象二天及地狱中的九十二亿原子，故而颁下此令，不但将道降人间，又借人的力量超拔气天仙佛，及地

---

① 郝宝山：《一贯修道须知》，第1页。转引自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年，第56页。

狱中的有缘亡灵。凡在人间未能赶上大道降世的,都可以寻访有缘而代为超拔。"[1]张光璧等人在《一贯道疑问解答》中,对"三曹普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该书写道:"一贯道普度性灵之范围极广,上可以度天上河汉星斗,中可以度人间芸芸众生,下可以度地府幽明鬼魂。此之谓三曹普度。"并且进一步解释说:"此时正应三期末劫,三佛治世,故有三曹普度之事。盖以过去修行之客,炼气之士,而未遇上天开恩渡回超入理天者,以及忠臣孝子烈女节妇,死后岂能淹没。虽可升为气天之仙,或为鬼中之神,然如不得天道,仍是难脱轮回之苦,不能达本还原。现逢三期末劫,天道普度,故气天诸仙,常有随神佛到坛,或到处显化,找寻前世有缘之人,担任保引,代缴功德费,由师尊再请南极祖师检定,并核准应缴功德费数目,始可借用人窍点玄,以期求得天道,返回理天,永脱轮回。"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明确,就是让那些"修行之客"和"炼气之士"明白,即使那些忠臣孝子、烈女节妇,虽然可以上升为气天之仙,或成为鬼中之神,如果不加入一贯道,仍然难脱轮回之苦,更不能"达本还原",也就是升入理天。如今人们遇到了好机会,"师尊"张光璧正寻找"前世有缘的人",并且自愿担任"引保",还"代缴公德费",只要你肯把气天诸仙为你代交的功德费交到一贯道中,"并核准应缴公德费数目","师尊"就可为你"点玄",让你"求得天道,返回理天。"因此,能否"达本还原,返回理天,永脱轮回,"关键在于你是否交纳了应缴的公德费。这就是所谓"上度河汉星斗"。而所谓"下度幽明鬼魂",则是说每个人死后"尤须行深超拔亡灵之功",如此才能"永脱轮回之苦,享受理天之清福"。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由当子孙的来进行。子孙为了让祖先永脱轮回之苦,返回理天享受清福,第一是要"修道有恒",但关键还是"代缴公德费"。所以,一贯道所宣扬的所谓"三曹普度",实质是要道徒们掏钱。所谓"三曹普度"不如称为"三曹普交功德费"更为贴切。

"道降庶民说"

一贯道宣扬,在青阳时期"道降君王和师儒",得道的人除了帝王皇室以外,都是儒门弟子,如轩辕、广成子、尧、舜、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到了红阳时期,真道就不在中国,已经由老子出关带到西域,在那里由释迦牟尼另起一个道派,得道的都是佛家子弟,中国方面虽然各代中名儒辈出,不过是应运阐发道

---

①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 年,第 56 页。

旨，直到梁武帝时，达摩东渡，真道才又回来。从达摩传了十六代，结束了红阳时期，白阳期自路中一祖再传至弓长祖师，才脱离了“单传单授，而大开普渡，把道传给“庶民小子”。[①] 这一说法的基石，也就是所谓“老子化胡说”。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所谓“老子化胡说”，无论是道教徒出于贬低佛教，还是佛教徒为了适应在中国流传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都是人为虚构的，历史并不存在老子到西域化胡一事。张光璧利用这个传说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如今一贯道正在“大开普度”，所有平民百姓，皆可以入道，而且说不许接近“国公卿相”等社会上层。但是，实际上张光璧在日本侵华时期，不仅大力勾结日本侵略者，而且把汪伪集团的大人物，如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等人拉入道内。日寇投降后，一贯道又勾结国民党上层，把于佑任、居正等人拉入道内。可见，一贯道所谓“道降庶民”也是为了骗人入道的工具。

4. 歪曲儒家经典

一贯道为了吸引信徒，尤其是吸引那些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大力宣扬自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和倡导者，特别是对儒家思想十分推崇。那么，一贯道究竟是如何维护和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呢？让我们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解释儒家经典的。

如果说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对儒释道三教经典进行了改造和利用，那么，一贯道对儒家经典的内容，则完全是歪曲和进行庸俗化的解释。其中有些是肆意歪曲，有些则是望文生义，胡说八道。李世瑜先生在《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一书中，根据道内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举出以下例子，现转录于此。

如：对“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歪曲。

一贯道对这段话作了如下解释：“解曰：子，就是一了也，一了百了，无思无虑，私欲净尽，天理纯全；即不睹不闻，无声无臭之理天也，无形无象无极之真空也。曰，就是口得其一也，口得其一即能言也，有声有色也，有声有色即太极气天也。有寒有暑，万物消长，变而有常之气天也。此气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始终。学，学得一贯道真传也。说，读为悦，此圣人之道微乎其微，不可轻得而

①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 年，第 57—58 页。

闻之也。必待学而时习之，真心求明师一点，不用文字，口口相传，然后得其至悦之工也。有朋一句：远方之人闻其圣贤之道脉，一贯之心法，四方有志之士，望风来归，人我一贯道，作一新道亲以为圣贤宗脉，故乐之也。人不知以下：人不知是不知之人也，不知之人见远方人常来常往，俱生疑心，不知所干何事，殊不知吾一贯道理微道大，平世小人何能知之，小人修成圣人，那有此理？圣贤修身性命之学，那能知之，故彼辈常出言毁谤吾一贯大道，吾辈不加愠怒，不亦君子乎？"①

一贯道对《论语》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句的解释，不仅是使用了明清以来秘密社会惯用的"拆字法"，把每个字拆开，胡乱解释，而且用一贯道的那些歪理加以附会，十分荒唐。如"子曰"就是"孔子说"，并无其他含义，而一贯道却用同他们的所谓"理气象三天"的"教义"加以附会。至于对"学"的解释就更加可笑了。他们把"学"解释成"学得一贯真传"，把"有朋自远方来"解释成"四方有志之士望风来归，人我一贯道。"如此解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贯道是如何歪曲儒家经典的。一贯道在清末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如何会要求弟子去学清末才出现的"一贯真传"？那时的"四方有志之士"如何能"望风来归"清末以至民国年间的一贯道？而对这句话的解释中还说："小人修成圣人，那有此理。"这同他们所宣传的"三曹普度"和"道降庶民"又完全矛盾了。

一贯道把《论语》中："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一句，歪曲成："孔子说我现在所传的道就是一贯道，曾子说：是。"也同样荒唐可笑。孔子所说的"道"，固然有许多含义，主要是指他的思想和学说，当然也包括当时一般的道德规范，但是绝对没有指一贯道的内容。道理很简单，因为孔子时代，连佛教尚未传入，道教也未产生，至于标榜三教合一的一贯道，更谈不到，孔子怎么会说"我现在所传的道就是一贯道"呢？

再如，一贯道对孔子所说："谁能出不由户，不一君子乎？"竟作了如下解释："按'户'字本是'尸'字加上一点，吾人之未得道者，虽生犹死，与尸无异，所谓行尸走肉。如果得到斯道——一贯道，受过咱师一点，就等于尸字加了一点，于是成了超凡入圣直达天理的门户。"如此解释，无异于街头骗人的算命占卜者愚

① 一贯道对儒家经典的解释，皆转引自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 年，第 69—70 页。

弄人的把戏。

更为可笑的是，一贯道把《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句，解释成一贯道的"明明上帝"即"无生老母"。"无生老母"乃是明代中叶以后才由秘密教门创造出来的神灵，如何能同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大学》拉扯在一起呢？况且，"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原意是说，学与道有小学与大学之分，大学教人的方法，在于让人明白"明德"即仁义礼智这些固有的道德。不能把"明明"二字连在一起。一贯道把"在明明德"说成"明明上帝"完全是有意曲解。一贯道甚至把《大学》中："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一句，曲解为"欲达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必先自身求得一贯道，然后一家皆入道，是为齐家，每家皆能齐家之后，可望治国。"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一贯道是如何歪曲儒家经典了。

三、一贯道的组织结构

一贯道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会道门组织，它以宗教信仰为掩护，从事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和宣传的活动。为了达到夺取政权，复辟封建专制帝制的目的，它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组织系统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在内部施行严格的封建家长制统治。

1. 佛堂的构成

佛堂"又称"道坛"，就是一贯道的传道据点，在道内术语称之为"法船"、"法航"。"法船"本来是佛教用语，又称"法舟"、"法航"、"慈航"、"慈船"、"宝筏"等。佛教把尘世看作苦海，皈依佛教后，佛法可以度人脱离生死苦海，达到彼岸世界。因此把佛法比作"法船"。一贯道借用佛教的术语，也便把其佛堂称为"法船"，借以向信徒敛钱，建造佛堂，以便在"三期末劫"来临时，把道徒渡回"家乡"。一贯道常常向道徒宣称："建造一座佛堂，就好比造一只大佛船，救度人，也算行了一个大功。"以此向道徒骗钱。而道徒们则以能在自己家里建立道坛为荣，故而争相在自己家里建立佛堂。每个佛堂都取有坛名，一般是设坛时由点传师嘱咐乩手取某个名称，通过请神降坛的方式，由乩手在沙盘里写出，每个佛堂均设坛主一人。佛堂的主要活动就是讲道、扶乩、吸收新道徒、开班、立愿等。

佛堂分为“公共佛堂”和家庭佛堂,公共佛堂规模大小不一,坛主多由有钱有势者充任,或由点传师兼任,领导若干个家庭佛堂。家庭佛堂是最基层的,也就是在道徒家中所设立的佛堂,受上一级坛堂的点传师领导。前者是所有“道亲”皆可自由出入,供道徒们求道、听道及举行各种仪式,进行参拜的处所,大多由道徒集资兴建。后者则系设立于道徒个人家庭内之佛堂,供道徒个人进行礼拜或附近道亲前来礼拜之用。一贯道是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组织,所以佛堂对外是保密的,而且是垂直领导,每个佛堂只听命于上一级佛堂的领导,佛堂与佛堂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佛堂的经费及管理全由所在地区的信徒承担。

一贯道所设全国性佛堂,称为总佛堂或总坛,由张光璧、孙素贞等人把持,各大城市也设有总坛,一般由“道长”,或“领导点传师”负责。各佛堂的主人(坛主)及点传师,定期聚会于总佛堂,共商道务。次于总坛的中心坛称“分总坛”,由一名点传师主持道务,若干名点传师辅佐其传道活动,并培养“三才”。还要领导若干佛堂定期聚会,共商道务。

2. 等级制度:职级

一贯道同历史上其他民间教门一样,内部施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路中一掌教时期,一贯道内分为:老师—领长—代表师—三才。另外还有恩职,即延续青莲教到先天道时期的传统,设顶恩—保恩—引恩—证恩—天恩—同恩。到张光璧掌教时期,已经不再使用恩职,而分为以下等级:

师尊　道内最高教职,是张光璧专门为自己设立的,只有张光璧一人可以担任。张光璧自封为一贯道第十八代祖师,自称“济公活佛下凡”,是代表天命的“正天命”。因此,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代表“天意”,所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触犯了他,便是违犯道规。张光璧还沿用封建社会避讳的制度,在道内凡属涉及他的姓名,皆要“避讳”,道内印刷的宣传材料,遇到他的姓名时,还要另起一行,并且不能直书其名,而是要求写作“师尊”,“天然师尊”、“弓长师尊”等。在当面谈话时,更不得直呼其名,而是称他为“师尊”。

师母　是张光璧专门为他的妻子刘率贞和妾孙素贞所设立的教职。享有与师尊同样的权威。为了区别刘、孙二人,刘率贞又称“大师母”,孙素贞则称“月慧师母”,1947年张光璧死后,孙素贞改称“母亲”。

师兄　本来是道内对张光璧儿子张英誉的尊称,因为张光璧是“祖师”,属于父辈,张光璧手下的道首们便尊张英誉为“师兄”,并非专门设立的道职。

1943 年张、孙间的斗争表面化后,张光璧为了保证教权不落入孙素贞手中,特任命其子张英誉代表他本人,到全国各地办理提拔点传师的"监愿"和"放命"仪式。至于张光璧的女儿张茂金,道内则尊称为"师姐"。

道长 最初并非正式道职而是一种人们对少数在道内资历深、威望高的点传师的一种尊称。1938 年,随着日寇对我国侵略的逐步加深,一贯道在华北迅猛发展,道徒日增,坛主、点传师等各级道首越来越多,许多原来的一般"道亲"或坛主,已经由于发展道务有功,逐渐被提升为点传师或领导点传师。这样原来的点传师或领导点传师的地位自然也要随之提高。于是,人们开始把那些最早跟随张光璧办道而又忠实于张光璧的资深点传师、领导点传师,尊称为"道长"或"老前人"。这些人因为得到张光璧、孙素贞的信任,往往代表"师尊"、"师母"到全国各地监督、指挥办道活动。所以是地位仅次于师尊、师母的领导人,乃是一贯道内点传师中资格最老、威望最高者,他们被认为是从师尊、师母那里领到了"天命"的人,可以代表师尊、师母提拔和训练点传师,领导各地的道首。所以,"道长"或"老前人"必须由张光璧亲自委任或得到他的认可,在张光璧控制下的一贯道,从兴起到覆亡,一共才有过七名正式的道长。原来只有六人,他们是:天津的胡桂金,追随张光璧多年的齐铭周,北平的张五福,青岛的董玉泉,济南的徐衡甫,济宁的张振忠,这些"道长"皆得到了张光璧的默认,并表示以后再不准用此称呼。1947 年张光璧因为添了一个孙儿,非常高兴,于是在成都召见南京的领导点传师孙锡坤时,才又破例把孙锡坤任命为道长。据济南道长徐衡甫称:"(他本人)当道长没有委任,也没有选举,只因常代表张天然办理济南道务,大家称之为道长,实际没有什么道长之权利。"张英誉称:"道长来源由(于)天津,因为天津道亲有不少领命为点传师者,大家认为胡桂金领导我们,均称为点传师,好像上下不分,于是乎就有人提倡尊称胡桂金为'道长',一唱百合,成为定例,后经我父亲认可。称为道长者,第一胡桂金,第二齐铭周,三张五福,四董玉泉,五张振忠。从此以后,老师以下就是道长,道长以下各地领导(点传师),领导(点传师)以下就是普通点传师,点传师以下就是坛主,坛主以下就是道亲。"[①]不过,后来道内把一些资深的老点传师仍尊为"道长"。如台湾的韩雨霖就被台湾的一贯道尊为"道长"。

---

① 《张英誉笔供》,载《一贯道的兴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65—166 页。

点传师　在路中一时代，把代表道首前往各地传徒点道者，称为“代表师”，意思是代表路中一传徒点道。在张光璧任道首初期，仍然沿袭这一称呼。等到他正式以十八代祖师自居后，为了否定路中一时期的一套做法，便把代表师改成了“点传师”，指道内那些受命于“师尊”、“师母”，前往新地方开荒，设坛点道，领导坛主进行道务的活动者。张光璧解释说：“凡替老点传师传道法者，皆称为点传师。”张光璧为了牢牢地控制各地的点传师，最初规定所有被任命为点传师者，一律要先经过“师尊”或“师母”的亲自“点传”，称之为“放命”。以后随着道务的发展，道徒的增多，对点传师的需求日益增加，张光璧与孙素贞二人无法对所有的新点传师亲自进行“点传”，才把“放命”点传师的权力下放给各地的道长或领导点传师。不过，每个地方能放命点传师的名额和放命后的名单，仍需由张光璧或孙素贞批准。在1938年张光璧等写的《一贯道疑问解答》中，预计乾道点传师（男点传师）数额为3000名，坤道点传师（女点传师）数额为600名。实际上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全国的点传师总数已经达到四万余人。点传师也分为不同等级，其中一个“线”或“总坛”的负责人，称为领导点传师；主持“支线”或一个地区总坛道务或资深的点传师，称为“负责点传师”；其余为一般点传师。

三才　又称“乩手”、“鸾手”或“扶鸾者”，包括“天才”、“地才”和“人才”。在开坛扶乩时，由“天才”扶乩，“地才”抄写，“人才”报字。三才乃是一贯道内一些经过长期训练的男女儿童，也是一贯道用来欺骗道徒的工具。三才是从虔诚道徒或办道人员自己的子女中挑选，一般是10岁左右，男女兼收。被选中后，皆要经过一两年严格的训练。训练是在总坛进行，由一名文化较高的点传师负责集中训练。训练之前还要求这些孩童立大愿，如始终吃素，不泄露天机，舍身办道等。如有违背，则五雷轰身，五牛分尸等。训练内容主要是熟读《四书》、《五经》、《成语手册》及《金刚经》、《心经》，并要求能够背诵。此外还要学习诗韵，熟读唐诗宋词，达到能够作四六句、五七言诗，而且要求写出的诗文能藏头露尾，玄虚莫测。每天还要练习站立，手拿乩圈在沙盘上画圈，练习手腕上的功夫。在熟练后，再训练写横字。经过一两年的训练，孩童们一般皆可写一手好字，作出一些佳句，使人感到十分奇妙。

坛主　负责本坛的道务，并协助点传师发展道徒，向道徒收敛功德费。分为总坛坛主、分坛坛主、道坛坛主和家庭坛坛主。每个坛一般设坛主一人，有的

大坛则设有副坛主一人。新设的坛,要由点传师支援开坛扶乩,在沙盘上写出坛名和对坛主的任命。要求坛主熟悉道内的礼仪,对于佛堂内外要勤加整理,保持整洁。对于一贯道内的知识,务求渊博。

办事员 亦称文牍,仅在分坛以上的道坛才设办事员,主要任务是协助坛主管理坛内事务,抄写训文与表文。任用的办事员需经点传师认可。

引保师 是“引师”和“保师”的合称,也就是新道徒入道时的介绍人、保证人,大多由一般道徒充任。据李世瑜先生在《现代华北秘密宗教》解释说:“凡引人得道者曰引师;保证求道人身家清白及入道努力奉行者,曰保师,合称引保师。”①

道亲 即一般道徒,也是道内之人彼此间的相互称呼,男子称乾道,女子称坤道。后入道者一般对先入道者尊称“前人”,或“前贤”,对点传师、前人、引保师自称“后学”。所有道徒对张光璧、孙素贞皆自称“弟子”。《现代华北秘密宗教》解释说:“凡较自己求道早者,不论其年龄长幼,皆尊为‘前人’或‘前贤’。”②

四、主要道务活动

1. 入道和点道

加入一贯道需要有引师介绍和保师担保,填写表文,然后举行仪式,宣誓发愿,包括净身愿和财愿(即捐钱、捐物)并交纳入道费,一人入道要求全家入道。主要仪式是所谓“点道”,各佛堂定期举行,一般道务不忙时,半月一次,忙时一周或半周甚至隔一天举行一次,视入道人多寡而定。整个过程分为七段,即结缘香、献供、请坛、明明上帝九五大礼、降坛批训和讲道。

点道就是接收新道徒,传授“三宝”,点道时先请点传师就位,若请坛系由点传师让坛主代行,则点传师应先献香,行礼后再就位。若系点传师亲自请坛,则不必先献香,仅行礼即可。点道中最主要的是所谓“点玄关”。点玄关被认为是天地人间最大的秘密,是人类灵性的根源,点破玄关窍是所谓会通天人的唯一法门。又说玄关点开之后,灵魂在人死后直升理天。而未曾点开玄关者,死后灵魂由两眼散出,进入轮回。还说玄关乃是智慧的关键。③ 李世瑜曾对此加以

①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年,第89页。
②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年,第89页。
③ 宋光宇:《天道钩沉》,台北元祐出版社,1984年,第95页。

描述：点传师令求道者看老母佛位前之佛灯，谓此灯能上照天府，下照幽冥，是一条归家见母的大路，借此金光照见。俗语谓“借光”。又用长香一支，向灯火引着，用香火向求道者绕一大圈，称为“无极圈”，又将香火向众人直戳，复又抽会，然后熄灭横置于佛灯之上，称为“引路归家”。在戳香时，口中还念念有词："我今指你一条路，洒洒脱脱大路坦"。

点道开始前，欲入道者须先完毕挂号（将姓名年龄籍贯住所登记）及交纳功德费，点道须有老道亲二人即“引师”和“保师”作为介绍人和保证人。点完道后即请鸾垂训，请仙佛解释三宝的意义。降训后为点传师讲训，或讲三宝之奥妙，并鼓励道徒们以后努力渡人。[1]

2. 日常传道活动

每月逢初一、十五，道徒们都要在佛堂集合，举行隆重的献供仪式，用一些水果、素糕点当作供品，并由坛主讲解道义，道徒则要一起焚香、叩首、立愿、忏悔。张光璧在《暂定佛规》中，对一贯道日常的礼仪作了具体规定，主要有：“参辞驾礼”、“早晚献香礼”、“初一、十五献香礼”、“老母大典礼”、“献供礼”、“办道礼”、“开坛礼”、“拜节、拜年礼”等。

立愿是一贯道的一项重要活动，道徒在“修行”过程中，需要立各种的愿，主要有：

得道愿：入道时选读入道愿文，向道宣布如犯天条（泄露道内秘密），则天打五雷轰身。

清口愿：即入道后要素食。

尽力愿：入道后要尽力办道。

轻凡愿：即要轻凡事，重道事。

舍身愿：发誓将身家交给道内支配，每月办道 28 天。

坛主愿：作为佛堂的负责人，有钱的为财施坛主，专门出钱；无钱的为法施坛主，专门跑腿。

领袖愿：分为村领、方领、街领、巷领等，立此愿者均为忠实分子。

领命愿：担任点传师者，必须立顶劫愿，发誓为道不怕流血牺牲，决心到底。

引保愿：是介绍人所立的愿，凡立过清口愿以上者，均可做介绍人。

---

①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 年，第 84 页。

一贯道的愿文共有10条，称为“十条大愿”，内容是：

“求道以后，诚心抱守；实心忏悔（男）、实心修炼（女）；不虚心假意；不退缩不前；不欺师灭祖；不藐视前人；遵守佛规；不泄露天机；不匿道不现；量力而为（男），诚心修炼（女）。

由于佛坛乃是一贯道发展道务的据点和基层组织，所以，张光璧在《暂定佛规》中特别强调佛坛和坛主的重要性，他说：“新进道亲，应当尽力之所及，在可能范围内安设佛堂，每日分早、午、晚三次烧香，诵读愿忏。”并罗列出坛主应遵守的九条规则：主要内容有：坛主应尊师重道，作为道亲的表率；遵守五伦八德，言行须检点，待人接物应谦恭和蔼；对于道亲，无论贫富，当一视同仁；对于男女道亲应如同胞之相亲相爱；对于佛堂内外应勤加整顿，以重清洁；对于各种佛规，应随时讲解，以易于遵守；对于各种书信应妥为存放，分发道亲时应特别注意；对于道亲所渡之人，应预先加以考察，而引保师接引求道之人，亦应首先报告点传师或坛主；对于来到佛堂的道亲，坛主及办事人员应尽招待迎送之责，以表恭敬。

3. **扶乩与飞鸾宣化**

扶乩也写作“扶箕”，因为是神仙驾凤乘鸾，故又名“扶鸾”，是古代一种占卜的方法，卜者观察箕底的动静来判断所问事情的行止吉凶，后来发展为书写。最初的扶乩是以箸插乩上，受术者扶着活动着的乩，使着在沙盘上写字，无须笔墨。后来才改着为丁字形的杆，插笔于垂直的一端，用两手或两个人执着横的两端，在纸上写字。或者不用笔，只弯曲垂直的一端，安置在沙盘上，用两手或两个人执箸横的两端，在沙上书写，随即记录下来。这种迷信活动，大约形成于宋代，最初流行于文人或官僚之间，作为问功名或科举考题之用。[①] 李世瑜先生认为，扶乩是我国唐宋时期发明的，当时仅仅是一种妇女的游戏，通过看它跳动的次数来占卜一件事的凶吉。后来演变成能书画，能作文和诗词，到清代已经在民间十分盛行。当时一些举子们喜欢用扶乩来作诗、对对、猜谜，甚至辩论文体，谈论国家大事，请示试题等。同时一些人也把它用作迷信活动，后来为明清民间秘密教门所采用。张光璧等在《一贯道疑问解答》中对“飞鸾宣化”作了如下解释：“诸天神佛助道，设立鸾坛，由仙佛之灵性，皆人之色身，神人合一，以木

① 许地山：《扶乩迷信底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10页。

笔沙盘，垂示讯章，宣扬一贯真道，以期醒迷觉世，谓之飞鸾宣化。"[①]所以，所谓"飞鸾宣化"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扶乩"，也叫"扶鸾"。按照一贯道的说法，降鸾时乩的运转很快，所有神的旨意完全由它颁降，所以叫做"飞鸾宣化"。一贯道也把扶乩作为"通神"的法器。一贯道把自己的乩称为"先天乩"，原因是他们自认为是仙佛借"三才"的身体来和信众直接沟通，而非经过沙盘或乩笔，因此，又称作"借窍"。另外，他们所使用的乩盘与其他教门也略有不同。一贯道乩盘的形式是：一个长方形的木制槽子，约二尺半长，二尺宽，三寸高，底是用铁或木制成，里面铺着细沙，槽子底下用架子或桌子放着。所谓乩就是一个圆形的罗圈，直径约十寸，高约二寸半，插上一只棒，高出罗圈约三寸许。另外还有一块约一尺九寸长、二寸宽的木版，中央插着一根长棍，是平理沙用的，这些东西皆是原色木料，不加油漆，请坛时在乩盘的左方安放一个小桌，置文房四宝，预备抄写训文。扶乩的人称为三才，即天才、地才和人才。拿乩圈在沙盘上写字的叫做天才，拿木拨平理沙盘兼唱出所扶出的字者，叫人才，抄录所扶出之字者叫地才。扶乩时，天才手拿乩圈闭目站在沙盘右面，人才执木拨立在沙盘正面(面对佛案)，地才站立在小桌边抄写。降神时，乩圈马上转动，先在沙盘上旋转许多次，画成许多圆圈，由地才平理之后，即开始书写。写时字要向外，地才方能念出。写出的训文格式大致相同，先是一首定坛诗或词，再报名和几句序文，然后开始正式的训文。定坛诗多半是七言诗四句或八句，也有的是五言、四言或西江月等词。诗中常将降坛者名字在每句的第一字贯出，如"五教真谛"中的第一篇训文：

道摄二仪紫薇太和平

德配天地气压上衡天

天道转盘东土老幼沾

尊重庄严来化君登案

将此诗竖起来读，第一行乃是"道德天尊"，第五行则是"紫气东来"。第七行为"太上老君"。

下面是报名和序文：

"吾乃道德天尊太上老君李伯阳，奉母命驾降东园，参叩天母，转运沙盘。

① 张光璧等：《一贯道疑问解答》，台北县正一善书出版社再版，1937 年，第 18 页。

哈哈。”

“哈哈”乃是固定的格式，在一段的末尾或另起一段时才用，有时也写作“花花”。

下面就是正文，大部分坛训的体裁都是十言韵文(三三四句法，与宝卷格式相同。)如：

天地间，男共女，阴阳定位。正乎外，正乎内，各依规矩。

有四书，和五经，男子体颂。列女传，女四书，女儿遵行。

每句话也由天才分三次写在沙盘上，由地才分三次朗诵和平理沙盘。坛训也有七言的、四言的或散文体的，但大多是十言的。每篇坛训的最后，也用“哈哈”二字作为结尾。如：

“言到此处无多讲，收笔辞母返上苍。哈哈。退。”

退字之后就算完结，降坛的神就要回去了，这时乩的标记仍然是一个圆圈，最后将乩圈退至沙盘的后方就不再动了。在降坛训时如有看不清时，还可以说“求慈悲”，于是将沙盘平理后，仙佛还可以再写一次。如有发错声音或不认识的字时，则乩即打一直扛，直到读对以后，再以圆圈表示[①]。

为了欺骗道内外群众，张光璧在《一贯道疑问解答》中吹嘘扶鸾乃是“神佛所为”。他说：“扶鸾原是仙佛之性灵，假借人的躯壳而写，绝非扶鸾者自已抄写。盖扶鸾者多系青年稚子，蒙学尚未毕业，甚且目不识丁，此项高深玄妙之道理，若无仙佛神灵，焉能自由写出。况是闭目横书，出笔成章，稍有智慧者，一见而知为神佛所为，不待吾人置辩而可证明者也。”[②]事情果真如此吗？还是让我们看一看道内知情者是如何说的。深知一贯道内幕、曾经担任过“地才”的道徒白季恺说：“扶乩是他们骗人的主要手段之一，所用工具有：沙盘一个，长四方的木制盘，长约80公分，宽约50公分，盘内贮有淘净晒干的海沙。罗圈一个，用薄木板约5公分宽，弯成一个圈，圈的直径约20公分，圈旁钉有固定的一根约30公分长与笔杆粗细相同的木棍，叫做‘乩’。耙子一把，长约一米的木棍，钉上一块木版，如钉子形，是在盘内来回把砂耙平用的工具。纸张笔砚一份，专供抄写所谓坛讯。”一贯道开坛一般是在道徒对所谓道务发生疑问，或需要以迷信

---

①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年，第64—65页。

② 张光璧：《一贯道疑问解答》，台北县正一善书出版社再版，1937年，第39条：《扶鸾是人写呢还真是仙佛写呢？》。

的方法来统一道徒思想,迷惑视听,或逢所谓做佛事时进行。

“他们统治或愚弄道徒都采取开坛的方法,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用神或仙的名义来降伏徒众,把开坛的乩语称作神仙的指示,目的是要求道徒们驯服的接受道首的控制。”“其实这所谓仙佛的旨意,只不过是道首、点传师、天才们事先商量好了的鬼点子,扶乩只是一种行骗的方法而已。因为如此,所以他们也常露马脚。其实,其中并没有什么神秘,比如疑问于扶乩,必须把事情向道首说明,经过道长派人了解,和在他们内部进行秘密研究之后,才允予开坛,没有准备好之前他们是不敢开坛的,不过这种准备是极端秘密的。虽然当众开坛时主持开坛人(道长或点传师)也当众向天才(乩手)嘱咐几句,其实都是早已规定了的暗语,因此,开坛时乩手一定秉着他的意图写出来。有时,他怕乩手领会不了他们的意图,还三番五次地予以暗示,所谓‘坛训’或神仙意旨,只此而已。”

“每逢一贯道办所谓佛事,照例也开坛扶乩,煽惑群众。他们用这个骗术一方面巩固旧有道徒的信念,另一方面愚弄和促使新道徒更加迷信。扶乩的情况和操作方法是千篇一律的。首由佛堂把应用的工具摆好,点上‘佛灯’和蜡烛,主持开坛人上香磕头毕,旁立以待。接着三才齐进佛堂,向上三叩首后,各就其位,天才拿起罗圈,煞有介事地坐在那里装神起来,静待片刻(这是为乩手安排的进一步思考的时间),一待乩手想好措辞,名曰乩笔的木棍便在沙盘中活动起来,这时乩手便一变而成仙佛的替身了。直至把他想好了的措辞划完了,最后写一个‘退’字,这场把戏才算完结。”白季恺说:“玩弄骗术也需有练习的时间。由于经常在一起和他们厮混,才慢慢看破了扶乩当中的破绽。原来所谓练习,就是假设一个题目让‘天才’们蹲在一个无人的屋内,闭目静坐想坛词。直到想好以后,始出屋装模作样的‘开坛’。有一次在练习时,我跑进乩手的静坐室,见他正捧着一本刊印的老坛训熟读,并未静坐。我出来他也跟出来,开坛后我发现他所出的训词,正与他熟读的一篇差不多,内容和韵底则一模一样,几乎等于默写或照抄旧坛训。所谓坛训也者,只是在道首示意下由乩手想出来而已。”[①]一贯道之所以能够用扶乩来蒙骗人,是因为那些充当乩手的“天才”,乃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他们经过两三年秘密训练以后,可以闭目横写,字体为大草,而且在沙盘上写字如飞,给人以神奇的感觉。其实,乩手所写的字,不仅是经过长期

① 白季恺:《我在一贯道之经历》,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580—588页。

训练过的，而且在沙盘上写字时，眼睛看似紧闭，实则微张，完全能看清楚近处的沙盘。一名三才揭露说："乩语都是点传师、坛主和我事先调查好了的事情，编成诗句，我把它背下来写的。我练三才已经六七年了，在沙盘上练了十一个月，才慢慢能写了。我从来也不知道神会让我写什么，一贯道头子全凭这一套骗人呢！他们利用一般人信神信鬼的迷信思想，就让我装神装鬼，借仙佛下坛训示来欺骗人，骗功德费，奸污妇女，造谣惑众。"①

4. 借窍

"借窍"就是通过所谓神仙附体来骗人的一种骗人手法，早在清代秘密教门中已经十分盛行。嘉庆十九年，安徽巢县的收圆教教首方荣生，为了骗娶已故教徒朱上志的女儿朱世枝为妻，便假称"借窍"，诡称孙悟空和无生老母及已故朱世枝的父母附体，称朱世枝乃是九女星下凡，应与他"配合乾坤"，结为夫妻，并说此乃"天配"。② 一贯道也继承了这个骗人的手法。被神仙附体者一般由三才中的"天才"充任，在点传师的授意之下，假称某一神佛如济公、吕纯阳、弥勒佛、关公、张飞等附体，有时还说是张光璧已经死去的两个儿子张茂田、张茂猛附体。因为他们被张光璧封为天上的"三天考试院院长"、"镇殿元帅"，可以与道徒沟通。天才在表演神仙附体时，一定要学会按照人们想象中某个神佛的形象和音容笑貌。如果是济公附体，就得装作疯癫之状，若是弥勒佛附体，就得装作腆着大肚子，喜笑颜开。而且讲话的声调也要改变，不能用平日说话的腔调。在神佛附体后讲话完毕，天才便要突然倒地，装作不省人事，表示神佛已经走了，但壳手本人的灵魂还未及回到自己身上。据一位曾经多年充当壳手的"天才"回忆说：他八岁时被父亲带领加入一贯道，后来便练习充当乩手和壳手。从10岁开始充当壳手，进行骗人的勾当。12岁在河南汤阴时，点传师让他渡一个岳飞的后代，他就上坛宣称："我是岳飞到了"，那个人很虔诚，信以为真，就入了道。有一次，为了证明借壳的真实可信，让他在表演神佛附体时，需要跳楼。当时他年幼无知，就从二层楼上跳了下来，结果被摔成重伤，当场昏了过去，醒来后还要忍痛在院子里走一圈。点传师于是向大家说："要不是神仙，一丈二尺高的楼，跳下会摔不死？"然后便要求大家捐钱办道，结果当场敛到大量金钱，使

---

① 白季恺：《我在一贯道之经历》，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580—588页。

② 《方荣生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办道人员生活大为改善，从原来吃玉米改为吃白面，而这位壳手却为此而受伤的腿，一个多月才好。据曾经参与过借窍的旧道徒披露说：借窍"即假装'神仙附体'，把事先已经了解到某人的情况，借'佛口'说出来进行欺骗。永清县大惠庄徐世清初入一贯道时，道首杨庆余劝徐世清给死去的父亲结缘，'超拔亡灵'。结缘时是天津请去的乩手张志诚（天才）扶乩。由于张志诚事先已经通过杨庆余了解到徐家的情况，便借扶乩假托徐母到坛说：'我当初为你们好不容易，学过孟母择邻（徐母生前为躲是非搬过家），现在你们入了道，应该'财法双施'，'度人办道'，这才是我的孝顺儿女。'乩手还说徐的父亲也到坛说：'可惜未见新儿妇（徐娶妻时其父已死）贤与不贤认不清。时间已到帝下令，重拉胡弦语再评'（徐父生前好唱），三才便用重拉胡弦暗示出来。使徐家人一听，真像他们父母到坛说话，都信以为真，放声大哭，从此更信一贯道了。"①

5. **传"三宝"**

按照一贯道的说法，"三宝"乃是世间最秘密、最宝贵的东西，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也没有多少人有幸得到它。甚至那些修成了仙佛的人，也会因为未能得到三宝而不能升到"理天"。如今正直三期末劫，罡风即将扫世，若能得到三宝，就可躲避一切劫难。罡风来时，一切都将陷于混乱。罡风过后，又将有一个新的世界。凡是得不到三宝者，都要归于毁灭。所以，今日的中国人能够有仙机加入一贯道，得到三宝，一定是祖上有几世德阴，或者乃是"气天"的仙佛转世投胎。

三宝的传授，最能体现一贯道作为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的本质。三宝是入道时由点传师授予。既得之后，必须永生不忘，而且不许出口说出，严守秘密，要立下"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的誓言。遇有困厄，只要暗转三宝，即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但是，若将三宝说出口或传与他人，则立刻被五雷轰身，化为脓血。

三宝的第一宝是"抱合同"。这是一种手式（指诀），以左手包在右手上，两手心皆向内，以右手拇指按右手第四指的第三节节纹，以左手拇指按右手小指第三节节纹，然后将右手其余四指包于左手之上，将两手置于胸前。这种手式的含义是："子亥相交"，即是世界将要新旧交替的象征。因为子亥两字适为十二天干的一头一尾。另一种解释是："子亥乃孩，无生老母欲唤回的九六原子，

① 咎道徒：《一贯道的罪恶内幕》，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596—597页。

都是她的孩子,故合同按子亥二诀,是归根认母之意。"

第二宝叫做"点玄关"。就是由点传师用手指向受点者的两眉当中一指,就叫做点开玄关了。玄关点开之后,将来人死时,灵魂即可从玄关直升理天。未受点者死时灵魂则由两目中散出,或游气天,或下地狱。因此,一贯道内对于玄关甚为重视,认为非到此普度时期,这一名词不能发现,是所谓天机不可泄露。

第三宝是"五字真言"或叫做"无字真经",意思是只有声音而没有文字。所谓"真经"就是真正的经,一切的经都是假的,只要通了这个经,一切的经都可以不念。但是,这五字真言只许暗传,不许出口,更不许写出来。所以,人们没有机会见到这五个字连在一起书写在纸上。其实,"五字真经"就是"无太佛弥勒"这五个字。其中的"无"是指"无极","太"是"太极","佛"是"佛极","弥勒"就是白阳时期掌天盘的祖师名字。这五个字的功用是将来死后上理天时的凭证,若是忘了,就进不去天门。[①]

对于道徒来说,入一贯道就是为了求得三宝,得了三宝就是得了大道。而三宝乃是绝对秘密的,绝对不许外传,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一贯道的秘密结社性质。

道徒在求三宝时,要先作揖磕头,献上三炷香,然后跪在拜垫上,有的先点玄关,有的先传合同。如是先传合同,在传完合同后,要求入道者眼睛观看案上的佛灯,静听点传师道经,又称"礼嘱",分为乾坤两点道经。点毕,点传师还要向新道徒说:"此时正在重阳天,大千蕴等俱向前,个个皆得还乡道,保尔无恙万八年。余今领受恩师命,传尔本来玄妙关。"点传师点香后在佛灯前晃一圈,再将香熄灭,放在佛案上。三叩首之后,还要求新道徒立"求道愿"。道徒立愿之后,点传师还要向他宣布说:"你若愿不能了,难把乡还,现在灾煞俱到身边,一切兵荒,老幼同沾。反心谤道,詈誓骂天,洪誓大愿,永不能完。"然后三叩首。

点玄关时,点传师先念"点道经",念毕,便用右手中指,先在求道人鼻眼周围画一个圆圈,再点两眉中间,点完后要三叩首。

然后再传"五字真言"。

三宝都传授完了,新道徒要行谢恩礼,就是要叩头。其中谢老母开道之恩三叩首,谢诸天神一叩首,谢弥勒祖师一叩首,谢南海古佛一叩首,谢活佛师尊一叩首,谢月慧菩萨一叩首,谢师尊一叩首,谢师母一叩首,谢点传师一叩首,谢

---

①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 年,第 66—67 页。

引保师一叩首。然后起立，大家同说："恭喜、恭喜！"

玄关点毕，再由点传师讲解三宝。要把三宝讲得神乎其神，借以骗取道徒的信任。讲完后，由大家分食供果，最后再由点传师对新道徒嘱咐一番，就算完成了。

一贯道所谓传三宝，无非是企图用一些神秘的仪式、口诀、手式，来增加信徒们的神秘感，借以巩固他们对一贯道的信念，然后再去"以亲度亲，以友度友"，进一步扩展组织。

6. 开办训练班

一贯道通过开办各种形式的训练班来训练、培养办道骨干，使一贯道得以在各地迅猛发展，训练班分为不同的等级，用以训练和培养不同级别的道首和骨干。

"炉会"。据亲自参加过两次炉会的白季恺披露说："所谓炉会，就是在一定时期将一部分道长、点传师、道徒聚集在一起，进行'冶炼'，其目的是：一、对原有道长、点传师进行考察，巩固他们的反动立场；对新道徒施以迷信训练，使他们老老实实地听道首的统治和指挥，并为道首多供一些金钱；二、通过'冶炼'，从道徒中选拔一批能对他们坚决服务而又有钱有势的人，放为点传师；三、敛财。"

一贯道的"炉会"3—5 年举办一次，时间与地点皆不固定。白季恺本人参加过两次炉会。第一次在济南，命名为"理学道德研究院"，有 100 余人参加，地点在旧军阀褚玉璞的寓所，参加者有道长、点传师，也有道徒。第二次在青岛，规模较小，时间也短。"在举行炉会时，也经常'开坛'，那简直和看巫婆跳大神一样，不伦不类。他们有时装济公，有时装院长或法律主（他们把张飞奉为法律主），有时甚至四个人都装济公或济公的儿子（即所谓院长），说这叫做'先佛分灵'，由一分为四。""在这个'理学研究院'的'炉'中，院中走廊的两旁，一边贴一个'剃'字，一边贴一个'度'字。这是因为他们奉济公为师，济公是个和尚，他的徒弟当然也必须都不留发，所以进门受'炼'必须先剃光头。其法是由'炉'中一个人装神，手执一把大剪刀，把每个人'炉'受炼的人的头发（不论分头或平头），统统给剪地似狗啃的一样。其中有一个道士的盘髻也被剪掉，可谓彻底。这样做过之后，再请来理发师，逐个给剃成光头。这是入炉冶炼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听讲和挨烤。听讲即每日白天有专人讲《金刚经》；挨烤则大多在

晚上，日子很难过，他们不一定出甚么花样，也不一定制造什么怪现象，使人无法揣摩。如能度过这个'烤'字，可以平安回家，否则就得挨他们的毒打。他们打人也有个名堂，叫做'打冤谴'，说那是'神的旨意'，因此，挨了打还得'心甘情愿'，不得反抗。有的竟被他们装神弄鬼打的遍体鳞伤。打的方法之一，如一个姓魏的点传师，被他们逼着满院直跑，不准住下，一直到筋疲力尽，晕倒在地，经旁人抬到室内打了强心针，才苏醒过来，简直是拿人命当儿戏。还有一次在约在半夜二时左右，人们正熟睡之际，他们突然敲起集合的警钟，于是受'炼'的人都急忙爬起来，因为这也是'拷'的一种形式，都怕去晚了受'烤'。有的连衣服也顾不得穿，半夜三更黑洞洞地就往外跑，磕磕碰碰，有的还受了伤，弄的人啼笑皆非。集合时手脚快的可以到得集合点，稍慢一点就被关在大门外边进去不得。就是最先到达集合点的也不是一帆风顺，在中途也遇到不少波折，如跑到大门口，大门紧闭进不去，便绕进旁门，旁门也被他们用桌椅板凳堵塞，便乱哄哄爬上高桌搬开椅凳，而在椅凳上边，他们还事先搁上一些贮满了水的大盆，急于赶到集合点的人，不知上边有水，一搬椅凳，水泼满身满地，有的被浇得和落汤鸡一样。好不容易过了这一关，还要穿火过独木桥，即进得门去便是一根独木'桥'，'桥'两边生着熊熊烈火，两边无路可行，既不能飞跃，就只好鱼贯过'桥'了。过了'桥'，总算是到集合地点了，但还得在屋子里挨冷风吹（用电扇），虽然各个冻得发抖，谁也不敢去关闭电扇，只好哑（鸦）雀无声地跪在那里挨死'待命'。结果是遭了一番罪，什么事也没有，只简单的下令叫大家回去睡觉。他们把人糟蹋了一夜，第二天还给他起上一个鬼名堂，说那叫渡过'水'、'火'、'风'三关。好在挨过水淋、火烧、风吹的人，都算'烤'中了，那些未挨过水火风苦楚的人则都算没'烤'住，都遭到了无情的体罚和毒打。诸如此类的把戏，一直闹了一个月才算收场。"①

最著名的炉会，要数天津的纯阳炉和北平的顺天炉。

天津的纯阳炉

1938年2月14日，由总道首张光璧与其妾孙素贞等人在天津的天祥市场一家饭店上开办，取名为"纯阳炉"，参加受训者有男女道徒108人，历时16昼夜，由齐铭周亲自主持，主要骨干如薛洪、宫彭龄、张五福（张范卿）、孙锡坤等。

---

① 白季恺：《我在一贯道之经历》，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年。

主要训练内容是:讲经传道、考冤孽债等。由乩手假借考试院长传训,讲解怎样修道、办道、开荒、考验酒色财气,借以巩固受训练者的虔诚,传授如何传道、度人的方法。结束时张光璧、孙素贞还亲临指导,勉励大家"行功立法",然后分别前往各地开荒传道。据张英誉披露说:他于1938年初来到天津,"此时天津正在所谓仙佛训示成立'纯阳炉'的时候,在吾到的时候,已成立数日了。""内中有两个借窍者,一名郑思衡,一名刘心泉,均系乩手。其中参加此纯阳炉者,大约有七八十人之多。若薛洪、刘梦荣、孙锡坤、张范卿(张五福)等人,大都系参加此炉者,借壳者自称为'院长',限期大半为一个月,就在天祥市场之美丽川饭店上面,地址甚为宽大。在吾初次去的时候,系先父叫吾找人,所以跑到里面,烟雾甚重,光线亦暗,在招待者招待之下,看其精神均已疲惫不堪,尤其众人方面站立的好似一面墙,大家均已(以)疲倦而神奇的眼光看吾。""现在把吾印象最深情形记下来。一幕系用扁担打人,在吾去的时候,依然将人按在地上,一人按头,另一人按足,外左右各一人按手。借壳的刘心泉如凶神附体,双手举起扁担,向卧者臀部猛打,如此在吾未到之前,已有几人受此痛苦,所以在吾到时,借壳的就放下扁担招待吾,吾是不明究竟,但是打人吾已看出,如此残暴,莫说仙佛,即凡有人心的人,亦难下此毒手,所以吾抱着到底看如何打法。后来又打起来,借壳的命被打者卧下(形式如上),借壳者依然凶暴的举起打人的扁担。"在炉会期间,还发生了道徒为给孙素贞医治咳嗽而割自己腿上的肉的惨剧。当时孙素贞因为着凉而咳嗽,道徒苏光驰为了表示虔诚,竟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一块,献给孙素贞治病。在他养伤期间,壳手郑思衡竟把苏光驰的腿,"大加盘折",以致"伤口破裂,失血甚多"。另外一次张英誉在纯阳炉看到"很多的人均在地上跪着,头上顶着一个小水碟,口里衔着点心,大多数满面流汗,有的将自己的衣服摆在下面垫着,每个人均已到了面容憔悴,筋疲力尽的地步。""以上乃吾亲身目睹。"[①]

北平的"顺天会"

1939年2月19日到3月25日,在北平鼓楼大街蒋家胡同50号开办"顺天大会",受训的点传师、坛主200余人,男女道徒达200多人,共计400余人。由张光璧亲自主持,张五福、宫彭龄、刘新泉、齐慧贞等道首负责具体工作,并由旧

① 《张英誉自白书》(一)。

军阀唐天喜、潘仲瀛等办理对外联络工作，他们通过勾结日伪的关系，获得了日伪的批准。参加者在"开班训练"期间，不准出院子，每天烧香、磕头，由道首宣讲"一贯道义"，和《中庸》、《大学》、《道德经》、《金刚经》等，同时还要进行酒、色、财的考验。考酒时，由天才乩手刘新泉"借窍"装充"八爷茂田"，又名"关公大师兄"。女天才乩手齐大姑娘"借窍"装关公。他们把一盆水掺上酒，说这是"仙丹妙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叫每个道徒都得喝。有一个姓冯的道徒闻到酒味不喝，当时被刘新泉用藤鞭毒打，众道徒给跪下求饶也不答应。最后，刘新泉尿了碗尿，说这是"琼浆玉液"，逼冯喝了才算完。

在考财时，刘新泉"借窍"声称和一个18岁的女道徒金小姐有"仙缘"，当天在"顺天会"结为夫妇，说这是"天作之合"，并要求众道徒"祝贺献礼"。因为一般道徒随身携带的钱不多，他们就事先在院内设立专用银号，可以开条借钱，会后再还。献礼钱从数十银圆到数百银圆不等，道徒李德禄一人就献礼2000块银元。他们以道徒出钱多少，是否尽力献礼，来判断道徒是否对道虔诚、忠实，所以叫做"考财"。仅此一次他们就从200名道徒身上骗取了2万多银圆。乩手刘新泉在与金小姐结婚后，昼夜在一个单间内赤身合卧，男女道徒还要到他们床前"问安"。这就是一贯道所宣扬的所谓"清心寡欲"。当时有个女道徒李德仲和葛太太，看见实在太不像话，坚决要求退出顺天会，并且退道不修了。道首们见事情不妙，恐怕顺天会和一贯道的内幕被揭穿，坚决不许出会退道。为了迫使道徒们就范，他们又用"还冤愆"的办法，在地窖里假设阴曹地府，有的道首假装阎王，有的假装判官，有的装小鬼。半夜里由小鬼拉来道徒，让他说出自己都有哪些罪过，并且借口道徒有"冤愆"，便用扁担毒打一顿，叫做"还偿冤愆"。怕打的可以用钱来赎罪，一名老道徒齐建渊为了赎"冤"，花了500块银圆。轮到李德仲和葛太太时，为了杀人灭口，借口她们"冤愆"太重，竟被活活打死。事后为了封住道徒们的口，还说这乃是"仙佛"的惩罚，于是没人敢问。加上每人都立下了守口如瓶，"不准泄露顺天会内任何情况"的宏愿大誓，便在事后偷偷运出城外埋掉了事。①

有关"炉会"的内幕，张英誉也有所披露。他说："再说秘密的，就是炉会、什么仙佛班了，我第一个知道清楚的就是天津的纯阳炉。""内中借窍的是刘新泉

---

① 咎道徒：《一贯道的罪恶内幕》，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596—597页。

和郑恩恒。主炉的是齐铭周。他们装神作鬼的用尽一切惨无人道的手段，使得入炉者筋疲力尽，精神恍惚的疲劳轰炸，使入炉者在此惨痛惶恐的情况下，增加了他的信心。什么了冤愆啊！什么仙佛显化啊！""在这套鬼把戏下，害了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丢了他们的宝贵性命，多少人妻离子散，直接的、间接的无数被欺骗的可怜的同胞。如济南在1938年所立的'道德促进会'也是如上的一套把戏。齐宣炳（寅）和他姐姐齐玉箴，还有另外一个叫辛荣轩的三个人，装神作鬼。后又添了个名叫王文选（齐铭周的亲戚）他们四人借窍，闹的落花流水，耳闻考的甚是厉害，我曾经看到阎步礼者，被打的屁股青一块、紫一块。还有吃粪的，等等。什么考酒色财气，花样反（繁）多。""更有名的就是北平的'顺天会'，乩手是齐玉箴和刘心泉，主炉者大约是齐铭周。这一场闹剧可就更加惨无人道了。耳闻由刘心泉和齐玉箴的色考上，是入炉的女道亲起疑心为原因。而刘心泉假公及（济）私的暴打此女道徒（刘梦荣之妻），打的遍体鳞伤，后有一女道亲不忍，愿替受责罚，于是刘心泉在暴怒之下，将此两女道亲活毙杖下。到了发觉人已死去，所有被考的人尚以为此系仙佛显化，而求刘心泉与齐玉箴慈悲。可是他们（指齐刘）心中有数，大家均在跪求开恩，而齐玉箴还是装神作鬼的在死者身上，口对口的利用人工呼吸法，想着挽救。但是满身青紫而浮肿的女尸，已是回天乏术了。这样血海大冤，竟然在他们仙佛所为（谓）的无情之考的'考'字下，也就不了了之（以上之事系张五福与我亲言者）"。[①]

其他训练班。一贯道开设的训练班中，除了炉会外，还召集各地区、各线的负责点传师，仿效炉会的形式，对各级办道人员进行训练。

"仙佛班"。是由各线总坛负责点传师定期召集点传师参加，布置窍手借窍，讲经说法，劝导参加者立愿出钱或训练他们外出办道，时间一般为一到两天。仙佛班的宗旨，除了巩固信徒们的信念外，主要还是要向参加的信徒骗取财物。据一位参加过"仙佛训练班"的道徒揭露说："我们原有四所房子，生活很好。自从（民国）三十一年我俩被王勋臣骗得在信一坛入了道，后来又改到张国香坛上求道。张国香要开'仙佛训练班'，就说我先生有仙缘，要他拿钱，他就卖了一所房子，贡献给张国香了。后来，一个名叫宋玉珍的点传师，说要到四川去'开荒'传道，便假借乩语说我先生仙缘很深，那时，我先生已被'老母'的米汤

① 《张英誉自白书》（四）。张英誉文化水平不高，所以自白书中多有文理不通之处。

给灌迷糊了，就又卖掉两所房子，做了宋玉珍的传道费。这些东西们看我们还有一所房子，就开坛说我先生根底深，三番五次的'功德费'、'度大仙'，把最后一所房子度去了。他们还不甘心，探听出我有金镯子、首饰、皮袄，就又摆好了一套鬼把戏。有一天，门外来了一个要饭的老头，他给我先生送来一封信，信里写着我先生怎么好，张光璧与我先生有仙缘，应当上坛求度。我先生被这信说的迷糊了，当时就拿了信去求'老母'指示。乩语说那个要饭的是济公活佛下世，这是我们真心所感，叫我们照信上的话行事。第二天所有的积蓄全部卖掉，送给张五福尽孝心。"

"忏悔班"，是张光璧死后，以孙素贞为首的"师母派"为了网罗各地点传师，而由山西道首李文斯所首创，目的是让那些曾经支持过师兄派，或开始时不够坚定者，来忏悔自己的过错。有时也利用办忏悔班的机会，趁机向参加者骗钱。东光县郑家园村一贯道，在开忏悔班之前，经过道首席庆泉等人商量，到晚上开班时，其中一名道首假装出外解手，突然大喊一声，倒地不省人事，醒来后对大家说："我看到一个三头六臂、满嘴红牙的妖怪，幸亏有我神在此，才吓退妖魔，不然性命休矣。"然后就让道徒们"献心许愿"，骗得许多金钱。[①]

"领袖班"，参加者均为各分坛以上主要点传师，时间仅一两天，由各线领导点传师向他们传授发展道务的方法和经验。

"点传师班"，把新提拔的点传师，定期集中培训，由老点传师向他们传授点道、讲道、开班及外出办道的方法。

"坛主班"，集中各总坛所属分坛坛主，定期训练，让坛主们学习"佛规"和如何劝人入道，结束时还要"立愿"。

"三才班"，由各地总坛主办，从虔诚道徒或办道人员的年幼子女中选拔一些孩童，由文化较高的点传师或资深的的乩手，对他们进行训练，学习《四书》、《五经》或佛教经典，主要还是学习如何扶乩，搞"飞鸾宣化"等骗人的本领。

"人事班"，也叫"讲经班"，不定期向道徒们宣讲道义，讲解《四书》、《五经》，大多由有文化的点传师主讲。有时，领导点传师到某地巡视道务，当地负责人为了表示欢迎，也请他讲经。

---

① 咎道徒：《一贯道的罪恶内幕》，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596—597 页。

7.“渡大仙”和“超拔亡灵”

一贯道搞的所谓“渡大仙”和“超拔亡灵”和“度人曹”即劝人入道一样,也是骗人钱财的重要手段之一。所谓“渡大仙”也就是“度天曹”,一贯道宣称到了“三期末劫”,天上的大仙为了躲过这一劫难,也必须求道,而神仙入道需要由引导仙人入道的人来交纳“功德费”。因为是“仙”,功德费自然比人入道多,而且要用黄金来支付。如道徒霍永胜渡了一个“华佗大仙”,就花了四条黄金。塘沽一贯道点传师齐国瑞等为了利用度大仙骗取黄金,曾从天津找来惠化坛道首刘玉田来塘沽说明。他令三才诡称在解放战争中,塘沽有“玄蝉大仙”和“蛇龙大帝”在暗中保护,因此未受损失。现在为使这两位大仙也能躲过“三期末劫”,应引渡二位大仙入道,结果从道徒那里骗到黄金55两。度大仙的功德费多寡,要看大仙在世时的身价和名望来决定。名望高的价钱就高,名望低的价钱也低。1939年天津有一个姓娄的道徒,为了度一个“毛遂大仙”,竟花了银圆一万元。宋振声引度一个宋朝名人陆秀夫,花了银圆2000元。上海一贯道大道首潘华龄被道内称为“度仙大王”,专门利用度大仙发财。他有一次度了一个大仙,竟骗到20条黄金。①

“超拔亡灵”是指为道徒已故先辈或亲人办理入道手续,也称“点亡灵”或替先辈“结缘”。为了骗到更多的钱,一贯道宣称只有“有功德”的人,才有资格超拔亡灵。届时,死者子女要先交银圆3元,把死者名字写在白纸上,顶在孝子或孝女头上,表示亡灵要“借体求道”。然后由点传师主持超拔仪式,被超拔者的子女要跪在佛堂里,呈上表文。表示代替死者求道。由于超拔亡灵是给鬼结缘,所以也得交“功德费”。因为鬼比人值钱,功德费也比人交纳的多。

在李世瑜先生所著《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中,转录了一件《因果结缘训》,乃是超拔亡灵的例证。其中序文提到:“陈君鸿义青县人,民国二十七年求道,至民国二十八年九月,随同高君文玉赴本县北五王庄办理佛事。正在献供之前,院长降香于李定斌先生,叫陈鸿义去禅堂观看。该禅堂在东配房三间北间内,中间供铜佛数尊,南间为磨房,有驴一头。院长将鸿义唤至南间切近曰:“‘跪下’。鸿义不知所为何事,即求院长慈悲指示。言未了,陡见黑驴连叫数声,毛耳尽竖怒不可遏。高君即求院长慈悲,曰:‘无你的事’,叫他们说话。又求曰:

① 昝道徒:《一贯道的罪恶内幕》,载《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群众出版社,1992年。

'鸿义凡夫,不通兽语'。院长即问鸿义:'他说话你为何不语?'吓的鸿义战兢言曰:'在未求道之先,与已求道之后,均不敢作丧天害理之事。'院长曰:'在你穿号褂子时如何?'曰:'不过抓烟禁赌,事不得已,亦不敢欺心。'院长又曰:'以前还有人命否?'忽忆起三十年前之事,遂曰:'不错,有人命。'院长曰:'乾坤分班,速来静听'。陈鸿义云:'民国二年五月间,麦秋时,余赴舅家探望舅父母,言数语,因麦场正忙,舅父母同去麦场操作,余亦欲起身回家门。适于此时表妹王树芬云:有事来前,将手伸入袋内取烟。此时舅母由外回来,见树芬之情况,大发雷霆之怒云:'你们现在都不是小孩子,各宜自尊自贵,我知道你们自小一块长大的,若外人看见,有个言三语四,何以自解?'当时余与树芬深自惭愧,有口难说,羞恶之心,彼此皆同。余虽婉言劝慰,而舅母余怒未息,责树芬益厉,余亦不能再劝,跺足叹息回家。至日落时,外面传出恶耗,舅母找至我家送信,树芬羞愧自尽,意欲起诉。家母及亲友百般调停,将事压下,最后花去千元之谱,将树芬葬埋,以全彼此脸面,此乃以前有人命之经过也。'院长云:'黑驴即树芬前身,今讨冤债,而应如何还她?'当时鸿义无所措对,只求慈悲。由高前人等恳求院长慈允,由鸿义超拔树芬,以了冤债。院长云:'此时虽可,但树芬前因欠了人债账,岂能不还? 候过数年,待其还满前债,再为拔荐。'事隔数年,今求院长允许超拔,并拔荐后,树芬到坛历数前因。"①这件事本来是无稽之谈,但是,当时在天津一贯道内十分轰动,被传得沸沸扬扬,神乎其神,道首们趁机也大肆宣扬,借此扩展道务。事情的实际经过是:1939 年天津河东仁义坛道徒陈鸿义,跟随点传师及乩手李定斌到河北省青县兴济镇开荒传道。当地本来没有一贯道的坛堂,只好在该镇一座娘娘庙临时设立佛堂。该庙的和尚养有黑驴一头,栓在磨房之内。点传师与乩手在进入庙内时,曾看到了这头驴,已经心里有数。所以当点道完毕,点传师讲解三宝时,乩手李定斌趁磨房里的驴嚎叫时,随即上坛表演"借窍"。他自称院长驾到,要审判一件冤案。点传师及在场道徒,急忙"接驾"。李定斌便带领众人来到磨房,让大家分立两边。黑驴见到突然来了许多生人,自然焦躁不安,愈发大叫起来。李定斌便对黑驴说道:"黑驴,你的因果冤源我全知道,今天就替你审明白,我替你做主。你若愿意,就停止跳叫。"经过李定斌的抚摸,加上黑驴见大家已经站定,并无骚扰之意,也就安定下来了。此

①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 年,第 117 页。

时，李定斌便喊说："陈鸿义快快进来受审！"陈鸿义慌忙进入磨房，跪在地上叩头。黑驴见状，随又叫了起来，众人亦感奇怪。李定斌便对他说："今天正是冤缘相报之时，你看这黑驴如此凶狠，若非本院长制止，它早已要你偿命，赶快把自己的罪恶，从实招来。"陈鸿义苦思良久，忽然想起说："在 30 年以前，我 20 多岁，某日去姑母家中，姑父母都不在家，表妹向我要香烟，我不给，她就伸手向我衣袋里抢夺。恰好被姑父母回家碰见，我被责骂一顿，羞愧而去。表妹则因父母不能原谅，服鸦片自杀。姑父母见她身死，要与我打官司，我于是逃出去当兵了。"李定斌便对他说："这黑驴即是你表妹，今天要你付命。"陈鸿义急忙恳求将黑驴买回饲养，并且超拔表妹。李定斌又说："不行，黑驴尚欠和尚的债，和尚靠它磨面，你一超拔，黑驴死了，它对和尚的债就无法还清了。"众人见此情形，随一同跪下，求院长慈悲。李定斌便说："办法倒有，也不使你为难。你要感谢老母代你化解，你很穷，用不着买回去，也不必超拔，只要你日后更加诚心，多度人，回到天津到各坛把这事告诉大家，让一般人都知道因果报应不爽。"陈鸿义于是叩头谢恩，回家后到处宣扬"黑驴告状"，使得此事在天津、河北一带广为流传，为一贯道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章　地下神秘王国内部的权力之争

一、以张光璧为核心的“神圣家族”

1. 张光璧原有的家庭

张光璧在16岁时，与朱氏结婚，先后生有子女数人，仅有一女存活，后因难产身亡。后来又续娶刘率贞为妻，先后生有子女九人，仅存张英誉一人。张光璧因张勋复辟失败而逃回家乡后，便与刘率贞及一子、一女同母亲共同生活。在他入道以前，生活颇为清贫。入道初期生活略有改善，但仍不富裕，不过，那时家庭和睦，用张英誉的话来说，家内是“安静而和乐的”。

2. 张、孙结合形成的“神圣家族”

自从张光璧以“天作之合”为借口，将孙素贞纳为小妾，并合谋从“老姑娘”路中节和陈化清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教权，成为一贯道“第十八代祖师”后，便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神圣家族”。在这个“神圣家族”里，张光璧以一贯道“师尊”的身份，成为家族的封建家长。其妾孙素贞则以一贯道“师母”的身份，成为家族里的第二号人物。张光璧的第二个妻子刘率贞则被打入“冷宫”，只能照料张光璧父子的日常饮食起居。张光璧唯一的儿子张英誉，既不满意于自己与生母的处境，更不满于庶母孙素贞的所作所为。孙素贞作为张光璧的小妾，虽然在张光璧面前，可以靠撒娇发泼以博得张光璧的欢心，在道内也拥有相当的势力，但是仍不满足，时刻企图取张光璧而代之。所以，在这个“神圣家族”内部，张光璧与刘率贞夫妻之间，张光璧与小妾孙素贞之间，张光璧妻刘率贞与孙素贞妻妾间，张光璧与张英誉父子间，孙素贞与张英誉的庶母与嫡子之间，皆充满着矛盾和争斗。

3.“天作之合”引起的家庭风波

在张光璧纳孙素贞为妾之前，张与继妻刘率贞、子张英誉尚能和睦相处。

当时,张光璧为了办道,整日四处奔跑,家中全靠刘率贞一人照料。据张英誉供称:最初,他家"做饭、烧菜、洗衣服等工作,依然是家母(刘率贞)来做,老人家一天忙到晚。""但是,家中空气是安静而和乐,吾从未闻见过有吵闹的声音,见过不豫(愉)快的现象。"可是,自从孙素贞成为张的外室以后,情况却为之一变。张英誉说:"大约吾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已在小学读书,于每天回家后,感觉家中景况变了,常常看到吾母的怨苦的面色上的泪痕,冷静而无情的环境,引起了吾心情上的愁苦不安的怀疑,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的和乐而安静了。家中已听不见有说有笑豫(愉)快的声音了。但是,吾母亲常在无人时或黑夜里哭泣。""到了后来听说外面又有一个母亲,所以使家母伤心难过的理由,就在这里。""后来渐渐听说吾这个庶母是单县人(孙氏),而且是个寡妇,外传平素品行不好。"由于张光璧对孙素贞宠爱有加,以致孙氏更加骄横跋扈。据张英誉称:张光璧"因其出身关系(寡妇),深怕家中人看她不起,故对家母不得不用高压办法。每次回家时,常称颂孙氏如何贤德才能,帮办道务。"对于张光璧称颂孙素贞,刘率贞自然也要争辩,张光璧对此则"不以为然","所以家母终日以泪洗面,有时数日不食,此时家庭陷入愁苦不堪的境遇中。但在孙氏一方既受先父之宠,又为道亲恭维,自认才德俱备,功大自持,即对先父时常也有要挟不逊的态度了。甚至常常借体(题)发挥,闹脾气,先父为顾面子,也只得委曲求全。"张光璧如此态度,自然使孙素贞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对张光璧大打出手。张英誉称:"身为一道之师母的孙氏,足然为了事不顺心或细故,动手用茶杯来打先父,此时吾正赶上,但不知为甚么生气,先父气的面色发青。"而孙素贞却"大声闹着要与先父分家、决裂,各干各的。"并且命人收拾衣箱,准备出走。这下可吓坏了一向惧内的张光璧,只好让儿子张英誉去"哭求"。在张光璧封建家长制作风的淫威下,张英誉只得跪在孙氏面前,苦苦哀求。孙素贞见要挟张光璧的目的已达到,才算收场。张光璧看到儿子为了此事弄的"老泪直流",只好又安慰他说:"你看有多难啊! 多么不容易!"[1]孙素贞在张家的跋扈,甚至造成刘率贞的未遂自杀。张英誉说:"记得在一天,吾从学校放学回家,大雨下的正紧,街上如同河流急湍奔流,吾冒着雨飞也似的奔跑,及至跑到吾住家的街上时,看到很多邻居冒着雨站在门口张望,看到吾时异口同音的[说],'你母亲跳坑了'。吾吓了一跳,跑到

① 《张英誉自白书》(三)。

家里把书包抛在桌上，飞奔而去，就奔向离家不远的一个大坑边。""后面有人追上来说，已经救回去了。"[①]张英誉对于庶母孙素贞的专横和生母在家中的悲惨处境，深感不公，他说："吾认为先父对于生儿育女之结发夫妻，终日在家操劳，过着老妈子的生活，还不得温恤，凡（反）而后来居上的孙氏，捧到了天上，吃穿享用，那样不比家母强百倍呢？如此不公，还谈什么道不道呢？"[②]

4. 孙素贞与张光璧争夺教权的较量

孙素贞虽然出身农家，及长也仅仅在底层社会生活，没有什么见识。但是入道后随着接触面日广，特别是成为一贯道的"师母"后，竟自称"月慧菩萨"。再加上张光璧的宠爱和道内有一般善于逢迎拍马者的吹捧，使她在道内便成了仅次于张光璧的第二号人物，拥有了一大股势力，并且培育了一些亲信道首作为羽翼，逐渐萌动了篡夺教权的野心。据张英誉称："早在1939年的时候，家母（孙）以乩训所示，让家父修养，家母（孙）出来代表办理。"[③]1940年冬，张光璧、孙素贞在天津过年，适有武汉线的领导点传师邢杰三自武汉来到天津。他带了一部《龙华经》[④]，请胡桂金转交张光璧和孙素贞。孙素贞听说经内有"双年双月度双成，火德交旨理域游"两句经文，是表示"弓长祖办理末劫收圆，指的是师尊张光璧，要在翌年清明归天交宫"大为高兴，认为是自己夺取教权的征兆。据张英誉称："1940年古历十二月间，有汉口来的邢杰三，带来一部《龙华经》，上面俱（据）说多系玄机。尤（有）关于先父以往的事，均在此经上早已说明。尤其说异（翌）年清明，先父将隐（去世）。所谓《龙华经》与原本不同，已经宫彭龄删改，附会家母（孙）之说。此说一出，人心动摇，家母（孙）在此时机，暗中求训，并借故出外招集立愿，均跟孙师母修。"[⑤]"此书未曾见着，早具野心的孙氏，今适其会，又得此有利宣传工具，于是就借此为说，并利用三才批训，孙氏应运，说先父将隐（即去世），天运已归孙氏，教大家均得跟孙氏修道。"[⑥]张光璧对于这一玄机，一时信以为真，便从北平返回济宁老家，召集各地道首来到济宁，以便嘱托后事。为了保住张姓的道权，他把在济宁的妻子刘率贞、女儿张静馨、儿

① 《张英誉自白书》（三）。
② 《张英誉自白书》（三）。
③ 《张英誉自白书》（一）。
④ 当为《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
⑤ 《张英誉自白书》（二）。
⑥ 《张英誉自白书》（三）。

子张英誉皆放命为点传师，并提出他死后由儿子张英誉继承道权。孙素贞对此表示反对，要求由她本人继承道权，而张光璧却坚持不许。孙素贞于是借外出巡视道务的机会，乘机拉帮结伙扩展势力。张光璧虽然疾病缠身，可是并未在1941年死去。孙素贞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于1941年春，借口张光璧有病，趁请弥勒祖师到坛垂训之机，说上天考验弟子，需要由她代表张光璧到各地同弟子结缘。当时张光璧对她的野心尚未觉察，便同意她外出巡视道务。从1941年起，孙素贞便在北平点传师宫彭龄的护驾之下之下，带领领导点传师齐铭周，乩手李振华、侍从刘瑞贞（邢杰三的妻子）、王慧贞（齐铭周的妻子）等亲信，前往全国各地去培植自己的势力，并借坛训为自己夺取教权大造舆论，而张光璧却被蒙在鼓里。

孙素贞外出时带领宫彭龄这几名“大将”并非偶然，早在1936年，宫彭龄等人就已经成了孙素贞的心腹。据张英誉称：“在杭州时，张天洞（一名道首——引者）谈起往事，道中变化经过。他说，早在1936年时，吾到光华里，此时师尊外出洗澡，师兄（指张英誉——引者）亦不在家。孙师母老人家在北屋哭了起来。胡桂金、宫彭龄、邢杰三及吾就跪在孙师母面前，劝老人家不要难过，有困苦徒弟们设法解决。孙师母说，‘你老师真狠心，要设法害吾，现在他儿子也来了，不知吾将来如何呢！怎不难过？’于是宫彭龄等说：‘吾们大家立愿，绝对保护师母，同心同德。’”[①]据张英誉称，宫彭龄本来是北平道长张五福的“后学”，后来与张五福意见分歧，矛盾日深，而北平道权完全掌握在不识字的张五福手中，而“宫彭龄是大学毕业，对旧学亦有研究，有看不起张的意味，所以明争暗斗，意见深巨”。[②]“宫彭龄乃系一大学生，此人写做俱佳，跟着孙氏奔走各方，大致南北东西孙氏所到之地，均由宫跟随，一切办法多由宫来策划。并带着三才和成本大套的天机堂训和自造的碑文，到处讲说，并立愿均跟孙氏修，上山到顶，下海到底的誓愿，”所以深得孙素贞的欢心。“此时，宫在孙氏前红的发紫，孙氏不呼其名，而呼‘玲玲’，还有一位多年善逢迎的齐太太王慧贞，亦不呼其名，而呼为‘能能’。”[③]孙素贞等人此行，实际上是为夺取教权作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的。孙素贞一行惟恐阴谋泄露，为了不让张光璧知道，便竭力对张光

① 《张英誉自白书》（一）。
② 《张英誉自白书》（二）。
③ 《张英誉自白书》（二）。

璧及其周围的人封锁消息。他们“严戒办事者,不许见师尊,”“以免孙氏在外之一切不轨行动与言论透露于先父”。[①]

孙素贞外出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教权而拉拢各处的道首。“孙氏数年中所到地方,计有京汉路、陇海路、津浦、正泰、平绥等,以及水路之九江、汉口、安庆,凡沿铁路较大城市道务稍有成绩者,带着一帮善于逢迎心腹助手,皆藉成全道务为名,而造个人势力系统。”“对于各地领袖,孙氏极尽笼络,又兼宫彭龄的如璜(簧)之舌的明引暗诱,和鸾机训坛指示,孙氏已有天明及立愿之说,使一般忠实之人尽入彀中。所有投机分子,无不拼命奔走,尽其阿谀奉承,以博孙氏之欢心,即多年修道,号称素有经验学问之齐铭周,亦惑此说。所有一般惟齐马首是瞻者,无不闻风加入。”[②]张英誉此说,固然带有宗派情绪,不过,孙素贞到各地拉拢道首,发展自己的势力却是不争之事实。

孙素贞四处活动的另一个目的,是为她夺取教权作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他们一行在各地一贯道道首中,宣扬“道统转移”之说,借扶乩提出:“道盘暗转,日月换肩,佛主降旨月慧应运。”所谓“月慧应运”就是指将由孙素贞(月慧菩萨)继任道主。又在各地道首中宣传张光璧道运已终,他只有18年的道运,从1925年辅佐路中节办道,到1942年已经期满,应该由孙素贞“接盘”,以便引导大家去见“金公祖师”,因为只有孙素贞能直接接上金公祖师的线。所到之处,各地道首纷纷向她立“上山到顶,下海到底”的大愿,而孙素贞则趁机大量放命点传师,扩展自己的势力。通过这些活动,一大批“领导点传师”,如上海的冯月千、潘华龄、徐书印、李廷岗、李和庭、李丽久,南京的齐铭周,汉口的邢杰三,徐州的林宝璞等,均立愿表示拥戴孙素贞。孙素贞还不放心,还要求各地道首发誓:“要追随师母,不许追随师兄张英誉。”还把她在各地借乩垂训的乩文,编成一书,名曰:《一线真机》。[③]

二、孙素贞夺权失败遭软禁与暗线的形成

1943年,孙素贞外出进行夺权准备一事东窗事发。这年夏天,南京点传师

---

① 《张英誉自白书》(一)。
② 《张英誉自白书》(三)。
③ 《张英誉自白书》(一)。

何云才来到济宁,面见张光璧,向他告发了孙素贞在南方各地笼络道首,及所发表的言论,张光璧如梦初醒,意识到孙素贞企图向他夺权的阴谋。于是立即指示平津一带道首,寻找孙素贞的下落。这时,恰好孙素贞一行刚由武汉返回北平,准备稍事歇息再前往东北活动。孙素贞的行踪很快被北平道长张五福手下人侦悉,张五福一面以好言将孙氏一行留住,一面用电话将此事向张光璧报告。据张英誉称:"1943 年,家父返家,正是吾小孩病死的时候,家父伤感不已","适有南京来人,看望家父,相谈颇久(此时全家均在外边——原注),家父颇为忧伤,该时吾亦听出系为家母(孙)之事,不敢多问。俟(嗣)后家父很伤感地说,你母亲(孙)如此做法,你们也得负不孝之责。"这时,张光璧为了稳住孙素贞等人,还特意要"让位孙素贞"。表面上他对张英誉说:"今既你母(孙)如此,就把全盘道务尽行交与她来领导,从此吾远隐归农,不问世事,不知你们的意思如何?"而暗地里张光璧却派人将孙素贞等人软禁在北平,然后将各地道长、领导点传师召到济宁,对孙素贞等人的活动进行揭露,并宣布孙素贞从此不得再到各地活动,将她软禁在北平达 3 年之久。随同孙素贞外出的齐铭周、宫彭龄、邢杰三,皆受到张光璧的掌嘴,令其闭门思过。据齐铭周供称:"璋(齐铭周)自 1943 年秋,道中生出内考,曾受师尊掌责(吃耳光——原注),深知错误,闭门思过。"①张光璧还要求各地的领导点传师皆向他立"追随师尊"之愿,其中唯独山西的薛洪拒绝立愿。同年八月,张光璧又宣布宫彭龄的四大罪状:私作训文、离间道内、蒙蔽女流、拉拢领袖。把宫彭龄定为道中罪魁祸首,驱逐出道,禁止各地道首与他接触。

经过张光璧对孙素贞等人的整肃,孙素贞虽然被软禁在北平,无法外出活动,但是,她的心腹宫彭龄不久便来到上海,与李丽久、李和庭等人独树一帜,与张光璧相对抗。李和庭自称"老祖师"即"弥勒佛转世",李丽久自称"关羽转世",宫彭龄自称"吕纯阳转世",并且在李丽久家中开办"接金线(孙素贞)"的活动。张光璧手下耳目甚多,对此当然不会不知道,不久,宫彭龄便在上海失踪,相传系被张光璧派人所暗杀。

张光璧此时已经完全识破了孙素贞企图向他夺取教权的图谋,为了巩固张氏家族对一贯道的控制,他决定把教权逐步传给儿子张英誉。1934 年 3 月,张

① 《齐铭周自白书》。

光璧宣布由张英誉代替他办理放命之责,即由张英誉负责任命点传师的批准权。孙素贞当然不会心甘情愿地把这一重要权力拱手让给自己的对头张英誉,于是起来抗争,她一面亲自出面表示反对,一面通知各地道长、老前人,不许承认在张英誉名下放命的点传师。张光璧则祭起封建伦常的法宝,在道内宣布:"家有长子,国有大臣,父在从父,父去从兄。孙素贞一切事情不能过问。"从此以后,张光璧与孙素贞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可是,孙素贞也非等闲之辈,她"表面上不言语,暗地进行她的计划,所以,宫彭龄、薛洪、李鹤亭、宫彭年等,均系暗受指导,另树一帜。"[1]当然,当时一贯道的大权仍操于张光璧手中。

---

① 《张英誉笔供》(一),载《一贯道的兴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5—166页。

第五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贯道的恶性发展

一、一贯道在平津一带

张光璧是个极具政治野心的人，他并不满足于一贯道在山东的发展。在羽翼稍为丰满后，便企图把一贯道推向全国。他所借助的乃是日本侵略者的势力。张光璧控制下的一贯道，从山东向全国的发展，正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同步进行的。从1931年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1931年9月18日晚，驻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军，突然向中国驻军所在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接着，在日本侵略者导演下，东北各地纷纷成立伪政权，并在1932年2月，拼凑成伪"满洲国"。同年日军还制造"一·二八事变"，迫使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在国难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一贯道也开始了从山东向全国的发展。《一贯道发展史》总结说："张祖在掌道之时，一贯道实际上只是局促在山东一隅的小教派，比起具有相同渊源，但已发展成全国性大教团的同善社和先天道，真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张祖领天命掌道后，一贯道有了快速发展，在短短十多年间，几乎传遍全中国，成为最大的教团。"根据地方志整理的数据显示，抗日战争爆发后，一贯道已经由山东传到全国许多省份。其中，由张光璧本人主持的忠恕堂（崇华堂），由李鸿臣主持的"敦仁堂"负责向山东的益都、烟台一带发展；由齐鸣周主持的"天一堂"负责沿津浦线、陇海线向徐州、南京、开封、郑州和西安等地发展；由徐衡甫主持的"礼化堂"负责向云南、贵州等地发展；由宿志臻主持的"金刚堂"负责向江苏镇江、丹阳等地发展。从1930年到1939年，一贯道从山东发展到了全国大部分地方。

1930年，传入山西、河南；

1931 年,传入湖北;

1932 年,传入安徽;

1933 年,传入河南;

1934 年,传入河北、江苏、天津;

1935 年,传入青岛、浙江、陕西、江西;

1936 年,传入北平、江苏、湖南、上海;

1937 年,传入山东、四川、山西、哈尔滨、河南;

1938 年,传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川;

1939 年,传入江苏、安徽、辽宁、黑龙江、绥远、山西、湖北、河北、天津、山东、上海。①

张光璧首先把目标指向了在北方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平津一带。1934 年 6 月,他带领济南东坛坛主栗振鲁和刘向前到平津一带办道,但收效甚微。同年年底他仍不死心,再次带领亲信齐铭周等来到平津一带活动,稍有起色。

张光璧等在天津,最初是由刘向前把一个开算卦铺的于铎拉入道内,接着,又把商人薛洪、崔占斌,开木器行的张五福、武术教练孙锡坤、原警察巡官、富商刘万兴等人拉入道内,这些人后来皆成了一贯道的重要骨干。孙锡坤当时是"道德武学社"的社长,并且是八卦掌的掌门人,天津员警界的警官,多出自他门下。孙锡坤入道前就经常搞扶乩活动,入道后,他把道德武学社的成员,全部拉入道内,建立了"道德坛",后来到台湾传道的韩雨霖,便出自道德坛。1935 年,张光璧任命胡桂金、齐铭周、徐衡甫为"代表师",代表他在天津发展新道徒,宣传道义,在河北区福庆里成立了公共佛坛,并在五昌里、大庆里、道德武学社、山西会馆、竹远里等处,设立天一、天祥、浩然、道德及竹远里五个分坛。据徐衡甫交待说:"民国二十四年(1935)我随张光璧到天津英租界开道,因道务很盛,所到人很多,将楼板压塌过二次。"②据台湾"一贯道总会"编的《一贯道简介》记载:"民国 23 年(1943)刘向前首赴天津开荒,并请张祖亲往点道传法。张祖抵津后,先在大经略路三星客栈点化老板李允中及伙计希舜,继又点化于洪洲、粮耀先、薛洪等五位。嗣后,又点化潘金生等数十位。翌年(1935)又度化张文运等,并引度道德武学社社长孙锡坤及全体社员,成立道德坛。"1936 年,张光璧又

① 孚中编:《一贯道发展史》,台北县正一善书出版社,1999 年,第 145—147 页。

② 《徐衡甫审讯笔录》。

因道务发展，把总坛迁到府署街，成立天真总坛”。[1]

不过，总的看来，在日寇入侵中国以前，一贯道在各地的发展，终归有限，而且受到了南京国民党情报机关的监视。1936年农历闰三月初一日，张光璧应南京军事委员会参议王敬贤的邀请，携齐铭周、王星五、及“天才”齐炳寅等，前往南京“点道”，发展组织。张光璧与齐铭周、王星五从济南乘火车，济宁的点传师张振中（张孝如）在兖州登车，济宁的另一点传师胡德群拟从蚌埠上车，一同前往。当列车行抵蚌埠车站时，张光璧一行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扣押在当地警察局，初四日解送南京，以汉奸通日嫌疑，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天才”齐炳寅因未成年而被释放。齐炳寅获释后立即向王敬贤报告，王敬贤便找到一贯道济南坛主周敬臣，通过其叔父、国民政府财政总长周自齐等人的活动，于当年八九月间，先把张振中、胡德群、王星五等保释，1937年初具结后，才将张光璧、齐铭周释放。据齐铭周称：“1935年4月，随从师尊到南京浦口去办过一次道。其时道甚疲滞，南京、浦口两处所点入道者不过10人。1936年闰三月初一日，随师尊同张、王两君等由济南乘车赴南京，行抵蚌埠，上车者有济宁之点传师胡姓，在未开车前，突有蓝衣社数人，将我们师徒五人逮捕，到市公安局，初四日又解送到南京，寄押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内。经中央党部派员来问话，始晓涉及通日、通共之两种嫌疑。经切实调查一年，至1937年正月底，始刻交保开释，同返济南。”[2]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寇开始了对中国全面侵略。从此，一贯道也进入了恶性发展时期。用张光璧儿子张英誉的话来说，“在七七事变后，此时可称为一贯道之黄金时代。”[3]这种情况当然绝非巧合，而是有其特殊原因的。从一贯道方面来说，他们是欢迎日寇侵略中国的，因为他们正可以把日寇对中国侵略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说成是“三期末劫”，宣称日寇对中国人民的烧杀抢掠这种“劫难”的到来，表明无生老母将派弥勒佛降生尘世，拯救她的“九二原子”，只有入道，才能得救。而且按照明清以来秘密教门和会道门的“教义”，每当劫难降临，弥勒佛降生尘世，人间便要“换盘”，也就是要换统治者。而降生尘世的弥勒佛，便是他们的教主。而张光璧在接任十八代

① 台湾一贯道总会编：《一贯道简介》，第44—45页。

② 《齐铭周自白书》。

③ 《张英誉自白书》（三）。

祖师时，就已经传出“坛训”说：“弓长领命下天堂，十八子为帝王。”十八子便是李姓幼童李文斯，而他本人便是“领命下天堂”的“弓长”，也就是转世的“弥勒佛”，是“收拾中国混乱局面”的未来的帝王。所以，对于一贯道来说，日寇对我国的侵略，正是被他们认为是乘机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登极称帝的大好时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正适应了一贯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恶性发展的需要。所以，张光璧、张英誉父子竟丧心病狂地叫嚷：“日本皇军打到哪里，道就宏到哪里”。再从日本方面来看，一贯道乃是他们侵略中国最好的工具。让我们引用一段张英誉的交代材料，对此加以说明。他说：当时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对于日本人来说，乃是“一棵（颗）不定时炸弹”。“在这时一贯道恰当其可的发展起来”，“敌日不加禁止是有它的用意的。”一贯道“于无意中上了敌日的诡计，作了敌日宣抚助手，用消极宗教学说，于是把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炸弹削弱了，甚至化为乌有，这才是敌日不加禁止主要原因呢。”[①]据一贯道道首们交代说，当时道内宣称：日本人侵略中国造成的灾难，是“三期末劫大收人”，是“天降灾难”，“道劫并降，降道渡人，降劫收人，不求天道，大劫难逃”。对于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应该抱着“和为贵，忍为高”的态度，应该“闲坐思己过，莫辩人是非”，借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斗志。甚至还胡说什么“日本人来中国，是外甥看舅舅来了”，要“发扬新民精神，祈祷世界永久和平，实现东亚共荣”等汉奸谬论。有的道首还向道徒宣传：“日本人就是秦始皇由长安派往东土找长生不老药的那500个童男、童女的后代，和中国人原是一家人。现在要回国来，中国政府不让进，才打起仗来了。等他们打到长安老家后，就可以和平。”[②]正是因为一贯道能够适应日本侵华的需要，所以才能够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获得恶性发展。而一贯道也正是跟在日寇侵略军的铁蹄后面，进行“宏道”的，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果然是日军侵占到哪里，一贯道也便“宏”到哪里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日寇制造卢沟桥事变的目的，是为了占领平津，控制华北，进而灭亡中国。所以，尽管国民党当局一再向日本方面退让，日本侵略者仍然于同年7月30日将北平侵占，与此同时，天津也被日寇侵占。这时，一贯道利用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时机，开始在天津、北平大肆发展道务。《一贯道发展史》也承认说：“民国26年

---

① 《张英誉自白书》（三）。

② 湖南省公安厅：《一贯道的罪恶》。

(1937),对日抗战爆发,7 月 25 日,日军进攻北平、天津,不到五天,北平市及天津市相继陷落。面对这样的局面,华北一带的一贯道徒,纷纷请示张祖该如何?张祖就是不撤。""事实上,一贯道道务在民国 26 年后,更为蓬勃发展。就在这一年,张祖任命胡金桂(按:应为胡桂金——引者)为天津道务的总负责代表,他进住总坛主持天津道务。"①卢沟桥事变后,一贯道头目崔占斌、张五福等便在天津光华里 9 号设立天津总坛,作为向全国发展的指挥中心。不久张光璧与孙素贞也亲自坐镇天津,推动一贯道向华北地区的发展。"其后一贯道的发展,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皆由天津开出去。"②据张英誉称:"七七事变,先父携同我庶母孙素贞由青岛到天津,住在法租界光华里,此乃天津总坛的设立先声。"③1939 年,天津道务统归张光璧的亲信胡桂金掌管,他手下有号称"四大金刚"的张文远、孙克枕、韩雨霖、霍永馨 4 人协助。由于孙克枕曾在天津的日本租界当过巡捕,与日本人早有勾结,于是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后,便由他负责与日寇天津宪兵队长田里拉上关系,并进而与日本一八二〇部队建立了联系,使天津的一贯道骨干皆获得了日本宪兵队签发的特别身份证。在日寇的庇护下,一贯道在天津得到更大的发展。在总坛之下又设立浩然、文化、普化、天祥、道德、慈航、明德、天一、天德、忠恕、金刚、干一、兴毅、善一、敦厚等 15 个分坛。共拥有点传师 1000 人,道徒 10 万之众。从 1938 年到 1949 年,天津总坛所属的敦仁等 4 个坛和后来建立的 14 个分坛,向全国各大中城市派遣了大量办道骨干,在各处建立了 61 处天津支线,成为一贯道向全国发展的基地。

天津的一贯道在张光璧、孙素贞直接控制下,大肆为日本侵略者效劳。日本学者浅井纪认为,在中国抗战时期,平津一带的一贯道,"是同日军合作的"。而平津一带的一贯道,正是在张光璧、孙素贞直接控制下的,这正好说明一贯道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态度。一贯道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一个明显事例,就是张光璧、孙素贞亲自主持平津一带一贯道组织为日军捐献铜铁。1939 年,日寇为了扩大对华侵略战争,急需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各种物资都十分匮乏,难以支持其对外侵略,特别是制造枪炮的铜和钢铁,尤为紧缺。他们得知在中国民间藏有大量铜钱后,便在沦陷区到处搜罗铜铁。张光

① 孚中编:《一贯道发展史》,台北县正一善书出版社,1999 年,第 155—156 页。
② 孚中编:《一贯道发展史》,台北县正一善书出版社,1999 年,第 157 页。
③ 《张英誉自白书》(三)。

璧、孙素贞接到这一任务后,便在平津一带亲自主持此事。他们把任务下达给亲信、天津道长胡桂金,胡接到任务后,立即把各坛的负责点传师召到天津光华里总坛。胡桂金拿出一包绿豆,对大家宣布:绿豆乃“仙佛所赐仙丹”,可以防避瘟疫,能医治百病,上天慈悲,才准许各坛道亲购买备用。限定每人只购买一粒,借以显示神秘珍贵,并且规定必须用铜钱购买,每一粒需要15枚铜钱。若没有铜钱,则需以纸币兑换成铜钱,才能购买。又说此仙丹一定要好好保存,若遇有瘟疫疾病需要服用时,先用开水冲泡,饮用此水,即可百病消除。每粒“仙丹”可以一再使用,屡用屡灵。但是切忌见疑,否则就不灵了。一贯道道徒大多是十分迷信的人,经过道长如此宣扬,当然深信不疑,纷纷四处搜罗铜钱,争相购买,有的还替自己的亲戚购买。天津拥有点传师1000余名,道徒多达10万之众,仅天津一地,就很快为日寇搜集到150万枚铜钱,成为日寇制造枪炮,屠杀中国人民的原料。①

七七事变后,一贯道在北平也发展很快。

一贯道在北平的活动,始于1935年。当时张光璧派其盟兄弟栗振鲁来到北平开道,在东单新开化路29号周景岑家设立坛堂,并发展其叔父周自齐入道。由于周自齐曾是国民政府的财政总长,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一度出任国务总理,在政界颇有影响。所以,一贯道在北平便以失意政客为发展对象,如曾在北洋军阀时期担任绥远省都统的潘榘楹和袁世凯的义子、曾被袁封为将军、曾经担任过北洋政府驻山东兖州镇守使的唐天喜,入道后皆成为“修一坛”的领导点传师。曾任“辫帅”张勋师长的朱兴元,入道后也成为“顺一坛”的领导点传师。曾任军阀孙传芳部师长的孙兴祥,入道后也成了“妙一坛”的领导点传师。1936年张光璧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期间,栗振鲁曾对张光璧的“信心动摇”,提出“以后要靠自己维持一贯道法统的说法”,因而失去张光璧对他的信任,加上栗振鲁不愿听从张光璧的摆布而将他开除道籍,另派在天津总坛的亲信张五福(张范卿),带领“天才”宫彭龄、刘心泉来北平主持道务。因为张五福在张光璧被捕期间,曾“用自己的生命和一切的财产来保释张祖出狱,因此,张祖在出来后,即改派张五福接替栗纯旭(栗振鲁)在北平的道务。”“民国26年(1937)对日抗战爆发后,北平的道务在张五福的领导下,大为宏展。”②张五福

---

① 《王效峰等案卷》。

② 孚中编:《一贯道发展史》,台北县正一善书出版社,1999年,第187页。

通过潘桀楹和唐天喜的关系，同日本的侵华秘密组织黑龙会建立起联系。张五福是木匠出身，为人善于逢迎拍马，所以深得张光璧、孙素贞二人的欢心，被树为道中模范。他到北平后不久，便与原来在北平办道的王勋臣、董雪桥，在前门外施家胡同12号建立“信一坛”。后来，天津道德坛点传师杨灌楚等又在前门外兴隆街草厂设立“纯一坛”。1938年9月，天津慈航坛坛主吕怀拯带领道徒张德贵等在前门外打磨厂板井胡同1号设立“善一坛”。他们很快便又在北平先后设立了信一、纯一、善一、守一、德一、明一、崇一、顺一、修一、道一等10个坛，坛主以上负责人有50余人，道徒人数也日益增多。张五福命令各坛坛主募捐筹款，在北新桥财神庙街2号建立“北平崇华堂”，作为北平地区一贯道各坛的总坛，由张五福主持领导，北平的道务从此形成规模。翌年正月，张光璧、孙素贞来到北平，住在崇华堂内，“北平崇华堂”遂成为全国一贯道的活动中心之一。同年二至三月，在北平鼓楼大街蒋家胡同50号召开“顺天大会”，由张光璧亲自主持，训练道内骨干，事后建立了“北平支线”，任命张五福为道长，从此，北平的道务便脱离了天津支线的节制，成为独立的支线。新成立的北平支线管辖太原、绥远、大同、张家口、石门(今石家庄)、定县、保定及河南等8个地区的一贯道组织。1941年，张五福通过信一坛“领导点传师”周灿如的关系，结识了日本“华北宪兵司令部”的中川大佐。

“信一坛”的领导点传师周灿如原来是个大奸商，在前门外施家胡同开设一钱庄，与日寇、汉奸早有勾结。后来，他把一名年轻的日本特务收为“义子”，以大量金钱让其挥霍。这个日本特务为了报答此恩，便将周推荐给日本“华北宪兵司令部”的中川大佐，给两人拉上关系。中川便给周灿如、宫彭龄等一贯道道首，发放了特别通行证，使他们得以在北平各处畅通无阻地进行道务活动。[①]《一贯道发展史》叙述说：“民国28年(1939)，可说是一贯道发展上的重要转折，看来张祖所开创的一贯道，已在华北各主要市县建立发展的重心，在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不但不受影响，反而大为发展。”[②]张光璧这时已经将发展道务的中枢，从天津转移到北平，“为了凸显北平道务中枢的重要，张祖特别在2月19日到3月25日，首度在北平鼓楼大街蒋家胡同50号，开办了一次顺天大会。有

① 《王效峰等案卷》。

② 孚中编：《一贯道发展史》，台北县正一善书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

200多人来自各地的干部参加。”①

在1941年以后，张五福又在北平市区建立了华一、兴一、化一、宏一、铎一、合一、通一、竖一、妙一、定一、理一、宣一、仁一、达一等道坛，并在附近各县建立大量组织，先后任命了总领导点传师7人，领导点传师40人，负责点传师64人，点传师72人，坛主33人，并派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发展道务。仅在北平附近各县就设坛400多处，还相继在沦陷区开辟了镇江、宁夏、彰德、顺德、辛集、扬州、洛阳、武汉、九江等支线，在蒋管区开辟了陕西、四川等地，建立了18个支线，下设93个分线，112个总坛，4个直属支坛，18个支坛，20个分坛、支线。其中点传师赵裕坡开辟了镇江支线，刘振东开辟了宁夏支线，王志纲、吕怀拯、何锡山开辟了彰德支线，并将天津道徒开辟的顺德道务纳入北平顺德支线。

1941年，张润田、吕怀拯、何锡山三人，又开辟了西安、重庆两条支线，其活动范围扩展到陕西、四川两省。北平线重庆支线的“领导点传师”何锡山把四川袍哥首领、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参议员贾文秦拉入道内。然后通过贾文秦的关系，将北洋军阀时期曾经充任过华北某市市长的庞某拉入道内，然后，令贾、庞二人引见国民党司法院长居正，并把他拉入道内。日本投降后，张光璧还同居正直接来往，张死后，居正还在张的墓碑上题了字。②

当时辅佐张五福的重要人物有：陈明源、郭绪铭、陈恩善、郭树荣等。到1944年，鉴于坛口众多，又分为：孝、悌、忠、信、礼、义、廉七善之总坛。翌年，在北平城内以中山公园为界，分为内东、内西两组，又以前门大街为界，分为外东、外西两组。截止到1949年北平解放，共发展道徒19万之多。③ 1941年底，张五福又用从道徒身上搜刮到的钱(6.5万银圆)，在北平兴化街购买了一处拥有30多间房子的住所，集中了道徒中的瓦工、木工，花费5个多月时间，重新装修后，把崇华堂迁来这里。这一切成绩都使张五福深得张光璧的赏识，而且他手下还拥有许多有财有势的“道亲”，在道内地位正如日中天。张光璧的另一亲信宫彭龄因与之意见不合，竟被他排挤出北平支线，只好跟随孙素贞到各处去巡视道务。

---

① 孚中编：《一贯道发展史》，台北县正一善书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1页。张光璧死后，葬地秘而不宣，此说是否确实，有待考证。

③ 台湾一贯道总会编：《一贯道简介》，第47—48页。

1942年4月,张五福得知北平宣一坛的"领导点传师"米国全的父亲过去同北洋军阀有些渊源关系,便授意他设法拉大汉奸、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堂入道。米国全最初在北平各大饭店设宴款待,但为王所拒绝。后来经过多方设法,收买有关汉奸使之向王游说,结果在一次宴会上,由道长张五福和领导点传师何锡山竭力劝说,王揖堂始首肯,并亲往"宣一坛",由张五福亲自点道,由何锡山讲解"三宝"。随后,张五福又就《论语》中"学而时习之"一语大加发挥,终使王揖堂折服,连呼张五福为"前人"。王揖堂入道后,便在家里设置佛堂,并对日本侵华各地军事机关和特务部门提出保证,称一贯道为"真道",此后不仅不应干涉,而且应予以扶持。一贯道从此得以在北平和华北大肆发展。

在日寇侵华期间,天津、北平两个支线得到空前发展,两地的道长张五福和胡桂金,也利用从道徒身上搜刮到的金钱,分别在两地为张光璧、孙素贞修建了豪华的住所,竞相向主子献媚取宠。1940年春节,张五福和胡桂金二人为了向主子邀宠,争着邀请张、孙在自己这里过年,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张、孙两人便在平津两地各吃一次年饭,称之为"双过年"。

在日寇侵华期间,张光璧又把一贯道从山东和平津推向全国各地,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反动会道门。

二、一贯道在华北其他地区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平津后,气焰更加嚣张,一面进攻上海,一面由平津南下,以实现其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初,日军从北平、天津分三路分别沿平汉、津浦、平绥三条铁路向晋察绥进攻。先后侵占太原、石家庄,成立汉奸傀儡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一贯道则凭借日本侵略者的庇护,大肆向华北推进。

一贯道在华北地区的发展以张光璧创立的济南总坛为基地,该总坛下属四个分坛,即以郝书暄为首的"敦仁坛",李鸿臣为首的"金刚坛",徐衡福为首的"礼化坛"和齐铭周为首的"天一坛"。以下是一贯道在华北地区的发展与分布情况。

河北省

石家庄市

一贯道在该市的组织庞大,有道首182名,道徒4516名,广布于全市13个区县。1950年被取缔后,少数道首仍继续暗中活动,以经商为掩护,建立联络点。共串联了37个村庄,有点传师以上道首58名,坛主21名,三才41名,道徒89名。①

藁城县

1940年传入该县,分藁城、正定、石家庄三支线,统归石家庄系领导。有栾城县人王济川、石家庄人郝国印、正定人翟中林先后在藁城县城的梅花、赵庄建立分坛。到1943年底,共建立了17个分坛。分坛设有坛主、达善师、讲阐师、办事员等职务。1947年发展到125个村。有前人5名,点传师24名,坛主180名,道徒9253名。②

晋县

1938年由束鹿县传入该县的南部和东部。1940年,该县西关村人席英贤受天津文化坛派遣,回到家乡设立"慧一坛",开始传道。与此同时,从石门(石家庄)也传来一股。1944年,席英贤将该县的三股合并,统归天津的文化坛领导。道徒遍及全县的104个村庄,共计23969人。其中有点传师62名,坛主88名。③

正定县

1941年,张五福将一贯道传给河北正定的刘德山,刘德山在该县发展了道徒90余人,在城内府墙东街(今解放路)自立成鞋铺建立一贯道的"慈北坛",刘德山任坛主兼点传师。坛内设点传师兼坛主三人,副坛主二人,领导点传师四人,讲善二人,文牍一人,招待八人。后来,刘德山又与石门市(石家庄)总点传师在正定城里建"慈惠坛"、"慈航坛"、"慈善坛"、"慈仁坛"、"慈和坛"、"慈德坛"、"慈厚坛"。从1930年到1945年,刘德山一共在正定建立道坛76个,有"三才"以上的骨干210名,发展道徒4152人,遍及正定的130村庄。而且在灵寿、无极、深泽、安平等县发展道徒,建立佛坛。④ 入道要有两名老道徒做保荐人,交纳2元以上的入道费,一人入道,要求全家入道。每逢初一、十五,道徒要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④ 《正定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年,第837页。

集中在公共佛堂拜佛，听点传师、坛主或讲善宣讲《圣训》或朗读弥勒佛经，诱使道徒发“净身愿”或“财愿”（捐献财物）。①

高邑县

1940年传入，到1950年已经在全县的67个村庄设立基层组织，共有道徒1200人，道首64人，其中前人2人，点传师16人，坛主46人。②

深泽县

1942年该县西关村人贾丙文在无极县加入一贯道，奉命回乡发展道徒。他首先在自己家里设立坛堂，发展道徒。1945年，贾丙文被提拔为“前人点传师”，先后在全县建立坛堂8个，家坛20个，吸收道徒500余人，提拔点传师6名。③

无极县

1941年2月由正定点传师吴清元传入，首先发展了该县城内的郝清江、刘贞义，北苏的陈洛明，西南汪的贾汉舟，进而发展了该县县长汤玉瑞，警备队副大队长苗济仓等官员十数人入道。陈洛明最初在城内开设道坛，后来向农村发展，由陈洛明、郝清江、刘贞义等人为点传师，分领县城、北苏、郭庄三路。每路之下设7个坛，共计21个坛，每坛设坛主一名（分为总坛主、分坛主和家庭坛主）。按照分工，还设立有达善师、劝善师、文牍师（即三才：天才、地才和人才）。1943年，以李家庄的魏玉章为首，进入深泽县，在县城周围村庄进行传道活动。在城内贾炳文家设立公共佛堂，在14个村庄发展道徒1212人，其中道首30余人。后来，陈洛明又到藁城县南孟镇传道，发展坛主1人，道徒13人。到1945年，一贯道已经在全县的141个村庄进行传道活动，道徒近万人。④

元氏县

1939年，获鹿县小北店村点传师董泰山等来到该县城内西街设立公共坛，以经营花店为依托发展道徒。1941年至1945年春，全县共有23个道坛，点传师16人，坛主67人，道徒7532人，分布在平汉铁路两侧的村庄。日本投降后，外地传道人陆续离开，县内一贯道组织分为两支：一支由里仁庄的高会有掌握；一支由获鹿县牛家庄点传师牛健忠把持，均受制于以石门保华锌工厂为依托的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6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6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上层道首。[①]

井陉县

该县的一贯道是由石门市传入的,[②]所以,井陉的一贯道由石门市的一贯道道长领导。大约在1942年,石门市的前人韩树培(保定人)在霍玉珍的书店里传道,并在长岗、张村、板桥、南屿、城内、矿区一带地方发展道徒。截止到1951年一贯道被取缔时,共有道徒5298人,道首115人(其中点传师10人,坛主57人,三才9人)。该县一贯道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霍玉珍等3人,下设东、西、南、北中5路,每路由点传师负责。东路有张村、梅庄、长岗等16村;西路有南屿、贵泉等5村;南路有龙窝、板桥、朱家峒等7村;北路有高家庄、南正、河东、王舍、北寨等17村;中路有东关、北关、黄沟等3村。下面共设有51个坛。每个坛设有坛主,并根据活动分工。另外,设有达善师、劝善师、督善师、文牍师等,其活动范围涉及96个村。[③]

宣化

大约在1940年前后从北平传入该县,由道首孙明善总领城乡道务,下属总领点传师68人,点传师436人,设公共佛坛7处,家庭佛坛60处,宣化城内和深井设有总坛,共有道徒34576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19.5%。[④]

张北县

1940年传入,以张北镇、二台、馒头营、公会、大囫囵等村镇为中心。1943年到1944年为其全盛时期,道徒多达二万人。职业道徒300人,到1949年仍有坛主9人,点传师4人,道徒945人。[⑤]

万全县

1940年前后传入该县,分为金线和绥西后线两大派,均隶属宣化中和总坛领导。金线派于1941年春由张家口市的赵双城、周德润传人,他们首先在万全城永成兴布庄建立"万德坛",发展点传师9名,坛主1名,万德坛遂成为金线派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② 一说该县一贯道是1940年从北平传入。道首为孙明善,下属有总领点传师68人,公坛7处,家坛60处。宣化城内和深井设有总坛,有道徒34576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19.5%。见《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0—71页。

③ 《井陉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71页。

④ 《宣化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90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2页。

的活动中心。其活动范围涉及该县东部各村及张北、张家口市郊。到1949年，该派在全县共分布在73个村，有公共坛13处，家坛92处，佛堂81处，中小道首700余名，道徒7000余人。绥西后线派于1940年冬由宣化中和总坛分道长尚顺贵受命于李植阜来到该县洗马林开荒办道。次年春，又有赵增福(北平人)李兴山、谷有庆(涿鹿人)等5名点传师来县传道。首先发展道徒100人，建立“广一坛”为总坛，成为绥西后线在该县的活动中心。后来又建立“化一”、“宏一”2个公共坛，到全国解放为止，该派的组织分布在全县的68个村，有公共坛13处，佛堂87处，道首454名，道徒3519名。[①]

怀安县

1941年北平的张五福派李左宪等人在该县城南街成立公共佛堂，次年就发展到全县，并分为东西两路。到20世纪40年代末，一贯道已经波及全县57.41%的村庄，有坛主以上的各级道首1614人，其中点传师351人，道徒1947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17%。集中在王虎屯等28个村庄，其中第六屯乡的第三屯1933人中，道徒占到84%。[②]

赤城县[③]

该县一贯道于1943年由怀来县点传师赵永富、石树兴传入，发展道徒1939人，分别建立了“普化总坛”和“马光总坛”，负责全县的道务。[④]

沧州

1938年由天津传入，然后传入盐山县，初期主要在县城附近的十几个村庄活动，发展了300多名道徒。[⑤] 抗战时期，该县一贯道首刘德山秉承日军特务机关旨意，由天津回到沧州发展道务。办道人员多数为土豪劣绅、市侩、游手好闲者。他们以“行善”和“躲避大灾大难”为幌子，欺骗群众入道。[⑥]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6—77页。《万全县志》记载与此不同，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696页。

② 《怀安县志》，地矿部水文印刷厂，1994年，第478页；《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③ 1858年撤销赤城县，并入龙关县，1960年龙关县更名为赤城县。

④ 《赤城县志》，改革出版社，1992年，第399页。

⑤ 《鲁山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37—638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7页。

南皮县

1940年自天津传入南皮，是年，博古于村高世玉经柴庄子村，由天津的一贯道首柴锡光介绍入道，以后逐渐扩大道务。其上级是总坛，下设捷地、泊头两个支坛，共有道首112名。1944年，高世玉被提拔为分坛乾元坛的点传师，成为一贯道在该县的最高道首。然后又把一贯道传入附近的河间、黄骅等县。①

唐县

1943年该县淑闾村的张文星、南关的苏老济等9名道首，在该县发展道徒3000多名，其中坛主117名，点传师31名，前人5名，道徒遍及全县的数十个村庄。抗战时期，该县的一贯道勾结日本特务伊藤，以传道为名，搜集抗日军民的情报。②

博野县

1938年到1944年，该县城关的姜小山等人，先后从北平、天津等地请来一贯道道首在该县设坛办道。其中姜小山一支传播范围最广，1938年先在小店的张营设立总坛，在80多个村庄吸收道徒。在博(野)温(仁)公路两侧的村庄，几乎村村都有其活动据点，入道人数占全县人口的30%。③

冀县

1936年由冀县在天津经商并入道的宋振声、赵殿廷、张志明、安书琴、孙金标等，先后被张光璧和胡桂金派遣回到家乡开荒办道的。宋振声是冀县漳下村人，在天津天祥市场经商，是天津一贯道"天祥坛"吸收入道的，其妻冯秀明也随之入道，于同年年底在宋振声家中设立"中和坛"，由冯秀明任坛主。宋振声于1940年病故，由冯秀明接续办道。1941年，冯秀明去天津，由孙素贞放命为点传师。冯秀明回到冀县后，更加积极发展道务，在冀县城内成立冀县总坛。1944年抗日民主政府令一贯道停止活功，但是部分道首仍继续传道。

该县一贯道最高领导人是道长谷希皋，有以下各支：

宋振声(即冯秀明)支。初由宋振声为首，宋振声故后，冯秀明利用"一体四用"的方法领导各坛。即由冯秀明为体，其他点传师为用。她在1940年以前共设立24个坛，1942年至1950年先后发展点传师60余名，坛主120余名，副坛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3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页。

主22名，帮办坛主6名，“成乩三才”23名，“初练三才”35名，道徒3000余人。其活动范围除冀县的18个乡、200余村外，还涉及枣强、南宫、新河、清河、丘县等5个县。

谷希皋支。谷希皋系冀具陆村人，1937年，在天津天祥市场经商时加入一贯道，同年11月受胡桂金的派遣回乡开荒传道。他首先在陆村成立了一贯道佛堂，并于1938年1月从天津请来点传师，大肆活动。1938年至1944年，由陆村的一个佛堂发展到30个佛堂（本县8个、衡水县7个、枣强县15个），领命点传师18个，提升坛主70余人，组织了15盘乩，培养三才50余名，发展道徒3000余人。

1944年，抗日民主政府对谷希皋等不断进行教育，并查抄了他们的一些佛堂，大部分受蒙蔽的群众停止了活功，而谷希皋却采取两面手法，以明转暗，继续进行道务活动，1948年，又受天津总坛派遣去东北开荒办道。陆村点传师崔福来、雷石春也先后去天津、郑州、开封等地秘密串联，进行道务活功。

安书琴支。安书琴系冀具北榆林村人。1936年9月，在天津道德坛加入一贯道。1938年3月，在天津南竹林太兴里成立佛堂，自任坛主。同年返回原籍设坛办道，发展道徒，后和彭村的刘书同勾结在一起。1938年秋，安书琴返回天津，伙同张五成等5人重建“兴义坛”，后又设立“致中坛”、“刚毅坛’、“致修坛’、“志义坛”、“孙氏菜园坛”等，1848年被提升为点传师。

常润田支。常润田于1938年春在北榆林村安书琴家入道。入道后又纠集了杜善廷、郭斋、郭焕章等6人在冀具城内常润田家开的“馒头坊”成立“温故佛堂”，常润田自任坛主，其他几人分别任副坛主，到处开荒办道。1942年秋，常润田去天津领命点传师，1941年，冀县设立总坛时，常润田任总坛主，负责冀县全县和枣强、南宫、新河县部分村庄的道务。1947年，常润田病死，由杜善廷继承常的职务，继续从事道务活劫，其间，该支共提升点传师21名，坛主57名，副坛主及帮办坛主55名，成乩三才5名，初乩三才5名，发展道徒1000余人。①

滦平县

1939年，有陈栅子乡大栅子村的引保师梁殿武从张垣传入，最初在安匠屯西街四和永商号设“普仁坛”，1944年，道首那奎仲等人在拉海沟、巴克什营、叶营等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124页。

地发展道徒。1946年9月，为了扩大一贯道组织，引保师梁殿武、点传师许仲一先后介绍小贩武顺、铁匠刘纪元在普仁坛入道，并很快委任二人为正副坛主。1947年，老道首田玉昌之子田克增加入普仁坛，道首们大肆活动，设坛、开仙佛班、人事班、忏悔班，放命点传师。并且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操纵，在滦河、王营子等40多个村发展道徒215名，点传师27名，领导公共坛28处，家庭坛35处。①

丰宁县

1938年，由察哈尔省独石口孟姓点传师传至大阁，1941年，多伦的郝维珍、长阁的苏连华在大阁周围发展道徒，后被日伪警察利用，接受搜集情报的任务，并规定摆坛时要有警察参加。日本投降后，一贯道提出"开荒下种，普度良贤"的口号，传道人员从多伦线、北平线、宣化线纷纷涌入丰宁，发展对象由地主、富商扩大到贫民、军警宪特人员。1946年，在县内设立总合中佛坛1个、合中佛坛3个、公共佛堂20个，家庭佛坛1876个。有点传师50人，坛主29人，道徒8462人。②

围场县

1942年2月28日，河北武清县点传师金阔全在县内吸收芦志君、李义，开始在该县发展组织，后来发展为两条线，第一条是多伦线，第二条是承德县。每条线来围场，均要通过芦志君、李义二人才能进行传道活动。1942年到1951年期间，共发展道徒7183名，建立家庭坛主397户，设立公共佛堂118处，有44名点传师。③

秦皇岛市

山海关区：1940年传入山海关，创办人是王仲田，点传师有杨灌楚、孙克忱，道徒有数千人。

北戴河区共有两个坛：普化坛和洪益坛。有道首11人，道徒455人。④

唐山市

1932年，由山东济南传至该市，1938年，点传师罗国华先后在段学勤等人家和振记瓷厂设坛，罗国华还在家中设大坛，操纵唐山道务。此后，一贯道便在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2—83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3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6页。

唐山逐渐扩展。[1]

迁安县

1939年古冶点传师李希富发展迁安师范教师马书鲁为道徒，1941年，马书鲁从古冶请来点传师潘绍先在伪冀东银行设立佛堂，委任李殿恩为坛主，发展道徒30余人。翌年，潘绍先和王绍庭（林西县人）在县城“福盛祥”等大商号内建立佛堂，并委任各商号经理为坛主。潘亲自主持道务和讲道、点道，发展道徒400余人。1942年潘绍先在周俊生家建立佛堂，由周任坛主，并组织“仙佛研究班”。马书鲁等道首均积极参加，专门研究发展道徒的方法和手段，训练三才。翌年，任命周俊生、郑玉山为点传师，周以大石河为中心，在周官营等地建立9个佛堂。郑玉山以小寨为中心，在潘营等地建立佛堂6个，共发展道首20余人，道徒710人。同年春，建昌营镇平安村王作民从山海关请来点传师罗占奎、范春生，在自家建立佛堂，发展道徒40余人。到1949年前夕，境内共建大小佛堂37个，发展点传师以上道首18名、坛主50名，三才5名，道徒1150名。[2]

丰润县

1941年，该县吴印堂在天津加入一贯道后，来到唐山办道，发展道徒，吴充任天宝坛点传师，同年，吴伙同该县的吴庆贺、吴国华等人在中门庄、韩城、欢喜庄一带发展组织，共有坛主、点传师20余人，建立家庭坛100余个，道徒1000余人。[3]

滦县

1941年，由唐家庄、古冶等地传入该县城区附近各村庄，原丰滦迁联合县七、八区不分村，以及原滦卢联合县西部大石佛庄、小石佛庄等村，均设有分坛，有道徒600余人，1942年，在伪治安军庇护下，古冶道首曾派点传师李布福等到滦县活动，发展道徒。[4]

玉田县

1936年，围里村胡玉辰经北平总坛道长发展为一贯道点传师，在该县围里村一带发展道徒，设立分坛。1940年，唐山一贯道长引渡万新庄的万学明为点传师，在家乡发展道徒。此后一两年里，在围里、虹桥等55个村、镇，发展道徒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1—92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3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3—94页。

1050 人，围里村即有 210 户入道，占全村总人口的 96% 以上。①

三河县

1938—1943 年间，该县大康庄的李克成等人先后从天津、北平等地请来一贯道道首在该县设坛办道，有 8 个支线在境内蔓延。李克成于 1942 年夏建立震宜总坛，其他几名道首在李旗庄等地建立分坛，加上其他几支，全县坛主以上道首多达 266 名，道徒 15530 名，在通唐公路两侧，几乎村村有一贯道的活动，入道户在 70% 以上。②

大城县

1937 年传入该县，由山东人钱德山最初在王屯一带传道，但仅发展了 6 人。1939 年，随着日寇的入侵，一贯道开始发展起来。点传师孙建盘在南赵扶设立了总坛，又到冯庄等村设坛，道徒多达 1420 人。③

大厂

该县为回族聚居区，但一贯道也已经传入。到 1949 年前夕，该县共有道徒 804 人，分布在潘各庄等 24 个村庄，有坛主 16 人，分坛主 14 人，点传师 56 人，待命点传师 18 人，三才 3 人。④

定县

境内的一贯道有两支：一支是 1941 年 4 月，以河间人陈海田为首，在定县清风店一带发展；另一支是 1939 年 11 月，由该县城内高志杰从绥远来到家乡办道，在城内王芝莲家设立佛堂。1942 年，高志杰去南方开荒办道，该支由吴彦会负责，1945 年是该县一贯道猖狂发展时期，不少道首到外地去开荒办道，该县一贯道由杨寿仁、尹成章负责。1947 年，杨、尹二人逃到北平，该县一贯道遂停止活动。⑤

涿州

1943 年传入涿州，属于孙素贞派。该县邓宗起、张炳恒于 1943 年在北平加入一贯道，并受孙素贞的派遣，回到涿州发展道务。到 1946 年，在涿州的 211 个村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7—98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0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3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4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5 页。

中，发展道徒5342人，其中坛主36人，骨干点传师15人，代命点传师、护道师、三才等90人，道徒5342人。邓、张二人于同年三月被委任为“信诚坛主”，同年冬，二人又被提升为点传师，负责领导该县的13个道坛。1948年6月，孙素贞召集该县坛主以上道首到北平大栅栏受训5天；要求大家追随“孙师母”。[①]

清苑县

1934年传入该县，主要分布在史庄、谢庄、温仁等95个村庄，有道徒1936名。[②]

唐县

1943年到1951年间，该县淑间村的张星文、南关的苏老济、枣庄村的刘振生等9名道首共发展道徒3000多名，其中有坛主117名，点传师31名。前人5名，遍及全县的数十个村庄。[③]

枣强县

该县一贯道有4个支派，其中张云桥一支势力最大。张云桥于1935年在天津入道，1938年返乡办道，1939年被委任为点传师、老前人。4个支派共拥有佛堂159个，其中有总坛1个，公共坛128个，家庭坛30个。各级道首565名，其中点传师195名。[④]

邢台市

1945年传入该市，当时在西大街设立德信坛，下设5个分坛，有道首156人，道徒2656人。直属北平道长孙之贵领导。[⑤]

南和县

1941年由邢台人赵清吉等传入该县，首先在该县北关、王庄设坛办道。该县点传师受邢台总柜谷其勋等人领导。[⑥]

曲周县

1940年，一贯道点传师杜世昌发展伪政府建设科长岳馥斋等人参加，以“修贤成佛”等邪说蛊惑人们参加一贯道，全县共有道徒730人，道首82名，分布在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3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

全县 6 个乡镇、18 个村庄。[①]

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

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

一贯道在归绥市的道徒众多,组织庞大,活动突出。1930 年传入该市,最初入道者并不多,1937 年 10 月,归绥市沦陷后,一贯道得到日本侵略者的大力支持,遂在城乡迅速发展。到 1941 年,全市已经有佛堂 100 多处,道徒 2 万余人。按照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慈编为 10 个大组,总坛设在石头巷,是全市的指挥中心,又叫"中心坛"。[②]

武川县

1939 年春,冯有章、刘振纲和马金玉等 3 人,由包头来到该县,在可镇开设"天德成"杂货铺,以经商为掩护,传布一贯道。1946 年,天德成商号歇业,冯有章等 3 人专心办道。3 年间,一贯道逐渐由城镇扩展到乡村,设立家庭坛 8 处。1945 年,县内佛坛增至 53 处,道徒发展到 500 余人。1948 年,该县一贯道召开"忏悔班",按照"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 字编组,然后分组办道,进行道务活动。[③]

固阳县

1939 年,河北人孙某、宋某 2 人来到该县传布一贯道。他们首先与当地人蒋修梅、赵建全接头,在赵建全后院建立第一个家庭佛堂,开始吸收道徒。首先吸收的有单汝清、郭克勤、李文启、张明正等,不久,赵建全夫妇外出传道,道务由单汝清、李文启负责。后来又在郭明太哥哥家后院建立公共佛堂。1944—1946 年,城内有公共佛堂两座,家庭佛堂多处。农村也有很多地方建立了佛堂。点传师、坛主、三才道徒遍及全境。道徒们每日成群结队去佛堂烧香、磕头,甚至在家吃饭、喝水都要高举过顶,默念"五字真经"。[④]

土默特右旗

1940 年,包头一贯道白氏佛堂"天真坛"为扩大势力,派张永和、王化南、杜仁等到萨拉齐县开荒办道。首先在萨拉齐镇内设立道德坛,杜仁等人为坛主,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46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02—203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04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06—207 页。

1943 年，萨拉齐镇内相继成立了东西南北四个坛：东面为“和一坛”，坛主是高登业等；南面为“波罗坛”，坛主为赵云雷等；北面为“德一坛”，坛主为刘贵哺等；西面为“般若坛”，坛主为苏云等。总指挥设在道德坛，由王化南主持，樊增林等人辅助。全县共有佛堂 201 个（其中家庭佛堂 53 个），前人 7 名，点传师 156 名，坛主 760 名，三才 69 名，道徒 23194 名。此外，由山西来的传道人员也在该县建立了家庭佛堂，发展了一批道徒。①

宁城县

该县一贯道是由沈阳、凌园、多伦、平泉 4 条线传入。沈阳线于 1941 年 12 月，首先传入小城子，后来由宋长山扩展到大城子、三座店、八里罕等地，建立起家庭佛堂 45 处。陵园线于 1946 年传入五化、山头、忙农营子等地，1948 年在忙农营子东沟丘村设立“北方佛堂”一处。多伦线于 1945 年 3 月，传至黑里和乡，1948 年扩展到八里罕、热水等地。平泉线于 1949 年 2 月，传入八里罕等地。至 1951 年一贯道在全县共有道首近 300 名，发展道徒 10764 名。②

多伦县

1939 年 2 月，张家口商人周庆魁来到多伦县万国道德会，与理事长张心一接触，协商在多伦县建立一贯道组织。4 月 15 日，周庆魁协同聘请的点传师苏振远，在万国道德会建立该县一贯道总坛——天真坛。成立时就经周庆魁介绍了 300 人同时入道，并开设了佛堂。一贯道在多伦利用战争年代兵荒马乱，人心不稳的形势，制造谣言，恐吓和欺骗亲友入道，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加入其中。到 1945 年，该县加入一贯道的人数，占全部人口的 30%。佛坛增至 8 个，即：天真、天成、天善、天理、天心、天德、天明、天一等坛。该县所辖 4 个区共有佛坛 67 个，因该县一贯道组织人数多，遂成了周边地区一贯道的活动中心。该县一贯道最高首领是邓金珠、张武福。1945 年由坛主先后派出 32 名点传师到该县周边地区开荒点道，并分设三条专线，即山西线、北平线、隆化线，开展道务活动。点传师宗广享被派到赤峰传道，他在赤峰领导 12 名点传师，开展道务活动。掌握公共佛坛 26 处，家庭佛堂 90 多处，发展道徒 800 多名。刘金山被派到围场县传道，共设坛 8 个，发展道徒 500 多人。1947 年 7 月，道首邓金珠派平定堡点传师白瑞生来到多伦办“忏悔训练班”，全县共设 20 余处“忏悔班”，要求道徒全部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07—208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12 页。

参加忏悔，把自己所做对道不忠的事情全部坦白交代，并立愿“舍身办道”，同时派人到赤峰、围场、丰宁等地办班。①

巴彦淖尔盟

1939年一贯道传入陕坝（该盟杭锦旗驻地），1940年传入临河，但道徒不多。1947年各县普遍传入，到1951年已经发展到16100人，占总人口的5.5%。点传师以上的道首49人，坛主625人。该县一贯道不定期举行训练班，训练道徒，在陕坝办过“炉会”、“仙佛研究会”、“忏悔”、“坛主”等训练班。道首们经常诱骗道徒捐献财物，奸污女道徒。②

杭锦后旗

1940年传入该旗境内，开始发展道徒。到1947年，境内道徒已经分为6个地方派系，即由山西、天津、甘肃、河北、绥远、包头的道首公开进行道务活动。其中河北派的道首潘某活动于陕坝南马路二道街，孙效贤活动于陕坝东马路头道街，发展了点传师14名，坛主11名。天津派道首张会之活动于陕坝，另有明线前人曾于1949年9月26日在陕坝讲道，举办仙佛班，参加道徒20多人，划分为7个组活动。道首武维蕃活动于米仓县平治乡，他任组长，下设3个小组，由喜林（点传师）、王有福（前人）、李悌（点传师）分别任组长。另外，还有天津明线派的4个组，也在该地进行传道活动。山西派的道首王育林活动在陕坝西马路，暗线派道首赵玉生、贾子明活动于米仓县境内。绥远派道首刘秀峰活动于陕坝南马路三道街。甘肃派道首杨贵德、杨有支等活动于米仓县境内。1950年（疑为1940年）编成3个组，由杨贵德总负责。包头派因依仗包头炮兵营的势力，按白芳洲、潘开祥2个前人的指示建立组织，发展道徒，势力较大。1943年，包头坛派点传师孙秉玉直接到陕坝见潘开祥，潘开祥指使孙到蛮会（今永胜乡），在王维珍家中设立佛堂，委任王维珍为坛主。③

1938年，天津浩然坛派遣点传师张珩、李启元到绥远（今内蒙西北部）开荒办道，设立“绥包支线”。1939年，山东济南支线派遣点传师苏振达在多伦县设立坛堂。截止到1948年冬，在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共发展了55176名道徒。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26页。

山东省

山东是张光璧的老巢，在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的一贯道因为得到日寇的庇护，尤为活跃。在济南，张光璧通过济南东坛的领导点传师郝书暄（汪伪山东省教育厅长）的关系，沟通了汪伪汉奸省长唐仰杜，并且拉拢上汪伪二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副总司令宁春霖、参谋长郭受天等大汉奸，使一贯道的活动受到保护。

在青岛，道长董玉泉利用与日寇的旧关系发展道务。董玉泉早在1914年便在日本租界充当三等巡捕，利用职权开设赌局，贩卖鸦片。1935年入道，先后担任坛主、点传师。1938年日寇侵占青岛后，与当年在青岛日本租界的同事、日寇青岛警备司令兼警察局副局长对马、日寇驻青岛海军特务山车凯夫等，以当年同事关系，建立新的联系。董玉泉向他们夸述一贯道可以麻痹中国人，有利于日本侵略，深得对马、山车等的欢心，使他得以在日寇的庇护下，大肆发展道务。1939年，董玉泉接受日寇宪兵队的指示，秘密搜查抗日分子。1940年，参加日寇御用的汉奸组织"青岛宗教联合会"，替日寇宣传"中日亲善"等汉奸谬论。

济南市①

乐陵县

1940年前后，分两股传入该县。一股由宁津县坊子传入，先后在杨纸坊、张桥设立支坛，下设11个分坛，6个散坛；另一股由沧县传入，先后在小李家、无里毛等处设坛，下设6个分坛，4个散坛，有道首77人，道徒529人，分布在全县的73个村庄。②

武城县

1937年由道长请来张光璧在该县河西街建立佛堂，1939年成立中心堂坛，1940—1943年是该道的兴盛时期，到1949年，一贯道已经遍布全县的5个区，当时全县293个村庄，其中109个村庄有该道的活动。入道者达1686人，其中有道长4名，点传师16名，乩手4名，引保师3名，坛主46名。③

桓台县

1938年由张光璧发展该县南石桥的崔凤藻入道，崔凤藻入道后积极发展道务，升任点传师后，在南石桥、张店二马路先后设立蕴空坛、新立沃坛等154处

---

①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40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43页。

坛堂，发展道徒 6882 人。[1]

高青县

1940 年，济南礼化坛点传师籍丹坡在青城开设公共佛堂，进行传道活动，1942 年改为"同坦会"。[2]

青州市

抗战时期，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提倡，一贯道等各种会道门遍布全县的 1196 个村庄，大小道首 2198 人，道徒 48500 人，大小坛堂 215 个。[3]

烟台市

1943 年秋，点传师宫贤廷等人在福山盐场村建立天德佛坛，由刘吉凯任坛主，活动于永福园等村庄，到 1945 年已有道徒 400 余人。同年冬，李光禧在古现北于家村建立于氏佛堂，由于世禄任坛主，活动于孙家、四合村等地，发展道徒 20 多人，1944 年，宋英全由烟台来到福山镇活动，在南关建立崇德佛堂，发展道徒 100 余人，1945 年 8 月，李光禧又在宋家疃建立佛坛，几年内发展道徒 106 人；全县共有道徒 3253 人。[4]

蓬莱县

1941 年该县梁家庄的梁学礼在青岛参加一贯道，1944 年长裕村的杨兹芳在济南参加一贯道，他们先后回到该县，发展道徒 2000 余人，有道首 9 名。[5]

枣庄市

1930 年由张光璧直接传入该市。以麻延坤为代表，1940 年马延坤死后，由魏西新等人继承。[6]

济宁市

该市是一贯道总道首张光璧的家乡，故参加者甚多。详细情况请参阅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50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50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53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54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57 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67 页。

邹城市

1920年由济宁传入，到1949年初，境内有佛堂50余处，发展道徒近6000人。[①]

汶上县

由济宁传入，道徒遍布该县。抗战时期，道首王化銮于该县二区柳航头村设立总坛，并在其他各区发展道徒500余人。[②]

梁山县

1943年，该县西杨集村的杨玉皋加入一贯道并任坛主，在点传师曹汝霖的指使下，大肆发展道务。仅在东、西杨集就有道徒35人，高庙村有道徒33人。[③]

新泰市

1944年由桓台人罗绳武等人传入，以大霞雾村的李某为首，先后发展道徒124人，其中有道首10人。[④]

沾化县

1937年由天津一贯道道长胡景一传入该县崔岭村，由崔焕章等人主持，直属天津总坛领导。1945年该县解放，道首各自逃窜。[⑤]

山西省

一贯道于20世纪30年代传入山西。1939年，张光璧因为前往山西办道的古广生、李玉生二人发生矛盾，办道不力，而改派亲信薛洪前去。从1940年起，山西的一贯道逐渐发展出四大派系，即：明线系，指由张光璧领导的道务；暗线系，指孙素贞领导的道务；此外还有郝宝山系和"天津文化坛"系。

薛洪系

薛洪是1934年在天津入道的，是张光璧在天津最早收的五个弟子之一。薛洪先在太原城内棉花巷设坛传道，后来又在郑家巷4号设立总坛。1940年，绥远的老前人刘梦荣派遣原先在山西办道的代县人阎攀发、崞县人张崇山、忻县人李耀昂等返回山西办道，经张光璧、孙素贞认可后，皆划归薛洪领导。1941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70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73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75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76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80页。

年8月，孙素贞初次来到太原巡视道务，又任命耿印章等5人为点传师，协助薛洪办道。翌年，薛洪借扶乩诡称自己是关圣帝下凡，纠集一批道内骨干结成“二十八宿”，在山西形成所谓“总柜”。薛洪因为在山西发展顺利，被张光璧任命为山西道务的总负责人，薛洪通过一贯道道首、日本翻译官李翔、汉奸吴综策等人的关系，在太原的日伪警察局注册备案，领取了办道执照，公开以“一贯道山西总柜”的名义，挂牌办道。1942年薛洪举办“仙佛班”，训练办道骨干，然后到全省各地去开荒办道。使薛洪一线几乎遍布山西省的中部和北部地区。1942年3月和10月，孙素贞再次前来山西巡视道务，放命点传师41名。从这时起，薛洪便与孙素贞建立了密切关系，当后来孙素贞向张光璧夺权一事被揭露后，张光璧曾在济宁召开会议，让各地道长、前人表态立愿，忠于自己，唯独薛洪不肯，并暗中与孙素贞联络，接受她的指示。以后薛洪在山西自成体系，成为独立于张光璧的派别“薛洪系”。1945年他在山西总柜之下，又设立仁、义、礼、智、信5个常柜。同年5月，他召集山西道内首领123人开会，正式与孙素贞接线，形成所谓的“暗线”。为了巩固组织，薛洪还在会上任命周宝善、耿印章、高增、李耀昂为“四贤”、“八俊”和“十明”，成薛洪的羽翼，号称拥有道徒100万人。

古广生系

1939年张光璧以古广生与李玉生二人不和，改派薛洪到太原主持道务后，古广生便将自己手下的人马交给杨友椿等人，自己回到原籍介休，开始设坛办道，训练骨干，避开薛洪的势力，向晋中、晋南发展。1940年，古广生保举介休人郭恂、张宝田为点传师。郭恂办道积极，于当年便赴平遥、灵石、临汾、洪洞、霍县等地开荒办道，发展了大量道徒，保举咸疏崧等15人为一贯道头目，因而深得古广生的欣赏，不久便成了古广生线的第二号人物。同年，张光璧又将在天津入道的新绛县人吴子安、周善臣二人推荐给古广生。吴子安因与日寇相勾结，在新绛县得以公开挂牌传道。1941、1942两年内，古广生便将道务发展到了运城、永济、长治、河津、稷山、万泉、曲沃、闻喜、翼城、平陆、交城、清源等县。并派人到西安办道，还在介休开办“仙佛研究班”，训练道首40余人。1943年古广生返回太原，他利用日伪潞县安县警察大队长周树岐（点传师）的关系开展道务。该线第二号人物郭恂往来于太原、清源、交城、祁县、太谷、榆次之间，大量发展道徒，并保荐了一批人担任当地一贯道的头目。截止到1943年，古生线已经遍及运城一带17个县和1个镇，提拔点传师308名，坛主1463名，发展道徒

53425名，次年已经把道务扩展到晋中南各县。

郝宝山线

郝宝山是山西汾阳人，早年在山东金乡县学习经商，兼办邮政业务，1931年身染重病，为了求医治病，拜路中一为师加入一贯道，1919年奉路中一之命返回汾阳办道。1920年路中一路经汾阳时，任命他为点传师，从此他便以办道为生。他最初以孝义县为基地，1920—1932年期间，他在汾阳、孝义二县开展道务，设立坛堂。他是路中一的八大弟子之一，始终恪守路中一的道义道规，仍然尊"金祖林一秘"为十四代祖师。他对张光璧与孙素贞的结合十分不满，因而独立发展，并且自称"十八代祖师"。随着道务的发展，他在孝义县成立了总佛堂，自任"领长"。随后又在该县设立了2个公共佛堂。1935年秋，挂出"一贯道总佛堂"的牌子，公开进行传道活动，这时已经拥有道徒1万余人。接着，他又在孝义县建立公共佛堂10余处，村佛堂133处。1941至1944年期间，又在介休、平遥、榆次、中阳、太原等地发展道务。郝宝山线拒绝与张光璧合作，但势力远不如张光璧，甚至不如山西的薛洪线和古广生线，只有道徒5万余人。

此外，在山西的一贯道组织，还有以新绛县为主要活动基地的周柄文线，有道徒1万余人；绥远的张衍线在晋西北一带也发展了6万多名道徒；张五福的明线派刘明湖等人，也在山西大同开展道务，在该县的318个村庄，发展道徒46000人，提拔坛主以上道首1564人。

由于山西的道徒中有大量商人，于是便把传道与经商结合起来，一般是先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作为据点，以开设商店作为掩护，既可以作为生计，又便于传道。商人拥有一定的财力，可以开设佛堂。

山西省各地发展概况

阳曲县

1942年前后传入，抗战时期，该县一贯道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帮凶。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贯道从公开转向秘密，对抗人民政府。1951年取缔一贯道时，法办了道首31人，17373名道徒声明退道。①

大同市

1936年由平津一带传入。是年4月，陈博文、苏光池来到大同开荒，传刘明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

湖、刘明珊弟兄二人入道。他们在大北街永泰成创办第一个道坛,称为"同化坛",直属北平道长领导。道内尊刘氏弟兄为"老前人"。他们通过"亲度亲"、"友度友"的方式,发展道徒,几年之内,道徒已经遍布大同全市。在城内四隅及北关、东乡、口泉各设有总坛。他们在隅下分街,乡下分村,另设支坛,家户院落设佛堂及小坛。各坛均有坛主和点传师。到 1950 年底,全市共有道徒 15000 人,其中坛主 795 名,点传师 130 名,预备点传师 21 名,大坛 52 个,支坛 28 个,小坛 37 个。[①]

高阳县

该县一贯道分为两派:大同派。1940 年由道首陈保万到城关传道,发展点传师十余名。绥远派。1940 年由老前人王官落脚在罗文皂关守家中传教,利用走亲串友的办法,在姚庄、下梁源、东西双寨等村发展道徒。1942 年,北平总会派李显静来到高阳办道,第一个佛堂设在南街福顺生粮店,接着发展到东井集、大柳树一带及西南部的大安滩。由于得到日本侵略者的支持,县城内 11 条主要街道就有佛堂 12 处,全城 2 万人,道徒就占了一半。农村 36 个村,就有佛堂 27 个,5000 多户,就有 2000 多户入道。全县仅点传师以上的道首就有 1500 人。[②]

左云县

1941 年传入本县,由县城一贯道徒乔希勋自称坛主,设坛发展道徒。全县共有道徒 5700 余人,其中前人 14 人,点传师 58 人,坛主 206 人。[③]

原平县(崞县)

1939 年该县郑家营村的道徒张崇山受前人刘某派遣,从绥远回到家乡发展一贯道组织。1940 年他在该县城西街开设"福盛三元"商号,内设寰丰佛堂,作为传道据点。后来王世昌从外地回来,协助张崇山办道,1941 年张崇山赴绥远"带命"回来后,该县的一贯道组织开始从县城扩展到农村。同年张崇山等人在该县开会,制定了办道规则,确定张崇山为该县总头目。[④]

定襄县

该县的一贯道是由暗线从内蒙古传来的。1941 年在绥远经商的该县官庄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54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59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65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79 页。

村人周能治、待阳村人牛迎武等人被派遣回县办道,隶属于忻县义字头总柜郭芝智。下设仁义礼智四个柜,柜的首领叫方领。方领以下又有一真、二贤、五昌、八德等,全县有老前人和前人 13 名,待命点传师和点传师 75 名,方领 22 名,坛主 423 名,道徒 29453 名。①

静乐县

1941 年忻县商人郭子良在该县县城和一区娘子神先后诱骗多人加入一贯道,此后逐渐蔓延至全县。一贯道在该县境内设有东西南北中 5 个组,每个组领导若干村坛,中坛又名总坛,称为“德丰坛”,领导其他各组。1941 到 1945 年日军占领时期,该组织曾公开活动,日本投降后转为半公开活动。每坛设有点传师、坛主、乩手,每半个月上坛一次,烧香拜祖许愿。②

神池县

1942 年传入该县,属于以薛洪为首的“暗线”系统,在仁义礼智信 5 个柜中,属于“礼记总柜”下的“晋柜”,八角镇的吴威为“神池执行柜”负责人。到 1951 年,境内有前人 8 名,点传师 77 名,坛主 302 名,道徒 13300 名。占总人口的 25%。③

宁武县

1942 年冬,点传师安殿基、宋丕月等在宁武县二马营村开始传道,次年,崞县点传师沈昌山、宋守业等人在孟家窑点道。之后,蔓延到蘑菇营、化北屯、宫家庄等村。④

平鲁县

1937 年日军侵入该县不久,崞县、绥远等地的道首来到该县传道,在日伪的扶持下,在县城、井坪镇、东易村及日伪盘踞的据点周围村庄,发展道徒。⑤

应县

1939 年由太原、北平两路传入。太原经繁峙传来的设有四个分坛,北平经大同传来的设有三个分坛。到 1942 年,一贯道在该县已经有较大发展。县城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81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83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83—184 页。
④ 《宁武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588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66 页。

通义和货栈设有总佛堂、里化坛。下社北楼口设有公共佛堂(开化坛),直属里化坛领导。最高首领是点传师张州(应县人)、马云景(忻州人)等。到1950年,全县有公共佛堂5处,家庭坛32处,点传师12人,坛主46人,道徒4205人。[①]

怀仁县

该县一贯道分三个派系。

绥包线:1930年由河北人刘振岗及王天宝首先来该县传道,在县城设立得胜坛,发展道徒10人。翌年又发展了60人。1944年,将道徒分为南北两线,南线点传师刘振岗,北线点传师薛云海。南线在磨道河等30个村庄设立了31个坛;北线在里八庄等9个村庄设立坛点。

大同线:1940年12月,河北人王焕章由大同来到该县,设立仁意坛,点道收徒30人。1943年开始在农村发展道徒,在尚希庄等村,设坛点6处。到1945年,共设坛23处。[②]

太原线:1947年由贾保生自崞县来到该县传道,在城内设坛一处,点道8人。[③]

平定县

一贯道传入该县有两个管道:一是县南上庄村的周宝善于1938年在河北省宁河县开染房时加入一贯道,翌年,他回到该县,先在本村和邻村神子山劝道,后来在阳泉益昌油店设立干天坛佛堂。1941年后,一贯道沿石太铁路发展到寿阳等地。二是北平人冯甫于1938年潜入阳泉教场设立佛堂,名为神化坛,又在东沟设立中和坛,在城内学门街设立精忠坛,依此在县城周围的村庄发展道徒。[④]

孟县

1942年传入该县。分为明线和暗线两大派系。明线又来源于两地,分别从河北省正定县和山西省寿阳县传入。一是1942年由河北省正定县点传师王加乃和孟县的王成良首先在县城东关庞毓锁家中立堂办道,取名"玄中堂",是为该县一贯道的总堂。由王成良任堂主,庞毓锁和刘基正任副堂主,组建了南乡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7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7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7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9页。

"血立"、城关"自诚"、东乡"自中",和榆次、阳泉等5个柜,设立了50个堂。二是1944年由寿阳县的点传师冀亮和范延全两人传入县内的凌井店(现属阳曲县)和西烟镇一带,设立了10个堂。以上两地的一贯道同属明线,互有联系,但分别活动,始终没有统一。暗线分别是从本省的定襄、忻县、阳曲和平定县传入。暗线又分为定襄系和忻县系、阳曲系和平定系。定襄系是由定襄县的点传师于1946年传入该县的御枣口和猫铺两个村,仅发展道徒30余人;忻县系是由忻县点传师许茂生和芦天贵二人传入该县的李庄、东梁和辛庄三个村,共设立了3个堂。阳曲系是由阳曲县东黄水村点传师张真珍于1945年传入县内的凌井店一带,共设了4个堂;平定系,是由平定县点传师于1950年传入盂县的东村和清城村一带,在小西庄河东村南沟两个村设立了2个堂。当时全县共有471个行政村,有135个村有一贯道的组织。到取缔时,全县共有71个堂,道首150人,道徒4000余人。①

平顺县

1942年,由潞城县苗家村的一贯道点传师陈某某,传道给北社村秦某某,1940年河北藁城道首又到东五马一带传道。1947年林县董家街点传师余永祥又在龙镇、西桥沟一带发展道徒。②

长子县

1940年1月,一是由梁贤瑞和长治县高河村杨仁斗等传入;二是1942年8月由鲍店镇郭家庄村的郭佐仁、城关镇北刘村的高八万等人传入。共有点传师23人,坛主155人,道徒3816人。③

沁水县

1943年河南人部作凡、马玉珍加入一贯道并成为点传师后,在不到一年时间就发展道徒1000余人。④

五寨县

1939年传入该县,分为两派:前合派,由崞县传入,李家口人李进洛为"前人";后和派,由河北传入,城内张润莲为"前人"。到1950年共有道徒11000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1%。①

偏关县

1943年由五寨县传入,个别道徒由绥远返回,全县有道徒401人,其中点传师1人,坛主11人。②

太谷县

1941年8月,太谷商人由太原请来一贯道点传师田师润,到城内德记货庄讲道,有货庄掌柜杨志亨入道。阎锡山统治时期一贯道转入地下,道徒遍及全县159个村庄,有点传师72人,坛主352人,道徒11460人。③

乡宁县

该县一贯道分为两大派系:明线派:在临汾和新绛设总柜(分为仁义礼智信五柜),临汾总柜在城关设"礼记柜"作为分柜;新绛总柜在牛王庙设"信记柜"分柜。古广生派(暗线派)设总坛、分坛、泥坛。总坛下设12个泥坛,每个泥坛都有泥坛主,共有前人7名,点传师26名,坛主186名,地才1名,1948到1949年,在全县共发展道徒2万余人。④

汾西县

1935年传入,该县内有三大派系:一是郝宝山系,1935年由晋中灵石县王禹寺传入对竹地区,随后发展到冯村等40余村。二是"暗线"系,活动于霍县与汾西县交界地区及城关个别地区;三是"明线"系,活动于勍香等村。全县66个村有一贯道的活动,有道徒1241名,职业办道人员67人。⑤

河津县

1938年秋由西安传入。前人齐苏喜利用迷信发展道徒,将全县列为5盘,按仁、义、礼、智、信命名。仁字盘踞县城,管辖其余4盘。义字盘为城东,礼字盘为城西,智字盘为汾南东一带,信字盘为汾南沟西。共有信徒4600人。⑥

芮城县

该县一贯道有师尊派与师母派,各据一方发展道徒。师母派活动于曲里、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4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6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0—191页。

柳湾等村，孙仰清为前人，下设13名点传师。师尊派由任中立为前人，下设14名点传师，在该县的东西山底、石湖窑等村活动。①

万荣县

1951年取缔一贯道时，该县有20780名道徒退道，其中坛主以上中小道首有286人。②

新绛县

1940年由在天津入道的该县人某回乡开荒传入，首先在韩家巷设坛，发展道徒。道徒分为“文化”、“明线”、“暗线”三派。1950年取缔会道门时，全县有坛主以上道首417人，道徒16428人，分布在全县的128个村庄。③

夏县

1939年该县王峪口村民崔文学在运城加入一贯道，1940年回家发展道徒，在城关西巷成立道坛。总负责人是张文明，到1950年道徒人数已经达到7000余人。④

离石县

该县的一贯道组织由道首李向堂掌管，由仁义礼智信五宗组成，分为东西南北中五路，有前人2名，点传师13人，坛主118人，道徒2770人。⑤

孝义市

由汾阳人郝宝山传入，1932年在古城内设立总佛堂、公共佛堂。1938年被日军侵占后，有佛堂11处，道徒遍及全县各地。1950年取缔一贯道时，城关退道的郝宝山系的大小道首有201人，道徒5271人。⑥ 孝义县郊区郝宝山系退道的大小道首有431人，道徒2195人。暗线系退道的大小道首64人，道徒6219人。⑦

兴县

1946年4月，由五寨县点传师传入城关、康宁等地。共有道徒54户，230人。⑧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2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5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6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6页。
⑦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
⑧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8页。

岚县

由忻县、代县、五台、崞县和交县等五县的一贯道组织派遣前人、点传师来到该县发展起来，形成5个各自为政的派系。到1950年为止，全县道徒有3867人，占总人口的6%。其中点传师12人，乩手4人，方领3人，护架6人，坛主90人。[①]

河南省

最早在河南开展道务的是孙锡坤，他曾亲自到河南温县的陈家沟，向一些武术界的人物传道。道务发展后，设立了9个柜，活动地区除河南的渑池、洛阳和开封外，还包括陕西的宝鸡、汉中、西安、潼关、渭南及甘肃的定西、陇西等地。河南的传道中心设在洛阳和开封，然后再向其他各县发展。[②] 1942年孙锡坤派人从洛阳到渑池吸收商人韩如章等入道，韩如章后来建立渑池柜，成为当地一贯道的负责人。1939年洛阳柜派人到附近的孟津县，在白鹤、老城一带发展道徒522人，并设立公共佛堂及家庭佛堂多处。[③] 然后又向周围的孟县、巩县、嵩县、洛宁、灵宝等县传布。河南开封是一贯道的另外一个中心，1944年开封的道首左子钧、刘福玉、郭化民等三人到鄢陵县建立"佛光坛"，[④]又有道首张文良、陈国章、孙吉甫等三人，在禹县建立"道场"，并派点传师曹国华、孙兴祥到襄城县发展道徒，与曾任国民党书记长的李白明及孙如璧在县城建立佛堂，发展道徒多达2000余人，并建立"中智坛"、"中礼坛"和"中仁坛"等三处佛堂。[⑤] 并且在邻近的新郑、长葛、蔚氏、扶沟、睢县等地发展道徒。各县分布情况如下：

新安县

1940年传入该县磁涧一带，发展道徒1000余人。[⑥]

嵩县

全县共有道首1284人，有道徒24479人。[⑦]

伊川县

1944年11月，该县点传师梁云道等，在该县白沙镇发展朱章记入道，并设立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② 《启东县志》，中华书局，1993年，第641页。
③ 《孟津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1页。
④ 《鄢陵县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96页。
⑤ 《襄城县志》，中州出版社，1993年，第570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91页。
⑦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96页。

佛堂。1945年梁云道又在关林的关帝庙发展白沙区滕子卿入道,并委任他为点传师。7月,朱章记在白沙区南衙村张治公家发展牛沟村人许成保入道,并在许家设立佛堂。1947年秋伊川解放,梁云道在该县煽动暴乱,并按照洛阳市一贯道首王会生的旨意委任朱守德为点传师。由朱和滕子卿共同负责白沙坛的道务。[1]

封丘县

1937到1945年有一贯道师母派的两个线先后传入该县。第一线是1937年西马庄的时振兴在卫辉参加一贯道,回县后传道,遍及100多个村庄,发展道徒3160人。第二线是1945年,西辛庄李重三在卫辉参加一贯道,回县后积极传道,遍及该县西部的114个村庄,发展道徒5201人。[2]

长垣县

1943年由汲县的黄得水、邢广孝来到该县开荒办道,先在城北林庄冯电杰、董谦家建坛,后又到孟岗户连修家建坛传道。到1950年全县有坛主100多名,道徒2000余名,遍及城关及孟岗等乡。[3]

淇县

1939年经滑县的道口传到该县的西岗、东街等村,1942年在县城中山街西鸿泰酒店设立总坛,在北关设立支坛,发展道徒200余人,到1950年发展支坛和户坛34个,有坛主67个,点传师32人,后来蔓延到全县的5个乡,22个村,发展道徒3484人。[4]

安阳县

一贯道的北平、济南两个系统,分别于1942年和1944年传至该县,先后发展道首153名,道徒1612名。[5]

尉氏县

1945年12月25日,定川线的坛主张寅虎、点传师汪济业等来到该县传道。最初在城关小西门街张运生家设坛活动,发展道徒500余人。1947年该县点传师崔喜法和王廷枢在城关西大街刘家楼重新办道,发展总坛1个,分坛12个,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99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07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07—708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08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11页。

佛堂 14 个，有点传师 4 人，坛主 48 人，道徒 1185 人。[1]

长葛县

该县一贯道有三大派系。(1)孙孟进派。1942 年道首张皮氏在郑州邀请点传师王学文、乩手阎崇华等人来到该县，引该县辘轳村孙孟进入道，之后，他积极发展道务，被提升为坛主，并在家里设立佛堂，直接受郑州点传师李占兰领导。1948 年孙在郑州受任为总点传师，他家佛堂改称总佛堂。从 1942 年到 1950 年共发展道徒 269 人，其中有点传师 3 人，坛主 10 人。(2)沈喜臣派。1942 年 5 月，河北省定县点传师陈守、坛主沈喜臣来到该县传道，在城内王辑五家设立总佛堂，发展道徒。到 1950 年共有道徒 1341 人，其中点传师 24 人，坛主 149 人，乩手 5 人。(3)赵克功派。1947 年 5 月，赵克功在禹县受点传师吴保定的派遣，回到赵庄村进行传道活动，后被提拔为点传师，在其家设立总佛堂。到 1950 年共发展道徒 94 人。其中坛主 12 人。[2]

鄢陵县

1942 年 2 月传入该县，由归德的王化贤首先在城关北门里苏家设立佛堂。1944 年，开封的左子钧等在城关南街张家胡同设立佛堂，坛号为"一心坛"，后迁至东大街路北，坛号改为佛光坛。至腊月初九日，外地来的点传师田治国加入，创办该县的东佛堂。是年，河北的郭玉振在城内和平巷成立西佛堂，称为"德修坛"，该坛分为乾道和坤道东西二佛堂，到 1945 年，两佛堂已经发展到 6 个区，30 个村庄，有道徒 600 余人，到解放初期已经拥有道徒 1500 人。[3]

襄城县

1944 年日军侵占河南后，一贯道前人张文良(东北人)、陈国章(河北人)及孙吉甫(河南人)3 人，随日军到禹县，派点传师曹国华、孙兴祥潜至该县，与曾任该县国民党书记长的李自明相勾结，进行传道活动。李派孙如璧出面在县城建立佛堂，发展道徒 2000 多人。抗战胜利后，在禹县的 3 个前人逃跑，李自明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被扣押，一贯道组织瓦解。后来一贯道合法化，李自明又恢复了国民党党籍。[4]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724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728—729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730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731 页。

临颍县

该县的一贯道有两个支系：一是西街的忠顺堂，以前人郑良辰为首，拥有道徒3077名，点传师26名，坛主49名；二是东街的忠临佛堂，以前人胡文德为首，有道徒1560人，点传师7名，坛主17名。①

保丰县

1945年春，鄢陵县的丁镇玉在该县城北关设立佛堂，先后在乔庄等村设立佛堂13处，发展道徒100余人。1947年河北人姜有根来到该县东北部发展道徒120多人，设立佛堂20多个。1948年，郏县坛主赵天台在该县境内的大石桥附近传道，到1949年2月，在全县发展道徒280多人，设立佛堂。②

郏县

1944年及1947年分别从河北定县和河南洛阳市传入。到1948年，境内设有50多个佛堂，有道首200多人，道徒2600多人。③

南阳县

一贯道道首孙兴祥于1950年来该县活动，办过两次忏悔班，发展道徒千余人。④

方城县

1944年传入，到1947年仅有道徒20余人，到1948年发展迅速，到年底已有650余人。⑤

信阳地区

1943年传入息县，1944年传入信阳县，1947年传入罗山县，1948年传入潢川县。罗山县有总坛2个，分坛27个，道徒1016个。信阳县集中在明港镇，有总坛一个，分坛20个，点传师、坛主80余人，信徒3000余人，几乎村村设有道堂。⑥

息县

1943年传入城关，到1949年，该县的城关、城郊均有一贯道组织。全县有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33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36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38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40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41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47页。

总坛2个，分坛27个，分坛主96人，小道首132人。[①]

罗山县

1947年点传师焦向荣等三人，受汝南道长王仲宇的指派，来该县发展组织。先在县城西街以开茶馆为名，进行传道活动，后于东街和南街设立道坛1个，继而又在潘新、陡山各设立道坛1个。1948年涩港绅士李钦香在信阳加入一贯道，旋回涩港设立道坛，自任点传师，发展道徒10余人。[②]

周口市

1945年，从武汉经漯河传入，在南寨东堤子街设立佛堂。点传师王戟云、王耀西利用亲友关系，进行传道活动。到1947年，已发展到2000多人。[③]

项城县

1945年11月，点传师李金铭由周口镇初次来到该县水寨镇传道，发展程宪章等人入道。翌年4月设立佛堂，到1950年已设立佛堂16处，有骨干16人。1947年7月，在老城设立佛堂，发展道徒。到1949年先后建立佛堂27处，发展道徒485人。[④]

鹿邑县

1949年前，由曹县人王心海夫妇传入该县，在城西关建立佛堂，后来又从河北保定来了齐道长，在芙蓉街陈昌永家设立佛堂，机关职员参加者甚多。解放前夕有道长5人，点传师1人，坛主48人，三才3人。[⑤]

遂平县

该县一贯道分为理性派和无为派两支。(1)理性派。1944年由汉口总支派的前人李品三传入该县，1945年在城内马道口路东总佛堂开办研究班，汉口总坛派前人周薄等4人亲临说教，共培养道首50余人。(2)无为派。1943年由天津老前人尹云鹤等传入，1944年在该县人杨洪建等人协助下，在县城南大街创办仙佛研究班，培养骨干。[⑥]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48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51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54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55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58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61页。

汝南县

1939年由山东传入，在县城东门内外等地设立5个分坛，道徒众多。1950年因组织暴乱被摧毁。[①]

三、一贯道在西北地区

陕西省

1946年，河南豫柜的点传师刘品山在西安总坛开办“仙佛研究班”，培养道首，使得陕西的一贯道非常兴盛，据《一贯道简介》记载，全盛时期全省共有240组之多。[②]

西安市

早在1935年，一贯道各派系便把注意力投向了陕西，是年，张光璧派遣宫雅文、阎光润来到西安，但是开荒未成。只好把道务向宝鸡一带扩展，1935到1936年期间，陕西凤县人苏钰在宝鸡担任秦川煤矿公司经理时加入一贯道，在被任命为点传师后，他干脆放弃了工作，回到凤县在家乡发展道务。[③] 宝鸡北面的凤翔县、千阳县、麟游县等地，也先后建立道场。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贯道各线因为张光璧提出“道运西转”，道首们于是纷纷前往陕西办道。1940年，天津线竹远里坛的点传师苏广驰前往西安，设立西安支线。翌年，天津的马玉骥等，北平线的点传师张润田、何倜文、吕怀拯也到西安办道，设立北平线西安支线。山西道首古广生也派杨德秦等先后在陕西17个县市设坛办道。1943年春，山西薛洪系的点传师张崇山去归绥（今呼和浩特）从老前人刘梦荣那里得知张光璧、孙素贞关于“道运西转，不久要实现”的口谕，回到太原后，向薛洪作了汇报，薛洪立即派张崇山等8人赴西安办道。1945年春，薛洪在太原总柜召集山西各地道首开会，借乩垂训：“道降东鲁，普传一贯，设法西秦，大会三元”。又称“现在弥勒佛祖在西秦，你们哪家后学想去西秦行功，就让他们去吧！”同年七月，薛洪便派周宝善等百余名点传师分赴西安办道。他们在西安崇义路新廊房13号设立西安总支柜，仅薛洪一系就在西安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63页。
② 台湾“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编：《一贯道简介》，第48—49页。
③ 《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6页。

发展道徒七八万人。

临潼县

该县一贯道的最大一系是礼字柜，公开敲锣打鼓，吸收道徒。到1953年被取缔时共有22055人声明退道。[①]

户县

1946年由山西、甘肃、云南等地传入。县内一贯道组织有薛洪系、纯一支和孔孟道。薛洪系下分仁级柜（下分5个小柜）、义级柜、智级柜。道内设有大掌柜、二柜、县柜、接线员、段掌柜、段柜接线员以及点传师、坛主、负责居士、居士等教职。

兴平县

1942年，山西的薛洪也派人来到陕西开荒布道，由田姓道首把一贯道传入兴平县，该县一贯道属于薛洪系的仁字柜；1945年又有河南人王自修、段玉琪先后到该县传道，到1949年，全县道徒多达20562人，有坛主以上道首183人。[②]

延长县

陕北的一贯道是从山西省传入的。1947年延安办道人乔瑄等在延安发展道徒，1948年道首刘俊继来到延长，发展道徒100余人。同年9月被取缔。[③]

延川县

1949年4月，清涧县点传师刘鼎昌、甘泉县点传师高尚成、山西省五寨县点传师周某和坛主刘文谋先后来到该县，发展道徒72人。同年9月被取缔。[④]

黄陵县

1914年阎锡山的兵工厂迁来该县，一贯道随之传入。1923年山西人连耀荣联络该县刘子林等加入一贯道，到1951年全县有道徒5800人，其中点传师以上道首7名，坛主等103名。[⑤]

华阴县

1932年由一个铁路工人传入该县，以泉店车站为据点，向周围农村发展。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29页。
② 《兴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45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32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32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34页。

到1950年全县有道徒4300人，点传师37人。[1]

大荔县

1946—1948年，先后由山西、河南等地传入，有很多派系。各走一经，同行一道。1952年清查时，全县17个乡镇，有佛堂340处，点传师以上道首108人，坛主206人，道徒5219人。[2]

渭南县

该县有点传师以上道首115人，道徒10036人，坛主486人。全县设有仁、义、礼、智、信五个柜。[3]

咸阳

1937年从山西、平津等地传入。在农村分为"两段、五组、一德柜"。两段即：东西两段。五组即东段智、义、信三级和西段礼、仁两组。在城内有山西支、河北支、孙艺柜、薛洪系和古广生系。一贯道在该县设有总柜、本坛、分坛、家坛，设有道长、前人、点传师等道首。[4]

兴平

1942年由山西一田姓道徒传入，属于西秦支薛洪的仁记柜。1943年到1945年，再由河南人王自修、段玉琪先后来该县传道。到1948年全县有道首183人，道徒20562人。[5]

长武县

1943年河北人赵春林来到该县设坛传道。1946年长武道务由山西人冯国俊管理，在商人中发展道徒20多人，到1949年冬，礼泉人、点传师董宏展等先后在该县发展道徒619人，形成三个派系，各自独立活动，到年底，全县加入该道的共有1559人。[6]

宝鸡市

1943年由山东、河南等地传入。1945年日本投降时，一贯道已经遍布宝鸡各个地区的乡村。以薛洪系和胡桂金系的据点最多。到1950年，宝鸡县已经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37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38页。
③ 《渭南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497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1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1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2页。

拥有道首 26 人，道徒 4400 人。[①]

岐山县

1944 年传入该县。截止到 1953 年取缔时为止，全县退道者有 17108 人，坛主以上道首坦白者 435 人。[②]

陇县

1943 年传入该县，1950 年取缔时，有退道者 8008 人，点传师以上道首 220 人。[③]

凤县

1935—1936 年传入该县，先是长桥村人苏钰（秦川煤矿公司堆栈经理）在宝鸡加入一贯道，成为点传师兼坛主。回县后在长桥和黄牛铺一带发展道徒。1945 年，点传师王正荣进入岩湾、沙坝一带发展道务，到 1953 年 4 月取缔时，全县退道者有 2399 人，坛主 131 人。[④]

汉中市

在陕南汉中一带的一贯道，属于孙锡坤的九柜之一，1943 年以后，在汉中附近的勉县、略阳、南郑、宁强等县，也先后建立了一贯道的道场。略阳县有道徒 1244 人，勉县有 5400 人，宁强有 2631 人。[⑤] 宜君县的一贯道是 1944 年由山西薛洪系“礼柜”的任焕传入的。经道首宋首吉、王志权等将该道以各种名称流传到各个乡镇，其名称有：圣贤道、无极道、有心道、真天道等，并设有总柜、段柜、县柜、分柜、坛主等。该县有点传师 8 人，道徒 2881 人。[⑥] 白水县的一贯道是由宜君县的点传师谢进忠、吕复兴以行医为名传入，该县礼字柜掌柜孙子胜在当地发展道徒 6075 人，中小道首 181 人。[⑦]

洋县

该县一贯道包括两大系统。（1）包绥系。1945 年由奎德义等 4 人，从西安传入该县城关等地。（2）薛洪系。1949 年由李怀文从周至传入该县马畅等地。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44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44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45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46—1147 页。

⑤ 《宁强县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377 页。

⑥ 《宜君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 年，第 488 页。

⑦ 《白水县志》，西安地图出版社，1989 年，第 427 页。

此外还有北平支系。1950年初有刘玉宏从天水传入该县八龙等地。奎、李等人先后在该县28个乡,发展道徒9910人,点传师以上道首910人。①

西乡县

抗战初期传入该县,多属包绥线。1945年以后,北平支、定县派、石门线和薛洪系、礼记柜相继传入。解放初期全县有点传师220名,坛主和相当于坛主的举士、引师、保师及乩手345名,道徒9000余人。②

宁强县

1943年由刘兴华传入大安、城关,其后陆续有5个支派,即山西支、陕西支、天津支、保定支及绥远支。道徒遍及全县,有点传师以上道首57名,坛主127人,道徒2631名。③

略阳县

1945年2月传入该县,1950年3月,南郑、勉县、宁强的一贯道前点传师先后窜入该县,委任点传师、坛主,秘密发展道徒。半年之内发展点传师1名,坛主2名,道徒450名。④

镇巴县

1943年传入该县,1953年取缔时,有道首50余人,佛堂40多处,退道者1075人。⑤

佛坪县

1953年取缔时,有一贯道坛主56名,点传师37名,道徒984名。⑥

榆林地区

从1942年起,一贯道开始在该地区蔓延。1944年在该地区活动的有河北(也叫绥包班子)、忻州、交城(也叫水柜)、代县等派系。河北派下设4科5组,在该县城郊设有督导1人,总管3人。除河北派,其余3派均属薛洪系。忻州派的组织为"一二五八制",即一理、二贤、五常、八德。交城派在该地区设有"忠孝节义"四字柜。代县派在该地区设有峻德总坛一处,其组织为一三五制,即1人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8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8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0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1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2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2页。

管3人,3人管5人。到1951年该县的四派共有道徒29909人,其中老前人8人,前人46人,点传师356人,坛主520人,乱手9人。①

神木县

从1943年到1950年,该县共有1231人入道,由榆林的前人牛祥荣领导。到1950年取缔时,有4名点传师,14名坛主和1213名道徒登记退道。②

横山县

1944年,山西忻县道首刘国典、刘成旺首先在韩岔发展段利珍等10余人入道。翌年,又派李长谦、邓魁元等在城关镇、顾兴庄等村发展道徒3000余人,邓被封为"横山一理"和"陕北八德"。1946年4月,赵而长派李全有来横山擢任道徒万斗明等4人为点传师。他们以横山镇为大本营,大批发展道徒。1948年,王有地乡李三湾村的谢永恒被李全有提拔为点传师,偕李军侃在党岔等地发展道徒700余人,到1951年,全县入道者有五六千人,其中中小道首300余人,点传师以上道首30多人。③

米脂县

1947年一贯道山西离石支堂前人张文贵来到该县发展道徒27人。1948年张振华又勾结山西籍道首贺克孝来到该县发展道徒700多人,到1950年登记道徒1450人。④

清涧县

该县一贯道属于山西薛洪派,1944年由瓦窑堡传入。1948年,道首李宗密由延安回到家乡,发展道徒171人。⑤

石泉县

1945年5月,国民党后勤部少校经理员王承业来到该县,同镇长刘香亭、乡长凌云阁发起建立一贯道组织。1950年,汉中一贯道派道首尚太和来该县与王、李、刘、邓,将活动中心编为"仁、义、礼、智、信、德"6个组,各设组长1人,同年9月,又成立石泉县道务督导团,发展道徒。到1950年,全县共有道徒3683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3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4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4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35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6页。

人，道首446人，共计4081人，全县建有佛堂25处。[①]

宁陕县

1949年先后从周至、佛坪、长安县等地传入，全县有点传师以上道首13人，均系外来。有一般道徒2931人，设立佛堂30个。[②]

紫阳县

1944年由安康道首李干生传入，属于绥远支。翌年，河北人张建三由安康来到该县，在县城河街设立佛堂。此后发展很快，影响和规模达到高潮，遂被县长觉察，将张建三关押后驱逐出境。1948年2月，安康道首崔致和到该县传道，以县城和瓦房店为中心，逐步向其他乡区发展。到解放初期，全县13个区有10个区有一贯道的活动。有前人3名，点传师12名，坛主43名，道徒937名，佛堂18处，家庭坛25处。[③]

商州市

1949年传入该市，到1950年全市有点传师19名，小道首246名，道徒2003名。[④]

镇安县

1949年到1950年从咸阳、安康、三原、户县等地传入，全县道首63名，道徒909名。[⑤]

甘肃省

1938年张光璧在北平、天津开设"顺天会"、"纯阳炉"，培养了大批道内骨干，然后再把他们分别派往各地"开荒"。1940年绥包线的点传师李扃元亲自来到甘肃兰州，住在一个旅店内，以贩卖布匹为掩护，暗中进行传道活动。翌年，又在兰州城内开设仁济堂国药店，在店内设立总佛堂。1942年2月，甘肃省政府发觉该药店进行一贯道的传道活动，遂将药店负责人赵重奎、高蕴璞、李时中等人逮捕入狱。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8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9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60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61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63页。

兰州市

1944年,赵德山在该市的小西湖为张光璧夫妇修建总佛堂共两院33间,因此得到他们的赏识,翌年被提拔为点传师,赵遂与王杰臣等在小西湖开设天馨斋酱园,作为活动据点。1949年在小西湖建立一贯道兰州枢纽,下设智、仁、勇三组,赵德山任仁字组组长。是年秋,任用郭海珍负责七里河一带的道务,将佛堂分为4组,在狗牙山郭海珍的家中设立办事机构,管理狗牙山、周家山等村的道务。至兰州解放时,已经由北平、天津、山西、成都、河南、山东等地先后派来大批道首,在该市发展组织。截止到1951年底,共登记道首106名,退道者1990名。[①] 薛洪一系也在兰州设立"兰州支线",1945年李启元正式宣布脱离绥包线,直接听命于张光璧。

白银市

20世纪40年代由宁夏、兰州、平凉、天水等地传入,设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大支。每支设正副支队长,大支下设小支,小支设小支队长、点传师。小支以下设坛。从1952年到1958年共发展道徒55000余人,其中坛主以上道首8404人。[②]

景泰县

1942年该县商人去宁夏入道后将一贯道传入该县。道首张治芳、张国栋又以经商为名,在靖远县发展道徒300余人。同年该县五佛的张启志在固原县加入一贯道,1943年,该县五佛的周庆云在靖远县经商时加入一贯道。1944年周庆云任家庭坛坛主,1947年武威县道首阎明德、冯大权来到该县,发展道徒200余人,设立公共坛一处,家庭坛3处,1949年,周庆云被天水道首董明星委任为点传师,不久又成为该县一贯道的总负责人。到1950年,全县共有道徒2314人,其中道首59人。[③]

秦安县

1942年冬由陇南前人董明星从天水传入,全县有道首3000余人,道徒17000人。[④]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71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71—1172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74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76页。

张掖县

1941年武威商人沈怀义在天津加入一贯道，回到武威后大肆发展道徒，并很快蔓延到张掖县。使张掖成为兰州枢纽的12个中心之一，领导张掖及向西直到敦煌的道务，共有道徒32550人，其中张掖有道徒13000人。[①]

山丹县

1942年由曹大荣与河南人詹世明传入，后来又从张掖、武威、民乐等地传入。到1951年全县有总坛2处，中心坛13处，公共坛73处，有坛主8人，堂主9人，道徒3726人。[②]

武威市

1941年，天津浩然坛泊镇分坛的点传师李金凯等前往甘肃武威"开荒"，成为甘肃中部的传道中心，总坛名为"天明总坛"。一贯道甚至发展到邻近的天祝县，该县居民虽然以藏族为主，仍发展了不少道徒。1931年武威县的道首吕奎元、赵璋等人，先后来到该县的茶港、黑沟、寺阳洼、峡门、白杨台等处传道，先后建立了高一寿、陈百奎等中心坛，任命了一批点传师和三才。到1950年底取缔会道门时，该县共有办事处3个，前人1人，点传师64人，中心坛17处，坛主32人；公共坛59处，坛主70人；家庭坛209处，坛主209人。共计有公共坛坛主以上道首181人，道徒9000余人。[③]

天祝县

1942年武威道首吕奎元、赵璋等先后来到该县发展道徒，先后建立高一寿、陈百奎等中心接待坛2处，后来武威道首赵维均等人相继又设立了一批中心坛，任命了一批点传师。到1950年，全县共有一贯道分事处3个，前人1人，点传师64人，中心坛17处，坛主32人，公共坛59处，坛主70人，家庭坛209处，坛主209人，道徒9000余人。[④]

民勤县

与天祝县邻近的民勤县，是1941年由武威"天明总坛"传入，先后设立了觉一、振一、济一、永一、清一、全一、清中、善中等8个办事处，有中心坛111处，公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78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80页。

③ 《天祝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81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81页。

共坛291处,家庭坛1048处,道首1963人。到1953年取缔会道门时统计,全县共有道徒26184人,占全县人口的19.5%。[①] 该县还有一支一贯道是由宁夏及甘肃张掖传入的。

泾川县

1942年从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地传入该县。到1950年全县共有道徒8487人,坛主以上道首129人。[②]

宁静县

1936年传入该县。是年,河北的彭金鱼来到该县通过当地人王存,在城关、高界、甘沟、曹务、红寺、细巷一带活动。1948年,山西的道首也来到该县,在城关等地传道,发展道徒6000余人。[③]

定西县

1943年传入该县。道徒多分布在城关、西巩、白碌、鲁家沟、葛家岔等地。有前人8人,点传师13人,坛主40人,道徒9041人。[④]

陇西县

全县有公共佛堂603所,家庭佛堂358所。分为明、暗两线。明线是1942年由旧军人姜修梅(山东人)开办,后来由天水的董明星派陈金榜(河南人)接办,1949年成立仁、义、理、智、信5组,每组设组长1人。全县总负责人是陈金榜。陈于1949年离开后,由魏宗五负责。暗线分为两股,一股是1946年10月管天佑按照地区成立5个组,每组设组长1人,也叫掌柜,1949年管氏走后,由王永贞负责。另一股暗线是1948年由临洮前人王克怀传至四区马河镇,直接由王克怀领导。[⑤]

西和县

1943年农历十月十四日,陇南14县前人董明星派道长张绪吉、王培贞来到该县开荒办道,经过5年,发展点传师28名,建立佛堂123个,到1953年全县共计发展道徒2400人,其中前人2人,点传师50余人,中心坛主500余人,一般道

---

① 《民勤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72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85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87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88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90页。

徒1900余人。①

临夏州

该州居民大多为回族，但一贯道仍然传入境内并得到发展。1942年传入该县，由刘德贵、孙德禄等人设立理化总坛，1935年改为光明总坛，有点传师30名。1946年西安道首恭洪派仁级柜老前人周宝善来该州康乐县开荒办道。1947年传入永靖县大川、中庄等6地活动。到1950年，已有点传师20余人，发展道徒2万余人。②

临潭县

1940年传入该县，1953年取缔时有道首146名，道徒1525名。③

青海省

1945年"师母派"的老前人李启元来到西宁指导道务，大肆培训、派遣道首向各地发展道务。1948年前人高振明以兰州总坛分支的名义在西宁设坛。由此，青海的道务在高振明等人的主持下，在西宁、大通、互助、湟中、民和等县迅速发展。

西宁市

1943年，"孙素贞派"老前人李启元的下属高振明、樊增林等人在西宁城内石坡街的福兴店货栈设立总佛堂，作为全省道务活动的枢纽。高振明离开后，由杨静轩、魏明德等接办，发展道徒200余人，1948年，青海省警察局将道首杨静轩、商雨亭密捕枪杀，其活动转入秘密状态。1949年西宁解放时，全省有前人26人，点传师200余人，道徒10000余人。④

大通县

1921年由点传师张俊德传入该县。先后在李嘉埠等地活动，1950年点传师严忠、堂主文福堂先后设立公共佛堂2个，家庭佛堂8个，发展道徒70多人。⑤

宁夏省

1938年传入该省，是年，刘子真在北平加入一贯道后，参加张光璧主办的炉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96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97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98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04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07页。

会，乩手刘兴全装神弄鬼，打死坤道2人，刘子真四处奔走为之解脱，故深得张光璧的嘉许，被派往绥远省五原县开荒办道，不久被提拔为点传师、前人，五原被日寇侵占后，刘子真逃到宁夏，成立宏义坛，短短几年之内，发展道徒五六千人，提拔点传师200余人。

银川市

1941年绥远线的张陶轩派心腹李启元、刘振东等来到宁夏，在银川设坛传道，第一批入道的有周彩宣等9人。1943年又把道务推向甘肃，随后又分头前往新疆、青海活动。有道首、前人刘振东、周彩轩等151人，道徒1815人。[①]

永宁县

传入时间不可考。1952年先后登记的道首有460名，其中点传师4名，坛主15名，一般道徒441名。[②]

中卫县

1942年5月传入该县。分为杨（化氏）、荀（德清）、潘（执山）、段（志诚）、鲁（雅言）、白（良玉）、李（作善）、杨（化民）七个派系，有道徒200余人，公共佛堂2处，点传师9人，坛主5人。到1952年被取缔时，有道徒1572名，佛堂19处。[③]

中宁县

1942年银川点传师刘振东在该县宁安埠设坛收徒，一贯道在该县迅速发展。1947年该县一贯道分为三派：刘振东派、周彩轩派和郝治威派。到1950年全县共有点传师17名，坛主27名，道徒726名。有公共佛堂1处，分佛堂7处，家庭佛堂19处。[④]

同心县

1946年从银川传至该县的下马关，设坛1处，有坛主1人，道徒11人。[⑤]

固原县

1951年春被取缔后，1959年再次取缔，时有道徒6982人退道，其中有道首434人。[⑥]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3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4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6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7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8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9页。

隆德县

1947年山西商人崔永平来到该县，与平凉马刀门、北沙石滩的一贯道联系，同县内的陈克礼、许安平一起办道，是为金线派。同年，苏皖祥等人从庄浪、秦安传来一贯道的明线派。1949年到1950年该县一贯道活动猖獗。在沙塘、城关、农山等地区所属各乡，均有传播。起初每村设一公共坛，立佛灯一盏，全村敬拜。后来增设道坛多处，到1953年全县共有点传师76人，中心坛主6人，引进师74人，公共坛主78人，家庭坛主171人，道徒4663人。占全县人口4.3%。[①]

新疆省[②]

1943年首次传入新疆，当时有一贯道老前人王某与丁进财住在迪化（乌鲁木齐）南大街商号经理蔡润田家，吸收道徒，开设佛堂。接着又至奇台、吉木萨尔、阜康一带及伊犁、塔城等地活动。1947年老前人吕忠信（甘肃武威人）、李国璋（河北人）及点传师张克勤在迪化仓房沟蔡星锋家中设立佛堂，吸收道徒，并开设"开泰坛"。坛主为迪化县参议长韩景德，坛口设在左公祠后的韩家院中；"福泰坛"坛主是蔡星锋，其女婿姚玉华为点传师，其子女为三才，地址在汉城六道巷蔡家院中。1943年到1949年期间，一贯道在迪化及奇台、吉木萨尔、昌吉、呼图壁、绥来等县发展道徒，全疆有道徒12000人。到1949年底，全省共有佛堂44处，前人1人，点传师70人，正副坛主132人，三才7人，道徒3122人，占当时汉族总人口的11.24%。[③]

哈密地区

1944年由宋同章、魏志英等传入该地区。最初在哈密城郊南菜园王国英家设立佛堂，后迁移到北菜园刘德元处，取名"博化坛"，后改名"福台坛"，吸收道徒19人。随后又在哈密老城顺城巷、西门里、新城北关等地设立佛堂。1945年，点传师张天祥到哈密主持道务，大肆发展道徒，由城区发展到农村，设立佛堂10余处。

巴里坤

1945年10月，哈密道首李枝盛来到该县镇西传道，设立佛堂4个。1946年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0页。

② 1955年设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2—1223页。

1月，甘肃高台县点传师张开祥又在此设立佛堂7个。1947年6月，在哈密神佛班学道的张克宽被委任为该地的点传师，与李枝盛、张开祥争夺道首地位。到1949年，全县共有大佛坛12处，家庭坛18处，有点传师23人，正副坛主48名，道徒1812人。[①]

呼图壁县

1947年该县农民李荣德在昌吉兰州湾子的道首吴学礼处加入一贯道，返回后，引其兄李忠德入道，同年10月，李德荣与兰州湾子道首曹明德取得联系，在全县开展道务活动。建立总堂1处，分堂7处，发展道徒1479人。[②]

塔城地区

1950年道首孙鹏从绥来（今玛纳斯县）迁入沙湾县，串联旧道徒在沙湾县设立佛坛，委任坛主、分坛主、管账、点传师，吸收道徒。同年，乌苏县的贾中联络从昌吉迁回乌苏县的杨振荣一家，在3个庄子设立主坛，有道徒18人。1951年取缔时，惩办了道首4人，有353名道徒退道。[③]

四、一贯道在东北地区

一贯道在东北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流传，是以天津为出发点发展起来的。1936年，有孙荣昌等人在吉林省农安县一带“开荒”，“度化”了从长春来到吉林省开设“格布纺织厂”的何文学，并在厂内建立佛堂，作为最早的传道据点。1937年日寇侵占平津后，该处一贯道借助于日本侵略者的庇护，纷纷前往已经被日寇吞并的东北伪“满洲国”开荒办道，扩展势力。

辽宁省

沈阳支线

1938年天津浩然坛派点传师刘万兴、卢文恒赴沈阳办道。1939年2月，天津道德坛的点传师陈惠泉等人，来到沈阳办道。1942年，天祥坛又派张元庆到抚顺办道。1943年道德坛的赵鸿寿到辽宁先后建立坛堂10余处。到1946年止，一贯道已经在沈阳发展道徒51878人。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7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8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30页。

大连支线

1938年，天津浩然坛派点传师王云龙等赴辽宁省大连办道，在刘家屯设立“振中坛”，在西岗区不老街设立“振兴坛”，在全市发展道徒60339人。次年，大连的前人张陶轩来到辽宁的金县开荒，引郑文焯、张良中等人道，之后，张等被提拔为点传师，负责该县道务。[①] 1940年，天津道德坛的陈惠泉到安东的凤凰诚创立“教化坛”。[②]

法库县

1941年，奉天永和纱厂的一贯道点传师敦庆祥来到该县传道，发展道徒10余人。1944年，开原县一贯道总坛派郭志贤到该县开设家庭佛堂，发展道徒64人。1945年末，沈阳总坛任命郭志贤为“前人”，至此，该县有“前人”1人，点传师4人，坛主6人。其中坛主郭凤在自家建立起家庭佛堂，号为“明善堂”，并在城内“公义亨”院内设立公共佛堂，发展道徒200余人。同时，阎荒地村的刘百荣设立“义一坛”，发展道徒350人。1947年，郭志贤被沈阳总坛任命为该县道务负责人，该县总坛设在“公义亨”院内，全县共设有家庭佛堂30多处，有道徒1000余人。[③] 郭志贤领导了几十名坛主、点传师和几百名道徒，在全县30多个村设立了3个公共佛堂和30多个家庭佛堂。1948年2月，郭志贤偕同17名道首逃往天津，1949年天津解放，他们又回到法库，进行秘密活动。[④]

凌源县

1945年，一贯道道首郎秉轩以商人身份从沈阳来到该县，发展点传师99人，三才12名，公共坛主150人，建立家庭佛堂190余处，发展道徒3万余人。[⑤]

铁岭县

1946年8月，北平的一贯道前人李焕长派点传师刘宜良、坛主单纪云，从哈尔滨来到铁岭开荒。8月19日，在单纪云家里设立佛堂，向铁岭全县及沈阳、长春等地开展道务。接着，北京总坛又加派李占元等三名点传师到铁岭主持道务，先后在六区的七里屯、三家子、大小白梨沟、宿老屯和四区的药王庙等地开

① 《金县志》，大连出版社，1989年，第726页。
② 台湾一贯道总会编：《一贯道简介》，第49页。
③ 《法库县志》，沈阳出版社，1990年，第522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36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38页。

坛传道，前后传徒13000多人。设立了20多处公共佛堂。培养点传师44人，正副坛主41人，其活动遍及该县城乡各地。[①]

抚顺市

1938年，张光璧之妻刘率贞派道长阎步黎来到抚顺，放命殷永塘为点传师，两年内发展道徒1300余人。1942年和1944年，点传师李宝贵、庞振山在自家"开荒设坛"，进一步扩大组织。1946年，庞振山在道首陈惠泉的协助下，又相继在大官屯等地设立"致诚"、"致德"、"致中"、"致勇"、"致一"、"致毅"、"致明"等公共坛，并以"致中"坛为核心，通过办"忏悔班"，讲"坛训"等方式发展道徒500余人。1947年张光璧死后，一贯道分裂为正义派和金线派，殷永堂和庞振山分别成为抚顺地区两派的总代表。1948年抚顺解放后，他们转入秘密活动。[②]

辽阳县

1943年，裴延东奉张光璧之命，在辽阳境内开创辽阳总佛堂，同时点传师赵洪涛等也到辽阳开荒办道，该县共有坛主、点传师以上道首61人，中小道首214人，道徒5900人。[③]

鞍山市

1929年传入该市旧堡区境内，1945年日寇投降后到1949年，境内有公共坛2处，家庭坛11处。其中"纯善堂"于1945年设于宁远韩连璧家，有坛主8人，发展道徒10余人；另一公共坛于1947年设于七岭子村张敬秋家，有坛主4人。到1951年，该区共有坛主26人，点传师11人，引进师19人，道徒2500人。[④]

海城县

1938年传入境内，当时由天津派来总点传师崔占斌，先在营口市传道，后来在海城、牛庄等地传道，海城一贯道组织属于营口中心坛主统辖。[⑤]

宽甸县

1946年一贯道道长孙长仁与张光璧、孙素贞结识，先后在宽甸、凤城两县发展道徒2000余人，有道首35人。[⑥]

---

① 《铁岭县志》，辽沈书社，1993年，第196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4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6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48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8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

旅顺

1923年传入,分为“长春帮”、“济南帮”、“大连帮”。1946年,长春帮道首袁洪佐从长春回龙头老家设立佛堂,发展了1000名道徒,3名点传师和20名坛主。济南帮的乔川生于1946年回到老家大潮口,发展道徒100人。大连帮道首邓玉亮发展道徒200人。[①]

金县

1939年一贯道前人张陶轩由大连来到该县,发展郑文焯、张良中等人入道,后来张良中成为点传师,在金县大肆发展道务,吸收道徒3000人。[②]

庄河县

该县一贯道组织属于“师母派”,由天津总坛、安东总坛下属分坛的张振文、于景明二“前人”领导。1941年点传师张德恕发展工人吕其山为道徒。1946年张德恕又来到庄河街开荒办道,成立佛堂,任命坛主,委任范世皎、吕其山等为头目,以庄河镇的“济和坛”为中心,分别在大郑等地设立3个组,建立佛坛20多处,发展道徒700余名,委任坛主30余人。并派遣虔诚道徒去城子坦等地开荒传道。与此同时,以周子玉等为首,在安东总坛“前人”、点传师张殿文等人的指挥下,建立佛坛30余处,委任坛主30余人,发展道徒400余人。[③]

吉林省

1939年,天津天祥坛派点传师崔占斌、王义轩到长春办道。崔占斌旋因病返回天津,又改派赵洪涛前往负责。1940年天津兴毅坛也派王成到长春办道,建立了长春支线。

长春市

1940年张光璧派点传师赵正洲从关内来到长春,在长通路建立一贯道“中荣堂”。随后,张光璧又派亲信董子泉在长春永春路建立“天一坛”。这两个坛被称为“东佛坛”与“西佛坛”,发展道徒数百人。同时又在吉林市、扶余县、四平和范家屯等地建立了4个公共佛坛。1943年张光璧又把曾经当过警察局长的王玉轩派到长春。王玉轩与日本特务勾结,在长春建立了9个公共佛坛,60多个分坛。日寇投降后,王玉轩又与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长春站站长史祚炎等人勾结起来,供给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52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53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56页。

特务组织经费,105站把特务分子纪心平安插到一贯道内进行活动。①

吉林市郊区

江南区的兴隆、前锋、荣光等村,有道首39名,其中点传师5名,坛主34名,道徒1200名。道首丁隆盛于1940年入道,1942年去北平领命为点传师后,以江南区兴隆村为据点,发展组织。江南区大孤佳子的一贯道有道徒39名,道首2名。欢喜二道岭的一贯道有3名道首,50多名道徒。白山八里屯有道徒220人,点传师2名,骨干9名。九站的一贯道有点传师7名,坛主30名,道徒800名。②

桦甸县

1943年传入该县。是年6月,横道河子农民尉殿元去吉林被一贯道点传师刘文龙发展为道徒。是年冬天,刘文龙又把尉殿元之兄尉殿清发展为道徒。从此,属于吉林市的刘锡儒派的一贯道便传入了该县。③

永吉县

该县一贯道系由吉林、长春、哈尔滨三市传入,分五个派系。1941年长春派系的丁德山到万昌乡的莲花泡屯王守仁家传道,王守仁入道后,一贯道又扩展到花家、新房子、温家窝堡等村。1942年吉林乔振江系也派人到该县活动,由点传师丁龙胜、叶启到五里河子一带发展道徒。1945年,吉林的"刘希儒系"派点传师陈吉庆到乌拉街发展道徒;又派点传师郑修奎等5人到岔路河等地活动,发展道徒10000余人。吉林的"王永昌系",由王永昌本人亲自到桦皮厂的宋长荣和岔路河的王永平家设立佛堂,发展道徒200余人。当时一贯道五个派系在该县共设有大小佛堂60余处,发展点传师50多人,涉及12个乡150多个村屯。④

四平市

1945年以前沦陷时期,已经有一贯道的活动,日寇投降后,已经有四十几个坛,包括唐山派四平致中总坛长春派四平大会总坛、天津派四平乙己总坛以及哈尔滨派的乾元坛。⑤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70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82—283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86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88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89页。

怀德县

该县一贯道分为两派：一为长春派，形成于1937年，活动范围遍布全县和伊通、梨树部分地区，有道徒一万人。二为沈阳派，形成于1934年，活动于公主岭、朝阳坡、甘家子和伊通等地，有道徒6000人。①

梨树县

1945年开始，该县一贯道分为三派：(一)沈阳派。1946年刘福合等人在张文治家建立佛堂，由于汇泽任坛主，吸收道徒五六百人。1948年张文治潜逃，由于汇泽负责会同坛主陈万金及点传师申唤金等，发展了3个佛堂，吸收道徒千余人。(二)天津派。1945年由梁化宣在天津入道后，领命回郭家店设立佛堂4处，发展道徒千余人。(三)长春派。创始人陈甫田、尹洪献，1949年来到该县发展道徒260余人。②

通化县

1938年先由天津引入安东，又从安东传入该县，设有总坛。1949年被取缔。③

珲春市

1946年6月，郭化县一贯道点传师刘文明等人来到该县，在珲春镇、崇礼、春芳等地区活动，先后建立8处坛口，14处佛堂，发展道徒389人，有道首25人。④

黑龙江省

1939年天津的朱相印等赴佳木斯办道，赵德纯到黑龙江海伦县“开荒”，传义利东商号经理许炳南入道，许在自己的商号内设立佛堂，让全体员工30人全部入道。赵德纯接着又传万兴隆商号的经理窦怀发入道，窦入道后又前往哈尔滨总坛学习，翌年返回海伦县，在自己的商号内设立佛堂，随之被提拔为点传师。⑤ 1940年，济南总坛也派王冠云到哈尔滨开荒，建立了哈尔滨支线。1941年到1945年，由牡丹江和哈尔滨派出道首来到安宁县开荒，传有道徒70到80人。⑥ 是年，邱鸿儒从哈尔滨来到嫩江县传道，在一个月内发展了10名商人，开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90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91—292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94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96页。

⑤ 《海伦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888年，第670页。

⑥ 《宁安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88页。

设佛堂一处，到 1941 年底，共开设佛堂 10 多处，发展道徒数百人。[①] 1943 年，长春的道首何文学来到农安县办道，先后在农安镇、五里河、滨河、开安、龙王、伏龙泉等地设立佛堂。[②] 同年，佳木斯市的点传师王希邦来到勃利县，设立"积善堂"，[③]1944 年，北安县点传师王亭勋等来到黑龙江省的孙吴县，传孙开珍等二人入道，并在二人家中设立佛堂，作为据点，发展道徒，先后传有道徒 100 多人。[④] 1945 年，哈尔滨的点传师卢秉林在讷河县商人王禹久等带领下，回到该县传道，先后传大德恒商号的李子贤人道，并在李的商号里设立佛堂，此后又在 5 处商号里开设佛堂。[⑤]

哈尔滨市

1938 年负责华北、东北地区道务的天津道长胡桂金从天津派郭海霖、邱鸿儒到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办道，在新阳区大同路设立"坤德坛"，天津兴毅坛也派点传师于凤山到哈尔滨开荒，在道外二道街建立"乾元坛"。同年，郭海润从齐齐哈尔来到哈尔滨，分别在道外承德街、道里八道街设坛。1945 年日本投降后，一贯道趁局势混乱，在哈尔滨大肆发展。共建有大小佛坛 236 个，点传师 151 人，坛主 210 人，道徒 35200 人。[⑥] 截止到 1948 年，黑龙江省共发展道徒 51314 人。

泰来县

1943 年由穆威山在该县建立一贯道组织，当时人数不多。1946 年 5 月到 7 月，该县城内设坛 3 处，先后由哈尔滨、齐齐哈尔的王某、崔某、白某讲道扶乩，大量发展道徒，1949 年被取缔。[⑦]

克山县

1941 年 6 月，引进师李济盛与点传师史文生等来该县克山镇东二道街郑殿儒家秘密发展道徒。1941 年到 1949 年间，共网罗道徒 1288 人。其中克山境内

---

① 《嫩江县志》，北京三环出版社，1992 年，第 708 页。

② 李继心：《农安的反动会道门》，载《吉林文史资料》第 20 辑，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社，第 153 页。

③ 《勃利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50 页。

④ 《孙吴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13 页。

⑤ 《讷河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597 页。

⑥ 《公安史料》，第 6 辑。

⑦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08 页。

有前人1名,点传师2名,坛主15名,道徒980名。①

嫩江县

1941年10月,点传师于增瑞、邱洪儒由哈尔滨来到该县,发展道徒10多名,设立佛坛1处,翌年增加到40人。解放前夕该县有点传师2人,公共佛堂4处,家庭佛堂3处,道徒达到300人。②

绥滨县

1940年哈尔滨人杨步礼、张光必等在绥滨、富锦传道,委任刘默臣为点传师,发展道徒。到1949年取缔时,全县共有道徒734人。③

佳木斯市

1940年,山东人阎兴礼到该市以一贯道"大仙"为名,开荒办道,次年离去。接着有朱立祥自依兰转来该市传道。日本投降前,已经设有佛坛12处,有点传师7人,发展道徒300余人。④

勃利县

1943年由佳木斯永安街夏家佛堂传入,道首王希邦,设立"积善堂"传道。⑤

鸡西县

1943年点传师邱洪儒从哈尔滨潜逃到该县,在平阳镇传林忠恕一家22口人入道。1944年林忠恕当上了点传师,又传金奎一等人入道。⑥

五、一贯道在中南地区

湖北省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一贯道就进入了湖北省。1931年,张光璧派点传师彭吉安回到家乡湖北省应山县,在该县及附近的嘉鱼县开荒传道。为了开展道务,他邀请哥老会"紫金山"的大哥曾繁清住坛,称为"乩仙会",⑦利用哥老会的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09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1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4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5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8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8页。
⑦ 《嘉鱼县志》,湖北科技出版社,1993年,第196页。

山堂发展道徒。湖北受到张光璧的重视,1943年冬,他亲自带领坛主陈亚南、刘木生等来到应山县广水一带开荒,一年之内传徒200多人,并向附近的李店、驼子岗、马坪等处发展。①

武汉市

1940年6月,天津道长胡桂金派浩然坛点传师邢杰三带领三才孟宪章、赵秉监,携带办道费3000元,以经营布匹为掩护,来到湖北汉口设立化南坛。邢杰三在武汉通过道徒,结识了日伪武汉治安维持会会长、汉奸计国桢,利用他的势力,发展道务。同年,天津道德坛点传师马鸣仁、范声淼在汉口设立觉南坛。同年,山东"济南线"派遣点传师在武汉设立启南坛。1941年10月、1942年7月和1943年7月,孙素贞三次至武汉巡视道务,放命点传师15名,更加推动了一贯道在湖北的发展。1944年6月邢杰三动员道徒捐款献屋,在汉口的武圣路9号建立了中和总坛,统一了全市的道务。后来与天津线脱离了隶属关系,成为直属于张光璧的直属坛。到20世纪50年代一贯道被取缔时,在武汉已拥有总坛35个,支坛143个,点传师417名,道徒147996人。

汉阳

1943年点传师孟宪章来到汉阳设坛办道,发展出总堂及分堂28所,道徒1500人。②

宜城县

1948年传入,由樊城人周宏盛通过串亲访友的方式,发展道徒20余人,点传师是该县的王德珍。③

谷城县

在城关有道坛12处,坛主17人,点传师、前人103人,道徒122人。④

应城县

1942年10月,一贯道湖北汉宜支线安化总坛的点传师梁少安来到应城传道,设立"德化坛",1943年又设立"普化总坛"。随后,又在黄家滩、临江口分设"铭中坛"和"挽难坛",全县共有24个大坛和一些小坛,道徒3335名,其中点传

---

① 《应山县志》,湖北科技出版社,1990年,第474页。

② 《汉阳县志》,武汉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72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73页。

师14人，坛主71人，三才8人，办事员29人，乩手10人。①

阳新县

1942年7月，广济县点传师戴若林同传道师李汉廷来到该县开荒办道，在县城的迎宾客栈设坛，坛主俞惠金等，道徒有百余人。②

洪湖县

1944年由天津点传师王衡雨、张佑庭传入，他们在该县与当地士绅艾贡甫等合设“道蕴佛堂”。之后，又有北京的“新德坛”及“孔圣道化坛”派来点传师来到该县传道，到1948年开设了3个道务中心，17个分坛，58个家庭坛，已经遍及长江沿岸及荆河两岸，共有道徒5700人。③

房县

主要活动在该县苍浪山和九道、盘水一带，有道徒200余人，道首是杜必章。④

蒲圻市

抗战期间由朱厚璞、程佳人等从武汉传入，设有总坛4个，分坛28处，家庭坛40个，道徒2589人。⑤

嘉鱼县

1931年由应山彭家场点传师彭吉安传到该县新街，由哥老会“紫金山”大哥曾繁清主坛，称为“乩仙会”。1940年又有蒲圻县点传师戚祖保等人到鱼岳镇设坛，由李开卷主坛。1945年又有点传师黄海泉等来鱼岳镇传道，由涂照薮主坛，1938年元月，武昌一贯道点传师周辅臣到该县传道到浦渡口，由徐树藩主坛。⑥

通城县

由蒲圻县“前人”雷元瑞于1945年传入，他在该县寺坡屋设立佛堂，到1950年全县已经有大小佛堂30处，分坛62个，道徒600多人。⑦

崇阳县

1947年由蒲圻县羊楼洞传入该县台麓乡的熊家岭。后又传入东关、大沙坪

① 《应城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年，第691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82页。
③ 《洪湖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03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71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83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84页。
⑦ 《通城县志》，湖北通城印刷，1985年，第419页。

岳麓等乡，在全县设立总坛1个，分坛10个。[①]

宜昌市

宜昌市及其附近的当阳、远安、宜昌、长阳、秭归等县及枝江市，在20世纪40年代均已有一贯道的活动。当阳县点传师郭治等在远安县鸣凤山传徒，将当地观花林寺观音洞的道士"度化"成一贯道徒，并设立公共佛堂作为传道中心。[②] 到1950年全县共有佛堂198处，坛主以上道首322人，一般道徒5106人。[③] 在枝城县有道徒3500人，坛主以上道首900人，佛堂180多处。[④]

监利县

抗战时期由张海云传入该县。1945年点传师石荣炳在下车湾创立义德坛，李艳支任坛主。到1948年全县有道坛30余处，道徒4000余人。[⑤]

远安县

1947年当阳县点传师郭治等到该县鸣凤山等地传道，设立公共坛，发展道徒6人。1949年3月，当阳县城关一带的点传师周文秀等分别设立佛坛，有道徒25人。同年7月，点传师谢昌贵等到该县安花林寺设立李氏佛堂，发展道徒8人。[⑥]

秭归县

1947年6月传入该县，到1950年全县共有道徒432名，坛主以上道首190名。[⑦]

沔阳县

1941年该县人杜云卿在汉口加入一贯道，同年8月，杜与点传师邢杰三、三才贾锡爵等来到该县的仙桃传道设立南坛。半月之内发展道徒百余人。此后又以仙桃为中心，向四处发展，到解放初期，共有引保师25人，道徒1314人。[⑧]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86页。
② 《远安县志》，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513页。
③ 《当阳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年，第580页。
④ 《枝城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52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89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93页。
⑦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94页。
⑧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96页。

天门县

1943年传入该县皂市，翌年传入县城，共有道徒1000多人。[①]

湖南省

1936年一贯道传入湖南。是年，张光璧派点传师、湖南永顺人彭廷润回到家乡，先后在本县及永绥传道，但参加者不多。[②] 1936年又从靠近湖北的永顺县和花垣一带向省内传布，[③]省城长沙和常德是从19世纪40年代以后才发展成道务中心。长沙及其附近的望城、宁乡、浏阳、汨罗、猷县，均有一贯道的活动。常德与邻近的慈利、安化、南县、新化等县，均有一贯道的活动。安化县的道务活动是由新化县的点传师王求梅传入的。南县的道务始于1947年，在该县的九都镇首先设坛，之后陆续设立了7个分坛，到1949年，已经有道徒500多人。[④]

长沙县

1948年该县邹顺初在长沙市加入一贯道，回到该县在谷塘等地设立道坛4个，有道首7人，道徒103人。[⑤]

津市

1948年湖北宜昌一贯道化基总坛派点传师王友信、戴启新到津市，与青红帮的李灿斗、侯永福联合，设津德坛，发展道徒767人，点传师10人。[⑥]

澧县

1949年传入澧县后，在该县设津德坛，在澧县设澧西、澧澹等分坛，共有道首35人，道徒431人。[⑦]

石门县

1945年该县雁池人黄碧川将一贯道传入境内，发展道徒百余人，设立道坛3个。[⑧]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98页。
② 《花垣县志》，三联书店，1993年，第598页。
③ 《花垣县志》，三联书店，1993年，第598页。
④ 《南县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9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12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17页。
⑦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19页。
⑧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22页。

南县

1947 年在该县九都镇设立支坛,陆续建立 7 个分坛,发展道徒 500 人。[①]

汨罗县

1948 年到 1949 年分 4 支传入,发展道徒 398 名,有道首 20 人。[②]

湘阴县

1949 年该县城关镇人陈渭山在永州加入一贯道,然后会同道首张兴汉在县城办道,到 1951 年共设坛 22 处,有道徒 613 名。[③]

湘潭县

1944 年,杨峻峰从河北吴桥县到该县传道。翌年在县城设立总坛——清德坛。到 1949 年继有浙江、江苏、山西、陕西、上海、南京等地道徒在县内发展组织,共有家庭坛 83 个,有道首 117 人,道徒 2000 余人。[④]

郴县

1947 年点传师贾宪文等在该县设立总坛于县城马家坪 6 号,统管嘉禾、蓝山、耒阳、宁远、郴县、永兴等六县的道务。该县的师兄派点传师武金泉等在县城马家坪等多处设立佛坛,发展道徒 300 余人。师母派点传师戴绍达于 1948 年 3 月从衡阳来到该县发展道务,共设佛坛 75 个,发展道徒 1567 人。[⑤]

零陵地区

20 世纪 40 年代设立总坛,1948 年春,以道县为基地,在东安、零陵、永明、宁远等地发展道徒 7000 余人。1948 年传入江华、蓝山、新田等县,据 1953 年统计,全区有道徒 6786 人,其中有道首 798 人。[⑥]

东安县

1948 年传入该县。是年零陵县道首龙睦陛率领点传师萧德弟在白牙市龙溪路李友嘉家建立佛堂。当年 7 月到 10 月,萧德弟及点传师荣开野等三人与坛主唐生禄,分别在白牙市、井头圩等地设立佛坛,发展道徒 148 人。12 月在白牙市正式建立"法化坛",统管县内大小坛口。到 1953 年,全县共有大小坛口 6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24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17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30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36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40 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42 页。

处，家庭坛27处，道徒299人。①

蓝山县

1948年分2支传入该县，先后在总市、洪观等地发展道徒991人，中小道首66人。②

武冈县

1950年2月，隆回县一贯道禹春阳来到该县城关，在化龙桥发展邓宝初等5人入道。是年禹春阳先后4次来到该县，在化龙桥伍聚奎家设立佛坛，委任邓宝初为点传师兼坛主，发展道徒14人，道首2人。③

邵东县

1950年分4支传入县内，设立分坛1所，家坛5所，临时佛堂28处，有道徒437人。其中点传师18人，分坛主2人，家坛主60人。④

隆回县

1949年3月，邵阳保明堂派点传师来该县桃花坪办道。同时还有新化县光德堂也向该县发展组织。该县一贯道组织除在桃花坪设立总坛宣德坛一处外，各地还设有分坛24个，家坛29个，道徒共有740余人，其中有前人1名，点传师11名，分坛主23名，家坛主36名。该县一贯道的宣德坛除在本县内发展外，还向湘西一带开荒。在城步、武冈等县建立道坛10余个，发展道徒300人。⑤

洞口县

1950年3月由隆回、邵阳分三支传入该县。先后在山门、高沙等镇设立分坛4个，家坛7个，发展道徒85人。⑥

靖州县

1947年由天津传入。天津一贯道老前人胡桂金派点传师张蕴华、张玉宽等人来该县传道，在县城萧家塘12号设立张氏佛堂，发展道徒16人。翌年9月，胡桂金又派点传师李青台率三才韩福万、李执中、高兴纬来该县扩展道务，到四乡所(今新厂)等地设立佛坛。据1953年调查，全县有道徒1100人，其中点传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45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46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50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51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52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54页。

师9人,坛主65人,三才6人。①

安徽省

1926年传入该省,是年山东济宁道首马延坤到滁县传道,发展道徒800余人。1937年和1942年,道首胡德、王星五等分别由济南至蚌埠发展道徒6000余人,并以该市为中心,向怀远、灵璧等地区发展。1939年齐铭周等在亳县设立“宏德坛”,1940年又在亳县设立总坛1个,分坛11个,发展道徒700余人。1941年春,马鸣仁、高仪亭、孙锡坤等人,分别由天津、南京来到芜湖传道,吸收汉奸任凤昌等人入道,设立“崇德坛”。1931年,孙素贞来到芜湖布置道务,并以该市为中心,向当涂、宣城等县发展。1941年秋,一贯道传入合肥,先后设立“一致”、“协和”、“治平”、“改知”、“坤范”等坛,直属南京孙锡坤总坛领导。②截止到1949年,安徽拥有道徒8万多人,大小道首570多人。③

合肥市

1942年,张光璧派点传师贾偏田由芜湖到合肥市开荒,先后发展张仲禹、李广庭等人入道,在撮造山巷设立“一致坛”,后来又在后大街设立“协力”、“政和”、“坤范”、“佣德”、“吾真”等分坛。接着成立总坛——治平坛。向合肥四周乡镇及舒城、六安、安庆、巢县等地发展道徒。仅合肥县境内就有点传师8名,坛主58名,道徒1000余名。④

长丰县

20世纪30年代由合肥传入,在境内岗集、土山等地有道徒2594人,其中坛主以上骨干有119名。⑤

肥东县、肥西县

1932年合肥一贯道派点传师王少成到肥东县传道,接着又来到肥西县。到1949年,该两县有道徒8万多人,其中大小道首570多人。⑥

宿州市

1939年,天津的道长齐铭周派蚌埠的点传师刘伯年和薛敬安来到宿州市,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68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75页。
③ 《肥西县志》,黄山出版社,1994年,第440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92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97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98页。

在裕丰粮站和凤凰台开设佛坛，然后在县城南、城东及濉溪县的杨柳集等地传道，发展道徒1347人。之后，在邻近的灵璧县、泗县、涡阳县、蒙城县、五河县、怀远县等地发展道务。[①]

凤台县

1937年从山东青州传入城关、孔集等地区，发展道首100余人，道徒1200人。[②]

滁州市

1927年夏，张光璧派马延坤来该市传道。马住在山东会馆，自称老师，放命金子葱为点传师，王家宝为天才，与张光璧放命的点传师龚雅文共同办道。后因内部纷争，道务停顿。1942年12月，天津道首贾庆仁来该市办道。1943年龚雅文重新在该市办道，在积善堂内设永归坛，一贯道在该市重新得到发展。[③]

芜湖市

1942年2月传入，在宁渊观设立"崇德堂"，作为总坛。其下设立13处分坛。有点传师27人，并在郊区和省内8个县镇设立了几十个分坛。[④]

安庆市

1941年6月由天津崇华堂的点传师孙兰芳等4人来到该市传道，在分龙巷5号设立"中致堂"，随后又开设了5处佛堂，以后又向附近各县发展。点传师汪德胜又把道务发展到屯溪及江西的景德镇、云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庆等地。[⑤] 1943年，张光璧派坛主刘星魁、孙连康从扬州来到天长县开荒，设立"崇华堂"，到1949年时，全县24个乡镇已经有道徒3859人，其中点传师66人，坛主334人。[⑥] 此外，安徽的铜陵、安庆及其邻近的繁昌、潜山、怀宁，东至黄山市的休宁、祁门、黟县等地，从20世纪40年代起，也均有一贯道的活动。如繁昌县的一贯道又名"中华道德慈善会"，共有7处坛口，坛主以上道首有10人，道徒百余人。[⑦]

① 《宿县志》，黄山出版社，1988年，第384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16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20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23页。
⑤ 《怀宁县志》，黄山出版社，1996年，第282页。
⑥ 《天长县志》，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6页。
⑦ 《繁昌县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8页。

怀宁县

解放前夕,该县有道坛169个,点传师98人,坛主1104人。①

寿县

1940年到1950年,一贯道先后4次传入该县,最初有田家庵道首常保安来到该县城关、下塘两地传道,设堂7个,发展道徒300余人。②

舒城县

1944年由六安县双河道徒罗克伦传入,在干汊河、新街等地发展道徒10多人。1947年2月,合肥县点传师王先登、坛主巩维方在该县桃溪镇开荒,发展道徒50余人。同年6月,又有合肥小兴集的点传师张道钧等来到城关、梅河等地开荒,在城关发展道徒50余人,在梅河发展道徒数十人。③

石台县

1947年河北唐山人石玉明、苏静波从青阳县传入。当时,永阳、柳溪、近圣等村已经有张光璧建立的“济世书斋”佛堂,后来,该支一贯道分裂为先天道和人情道两派。到1950年该县共有道徒351人。④

青阳县

1947年石玉民来到该县传道,不久被县政府取缔。翌年,苏向荣到九华老田村传道,吸收道徒数人。1949年2月,河北保定人孙安甫到陵阳上章村传道,发展很快,到解放前夕已经有佛堂26处,道徒千余人。⑤

宁国县

1948年传入该县,依地区划分为东西两派,分布在全县18个乡村,有道徒1205人,其中点传师13人,坛主88人。⑥

广德县

1948年3月由湖州、郎溪、宣城等地传入,在城乡有道坛24个,道徒700余人。⑦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28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43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38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45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46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48页。
⑦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49页。

绩溪县

由屯溪等地传入,有道首13人,道徒917人。[1]

丰顺县

1927年由潮安传入该县,设有总坛1处,分坛9处,有道首9人,道徒487名。[2]

广东省

1938年9月,日寇大本营决定向华南进攻,直接夺取广州。同年11月21日,广州失陷。随着日本侵略军逐步南下,一贯道也随之向华南挺进。1943年,天津总坛派霍永盛到广州办道,1947年,上海道首潘华龄派宝光坛的梅鉴彬、黄殿峰到广州分头开展道务。1948年下半年,杭州道首鲍正泰到广州活动。[3] 截止到20世纪50年代,一贯道在广东共设坛44处,发展道徒7747人。

韶关市

1947年传入粤北,解放前夕,韶关市区及阳山、连城等县有道首63人,道徒946人。[4]

汕头市

1946年传入该市潮安县,1947年上海一贯道宝光系派点传师李浩然率三才张坊等三人,来到汕头发展组织。最先在澄海县蓬周乡设立浩德坛,然后向各地发展。1949年1月在汕头市设立润德总坛。同年上海一贯道金光系道首刘延庆来该市设立阐德坛。解放后取缔时,汕头一市三县共有道坛245个,道徒17812人。[5]

澄海县

1947年3月,汕头总坛主李浩然派点传师吕文德等到该县亭脚巷设立浩德堂。同年秋传入下蓬、城关等地。到1949年2月,全县共有37个道坛,60名道首,2059名道徒。[6]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51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88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76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83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91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92页。

广西省

1943年云南省昆明市一贯道点传师国怀宝来到桂林开荒办道，发展道徒20余人，1944年，一贯道前人郑树恒等人从柳州到宜山开设佛堂，发展道务。桂林被日寇侵占后，国怀宝逃往贵阳，日本投降后，他又回到桂林，并把道务发展到兴安、荔浦等地。共设立佛堂28处，家坛13处，提拔点传师11名，坛主43名，三才14名，发展道徒1068名。1946年以后，其他省市的一贯道支派纷纷派人来到广西办道，1943年到1950年，8年之内，外省市共有26个支派渗透到广西各地。分布在全省的37个县。据1953年统计，全省有道徒22549人，其中道首1467人。①

恭城县

1912年，高洲余本清在湖南省江华县加入一贯道，然后回到本县发展组织，在城乡发展道徒100余人。②

南丹县

1949年由北平、柳州、贵阳等一贯道支派传入该县，到1952年取缔时，有道徒100余人，小道首12人。③

象州县

1949年传入，有点传师、坛主、保引师15人，道徒253人。④

六、一贯道在华东地区

上海市

1936年张光璧决定向上海发展道务，1937年11月12日，上海被日寇侵占后，一贯道也随之来到上海。1939年春，一贯道在北平举办“顺天会”的炉会，胁迫大批道徒立愿到外地“开荒”。第一批来到上海开荒的，是天津道德坛派出的点传师冯月千（迁）、张葆经。他们在嵩山路78号中医疗养院楼上建立传道据点——基本坛，后来改为“基础坛”，成为上海的总坛。同年4月，济南明德坛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06—907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13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20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21页。

派点传师胡寿庵到上海办道，设立“和光坛”，由胡的后学李光吉主持道务。1940年，徐书印、吴信学从基础坛分出“金光坛”，庞守诚、李介人成立了“紫光坛”。[1] 1941年春，邢杰三与孟宪章等又来到上海，在山西路丝业会馆设立宝光坛。当年4月，邢杰三等返回武汉，天津浩然坛另派点传师潘华龄携天才孙鹤亭到上海主持宝光坛的道务。不久，浩然坛又派点传师赵春林到上海浦东设立浦光坛。经过天津、济南两地一贯道点传师的发展，在上海形成了五个大坛：基础坛，由李鸣岐、王德训等人主持；宝光坛，由潘华龄、韩兰楹主持；和光坛，由李光吉、李顺发等主持；金光坛，由徐书印、葛子骏等人主持；浦光坛，由王永和、庄妙涛等主持。五大坛由济南人胡寿庵总负责，后因胡办道不力，于1942年被撤回济南，由冯月千负责。1944年张光璧授意将五大坛改称五大组。冯月千死后，五大组各自为政，独立发展。在上海沦陷期间，一贯道依靠日伪的势力，把道务发展到了每一个里弄和村庄，到1949年，全市共有总坛18处，道徒15万人。

在日寇统治下的上海和南京，一贯道大力发展汪伪政府的高级官员入道，以便借助日寇和汪伪的势力，进一步发展道务。1942年，上海点传师胡月千把汪伪“中央警税团”中将团长李丽久拉入道内，成为上海基础坛的“领导点传师”。李丽久早年曾学习武术，1940年6月，经大汉奸周佛海介绍，担任汪伪“财政部盐务署税警处”副处长。同年10月升任汪伪“中央税警学校”总队长，1943年升任汪伪“中央税警总团”中将团长。他在入道后，大力宣扬“世界末日已到”，要求百姓“顺应天时”，做日寇的顺民。1943年7月，李丽久凭借深得汉奸周佛海的欢心和自己在汪伪政府中的地位，又把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孙祥夫拉入道内。继而，又通过孙祥夫的关系，把大汉奸、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拉入道内。据李丽久供称：“我同褚汉奸认识是在1928年间”，“后来参加敌伪又见面。（1943年张道长在南京时）孙祥夫介绍他入道，是在鸡鸣寺（我为保人或是别人，我记不清了），他入道以后，我同他到三茅宫齐铭周佛堂去过，我同孙祥夫、褚汉奸都是该坛坛主之一。”[2]张光璧通过李丽久和孙祥夫，很快与汪精卫卖国集团建立了密切联系，后又把汪伪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等汪伪卖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拉入一贯道，使一贯道在汪伪政权的庇护下，在南京如鱼得水，大肆发展。张光璧还当上了汪伪政府的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27页。

② 《李丽久案卷》，原卷藏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处。

"外交部顾问",其子张英誉当上了汪伪"外交部专员"和"侨务委员会委员",同时还兼任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北平办事处少校参谋"。关于张光璧担任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顾问"的事,据李丽久供称:"大约十月间(1946年——引者)李和庭约我同他到北京去接线,得机会见见孙师母。我同他到了北京,住在我北京家中。"见到孙素贞后,"我报告李和庭在南方接金线的事,同时,我将南京及上海道德会被查封没收事,托友写信讲情面无效,并将社会部专员透露出来消息等事,一一说明经过。孙师母答说,'老母早就降训说,一贯道不向任何政府立案。道德会的成立,就是违背老母的训,你老师也胡〔糊〕涂了,听从张英誉的话,托褚民谊挂了个名义的事,听说为旅行、买车票便利,你看这不是招考吗?托褚民谊挂名义的事,是你办的,还是孙祥夫办的?'我解释答说,老师同师兄挂名义的事,(大约1945年胜利前,张光璧在敌伪外交部挂了顾问名义,张英誉挂了一专员名义——原注)在事前我不知道,事后我到南京去,听孙祥夫说的。我当时说,孙祥夫不该给老师挂名义,孙祥夫说他也认为不当,因为道德会杜钟梁等托办甚紧急,情不可却。孙师母说:'无论怎么说,孙祥夫是你的后学,将来受了考,你也脱不掉。社会部怎么不怀疑呢?'"[①]当时,张光璧在汪伪统治下的南京,同汪伪政府的高级官员们打得火热。张英誉供:"1944年夏,南京来人接先父,先父教吾随往,住南京建邺路187号。先父每日说话甚多,吾帮着办点现成的事,或代见见客而已。常来者有齐道长、孙锡坤、王俊九。又新认识了孙祥夫和上海来的李丽久。孙、李又陪着褚逆民谊来看先父。后先父又教吾随孙祥夫、李丽久回看褚逆民谊,以作礼节上的应酬。据吾听说,李丽久度孙祥夫,孙祥夫度褚逆民谊。"[②]对于张光璧等一贯道头子与汪伪高级官员的密切活动情况,齐铭周也供称:"在1944年,师尊住建邺路新宅时,孙祥夫之后学褚民谊亲去拜望过一次。孙系李丽久之后学,约在1943年间,孙曾同褚民谊到三茅宫去拜望璋(即齐铭周,因为他字为'璋'——引者),璋与他谈一次。嗣后其前人李丽久曾同璋到褚家中回拜一次。又年余在毗卢寺吃例斋素饭,值褚亦去吃斋,见过一面。事后,1944年秋末,三藏塔行落成典礼,璋去参观,与褚又见过一

---

① 《李丽久案卷》,原卷藏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处。

② 《张英誉笔供》,1951年7月,载《一贯道的兴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5—166页。

次。"[①]1943年,孙祥夫又把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拉入道内,成为一贯道坛主。此外,被拉入一贯道的汪伪高级官员还有伪"司法部长"李圣五、伪"社会部副部长"彭年年、伪"南京市市长"周学昌等人。一贯道正是有了汪伪政府众多高级官员的庇护和支持,才得以在沦陷区大肆发展。

江苏省

1937年日寇在占领平津后,不仅向华北大举进攻,而且进一步开辟东部战场,企图使东部的中国军队无法增援华北战场。并且控制上海、南京以及富饶的江浙地区,使中国丧失抵抗能力。但是,江浙乃是国民党政府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经济利益所在地,所以,从1935年起,国民党就修筑了三道国防工事,布置了大量军队。因此,日本侵略军从1937年8月到11月,在上海一直被胶合着,直到同年11月11日才将上海攻占。上海失守后,中国军队急忙转移,由于指挥失当,加上刚刚撤退又奉命返回原阵地,秩序混乱,三道国防工事失却效用。同年12月5日,日军迫近南京市郊,17日南京被日寇侵占。1938年,日寇又把魔爪伸向徐州,接着又进兵武汉。同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在这时,张光璧为了配合日寇对我国大举南侵,又提出"道运南转"的口号,他不仅亲自南下,而且命令道首们纷纷向东南地区扩展道务。

南京市

1935年济宁道长张振中来到南京浦口办道,道务稍有发展,旋因1936年张光璧等师徒5人被扣押在南京,道务暂时停止。随着日寇向江浙一带推进,一贯道也在这里重新活跃起来。1937年12月13日清晨,日本侵略军侵入南京市内,接着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从此开始了对南京的野蛮统治,一贯道则趁机在南京开荒办道。1939年天津点传师杨灌楚、坛主龚名山分别来到南京,在玉带巷设立一坛。1940年春,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汪伪"国民政府",一贯道在北方的各线更纷纷南下,大肆向南京发展道务。同年,天津道德坛派点传师刘之江到南京,在姜家园设坛。济南天一坛坛主于雅倩以中医针灸为掩护,来到南京办道。1941年春,济南道长齐铭周随孙素贞到南京巡视道务,放命点传师。是年6月,齐铭周派王俊九到南京主持道务,在三茅宫99号设立"明一总坛",下设明真、公共、兴化三个分坛,并向南京周围地区发展道务。这

① 《齐铭周供词》,1952年4月。

时，天津道德坛的老前人孙锡坤也到南京主持道务，在五星里6号设立“道兴总坛”，下设中和、诚明等11个分坛。同年8月，北平线也派点传师袁子良到南京办道，将大汉奸常玉清拉入道内，在曾公祠常家设立“忠义坛”。同年北平线坛主韩顺祥偕妻子也前往南京办道，在大光路4号设立薄厚坛，次年又在糯米巷河南同乡会设立“中一总坛”，下设昌义等5个分坛。这时，孙素贞看到一贯道已经得到了汪伪集团的青睐，便把她最亲信的点传师宫彭龄派到南京，以便进一步与日寇和汪伪卖国集团相勾结。宫彭龄在富民坊10号设立“刚义总坛”，作为发展道务的据点。至此，一贯道在南京，已经设立了4个总坛，可见其对汪伪统治下南京的重视。

为了进一步在南京发展道务，南京一贯道道长孙锡坤在南京建邺路187号购买了一座旧宅院，于1943年开始重新装修，里面添置了大量贵重的红木家具和古玩、玉器，献给张光璧、孙素贞，成为他们下榻南京时的别墅和一贯道的总指挥部。

江宁县

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在日寇占领时期发展甚快，全县建立了11个大坛，131个小坛。①

丹阳

南京附近的另外一个城市丹阳，从1945年到1949年期间，一贯道设立了民德、怡光、瑞光、淮光、本茂、义光、义善等7个道务中心。②

江浦县

一贯道以南京为中心，向附近各县发展道务。1943年，南京西门白果树佛堂堂主毕有昌、点传师宫彭龄在江浦县城北门大街建立“新德佛堂”，全县有道徒200多人，分布在全县的珠江镇、高旺街和侯庄等堂点。③ 由于宫彭龄是孙素贞的亲信，他负责南京及其附近的开荒工作特别卖力，到1943年南京附近的江宁、句容、六合、溧水等县，均有了一贯道的传道活动。④ 这些地方的一贯道分为两支，一支隶属南京，又分为“正义”和“金线”两派；另外一支直接与溧阳发生

---

① 《江宁县志》，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850页。

② 《丹阳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29页。所记宫彭年当系宫彭龄之误。

③ 《江浦县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6页。

④ 《溧水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18页。

联系。全县设有慈普和慈成两个大坛和 17 个小坛,7 个家庭佛堂,共有道徒 700 余人。

六合县

1943 年,浦镇的张叙明派张继勤等 4 人来到该县办道,他们以经商为名,暗地里发展道务,先后在六城、龙袍等 11 个乡镇设立了 29 个坛口,有坛主 30 人,道徒 430 人。①

徐州市

1910 年传入徐州,1935 年由山东济宁传来贾汪后,设立了 4 个公共佛堂及一些家庭佛堂。有 6 名点传师,20 余名坛主,在城郊 20 多个村庄设有佛堂,有道徒 3000 余人。②

铜山县

1936 年由山东济宁人范兆吉传入。开始时在徐州人林宝甫家设总坛,后来到柳新乡口上村等地设总坛,并且在西朱家等 30 多个村庄设立分坛,发展道徒 400 余人。③

丰县

1943 年从山东金乡县道首范道学、单县道首孟宪忠分两路传入该县。以金乡县道首范道学和盛玉举为首的一路向华山、梁寨等地发展;以单县道首孟宪忠为首的一路向城关、常店等地发展。④

连云港市

1940 年一贯道由山东传入该市,到 1948 年底,共设有公共坛 4 处,家庭坛 12 处,有道徒 1062 名。⑤

宿迁市

1941 年一贯道从山东传入,活动于县城、卓圩、皂河、晓店等地,设有总坛、分坛和家庭坛。⑥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51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54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57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59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63 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65 页。

淮安市

1945 年扬州人张瑞堂等人来淮安传道，不久扩展到清江浦，道徒多达 1100 人。[①]

淮阴市

1943 年清江浦复兴龙锅厂王姓老板在青岛被委任为点传师，他回到家乡后发展道徒 30 余人，1945 年新浦人贾庆仁等先后来到淮阴传道，活动于沭阳、灌南、宿迁县境。[②]

金湖县

1948 年由宝应山阳乡道首张某指使该乡何某等三人来该地发展道徒，集中在白马湖阮桥一带，佛堂设在乔某家，张某为点传师，当时共有道首 2 人，骨干 12 人，道徒 56 人。[③]

扬州

1930 年前后传入该市，城内设有 5 个大坛，48 个分坛，道首 600 多人，道徒数千人。1940 年绥远点传师派坛主金鹏贵、乩手王仲国等人来扬州开荒办道，初在城内缺口街堂子巷 12 号设坛，1941 年天津点传师白守仁偕三才宋起秀来扬州取代金鹏贵。1943 年 2 月，坛址迁往便益门大草巷 28 号，成立"忠义堂"，白守仁从北方调来 20 多名办道人员，来扬州发展组织。同时又派人往东台、淮阴等地开荒办道。这时，"忠义堂"已经成为苏北地区的活动中心。一贯道传入扬州的另一条线，来自北平方面。1942 年冬，北平道长张范卿派点传师杨缘茂等、坛主王乃德等来扬州办道。初在城里羊胡巷设坛，后迁马监巷，成立"信义坛"，王乃德升为点传师，带领一帮人去盐城、大丰、白驹等地办道。[④]

邗江县

1939 年有泰州人自称"白仙姑"者，在该县头桥设坛传道。1942 年，在瓜洲设"崇善堂"，后在八里铺、六圩等地设堂口 6 个，设家庭坛 12 个，收道徒 1300 人。[⑤]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68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71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75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81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83 页。

仪征市

1941 年前后，孟姓坛主来该县设坛，发展道徒数百人，以后逐渐扩展到全县大部分地区。①

宝应县

1941 年初，扬州道首白守仁到该县设“理化坛”，发展道徒 4 名，其中点传师 3 人，坛主 1 人。1943 年，该坛改为总坛，在县城和郊区设小坛 7 个，后发展到泾河、山阳等集镇，共有坛堂 149 个，道首 31 人，道徒 16654 人。②

靖江县

1934 年，该县原道教的文昌宫由一贯道点传师任主持，原道教徒转入一贯道。③

泰兴县

1944 年由外地传入境内，1948 年曾在国民党政府备案，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组，到 1950 年已经发展道徒 1 万余人。设有坛堂 160 多座，有点传师51 人。④

泰县

1942 年由一贯道北平总堂点传师侯光增等人创办堂口，全县有堂口 75 处，道首、办道人员 181 人，道徒 2800 人。⑤

启东县

1944 年由海门茅镇归化坛负责人李浩然等，通过亲友建立道堂，发展组织。该县东部沿江一带由崇明传来的一派属于刘率贞的明线派，而李浩然等所传一派属于孙素贞的暗线派。到 1950 年，全县 6 个乡共有道首 180 多人，道徒 2238 人。⑥

海安县

该县居民夏某在外地信奉一贯道，1941 年回乡后在家中设坛，发展道徒，到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84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88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89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90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91 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95 页。

1942 年有道徒百余人，在海安地区 22 个乡间有组织。[1]

常州市

1941 年上海基础坛派武进县人吴萼伟与其嫂王璋德返回原籍办道，另派浙江人桑春生、山东人宿致华等到常州一带办道。初在东门藤公桥设博德坛，对外称“崇华堂”，1944 年迁到娑罗巷，改称天德坛。为了发展道务，吴萼伟同伪县长勾结，到日本人那里领取通行证，发展了一批核心人物。到 1945 年，共有道坛 74 处，佛堂 35 个。道徒号称万人，到 1947 年，号称城乡有点传师 3600 名，坛主 48000 人，道徒 12 万人。[2]

溧阳县

1943 年 6 月，由金坛人彭国铣陪同山东道首宿致华来到该县传道。在城镇设立道坛，以陈文华为坛主，发展道徒。1945 年有道徒 1000 余人。1949 年前夕，共有道坛 120 个，点传师 50 名，大坛主 24 名，办道人员 193 名，道徒 6000 余人。[3]

无锡

1939 年天津浩然坛派点传师陈印青到无锡办道，在三皇街设立“志善总坛”。1941 年，浩然坛又派李秀恩等人到无锡主持道务，在城内建立了 12 个大组，并向云贵派人发展道务。同年，上海的基础坛也派点传师陆良荣等到无锡办道，在小楼巷 49 号设立“天光总坛”，后来因为把当地一个县参议员余赞平拉入道内，使得天光坛的势力大增，在城乡共设立了 8 个大组。同年济南道长齐铭周派点传师李世杰来到无锡，在后祁街设立“智勇总坛”，到 1949 年境内共有 6 个分会，11 个组，140 个坛，200 个家庭佛堂；道首 2039 人，道徒 63742 人。[4]

江阴市

1942 年南京一贯道明一坛道首和无锡办道人员来到江阴建立明德坛。3 月，该坛改由南京明真坛的点传师王金印继办。4 月至 9 月，在江阴北门开办道徒研究班，先后发展道徒 16000 余人，在城乡建立中心佛坛、分坛、佛堂共 53 个。1943 年，上海一贯道紫光坛的办道人员来江阴建立博仁坛，并在城内开办训练班，先后发展道徒 3000 余人。其中有点传师 61 人，三才 7 人，坛主 120 多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97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01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07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10 页。

人，佛堂、家庭坛54个。1947年，道首王金印等赴香港开坛，明德坛由点传师朱芳梅接办，受王金印控制。[①]

宜兴县

1943年从镇江传入，最初在和桥设立正德坛，1944年改为祥德坛。1947年7月，改名“中华道德慈善会”，在城西设“宜兴县道德慈善救济会”。1948年在和桥、鼎山设分会，下设8个小组，239个坛，道徒4万余人，遍及全县。[②]

苏州市

1939年天津道德坛点传师杨灌楚、冯月千来到苏州办道。1941年济南天一坛道长齐铭周派点传师司敬涵到苏州办道，在铁瓶巷设立“诚一坛”。1942年复派卢竹枕夫妇协助其办道，先后在苏州设立8个分坛。

吴县

1939年传入吴县城区，日伪时期魏华林办白阳坛，王正贵等办培德坛，司敬涵等办诚一坛。1943年天津一贯道派曹至善到吴县，组织照光善书局、崇华善堂。1944年到东山、西山、横泾一带设立佛坛。全县共有50个分坛，18个家庭坛，办道人员991人。其中，点传师35人，坛主195人，三才11人，办道员750人，道徒22000人。[③]

吴江县

该县绸商杨海荣、杨章魁夫妇在上海经商时加入一贯道。1944年受上海宝光坛派遣返回该县盛泽镇，住在南新街开荒办道。同年4月，宝光坛的徐凤章正式在盛泽镇开设“润光坛”，以杨氏夫妇为坛主，发展道徒近千人。解放前夕，该镇有道徒2966人。[④]

太仓县

1943年由昆山点传师李新甫传入，在城内关帝庙设立余德坛，委任日伪太仓保安大队中队长罗治平为坛主。罗利用权势向郊区发展，先后设立道坛20多处，罗自任坛主。之后，宝山、川沙、嘉定等地的一贯道也相继派人来此设坛。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11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12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15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16页。

到1949年春，全县已经有道坛54处，道徒1万余人。①

镇江

1939年北平线道长张五福派点传师侯光增和坛主张成德等来到镇江，在邹家巷12号设立“普光坛”。1942年，北平线又派赵裕波来镇江协助主持道务，在双井路27号设立“正觉坛”，作为总坛。

常熟

1941年北平线张五福派点传师张天洞等，在常熟南乡杨墅园设立“明德坛”，以后又向农村发展。

徐州

1940年天津道长胡桂金派点传师林保璞等来到徐州，在中枢街设立“中枢总坛”，并向连云港、淮阴等地发展道务。同年，济南天一坛道长齐铭周派坛主高铸青，在徐州城内鼓楼西巷5号设立“昌一坛”，后来又派点传师司允中来徐州主持道务。

海门

1941年上海宝光坛领导点传师潘华龄偕李浩然来到海门，两年后在海门设立“海北总坛”，继向南通、如皋等地发展。

铜山

1936年济宁人范照吉把一贯道传入铜山，在西家朱、大小黄山、大小张家等村庄设立30多个分坛，发展道徒400余人。②

武进

1941年由浙江绍兴人桑春生传入，他与本地人吴萼伟先在东门滕公桥头开设博德坛和厚德坛，后在西门开设润德坛，南门开设洪德坛，到1944年共有道徒5万多人。③

浙江省

一贯道是1935年传入浙江省的，当时，有岱山的道徒刘甫仁迁居嵊泗小洋乡，在该处建立佛堂，发展道徒24人。④ 1941年，张光璧派人在杭州市设立“醒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18页。

② 《铜山县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912页。

③ 《武进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34页。

④ 《嵊泗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6页。

世堂”，之后，上海、南京、天津等地的道坛先后在杭州设立了6个坛堂。1942年到1943年，又在宁波、绍兴、兰溪等地建立坛堂。1947年张光璧死后，以张光璧妻刘率贞和儿子张英誉为首的“师兄派”便以杭州为基地，设立了25个分坛，分布在嘉兴、湖州、绍兴、余姚等地。以孙素贞为首的“师母派”也在杭州设立了24个大坛。1952年取缔会道门时，全省共有坛堂5749处，道徒16.9万余人。[①]

杭州

一贯道传入杭州颇早。1941年天津道德坛的李育坤立愿要求到杭州去“开荒”，张光璧对他说：“杭州是个佛地，你只要好好注意，上天必有一番显化的。”同年2月，李偕其妾骆英男、“天才”韩金城、“人才”乔振干、坛主王佩玺等一行，先来到上海基础坛，由冯月千派点传师刘书蔚、坛主林学栋等陪同来到杭州。他们在杭州九曲巷12号租房数间，以开设道济医院为掩护，开展道务。李育坤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以便于领导，他授意“天才”韩金城利用扶乩，编造了一篇坛训《醒世妙篇》，遂在此设立“醒世坛”。后来该坛下属的分坛，皆以“一”字命名，以表示“九九归一”。

由于张光璧称杭州乃是“佛地”，所以，上海的金光坛、宝光坛，天津的浩然坛、慈航坛，南京的明一坛，均相继派人来到杭州发展道务。1941年3月，上海一贯道总负责人胡寿庵派金光坛点传师徐书印、坛主桑春生在杭州上珠宝巷30号设立“忠恕坛”，后来与济贤坛合并，改称“化一坛”。1942年2月，天津道长刘梦荣派浩然坛点传师孙坤、“人才”刘宝仲、“天才”王俊庭等人，在杭州窑瓶巷29号设立“守一坛”。同年7月，上海宝光坛潘华龄在珠璧弄散花巷建立“明一坛”。同年9月，潘华龄又派冯世珍在杭州建立“纯一坛”。1943年，杭州本地点传师鲍正泰受上海宝光坛领导点传师潘华龄之命，在乌龙巷29号建立“道一坛”。1942年春，河北省武清县的慈航坛，派点传师王云齐、坛主何兆鼎到杭州设立“贯一坛”，同年4月，在南京的济南道长齐铭周，派南京明一坛点传师王星五、坛主陈祝三等人到杭州设立“济贤坛”。1943年5月，孙素贞带领冯月千、宿子臻、宫彭龄、刘瑞贞及汪伪“中央税警总团”团长李丽久夫妇，来到杭州，住在济贤坛内。他们在杭州先后建立了“普济坛”、“明一坛”和“道一坛”；刘率贞在杭州也建立了“醒世坛”、“诚一坛”和“忠一坛“。两处共计设立253处佛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28页。

堂,有点传师23人,道徒约3万人。[①]

总之,自1941年到1943年,从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前来杭州设坛办道的,共有6支之多。后来,又有来自安庆、九江、南昌、西安等地的一贯道组织,前来杭州发展道务。一贯道在浙江的三股势力,共设坛3663处,拥有道徒264492人。[②]

浙江其他地方的一贯道多由上海、杭州等地传入。

余杭县

1942年传入杭县,翌年传入余杭县。传入余杭县的有孙、刘两派,共有坛堂253个,点传师23名,道徒约3万名。[③]

萧山县

1943年杭州东街路的王五金来到萧山县城厢镇东仓弄大庵内,设立坛堂。以后相继成立了"道一"、"五一"、"明一"、"程一"、"真一"、"济贤"等坛。截至1938年,全县有11个起点大坛,66个大坛,45个分坛,道徒11833人。[④]

富阳县

1945年2月,由杭州济贤坛点传师裘阿彩、诚一坛点传师占天宝等传入该县。在大源乡潘塘头、渔山乡五丰村设坛,发展一批道首。1948年,杭县凌家桥点传师来该县发展道徒。此后,一贯道组织迅速发展,遍及全县,共设有坛堂54个,有道首159人,道徒1997人。[⑤]

建德县

1942年2月传入,全县共有大坛10处,小坛122处,家坛99处,道首244人,道徒3204人。分为天津系和杭州系。天津系是1947年分别由兰溪大和坛的王瑞坤、明德坛的金海根和谦信坛的程少通等人传入。杭州系是1946年2月分别由杭州观一堂的张祖同和宁波瑶光坛的俞根堂等人传入。[⑥]

德清县

该县一贯道是由上海、杭州和湖州3个地方传入的,建有戈亭"恒德"、钟管"妙善"和车由"明孝"、"学德"等道坛,下设佛堂306个,道首2350人,道徒2.3

---

① 《余杭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97页。
② 《鲍正泰等供词》。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1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2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2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3页。

万人。

平湖县

1944年4月传入该县,设有总坛2个,家坛4个。同年5月,上海一贯道派点传师钱应莲等来到该县城区活动,1945年春易名"孔孟大道",由县城扩展至新仓、广陈一带。1947年改称中庸大道。从1948年开始转入农村。1949年2月,上海派庄妙涛等来到城区、新仓一带活动。设立1个总坛,4个分坛和21个家坛。①

嘉善县

1941年上海和光坛点传师史步高和基础坛的朱素珍分别来到嘉善开荒办道。先后在城内勾吴弄1号设皓德坛,由史步高兼任坛主;过盘生、柏宝珍则于西门太平桥设中德坛。两坛均以魏塘镇为基地,不久发展到西塘、干窑等地。1943年吴正明充当皓德坛坛主,使该坛发展到1000余人。②

普陀县

1944年6月,从上海传入,在新街设博光坛,发展道徒800余人。翌年又设雪光、崇光、紫光、道光、中光等五坛。1946年4月,博光坛升格为总坛,势力扩展到镇海、玉环等地。③

岱山县

1948年6月,沈家门道首、博光坛点传师先在长涂乡设立辉光坛,后分设华光坛等7处,总称岱山金光组,发展道徒563名。到1949年,全县的道坛已经遍及岱山、衢山等岛。有坛堂20处,佛堂13处,道首49名,道徒1649名。④

宁波市

1942年春,西派(四川派)天津总坛点传师马毓麟来到宁波设立光明坛。秋冬又设集贤坛。1943年建立天铎坛,翌年又建智光坛,1947年建善光坛。在上述六大坛之下,设立分坛和佛堂86个,分布在城区、郊区和邻县乡村。⑤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9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41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43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44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45页。

慈溪县

该县一贯道分为两派。其中孙素贞派是1943年从余姚县传入的。在该县的周巷设立德基坛。1945年以后，在周巷、逍林、浒山、横何、长河等处均有大批道徒。刘率贞派来源于杭州的醒世坛，后在观城、鸣鹤两区发展。到1952年取缔会道门时，在浒山等8个地区共有大小佛堂108处，坛主以上道首191人，一般道徒1922人。[①]

余姚市

1942年春，宁波一贯道集贤坛点传师尹梅珍在该县县城助海庙建立唯一坛。翌年，宁波瑶光坛和光明坛相继派点传师桑春德、单德明在县城建立儒基坛和德益坛。1944年，杭州醒世坛派点传师朱启祥在南城下寺桥建一如坛。各坛又纷纷建立支坛、分坛，发展道徒。到1949年，道坛已经遍布该县城乡，有总坛4个，支坛34个，分坛158个，家庭坛242个，道首有点传师91人，支坛主48人，分坛主501人，家庭坛主173人，道徒1万余人。[②]

鄞县

该县一贯道属于西派（四川派），1942年天津乾元坛点传师马毓麟在宁波小沙泥街设立光明坛，后又在城区及外县设立总分坛、分支坛520余处，培植点传师450人。据1951年调查，该县共有12个总坛，168个小坛，道首363人，道徒万余人。[③]

象山县

1943年6月，宁波市瑶光总坛的点传师桑春森偕点传师庄彭令等人来到该县，7月在该县丹城镇设立先觉总坛。1944年4月，庄彭令等人前往石浦镇，勾结镇商会理事钟伍章等，在该镇设立性纬总坛。1946年4月，将丹城先觉总坛改称“公济慈善会”，石浦性纬总坛改叫崇德善堂。到1949年全县有总坛2处，分坛72处，家庭坛65处，点传师74名，坛主72名。道徒5000余名。[④]

绍兴市

该市一贯道分别从杭州、上海传来。其中一路从杭州传来：1941年，张光璧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46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47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48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0页。

在杭州设立“醒世坛”,1942年该坛派点传师李育坤等人,在绍兴城区西小路27号开办“正义班”,广收徒众。几经变迁,最后在华严弄高道台门内设立“一本总坛”,自称“正一贯”。分为四个系:忠字、孝字、节字、义字,进行道务活动。另一路是从上海传来:1943年,上海宝光坛派点传师辛靖等人来绍兴设坛传道。是年10月,在城区作揖坊设立“归真总坛”,自称“金线一贯”。1944年3月,辛靖病故,宝光坛派孙堃来绍兴主持道务活动。1949年,宝光坛指令孙堃等人向外府发展,孙堃等人遂在绍兴县、上虞县、嵊县等地,设立分坛90余个,拥有道徒2万余名。①

诸暨县

1943年,董庆鸿、谢耀南自杭州传入该县,设有坛主、点传师等职务,到1950年有道徒284人。②

江山市

1943年该县人毛春凤在上海入道,1948年,毛春凤陪同上海点传师刘玉兰来到该县设坛,先后在保安、凤林一带发展道徒86人。1949年6月,兰溪县点传师在该县城关发展道徒7人,一共有总坛1个,分坛3个,道徒93人,坛主4人。③

永康县

1949年1月,出嫁在上海的该县后宅朱村人朱宝五回娘家时,带道首张时宗、王生泉等八九人,来到该县发展道徒。共设坛14个,分坛118个,有道首49人,道徒650人。另外,在上海打铁的该县人吕林昌也于1949年6月在该县下溪池村发展道徒。设立玄光佛坛,自任点传师,直属上海博光组领导。有总坛主8人,点传师2人,分坛主31人,私坛主51人,道徒680余人。④

义乌县

1944年3月由杭州传入,称为“南京系杭州派”,由杭州女道徒金天禄传至该县稠城镇农协村。1946年杭州又一女道徒张小娣来该县柳青乡何麻车村传道,主要在农村地区活动。有前人1人,点传师3人,分坛主1人,办道人员3人。1947年5月,又有天津系兰溪道首胡炳荣(本地人)在该县佛堂镇联合村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3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5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6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8页。

传道,培训骨干并发展道徒。先后发展2428人入道。两派共有道徒3471人,其中道首67人。①

武义县

1949年由兰溪人赵云焜(点传师)传入该县。以城内杨义丰栈房为据点筹建组织。先后传朱樟火等4人入道,并将他们委任为点传师。大肆发展道徒,扩大组织。1950年1月,在壶山镇成立分坛,此后建立了67个坛点,发展道徒300余人,其中有点传师9人,引保师11人。②

临海县

1946年下半年传入,有坛堂400多个,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500多人,道徒6000多人。③

温岭市

1945年先后从上海等地传入。设有65个坛(内有10个总坛,18个分坛,37个家庭坛),分布在全市4个区,30个乡镇,有道首103名,道徒1726名。④

仙居县

1946年初开始,分别从宁波、临海、兰溪三地传入。在全县各地设有219个坛堂,有道首239人,其中点传师12人,总坛主2人,办道人员28人,一般坛主197人,道徒1596人。⑤

缙云县

1947年由义乌传入,有杭州系和陕西系两派。1952年取缔时有坛堂85处,道首97人,道徒608人。⑥

青田县

1948年1月,由林岩渔、陈觉民二人从兰州传入,在鹤城镇设总坛,下设14个分坛,有道徒1400人。⑦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9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61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62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62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65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70页。
⑦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71页。

福建省

福建省的一贯道是1945年以后才传入的，传布的中心是厦门市，初期道务是由上海基础组开创。1945年点传师唐绍继由石码进入厦门，开设“崇本坛”，并附设“熙光善书局”，作为发展道徒的基础。他曾把当地福建高等法院厦门分院院长夫妇拉入道内，之后，他又到漳州开设“崇德堂”，赴同安开设“崇仁堂”，到鼓浪屿开设“崇德堂”。1946年他又派解绍武等人前往台湾开荒布道。[1] 1946年上海基础组又派点传师张荣华来到厦门，协助唐绍继办道。1947年张荣华派人到泉州设立“崇德坛”，是年6月，解绍武从台湾返回福建，随即被任命为泉州地区的总负责人。1948年6月，上海基础总坛的前人李鸣岐与台湾基础组负责人张培成一同来到厦门，召集福建各地坛主以上道首开办“忏悔班”，借以巩固大家的“道心”。1946年4月，上海的宝光组道长潘华龄派福建莆田地区的宝光组负责人庄凤昌来到厦门主持道务。他先在厦门利用上海和宁波籍同乡关系拉同乡入道，1947年9月，他在厦门成立总坛“煜德坛”，然后以此为中心，向附近的漳州、龙岩、莆田等地发展。同年10月，又在泉州设立总坛“大乘坛”。[2]

此外，上海的金光组也在1946年12月派人来到厦门开荒办道，点传师刘正余分别在鼓浪屿和石码设立“宏德坛”和“悟一坛”。1947年又先后在厦门建立总坛“俊德坛”，在泉州建立“润德坛”，在漳州建立“浩一坛”、“浩然坛”。同年11月，点传师严学礼赴漳浦开设道坛，1949年初，在连城开设“明一坛”和“仙一坛”、“崇一坛”，在龙岩开设“伟一坛”。[3]

福州市

1941年由天津传入。张光璧先后派道首罗步瀛与点传师潘石昌到福州发展组织，在仓山区泛船浦泉祥行和城内八旗会馆设坛。1944年国民党政府取缔一贯道时，罗、潘两人被捕，关押8个月后被释放，罗返回天津。一贯道投靠国民党取得合法地位后，潘又于1947年初回到福州，与罗继续合作，在井大路设立总坛，改属上海金光组领导。1949年孙素贞命令罗步瀛统一领导闽东、闽北道务。福州解放初期，上海总坛派陈尉茹将各支派统一成立福州分枢组，由罗

---

① 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8页。
② 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9页。
③ 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9—450页。

步瀛任道长，郑信章、周志行为副道长，以“罗永和商号”为联络代号。福州共设总坛4个，分坛69个，家庭坛18个，正副道长3人，前人20人，点传师54人，坛主89人，道徒2340人。①

浦城县

1941年城关崔高大等3人在杭州加入一贯道，回到该县后，设立“醒悟坛”，发展道徒40多人，1946年该坛改为“济颠南屏大坛”，有道徒609人。②

清流县

1949年8月，闽西道首张鹏霄指派黄卓元等3人到该县灵地发展组织，全县设有3个总坛，19个分坛，道徒1000余人，坛主以上骨干130人。③

将乐县

该县有道坛17个，道首7人，道徒300余人。④

龙海县

1944年6月，基础派点传师唐绍继在该县石码设立宗诚坛。翌年，点传师王伯龙到澄海、罗坑等地设立宗祠坛，后由厦门、石码传入浮宫等地设坛。1948年4月，在龙溪天宝布坑村设立宗正坛，到1949年，一贯道在龙溪、海澄共有45个坛，有点传师6人，坛主75人，道徒3514人。⑤

南靖县

1948年6月传入，由厦门总坛在金山荆美开设宗廉坛，到1951年底，全县共有32个坛，有领导点传师2人，点传师11人，坛主32人，天才5人，办事员6人，道徒1650人。⑥

长汀县

1949年5月由厦门张鹏霄率连城、上杭等地道徒来该县传一贯道。在城关仓下巷设立总坛，任命总坛主、点传师等道职，并于新桥等地设有家庭坛14处，归闽西总坛管辖。⑦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58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65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69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70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75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77页。
⑦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78页。

永定县

1949年8月，点传师卢光华、卢光烈利用一贯道设坛、任命点传师，暗中串联连抚市、坎市、胡雷、凤城等地的地痞流氓，煽动暴乱。[①]

江西省

南昌市

1940年传入该市设坛于万寿宫。1947年，天津的道首胡桂金派人到南昌开荒布道，同年上海浦光组组长王永和点传师数人，亲自到南昌市设立佛堂。嗣后，上海的基础、金光、宝光各组都曾派点传师到江西布道。此外，山西一贯道的礼记柜和陕西的一贯道也先后派出90名点传师来到江西，在南昌设立"省柜"，并在25个县建立"县柜"，到1948年，一贯道不仅已经布满江西全省，而且向外省传布。[②] 到1952年，共有大小独立支派24个，总道坛13个，分坛24个，有坛主185人，点传师216人，道徒7650人。[③]

新建县

1940年9月，天津人于义贤来到南昌市建立佛堂，委任曹居中掌握。1943年2月，曹居中、郭文元二人来到该县生米镇，委任闵仁旭等14人为点传师，建立7个佛堂，共有道徒210人。1947年扩大到厚田、望城等65个地区，全县共有道首258人，道徒3841人。[④]

修水县

1949年2月，由武宁人张德荣传入该县，到1950年12月底，全县共有佛堂17个，道徒542人。[⑤]

都昌县

1943年由星子县传入，相继在县城镇及襟带乡等地设立坛堂5处，全县有道首11人，道徒127人。[⑥]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79页。

② 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8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91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92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93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94页。

崇仁县

1935 年由南昌传入崇仁县,有道徒 157 人。①

乐平县

该县一贯道是景德镇的詹振佑和江大义,引乐平县的瓷器店老板何爱莲入道后发展起来的。何爱莲入道后,于 1942 年与詹振佑和江大义在该县开展道务,在自己家里设立公共佛堂,三年之内发展出总坛、支坛和公共坛三个层次。第一总坛设在南外街种植巷,称为“崇礼总坛”,下设“慈安支坛”、“笃志支坛”和“慈光支坛”,共有大小坛堂 48 处。第二总坛设在东门家祠巷,称为“中传总坛”,下设“翦山笃诚支坛”和“坑口支坛”,共有大小坛堂 20 处,全县共有道徒 200 余人。②

萍乡市

1947 年传入该市后,陆续有 4 个支系前来传道。1948 年陕西西安的庞若霖等 6 人来传道。同年 6 月,又派高俊前来协助,在该市城内设立“启南坛”,作为全市的总坛。到 1950 年为止,先后在该市发展点传师 1 人,坛主 30 人,道徒 2137 人。另外,1948 年曹居中从南昌来该市传道,设立德兴坛,1950 年在芦溪设立明德坛,在该市共发展道徒 80 人。③

波阳县

1943 年由安庆点传师江大顺传入,但很少发展。1948 年高安点传师褚昌载前来重整道务,设立总坛(敦德坛)和三个分坛,提拔点传师 14 人,坛主 74 人,道徒 500 余人。④

万年县

从乐平、浮梁等地传来,全县设有总坛 6 个,分坛 13 个,分布在石镇、青云、陈营、苏桥等地。有道徒 659 人。⑤

奉新县

1949 年初由道首郭隆智传入,发展道徒 750 人,有点传师 4 人。⑥

---

① 《崇仁县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485 页。
② 《乐平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84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599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13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14 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19 页。

永丰县

1948年由宁都人张中和、曾冬生传入境内的中村、上溪、石马一带边缘地区,全县有道徒173人。①

七、一贯道在西南地区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乃是当时我国抗日的大后方,一贯道在跟随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在沦陷区大肆发展道务以后,仍不满足,又企图把魔掌伸向抗日的后方,以便为日本侵略者向西南地区进军准备条件。

四川省

一贯道最早在四川的传教活动是在1937年,当时,广安就曾有一贯道活动的记载。② 有关一贯道活动比较具体的记载,是1937年道首朱书成奉派来到乐至县开荒布道,他在该县东门外的明德茶社设立佛堂,作为最初的传道据点。此后他又向安岳、资阳、遂宁、简阳等县发展,共设立总坛11处,佛堂350处,发展点传师87人,坛主411人,一般道徒1万余人。③

1940年5月,北平道长张五福在所开"仙佛班"结束后,立即派线点传师张润田、坛主赵锡三赴重庆开荒办道,他们以"中庸道"的名义开展道务。④ 赵以前曾在湖北与国民党宪兵司令兼重庆防空司令贺国光,同在军阀王占元手下共过事,故张、赵二人一到重庆,便立即通过贺国光的关系,在重庆站稳了脚跟。赵锡三还在贺国光部混到了一个挂名的军官差使,使其开展道务得到贺的庇护。由于一贯道当时被国民党当局所禁止,因此,便将其改名为"中庸道",借以掩人耳目。

1940年何侗文与朱介民从北平先到河南安阳、开封、洛阳等地办道,1941年冬,何侗文派王俊升、朱星恒、何希孟三人,从河南前去成都活动。1941年,山东人顾钟林随东北大学来到四川三台县开荒,他利用在县女子中学教书的方便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23—624页。

② 《广安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0页。

③ 《乐至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6页。

④ 古肱:《重庆的一贯道》,载《重庆文史资料》,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3期。

条件,发展了40多人。同年,张永芳也来到四川温江开荒办道,设立佛堂50多处。[1] 1942年,从北平来的点传师周荫田和唐晓锋在该县玉皇乡设立佛堂四处,发展道徒四五千人。[2] 同年,北平线又派何僩文前往成都办道,他亲自带领朱介民来到成都。

何僩文又名何西山,河北省河间县人,有大学文化,曾在军阀部队当过营书记官,又在北平当过律师,1937年加入一贯道,成为职业办道人员,著有《道学新论》一书。他来到成都后,便与北平"顺一坛"原先已经派到成都的王辑五、吕贵云、王嘉辰等会合,在吕贵云之兄家中设坛,后来又在成都燕鲁公所设立"合中坛"。何僩文在成都站稳脚跟后,立即着手训练办道骨干,1942年在成都西城角街开办"仙佛班",参加受训的有20多人,后来皆成了办道骨干,他们分别到成都附近各县去开展道务。

一贯道大量向四川发展,是在1943年以后。这时,一般道首有:从北平来的徐汉,从河北定县来的胡润国,从西安来的张景怀,从山西来的张崇山,从山东来的许孝先等。一贯道的主要骨干则在成都和重庆等地发展,除何僩文外还有吕怀拯、邢杰三、潘华龄、汪有德、黄殿峰、甄中和等人。[3] 1943年何僩文再次来到重庆,通过道徒中的军统特务叶某的关系,请求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人接见了他,在得到戴笠的允许后,一贯道便得以在西南地区开展道务。1944年何僩文又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官僚政客中的关系,网罗了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入道。他通过国民党元老、立法委员王伊文和四川哥老会首领、国大代表贾文秦,将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国民党元老张继、前湖南省主席、内政部长何键,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孟广彭、空军少将甄中和、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四川省保安处长刘兆藜、军统特务马竹峰、国防部二厅特务专员郝继昆、委员长侍从室特务秋游等人拉入道内。何僩文还通过居正等人的关系,与国民党元老邹鲁及谷正伦、谷正纲、毛庆祥、刘文岛等国民党上层人物搭上关系。所以,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尽管三令五申地下令禁止一贯道,但是,由于受到国民党上层人物的保护,一贯道仍然得以在西南地区任意发展。

何僩文和张润田为了发展道务,又在重庆举办"仙佛班",共有50多人参

① 《温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45页。
② 《三台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12页。
③ 台湾一贯道总会编:《一贯道简介》,第52页。

加,这些人受训后,纷纷前往万县、乐山县、成都市、三台县及贵阳、昆明等地开荒办道,使道务逐渐向西南发展。[①] 1945年日本投降后,何僩文又回到成都,在黄瓦街开办“文教班”,训练骨干64人。1946和1947年,一贯道在四川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大肆发展。北平的张五福一次就派遣北平的“德一坛”、“诚一坛”、“鸿一坛”、“抱一坛”、“开一坛”、“专一坛”等9个支的点传师、坛主32人乘飞机来到重庆。天津的胡桂金也一次就派遣21名点传师到重庆办道。[②]

一贯道在四川除何僩文一支外,还有李启元一支。李启元属于天津道长胡桂金系统,是由绥远到甘肃、青海等地发展到四川的。1944年他派刘伸三、刘建五等人,来到四川开荒,1946年他又亲自来到四川成都。该支设有10个分支,其势力仅次于何僩文,有点传师1200多人,2300处坛,道徒6万余人,分布在川西、川东、川北的60多个县。总之,在抗战时期,一贯道在四川各地皆有很大发展,所以到抗战胜利后,成渝两地竟成了一贯道在全国的指挥中心,仅成都市就拥有46个支线,大小佛堂4800处,道徒46万人。重庆有57个支线,道徒30万人。广汉县因为直接由张光璧坐镇指挥,发展颇快,全县有佛堂230多处,前人34人,点传师310人,坛主762人,道徒约6万人。[③]

一贯道在四川的发展,与张光璧、孙素贞亲自坐镇成都不无关系。1946年,何僩文为了扩展道务,亲自把张光璧、孙素贞从北平接到四川成都。他们到成都后,一面整顿汇集到成都的各个支线,一面领导全国的道务。并且对何僩文、李启元放命的点传师,重新加以认可。为了向道首们敛取财物,张光璧还在成都福兴街的“池中坛”召见各地道首讲话,鼓励他们“苦修”,各地支线到成都“结缘”的道首们,趁机向张光璧交纳“献心费”和贵重物品。如川西道首王可中,向他献上一件猞猁皮的皮袄,西安点传师苏光池向他献上一辆小轿车。李启元除了把自己在成都王家塘的一院住宅作为“献心礼”外,还送给张光璧400万元现金。不过,当时一贯道内部师尊派与师母派的斗争已经十分激烈。成都乃是孙素贞的势力范围,能够接近张光璧、孙素贞的大道首,几乎都是孙素贞一派的人,张光璧实际上已经被包围。不久,张光璧便暴死成都。

① 古肱:《重庆的一贯道》,载《重庆文史资料》,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3期。
② 古肱:《重庆的一贯道》,载《重庆文史资料》,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3期。
③ 《广汉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4页。

成都市

1941年前后传入，以成都为中心向全省各地发展。其中以北平总支线的何倜文和天津总支线绥包支线的李启元两支发展最快。他们成立道务总坛，分管附近各县的发展工作。1946年冬，何倜文亲自到北平把总道首张光璧与孙素贞接到成都，指挥全国的道务。然后又以成都为中心，大肆向外扩展，如内江、泸县、宜宾、乐山、双流、中坝、简阳、中江、绵阳、灌县、广源、金堂、三台、新都、遂宁、梓潼、大竹以及西康的雅安、西昌等地，皆有一贯道的活动。截至1950年，何倜文一支共设坛2500处，有道徒40多万。如内江支区由点传师韩道林负责，下辖富顺、铜梁、资阳、大足、资中等县。① 1946年，成都点传师姚世禄到三台县开荒布道，先后设立26个佛堂，发展道徒三四千人。② 1947年，何倜文偕同程介夫、王可人等由成都来到双流办道，先后设立"诚中坛"、"礼中坛"、"宏德坛"、"焕德坛"、"志德坛"等，设立家庭坛486处，发展道徒近万人。③

灌县

1948年传入，更名为"圣贤道"，先后在蒲阳、金马等地发展道务，有道徒1000余人。④

双流县

1947年由成都师兄派道首何倜文、程介夫等人，在该县成立诚中坛、礼中坛、宏德坛、志德坛等共486处，有前人9人，点传师429人，坛主以上办道人员1468人，道徒约18000人。⑤

广元县

1948年传入该县，全县有21个分支，发展道徒10000余人。⑥

三台县

1941年道徒顾仲林(山东人)随东北大学来到该县，在县女中教音乐，发展道徒40余人。翌年，前人周荫民与唐晓峰在玉皇乡老君庵设坛传道，先后建坛4处，发展道徒四五千人。1946年，前人兼点传师姚世禄(河南人)从成都来到

---

① 《内江县志》，巴蜀书社，1994年，第745页。

② 《三台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12页。

③ 《双流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39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64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65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68页。

该县，发展支坛26处，道徒三四千人。同年，前人杜养元（西安人）来该县，以做棉花生意为掩护，在城关南街设立总坛，在乡镇设立分坛75处，发展道徒约万人。到1949年，全县共有11个派系，设坛636处，有前人37人，点传师208人，坛主459人，道徒28000人。①

盐亭县

1948年从不同渠道传入该县。从中江传来的，在城关地区活动；由西充传来的，在金孔地区活动；由成都高等法院军法官陶浦泉派来的，在柏梓、黑坪地区活动；由射洪传来的，在城关、两河、黄甸等地区活动；由三台传来的，在两河设坛活动等。全县共有道坛160余个，发展道徒3400人。②

安县

1947年传入。先后在秀水镇设立坛口2处，由曹忠萱任点传师。1950年点传师翟华弟去河清镇传道立堂，建立坛口23处，有坛主以上道首33人。③

德阳县

1942年有一贯道前人余治平、点传师刘星奎等，在该县德安乡金龙寺设立总堂，培养郑能芳为点传师，负责新盛、德安、慧觉等乡的道务。1945年又有前人刘聿三（河北省人）来德阳"开荒"，继有前人刘霭阳等前来办道。先后在全县设立佛堂174处，共有前人17人，点传师92人，坛主220人，道徒1096人。④

广汉县

1945年传入该县。由前人陈礼明等在城乡传道收徒，发展道徒6万余人，仅城关、高骈等11个乡，就设有181个坛，全县有佛堂230个，道首中有前人34人，点传师310人，坛主762人。职业办道人员1000人。⑤

中江县

1941年至1947年，先后从河南、山西、河北等省和成都等地传入该县，设坛832处，有11个支系，有道首252人，道徒1694人。⑥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74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74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75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78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81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82页。

南充市

1945年春传入该市。先后在环子河、五里店设有道坛。由于得到国民党军警的支持，发展很快，在城内购置街房，开设织绸机房和商号。到1949年道首尹纪舜等在附近11个县发展道徒，设有49个道坛，有坛主136人，道徒3000余人。[①]

蓬安县

1947年7月，北平老前人多某等与南充前人王某，到该县周口陈某家设坛布道，在周口、杨家等地设坛16处，发展道徒600余人，有前人1人，点传师14人，正副坛主38人。[②]

仪陇县

1946年，蓬安人胡显周（总坛主）以圣坛为基础，在该县二道、双河等乡发展道徒。[③]

西充县

1948年4月，南充前人张静清来该县设坛传道，相继在木角等乡设坛61个，立点传师、坛主60余人。翌年1月，前人齐镜波、点传师李宝善从剑阁来到该县中兴乡建立总坛，发展道徒，设坛31个，立坛主32人。同年7月，遂宁道首瞿裕坤等先后在木角等地设坛20个，立点传师8人，坛主10人。[④]

遂宁县

1941年传入，先后在城关油坊街等处设立佛堂。[⑤]

蓬溪县

1942年传入。是年有一贯道前人4人来到县内的城厢、任隆等乡镇发展道徒5000余人，有坛主50余人，分12个支系。[⑥]

射洪县

1946年开始，先后由重庆、成都等地的老前人在该县的太和镇、金华镇设立总坛，发展道徒。训练出点传师100余人，三才5人，发展道徒2万余人，设坛近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83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85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86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87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89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91页。

880 个。[①]

内江县

1946 年在成都设立总坛，派韩道林为内江支区负责人，管辖富顺等县的道务。内江县负责人是荣华长。[②]

资中县

1941 年李素臣妻子来到该县水南镇湾传道，翌年李本人来到县城西门外七贤街设坛，全县分为城区、东区、北区、西区进行发展，每区均由李素臣委任的点传师、前人传道。[③]

泸州市

1943 年一贯道由昆明传入叙永，设坛于郭某处，发展道徒 11 人。1946 年昆明总坛继派点传师赵恒洁、坛主袁思信，设总坛于东城张某家，收徒 40 多人。10 月，再派点传师孔非熙到叙永发展道务。逐渐从城区延伸到金林、三河等乡村，横向发展到古蔺、古宋、兴文等县。1948 年城内设福性总坛，有道徒 300 余人，下属 4 个分坛，25 个家庭坛。[④]

合江县

1947 年重庆派点传师吕德富来该县传道，先在白果乡成屋基吴家发展道徒，建立佛堂，指定万朱氏为坛主。万死后由其子万云峰继任，同年迁入城内中街开设云峰诊所，以行医为名，设佛堂于楼上。1948 年，另一点传师也来到合江，坛址先设在天台寺，后迁往中街徐家茶馆。同年，另一支系由北平何永良等传入合江，在城区玄天宫秘密设坛，发展道徒。后来又建立公共佛坛于静阳堂，道徒不断增加。[⑤]

叙永县

1943 年传入该县，发展道徒 11 人，1946 年昆明总坛派点传师来该县，在东城设坛传道，发展道徒 40 余人。以后相继在县内的金林等地发展道务，并蔓延到邻近的古蔺等县。[⑥]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93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95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97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04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06 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07 页。

筠连县

1947年由宜宾传入,到1949年在城关、莲花、腾达等地建有佛堂9个,有道徒700余人。[①]

巴中县

20世纪40年代传入该县。分为三个支派:一是汉中支派。1946年汉中天元佛堂的前人游国相等6人以经商为名来到该县,得到县政府社会科科长王远禄等人的支持,在县城设立佛坛一所,随后又向农村伸展。到1949年,境内有总坛8个,分坛64个,公共佛坛1个,家庭佛坛45个。二是阆中派。1947年阆中一贯道前人苟美如、点传师黎瑞连到鱼溪寺传道,设立总坛1个,分坛5个,家庭坛3个。三是广元支派。1948年广元一贯道前人董海云、点传师魏兴坤在城受乡清莲洞传道,设立分坛1个,家庭坛3个。三派共设佛坛9个,分坛70个,公共佛坛1个,家庭佛坛53个,发展道徒4300人。[②]

通江县

1949年7月,百货商邓海山去巴中购货时入道,遂邀请点传师王远禄来通江,结识该县商会会长司文斌等人,发展道务,活动于城关、涪阳等地。[③]

宣汉县

1947年点传师杨才清夫妇来到该县发展道务,在境内设立总坛2个,分坛19个,有道首71人,其中前人3人,点传师16人,坛主48人,乩手4人,道徒1500人。[④]

资阳县

1948年传入,分为五大支系:韩道林支系。由成都总坛传入,又分为两个细支,有点传师25人,坛主40人。施智明支系。由简阳总坛传入,下分三个细支,有点传师20人,坛主112人。朱道成支系。由乐至传入,有点传师2人,坛主23人。徐翠花支系。也由乐至传入,有点传师2人,坛主23人。崔俊峰支系。由资中传入,有点传师17人,坛主19人。[⑤]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0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2—1013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8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21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24—1025页。

简阳县

1946年萧福珍等人由成都来该县开荒办道，建立义中总坛，到1952年取缔时，境内共有6大支，31小支。①

乐至县

该县有一贯道多个支系传入。(1)王岐山支系。1947年道长张五福(四川人)派杨青和到重庆，派刘宝德到成都传道。杨到渝后，派张示笑到遂宁传道，1948年，在遂宁工作的杨全益加入一贯道，建立佛坛，杨任坛主。到1949年2月，已经发展道徒600余人，建立佛坛20余处。(2)朱书成支系。1947年2月，前人朱书成(河北献县人)从成都来到该县，在江德明家建立佛堂，进行传道。嗣后共建立总佛堂11座，佛堂352个，发展道徒11243人，其中前人1人，点传师87人，总坛主11人，坛主466人，道徒11243人。(3)赵文秀支系。1948年6月，该县徐承芳在简阳入道后，引前人赵文秀等到家设坛，发展道徒。嗣后在该县3个区14个乡设立总佛堂3座，佛堂82个，前人1人，点传师13人，总坛主2人，坛主98人，道徒1603人。(4)杨兴贤支系。1947年7月，杨兴贤加入一贯道，1949年被任命为点传师，1950年3月，又放命为督导(相当于前人)。杨在回澜等10多个乡建立佛堂30余座，发展道徒1000多人。(5)杨伯卿支系。1947年杨伯卿加入一贯道后，相继升为点传师和督导，在回澜等乡发展道徒4000余人。(6)江泽明支系。1947年，点传师江泽明到蓬溪县建立佛堂，辗转发展道徒100余人。(7)卓素清支系。1949年1月，卓素清入道后，于同年5月，成为办道人，建立了11座佛堂，发展道徒140余人。②

安岳县

1948—1949年，分别由内江的韩道林、乐至的朱书成、遂宁的吴明皋等人传入该县。共建立佛堂190个，任命道首265人，发展道徒2500人。③

重庆市

1940年5月，北平一贯道的崇华堂道长张范卿在北平开办仙佛班后，便把骨干纷纷派往各省市开荒布道。其中到重庆布道的是点传师张润田、坛主赵锡山。赵锡山在湖北时，曾与国民党宪兵司令兼重庆防空司令贺国光同属军阀王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25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27—1028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31页。

占元部下。他与张润田到重庆后，即通过贺国光的关系，在重庆市站住了脚。1943 年，张光璧派北平线点传师何侗文也到重庆活动，同军统特务机构建立起关系，从此一贯道得以在蒋管区活动。1948 年，一贯道分裂后，以孙素贞为首的金线派为了应变，在全国各地建立“公馆”，统一指挥各地道务。1948 年 2 月，首先在重庆市四德村设立“重庆公馆”，管辖重庆市及四川东部、南部和贵州的道务，由何锡山、邢杰三总负责。发展道徒数千人，设立佛堂几十个，任命道首近百人。1948 年到 1949 年年底，道首王可中按照孙素贞的旨意，大肆开办忏悔班、仙佛班，积极培养骨干，使一贯道的组织疯狂发展，道徒发展到数万人，设立佛堂上千个，道首多达千人。①

涪陵市

1946 年 8 月，由点传师蔡贤诗、胡体祜传入，属于重庆总坛仁字组的天真道。翌年 10 月，设修德善堂于城内的黄泥坡。1948 年 8 月，又发展出 3 个分坛，25 个佛堂，有点传师 20 人，发展道徒 800 余人。②

合川县

1946 年从重庆传入，在县城文明街设坛收徒，然后向农村发展。到 1949 年 12 月，全县道徒 2000 余人。③

綦江县

1946 年传入，先后设立总佛堂 11 个，分佛堂 58 个，有道徒 4600 人。④

潼南县

该县一贯道分 4 个线传入。(1)绥远线。由前人赵耀环、范高明等人，于 1949 年 2 月从包头经广元、成都、遂宁到该县。先在城关安庆街开设新民商店作为掩护，后在柏梓、塘坝、双江等地建立佛堂 10 多个，发展道徒 154043 人，有总坛主 8 人，点传师 24 人。(2)河北线。1949 年由一贯道前人王正军、张万源带乩手 3 人，点传师 5 人，来到该县观音乡栗家冲等地发展道务，设立佛堂 9 个，发展道徒 300 余人。(3)大足线。由大足北门外的一贯道前人龙如亮、点传师周伯翔在卧佛区发展道务，设立佛堂 5 个，发展道徒 80 余个。(4)重庆线。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28—929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36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37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42 页。

1949 年重庆一贯道前人萧治华来到该县发展道务。1950 年又有前人路宝祥、朱子修来到该县，在今双江区设立佛堂 9 个，有坛主 2 人，道徒 300 余人。到 1950 年一贯道徒已经遍及全县，共有大小支系 33 个，佛堂 151 个，道徒 3400 人。其中前人 28 人，点传师 64 人，坛主 266 人。①

铜梁县

1947 年由遂宁县总佛堂前人彭岳山、金殿荣带乩手来该县虎峰镇成立佛堂，在石鱼、大庙、西泉等地发展道徒。计有点传师 7 人，坛主 33 人，道徒 192 人。是为遂宁一线；1948 年 4 月，重庆前人由重庆曾家岩总佛堂来该县发展道务，是为重庆一线；同年 7 月，成都总佛堂派人到该县设立信中佛堂，是为成都一线；总计一贯道在该县共有道徒 1895 人。道首、办道人员 653 人。②

璧山县

1947 年由重庆传入，在县城设坛布道，后来发展到来凤、健龙等乡，共建立了 10 个支系，道徒遍及城乡，共有 2000 余人，其中骨干有 150 人。③

忠县

1946 年由冯启全、赵鸿儒等人从万县传入。最先在县城设立佛堂，后又在复兴乡等 8 个乡，建立佛堂 15 处。共举办仙佛训练班 3 期，仙佛研究班 6 期，培养了大量骨干。④

云南省

一贯道是 1941 年传入云南的。一支是山东济南道长徐衡甫派点传师赵作贤（赵俊生）到昆明办道，他在奸商杨其昌的协助下，在昆明市小绿水河街 12 号建立“道基坛”。另一支是由北平线张五福派吕怀拯、何侗文、王佑谷等传入，在昆明北门街设立“同德坛”。1942 年，北平线河北定县支线明真坛高志增等，在昆明威远街建立“纯一坛”，旋因高志增被国民党政府捕办，即由王振铎负责，后又由赵成章主持道务，所以，赵后来就成了云南一贯道的总前人。当时，仅昆明一地就有 24 个大坛。一贯道的其他头目也纷纷进入云南“开荒”，形成了一贯道在云南发展的高潮。1945 年前后，已经在昆明及滇南建立起总坛，负责云南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44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45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47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52 页。

道务的开展。昆明负责人是张锦昌，滇南总坛负责人是莫海秀。后来，孙素贞派石怀芝到云南主持道务。石怀芝与张锦昌、莫海秀等于1944年在石屏县开荒，建立“纯一总坛”、“同德坛”及“道济坛”，以此为核心，向全县各地发展。1947年以后，云南一贯道的发展达到高潮，仅其中的“纯一坛”就有道徒50多万，连同其他派系，全省约有道徒100万。

昆明市

1941年传入昆明。1942年在该市威远街、北门街设立“纯一坛”、“同德坛”，并且以昆明为中心，向全省发展。到1950年初，全市有道徒90965人，其中道首1063人，骨干分子2838人。①

嵩明县

1943年从昆明传入，点传师王彬等人在该县传道，1946年到1949年，一贯道的组织已经遍及全县80%的村庄，有点传师49人，智领129人，堂主244人，仁领219人，道徒14000人。②

路南县

1944年昆明的“纯一堂”派人经宜良传入该县的鹿阜镇，由李立平、杨士英为首，设堂于李立平家，1944年被国民党政府取缔，年底又被宣布合法。县长、镇长纷纷参加。昆明总堂先后派点传师8人，乩手2人，及外省来滇的道首10余人来该县扩大组织，共设坛27个。③

玉溪市

1938年，该市的邓文俊和康济唐二人到昆明一贯道总堂受训后回到该市，先后建立“纯一”、“道济”两个坛。到解放时，该县有点传师3人，坛主37人，勇领24人。④

保山市

保山市的一贯道是1945年传入的，一贯道徒周恒宝（河南人）在该县板桥东村建立“道基坛”，并在附近各县建立了“统一坛”、“阐德坛”、“同德坛”、“道基坛”等支系。到1950年，在保山市所属的施甸、腾冲、龙陵及昌宁等县，发展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86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88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89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95页。

道徒7万余人,其中坛主以上的道首1600人。[①]

江川县

江川县有前人2人,点传师8人,总坛主3人,一般坛主149人,道徒7667人。[②]

通海县

1944年传入,设有"纯一"、"道基"、"同德"等坛。"纯一坛"由在昆明入道的朱焕冰偕点传师刘秉清到该县城内设立佛堂。不久,澄江县前人张家英也来到该县传道,培养了6名点传师,1949年解放前夕,该县"纯一坛"共有点传师33人,坛主45人,道徒5400人。"道基坛"有点传师17人,道徒3000余人,建有佛堂25个。[③]

峨山县

1945年,玉溪人康济唐在昆明受训后,于1947年4月来到该县建立"纯仁堂",发展魏光贤等人入道。[④]

彝良县

1947年、1949年,先后有昭通点传师陆德秀等来到该县传道。发展道徒65人。1947年秋,贵州毕节总坛的朱永益派尹继和到该县开荒设坛,发展道徒。提拔点传师3人,总坛主1人,坛主12人,发展道徒80多人。[⑤]

镇康县

1949年初,由刘毅俊等4人从保山传入,在明朗等乡设坛,发展道徒300余人。[⑥]

潞西县

1948年,一贯道师兄派"道基坛"从龙陵进入芒市,发展道徒很少。后来师母派的"阐德坛"传入北练等汉族聚居区,发展了5人,充当点传师。[⑦]

① 《昌宁县志》,云南德宏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666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96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96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97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03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08页。

⑦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09页。

泸水县

1949年1月,一贯道从保山传入,保山师母派的"阐德坛"前人胡静帮、点传师汪文品等10余人先后在上江等地设立佛坛。上江的"长德坛"设有14个分坛,有前人2人,点传师3人,坛主1人,分坛主24人,道徒400余人。六库的"智华坛"下设7个分坛,有点传师1人,坛主1人,分坛主7人,道徒117人。①

永平县

1946年从保山传入,先在县城办道,随后发展到杉阳等地和邻近的昌宁等县。到1950年已经有前人12人,点传师31人,乩手7人,佛坛157个,坛主200人,道徒6000人。②

鹤清县

1948年传入境内,很快发展到7个区,37个乡,以城镇和城郊流传为广。有"阐德、纯一"两个派系,有点传师34人,前人2人,坛主208人,道徒53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9%。③

蒙化县(巍山县)

1943年一贯道前人马四杰等人到该县"开荒",最初在大仓街邹家设立佛堂,1944年设立"纯一、同德"两堂。1945年,前人段淑云到该县永建地区"开荒",在统寺盘杜后康家设立"阐德堂"。到1953年,全县有道徒11000人,点传师以上骨干86人,总堂主17人,一般堂主418人,大小佛堂253个。④

双柏县

1946年,道首郝明亮等人在该县开设守信总坛,到1950年初,在全县20个乡中设立总坛5个,分坛72个,家庭坛49个,有道徒2009人。⑤

蒙自县

1944年由陶正邦、张锦昌传入,在武庙街王萧氏家设"纯一坛",后来又分别建立"同德坛"与"道基坛"。到1949年境内共有36个纯一总坛,83个分坛;25个同德总坛,33个分坛;45个道基总坛,25个分坛。⑥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0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1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2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3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5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7页。

建水县

该县一贯道分为三股:一股称道基,1943 年在城区纸房巷设坛,点传师是张玉林,前人高清和、杨福元;第二股为"纯一坛",1945 年由昆明总坛传来,在鸡市街设坛。两年后在城内设总坛,称建德坛。点传师为张勇玉等;第三股为同德,1949 年 2 月由宜良传入,在西门外设坛。到 1950 年全县共有总坛 10 个,公共坛 122 个,家庭坛 210 个,大小道首 568 人,道徒约 1 万人。[①]

石屏县

1945 年初,一贯道师母派道长石怀芝、昆明总坛老前人张锦昌、乩手王淑慧等,在该县建立"纯一线",放命雷润生等为全县的领导总前人,孙汝静等 10 人为各号的领导前人。1947 年,师尊派的老前人马志远、前人刘群等人又在该县建立了"同德线"和"道济线"。到 1949 年底,先后在城关和 11 个区镇 119 个村寨,建立大小佛堂 160 个,有总坛主以上道首 98 人,坛主 253 人,道徒 5059 人。[②]

元阳县

1947 年纳更土司军需官王体康在昆明加入一贯道。同年 6 月,一贯道点传师到该县发展道徒 11 人,在王体康家设立道坛。1948 年王体康、张月仙等升为点传师,在纳更、稿吾、红土寨等地设立了 5 个道坛。到 1950 年共发展道徒 300 余人,坛主以上的 101 人。[③]

金平县

1947 年传入该县的第五区,到 1950 年在该区共发展道徒 363 人。与元阳县共有前人 22 人,点传师 39 人,坛主 40 人,领导坛主 15 人。[④]

砚山县

1947 年,文山县一贯道派遣刘庆儒到该县建立总坛 11 个,分坛 13 个,坛主 17 人,吸收道徒 1000 余人。[⑤]

马关县

1947 年 3 月传入境内,到 1950 年共有道徒 1077 人,遍布全县 20 多个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19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19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21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221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22 页。

村寨。[1]

贵州省

1941年1月，张光璧派大名总坛赵作贤到贵州传道。翌年，又派济南线点传师高志杰等人到贵阳等地设坛办道。不久，北平崇华堂道长张范卿派张润田到重庆，后转往贵阳。此后，一贯道支派也纷纷派人前往遵义、安顺、毕节等地开展道务。1944年6月，河北枣强县人郑兢泽在云南平彝加入一贯道，不久被提拔为点传师，后又升为前人，1947年被派到贵州传道，1948年6月到遵义传道，8月到安顺设立佛坛，发展道徒800余人。设立佛坛30余个。1946年，河北定县总坛派廉俊杰来到贵阳市开荒办道。次年，定县总坛又派魏清波来贵阳协助廉俊杰办道，在贵阳正式成立"纯阳坛"，作为发展道务的中心。从1946到1950年期间，共建立了35个分坛，分布在贵阳、都匀、贵定、马场坪、龙里、惠水、花溪、青岩、安顺、镇宁、遵义、仁怀等地。[2] 1947年以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北方的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和南方的南京、上海、宁波，以及安徽、广西等地的一贯道组织也相继派人到贵州建立据点。1947年，孙素贞任命甘荣卿为贵阳24个分总坛的总负责人。次年，孙素贞亲自到贵阳总坛，召集各地的坛主，开办坛主研究班，然后派一些坛主到惠水、猫洞及湖南的祁阳开荒。[3]

贵阳市

1946年河北定县总坛派人到贵州传道。定县总坛派廉俊杰到贵阳开荒设坛，翌年11月，定县总坛派魏清波到贵阳协助连清波办道。二人商议重新建立分总坛——"纯阳坛"。1946年到1950年"纯阳坛"共建立分坛或支坛45个，分布在贵阳、都匀等地。提拔点传师139人，吸收道徒12000人。1947年9月，孙素贞指派甘荣卿为师母派在贵阳24个分总坛的总负责人。1948年8月，师母派纯阳坛开办坛主研究班，筹集办道经费，并派人到惠水、猫洞开荒。1949年7月，重庆总坛派前人郝仲连、张润田到贵阳，召集24个分总坛负责人77人开会，传达一贯道应变计划，决定在贵阳成立贵州总坛，统一指挥，确定甘荣卿、勾振山、安树凯3人为贵阳总负责人。[4]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22页。
② 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4—445页。
③ 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5页。
④ 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5页。

修文县

1948 年春，一贯道“长江派”的朱增森由四川带着道徒 22 人来到贵州，在各地发展道徒。道首王天南在该县扎左发展道徒 7 人，同年 11 月在杨守中家设立总佛堂，一年之间，设立佛堂 9 个，有点传师 17 人，道徒 500 多人。①

桐梓县

1948 年底传入该县，分为北方派和上海派。北方派点传师姓施，北方人；上海派点传师叫赵世杰。二人均于解放前离开，共发展道徒数百人。②

湄潭县

该县共有道首、道徒 137 人，其中恩职以上 48 人，主要分布在义泉、永兴、茅平等地。分为贵阳支系、保定支系和武汉支系。贵阳支系。1949 年 6 月由遵义的朱淑兰派点传师文汉清到永兴，崔宝林（点传师）、坛主李文章到该县开荒办道。崔在义泉镇设立佛堂，发展道徒，同年返回遵义，李文章被提拔为点传师。到 1950 年，在该县设立佛堂 6 个，发展道徒 100 余人，有坛主 9 人。保定支系。1949 年 6 月由遵义前人纪桂芬、张鸿吉派罗四维等点传师来该县义泉、永兴办道，设总坛于义泉的永和烟厂，下设 3 个分坛，发展道徒 40 余人。有总坛主 2 人，分坛主 4 人。武汉支系。1949 年 5 月，由遵义前人刘燮成（改名付炎山）来该县开荒办道。设总坛于曾寿山家。同年回遵义，1950 年由付炎山派沈筱齐（点传师）接管道务，发展道徒 38 人，设分坛 5 个，有坛主 8 人。③

安顺市

1949 年一贯道的师兄派派人来到该市，先在城区图书路设立佛堂，数月内发展道徒 400 多人。接着又在县府路、西街、龙井山等地设立佛堂 3 个。到 1950 年被取缔时，共有总佛堂 9 处，分佛堂 100 余个，坛主以上道首 216 人，道徒近万人。④

毕节市

1940 年传入该市，共分为两个支系：受昆明“纯一坛”控制的师母派和受贵阳和昆明“道基坛”控制的师兄派。1943 年总坛派人前来“开荒”，1946 年，昆明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48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52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56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59 页。

"纯一坛"也派人前来，在双井设立圣化总坛，管辖大方、黔今、织金、赫章等县的佛坛，与师兄派设在百花山的"道基坛"竞相发展道徒，各自扩展势力。两派共设坛362个，有道首772人，其中点传师以上道首46人，分坛主以上道首726人。道徒有8020人。[①]

大方县

1947年由毕节传入，师尊派掌握"道基坛"，有贵阳总柜派前人邵成芝坐镇，设"节义坛"，下设5个分坛；师母派掌握"纯一坛"，设"圣臻坛"，下设4个支坛、10个分坛。还在鸡场、六龙发展道徒千余人。[②]

赫章县

1944年传入，到1951年共有总坛2个，支坛8个，分坛29个，道徒800人，坛主以上道首60多人。[③]

黔东南地区

1946年从贵阳传入，从贵定总分坛和贵阳总坛传入镇远县，称"圣贤道"，属于师兄派；1949年贵定总分坛和贵阳总坛复派道首吴隆均、桂隆兴分别在麻江县和丹寨县设坛，属师母派。到1952年，全地区共建坛31个，有道首28人，一般办道人员24人，道徒1053人。[④]

黄平县

1946年由张致和等人从贵阳传入，该县有点传师以上道首8人，坛主4人，发展道徒291人。[⑤]

镇远县

1945年，东北一贯道点传师齐殿顺到该县传道，设道长、道师和道师组，道下设13个分支，支设前人、后人、省前人、县前人(即坛主或点传师)。全县有坛主4人，道徒32人。[⑥]

麻江县

1949年4月，一贯道前人吴凤林和点传师吴隆均由贵定转移到该县，相继建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60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62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64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69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71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72页。

立道坛17个，有前人1人，点传师4人，坛主11人，办事员11人，道徒430人。[1]

都匀市

1949年前，相继由一贯道不同的支系到该市传道，有道徒1000多人，连同都匀道首控制的独山、贵定、麻江、福泉等县，共有道徒3000人，有前人15人，点传师85人，城区设主坛11个，分坛69个，农村设32个。[2]

福泉县

1949年由坛主周明连、点传师詹志辉由贵定传入，发展道徒10余人。[3]

瓮安县

1949年传入该县时，由贵定县点传师张友文、梁伦森等人，在该县设坛，全县共有支坛6个，家庭坛9个，道首30人，道徒314人。[4]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75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76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77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78页。

第六章　一贯道的分裂与地下神秘王国的覆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贯道便因日寇的投降而逐渐衰落，随着人民革命的逐步取得胜利，一贯道这个地下神秘王国也开始走上了覆亡的道路。

一、"中华道德慈善会"的出笼

1945 年夏，张光璧在北戴河海滨别墅，召集北平、天津、济南、秦皇岛、沈阳、长春等地的道首开会，商讨如何应对日本侵略军逐步败退的局面。同年 8 月 15 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向日本侵略者卖身投靠的一贯道道首张光璧等人，极为恐慌。张光璧与道首王仲田、王佩玺、张思邈等人，经天津塘沽秘密潜回北平。回到北平后，他们虽然未敢公开露面，但是，南京"中华理教总会"理事长王有才，已经向国民政府社会部检举了一贯道在抗战时期有通敌行为。呈文中称："查一贯道组织，业经钧部明令解散，殊该道在敌伪势力卵翼下，根植颇深，不知觉悟，仍妄图抗拒政令，百般活动。有该道叶文藻、叶绍庭……等，竟敢以'崇德慈善会'名义，朦呈南京市社会局核准备案，纠集该道徒众 2000 余人，订于本月 12 日举行成立大会。若不明令禁止，彼狡计得售，影响世道人心，何堪着想，谨将该道活动情形，呈报监核示尊。"国民政府社会部接到呈文，便指令南京市社会局，称一贯道"业经本部明令解散，并予取缔在案。如有改换名义从事活动等情形，自应严加取缔"，"切实查明办理"。[①] 南京市社会局接到社会部训令后，立即着手进行调查，同年 3 月 1 日，以局长陈铁如的名义，向社会部呈递呈文称："经派员查报该会会员及筹备员中，内有叶绍庭、韩顺祥、左宗元、袁魁、李瑞峰等，均系奉令查禁之一贯道代表分子参加，难保其无利用该会宣传邪教之嫌。究应如何办理之处，未敢擅专。除令该会停止筹备，俟

① 《社会部训令》，发文京组四字 0084 号，民国三十五年(1946)二月十一日。藏南京市档案馆。

令饬尊处。"[①]同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社会部以汉奸罪将南京建邺路一贯道总坛查封，使一贯道受到严重打击，被迫宣布暂停活动。张光璧闻讯后立即令何倜文前往南京，一方面通过道首王伊文（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关系，向司法院院长居正、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等进行疏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部有关官员行贿。当时，正值国民政府各院、部从重庆迁回南京，一时间南京住房骤然紧张。社会部主管查封一贯道总部案件的科长畲蒸云恰好正在为没有住房而发愁。南京的一贯道道首们得知此事后，便由南京领导点传师叶绍庭出面，转托点传师、一贯道"松华斋书局"经理王闻中，代畲蒸云租赁住房一套。畲蒸云感激之余，便对解除对一贯道总部查封一事大为卖力。他为叶绍庭出谋划策，暗中指使一贯道改用南京"中华道德慈善会"名义，呈请社会部批准备案。经过对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和具体主管此事的官员上下疏通，终于获准以"中华道德慈善会"名义在社会部备案。1937年1月6日，社会部发出批文，准许一贯道以"中华道德慈善会"的名义在社会部正式注册，批文称："准予组织中华道德慈善会，并派本部科长畲蒸云为该会组织指导员。"[②]社会部随即将一贯道被查封的总佛堂房产发还，一贯道遂于1947年8月1日在南京安徽公学大礼堂召开第一届会员大会，并举行成立典礼。该会由天津点传师霍永馨充任理事长，齐铭周、杜钟楔、孙锡坤、冯兆异、王伊文、翟宗华等31人为理事，叶孝天等15人为候补理事，张孝如等九人为当选监事。[③] 一贯道由于有了"中华道德慈善会"这个合法招牌，便又重新启动，大肆发展组织，不久便网罗到5000多新道徒，骗得价值35两黄金的功德费，并且与国民政府的高级军政官员，如孙科、白崇禧、何键等人拉上关系，从而得到他们的庇护。

二、所谓"道运西转"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了全面内战，对解放区大举进攻。全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亟待休养生息，恢复被日寇破坏的国民经济，因此，国民党挑起的内战是极不得人心的，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各地

① 《南京市社会局呈文》，民国三十五年(1946)三月一日。藏南京市档案馆。

② 《社会部批文》，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初六日发出。藏南京市档案馆。

③ 《中华道德慈善会理事、监事姓名简历名册》，藏南京市档案馆。

反人民的军事行动，节节败退，加上这时国民党当局又一度取缔一贯道，在此情况下，一贯道的活动，日益困难。张光璧便在北平召集张五福等骨干开会，讨论如何面对不利的形势，继续开展道务。他们认为国民党政府的活动中心已经从西南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对西南的控制减弱。东北、华北已经逐渐被共产党所控制，而共产党对一贯道则更加严厉，只有四川和整个西南地区比较安全，于是提出“道运西转”的方针。面对日益艰难的局面，张光璧与孙素贞之间的矛盾在表面上也暂时得到缓和，张光璧解除了对孙素贞的软禁。同年 10 月，成都道首吕怀拯、何倜文来到北平，邀请张光璧去成都“结缘”。同年 12 月，张光璧与孙素贞、医师王佩玺、“天才”张思邈与何倜文等人飞抵成都，住在成都市小南街 105 号吕怀拯家中。由何倜文出面拉拢四川军政要员邓锡侯、贺国光等，并诱使甄中和等一批国民党空军军官加入一贯道。1947 年，张光璧、孙素贞等人先后在成都放命了数百名点传师，准备在四川和西南地区大肆发展，并以“度大仙”的手法，骗得大量金钱。

三、张光璧被孤立与暴毙

一贯道在四川形势好转和道务的发展，并未给张光璧带来多少好处，反而使孙素贞的势力日益膨胀。特别是在成都，一贯道的骨干基本上都是孙素贞培养起来的心腹干将，于是造成孙素贞夺权野心的再次萌动。这时，张光璧在孙素贞、李启元、何倜文、吕怀拯以及王佩玺等人包围下，已经很难与外界接触。凡是想要面见张光璧者，不经他们许可，便不能见面。在张光璧左右的亲信仅有张思邈和任喜顺两人，这一形势乃是张光璧所始料不及的，可是，已经为时晚矣！

1947 年农历八月初七，张光璧、孙素贞移居到王家塘李启元的家中。中秋节前两天，孙素贞突然将张思邈、任喜顺二人调开，结果，张光璧在中秋之夜便暴毙于李启元家中。据张英誉称：“旧历八月十四日，曾接家父来信，又接一电报(即复电询问病况并云不日到川)，问家眷何日南下。十五日早接成都来电，云‘父亲有病，兄速来川’。吾颇怀疑，先父来信甚多，未提有病，即如身体欠佳，为何来电者不是家母(孙)，而是任喜顺呢？中午又接一电(与前电文一样)。到此吾深为疑惧不安，又复电问病况(此电系与医生王佩玺者)。及晚，又得一

电，'父亲病重，兄速来川'。至此，心慌意乱。""十九日到重庆，二十一日到成都，同行者有天津胡桂金、张文远、孙克枕，北京张范卿、杨灌楚等。来机场接吾们的何倜文、吕怀拯二位见面即问家父病况，而答言含糊其词，即乘车进城。及到门口，方见白纸门封，素幡飘扬，魂警神散，方知家父已逝。""吾母（刘）要求看看老人家遗容（全家均此要求）。只见他们预先在棺的天花板上做一方洞，上有玻璃，可以看见内容。但见先父面色青灰而肿，全家大哭死的不明。""询及家母（孙）在何处，为何不在此守灵？众答因身体不好，现在别处休养。询及家父不在的前后情形，答云：旧历八月初一，身体即受感冒，时好时歹。到了初十日身体稍好，即来王家塘洗澡，后即住下。以后病体渐重，大夫系王佩玺，病重时换战锦涛（何倜文后学）。十五这一天，老人家还叫亲友来此过节（中秋节），饭后各自回家，老人家还问菜好不好。是日下午家母（孙）请示坛训，此时家父尚欲起床行礼，被人拒揽［拦］，未能起床（闻听这篇坛训就是大起作用的天命训）。当晚六点就逝世了，在场者仅有张思邈和常金亲两个小孩。"

张光璧死后，孙素贞夺取教权的主要障碍已经不复存在，而且在成都的道首们大多是她的心腹，形势对她十分有利。但是，张英誉也并不甘心把教权拱手相让，因为他毕竟是张光璧的嫡子，子承父业，天经地义。而且，张光璧生前已经有过让张英誉接任己位和"一切事情不许孙素贞过问"的话，张英誉心里有数。但是，他此时势单力薄，很难顺利接班。于是施行了一套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策略。他以张光璧嫡子的身份，召集在成都的道首们开会，出席者有胡桂金、张五福、齐铭周、何倜文、吕怀拯等20余人。张英誉跪于灵旁，刘率贞坐于对面。大家依次坐好后，张英誉便发表了一通演说。他宣称："先父已故，吾人毫无办法能使老人转来。然而，大家修道到中途，无人领导，何所适从呢？家母（刘）平素不过问道务，吾志在守孝，而且年幼无识，家姐乃一女孩子，一切不懂。家母（孙）才德俱备，又领导大家多年，万分完善，望大家协助前修，吾全家毫不过问，均出本意。"①张英誉的本意，是希望通过他的演讲，博得大家的同情，并能趁势"劝进"，他便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乃父的职位了。可是，参加者大多为孙素贞的心腹，他们对于张英誉的表白，当然不会有所表示，"众人随即散去"，使张英誉大失所望。张英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企图把孙素贞带到上海，那里

① 《张英誉笔供》（一），载《一贯道的兴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5—166页。

张英誉的势力比较雄厚,容易迫使孙素贞就范。可是,孙素贞亦非等闲之辈,且手下还有一班谋士,为她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上他的当。她一直不肯露面,张英誉打听孙素贞的下落,但是"问谁谁说不知,如此两三天的工夫,可见串通一气,黑暗可知矣"。张英誉无奈,便对大家说:"吾想大家决不忍于拆散吾们的家庭,后来吾姐为此事大哭。"次日才有人告诉他孙素贞在医院养病。张英誉遂前往孙素贞处,告以"办好飞机,请老人家同返上海,以免一人留川无人照料。并把全家均乐意不问道事,向众发表的情形一一禀明"。孙素贞当然明白他的用心,便对他说:"吾知道你得来这一场,你们走你们的吧,别管我。再者道务吾亦不管,你们何必如此呢?"张英誉见孙素贞识破了他的计谋,连忙解释说:"请老人家不要误会",孙素贞即答以:"吾不误会你!"[①]孙素贞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向张英誉发出一个示威的信号,还演出了一场大闹灵堂的丑剧。一天,张英誉正与刘率贞谈话之际,突然听到灵堂里哭声甚大,张英誉原以为又来了吊丧者,急忙出来陪同举哀。"谁知满屋皆人,吾请大家让吾过来,到了棺的左面跪下,方才看出是家母(孙)来,也举起哀来。这时吾姐姐亦出来,意欲陪老人家。哪知大家皆拒不让路,互相拥挤。此时吾喊他们让姐姐过来的时候,家母(孙)突然站起来,往后一转,大家一拥,呼号而出。"[②]孙素贞的行动,无非向张英誉传递一个信号:道内全是我的势力,你休想继承教权!接着,孙素贞又唆使何侗文,勾结国民党特务,扬言要追究张英誉的汉奸罪,并且派人监视张英誉、刘率贞母子的行踪,迫使张英誉早日离开成都。张英誉、刘率贞见情况不妙,遂匆忙将张光璧的尸体空运到上海,又转运到杭州,埋葬在杭州长桥25号大院。

四、张光璧死后一贯道的公开分裂

孙素贞夺取道权的图谋由来已久,但是,张光璧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1943年南京有人向张光璧报告孙素贞等人的活动,张光璧"方知底蕴"。这时,张光璧为了试探孙素贞,曾经多次向她表示自己"决然退身"。孙素贞当然明知这是张光璧对她的试探,所以"表面上无任何表示,实际上家母暗地指导他们,如宫彭龄、李鹤亭、王庭贵、薛洪、孙志贵等,实行与道脱离,背师而行(此为老金线),

---

① 《张英誉笔供》(一),载《一贯道的兴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5—166页。

② 《张英誉笔供》(一),载《一贯道的兴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5—166页。

尚有一般表面敷衍者(即今日之新金线)。"[①]

关于"老金线"与"新金线"的情况,据张英誉称:在张光璧死后,"道的演变自然的分裂,形成数派"。"所谓西方的一派,其种因甚早,在多年以前,直到1943年,先父方才明了。后来虽表面上安静下来,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今日的局面。当时受家母(孙)暗中策动的宫、李等人,公然背师,声称太阳将落,当令日月(日,暗示是师尊,月是师母孙)赶快接线云云,此之谓老金线。既然先父已殁,于是旧说复兴,均跟家母(孙)再接金线(此为新金线)。

张英誉上述说法当然是为自己辩解,实际上他本人也在搜罗党羽,扩展势力,所以在张光璧死后不久,便又形成了所谓"师兄派"。据他本人解释说:"吾在杭州两年之久,从未写信或派人邀请过道中的哪一个人来上坟扫墓者,茶饭招待而已,无一人立愿或教他跟吾修道,纯系以人情招待的方式,来之不拒,去之不留。后闻西方称吾为'正义派'名义,此乃笑话。"但是,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他拉帮结伙的事实。他说:"后来有南京的孙锡坤、青岛的董玉泉、王子欣等二十余人,大家一再讨论,孙师母既然如此不顾先师遗德,一意而为,把先师济世救人的大道,闹成邪说白莲,如此下去,何堪设想。""于是大家议论请家母(刘)出来主持。"张英誉对此心中自然高兴,但表面上却表示:"让老人家休息吧,况且老人家无此经验,怎能办理此事?"后来,又利用"开坛求训"来制造口实:"后来家母开坛求训,哪知坛训一如大家所说,并责备家母早应该如此,以挽正气,不必瞻顾徘徊。家母是个最笃信鸾坛的老太太,到此还有什么话说呢?"刘率贞表示同意后,张英誉正求之不得,表示"西方肆意的攻击,如若一躲反而更增彼等的口实",于是半推半就地说:"吾亦无反对理由。"[②]为了避免道内人议论,张英誉还以刘率贞的名义写信给孙素贞,请她来杭州商讨,以避免道内分裂。孙素贞当然明白张英誉的伎俩,遂不予理睬。一个月后,张英誉便来到上海,"开始办道"。[③] 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以刘率贞、张英誉为首的"师兄派",又称"正义派",以杭州为活动基地。而以孙素贞为首的一派,则称"师母派",或"金线派",以成都为活动基地。

① 《张英誉笔供》(一),载《一贯道的兴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5—166页。
② 《张英誉笔供》(一),载《一贯道的兴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5—166页。
③ 《张英誉笔供》(二),载《一贯道的兴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5—166页。

五、“金线派”(师母派)与“正义派”(师兄派)

金线派(师母派)

以孙素贞为首的“师母派”实力雄厚,控制着大部分道首与道徒。孙素贞为了执掌一贯道的道统,集中领导,对整个道务做了许多变革,以示与张光璧时期的区别。

第一,为了树立自己在道内的权威,把“师母”这个称谓改成“母亲”。道理很简单,“师母”是与“师尊”相对而言,有“师尊”才会有“师母”,况且“师母”职位是张光璧所设立。现在由孙素贞掌道权,当然不能再称“师母”,于是令道内人尊她为“母亲”。在包括一贯道在内的秘密教门和会道门,皆把“无生老母”尊为人类的始祖,共同的母亲,孙素贞让道徒们称她为“母亲”,显然有着更大的含义,是企图以“无生老母”自况。所以她把道徒的称谓也加以改变。过去男女道徒称为乾坤弟子,而现在则改成“子女”,也是为了把自己比作“无生老母”。

第二,废除“道长”,采取纵的直接领导,原有的各支线及重要地区的支线,一律改成“直属线”,对外称“道”。

第三,加强对各地坛堂的控制。指派专门的负责人,将各地分支混合编组,统一指挥。

把各管辖区所有单位,统一编组,负责指挥道务,经管道款,传达使命。并把太原、顺德二线,直接划归孙素贞领导。

第四,开办“忏悔班”以训练骨干。命令参加训练的道首们,忏悔自己对“母亲”是否忠心,并且忏悔自己的罪恶,检查思想,进行洗脑,藉以控制各线与支线的道首。1948 年 5 月,孙素贞从武汉来到北平,命令张五福(范卿)发出通知,召集北平、天津、东北、山东、绥远等地的道首,前来北平参加忏悔班。在北平的“铎一坛”先后开办了四期“忏悔班”,每一班训练点传师以上道首约 100 人,由孙素贞指派的亲信薛文仲、郭昆兰主持,每班 5 天。薛文仲在“忏悔班”上对“道长”、“老前人”等称呼,大加抨击,并提出“道长、老前人要放下架子,不得欺上压下,要以身作则,真心办道。”又要求参加者每人写一份忏悔书,表示对“母亲忠心”。强调树立母亲的威信,道权归“母亲”孙素贞掌管。从此以后孙素贞便以“真天命”自居。

设立“公馆”。从1948年到1950年，共在全国设立了10个“公馆”，作为一贯道在各地的基地和领导机构。各地负责人是：

北平公馆：负责人是张五福、王勋臣，1948年农历五月设立于东四四条12号，1949年迁移到北新桥估衣市胡同中段的汪宅，管辖地区包括北平、河北北部与中部、张家口和热河省等地的道务。

天津公馆：负责人是王镒、何玉琳，1948年农历六月设立于天津，管辖天津、河北南部与东部、津浦铁路至山东境内的道务。

开封公馆：负责人是吕怀拯、郭树荣，1948年下半年设立于开封市内，管辖河南全省的道务。

武汉公馆：负责人是郭昆兰、张德贵，1949年农历一月设在汉口武圣官街33号，管辖武汉市、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及安徽等地区的道务。

成都公馆：负责人是郭根峰，1948年春设立于成都市玉龙街，管辖成都市、四川北部、中部、西康、陕西南部、昆明市、云南，初期还兼管缅甸的道务。

重庆公馆：负责人是何锡山、邢杰三，1948年2月设立在重庆市四德村，后移至重庆忠烈祠巴蜀中学隔壁，管辖重庆市、四川东部和南部、贵州的道务。

西安公馆：负责人是薛文仲、李智、尹志恒，1948年农历9月设立于西安市东大街建设巷6号，管辖西安市及陕西、甘肃东部的道务。

兰州公馆：负责人是李金凯、孙明煜，1948年秋设立于兰州小西湖，管辖甘肃西部及宁夏、青海的道务。

上海公馆：负责人是李廷冈、潘华龄，1950年设立于上海富民路的富民里25号，管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道务。

香港公馆：负责人是徐书印，1949年农历五月设立于香港皇后大街，管辖香港、九龙、澳门、台湾地区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朝鲜、日本的道务。

直属线：太原线，负责人薛洪，设在太原市天平街和西安崇义路元兴面粉厂内。顺德线，负责人孙贵芝，设在顺德和西安崇义路。

“正义派”（师兄派）

以刘率贞与张英誉为首的“正义派”，势力较小，以杭州为基地，依靠青岛的董玉泉、济宁的张毅、南京的孙锡坤以及华东地区的一贯道原有组织，仍然以“崇华堂”的名义开展道务活动。先后在杭州设坛1454处，发展道徒114990

人。在浙江其他城市和农村,设坛1409处,道徒约10万人。

为了与“金线派”争夺道权,他们还散发“快邮代邮”等,警告“金线派”各线的道首,甚至一度组织“锄奸队”,对“金线派”进行威胁,企图迫使其停止活动。但是,“正义派”的势力毕竟很弱,所控制的坛堂和道首,仅及“金线派”五分之一,所以也难以同金线派相抗衡。

1949年春,以刘率贞、张英誉为首的正义派,面临杭州即将解放的局势,也暂时放下同“金线派”的争斗,考虑自己未来的命运。刘率贞、张英誉急忙召集道首孙锡坤、孙子俊、韩金城、詹天保、赵殿英、贾庆仁、李秀恩等人讨论局势。当时台湾的领导点传师吴信学主张逃往台湾。上海的道首文彬如等人,则认为青岛有美国军队,一时不会解放,主张逃往青岛,以便在美国人的卵翼下继续活动。最后,大家决定前往青岛。

第七章　一贯道在大陆的覆亡

一、末日的余晖

1948年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这时，一贯道也预感到自己末日将临，于是采取一系列的应变措施，企图挽救其覆亡的命运。

1. 师母派的活动

以孙素贞为首的“师母派”，为了加强对各级道首和道徒的控制，在何倜文、李文斯等人的策划下，举办各种训练班，向受训者灌输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反动思想，让受训者分别立下“顶劫救世”、“卫道护法”、“同心同德”等誓愿。并借所谓“度仙”、“度灵”的名义，大肆搜刮金钱，作为活动经费。另外，还按照孙素贞的指示，采取了许多进行隐蔽活动的措施，具体办法是：改变活动方式。将各支线改编为小组，垂直领导，各小组间不得发生横的联系，减少接触面。由孙素贞指定专人接线，统一领导。如将成都地区的一贯道支线，改编为12个小组，指定道首赵子厚、任弘毅等人负责接线。各地佛堂一律迁移地点，改用商号的名称，以做生意或其他办法进行掩护。道亲一律在自己家中修道，不上佛堂，点传师须寻觅职业。孙素贞还亲自指示成都地区的道首何倜文、李文斯、王中可等人，将成都、重庆、西安、广汉、汉口等地的坛堂，改成商号、店铺、诊所或一般住家。王可中遂将设在成都福兴街的慈忠坛改为“锦城诊所”，调重庆的点传师战锦韬为诊所医生。何倜文调河南前人孙复智到西安北大街开设“大通商号”，并派点传师甄仲和去香港，在九龙太子道设立秘密据点。可以继续点道传徒，唯须慎重，严防泄露机密，所收功德费、度仙各费，须买成土产品运往成都，不能办道的地方暂停活动。为适应形势，由各坛代放点传师，报孙素贞备案。1947年孙素贞离开四川时，给四川道首郭根峰3000名点传师的

名额。郭分给各支线2960个，自己留下40个。道首王中可按照孙素贞的旨意，继续开办仙佛班、忏悔班，训练骨干千人以上，然后派往各地进行活动。

利用工厂或商店掩护外地潜逃来的道徒。各分坛名册用白绸书写两份，一份自己保存，一份交总坛埋藏。

为了便于秘密活动，还为孙素贞指定了“交通”，专门替孙素贞往来各地传递消息。规定通信一律使用暗语，如点传师为“经理”，吸收道徒为“收货”，度大仙为“鲜货”，放点传师为“吃股份”，有道徒被捕称“因病住院”，释放为“病愈出院”，被取缔为“生意不好做”，如在夏天又可说“时疫流行”，冬天称“天气寒冷，多加珍重”。书信由交通员缝于衣内。

疏散道产。为了减少目标，易于潜伏，孙素贞于临行前对她住过的地方，一律加以清理，以毁灭证据。并将道产完全疏散，进行伪装。如张光璧在成都居住过的王家堂街的房屋，伪装典当出去，并改成医院。所有家具、古玩、字画、瓷器皆分散到各支线道首家隐匿起来。将黄金8000余两、银元3000余个，分别埋藏在两个道徒家，而且做得十分诡秘，甚至连两个道徒本人都不知道。[①]

1949年7月，孙素贞离开四川，经广州逃往香港，住在皇后大道的一贯道“香港公馆”内。同年9月，她又以侨胞身份，参加“归国华侨参观团”，带领秘书徐宗沂、侍从周存坤，从香港乘轮船到达天津，后转北京、济南、南京，并由齐铭周等陪同，到达上海等地，暗中巡视道务，发出指示。在上海，孙素贞住在富民路富民里25号的一贯道“上海公馆”，分批秘密召见南方各地道首开会，询问隐蔽活动的情况，并布置今后的秘密活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1950年，孙素贞在齐铭周的陪同下，经澳门转逃香港，住在“香港公馆”，窥视大陆，伺机活动。1952年，她通过台湾国民党“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其妻为一贯道徒)，前往台湾，1975年2月死于台中市。

2. 师兄派(“正义派”)的活动

以刘率贞与张英誉为首的“正义派”，是以杭州为基地，依靠青岛的董玉泉、济宁的张毅、南京的孙锡坤以及华东地区的一贯道原有组织，仍然以“崇华堂”的名义，开展道务活动。先后在杭州设坛1454处，发展道徒114990人。在浙江其他城市和农村，设坛1409处，有道徒约10万。

---

① 《公安史资料》，1991年第1辑。

1949年3月，杭州解放前夕，刘率贞与道长孙子俊及女儿、侄子等4人，以治病为名，由杭州乘飞机经上海转青岛，秘密进行道务活动。1949年6月青岛解放，7月刘率贞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1953年4月24日病死于济南看守所。

张英誉于刘率贞赴青岛后，又令詹天保、韩金城二人分别到绍兴、杭州两地秘密进行活动，布置道首、道徒隐蔽，以便伺机活动。1949年全国解放后，张英誉继续来往于上海、杭州、绍兴之间，进行秘密活动，1951年4月13日在广州湛塘路66号被逮捕，1953年6月11日以反革命罪被依法处决。主要罪恶事实有以下一些：

勾结并凭借反动政治势力从事反革命活动，日寇统治时期，张英誉认为是"宏道千古一时的良机"，并与其父张光璧勾结汉奸褚民谊、陈东升、孙祥夫、李丽久等人，拉其入道。使其父张光璧得以担任汪伪外交部顾问，本人先后担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北京办事处少校参谋及外交部专员。在日寇及汉奸势力支持下，把一贯道逐渐发展到遍及所有沦陷区，并且狂妄地宣称："日本皇军打到哪里，道就宏到哪里"。日寇投降后，又与国民党相勾结，指使南京一贯道道首孙锡坤等，代表一贯道上书蒋介石，表示"坚决效忠党国，绝对遵从领袖"，使张英誉又被委任为国民党政府公路局专员。解放前夕，他又布置应变及解放后的潜伏活动，煽动群众道徒反对人民政府。并且散布谣言，攻击人民政府，胡说全国解放乃是"黑难大政"，污蔑人民解放军八一军旗和帽徽是"应和天机九九八十一劫"，"八十一劫都全了，水火灾都要降临"。①

二、取缔一贯道等会道门

1. 解放区人民政府对一贯道等会道门的取缔与打击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鉴于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不仅在历史上一贯敌视人民，反对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勾结日本侵略者，压迫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一贯道道首们又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搜集情报，有的还组织反动武装，对抗人民解放军。所以，一贯坚持取缔和打击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方针。在全国解放以前的解放区，由于一贯道在各地造谣惑

① 《张英誉结案报告》。

众，破坏生产建设和土改、扩军，污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散布“变天”思想和进行其他破坏活动，有的一贯道道首向道徒们宣传：“共产党能打仗不能坐天下，将来天下是一贯道的。”“一贯道打仗不用枪炮，只要念动咒语就可胜仗。”一贯道除政治上与人民政府为敌外，还严重扰乱和破坏正常社会秩序。他们利用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机会，以巫术治病，残害、贻误人命。一些道首用所谓“下神”、“捉妖”等迷信办法为人“治病”。他们装神弄鬼，对病人或用树枝抽打，或用火燎烟熏，卡脖掐肉，筷夹手指，板打手心，或用香火淬，冷水喷，甚至将病人用绳索捆绑，问是“哪路妖魔降临”，谓之“审妖”。有的还以香灰、泥土、野草制成“仙丹”，给患者服用，致使患者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甚至因为贻误就医而死亡。如安徽阜阳县一位王姓农民，身患脑炎，老母道（一贯道变名）为他治病，道首焚香请神，口中念诵：“青身老母你下凡，保佑凡人出火坑。东廊坊，西廊坊都查明，还有东北仙柱未查清。”然后又念法语：“指天天就塌，指地地就裂，指海海就漂，指山山就倒，指龙龙就跑。”接着就在病人头上拍拍打打再发给“仙丹”（香灰）让病人服用，导致病人死亡。一贯道还利用向道徒收取“求道费”、“开荒费”、“供果费”、“献心费”等名目，骗取钱财。阜阳县一贯道利用“度大仙”的名义，仅从道徒王殿一人手中就诈骗黄金 8 两。另外，道首们还利用各种名目奸淫女道徒。一贯道以“结丹了仙缘”、“考色”、“佛为媒”等名义，奸淫女道徒。安徽肥乡一个点传师通过坛训要求一名年轻女道徒，同他一道外出传道，途中将她奸淫。芜湖市一贯道道首，要求 5 名女道徒脱光衣服睡在床上，任其乱摸，称作“仙身转体”。另一道首何去清经常要求一名女道徒同他一起打坐，然后将其奸淫。他利用此法先后奸淫了 10 余名女道徒。为此，解放区人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取缔会道门的政策法令。1948 年 2 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华北局，分别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政权机关依法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指出一贯道等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工具。因此要打击其反动头子，教育道徒脱离其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反对会道门。1949 年 1 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出《解散所有会门、道门封建迷信组织》的布告，规定：“自布告发布之日起，所有会门、道门组织，应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所有会门、道门的首要分子，应向当地县市政府所属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如能悔过自新，当予宽大处理；若抗不登记，继续活动，一经查明，定予严惩。”全国解放前夕，一贯道一些大道首纷纷逃往境外，留在大陆的各级道首，有的改头换

面，暗中进行传道活动；有的转入地下，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2. 20 世纪 50 年代初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运动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什么要取缔和打击会道门？

首先，会道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的有组织的颠覆势力。

会道门中的人大多有历史罪恶，或者曾经同日本侵略者相勾结，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或者投靠国民党反动势力，反对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前夕，大量会道门组织有计划地隐蔽下来，企图继续与人民解放事业对抗。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会道门继续发展组织。它们简化了入道手续，并且用各种欺骗性谎言，诱骗群众加入。四川的一贯道欺骗群众说："我们的道，叫人民解放道。""共产党和我们的道的目的一样，都是世界大同。""但将来是弥勒佛坐天下。"解放初期，许多国民党的特务、党团骨干隐蔽下来，而且社会上还存在着土匪、恶霸。会道门头子们便与这些人勾结在一起，沆瀣一气。有的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本人就是会道门头子。会道门也设法把一些土匪头子、特务分子拉入道内。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会道门的信徒在千万以上，超过了五大宗教信徒的总数。更为严重的是，会道门还向基层党和行政组织渗透，或把基层党政负责人拉入道内，再利用他们刺探情报，或保护道首和会道门组织。福建大刀会的头子、自封为"北方水火元帅"的连富佑，混入福安专员公署，将专署的内部情况，甚至枪支提供给国民党特务，并且在专署内发展大刀会组织。江苏武进县的一个区公安员，入道后将公安机关内部的机密报告送给一贯道道首。安徽亳县两个村的党政基层组织被白莲教所控制，并发动暴乱。总之，会道门的活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成为人民政权的重要隐患。

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需要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解决人民群众的各种困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是，会道门却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和捣乱。他们散布谣言，蛊惑人心，使广大群众难以安心生产。他们在群众中散布"魔王下界"、"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了"、"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等。在首都北京也出现所谓"鼓楼冒烟，石狮子流泪，万寿山闹鬼，风水破了，要改朝换代了"等政治性谣言。同善社在湖南散布反动传单，诅咒中国共产党，侮辱人民领袖。而且大肆攻击和污蔑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政治运动。

施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拥有土地，这是中

国农民几千年来的愿望,因此得到亿万农民的热烈欢迎。而会道门却对土地改革大肆攻击,针对广大农民翻身得到土地和地主的浮财,胡说"白来的钱不养家,白来的田地水冲沙"、"谁斗地主谁遭殃,不信神明变猪羊"。这类谣言对于土地改革的进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侵略者很快把战火烧向中国的鸭绿江边,年轻的共和国受到侵略者的严重威胁,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而派遣志愿军,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而会道门却趁机大肆鼓吹"美日出兵"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造谣说:"天上天(按:指美国),口上口(按:指日本),两人携手进中原。"企图破坏抗美援朝,梦想美日帝国主义重新统治中国。

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潜伏残余势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会道门也趁机进行破坏活动,针对人民政府有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到处散布谣言说:"坦白是灯蛾扑火,自烧其身。"并且威胁积极检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说:"镇反时被杀的人,来生定要算账,谁是积极分子,上天都有清册。"

此外,会道门还利用解放初期部分群众中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煽动群众饮用"神水"医治疾病,藉以危害群众健康,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1952 年,在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皆发生过会道门煽动群众饮用"神水"事件,导致大量群众中毒死亡。1950 年,一贯道还在一些地方制造所谓"割蛋"事件,用来恐吓群众,挑拨党和人民间的关系。胡说什么"毛主席派人下乡割蛋,送给苏联去制造原子弹"。闹得群众人心不安,许多地方男人白天不敢下地干活。

更为严重的是,会道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多次策动和举行武装暴乱。1953 年 5 月,仅安徽省发生的会道门暴动就多达 40 多起。在湖北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 1952 年末,一贯道、同善社、大刀会等会道门在全省 32 个县,策划武装暴乱 52 起,已遂 31 起,参加者达 7000 余人次,杀害干部、群众多人。河南省从解放初期到 1952 年 9 月,会道门举行的有百人以上参加的暴乱就有 14 起之多,伤亡干部 300 余人。会道门举行暴乱,宗旨就是企图颠覆人民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1951 年,陕西黄陵县的一贯道头子黄得功,策划暴动,不仅缝制了旗幡,而且建立了"国号"——"大同天国",还建立了"大同义勇军",黄得功自任"元帅"。有的会道门头子本人便是国民党残余分子,企图推翻人民政权。1950 年,江西同善社的副"号首"罗会途(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参谋),

准备在全省举行暴乱。他们在南昌筹组了"中华爱国军",在广丰组织了"中国保国军",在上饶建立了"反共救国军",提出"打倒人民共和国,建立莲花国政府"等反动口号。在湖南,同善社头子们也积极组织地下武装,准备暴动。他们秘密集会,在会上声言:"弥勒古佛已降世,生在浙江天台山,不久就要登极。"他们在桃源、慈利等地举行武装暴乱,攻打县政府。1949年,九宫道在河南洛阳举行暴乱。向道徒们宣扬"三期末劫到了,真龙天子要出现了","天下是九宫道的了","打开洛阳城,有吃有穿,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活着可以做官,死后可以升天堂"。并威胁说:"谁要不去,满门剿灭。"计划攻打洛阳市的党政机关,企图杀害党政干部,占据洛阳市,建立"中天国"。天津"世界新佛教会"的"世尊"王紫泉于1950年阴谋组织暴动。王紫泉自称是"白阳佛下界"的"中皇天",一贯反共、反人民,污蔑共产党是"红阳执教,乱世魔王下界",解放后一直幻想登极称帝。1950年他对信徒说:"今冬明春非出皇帝不可,大权就在我和李桂荣(按:另一道首)手中。"北京的九宫道头子刘国俊也自称"白阳活佛",解放前夕企图趁国民党垮台之机建立"莲花国",保"白阳紫薇大帝登极"。解放后又在涿州一带组织反动武装,并以经商为名,建立据点,令该道头目设法打入人民政府充当内奸,以便内应外合,夺取政权。北京的九宫道另一头目李懋五,早在解放前夕就自称"真龙天子",不久就要坐"大皇帝"位,建立"大顺"国。解放后继续进行阴谋活动,1950年春,他与该道另一道首殷凤池共同策划武装暴乱,在与骨干分子聚会时,宣称当年农历五月初五将"明道","坐大皇帝的时机到了"。

(2)对会道门的取缔和打击

鉴于会道门是一种打着宗教信仰旗号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具有群众性和欺骗性,不同于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或特务、汉奸等反革命分子,不能仅仅依靠司法部门的惩治,还必须发动群众,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打击道首,教育群众加以解决。具体取缔过程,一般分为以下步骤。

首先,向群众讲明会道门的危害和本质。通过大量确凿事实,揭露会道门的反动本质和丑恶嘴脸,使广大群众了解取缔会道门的重要意义,迅速行动起来,投入到揭发反动道首的斗争中来。具体方法有:利用广播、报纸、黑板报、幻灯、电影(如拍摄《一贯害人道》)、戏剧、连环画、宣传车、座谈会,其中以组织悔过骨干("三才")现身说法和举办展览会的方式效果最为明显。悔过道首和"三才"们,现身说法,揭露会道门内幕,表演会道门如何装神弄鬼、扶乩、过阴等

骗人伎俩。这样,不仅使受骗道徒在了解内幕后很快迷途知返,要求退道,也使广大群众更清楚地认识会道门的丑恶面目,不再上当受骗。展览会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北京市举办的一贯道罪证展览,观众极为踊跃,展览不得不一再延期。观众多达26.6万人次。展出内容有一贯道头目从道徒那里诈骗到的财物,包括各种古玩、金砖、金锭、元宝、银元以及反映道首们腐朽生活的大烟枪、春宫画等;还展出了大量反映一贯道与日伪、国民党特务勾结的罪证。展览会布置了一个露天"佛堂",让悔过的点传师、"三才"表演他们如何扶乩、借窍、超拔亡灵和传"三宝"。揭露了利用扶乩进行骗人的内幕,一些受骗道徒看后十分气愤,当场揭露一贯道如何骗他变卖房产用来缴纳"公德费"和"度大仙"的事实。

经过宣传教育,广大群众眼睛更亮了,受骗信徒们也识破了会道门的反动本质和丑恶面目。有些地方的群众,原来不了解会道门的反动性,在公安机关逮捕会道门头子时,有人说:"怎么把斋公也逮走了!"有的说:"他是善人!"经过宣传教育,群众眼睛擦亮了,认识到会道门头子"真是面善心恶!"纷纷起来揭发、检举会道门道首的罪恶,有的群众还主动在夜间搜山,捉拿潜藏在深山里的会道门头子。宣传教育也震动了道首的亲属,他们在认清形势后,纷纷动员自己的亲人向人民政府登记,或大义灭亲,检举自己的亲人。

其次,取缔过程。取缔会道门的运动首先在北京市采取行动。因为北京市是一贯道在北方的大本营,许多重要骨干皆藏匿在这里。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1950年末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各种反动会道门,首先以北京市为试点。在大规模取缔会道门前夕,北京市破获了九宫道预谋的暴乱活动。当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取缔一贯道》,指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贯道即被日寇利用为侵略我国的工具,散布'不抵抗主义'与失败情绪。愚弄群众作日寇的顺民,他们有许多人更直接为日本特务机关搜集军事情报,成为日本特务的得力助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匪帮命令一贯道改组成'中华道德慈善会',从此,一贯道即完全为国民党特务所利用。他们到处散布谣言,破坏人民解放战争,破坏土地改革,并在东北、开封等地策动武装叛乱。"其首要分子"利用这一组织,一方面欺诈勒索道徒,敛聚财务,以供自己挥霍;有不少道首,并奸污入道妇女,使不少道徒人死财空。更主要的是他们进行反革命的政治活动,甚至胁迫落后群众参加武装叛乱。"因此确定"一贯道是被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匪帮所掌握和利用的反革命工具,是反动的封建迷信组织,是欺骗与陷害落

后群众的组织。”

社论吹响了取缔一贯道等会道门的号角，按照中央的部署，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指出：“查一贯道是反革命、反人民的封建迷信组织，在其反动首领操纵下，一向与汉奸及美蒋特务勾结，进行各种出卖国家、危害人民的罪恶活动，而一般被欺骗或被胁迫入道的无知落后群众，亦深受其毒害，许多被诈骗钱财，甚至倾家荡产；不少女道徒被强奸骗奸，甚至被迫卖淫；有些道徒遭受非法拷打，甚至被杀害。”“为了保障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并挽救误入歧途的受骗群众，决定严厉取缔。”

接着，全国各地便相继开始了取缔会道门的运动。经过三年时间，全国各地对会道门，特别是一贯道、九宫道、先天道、同善社、还乡道、一心天龙华圣教会等进行了取缔和打击。没有经过取缔的会道门组织、应该打击的道首，也在镇反运动中受到了冲击，其组织也宣布自行解散。这样，会道门中绝大部分道徒，经过几年来的教育，提高了觉悟，认清了会道门的危害和本质，不仅退出了会道门组织，而且自觉地不再信道。会道门不仅是个十分顽固的封建迷信组织，更重要的是，会道门的宗旨是为了夺取政权，建立神权统治。会道门的存在，与道首和骨干有着巨大的切身利益，当然不可能经过一次政治运动就将会道门问题彻底解决。所以，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各地仍不断发生会道门的复辟活动和各种破坏社会治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三、一贯道被取缔后的破坏活动

在 1953 年全国取缔会道门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全国各地仍不断发现一贯道等会道门秘密的传道和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有的会道门由公开转入秘密，由固定的“面”的发展，转入流动的“单线发展”，有的则打着宗教旗号进行秘密传道活动。在四川，一些漏网的道首，仍然在各地秘密活动。他们提出“不分前人后学，不分支系派别”，和“道归一统”的口号，大搞“接线”活动，秘密恢复组织。1952 年在陕西商洛地区的一贯道策划武装爆乱，白河县一贯道道首缪宗绪等 30 余人杀害当地民兵队长并重伤民兵 1 人。同年 12 月，一贯道金线派江苏总负责人中杰前往无锡召集上海、镇江等地道首秘密开会，称取缔一贯道是所谓“魔考”。将点传师以上道首编成“梅花小组”，提出“不受苦，难

得甜,不经魔考不成仙”。提倡“一人受考一人当,上不拉前人,下不连后学”。1953年山西临汾一贯道提出“政道合一”,内蒙古察盟一贯道道首李柱自称“皇上”,把一些道长、前人封为“大臣”、“诸侯”、“州官”、“区长”等职务,还制订了“国旗”、“国号”,扬言“马年尽日(1954年年底)出朝廷,十八子登基”。1954年,安徽省安庆市一贯道道首萧东海等,以安庆市为中心,向农村地区发展道务,进行“重整”和“接线”活动,先后与200多道首进行“接线”,发展道徒600余人。他们利用自然灾害制造谣言,进行政治性煽动。在群众防汛抗灾中,提出:“水灾是天定的,水灾后还有风灾、火灾。”“共产党登不长,世祖出世,将来要成佛国。”1955年1月,湖北省新洲县一贯道等会道门预谋联合暴动,为首的张正顺等人自封“皇帝”,计划组织500余人,先攻打公安局,劫狱后释放囚犯扩大势力,再攻打县政府。1956年,四川省江津县一贯道道首家中藏有“皇袍”20件。云南曲靖县一贯道点传师家中藏有枪支和子弹。同年8月,发现一贯道等会道门道首中,自称“皇帝”者有14人。1960年,全国发现一贯道等会道门中,道首称“皇帝”者多达42人,并且多次举行暴动。1962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窜犯大陆,一贯道乘机制造谣言,与之呼应。向道徒们宣称:“现在老蒋戒了口,母亲掌天盘,灵性在理天办事,凡体在台湾,各兄弟要认准金线目标。”许多地方的会道门头子,还企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由自己“登极称帝”。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出现的会道门头子当“皇帝”案件,多达数百起。仅河北省邯郸地区,就发现会道门阴谋武装暴动案件118起,其中道首自称“皇帝”者有104名。

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会道门又企图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号,进行复辟活动。如云南昆明点传师何继祖、坛主方文津皆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号,进行活动。他们通过原点传师杨桂英与晋宁县等地一贯道接通了关系,在道徒中散布说:“天时快要亮了,老娘(指老母)就要当家了,孩子们(指道徒)也要出头了。”各地一贯道等会道门纷纷蠢蠢欲动。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刑满释放回家、或撤销管制以及残留的道首、道徒,又妄图死灰复燃。他们利用各项改革开放政策和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寺庙开放之机,大肆恢复道务活动。浙江湖州地区,一贯道点传师叶少庭等,在当地恢复活动。他们采取了几项措施:首先是培养接班人,他们感到自己年龄已高,活动困难,于是挑选了4名比较年轻的道徒杨圣发等做接班人。对他们进行培训,让他们四处活动。其次,进行串联活动。一些漏网的老道首、道徒,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打击之后,彼此间很

少来往。1979年以来,叶少庭、费长福等人,频繁接触、联络,有的通信,有的面谈。再次是四处讲道,进行反动宣传。叶少庭等派出严云权等九人,到湖州市所属各地及江苏的一些县进行传道活动,宣扬将有大灾大难降临,只有通道可以避灾免难。最后是传抄、编撰各种经文、表文,制造谣言。有的宣扬"三期末劫",有的叫嚷"弟子们正在水深火热之中",要求道徒"志向坚决,勇往直前"。不久"苦将尽头"、"劫运期满","将要皇榜悬挂",将是"一贯道的天下"。在贵州威宁县,一贯道的变种白阳道道首也利用改革开放之机,公开扬言:"白阳道属于正当的宗教,是个好教门,佛教吃素,白阳道戒口,佛教拜佛,白阳道敬母。"叫嚷"现在共产党落实宗教政策,白阳道可以自由发展了"。

针对这些情况,党和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对策。鉴于会道门利用改革开放之机大肆进行复辟活动的严重情况,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9条规定:"组织、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对各种会道门进行打击。但是,有些地方的会道门仍然猖狂。1981年6月,云南昆明一贯道前人龚达干、点传师张仙彩等,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号,到处造谣煽惑说:"现在道快要明了。《参考消息》上讲:台湾提出来这个道几十年都是跟着黄帝走的,英国也提出意见了,我们党中央对这件事正在讨论,等政府承认了就可以摘帽子,恢复自由,公开办道、讲道、通道。"甚至公开向公安机关挑战,叫嚣要搞一贯道、公安、群众三结合的扶乩活动。1982年初,四川蓬安县一贯道道首刘光炳到处散布政治谣言,说"明年甲子就要改朝换代"、"蒋经国要回来统一中国"、"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了"。针对反动会道门打着宗教信仰旗号进行会道门活动的情况,1982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指出:"已被取缔的一切反动会道门和神汉、巫婆,一律不准恢复活动。凡妖言惑众、骗钱害人者,一律严加取缔,并且绳之以法。"揭穿了会道门利用党的宗教政策进行会道门活动的阴谋。不过,会道门是一股顽固的社会势力,并且有反动的政治企图,所以,尽管不断打击,他们却仍然秘密活动。1982年,天津一贯道点传师赵春槐、坛主张振环经常在海河广场公开宣讲反动经文和坛训,并制造政治谣言:"推倒昏君换明君",影射要"改朝换代"。叫嚣"出现真主登龙位,一贯大道天下辉",妄图夺取政权。鉴于一贯道等会道门严重破坏社会治

安,1983年9月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中指出:“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必须予以严惩。”决定中提到凡“组织反动会道门,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均属“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活动,要“严加惩处”。一贯道的活动虽有所收敛,但是有的地方仍很猖獗。截止到1983年8月,在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斗争中,公安机关揭露和破获了许多起一贯道等会道门的活动。仅在贵州、云南2省3个地市、4个县,就发现新建坛堂65处,设立东南西北4个号,提拔点传师5人,随驾坛主2人,领导坛主4人,坛主65人,发展道徒644人,其中的562名新道徒中,少年儿童就占了一半以上。在山东,1983年8月,张光璧的孙子张成,纠集一贯道点传师9人、坛主4人,妄图“坐天下,当皇帝”。他们在山东、河南两省的郓城、巨野、单县、阳谷、嘉祥、济宁、范县、台前等9县活动。张成幼年即由其祖父张光璧怀抱入道,后来随父母在上海生活,其父被镇压后,1955年由其姑母张茂金将他接到山东郓城县,接受一贯道道务方面的培养。张茂金还借“南海观音”之口,在张成13岁时封他为“皇帝”。后来张成因积极从事一贯道活动被判劳动教养,1966年解除劳教后,仍不思悔改,并且凭借其祖父张光璧在教内的威望,继续进行道务活动。点传师吕光复对他说:“你以后接老祖师的班,你是佛门弟子,师尊的根,我们跟你爷爷修道多年,咱们这些道中人都扶(辅)佐你,由你主办。到了白阳界(劫)天下就是你的,就是帝王之位。坐天下,朝中大小官员由你封。”张成自己也得意地说:“明道后我掌天下,是帝王之位,在万人之上,不在一人之下。”1970年他与郓城县道首孙金库策划组织“五心归一”(五个骨干结成生死弟兄)的活动,扬言:要在黄河两岸摆“万仙阵”,纠众造反,“要打到外国去,实现世界大同”。针对一贯道等会道门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利用迷信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依照本法第236条、第266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八章　台湾和香港的会道门

一、台湾的会道门

1945年日本投降以前，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的台湾，会道门主要是斋教系统的龙华教、金幢教和先天教。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贯道也大量传入台湾，并变成为台湾主要的会道门。

1. 斋教系统的会道门

台湾的斋教实际上就是从大陆传入的一些茹素食斋的秘密教门，包括先天道、金幢教和龙华教（会）等支派，因为其信徒皆茹素食斋，故俗称“斋教”。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斋教系统的教门，多称“在家佛教”，该教虽然打着佛教旗号，但是并不剃发出家，而是以俗人身份在家中吃斋修炼，过世俗人的生活。

台湾的斋教属于明末清初浙江应氏无为教和姚氏龙华会的流裔。在该教所属化善堂藏的经卷《大乘正教科仪宝卷》中提到：“无生老母在家乡观见大地男女轮回受苦，老母慈悲，亲自降凡在山东莱州府即墨县罗家，苦悟一十三春，注集五部六册经书，颁行天下。”又“命转到缙云投应家。”“后来又转庆元姚家开化度人天。”在台湾斋教所属龙华教、先天教和金幢教三派中，以龙华教占优势。龙华教实际上是大陆浙江庆元姚文宇在明末清初创立的龙华会，或称“龙华斋教”。[①] 后来与来自北方的黄天教、圆顿教等融合而形成青莲教，大约咸丰年间传入台湾。因此该教继承了黄天教、姚门教、青莲教的许多特点，如信徒皆以“普”字派名，尊达摩为祖师，以佛教禅宗的前六祖作为该教的前六祖，崇拜无生老母，教内有十步功夫，借伪造的《护道榜文》传徒敛钱等。该教主要仪式分为早晚两种奉佛仪式。

① 郑志明：《台湾的宗教与秘密宗教》，台湾台原出版社，1990年，第75页。

早堂奉佛仪式是：

(一)进茶。念偈一首：清净香茶，护法安排，家乡显化，供养如来。

(二)先发香，后开桌，唱堂偈：嵇首归依无量寿，遥垂金臂接婆娑，众生度尽方回首，几个知恩出爱河。

(三)拜桌四拜，起身回原位，再唱偈：佛身清净似琉璃，佛面犹如满面辉，佛在世间长受苦，佛心无处不慈悲。

(四)炉香赞。念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三声。

(五)五颂《心经》。

(六)秉祖，颂答四恩、十报经。

(七)秉明，念《心经》，唱偈，拜桌，收桌，收茶。

晚堂仪式是：

(一)进茶。念偈一首，先发香，后开桌。

(二)唱堂偈：法堂高广不须议，坐断恒沙更有谁，三界神祇皆拥护，十方世界尽皈依。

(三)拜桌四拜，起身回原位，再唱偈：在家菩萨智非常，闹市丛中作道场，心地若然无挂碍，高山平地总四方。

(四)香赞。念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三声。

(五)颂念《心经》。

(六)禀祖，问答四恩、诵《十报经》。

(七)禀明，诵《心经》，唱堂偈。

(八)拜桌，收桌，收茶，问讯，退堂。

除了每天早晚举行上述仪式外，每逢朔望还要举行供佛仪式。当有新信徒进道时还要举行法会，称为“开光场”，信徒参加法会要交纳“礼仪香金”。开光场一般要进行七天，故又称“七天法会”。除七天法会外，还有所谓“功德仪式”，目的是安抚死者，超度亡魂。

台湾斋教系统的教门念诵的经卷。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五部六册》。

(二)《明宗孝义达宗宝卷》。

(三)《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宝卷》。

(四)《大乘正教科仪宝卷》。

（五）《天经》。

（六）《结经》。

（七）《十报经》。

（八）《三乘偈》。

（九）《大乘明宗科仪》。

（十）《收殡经》。

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斋教信徒中，以年轻人和无业者居多，其次是小商人和工人。教内分为九个等级，称为"九品职位"，由低至高的顺序是：

小乘——大乘——三乘——小引（老官）——大引（太老官）——四句（明偈）——清虚——太空（传灯）——空空。[①]

当时，台湾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斋教系统的先天道、金幢教和龙华会三个支派，一度联合为"齐心社"。[②] 后来，这些教门为了得到日本佛教曹洞宗的庇护，便加入了日本人控制的"台湾佛教会"或称"爱国佛教会"。大约在1920年，这三个教门联合为"台湾佛教龙华会"。首任会长是廖炭，本部设立在嘉义县山子顶的"天龙堂"，并准备在台北、新竹、台中和台南设立28个分支机构。联合后的"台湾佛教龙华会"，带有明显的殖民地奴化性质。在该教内部文献《斋教三派合同龙华会设立趣旨书》中，对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备加颂扬和赞赏。"趣旨书"中写道：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文运与日月并进，人智同时势争趋，而物质上设施略备矣。其政治上之效果，更进于自治制度之颁布，吾人无不额手称庆。所可憾者，唯精神上启发，尚缺涵养。而岛民虽浴我天皇陛下之御，恩泽未能体一视同仁之深身心。俗既未免，犹多墨守旧惯，不胜浩叹"。提出"开岛民心地"和"开以自新之路"，乃是被"付与"该教的"使命"。而且提出该教的教规、教义，要"参酌日本佛教清规"，"勿以舍近图远与支那本山旧习是沿"。[③] 这篇宣言式的"趣旨书"说得十分明确，那就是该教三派联合的宗旨，乃是为了要使台湾人民对日本侵略者感恩戴德，企图割断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

① 王见川：《龙华派斋堂的个案研究——安平"化善堂"》，载《台湾的斋教与鸾堂》，台湾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6年，第115—132页。

② 李添春：《台湾省宗教志》，（人民宗教篇）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56年，第111页。

③ 转引自王见川等编：《台湾斋教的历史与展望》，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152页。

的血肉联系。该教不仅如此宣示,也是这样做的。该教聘请日本临济宗僧人东海宜诚担任顾问,使该教在组织上也隶属于日本临济宗名下。① 鉴于该教实际上已经是日本侵略者奴化台湾人民的工具,所以正式成立后,很快便得到日本台湾总督府的批准。在日本总督府批准的该教《章程》中,明确宣示其宗旨乃是"鼓吹尊王爱国"。他们所"尊"的"王",当然就是日本天皇,他们所"爱"的"国",自然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国"了。一副汉奸嘴脸,跃然纸上。

由于得到日本殖民当局的庇护与支持,联合后的"台湾佛教龙华会"得以迅速发展,短短 3 年之内,就完成了创建初期提出的建立 28 个分支机构 2/3 以上的任务,在台湾全省建立了 22 个分部。从该教内部保存的文献资料看来,该教的活动,同日本殖民当局的行政、警察及宗教界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台南德化堂所藏《台湾佛教龙华会台南支部发会式举行御案》记载,该堂在成立时,曾邀请当时台湾台南州知州知事吉冈荒造、总督府内务局社寺课课长丸井圭治郎、台南州警务课长赤崛、高等警察课长田村,及日本日莲宗布教师九井等前往参加成立大会。② 会上,台南州知州吉冈荒造在致辞时,要求该教"不应消极避世",而应该积极参与台湾的"社会教化事业",以"兼善天下",也就是要求该教努力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后,该教为了配合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于 1939 年在台湾举办"时局佛教讲习会",开会时首先要向日本天皇居住的"宫城遥拜",然后唱日本国歌《君之代》。新任会长陈登元在致开会辞中,向信众讲述所谓"国民精神",鼓励信众"减私奉公","省奢靡之费,以助国防",并提议为日本侵略者"募集国防献金,以尽草民之义务"。③ 该教积极参加日本殖民统治者倡导的"皇民化运动",后来,该教在陈登元带领下,干脆并入了日本人冈田日惺建立的"台湾佛教奉公团",直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台湾同胞的工具。

台湾佛教龙华会的几个头目,都是有名的汉奸。该会首任会长廖炭,是当地士绅,在担任会长后,积极为日本殖民统治效力,"屡受日本总督表扬",被授

① 转引自王见川等编:《台湾斋教的历史与展望》,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年,第 154 页。

② 转引自王见川等编:《台湾斋教的历史与展望》,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年,第 164 页。

③ 《南瀛佛教》第 15 卷,第 60 页。转引自王见川等编:《台湾斋教的历史与展望》,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第 167 页。

予“绅章”。① 1922年,日人丸井圭治郎等人筹划建立日本殖民统治的御用工具“南瀛佛教会”,廖炭被指定为干事。由于他积极参与该会会务活动,很快成为该会的讲习会员和理事。②

廖炭死后,继任会长的许林,更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他在日本占领台湾后,便投身于警界,充当日本侵略者压迫台湾同胞的鹰犬。由于他为主子效力卖命,多次获得日本殖民当局的表扬。③ 1912年,许林辞去警察职务,加入斋教的龙华派,并成为“堂主”,专门利用会道门这一工具为日本侵略者效力。许林隶属于龙华教的“一是堂派”,该派规定,如果信徒要由“清虚”晋升为“太空”级,必须到祖堂接受“总敕”(教主)的“点授”,否则不能得到信众的承认。1914年,许林只好同另外两个堂主施炮等,一同回到浙江晋见总敕普梅,被授为太空级的教首。回到台湾后,他更进一步为日本侵略者卖命。1915年,许林又与施炮成为日本佛教会曹洞宗的“布教补助嘱托”。1916年,“台湾总督府”新址落成,日本政府驻台湾总督召开庆祝会,台湾斋教的首领黄玉阶等在会场设立“佛教大演讲会”,许林等龙华教头目也“北上声援”。1922年,台湾斋教的龙华派、金幢派和先天派联合成立“台湾佛教龙华会”后,许林担任该会的“布教主任”。同年,又被推选为“南瀛佛教会”的理事兼干事、讲师。这时,许林又担任了日本殖民当局“台中刑务所”的“嘱托”,对民众进行“教诲工作”④,他利用佛教会理事的身份,对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爱国志士和台湾同胞,进行所谓的“教诲”。由于他干得十分卖力,深得日本主子的赏识,1923年又成为曹洞宗大本山别院“全省布教师嘱托”,及彰化、员林、丰原三郡社会教化的“嘱托”。此时,他对于所担负的“教化”工作,极为卖力,他“东奔西走,日夜不懈,极为投入其中”。以至当时在台湾的日本记者松尾歌太郎对他的“宣传工作”大为称赞,日本的台湾总督府也对他所从事的“教化工作”加以肯定。1925年,台湾总督伊泽多喜男还在

① 《台湾全台寺院斋堂名迹宝鉴》,第91页。转引自王见川等:《台湾斋教的历史与展望》,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71页。

② 《南瀛佛教会会报》第2卷,第28页。转引自王见川等:《台湾斋教的历史与展望》,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71页。

③ 松尾歌太郎:《台湾美事行善录》,第69页。转引自王见川等:《台湾斋教的历史与展望》,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71页。

④ 《真本宗派本愿寺台湾开教史》,第510页。转引自王见川等:《台湾斋教的历史与展望》,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74页。

"始政三十周年纪念会"上赏赐给他木杯一组。1925年,许林又作为台湾代表,前往日本东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呼吁日本佛教界为该教留日学习的信徒提供方便。回到台湾后,继续为日本侵略者效力,因为他帮助日本侵略者对台湾民众"教化民风"有功,于1933年再次受到日本侵略当局的"表彰"。①

总之,在日寇统治时期,台湾的斋教,完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奴化台湾同胞的帮凶。

2. 一贯道

(1)传入台湾

一贯道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传入台湾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大陆的一贯道纷纷派人前往台湾"开荒"办道,最早前往台湾办道的是天津的道首王义所派点传师贾庆,他在台湾基隆开设了几处坛堂。1946年春,上海一贯道道长潘华龄、李廷岗相继派遣鲍秉森、陈文祥、吴学信等人前往台湾办道。潘华龄一系在台湾成立了亲德坛及分坛30余处,李廷岗系也成立了数十处坛堂,由吴学信主持。1947年,天津道首胡桂金又派韩雨霖(韩恩荣)等人前往台湾"开荒"。

一贯道在大陆时已经分裂为师母派(金线派)和师兄派(正义派),传入台湾后,两派依然对立。前者占绝大多数,后者居少数。最早到台湾开荒办道、后来又在台湾较为有名的陈文祥、张培成、韩雨霖、何宗好等人皆属于"师母派"。

陈文祥夫妇都是台湾高雄人,陈文祥(1906—1988)又名陈志浩,台湾省高雄县弥陀乡人,出身于一个经营糖业的富商家庭。1927年赴日本留学,在爱知县的爱知医学院学习医学,1935年回到上海,在法租界开办诊所。后来因得到富商叶鹏远的资助,在大马路(今南京路)的哈同大楼成立"爱华医院"。1939年,一贯道天津道德坛的张葆经、冯月千等人来到上海,"一边经商,一边办道",在法租界的吕顺路新城隍庙边上,开设了上海第一所佛堂,最初叫做"基本坛",后来改称"基础坛"。这一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其中许多高级官员皆加入了一贯道,如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褚民谊、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孙祥夫、汪伪税警团司令李丽久等,皆入道成为道内头面人物。孙祥夫在担

① 王见川等:《台湾斋教的历史与展望》,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76页。

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便邀请陈文祥出任汪伪军职，从此，陈文祥便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汉奸。1942年7月15日，孙祥夫与李丽久又一同“引保”陈文祥加入一贯道。陈文祥“求道”是在当时南京三茅宫天一坛，由道长齐铭周亲自点道。然后，又带他去宝光坛见道长潘华龄，不久，陈文祥便成了宝光坛的十大坛主之一，翌年，便被提拔为点传师。这时，陈文祥与孙祥夫的关系更加密切。1943年孙祥夫又邀请他到浙江宁波，出任汪伪陆军医院的院长。他到宁波后，先到当地一贯道佛堂报到，然后才去伪陆军医院任职，所以，他很快便成了当地一贯道的道首。他以汪伪陆军医院院长的身份，在当地开展道务，那些汪伪政府的大小汉奸，纷纷求道，有一次竟有360多人接受点道。陈文祥还利用职务之便，在当地横行霸道。据其《行状》中称，当地一家小报刊登了一则“诋毁”一贯道的消息，陈文祥凭借汉奸权势，“迅即查明该记者姓名”，并命令该记者翌日再“在该报刊登赞扬一贯道”的一大篇文章。另有一次，当他得知当地有一佛堂被游击队占用后，他又凭借汉奸权势，强迫游击队迁出。[①]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汪伪政权随之覆亡，陈文祥为了逃脱充当日伪汉奸的罪责，犹如一条丧家之犬，逃回台湾，在当地设立佛堂，传一贯道，成为后来台湾一贯道的总负责人之一。

在赴台湾前，陈文祥由道长潘华龄带领，去拜见一贯道总道首张光璧，陈述去台传道的愿望，受到张的赞许。张对他说：“台湾乃一片干净土，汝有此志，不啻东方出太阳。”[②]并随即命令潘华龄在三天之内为他筹足旅费。同年11月中旬，陈文祥与妻子杨倚文、“老前人”鲍炳森，一同搭乘轮船，于年底回到台湾。1946年初，陈文祥一行开始在宜兰县设立在台湾的第一座一贯道佛堂——天德佛堂。几天后，又在台北设立“归元佛堂”。同年4月，又在屏东市设立“守德佛堂”，不久，又在高雄设立“廖氏佛堂”。一年当中，陈文祥共设立了11座一贯道的佛堂。由于台湾道务发展颇快，陈文祥又要求潘华龄派人前来协助，不久，潘华龄又派出10人前往。1947年又增设了24座佛堂，由于人手不够，陈文祥又向潘华龄推荐了4人，转请张光璧任命为点传师。又在台北归元堂开设训练班，培养办道人员。其中有不少企业家，如台湾省五金公会理事长张东华、伸铁钢铁厂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伸火等。这些人入道时皆“立愿”，要在台湾各大城市

① 宋光宇：《天道传灯》（上），台湾三扬印刷企业有限公司，第90页。

② 《潘华龄笔供》。

开设佛堂。

这时,一贯道的发展对象,主要是乡村的农民、城镇的工人、小商贩,以及部分小学教师。但也有少数企业家,如上面提到的张东华、黄伸火等,由他们出钱出力,扩展道务。一贯道入道时都要求许愿,每人都要度满 64 人才算“功德圆满”,因而每个入道者皆积极传道,使一贯道有了不少发展。由于一贯道行踪诡秘,引起了当地警方的警惕。1947 年春,台北归元堂举行法会时,被邻居举报,警方闻讯后立即前往搜查,将道首陈文祥关押了 6 个月。在陈文祥被捕期间,上海的一贯道头子潘华龄只好亲自到台湾主持道务。陈文祥获释后,便成了全省一贯道的总负责人。20 世纪 50 年代初,国民党当局由于刚刚来到台湾不久,惊魂未定,对一贯道这类秘密组织十分警惕。加之一贯道举行“法会”时,又行踪诡秘,听到警察前来,便一哄而散,更加引起当局的疑虑。所以,初期到台湾传教的“前人”,几乎都有过被警方传讯,或被投入监狱的经历,陈文祥就曾被警方拘禁过 100 多次。“前人”吕树根被关押 6 年之久。

另一个初期在台湾传道的道首张培成,1914 年生,江苏崇明(今上海市崇明县)人,出身于上海一个店员家庭,14 岁时在上海的鸭绒鹅毛店里学生意。23 岁时与人合伙在南京开了一家“鸿利毛厂”,仍然经营鸭绒鹅毛的出口生意。后因父亲病故,回到上海,被一名一贯道道徒带领去见一贯道上海基础坛的“前人”李廷岗。李告诉他说,求道后可以超拔父亲的亡灵,使父亲免于受苦,张培成便加入了一贯道。经过 4 天的训练,他便跟着点传师出去办道,回到南京后,立刻到附近一家佛堂去讲道。1943 年元月,他回到上海崇明办道,在一年之内,就在当地开设了 88 间佛堂。他们的活动,引起当地游击队的注意,怀疑他们是日本特务,一度将他关押。获释后,于 1944 年由张光壁亲自任命为点传师。1946 年上海基础坛的唐绍继和吴学信经厦门到台湾传道,次年,上海道首便派张培成接替唐的职务。他与 23 名男女道徒前往台湾,临行前他们购买了 70 匹绸缎、100 打毛巾、600 打手绢,准备到台湾出售,以赚取生活费。到台湾后,先在基隆逗留了 3 天,然后转赴台北,在台北租到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楼下开设“天丰商行”,楼上则是“天丰坛”佛堂。当时上海日用品在台湾很受欢迎,货物一到,很快就销售一空,利润颇丰。这样,他们就靠倒卖大陆的各种日用品赚取利润,以维持生活和进行传道活动。大陆解放后,他们无法再从大陆贩运商品,只得经营一家百货店,勉强维持生活。1951 年,张培成与人合伙经营可乐娜糖

果饼干公司,利用赚得的利润维持生计和开展道务。

韩雨霖(1903—1995)也是最早到台湾传布一贯道的“前人”之一。韩雨霖本名韩恩荣,入道前曾在天津开设“大德隆纺织厂”,1938 年因为身患肺病,由医生引导他加入了一贯道,病愈后便成了道内骨干,开始办道。1939 年他设立了“同兴坛”佛堂,协助专门印刷一贯道道书的天津“崇华堂善书局”,并到天津总坛任司账,翌年升任点传师。1948 年解放战争胜利发展,韩雨霖看到国民党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便同二十几名道徒,逃往台湾。他们初到台湾时,生活也相当困苦,从大陆带来的钱很快用尽,大陆解放后,他们的经济来源完全断绝。这时,韩雨霖便向道亲借得黄金 10 余两,开设了一间“同德商行”,后来到台中定居,开设“同德机面厂”,做面条出售,来维持大家的生计。初到台湾时,由于言语不通,道务难以开展。后来韩雨霖在台北“引度”了一名当地人李清贺,并买下一家“青年照相馆”,在楼上安设佛堂。他们在李的帮助、陪同下,开展道务活动。这一支一贯道后来发展成台湾一贯道的“发一组”。1954 年,孙素贞决定从香港到台湾定居,韩雨霖受命办理有关手续。他与道徒刘士毅(曾任台湾国民党政府“总统府参军长”)商量对策,设法将孙素贞接到台湾。

台湾一贯道的“兴毅组”,是由从东北逃到台湾的何宗好等建立的。何宗好又名何宗浩,是吉林长春人,曾在黑龙江省哈尔滨经商,开设“祥荣大染厂”,1939 年在哈尔滨入道,然后便在东北各地传道,开设了不少佛堂。1946 年东北解放区开展取缔会道门的运动,何宗好于 1947 年 2 月,带领道内骨干马仲龄、王春茂及“天才”张长江等到台湾传道,建立了“纯阳组”。次年 8 月,又潜回到天津,此时天津已经解放,何等难以立足,便第二次前往台湾。1948 年年底,何宗好带领马仲龄再次潜回天津,适值天津正在开展取缔一贯道的运动,何等感到“如此坐以待毙,不如冒险出走”。春节过后,又辗转前往香港,靠充当小工为生,1953 年再次来到台湾。由于何宗好在第一次到台湾时曾建立了“纯阳坛”,把薛福隆及其弟薛福三拉入道内。他们又把几个在铁路上工作的乘务人员拉入道内,利用工作之便,开展道务。到 1966 年已经形成了 29 个单位,并建立了“兴毅理事会”,总部设在台北市。为了保密,兴毅组采取了更为诡秘的活动方式。规定:“任何一位道亲只能知道自己的佛堂和所属的点传师,不必知道别单位的情形,也不必知道再上一级的

情形。任何佛堂只是纵向地与自己所属的中心佛堂联系。"①

到台湾发展道务的,还有来自上海、温州等地的宝光坛、基础坛、文化坛等一贯道分支。它们在台湾设坛传道,成为后来的宝光、基础、文化等组(支线)。1947—1948 年,由于解放战争在东北的胜利发展,在哈尔滨、长春、四平街(今四平市)、安东(今丹东市)等地的一贯道徒,也纷纷逃往台湾,成为后来台湾兴毅、天祥、安东三个组的起源。

1946 年以后,台湾的一贯道主要分为众多"组"和支派。

基础组

源于上海的基础坛。1946 年 5 月,厦门基础道场的唐绍继等到台湾,后来又有黄自然、袁翦鹗、袁翦鸿等人从江苏崇明岛(今属上海市)、李浩然从江苏海门到台湾。他们先在台北市南昌街开设基础堂,后来主要在台湾北部地区发展道务。1947 年 3 月,张培成又率众到台湾,唐绍继等返回大陆,张培成为该组的领导人。该组后来在台湾发展很快,建立了许多寺庙式的公共佛堂和大量家庭佛堂,发展了众多的点传师。

文化组

出自天津的文化坛,1946 年来自上海的孙路一等来到台湾设立文化堂,其后,天津的文化坛又陆续派人来台,设立中化堂、善化堂等。

法圣组

出自南京韩顺祥的忠恕坛,1948 年南京人孙德椿到台湾台北市设坛,以后向南部发展,建立家庭佛堂 30 多座。

乾一组

1947 年,天津乾一坛派闻道弘率"三才"牛春来等到台北市古亭区设理智坛,后来设立佛堂 50 多座,有点传师 20 多人。

天祥组

源自天津的天祥坛,1948 年有李星五、刘懋忠等人在台北市设堂。李返回大陆后,刘懋忠独自办理。

金光组

源自上海的金光坛,1947 年由庄祥钦等在台北市设堂,总堂设在台北县永

---

① 宋光宇:《天道传灯》(上),台湾三扬印刷企业有限公司,第 146 页。

和市，有佛堂10余所。

天真组

1948年天津天真总坛的张文运在台北设立，由浙江镇海人刘汉卿（女）掌理，总坛设在台北市中正区。

慧光组

源于安徽六合的慧光坛，1947年由张继勤传入，在台北市设坛，有点传师30多人，佛堂数十座。

浩然组

出自天津浩然坛，1948年于金藻（女）派金宝璋等人到台湾办道，分为浩德道场和育德道场两支。

中庸组

来自四川成都，分为三支：刘应才（四川江油人）于1949年到台湾，在台北市中山区设坛；甄中和（河北宛平人），1950年经香港到台湾，初期在屏东县设坛，后迁桃园县；周绍贤（女，山东德州人），1950年初抵台，在新竹设立天广坛，后迁至台中县的太平市。

安东组

源于辽宁安东（今丹东）的敦厚坛，1949年高金澄经韩国辗转到台，1951年在新竹设高真堂、高宗堂等，以后陆续向台北及中南部和国外发展。

宝光组

出自上海宝光坛。1945年12月，一贯道道首潘华龄派陈文祥夫妇回到台湾，次年初在宜兰设立天德坛，为台湾的第一座佛堂。该组分成9个道场。

明光组

出自浙江宁波的明光坛，1946年底，於宗瑶（浙江宁波人）在台湾抵台中大里糖厂任厂长职，次年在糖厂宿舍设立和光堂。

浦光组

1983年从宝光组分出，改隶香港浦光组。

常州组

源于江苏常州的博德坛，1946年匡佩华（女）率顾爱珩（女）等在台南市成立天乾坛，在南部拓展道务，后来又逐渐向中、北部发展。

发一组

源于天津道场,1947 年胡桂金派刘振魁、陈鸿珍到台湾开荒办道。1948 年韩雨霖先后率祁玉镛等抵台,初期在台北市大安区成立同德坛及同德商行,后来向南部发展。下设众多道场。

兴毅组

出自天津兴毅坛,1947 年何宗好带领孙正阳等从天津到台湾,在台南市设立纯阳坛,并向北部拓展,数年后遍及台湾,下设众多道场,并向海外发展。

阐德组

1948 年,上海宝光坛的杨奇昌创立阐德坛,1950 年派刘秉宏到缅甸开荒,1982 年缅甸阐德坛归侨杨世昌回到台湾,在台北市设立天德堂,在高雄设立天明堂。

正义辅导委员会

源自一贯道师兄派在杭州成立的"正义辅导委员会",1946 年由吴学信等人首先在台湾基隆市设立天慈堂,又在高雄设立天浩堂,成立支线。[1]

(2)因被查禁而蛰伏

国民党在逃台初期,草木皆兵,对一贯道这样一个秘密组织更是严加防范。1953 年 4 月某日,一贯道在台北总坛举行"老母大典会",警方探知后将道首缉捕。同年,台"内政部"为防范一贯道,依据在大陆时颁布的《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将一贯道作为"邪教"加以取缔。1958 年,当局再次查禁一贯道。1967 年,台湾的佛教会云林分会呼吁治安当局加紧取缔一贯道,并提醒善男信女勿受愚弄。佛教界也出版了一些反对一贯道的书籍。如释回明的《暗路明灯》,由释广定校正,于 1974 年重新出版;释宏妙的《天道真传》,1975 年出版;佛教出版社编印的《天道指南》,1980 年出版;乔立人的《天道参同契》,佛教出版社出版。社会其他各界也有不少批评一贯道的书籍,如施文涂的《我怎样脱离一贯道》,1978 年出版;郑灿的《中国邪教祸源考》,中国孔教会和佛教出版社出版;东方白(郑灿)的《天道玄旨》,1981 年佛教出版社出版;以及不著撰人的《歧路指归》、《回头是岸》等。这些书籍皆指斥一贯道是历代叛乱的继承者,"天生的就是个叛乱的胚子",妄称"释迦佛退位,弥勒佛掌天盘",并以"天命来控制信徒

① 慕禹:《一贯道概要》,台湾飙巨书局,2002 年,第 80—127 页。

的行动，指使他们叛乱，以达到自己称王称帝的欲望"。

1980年12月，台湾的"中国佛教会"召开会议，指出一贯道令信徒俯首帖耳，绝对服从；教首有政治野心，是危害社会最巨之人。""破坏中华道统"，"藉佛教之名，歪曲佛教形象。"这些指斥，基本符合一贯道的本质。

在台湾治安当局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一贯道虽然表面上解散了，暂时停止活动，但他们并不甘心，而是采取"吃会"或外出旅游等方式，继续变相开展活动。据张培成回忆说："既然宣布解散了，有两个多月时间，大家都不敢有所活动，后来才想出用游览车载道亲去环岛旅行的办法继续办传道。""我在一辆车上讲道，到了垦丁会车的时候，就换到另一辆车上利用回程继续讲道。"后来，又采取"家庭式的活动"，"把大班改成小班，在几个道亲家中，用聊天的方式讲道，别人来看时，会以为是朋友在闲聊。""那时警察机关抓得很紧，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每一位点传师出门去办道时，三表六愿的表文都不敢事前写好，以免万一被搜到时百口莫辩，每一个人都把表文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然后身上带着表文纸，办道时临时写表文，办完道后就将表文一把火烧掉，即使警察来了也抓不到证据。"一贯道为了继续生存，又想出两个办法。一是托庇于道教，张培成带领各"支线"加入台湾省道教会，然后公开登报呼吁一贯道道亲"回归"道教；二是建立大庙，公开登记在各地道教会、佛教会名下，继续活动。一贯道为了使活动免遭警方破坏，采取了单线联系的方式，横向各组织绝不联系。不同单位发展出来的佛堂，也互不来往，有事则透过理事会来沟通。在纵向方面，一个道徒，只能向上追溯两级，到自己的点传师为止，再往上就必须由点传师带领，才能见到各级领导理事。

另外，一贯道在蛰伏期间，又以从事工商业为掩护，进行传道活动。道首何宗好本人是商人出身，所以，便在工商界进行传道活动。他首先在台北市的兴毅总坛开设公司，代理韩国高丽参在台湾的销售业务。另一道首薛福三则经营古董生意，开设"古都民艺馆"，其他各组也都利用各种机会，参加社会团体，趁机宣扬一贯道教义，发展道徒。使得许多著名企业家成了"道亲"，如长荣海运公司的董事长张荣发，便是其中之一。他们把道务与经营工商业结合起来，使一贯道获得了一个公开、"合法"的地位。他们把公司、工厂与佛堂混合设立，召开法会时，便以"员工讲习所"的名义进行，对外则称佛堂为"员工活动中心"，出境办道，则称"业务视察"，并利用各国鼓励投资的办法，在国外建立据点。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贯道开始把触角伸向大专院校。1967年，台中市

的逢甲学院合作系学生吴景山首先入道，翌年，他又邀约另外三位同学入道。1969年初，他们四人在学校附近一处供应学生早餐的饭铺，以包伙的方式，一起用餐，边吃饭，边谈一贯道的“道义”。以后又有其他系的同学加入，发展成拥有20人左右的素食伙食团。到70年代，这种素食伙食团，在各大专院校已发展到80余个。一贯道之所以能够吸引这些大学生入道，关键在于素食伙食团可以节省金钱。当时的逢甲学院、文化学院、淡江大学、铭传商专和实践家专等私立大专院校，排名较后，因而成了台湾中南部农村贫困考生报考的对象。许多农家子弟入后，吃素食包伙，可以省钱。但是，一贯道的传道者，大多是缺少文化知识的农民、小商贩，传道主要靠扶乩和举行法会时的“仙佛借窍临坛训示”。这种愚昧的迷信活动，对于大专院校的学生来说，很快就产生了信仰危机，使得一贯道建立的道场受到严重冲击，素食伙食团也随之停摆。80年代初，一贯道道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改变策略，放弃扶乩和仙佛借窍临坛训示的传道方式，改为注重儒释道三教经典的研读，要求信徒研读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佛教的《孝经》、《金刚经》、《六祖坛经》、《心经》，道教的《道德经》、《清净经》、《庄子》等。后来又加上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基督教的《圣经》，以此吸引大学生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入道。

(3)一贯道在台湾争取“解禁”的活动

首先是进行舆论准备。由一些同一贯道关系密切的学者为其进行辩解，其中最重要的是宋光宇为一贯道所作“调查报告”。宋光宇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其父早就是一贯道道徒，他幼年时便跟着父亲到以宁波同乡为主的一贯道佛堂中走动，所以，自幼便受到一贯道的熏陶。早在1970年读大学四年级时，便选择与一贯道有关的题目撰写毕业论文。为此，他又跟随父亲到一贯道的佛堂去做调查，了解一贯道的祭典仪式和讲经活动，历时7个月之久。1971年完成了毕业论文《守德佛堂》，修改后改为《一贯道的民族学探讨》，发表在《综合月刊》上。1980年夏，有两位记者胡逊、何颖怡见到高雄地方法院推事苏鸣东公开承认自己是一贯道的“忠实信徒”，认为新闻价值很高，就着手进行研究。他两人因为见到宋光宇有关一贯道的论文，便对他进行采访。通过这层关系，宋光宇便认识了苏鸣东，又由苏鸣东的介绍，认识了“国大代表”王兰。王兰乃是一贯道的坚定支持者，早在1978年一贯道被禁期间，她就曾对一贯道进行调查，并写出一份调查报告，称“一贯道教义乃以宏扬中华

固有文化为宗旨”,“综观一贯道之教义,道中人之作为、信徒之言行,其为一正正当当之宗教,而绝非邪说不法之团体,不言自明”。以此呼吁台湾当局“能使一贯道正式公开登记,使成为一合法之宗教学术研究团体”和“作为安定社会之一股力量”。[①] 王兰虽然具有“国大代表”的身份,但是,台湾当局对于她的建议,仍然不予理睬。1981 年 2 月 26 日,宋光宇与记者胡逊约见王兰并一同进餐,王兰答应带领他们到一贯道各组去走动,帮助引见各组的前人,而宋光宇等则“以把一贯道的真相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公诸于世”,“作为回报”。这样,宋光宇就开始了对一贯道的调查。由于调查者的目的乃是为了替一贯道进行“正名”,在进行调查之先,就已经有了结论,认为一贯道所遭受的“不白之冤”,乃是佛教等宗教“为一贯道罗织罪名,向有关单位密告,大玩两宋时假手官府以除异己的老把戏”。而且调查的对象,仅仅是一贯道的佛堂和道首,他们提供的资料全是替一贯道辩解的。而调查过程中又得到被调查者(当事人)的“种种帮助”,如一贯道中的“老前人”张文远、韩雨霖、祁裕修、梁华春、陈鸿珍、张培成、何宗好、张德福、王寿等。这些人全是一贯道的道首,他们提供的情况全部是有利于一贯道的内容,不可能真实的。调查是在一直要求为一贯道“正名”的“国大代表”王兰“带引”下进行的,王兰为宋光宇“负担了几乎全部的经费”。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调查和写出的调查报告,当然不可能是客观真实的。该调查报告称,一贯道应该正名为“新兴宗教”,“不仅不是危害社会的‘邪教’,反而是一股庞大的社会安定力量”。它“解决了许多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社会问题”。其结论是:“一贯道完全秉持着政府政策在做,政府推行一项政令,一向采取由上而下的传统方式,因此在基层常会出现死角。而一贯道推行同一件事,是由下而上,先要从广大的基层做起,所以能实施得很彻底。”[②]这就是说,一贯道完全可以成为当局在基层推行政令的工具。该调查报告在后来台湾当局对一贯道的“解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苏鸣东为一贯道所作的辩护。

苏鸣东原来是台湾高雄地方法院的一名“推事”,早在童年时(8 岁)就因为受到一贯道“飞鸾宣化”的迷惑而参加了一贯道,后来便一直执迷于一贯道。当台湾警方、舆论界和佛教界开展对一贯道本质的揭露后,他便以“一贯道虔诚信

① 转自宋光宇:《天道钩沉》,附录二,元祐出版社,1984 年。

② 转自宋光宇:《天道钩沉》,第 17 章‘总论一贯道’,元祐出版社。

徒”的身份，发表《公开信》，为一贯道进行辩护。又发表《天道的辨正与真理》与《天道概论》二书。《天道的辨正与真理》的中心内容，是企图对一贯道是台湾当局有关“白莲教余孽”的说法进行“辨正”。证明一贯道与历史上的白莲教“毫无关系”。提出元末的白莲会（白莲教前身）“是一个徒有宗教外表，实际上是以革命或叛乱为目的的团体。”“不论何种白莲教，本质上都是含有政治目的的革命或叛乱团体，绝不能视为宗教或教团。”而一贯道则是来源于明中叶兴起的“以天定三会为基本思想，教人明心见性，修大道，以期超生了死，回真空家乡为宗旨的新兴宗教，”“与白莲教毫无传承之关系”。[①]《天道概论》是一部从正面论述一贯道内容的书，作者坦言：“我编写此书的动机，除旨在使世人认识天道确为真理而非邪教外，并期盼其真理昌明于世，使国人从天道中肯定精神世界之存在，确立正确的人生观，重振民族精神，消灭共匪，完成中兴复国之历史使命。”

林万传的《先天道研究》，则是从学术角度论证一贯道并非“邪教”。林万传任职于台北文献馆，所著《先天道研究》，是一部以学术研究面目出现的道书，全书共有三编。第一编为“先天道研究”，主要讲述先天道的源流、供奉的神灵、教义、术语、经典、佛堂、礼仪及职级、历代祖师、“改革派”的兴起、台湾先天道的沿革与展望等。在先天道源流一章，作者主要论证先天道源出于金丹道，而金丹道又来源于道教的丹鼎派。到了宋元之际，发展成全真道，从而说明先天道乃是从道教发展而来的。而一贯道、同善社、圆明圣道等，皆是从先天道发展来的，它们都是先天道的“改革派”。第二编是有关先天道经典的汇编，共汇集了 56 种经书。第三编是先天道的大事记。综观全书的内容，无非是证明先天道即一贯道的前身并非邪教而是“正道”，完全是为了一贯道争取合法地位而编写的。

其次，争取解禁的活动。1967—1977 年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在台湾政坛上出现了许多党派。国民党为了在竞选中获取稳定的票源，一些地方的“党工人员”和各级“民意代表”，便开始和一贯道拉关系，一贯道也因此得到各级“民意代表”和地方行政官员的支持，一贯道道首在与国民党相互利用的背景下，开始了争取“解禁”的努力。

国民党为了争取选票，便动员包括治安单位在内的各种力量进行“辅选”。1971 年，台湾“警备总部”正式委托一贯道的道首张培成等，在地方选举中，支

① 苏鸣东：《天道的辨正与真理》，“自序”。

持国民党的候选人。一贯道为了取得合法地位，也不得不与国民党合作。张培成向“警备总部”人员表示愿意帮助国民党进行“辅选”，但说：“一贯道的道亲完全是看在‘国家’的情分上，才不计前嫌，大力帮忙，着眼点完全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华民国的生存与发展。”①台湾当局的地方官员，在选举中也曾得到过一贯道的帮助，所以他们在当选后“也必须有所回报”。1971 年台北县县长邵恩新，乃是“警备总部”重点支持的对象，在选举前便亲自来到一贯道的先天道院，向张培成求援。并问张“有什么可以效力的地方？”张向他提出：“希望你当选后不要再来取缔一贯道。”邵便满口答应，并且在当选后，果然很少让警方去干预一贯道的传道活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1983 年台湾举行“立委”选举，一贯道又为国民党大卖力气。当时，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提名的林钰祥，受到该市大安区基层组织的抵制，党外提名的杨某拟利用这一形势希望，一举打败林钰祥。这种情况使得负责辅选的大安区党部负责人张明致大为头疼。张自幼随父母入道，读大学时的学杂费，一直到硕士，皆由一贯道“发一组”前人祁裕修、陈鸿珍提供，毕业后从事党务工作。此时作为大安区党部第一组组长，负责组织动员党员的辅选工作，如果基层组织不进行辅助，林钰祥未能当选，他将难以向上级交差，于是便求救于祁裕修，要求他帮助自己完成任务。祁裕修鉴于张乃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不能为此而断送了前程。而且帮助国民党助选，又有利于一贯道合法化，于是在佛堂连续举行的大型法会上，邀请林钰祥参加，讲几句“只要有益于善良风俗的宗教，就值得发扬光大”的话，以讨好一贯道徒。林的话果然得到道徒们的良好反应，祁裕修便动员道徒们支持林钰祥，从而也帮助张明致交了差。选举结果，使一贯道支持的国民党籍候选人林钰祥等八人，全都进入“立法院”，以致当时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任关中感慨地说：“一个一贯道，抵得上三个区党部。”在 70 年代台湾的选举中，许多后来的国民党要员，皆曾得到过一贯道的帮助，其中有当时的台北县县长邵恩新、林丰正，桃园县县长吴伯雄等。所以，每逢选举，国民党地方党部便去拜托各地一贯道佛堂，请求支持。

1982 年 9 月 30 日，蒋经国邀见台湾各个宗教的代表，此时一贯道的“老前人”张培成以“中华民国道教会理事长”的身份应邀参加。他见机会到来，便与其他道首准备了一封“陈情信”，准备在晋见蒋经国时，交给“总统府秘书长”马

---

① 宋光宇：《天道传灯》（上），台湾三扬印刷企业有限公司，第 222 页。

纪壮。张培成在信中称一贯道乃“道教的一派”,并称一贯道“深明大义,爱国家,爱领袖,奉公守法,知耻尚义”,而且“乐善好施”,“绝无地域与省籍之隔阂观念。”故呈请“政府”准予公开立案,“使之成为一正式独立之宗教团体。”接着,张培成、王寿等又通过私人关系,了解到蒋经国已考虑一贯道的解禁问题。于是决定以“中华圣教”的名义,向“内政部”申请立案。“内政部”则以宗教法尚未完成为理由,未予批准。

在一贯道争取解禁的活动中,一些国民党的高层人士也大卖力气。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主任的陈水逢,起了关键性作用。他曾为此专门找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副秘书长郭哲。但最关键的还在主管台湾治安事务的“警备总部”,他便通过担任台北市景美区民众服务社理事长的一贯道点传师林枝乡,因为他同当时的“法务部长”李元簇多有交往。1982 年台北一贯道“宝光建德组”的总坛在大香山慈音岩举行落成典礼,该组负责人便通过林枝乡的关系,请到李元簇和当时的“监察院长”余俊贤参加剪彩。李元簇长期负责台湾情治工作,有了他的幕后支持,为使警备总部最后答应一贯道公开化方面,扫清了道路。1984 年,陈水逢又专门拜访了当时的“警备总司令”陈守山,希望“警备总部”考虑一贯道公开化,但陈守山并未表态。陈水逢又去拜见当时的“副总统”李登辉,请求同意一贯道公开化。由于台湾当时刚刚发生国民党情治机关指使台湾竹联帮刺杀江南的事件,十分被动,李登辉便同意了早日解决一贯道公开化问题。在得到李登辉首肯后,陈水逢便又去找当时的“教育部长”李焕,李焕得知李登辉已答应,也就顺水推舟。接着,他又去找“中央党部社会工作会主任”许大路,要求在全省 21 个县市做一次普遍调查,如果近一二十年未发现不良记录,则应考虑允许一贯道公开活动。这时,一贯道内部也积极活动,为成立一贯道总会作准备,并聘请陈水逢等多位“民意代表”作为顾问。1985 年,张培成、祁裕修、陈鸿珍、王寿等 7 人,在陈水逢协助下,联名向台“内政部”提出登记申请,但得到的答复仍然是:“在宗教法没有完成立法程序之前,有关宗教申请立案事宜,均未便核准立案。”

1986 年又逢“立法委员”选举,一贯道“再度为国民党护驾”,结果,不仅分配给一贯道负责辅选的 13 名候选人全部当选,而且还有另外 20 名分散在各县市非国民党规划的立委候选人,也顺利当选。对于一贯道来说,此举乃是为了“作面子给国民党,以换取合法的地位”。对于国民党来说,此次选举的结果,也

改变了台湾当局高层人士对一贯道的看法，把一贯道视为可资利用的工具。同年末，国民党召开十二届四中全会，陈水逢趁机邀请"警备总司令"陈守山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工作会主任许大路共进午餐。席间，陈水逢竭力为一贯道辩白，并称经过详细调查，近一二十年一贯道确实没有不良记录。陈守山当即表示："老案是有，不过已是几十年前的事。只要没有新案，就可以让一贯道公开地活动，不受任何限制。"陈水逢连忙建议许大路由党部出面，协调各部门，将此事定下来。一贯道方面，张培成又以"一贯道总会"的名义，再次向"内政部"申请立案。同时，陈水逢又授意他的学生、"立委"萧瑞征和林钰祥出面，联合40名"立委"，于1987年1月9日，在"立法院"向"行政院"提出紧急质询，要求为一贯道立案。在"质询"中提出："天道（一贯道）乃纯正宗教信仰，际此高倡政治革新、解除戒严，且容许新党活动之时，殊无将天道仍排斥于宪法明定宗教信仰自由之外的道理，为特联名郑重提出质询，呼吁迅准天道之立案，合法传布，以符民望。"2月11日，台"行政院"正式同意解除对一贯道的禁令。3月8日，在先天道院成立了"一贯道总会筹备会"，向"内政部"申请成立"一贯道总会"。同年年底，正式核准"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为社团法人，聘请陈水逢为总会顾问。1988年3月15日，一贯道在台北县新店大香山慈音岩成立一贯道总会，国民党"中央社工会"主任委员赵守博前往致辞，承认一贯道的"合法地位"。①

3. 台湾的其他会道门

理教

台湾的理教又名"中华理教会"，是从大陆传入的一个会道门组织，在大陆时原名"在理教"，俗称"理门"，是清初山东即墨人杨存仁所创立。他后来改杨姓为羊，名宰，后人尊为"羊祖"。1949年，理教首领之一、国民党少将高参赵东书到达台湾后，于次年春召集从大陆到台湾的理教信徒商议"复教"之事，并且向台湾当局申请登记。同年5月25日得到批准，遂以"中华理教总会"的名义，重新登记，赵出任理事长。1954年，台湾当局拨出原日本佛教净土宗在台北的"西本愿寺"旧址，作为"理教总公所"的所在地，由赵东书担任"总领正提点大法师"。赵故后，由陈志泉继任总领。

后来，理教在台湾共设有公所等机构145个，信徒多达152000人，神职人员

① 宋光宇：《天道传灯》（上），台湾三扬印刷企业有限公司，第214—272页。

629人,并且办有专门培养传道人员的"中国圣理书院"等三所教办学校。该教与在香港、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及美国的理教皆有联系。[1]

玄子道

亥子道实际上是一贯道的变种,是把一贯道与台湾当地鸾堂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会道门。该道尊"玄玄上人"为最高主宰,又称"混元老祖"。宣扬玄玄上人以其混元一气化生三清、五老,三清是原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五老是东方木公、西方金母、中央土老、北方水老和南方火老。他们皆奉玄玄上人之命,以先天五行化育人类,其中东方木公被称为灵父,西方金母被称为灵母,是人类始祖。该教还宣称,由于一贯道的张光璧、孙素贞已经"成道交旨",被皇天封为天然古佛与月慧菩萨。1984年即甲子年另以亥子道开办"收圆圣业",由玄智、玄慧任继承张光璧为十九代祖师,由二人之父林玄和为实际道首,称为该道的"一品执法"。[2]

天德教

该教由四川乐至县人萧昌明(1894—1943)于1927年创立。萧昌明宣称,该教"以五教精微而称",乃"非人之教,乃天之教;非天之教,乃大公无私之教;入是者,五教各自整理,由天德教贯注各教,合而为一,谓之天德圣教"。最初在各地以"宗教研究社"或"宗教大同推进社"的名义进行传教活动,1936年被南京政府取缔,总部迁往安徽黄山。萧昌明死后,道务由"师母"昌慈接掌。1949年,该教总社迁往香港新界的青山,以"天德圣教"的名义,向港英当局登记注册。1953年由萧昌明的弟子、湖南平江人王笛卿把该教传入台湾,1965年在高雄、台北设立公共道坛。同年10月30日,王笛卿等64人联名向台湾当局申请登记立案,未能获准,遂以"中国精神疗养研究会"的名义,于1966年4月召开成立大会,由台湾前"内政部长"王德溥任理事长,并且在一些市县建立支会,附设道坛,发展道徒。1974年王德溥、王笛卿又以"天德圣教中华民国总会"的名义申请登记,仍未获准。1975年王笛卿故后,王德溥将总会交给王笛卿的弟子秦淑德管理,秦遂召开"会员大会",推举有军方背景的萧楚乔为总会新一届的理事长,掌管教务行政,秦淑德任"道监",总管道务。1989年1月,该教再次申请立案,于同年4月获得批准,6月将原"天德圣教总会"改组为"中华民国天德

① 戴康生等:《当代新兴宗教》,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385—386页。

② 郑志明:《台湾的宗教与秘密宗教》,台湾台原出版社,第94页。

教总会”,仍由萧楚乔任理事长。1992 年该教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萧楚乔再次连任理事长。这时该教共设有坛堂等机构与活动场所 34 个,教职人员 103 名,信徒大约有 19 万人。该教的基层组织采取教社合一的体制。在教团方面,其教阶分为开导师、副开导师、协理开导师、教士、修士、居士(皈依在家弟子)、信士(未皈依之信徒)等。社团方面,设有道务、服务、总务、秘书、会计等,但由教职人员负责。该教还设有“天德圣教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并且在全省办有《觉明杂志》、《明德杂志》、《幸福人生命运指南》等。①

该教规定,凡年满 20 岁诚心信奉该教者,经道友二人介绍即可皈依。该教注重精神治疗,除自身行功外,还以无形针、掌光、经穴等法为人治病。也注重内功修持,以“二十字心花守则”修炼身心,外功已深则兼修内功。教内采取教团制与社团制合而为一的方式,在教团方面设有总开导师、开导师、皈依弟子等教阶;在社团方面,以资深弟子为理事长、理事监事与职员。

天帝教

天帝教是从天德教分化、发展出来的一个会道门组织,由天德教教主萧昌明的大弟子、台湾前“立法委员”和《自立晚报》发行人李玉阶在天德教基础上创立的。李玉阶原名李鼎年,道号“涵静老人”,江苏吴县人,1949 年全家赴台湾,1951 年起接办《自立晚报》,后因不满当局对新闻自由的干预,退出该报。他早在 1930 年就皈依天德教,成为教主萧昌明的首座弟子,被封为“十八真君”之首。1932 年在上海建立“宗教哲学研究社”,奉萧昌明为“师尊”,发展道徒到台湾后,初与王笛卿、王德溥等传布天德教,曾在王德溥的“天德圣教”总会担任副主任委员。1978 年,李玉阶与王笛卿、王德溥分手后,自立“中华民国宗教哲学研究社”,1980 年 12 月 21 日正式创立天帝教。该教具有鲜明的反共政治色彩,宣称其教义之内涵,“与三民主义思想有融会贯通之处”,其使命之一便是“确保台湾复兴基地,实现三民主义和平统一中国”。在该教各级教院内,随处可见国民党的旗帜,甚至把蒋介石尊为“中山真人”。正因为该教具有强烈的亲国民党色彩,被舆论界认为是“国民党外围宗教”,所以即使在台湾“戒严”期间,该教的传教活动仍然可以得到当局的准许,并在 1982 年 2 月 15 日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批准。1987 年已经拥有信徒 15000 人,后来发展到约 10 万人,被台湾

① 戴康生主编:《当代新兴宗教》,东方出版社,第 396 页。

当局确认为“十大宗教”之一。该教崇拜的神祇“天帝”，即“世界各地至今统称之上帝”。李玉阶自称是天帝“驻人间首任首席使者”，由他“代天宣化”该教的教义：“以生生不息，体天心之仁，亲亲仁民，仁民爱物为中心思想。”要求信徒先尽人道，再修天道，进而“修持身心性命妙道”，以达到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和宇宙为家的目标。该教认为天帝宇宙大道乃是教化之根本，故该教以“天帝教”命名。该教分为五级五院，最高为“始院”，洲级为“统院”，国级为“主院”，省级为“掌院”，县级为“初院”。各院内部又分为五级，即“院教”、“副院教”、“三教长”（参教长、赞教长和督教长）、“三中心”（道务、教务和管理）和各典四司、各司。该教信徒皆有“道名”，男女分别以特定的字排叙教内辈分，信徒互相间称“同奋”，表示共同奋斗。该教的教职有极院系统的“辅教”、“翊教”等15级内职和弘院系统的“导师”、“统教”、“主教”、“掌教”等外职。该教的日常修证功课主要有：反省忏悔、祈祷诵诰、力行教则和填奋斗卡。各院、堂每周举行会祷会座、亲和集会。每年在天极宫分期传授“正宗静坐”，为民众提供所谓以“天人气功”为主的“精神治疗”。该教十分热衷于扶乩降神活动，教首常借所谓“神谕”来表达自己的主张。1994年李玉阶故后，由其长子李子弋接任“首席”。[①]

红卍字会

台湾的红卍字会又称“世界红卍字会台湾分会”、“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是1948年由大陆传入的一个会道门。红卍字会原是1921年在山东滨县创立的会道门“道院”的一部分。山东济南解放前夕，当地的红卍字会派在上海的红卍字会成员张子旦前往台湾，同已经在台的红卍字会成员、辽宁黑山县的张安瑾一同在台筹办台湾的红卍字会。1949年秋，便在台北市成立了“世界红卍字会台湾分会”。该会以办理慈善事业的名义，先后在台北、台南、高雄和嘉义建立分会，发展组织，以后又在台中、基隆等地，设立分会。总会则设在台北市，设理事长一人，常务理事一人，总干事一人，理事若干人。1990年以后担任理事长的陈重光，曾担任过台湾省议员、台湾协荣航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海运总处理事会主席、台北轮船联谊商业同业公会理事和台湾“中华奥委会”副主席等社会职务。

① 戴康生主编：《当代新兴宗教》，东方出版社，第398—400页。

二、香港的会道门

1. 一贯道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贯道尚未在香港形成有组织的活动。大陆解放后不久，便开始取缔一贯道等会道门，许多一贯道头目纷纷逃往处在港英当局统治下的香港。1950年初，一贯道“师母”孙素贞在台湾国民党“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的策划下，由道首齐铭周陪同，从大陆逃到澳门，然后来到香港。鉴于一贯道在大陆已经声名狼藉，遂将一贯道改名为“天道”。不过，“天道”一时未能在港英当局那里取得合法地位，只好暂时用“香港道德善堂有限公司”的招牌进行活动，并且向港英政府以慈善事业的名义进行注册，并且把“总堂”称为“总公司”。

香港的一贯道最初在总坛之下设立了18个支线（组），并且出版宣传一贯道的印刷品，举办训练班，调集“前人”、“讲师”进行讲道等活动。不过，香港的总坛实际上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络性组织，各个道坛皆自称某某“道德善堂”，点传师对外称为“经理”，如遇重大事务，则由总坛召集各支线的“前人”进行协商，各支线（组）的道务，皆自行负责，互不干涉。总坛设有董事会和正副会长、董事长，最早的会长由一名与香港总督关系密切的国际知名医生担任，该会长死后，由汪有德继任名誉会长，实际工作由会长吴静宇，副会长施定方负责。

一贯道在香港的18个支线中，比较活跃的有以下一些：

浦光组

1949年上海一贯道点传师王永和逃到香港后，投靠当地的叶云生，建立了辅善坛。

随同王永和从上海来到香港的一贯道骨干，还有周至达、袁金宝等18人。他们来到香港后，因为生活困难，难以开展道务，除王永和、周至达外，大部分自谋出路，脱离了一贯道。浦光组在香港设有辅善、慈航、大明等三处佛堂，辅善堂还专门设有为大陆赴港道徒的接待处。

宝光组

上海宝光坛的点传师施定方逃到香港后创办的。主要由来自浙江绍兴一贯道归真总坛的点传师陈宗惠、陈宗芬等负责，在香港创立了许多坛堂，与台湾

的宝光组有密切联系,并向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发展。

基础组

由原上海基础坛的苏守信、陈义善、朱文仙等人到香港后创办的,有较强的实力,并且在海外设有多处坛堂。

兴毅组

由原来天津的兴毅组在香港重建的,据称在新加坡建有坛堂,并且同台湾的兴毅组有密切关系。

明光组

浙江宁波一贯道明光坛的马毓林在香港开办的,马死后,由施定方继任领导。

常州组

由原江苏常州、武进一带一贯道前人王璋德、吴萼伟(吴锡基)等人于大陆解放初期逃到香港后建立的。王璋德,女,1901 年生,在大陆时曾任一贯道江苏常州总坛的负责人,她与一贯道"师母"孙素贞过从甚密。1950 年夏,伙同其夫吴祖荫等道首,带领"天才"胡会玲、顾莲莲等来到香港办道。吴萼伟,1909 年生,江苏武进县人,1939 年在上海加入一贯道,1942 年回到常州办道,吸收道徒 10 余万人,曾任一贯道常州总坛崇华堂总点传师。大陆解放时,他逃到香港,利用办道骗得的黄金、银元,在九龙开办"光明灯泡厂",以该厂为据点,开展道务活动。后来吴萼伟移居美国,改信基督教,该组道务遂由王璋德主持。总堂设在"博德佛堂"之内,以"竹林明堂有限公司"的名义向港英当局注册,公司下设 1 个安老护理院和 6 个中心佛堂。

2. 天德圣教

天德圣教是由四川乐至县人萧昌明所创立,曾在安徽黄山设有芙蓉居总堂。解放初,该教总坛迁往香港,在九龙青山寺开设"宗教哲学研究社",由萧昌明妻子主持道务,据称该教在香港约有 4 万信徒,设有"天德圣教社"和"天德圣教联合会"。

3. 先天道

先天道托名清代雍正年间江西饶州人黄德辉所创立,实际上是由青莲教分

裂演化而来，何时传入香港已不可考。香港的先天道道首是保恩级[1]的李永意，分设70多个庵堂，重要的有成德堂、育津堂、善志堂、志和堂等。

4. 真空教

该教又称真空道、廖祖教等，是清代同治年间江西赣州寻乌人廖帝聘所创立。1904年江西会昌人朱秀渠来到香港，在商人何到良所开商店建立道坛发展信徒。1920年，广东五华县人李定浩来香港建立"复本原道堂"。次年朱秀榘又在九龙创办"明德坛"。1926年兴宁人杨善三在九龙创立明德堂。1936年，广东惠阳人涂道信在筲箕湾开办"旋光性坛"。广东惠阳人严道云于1938年创立真灵堂。1947年，朱秀榘的再传弟子梁二姑创办光明堂。[2]

① 该教教阶有十地、顶恩、保恩、引恩、证恩、天恩、众生等。

② 罗香林:《流传于赣闽粤及马来亚之真空教》，香港中国学社，1962年，第173—174页。

第九章　同善社

同善社是民国年间一个重要的会道门，其名声仅次于一贯道。

同善社与一贯道"本是同根生"，它们都来源于晚清时期的秘密教门——青莲教。青莲教瓦解后，教内群龙无首，一些骨干纷纷自立门户，争相充当继青莲教的"第十四代祖师"。同治二年，四川广安人黎晚成（一作黎国光）自称"第十四代祖师"，并且在四川创立"礼门"。1909 年，四川永川人彭泰荣继任礼门首领后，于 1917 年改礼门为"同善社"。彭泰荣掌道期间，正处于清末民初秘密教门向会道门蜕变的时期，也就是从秘密教门，蜕变为以军阀、官僚、地主、富商为社会基础的会道门。

一、清末"礼门"在民初向同善社的演化

同善社与一贯道有着共同的渊源，也是由清代的青莲教演化而来的。青莲教在林依秘掌教时期已经分裂，许多人自称继徐继南、杨守一之后为该教的"十四代祖师"，除正宗的青莲教尊彭依法为十四祖外，还有归根道的曾圆明，礼门的黎晚成（同治二年黎晚成从青莲教分裂出来，创立"理门"（礼门），后来称同善社）皆自称"十四代祖师"。礼门在黎晚成之后，又于清光绪六年（1880）尊袁世河为十五代祖师。据同善社内部流传的《历代祖派修正补遗》记载，清宣统元年（1909），由彭泰荣继任为十六代祖师。清末民初，在彭泰荣任道首时，把名称从"礼门"（当时又称"孔孟圣教"）改为"同善社"，性质上也从清末以下层群众为主体的秘密教门，蜕变为军阀、官僚和失意政客为骨干的会道门。

彭泰荣（1873—1950）字汝尊，号述古老人、龙凤山述古老人、回龙述古老人、清净自在道人、无极燃灯佛等。社内尊他为"统道师尊"、"回龙师尊"，他还自封为"清净自在无极燃灯佛"。彭泰荣祖籍湖南邵阳，后迁居四川，至其父时

已经是第六代。清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十日(5月6日)彭泰荣出生于四川省永川县红炉厂,1926年全家迁往大足县龙水镇的郭家塘。彭荣泰自幼读过私塾,是个应试不第的人。早年参加过先天道,拜袁世河为师,1903年在綦江县赶场时,经郭恒炳介绍加入"礼门"。1909年他自称"得道",受命于天,成为"礼门"(对外称"孔孟圣教")的教主,自封为礼门的"十六代祖师"。据礼门初期的号子之一、荣昌县天锡公号第四任号首何举卿记载:"彭汝尊(即彭泰荣)永川红炉厂人,教过私塾,曾在綦江由郭炳恒(应为郭恒炳——引者)、郭尊荣和慈音佛三人点体传道。1912年,彭忽自称受命于天,当为教主。从其学道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徒众呼他为'统道',又有'无极宫统师'和'师尊'等名称。他就成为十六代祖师了。"[①]彭泰荣的同乡、1918年加入同善社"国学专修馆"学习的二层道徒刘宣等记述说:"大概在1911年前后,彭汝尊(泰荣)自己宣称他得了道。原来他在光绪末年在綦江县赶水场入了郭怀炳的教。郭就是他的传道师,证道师是李成平的母亲,过渡师是张文远。郭传的是什么道?无人知道,但彭汝尊因为读过几本旧书,就妄称是什么周公、孔子之道——中庸之道。这正投合当时社会充满封建思想的落后群众的心理,因此有很多人相信他。就在永川县的红炉厂、新店场、大足县的龙水镇等地开始传播了。特别是那些清朝遗老,如举人、拔贡、廪生、秀才之类的人和一些大小地主纷纷加入。"[②]

"礼门"是从先天道演化而来。清同治二年,先天道的"第十四代祖师"黎晚成(黎国光)从先天道脱离出来,另立教门,他以"大道无名,强名之曰礼门"。[③] 所以,礼门的组织形式和道义教规,均沿袭了先天道的一套。"礼门"最初仅仅在四川的成都、重庆一带流传,先后建立了5个善堂,称为5个号子。"一曰复兴公,号首周北才,邓宗舜、袁华封副之;二曰永兴公,号首谭紫云,刘维贵副之;三曰长兴公,四曰德兴公,五曰席珍阁,正副号首均未详。"[④]光绪六年,黎晚成被清廷捕杀,由弟子袁世河继承其"祖师"的职位。袁世河于光绪六年三

① 何举卿:《关于同善社反动内幕的一点补充》,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7—198页。

② 刘登选:《同善社在四川内幕一瞥》,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③ 何举卿:《关于同善社反动内幕的一点补充》,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7—198页。

④ 杨觐东(毅一子):《组派修正补遗》,江苏应记水天华馆刻本,1929年,第5页。

月(1880年4月)在成都继任为“礼门”的“十五代祖师”。袁世河在执掌“礼门”教权后,设立了5个号。本号称“致中号”,号首证道胡慧贞;设“致中祥号”于汉口,号首阐道袁世海;设“致和祥”号于壁山,号首吴宝田;设“致祯祥号”于长寿,号首朱清源;设“致成祥号”于荣昌,号首郭恒炳。光绪十二年(1886)后,袁世河将道权交给胡慧贞代理。① 胡慧贞是四川省綦江县人,于光绪十二年代理祖师职位,于1909年去世,共掌道8年。

胡慧贞去世后,礼门内部群龙无首,彭泰荣遂自称“得道”和“受命于天”,自封为教主,于1912年把总部设在四川省永川县,称为“洪信祥总号”。据《祖派揭晓》记载:“行至庚子(1900)天下大考,礼门无主。辛丑(1901)始有郭富臣先生开坛,选送玄裔,人多滋疑。初会燃灯佛又来,三期道运洪开。岁已酉(1909年)慈音佛奉天命,授统于我回龙师尊。”②为了在当地立足,彭泰荣竭力拉拢驻军首领入道,并且尊四川总督赵尔巽为该道“护法”。1910年清朝覆亡前夕,“礼门”传入北京,彭泰荣也在弟子曾奎生引见下,见到了宣统皇帝,并结识了一批王公贵族,被允许在全国传道。民国成立后,该道继续拉拢权贵,以便继续流传。1914年彭泰荣派弟子、曾任北洋军参谋总长的贺静安沿长江南下传教,在上海成立“天齐宫号”。在北京又把北洋军阀政府陆军部中将咨议姚济苍拉入社内,并委以重任。1917年11月6日,由姚济苍等18人发起,将“孔孟圣教”正式改名为“同善社”,并且向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请立案。在呈文中大肆攻击辛亥革命,说:“我中国自辛亥改革以还,于今六载,天灾人祸,纷至沓来。各省人民,流离迁徙。其痛苦颠连之状,即遍绘流民之图,亦莫能方其万一。”因此,要“救正人心,挽回天意”而成立同善社。由于当时的内务部长朱启衿本人已经加入同善社,因此,同善社的呈文在4天之内就被批准了,北洋政府内务部还通令各省对同善社予以扶植。于是,大批军阀、官僚和地方豪绅纷纷加入,并充任社内骨干。如湖南督军彭廷衡入道后担任同善社湖南省社的社长;1918年,湖南省主席赵恒惕、督军张敬尧相继加入同善社。其后,湖南省督军兼省长谭延闿也加入并担任该社的名誉社长。湖北省督军萧耀南入社后也担任该省同善社名誉社长;担任过广东省省长的李开侁为湖北省首任社长;1924年,又由

① 杨觐东(毅一子):《组派修正补遗》,江苏应记水天华馆刻本,1929年,第6页。

② 杨觐东(毅一子):《祖派揭晓》,上海明善书局印,1933年,第8页。转引自陆仲伟:《同善社》,社会问题研究丛书,(内部资料)。

武汉警备司令陆沄为湖北省的社长。浙江省同善社社长则是该省省长张载阳；山东省社长是该省财政厅长杜尚；河北省同善社社长是曾经担任过山东省长韩复榘手下师长的张秉干。在东北，同善社得到军阀张作霖的允许，得以在吉林、黑龙江设立省社。[①] 有人估计当时入社者多达百万之众。

同善社迅速恶性膨胀，究其原因，与该社宣扬“大劫将至”和“坐禅”（修炼气功）可以延年益寿密切相关。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政坛风云变幻，一些官僚政客的命运，朝不保夕，大有劫难将至之感。他们希望通过加入该社，修身养性，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同善社宣扬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目的是为了复辟专制帝制。该社头目宣称：民国乃是“乱世”，是“混世魔王当道”，是“众生劫运之年”。因此，只有加入同善社，勤修内功、外功，才能免除劫运，等到弥勒古佛下凡，武圣帝君、伏魔大帝就会出来把所有魔王收服，扫平劫运，让降生尘世的弥勒古佛当皇帝，创造永远幸福的太平盛世。

同善社为了巩固全国的组织，彭泰荣让大弟子雷应霆于1920年在汉口召开各省负责人开会，成立“合一会”，对外称“同善社总事务所”，彭泰荣亲往主持，把全国各地的同善社统一起来，同善社进入极盛时期。1923年，同善社在华北、华东、华南及东北等地，共设立了37个省一级的“号”。甚至还发展到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彭泰荣自己也十分喜悦地说：“吾受命以来，虑九二原人无由上岸，始挂出同善社招牌，不数年，遍及二十二行省及特别区域，均已次第成立。现在方方有人，可谓极一时之盛。”[②]

同善社在各地大量发展信徒，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引起了各地先进知识分子的不满。1921年春，湖南《湘潭日报》发表署名黎明的文章《辟同善社》，指出：“现在我们乡里，居然也有一个同善分社了。”他们“每每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几个名字挂在口头，这就叫做重五伦，讲道德，并说六经外之五奇书。”大肆宣扬迷信，弄得乡人“奔走若狂，日日讲求仙术为事”。这篇文章惹恼了当地的同善社头子，企图勾结当地官员查封《湘潭日报》。但是，该报却得到了《新青年》的支持，该刊不仅全文转载了黎明的文章，还发表了陈独秀为此事致读者的

① 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陆仲伟著：《民国会道门》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4页。

② 《回龙师尊普度语录》（下），上海宣化书局，1935年，第15页。

公开信，指出："我在北京时，就听得同善社有许多妖邪举动，后来便知道长江一带信奉邪说的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就是广东现在也有不少了。""主持同善社事宜者，全是有形无形的旧分子，信奉其邪说者，皆为政界军界中极为腐败的分子，在劳动界、学生界中信奉其邪说者乃极其少数，甚至完全无有。和灵学会比较起来，这种邪说的野心有过之而无不及。简言之，这不只是白莲教、义和团的后身，更包含了复辟作用。"①

由于同善社大肆宣扬封建迷信，而且与军阀势力相勾结，在全国拥有相当大的实力，成为全国统一的障碍。因此，在1927年被北伐军下令取缔，湖北号首陆沄波被处死，部分首领被逮捕，彭泰荣只好潜回四川大足县龙水镇，同善社也转入地下，进行隐蔽活动。北京的同善社总社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省级分社一律使用商号名称，县级分社改称"先觉祠"。通信也使用商业用语，如"东家"、"掌柜"、"经理"等。不久，同善社又恢复了元气。1929年，彭泰荣看到全国已经拥有几百万信徒，又有一大批骨干分子，于是又萌发了称帝的政治野心，阴谋举行暴动。为此，他把自己说成是受"天命"下凡拯救世人的"燃灯古佛"的化身，在道内宣扬"皇帝即将出世，同善社大道光明不远"和"天下大乱，真明主潜于西川"。他还写了一副对联，来表达他希望登极称帝的野心：

"紫薇到四川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有院都成福地；

皇极亲九族乃文乃武乃圣乃神无人不拜次天真。"

彭泰荣这时俨然以紫薇星临凡的神人"皇极天真"自居。同年，同善社上海副号首朱祝封在无锡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宣称："三期浩劫马上就到，现在弥勒佛已经降世凡间，是将来的皇帝。先派松勒子做扫荡神、开路先锋，但需要集资帮助。"于是，发动各地同善社组织为真命天子登极而筹措资金。彭泰荣本人也制造了皇袍、宝剑，准备登极称帝，结果被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觉予以取缔，并下令通缉彭泰荣和各地的号首，同善社被迫再次转入地下。1933年，潜匿在四川永川县的彭泰荣，又企图利用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登极称帝的野心。他派儿子彭宝善潜赴东北长春，拜见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表示愿意为伪满训练几百万"神兵"，并且与日本关东军建立联系。1935年，彭宝善奉日本特务机关和溥仪的密令，返回四川，将与日本侵略者建立联系的事报告给彭

---

① 《新青年》第9卷第四号，北京人民出版社。

泰荣。彭泰荣即密令各地同善社加紧拼凑武装,训练"神兵"。[1] 事情被国民党当局获悉,同年九月,南京国民政府再次下令通缉彭泰荣。彭泰荣被迫逃到大足县隐匿,从此不敢再公开露面。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彭泰荣也进一步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1940 年,彭泰荣潜往湖南,与汉奸汪精卫的代表秘密接头,来到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北平,把众多的汪伪高级官员拉入同善社内。彭泰荣为了实现登极称帝的政治野心,还在北平召集各省市的号首和骨干开会,要求大家把各地原有的大刀会武装控制起来,没有大刀会的地方,要设法建立大刀会,并且在发展同善社的同时,发展大刀会,以加强同善社的武装力量。[2]

二、同善社的主要歪理邪说

1. 供奉的神祇

首先是无生老母。

同善社来源于清代的青莲教,所以供奉的神祇首先也是"无生老母",也称"无极老母"或"瑶池妗母",全称是"瑶池慈音佛消劫行化圣母元君"。无生老母被尊为主宰宇宙的唯一主神。

其次就是弥勒佛。

明清以来的秘密教门均信奉"天盘三副"说,把"现世"说成是充满苦难的红阳劫期的末期,将有弥勒佛下降尘世,在人间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白阳世界",因此,期盼弥勒佛降生救世,乃是所有秘密教门和会道门的共同信仰,同善社既然信奉"天盘三副"和"三期末劫"说,自然也要崇奉弥勒佛。

最后就是彭泰荣本人。

他自称是燃灯古佛的化身,是到尘世协助弥勒佛救度九十二亿皇胎儿女的救世主,他在《回龙师尊普度语录》中说:"古佛化身,名山隐迹,道掌无太皇三极,理合儒释道一家,普度九十二亿皇灵,共证无生之妙果,提醒三千六百外道,同登上品之莲台。无古无今,不生不灭,神光默默,为天地人三曹之恩师,法相堂堂,作统正阐三盘之主宰,大悲大愿,至圣至仁,天梯山中,回龙宅畔,无量度

① 蒲文起:《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30 页。

② 连立昌:《福建秘密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301—302 页。

人,情境自在,燃灯化身,无极上圣,统道降世天尊。"[1]他在1935年1月17日发出的《牌谕》中自称:"受命清静自在无极燃灯佛,为大劫临头,特申原委,晓谕诸神,保护人民事。照得洪信祥号,懿旨出自瑶京,多蒙七圣保本,命我下凡度人,须知此身非我,我即古佛燃灯,奉命代天普度,普度九二残零,当急申文礼谢。礼谢列圣鸿恩,掌握三盘大事,阴阳两度扫清。"[2]如此,彭泰荣(燃灯古佛)就同无生老母、弥勒古佛成为同善社供奉的三位主神了。

同其他会道门一样,同善社也标榜崇奉儒释道三教合一,向道徒们宣扬:"天下儒释道是一家",提出"用儒教的礼节,做道教的功夫,证释教的果位",要用儒家学说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来劝善规过,正心修身。所以,同善社崇拜的对象涵盖了儒释道三教的主要神祇和神话中的人物。主要有:佛教的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来佛、观世音;道教的玄天上帝、太上道君、玉皇大帝、文昌帝君、太乙无量天尊、吕纯阳;儒家的孔子、孟子。还有秘密教门创造的无生老母,以及关羽、岳飞、张飞等。1932年,彭泰荣在所著的《了道真经》中,罗列了该道供奉的主要神祇,并分别加上尊号,计有:无极燃灯佛、太极释迦佛、皇极弥勒佛、觉皇如来佛、太上道君、大成至圣文宣圣王(孔子)、玉皇大天尊、瑶池慈音佛、文昌帝君、孚佑帝君(吕纯阳)、忠勇桓侯大帝(张飞)以及关圣帝君(关云长)等。[3]

2. 所谓的"道统"

同善社与一贯道皆来源于青莲教,因此其道统基本上沿袭青莲教的"道统"。不过,1923年冬,彭泰荣指示弟子毅一子(杨觐东)对先天道的《祖派源流》加以修改,编成《祖派修正补遗》,否定了原来青莲教系统各派道统中有关七祖白玉蟾、马道一和十三祖徐继南、杨守一双承的说法。将道统改为:"东土以达摩为初祖,传慧可大师,并衣钵示欣,是为神光二祖;二祖传僧璨大师为普安三祖。三祖传道信大师,为曹洞四祖。四祖传弘忍大师,是为黄梅五祖。五祖传六祖惠能。""六祖传孙七祖敷仁,道传火宅,释终儒起。""罗八祖蔚群,晋时人,咸和中入蜀访师,遇太上传以道法灵文,隐显莫测。八祖后道统中断800年,至清康熙间黄九祖接罗祖心源,阐道洪都。九祖传吴十祖紫祥,十祖于有缘

---

① 陆仲伟:《同善社》,社会问题研究丛书,2005年,第64—65页。

② 陆仲伟:《同善社》,社会问题研究丛书,2005年,第65页。

③ 彭泰荣(述古老人):《了道真经》,壬午年刊刻,第10—12页。

寺遇何十一祖，传授大道，后遭黄风颠考，遣发贵州龙里。十一祖传袁十二祖志谦，十二祖传杨十三祖还虚。杨祖名敬修，四川新都人。"然后又增加了第十四祖黎晚成，十五祖袁世河，十六祖是彭泰荣。[①] 以便为彭泰荣继承"道统"制造依据。

3. **主要邪说**

同善社的主要邪说和一贯道基本相同，也是鼓吹"三期末劫"，只是具体说法稍有差异。

他们宣称：人间共有96亿生灵，在上古时期的水劫和中古期的火劫，已经有4亿被度回天宫，还有92亿生灵，尚留在尘世。如今正处于下古期，也就是现代的"风劫"，将有"邪风吹来"，导致"万物皆无"。只有加入同善社，才能"避此劫难，得升天宫"。在彭泰荣弟子唐光先撰写的《破迷语录》中写道："九六原人，丹经诸书，言之屡矣。每亿祗有一千一百二十五，和九十六亿，共计十万八千之数。九六原人本是天地精灵之气，犹如人身上十万八千毛窍一样。"[②]

同善社为了反对民国的世俗政权，大肆宣扬民国是"乱世"，是"混世魔王当道"，是众生的劫运之年，因此，只有加入同善社勤修内外功，才能够免遭劫运。并可等待弥勒古佛派遣伏魔大帝来尘世扫除一切魔王、魔鬼，重建太平盛世。那时，将有真命天子登极，恢复一切大道，重新开科取士。反映出彭泰荣企图推翻民国世俗政权，恢复专制王朝，恢复科举制度的梦想。该教标榜"三教合一"，还把佛教的"三皈"说成是道教的"三清"和儒家的"三纲"；把佛教的"五戒"，说成是儒家的"五常"。把儒家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作为基本信条，把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社员必须遵守的规约。

同善社为了吸引更多的信徒，采取针对不同对象，宣扬不同内容的办法。如知识分子大多相信孔孟之道，他们便宣扬忠恕、修治齐平；对于地主阶级和士绅商人等富裕阶层的人，则宣扬入道可以"祛病延年"，永远富贵；对于失势的军阀官僚，则宣扬入道可以重新获得失去的权力与地位，飞黄腾达。所以，同善社中知识分子多，商人地主多，失意的官僚政客多。

4. **主要"经典"**

同善社的主要经典，多出自彭泰荣或其弟子之手。据陆仲伟先生的搜集，

---

① 毅一子：《祖派修正补遗》，江苏汜水天华馆印，1929年。

② 转自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了道真经》

又称《佛说三教归一了道经》，由彭泰荣本人撰写，署名“龙凤山述古老人”，1932年刊印。彭泰荣要求徒众们朝夕念诵，声言“凡奉是经，所求如意：若求婚姻，佳偶天成；若求子孙，兰桂呈芬；若求寿年，鹤算延绵；若求富贵，福禄永锡；若求平安，吉庆相连；若求学业，成就奇特；若求祛病，灾厄不浸；若求解冤，怨憾永泯；若求吉地，风水俱利；若求超升，玄祖拔灵”。总之可以达到心想事成的效果！

《回龙师尊普度语录》

为彭泰荣讲道演说及往来信件、诗词等，由弟子记录编辑而成，1945年刊印。上卷载有彭泰荣的题词4幅、“宝诰”、诗以及“师尊(修道)十要”、“道之规律内”和统号开张令记录等；下卷包括“应时参道秘语”15篇、宝塔歌4篇、宣言1篇、牌谕3则、禅语3则、函牍12篇、联语120篇、《食人丹纸烟有害功程进步说》一篇。此为同善社最重要的“经典”。

《同善社章程》

由姚济苍等人起草，经彭泰荣修改审定，有多种版本。内容包括：同善社简章、社员规约、执事规则、同善社组织规则、社员名单表式、社员乐捐表式、发起人题名录、代表人履历表、职员履历表、同善社成立通告表、同善社事务所组织规则、事务所图章模式、营造尺寸标准、事物所成立通告表、省社核准事物所按季汇报表，以及附录：同善社总社成立的立案呈文、京师警察厅批文、各社立案呈文简章举例等。

《佛堂规则合编》

彭泰荣编，又称《洪炉大冶洞天收圆佛规五十二条》，内容包括：各号机构职责、规定各号内分文牍、收支、稽核、外务、内务、宣传六科；祀神之日要斋戒沐浴，另设祖师香位；拜佛陈供的礼仪；从初层众生到八层顶航的职责及恩职人员外出办道的规则；道金收支结算等。

《续定佛规》

共计6章48条，第一章“职任”，规定统号职权，立号安堂，做道场庶务等之分工；第二章“选法”，规定从初层众生递升三层众生的原则。第三章“体理”，按八卦五行说授以九层到十层两仪名称，因人而异，传授坐功。第四章“仪则”，

为朝贺仪节及顶礼作揖的规则。第五章为“赏罚”，第六章为“款项”，是有关道金收支的规定。

《甲申年(1944)新定佛规》

彭泰荣著。彭泰荣带领各省号骨干至山东曲阜登泰山，首先抒发对孔孟的感情，接着规定各恩职人员的职责：“自今而后，凡天证引保(即天恩、证恩、引恩、保恩——引者)各细心于进道之人，见贤焉，然后引之、保之、证之开之。至于升降，是三才四相之责也。发恩(即授以恩职——引者)、顶航、十地之责也。调和(即授以静坐功夫)五行之责也。”

《祖派修正补遗》

毅一子(杨觐东)著，1929年刊印。此书系由彭泰荣授意，经贺静安审定，最后由彭泰荣核发。所述同善社的“祖派源流”中，从初祖到五祖，均系抄自先天道的《祖派源流》一书，仅将其中的七祖白马改换为孙敷仁，把十三祖徐继南、杨守一，改为杨还虚。并且把十四祖改为礼门的创始人黎晚成，十五祖改为袁世河。

《祖派揭晓》

《祖派修正补遗》的另一种版本，书中除叙述历代祖师外，专门对罗蔚群究竟是晋朝人、唐朝人还是明朝人作了考证。

《同善社传单汇编》

为北京同善社总社发出的档、信函编辑而成，包括总社发给各省市县分社下达的指示和要求道徒遵守的规则，共计53篇。

《问道指南》

编者署名“了因山人”和“果圆居士”，1924年元旦北京天华馆刊印，全书以问答的形式讲解同善社的道义宗旨，宣扬同善社以“劝善规过为正宗，以正心修身为要旨，以静坐养道为功夫。一不在外募捐，二不强人入社，三不设立乩鸾，四不妄谈祸福，五不评说是非，六不争论长短，七不植立党派，八不干预外事”。

《修行十要笺注》

1924年10月24日，彭泰荣给北京总社总理姚济苍写信，订修行十要：一要心正，二要功高，三要德厚，四要师明，五要依法，六要勤修，七要请益，八要和平，九要精固，十要神团。该信内容由西昌果圆居士逐条加以笺注后，被用做同善社会员修持的经典，于1925年初由北京天华馆刊印。

《回乡语录》

由同善社内“十一层四相兼扬州、上海号首唐光先在原籍江苏盐城24次讲演记录稿的汇编”，主要讲述修道要义及坐练气功的方法，阐述修道者要首重伦理、练心，立志培德，及八德与内功的关系。

《还乡直指》

唐光先以“庵头陀”的化名所著，由彭泰荣题写书名，讲述学道之人的修炼要义和方法，共计55条，阐述学道者要有恒心，扫除杂念、色相、看破财力，不贪酒色荣贵，戒杀放生，慎风寒，节饮食。

《破迷语录》

唐光先以“庵头陀”的化名所著，讲述修道先要抛弃“名利恩爱酒色财气”八字，要“首重八德，戒杀放生，诵经习静”，做到“一心一德，以道为己任”，便可以“久久自然成道”。书中回答了弟子们提出的26个问题。如“三期末劫为何在午会?”“修道之人如何修而有成?”等，不仅阐述了同善社的宗旨，而且宣扬了彭泰荣的思想，因而得到彭泰荣的赏识。

《惜字证验录》

唐光先于1933年奉彭泰荣之命而编成，成书后由彭泰荣作序并题写书名。主要是要劝告人们敬惜字纸，主要内容有：劝惜字文、劝惜字纸说、习字法、奉劝各界惜字63条，亵字罪29条。祸福因果报应事例80条，每条写成文字，制成图解，讲述惜字得福，亵字得祸。

《唱道真言》

全名是《唱道直言真诠》，楚州通宵子著，同善社汉口合一会印发。分为上、中、下三卷，主要内容是阐述修炼静坐功夫，上卷讲练功的原则：第一要“断缘简事”，第二要定心，第三要真观，第四要泰定，第五要发慧，第六要得道。中卷是有关炼丹理论的论述，下卷是炼丹的步骤：第一营静室，第二办肯心，第三屏众缘，第四学打坐。是同善社传授静坐功夫的系统论著，也是恩职人员必须熟悉的基本功。

此外还有许多前人的著作，如明代袁黄的《了凡训子书》；清康熙年间普润道人的《玉符直指》；清乾隆年间柳华阳的《金仙证轮》、《慧命论》；清光绪年间

云上烟波氏的《三教合参》等。①

三、入道手续与道务活动

1. 入道手续与等级制度

同善社为了发展组织、扩大势力和达到控制信徒思想的目的，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入道手续。声言入道乃是"人生第一件大事"，因此，凡入道者，"必须预先平心静气，革面洗心，到社里虚心请教"。加入同善社必须由本人申请，需有两名道徒介绍，再由"引恩"领进佛堂，由"保恩"担任"保举师"，"天恩"担任"开示师"。入道仪式一般选在举办龙华会或菩萨诞辰举行。入道的具体手续是：先由要求入道者填写"愿单"，再由"天恩"主持拜佛仪式。新入道者跟随"天恩"跪在蒲团上叩拜，由"保恩"带领求道人宣读愿词，也叫"誓牒"："今有弟子某某某带领众生某某某，虔心跪在清静自在无极燃灯佛道统师尊莲台下，誓愿皈依圣教，五伦常讲，八德永敦。如轻贱佛法，私送人情，甘遭五雷劈身。"②

"誓牒"添好后，进行宣誓：求道者进入佛堂后，先要交纳"护道金"即入道费，再由天恩开示师主持上香礼，行拜佛仪式，司仪令求道者站在佛堂中央蒲团后面作一揖，叩四个头，上三炷香。这时由保举师领求道人宣读誓牒，然后由保恩把愿词焚化，再由天恩给求道者求准拈阄。实际上事先已经对求道者进行过考核，如认为求道者已经合格，在两个纸阄上皆写成"准"，否则皆作成"空"。如拈到空，则下次再来。如拈到"准"，便由天恩进行"点道"。具体做法是：天恩手执三支点燃的檀香，在求道者两眉之间点一下，称为"玄关一窍"。接着传授"十字真言"，即"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然后再由传道人员讲授五伦八德等道义，并且由天恩传授坐功运气的静坐功夫，分为七步：

第一步盘脚。练习者坐在蒲团上，或者卧在床上，右脚在内，左脚在外（或者相反），双手放在膝盖上，上体和头部伸直，端坐，先平气，两眼平视。

第二步扣合同。右手在外，左手在内，右手拇指尖按在左手无名指的第三节上，左手拇指尖按在右手中指的第一节上，其余手指均并拢微屈，扣成一个太

① 陆仲伟：《同善社》，社会问题研究丛书（内部资料），第85—100页。

② 陆仲伟：《同善社》，社会问题研究丛书（内部资料），第111页。

极图式。

第三步闭目回光返照，又叫作“垂帘”。练习时双眼微闭，留一线不闭拢，右眼向左视，左眼向右视，要求微视“性宫”即玄关窍。

第四步屏息。收耳意听根源，将嘴唇闭上，呼吸调节匀称，要收闭耳窍，不为外界声音干扰。

第五步叩齿。将上下牙靠近，轻轻接触扣击。

第六步搭桥。即舌抵上腭，收舌天桥搭定，将舌头微顶天堂。

第七步守窍。要收心，意守“玄关”或“丹田”，把心思平静下来，不乱想，集中注意力，守住所点的“窍门”。①

同善社在江苏一带把静坐功夫简化为四步功夫：

第一步休息——静坐在蒲团上，去掉杂念，调匀呼吸，不闭口，不盘足，不扣手，两足略伸直，挺直腰，头稍仰。

第二步平视——先盘右足，再盘左足，胸部挺直，两手搭膝，双目微启，平视收神，平视只限三尺，略守窍，闭口，头稍仰。

第三步守窍——即守“玄关”，玄关位于两眉之间，要求扣手，形成一个太极图，左手拇指与无名指尖接合，右手包住左拳，右手拇指抵在左手无名指的末关节上。嘴唇紧闭，牙合紧，舌抵上腭，两眼微闭，回视人中，胸挺直。

第四步下丹——缓缓开眼，开口，松手，松足，守窍结束。②

同善社要求信徒每天子丑寅卯四个时辰练功，宣称长期坚持练功，小者可以延年益寿，大则躲避劫难，成仙成佛。

在同善社内部有一套等级严格的制度，藉以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

初入社者称为一层“众生”，经过一段修炼后，称为二层“众生”。成为老道徒后称为三层“众生”。之后，达到四层“天恩”，就可以“开示”，即发展信徒。天恩之上是所谓五层“证恩”，可以“开示”三层众生，并充任乡镇善堂的“善长”。然后是六层“引恩”，可以为提升“天恩”的众生授以恩职，负有引进之责。接下来是七层“保恩”，可以为提升天恩的众生负保举之责。之后是八层“顶航”，可以担任省市一级号子的号首，每一省可以有数名顶航。再后是九层“十

① 刘登选：《同善社在四川内幕一瞥》，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81页。

② 陆仲伟：《同善社》，社会问题研究丛书（内部资料），第126页。

地”，道内后来称为“老板”，有权委任五层到七层的恩职，负责管理一省或数省的道务。“十层五行”，可以代表师尊巡视各处的道务，并可代授顶航。十一层为“四相”，职责是负责道场庶务。十二层是“三才”，职司赞化，负责各地恩职人员的升降。十三层“两仪”辅佐师尊办理统号道务，仅有姚济苍一人担任。十四层“皇极”，仅有雷应霆担任。十五层“太极”仅有贺静安、李时品担任。十六层“无极”，是全社最高首领，只有彭泰荣本人可以担任。

同善社利用这个等级制度，引诱信徒逐级往上升，而升级的条件，则是发展信徒的数量。该教规定，四层以上的信徒，要发展10000人，其中天恩6000人，证恩、引恩、保恩各1000人，顶航854人，十地100人，依次递减。

每升一层道级，都要在佛堂里拈阄求准，并填写誓愿单。愿单分为传道与求职两种。

传道式愿单：

“今有弟子某某某，虔心跪在瑶池宫中无生宝殿无极天尊、天地神祇、祖师天尊等莲台之下，弟子奉某某某之命，为某某某众生传授某堂天职。今后为古佛协助圆成。弟子因肉眼凡夫，不识某某某前生今生后果如何，恳求护道护法，执阄灵官神明鉴察，速视回报，当准则准，不准则空。”

求职愿单：

“今有众生某某某，虔心跪在瑶池宫中无生宝殿无极天尊、天地神祇、诸佛诸祖、诸圣贤、诸仙诸帝，告归十五代祖，过去现在众位师尊莲台之下，恳恩超拔，开示初层知止至善。誓愿为古佛走马传道，暗度响贤良，弃家舍身，不怕辛苦，如有三心二意，欺师灭祖，轻泄佛法，即遭雷打火烧。”

2. 主要道务活动

做龙华会

每年农历三、五、九月的十五日，是所谓“龙华会期”，其中的三月十五日为“上古龙华会期”，或“弥勒古佛龙华会”；五月十五日是“中古龙华会”，或“释迦古佛龙华会”；九月十五日是“下古龙华会”，或“燃灯古佛龙华会”。每逢龙华会期，信徒要聚集在佛堂，由号首主持，进行烧香、拜佛、诵经、静坐等活动，并且念诵社内的经文，同时也举行新社员的入道仪式。

醮典

即打醮，于每年春秋两季举行，春典在农历三月，祈求上天赐给五谷丰登；

秋典在农历九月，是报答上天秋天丰收的恩典。为期7天，每天早晨竖旗，傍晚收旗。上下午在佛堂轮流念经，晚上集体念诵经咒。

拜佛会

每逢师尊(彭泰荣)、师母(彭妻)的寿辰及历代祖师、菩萨的诞辰及中元节和每月的朔望日，信徒们都要到固定地点念经聚会，集资聚餐。

上天梯

即记载"功过"，为了激励各级办道人员舍身办道，使道徒多多缴纳道金，要求每人的所作所为加以记载，有功用红圈，有过用黑圈。由各号、祠果证明考察。十次小功作为一次大功，十次小过作为一次大过。功过可以相抵。各号的号首制备功过簿一本，随时登记，岁末进行赏罚。

纪年方法

同善社有自己的一套纪年方法，规定12个月为一年，30年为一世，12世为一润，30润为一会，按照地支顺序分为十二会，十二会为一元。

外功与内果

外功是指捐款办道，发展道徒；内果是指修炼功夫，修身养性。

吃花斋

既每逢朔望(初一、十五)、祖师诞辰、菩萨生日，及有关节日，皆要吃斋，平日可以吃荤。

四、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

1. 立誓严守社内秘密

强调对于社内的教义和各种仪规等，一律"口授心传"，入道时要填写誓牒、愿单，在神前宣誓保守社内机密，永不叛道，不论一般道徒还是办道人员，平时皆不得谈论社内的情况，即使是对父子夫妇，亦不得泄露社内机密。

2. 尊师重道

借以增强教主的权威地位，以便于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在《佛堂规则》里明确写道："师位与天地君亲五者并重，无论开示、引保及指点师友，均当起爱起敬，以为入道之本。"对于信徒的表现，"各号领袖置备功过簿一册，随时登记，岁暮核算品除，申请统号，实施赏罚"。

3. **宣扬封建伦理道德**

在《三教合参》中宣扬"三皈五戒者,指三纲五常也,乃成圣成贤之骨髓,修仙修炼之本源。三纲即释道之三皈,道教之三宝也"。"五常即释教之五戒也"。

4. **办"国学专修馆",以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控制**

"国学专修馆"的创办原则规定:"注重国学,经部批准自行开办,与公立私立各种学校性质不同,既不在国家现行学制之内,自不在各学校系统之中。"该馆"以敦崇品行为重,品行实际即在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德"。[①] 据四川永川同善社刘登选回忆:校中教师全是清末举人、副榜、拔贡、秀才等,学习方法全是背诵,内容是四书、五经。[②] 福建同善社徐葆庆等回忆:"每逢朔望早晨,由馆长带领学生在孔子像前焚香,行三跪九叩礼。"[③]

五、同善社在全国各地的蔓延

在同善社全盛时期,全国各地均设有分支机构,大肆发展信徒。

四川

四川是同善社的发祥地,设有八个大号子:

玉池宫号:又称玉赤公号,是彭泰荣于 1912 年从永川来到重庆传道时,传杨成良、何伯勋等人为道徒,1913 年便在丁字口杨成良家设立第一个号子——玉池宫号,由杨成良、何伯勋分别担任正副号首。

重济堂号,1913 年设立于重庆江北桂花街,号首为刘秀升(刘子元)。

普仁祠号,1923 年经彭泰荣同意从玉池宫号分出来的,设在重庆市,由李兴伯任号首,下设 70 多个善堂,分布在重庆、巴县、綦江、万县、巫山等县。

太和春号,1913 年设于荣昌县仁义镇,第一任号首是郭尊荣,第二任号首是郭有坚,下辖河包乡、盘龙场和隆昌的几个乡镇的善堂。

天锡公号,1913 年设在荣昌城关镇,第一任号首陈善,第二任号首汤炳堂,第三任号首谢龙平,第四任号首何举卿。该号管辖 17 个县的佛堂。

---

① 《同善社传单汇编》壬午年(1922)第四号。

② 刘登选:《同善社在四川内幕一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2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③ 徐葆庆等:《福建同善社略述》,《福建文史资料》第 20 辑,福建人民出版社,第 198 页。

会星公号，1913年设于合川县，在重庆市设有办事处，首任号首雷应霆，末任号首李乃斌，下设会星恒、会星堂、会星楼三个分号。

长兴永号，又名琼林阁号，设在长寿县，在重庆市设有办事处。

巨昌生号，设于成都市，号首为成子钦。另设一坤道正号太安宅。在大足、铜梁、南充、涪陵、万县、绵竹、自贡、垫江等地设有近20个分号。

同善社在全省各地均有组织。

綦江县

1917年在该县县城设立同善社。1941年东溪同善社改名为同德善堂，1942年同德善堂在扶欢、青年、石角、蒲河等地成立同德善堂。1944年同德善堂改为"有仁总社"，分为乾坤二社，增设赶水等5个事务所，共有信徒1200多人，取缔时，有总善堂3个，分善堂13个，信徒1400人。①

广元县

1927年由陈梓堂、杨成模从合川传入，1931年王家相加入后，设立两处分堂。1944年以后，在城乡普遍发展信徒，吸收信徒百余人。②

璧山县

1915年由永川传入该县正兴乡，1921年发展到丁家等乡镇。1952年被取缔。③

盐亭县

1925年由富驿传入，1931年在县城南街四元馆设坛，对外称商号，受南充总号领导。发展信徒3000余人，在永泰、金孔、折弓等多处设立事务所，下设若干静坐处。④

北川县

20世纪20年代传入，在县城设立总社，小坝等地设立分社，归绵竹总社领导。到1949年有道首54人，信徒127人。⑤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42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68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47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74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76页。

平武县

1921年合川县会兴宫所属江油中坝同善社道首王志成、黄尧知到该县开展道务，在县城教友祠堂建立组织。1928年被国民党政府取缔，一度转入隐蔽活动。1931年恢复活动，仍未公开，并更名"善堂"。1939年先后在古城、青川、旧堡等地设立事务所。在余乐年任该县同善社道首时，将善堂与县城的慈善会转仁堂合并。1945—1947年，余乐年又在高村、白草等地建立基层组织。该县共有基层组织28所，善长以上道首61人，道徒110余人。[①]

德阳县

1918年由绵竹传入该县。当地有孝泉的冯柱颜首先加入，不久即被提拔为"正恩"，他又发展城关的王正江等10人入社。1910年，王正江等均被提拔为天恩。1921年2月，经德阳县署批准，立案成立基层组织，设于南华宫，由冯柱颜任善长，王海秋、王正江任副善长。王等又在黄许、孝泉等乡镇发展组织。1922年分别成立事务所。1929年遭国民政府取缔，转入隐蔽活动。1924年又恢复公开活动，全县共有3个支系，有天恩以上道首128人，信徒900人。[②]

中江县

1917年由重庆人刘汇仁传入，在骑龙、永丰设坛两个，有天恩4人。1930年王文略从绵竹将另外一支传入县城，先在公园街湖广馆设坛，后发展到永太、回龙等乡镇，设坛107个，有号首2名，保恩9名，引恩4名，证恩10名，天恩45名，善长107名，执事4名，信徒4000余人。[③]

南充市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同善社创立不久即传入该市。1916年川北号首蒙思普、李树勋在城内二府街建立组织，指派善长、副善长、香灯以及六科执事等，在市内部分镇场建立事务所14个。到1950年全市有道徒3000余人。骨干分子127名。[④]

蓬安县

1919年岳池人朱某到周口士绅中发展职业道首5人，4—7层恩职6人，六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77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79—980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82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83页。

科执事 6 人，信徒百余人。后来又成立周口总社，由朱某和黄某分别任正副善长，嗣后又在河舒、杨家等乡场设立 18 个事务所，共发展正副善长、总理、执事等 88 人，道徒 200 余人。[1]

西充县

1919 年由善长赵墨轩、王指凡二人，在县城大南街建立组织。翌年在华光乡老君观成立事务所。1936 年将县城南街社址改为西充分号，王指凡任顶航，贾见知任号首。下设善长、文牍、监理、稽核、收发、庶务等六科执事，负责发展组织、传道。县以下设华光乡、太平乡等 7 个事务所，坛门 10 余处，各级道首 60 人，道徒 2240 人。[2]

蓬溪县

民国时期曾两次传入该县。1918 年大石乡的刘守春在遂宁加入后，回到该县在明月、大石等乡镇成立事务所；1935 年从南充、潼南、武胜等县传入，在上东乡陈耀庭家建立事务所，并在任隆乡建立善堂 4 处。[3]

射洪县

1949 年初由南充、合川两地传入。设坛 21 处，有信徒 1000 余人。[4]

泸州市

1915—1916 年，合江办起同善堂，属大足龙水镇洪信祥号管辖，初设于城区南街，后在稻谷仓中药行、中山路纸火铺等处设立佛堂，另外在城区李家巷内设有坤善堂，为女信徒举办活动的场地。其时由永川洪信祥号、荣昌天锡宫号等传入泸州。城区设立总社，下辖乡场同善堂有：太和乐善堂、牛滩阁善堂、弥陀顺在昌、仙佛保善堂等。[5]

合江县

该县同善社于 1912 年成立，最初临时设于私人家中，后收入道金增多，购买南街铺房一所，设立佛堂。县以下同善社有先市、九支、二里等六处。此外，李家巷内设坤善堂一所，故其他善堂便被称作乾善堂。[6]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85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88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91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94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04 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06 页。

铜梁县

1917年该县的罗尚珍到北江县的重济堂正号领得同善社的天恩，随游章武来到该县兴办道务，在巴川镇城外修建善堂。1919年正式成立重济康分号，直属全国总号洪信祥。对外称做“善堂”，还在小北街设立坤佛堂一座，在安居等23个乡镇发展信徒4200余人。①

筠连县

1933年由宜宾县明德堂善女丁党南，派遣郝大珍等来到该县创办组织，1929年在双河、巡司设立事务所，社内有社长、天恩等19层，有道首37人，道徒千余人。②

通江县

1926年传入该县。原属合川会星宫号，1947年号首李乃斌等来到该县发展组织，使同善社的活动遍及全县。③

南江县

1911年传入，1923年在县城上和街修建了善堂，在治城、长赤等地设立事务所。④

宣汉县

1913年由万源传入该县的一支在南坝等地发展；由南充传入的一支在城关、胡家活动。两支同善社组织传入县内的21个乡镇，有信徒3000余人，骨干136人。1935年被取缔，抗战期间用慈善组织的名义活动。⑤

开江县

20世纪20年代初，该县人柳圣五等在城内西街城隍庙右侧建立同善社组织，各乡建立分社，全县入社者数以百计。⑥

资阳县

1911年资州道首唐廷模来到该县传道，布道于南津、伍隍、临江等地。由永川来的一批道首，又使同善社在全县蔓延开来。1928年因总道首彭汝尊阴谋武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46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0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7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9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20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22页。

装叛乱，遭到禁止。1948年又恢复了活动，不到一年，全县发展信徒千余人，道首31人，广布城区及重要城镇。①

乐至县

1921年中江人胡元楷在该县城西街老君庙开办同善社，因胡系该县县长之兄，故各界人士多往参加，由县副议长张子野任善长。1926年社址迁往北街文昌宫观音堂，1929年被禁，1945年恢复活动，1947年重建天宫庙，将大佛善堂迁移到庙内。下辖大佛、复兴、中江县的盛池等10余处善堂。全县有天恩以上道首30余人，众生300余人。②

理县

1931年由郭秉山发起，社长文国泰（茂县人），当时入社者有二三十人，1935年将社名改为慈善社，后又改为积缘慈善堂，有成员294人。③

茂汶县

清末绵竹人邱藻章与该县人古瑞生等在陕西街建立同德茂同善会。民国初年同善社先后在县城、石纽、土门等地发展组织。1925—1946年，分别在东兴、富顺等乡设立事务所，有信众77人。④

雷波县

1925年在县城和黄螂两地同时成立同善社组织，直属宜宾明善堂领导。1939年宜宾明善堂道首丁志瑞将雷波同善社改名为德昌善堂，由县城的罗复祥任善长，有信徒30余人。杨保卿等先后任黄螂同善社的善长，有信徒64人。⑤

北平市

1910年传入北京，同善社"师尊"彭汝尊由社首曾桂生引见给宣统皇帝，随之结识了一批清朝遗老。1913年，雷应霆、贺静安率领上海天齐宫号的王汝青、严调楚等人到北京传道，把北洋政府的陆军部中将咨议姚济苍等拉入"礼门"，在北京成立永定一号，由姚济苍任"善长"。1917年礼门正式改名为同善社，由姚济苍出任"总理"。后来，彭泰荣自任总社"善长"。1917年11月，北洋政府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23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28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37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37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41页。

批准同善社为社会团体，在北京成立“洪信祥”总社，解放后被取缔。[1]

天津市

1918 年，同善社北京总社派人在天津仓敖街设立天津分社，由李时品任善长，分社之下设天津县社，并建立 3 个事务所，分社管辖唐山、沧县、东光、交河、阜城等社的先觉祠。

贵州省

贵阳

1921 年四川洪信祥统号派陈化龙到贵阳传道，建立大顺祥号，又称太和春号。由姚景崇、曾汉清等为正副号首。贵州全省共有 29 个县市设有同善社的分社。

修文县

1923 年从四川传入该县，是年 4 月，省号派道首罗子俊到扎左协助成立同善社的分社扎左善堂。堂址设在扎左南大街的廖叔文家，由廖任堂长，有信徒 70 人。翌年，在县城温家坡皂角树经堂和六广十字街朱举之家分别成立龙场善堂和六广善堂，有信徒 50 人。[2]

息烽县

1921 年春，同善社全国总务所四川璧山县八塘场十六号管理处首领黄保全等 3 人，在该县结识当地士绅陈南清等，将他们吸收为信徒，到 1922 年已经发展信徒 200 余人，正式成立该县同善社，社址设在永靖镇的三官殿，同年下半年在九庄龙塘、流长茶园设立事务所，发展成员。到 1929 年已经有信徒 2000 余人。[3]

桐梓县

1924 年由毕正霖等人发起建立该县的同善社。有信徒 56 名，1935 年前，其招牌公开挂在县城东街吕家巷的陈家祠堂。[4]

湄潭县

1920 年四川的陈开龙来带该县传道，腊月，在县城设立同善堂。1921 年同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3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47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48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53 页。

善社传到永兴。到解放初期，同善社已经遍及该县的义泉、永兴、茅坪、鱼泉等地。①

大方县

1922 年由四川大足龙水镇同善社派刘明江等人来到该县发展组织，社址设在县城的杜康庙。后由首领徐祖栋等分别在城关、瓢井建社传道，分别设立谦善堂和大善堂，到 1934 年信徒发展到数千人。②

赫章县

1922 年传入该县，到 1949 年发展善堂 6 个，事务所 4 个，经会座室 44 个，道首 100 余人，信徒 5000 余人。③

江口县

1920 年传入该县，是年冬正式成立该县的同善社分社，乡镇也建立事务所，积极发展信徒。因为该社提倡复古、复旧，国民政府于 1927 年和 1945 年两次下令查禁，该社转入地下。1942 年 12 月 10 日，该社发起“黔东事变”，攻打怒溪等地，后被地方政府打散，组织被取缔。④

石阡县

1921 年同善社四川统号派顶航陈化龙到该县传道，发展官绅何杨等 7 人入道。翌年，推代表 4 人前往四川统号汇报道务，后均被提拔为恩职道首。1924 年建善堂于南城内，设正副和名誉善长及监事各 1 人，下设文牍、收支、庶务、稽查、交际和理体六科。并在新场建立事务所。到 1950 年 10 月，恩职以下道首有 136 人，信徒 3000 人。⑤

玉屏县

1929 年该县开始建立同善社的组织，有男女信徒 75 人，乩坛 8 处。⑥

黔东南地区

1919 年同善社从松桃传入雷山县，从湖南省的芷江传入岑巩县，其后又在台江、天柱、黎平、镇远、三穗、黄平、凯里、榕江、麻江、锦屏等县建立组织。据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57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62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65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66—1067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67 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68 页。

1952 年对该地区 11 个县的调查，共有县社 11 个，分社 15 个，事务所 27 个，道首 49 人，信徒 2873 名。①

镇远县

该县同善社在城关、清溪一带，有信徒 240 余人。1926 年该县清溪人朱明亮发展信徒 2000 余人。②

锦屏县

1923 年湖南邵阳人马德生(天恩)到该县设坛传道，1926 年在卦治、茅坪、大同等地设立事务所，所内设正副善长各 1 人，发展信徒 2000 余人，有天恩以上道首 47 人。③

台江县

该县同善社是清末宣统元年(1909 年)传入，由贵阳天恩单义斌到该县与向名才、杨宗友等联络。1922 年 10 月，贵阳大胜祥号派天恩龙光辉来到该县江西会馆，建立事务所，1925 年，单义斌再次来到该县，于郑某家建立同善社组织，并在革东、德眷建立事务所。到 1948 年共发展道徒 8 批，456 人，其中道首 348 人。④

福泉县

1924 年 6 月，该县人刘樵松在都匀县加入同善社，1926 年刘返回家乡平越，设佛堂于住宅，后移设宗祠。是年冬，省社委托松桃恩贡龙式之到平越催造册报省社及总社。翌年经北平总社核准，颁发图记，平越同善社正式成立。⑤

云南省

巍山县

1922 年云南大理人杨畅在该县大仓街成立同善社的组织，善长为杨畅本人，1923 年，该县文华镇也成立同善社，善长为杨畅。1927 年文华镇的同善社改称至善堂，有成员 700 多人。⑥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69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72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73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74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077 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14 页。

蒙自县

1920年4月，同善社道首李序清从昆明到该县联合中学发展组织，以曹树初为善长。1929年曹死后，由王维章接任善长。1930年派生丫女社，以曹树初妻为社首。[①]

陕西省

宁强县

1920年胡德修、夏明贤二人从四川来到该县县城南街王文盛家开办同善社，收徒100多人。王自任善长，1926年停止活动，1937年秋又恢复活动，有信徒20多人，多为老妪。[②]

横山县

1943年春，靖边人樊幻桥、榆林人李守一在该县城内祖师庙成立同善社组织，仅有10余人参加。[③]

清涧县

20世纪30年代初，四川田某和安定的阎某，在该县筹建同善社的组织，社址设在惠华亭毡坊中，1959年查获道首1人，信徒78人。[④]

子洲县

1917年由榆林税务局长任希孟来到该县苗家坪传人，解放初期统计有道首1人，信徒350人。[⑤]

甘肃省

兰州

1918年四川洪信祥统号派李可杭到兰州传道，设立大崇祥号，由廖元佶任号首，1920年甘肃省督军兼省长陆洪涛入道后，成为甘肃省同善社的"护道"。当地一批官僚政客纷纷入道，各县知县也纷纷成立分社，到1923年，已经有陇县、临洮、渭源等20多个县建立了县社。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8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0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5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6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7页。

白银市

1922年湖南人刘仁杰率先到该县开办同善社的组织,1923年兰州同善社派人在靖远县城设立事务所,1931年更名为“先觉祠”,并设立乾坤堂。1938年会宁同善社利用社内经费,开办了一所同善小学,学生达到100余人,1936年信徒发展到1000多人。[①]

张掖市

1920年四川人蒙荣仁来到该市发展组织,社址在木塔寺旁的接引殿内。1928年被查禁,后来又恢复活动,先后发展信徒800余人。[②]

山丹县

同善社在该县县城、东乐、霍城共有事务所4处,有名誉善长8人,正副善长8人,总理4人,文牍39人,收支2人,稽查33人,教授16人,庶务41人,交际32人,天恩6人,信徒1602人。[③]

陇西县

该县的同善社组织是1920年由四川人张永泰和陇西绅士裴象臣在该县天庆观创立的,参加者多为地方上的老年人,大多在家中练习坐功。1931年由四川朱明治和李普泽负责,在首阳、文峰等地有100余人参加。[④]

康县

1922年传入该县的云台,主要活动在云台、大山岔等20个村庄,共有信徒70多人,其中道首3人,善长2人,经理1人。[⑤]

西和县

1926年传入,在该县石堡王家斜坡和城关冯家庄成立佛堂办事处。据1958年调查,共有信徒131人,道首1人。[⑥]

宁夏省

银川市

同善社于1928年传入银川,设立大宁祥号,有信徒124人,其中一般信徒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72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79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80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91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94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96页。

106 人，道首 18 人，主要领导人李斌。[1]

上海市

天齐宫号

1913 年彭泰荣先派石知一在上海吸收朱祝封等 10 余人入社。因为入者寥寥，又派大弟子贺静安、雷应霆在上海邀潘勤夫等人入道，1918 年在大东门梅家弄建立天齐宫号。号首张正荣，该号拥有"天恩"以上骨干 30 多名，分赴北京、南京、杭州、宁波、福州、镇江、扬州等地传道。先后在各地建立了 10 多个省级大号子。[2]

江苏省

南京市

1915 年四川洪信祥统号派曾奎生、雷应霆到南京传道，并设立善堂，由王监青任"善长"。1917 年正式成立同善社南京分社，定名为"会吉祥号"，后改称"会齐岛号"，由王润芝任号首。该号先后在南京设立分佛坛 7 处，并向山东、黑龙江、广东等省和镇江、无锡、徐州、福州等城市发展道务。

江浦县

1923 年该县县城成立珠江镇同善社，社长王观易，有信徒 45 人。到 1941 年全县有信徒 268 人，其中证恩 1 人，天恩 7 人。[3]

宝应县

1917 年上海道首来到该县传道，1921 年在县城建立社坛于真君祠内，属于南京"会齐岛号"。1914 年社坛迁到汤家巷陈宅内，设善长、副善长各 1 人。1926 年全县建有 18 个事务所，到 1949 年全县有县坛、事务所 74 个。[4]

靖江县

1918 年从江阴传入，佛堂设在城隍庙小花厅，1921 年迁新街，先后设立 8 个事务所，有信徒 3000 余人。[5]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213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27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51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89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90 页。

泰县

1912年童岩仁来到该县创社，建立事务所或办事处13个，有正副分社社长24人，信徒800余人。①

扬中县

该县同善社分为文武两班，文为孔孟道，武为黄旗会，后者于1939年由丹徒传入，社首姚九如。②

常州市

1927年同善社在该市设立第一个佛堂，发展信徒135名，有大小道首12名。③

溧阳县

该县同善社属于镇江号子"济阃号"，创始于1920年，有信徒300余人。1924年在该县戴埠等集镇设立支社。1930年被国民政府查封，1938年又恢复活动，设立"先觉祠"，投靠日伪。④

镇江

1915年上海天齐宫号派梅旭祺等到镇江开荒，设立"齐祥号"，号首解正霖。该号后来又向丹徒、丹阳和苏北的海门、靖江等地发展道务。

无锡市

1922年由镇江郁荣春到该市传道收徒，在城区光复门附近建立分社，以薛兆卿为社长。1926年被取缔，转入地下活动，改称"先觉祠"。1931年由祝有青等人在境内农村先后开设佛堂16个，有道首105人，信徒5990人。⑤

江阴市

1918年传入，1920年镇江分号号首郁永介来到该市建立江阴社。社长吴朴斋，1927年被国民政府取缔后改名"先觉祠"，下设9个事务所，组成36个"半仙堂"。⑥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91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99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03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07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10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11页。

宜兴县

1940 年在城西榜眼祠设立事务所，在和桥等地发展信徒千余人。[①]

吴县

1923 年传入该县，分社设在城区的申衙街，下设东山、西山等地的事务所，并得到地方政府的承认。1927 年被国民政府取缔，转入地下活动，1936 年恢复活动，对外称"先觉祠"，隶属上海"天齐祥"。[②]

沙洲县[③]

1925 年南通同善社派王层等到常阴沙一带活动，江阴县派赵春华到该县西张办社，主要活动在三兴等地区。[④]

扬州

1915 年上海天齐宫号派梅旭祺等到扬州设立"天齐永号"，由王受权等先后担任号首，领导苏北各县的道务。

浙江省

1912 年传入宁波，由省长张载阳设省社于杭州，迅速发展到全省各地，在 46 个县设立了"先觉祠"。到 1952 年被取缔时，共有信徒 7 万余人。[⑤]

余杭县

1921 年传入杭县，以黄云鹤为首，在市郊成立分社，发展信徒。1930 年各分社改称"先觉祠"，到 1949 年共有先觉祠 15 处，静坐室 54 处，骨干分子 117 名，信徒 400 余人。1923 年传入余杭县，在城镇设立先觉祠 13 处，有骨干分子 28 名，信徒 1078 人。[⑥]

萧山县

1920 年在该县城厢万寿桥下街成立分社，社长为蔡子恒。各乡镇设立事务所，1927 年被取缔，1938 年汪宝煜等人在城厢镇西门外发起复社，改称"萧山先觉祠"，以后，全县共有 26 个佛堂，45 个先觉祠，1952 年取缔时有信徒 10665 人。[⑦]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12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15—416 页。

③ 今属苏州市。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22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28 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31 页。

⑦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32 页。

新登县与富阳县

1920年浙江省社派郑逾民到新登县活动,设立新登县分社,社长陈志凌,社址在普济医院楼上,1927年被国民政府禁止。1939年该分社在富阳县同善社的支持下,重新活动,设立坛堂1个,有社首4人,信徒217人。富阳县同善社始于1921年,由杭州的曹汉璋等创立杜墓同善社,后转到富阳县城西的赤城公会,成立富阳同善社。是年5月,社址迁到王家祠堂。在太源等地设立事务所,有 徒1500人。1939年恢复活动,据1953年统计,全县共有坛堂28个,社首33 ,信徒2352人。[①]

建德县

民国初年传入该县,1952年被取缔时,共有县先觉祠1处,静坐室9处,家庭佛堂19处,道首12人,信徒453人。

武康县与德清县

武康县同善社始于1925年,设有县社,有信徒500余人,下设上柏等地的7个先觉祠或事务所。解放前夕信徒猛增至6000余人。[②]

德清县同善社始于1915年,由杭州发展而来。1920年建立县社,有信徒358人,善长程森,社址在城关镇西门外河下。1932年信徒猛增至1326人,善长蔡振绅,下设新市等10个先觉祠或事务所。

平湖县

1918年由施凤石在杭州取得恩职后回到该县,建立同善社组织,到1920年有信徒400余人,1927年改名为“先觉祠”。到1953年统计,全县有道首209名,信徒2005名。[③]

普陀县

1918年从宁波传入,在沈家门中大街设立事务所,1928年被地方政府查封,1930年恢复,改称“先觉祠”。1948年设立七元坛,1952年被取缔,查封坛堂1个,逮捕道首2人,退道者600余人。[④]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2—433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8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9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9页。

岱山县

1923年传入，由沈家门人来到该县，设立同善社于东沙东源行楼上，吸收信徒。1926年有信徒40人，到1950年有信徒300余人。①

余姚市

1917年余姚人丁连标在南城杜义弄设立先觉祠，高绍基任善长（后改称首事），到1938年全县有先觉祠19个，长泾坛2个，家庭佛堂14个，道首46人，信徒2000余人。②

鄞县

1912年同善社传入该县江北岸，1915年上海天齐公号的陈春阳、刘希奇来到该县大沙泥街建立"天齐昌号"，因信徒日增，又在县城鼎新街、新河头等地设立社堂。1927年同善社被取缔，社堂解散。后来又逐渐恢复，1934年，天齐昌号改为省社后，称"永定祥号"。1941年鄞县被日寇侵占，号首刘晓波迁居上海，设立办事处。1942年北平"永定祥号"柳葆初来到该县建立太平坛，基层组织逐渐恢复，有先觉祠9个，佛堂51个，道首107名，信徒5400余人。③

象山县

1918年12月，宁波同善社刘树声派四层功（天恩）来到该县发展道务，在丹城镇筹办组织机构。当时入社者有20余人。1919年陈祥源偕同邵孝熊（四层功）又到该县发展社务。1920年宁波派周昌基（五层功，证恩）再次来到该县，正式建立了"象山同善社佛堂"，并备文报经当时县政府批转，从此公开活动。④

绍兴市

1918—1919年，同善社上海社首阮庆焘来到该市，在城区通市桥设立先觉祠，到1951年，该市各县城共有先觉祠6所，乡镇先觉祠70所，四层以上骨干分子184名，信徒三四千人。⑤

诸暨县

1920年传入，设立分社于登仕桥里，数年后有分社42所，信徒2万人，⑥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44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47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49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0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4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5页。

杭州

1915年上海天齐宫号派吴小鲁到杭州成立鼎丰祥号，由当时任浙江省省长的张载阳任号首。

宁波

1915年上海天齐宫号派陈春阳、邵永康到宁波大沙泥街成立天齐昌号，由陈春阳、刘希齐分别担任正副号首。1924年，彭泰荣委派周天裕为号首，1934年天齐昌号改名为“大慈祥号”，领导浙江台州、温州等地的道务。

江山市

清末从衢州传入，民国初年在清湖、峡口、二十八等地方建立组织。共有总坛1个，事务所11个，信徒616个，其中四层以上17人，一至三层众生599人，分散于全县的13个乡镇。[①]

永康县

1920年冬，由徐理夫从绍兴传入该县，社址在下园朱，称“永康同善社先觉祠”。下分7个分祠。全县共有坛堂52处，信徒3615人。[②]

武义县

1920年该县县长蔡瑞年引四层天恩陈抚松在该县发展组织，成立分社，北平总社授予该分社方印一枚，委任徐仲英、应玉如为分社社长。分社设在县城，下设履坦等13个事务所，信徒发展到300余人，1922年又在县城圆石巷设立总佛堂。1927年同善社遭查禁，总佛堂被国民党县党部占用，分社印章也被没收，被迫停止活动。1932年在徐舍庆家重设总佛堂，改称“总觉祠”，1942年县城沦陷，社内停止活动。1945年又恢复活动。[③]

临海县

1920年传入，设先觉祠或事务所3个，有道首24人，信徒300余人。[④]

温岭市

1911年从宁波传入该县太平，1917年从黄岩传入该县大溪，先后在城关、泽国等地创立先觉祠，在大溪设立事务所。全县共有7个社，32个坛堂，有道首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6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8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61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62页。

73 人,信徒 842 名。[1]

仙居县

1921 年由台州区同善社管铎来到该县传人,1924 年正式成立县社,设立坛堂 7 处,有道首 14 人,信徒 292 人。[2]

乐清县

1920 年从温州传入该县,初在乐成设立分社,发展信徒 100 多人。1931 年改名为"道德研究所"。[3]

平阳县

1921 年由宁波传入,1929 年在城区成立先觉祠,并在各地设立总堂,下设分堂、家堂。该县共有坛堂 57 个,道首 70 名,信徒 3482 人。[4]

顺泰县

1921 年传入该县,1925 年在县城儒学路设立坛堂,由周伯济为名誉社长,卢鳌为社长。1931 年设立先觉祠,各乡设立事务所。到 1937 年全县共设 24 个事务所,有信徒 3500 余人。[5]

缙云县

1922 年传入,到 1924 年已经拥有信徒 2025 人。1927 年被取缔,县社大楼被国民党县党部接管使用,1933 年又重设佛堂。[6]

云和县

1921 年由遂昌县道首王昌杰传入,最盛时有信徒 5000 余人,设有先觉祠、分祠、佛堂等 75 处。[7]

松阳县

1921 年,由遂昌传入,同年 10 月,叶凤池创立县社。,1931 年在西屏镇设立先觉祠,下设 3 个分祠。西屏设有总佛堂 1 处,家庭佛堂 2 个,信徒 140 人。石仓乡茶排村设有总佛堂 1 个,家庭佛堂 2 个,信徒 27 人。石民乡有佛堂 3 个,信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63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65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66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68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69 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70 页。
⑦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71 页。

徒87人。①

安徽省

合肥市

1922年芜湖号首派专人来到合肥发展组织,有信徒100余人。②

安庆地区

1915年传入望江县,由高冉卿在吉水镇设佛堂。1919年,安徽省同善社正式在安庆成立,社长张钺,然后向各县传布。1934年改社为号,称"大林祥号",到1941年共发展信徒7600人。③

怀宁县

1918年,宁波道首陈文新在石牌成立县社,由潘树南任社长兼监理,1941年改称"先觉祠",潘树南改任首事,在农村设立事务所,乡以下设立香灯处,分别由所长、灯主掌管事务。到解放前夕,全县农村建立组织29个,道首97名,信徒2130名。④

蒙城县

1921年传入,直属武汉同善社,在县城设有佛堂,发展信徒80多人。⑤

舒城县

1926年城关人陈仲西在外地教书时参加了同善社,1927年陈返回家乡,与镇上刘自开等以大得祥商店为掩护,秘密传道,信徒遍及城北。1942年,陈与社首徐霖、柴国斌等人纠合信徒百余人,袭击县政府所属北隅乡公所,当场被乡警击毙19人,余众溃散。柴国斌等5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枪决。⑥

青阳县

1921年安徽省社派桂锦堂来该县发展组织,吸收信徒17人,由左一连任善长,在陵阳曹家湾等地设立事务所。1924年被县政府取缔,改名"同德善堂",善长改称首事,转入秘密活动。1928年再次遭到取缔,再改名为"先觉祠"。⑦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72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94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24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27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14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38页。
⑦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45页。

绩溪县

1919年宿松县同善社天恩方昶华来到该县建立组织，社址设在城西孔家庙，翌年，又派天恩程干云来到该县发展组织，在西溪村建立事务所，有信徒30余人，到1934年，全县有分社1个，事务所2个，香灯3个，信徒182人。[①]

山东省

济南市

1915年在济南设立同善社山东省社，社长由时任北洋政府山东省财政厅长的杜尚担任，后改称"会齐都号"。

江西省

南昌市

1917年雷应霆在南昌市陈家桥设立洪善祥号，先后由周贤甫、罗朗山等担任正副号首。周、罗二人积极向全省86个县市发展信徒6万人。[②]

进贤县

1917年成立县社，由刘乐春任社长，吴正慕等任副社长，社址设在县城莲花池。1920年该县县长加入同善社，信徒发展很快，达到600余人，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信徒纷纷退出，仅剩20人。1929年同善社改名"先觉祠"，进而又改名"洪都祥社"，1940年，章松生任社长，先后设立3个事务所，有信徒60人。[③]

都昌县

1919年由武宁传入该县，当时有20人参加。1953年被取缔时，有道首16人，四层道徒4人，三层道徒10人，二层道徒30人，一层道徒201人。[④]

乐平县

1916年由鸣山煤矿的瞿绍开道，1917年6月，由南昌省号指派开道师刘锡梅来到该县设立佛堂，吸收信徒，在县城发展信徒100余人，另外还在菱田、镇桥发展信徒19人。[⑤]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50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88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92—593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94—595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97页。

贵溪县

1920年由县乡绅李桂林传入,开始时入者仅数人,不久在雄石镇设立县社,设首事、副首事各1人,1923年在鹰潭镇,1924年在塘湾、文房镇,1927年在上清镇,相继设立四个事务所,到1949年,共发展信徒2000余人。①

萍乡市

1920年由省号派道首聂根云等来到该县建立组织,初任善长邓鼎元,1945年周连清任善长时,在泸溪、安源设立分社。从1920年到1950年共发展信徒400余人。②

南康县

1918年由军界发起组织,在唐江镇文昌宫设坛,在凤岗等地设立事务所,发展信徒799人。③

寻乌县

1901年熊景章等人来到该县建立组织,从最初20多人发展到100多人,称"先觉祠"。1947年改称"志善堂",内设善长1人,副善长1人。1952年被取缔时,登记的小道首4人,退道者207人。④

广丰县

1922年由玉山传入该县,以太之仁药店老板朱桂新为发起人,1928年改为先觉祠,后又称"柴门道",人数最多时达2万人。⑤

上高县

1919年由南昌省号派遣蔡信到该县发展组织,称"先觉祠",1948年10月,改组为"反共救国军"即6642部队,企图阻挠人民解放军南下。上高解放后,匪首李首先、李宗元等转入地下。1953年破获时有道首40人,信徒472人,匪首李宗元等被枪决。⑥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98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99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01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05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09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20页。

靖安县

1921 年由武宁人周松柏传入，曾有信徒 400 余人。[1]

新干县

1919 年冬，南昌省社张安球、胡宁庭来到该县进行传教活动。1924 年在县城鸿安斋建立组织，初期信徒很少，后来发展到 100 多人。1945 年临江天柱斋总社在三湖建立分社，有信徒 30 余人。[2]

遂川县

1919 年由湖南和吉安等地传入，曾有信徒 4022 人，受省社领导，设县社 1 个，下设 19 个事务所。[3]

安福县

该县同善社组织始于 1920 年，1926 年遭取缔，1932 年恢复组织，改名"文化社"，又称"道德会"，1933 年改称"慈善会"。1934 年赣州人刘锡福前来点道，成立核心组织，李如东为善长。1944 年李如东死后，刘汝南任善长，同善社的组织分布于全县的八个区，41 个镇，信徒 400 余人。[4]

永新县

1921 年由罗介动传入，建立组织，设有 5 个事务所，发展信徒 656 人。[5]

湖南省

1917 年由彭泰荣大弟子雷应霆、贺静安等把同善社传入湖南，首先把湘军第三师师长彭廷衡拉入道内，并委任为同善社湖南省社长。接着又把湖南省主席赵恒惕、督军张敬尧、督军兼省长谭延闿等拉入道内，并聘为名誉善长。1920 年，谭延闿把在万寿街的公馆捐出，作为湖南省同善社省社同吉祥号的会址。还举办岳麓山国学专修馆，培训大批骨干，派往各地发展组织。省社下设果证、明察、文牍、宣化、道金 5 课。1921—1927 年，全省各县成立先觉祠，在各县辖区设立事务所，1929 年以后，又先后在岳阳、衡阳等地设立 14 个区社，协助省社督导各县事务。据 1952 年统计，全省共有信徒 72000 余人。[6]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20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23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24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26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27 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09 页。

常德市

1920年从北平引入该市,参加者主要是清朝遗老和失意政客、绅士和商人。①

津市

1925年传入该市,在万寿宫内设慈善堂,发展中小道首23人,信徒181人。②

澧县

1919年由常德传入该县,于县城成立县社,分别在城关、津市设立先觉祠。下设8个事务所,有道首55人,信徒1218名。③

石门县

1919年由常德区社长畲钦翥等人传入。由国民党石门县副议长陈大广发起,全体议员31人参加。该县警察局长聂伦元等军政官员纷纷加入,1924年国民军第二混成旅部队中人加入者达200多人。到解放时全县12个区共设事务所14个,下设会坐处8个,临时灯2个,私人灯10个,入道者1640人。其中天恩以上道首16人。④

南县

1920年前后传入该县三仙湖一带,设立崇正善堂,后于县城设立七县先觉祠,管理南县、华容七县的教务。在县内设有9个事务所和29个坛堂,有信徒2500人。⑤

桃江县

由益阳、湘阴传入县境的桃花江等8处,各处设事务所,下设会坐处24处,佛堂25处,有信徒1022人。⑥

汨罗市

1922—1934年分三支传入该县,先后设有新市、长乐、三神三个事务所,发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16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17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18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20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23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25页。

展信徒635人。①

湘阴县

1918年益阳人吴树凡来到该县开道，当时因得到湖南督军谭延闿的支持，入道者多达千人。1928年又有邵阳人陈锦春来到该县传道，发展信徒80余人，到1951年被取缔时，有坛堂18处，道首26名，信徒950名。②

澧陵县

1918年湖南省同善社派道友柳九曦来到该县，于是年冬成立县社，下设渌口、玉皇阁、石亭等事务所。发展四层（天恩）2人，五层（证恩）2人，七层（保恩）1人，信徒451人。③

鄠县

1919年由天恩李峥嵘等从衡阳传入该县，翌年立坛于梅冈试馆，林海源任善长，从1924到1935年先后在该县水口圩等地建立4个事务所，设立41个会坐处，发展信徒1500人。④

湘潭

1918年湖南省社在长沙设立后，不久传入湘潭县，设立县社，成立6个事务所，到1949年有道首23人，信徒800余人。⑤

郴县

1919年建立组织，吴海狱任社长，1925年在县城、安和建立两个事务所，1937年改名"先觉祠"，又在县城等地设立5个事务所，共有信徒1305人，道首40人。⑥

安仁县

1919年衡山人王时拭到该县传道，1927年建立县社，由许文渠任社长，到1932年发展信徒3000余人，下设6个事务所，150处"会坐"。⑦

零陵地区

1917年由王保成传入该县，然后又传入道县、宁远、江华、蓝山、东安等县。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27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29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33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35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36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40页。
⑦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42页。

1921—1927 年间，在各县先后建立县祠社，1929 年又在永州设立“永州区社”，到 1953 年全区共有信徒 3135 人，其中道首 327 人。[1]

武冈县

1919 年同善社邵阳区社李笏山来到该县发展信徒 40 人。1920—1922 年，新宁人李三宜、邵阳人邓雨轩来到该县传道，发展信徒 600 人。1924—1944 年，邵阳人周熙珍任武冈分社社长，发展信徒 2000 人。[2]

邵东县

1919 年传入该县，到 1935 年县内有事务所 18 处，1940 年又建立坛堂 15 处，有道首近 300 人，信徒 3000 人。[3]

隆回县

1921 年以后，宝庆同善社由东向西，新化县同善社由北向东南，陆续传入该县境内，先后设立桃花坪等 10 个事务所，52 个会坐处，发展信徒 5820 人。[4]

洞口县

1926 年，长沙同善社总会派道首瞿兆瑜在高沙湘乡会馆建立事务所，发展信徒 364 人。[5]

绥宁县

1912 年由洪江天恩刘可松传入，得到县政府支持，1923 年 11 月，于县城内建立县祠社，下设下乡、临口等 8 个事务所，有信徒 1400 人，分布于 12 个乡镇。[6]

新宁县

1920 年省社道金课负责人林湘洲（新宁县人）牵线，同善社汉口“合议联合会”派熊明中来该县传道，在金石镇开堂设坛，发展信徒。1921 年正式建立新宁同善社分社，1935 年改名为“先觉祠”。1947 年，林湘洲在省社李焕章的指派下，在该县先后建立茶山坳等地的 6 个事务所，发展信徒 1007 人。[7]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24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49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50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53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54 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55 页。
⑦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57 页。

城步县

1919年7月，由邵阳区社李笏山传入该县，得到县长吕佐文的大力支持，几天之内就发展信徒100余人。到1924年已经有信徒1398人，1949年底，有信徒2500人。①

黔阳县

1919年黔阳人施虞唐由长沙返回家乡传道，在该县设立先觉祠，发展信徒963人。②

溆浦县

1917年由宋竺仙从沅陵传入该县，是年在该县大鹤鸣山成立分社，由谢希夷任社长，到1949年共有信徒654人，道首25人。③

新晃县

1917年由贵州万山传入该县。1942年，吴宗尧接受湖南号首李焕章的命令，回到新晃县建立秘密武装上万人，于当年12月10日发动"黔东事变"，攻占5个县城，波及湘黔两省的14个县。④

芷江县

1917年由杨世弼从长沙传入该县，士绅捐资建立分社，1942年因重庆、安江同善社发生暴乱，该社被当局查封。在该社存在的15年中，共发展信徒300余人。⑤

靖州县

清末洪江同善社派道首来到靖州传道，在城关镇下熙街开设佛堂，发展信徒60余人。1923年，奉省社旨意，成立国学专修馆，招收信徒30人。1924年在艮山口等地设立事务所，发展信徒800余人，到1926年已有信徒2000余人。1927年同善社被取缔，1929年又复办先觉祠。⑥

凤凰县

1913年由田应诏部下彭铁岩传入该县。在玉皇阁建立组织，在县城建立先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58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59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62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65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66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69页。

觉祠,在农村建立3个事务所,发展信徒678人。[①]

龙山县

1919年夏,道首袁子甄携带湖南省主席赵恒惕文告来该县,与李丙炎等接洽,经县知事公署批准,成立同善社龙山分社,大力发展组织,先后建立了洗车河等地的4个事务所,发展信徒302人。[②]

湖北省

武汉

1917年四川洪信祥号派段佩宾到湖北武汉传道。1918年,段佩宾在武昌涵三宫成立武昌同善社,由前广东省长李开侁担任善长,1920年扩大为湖北省社,由王成斋任善长。1924年,聘军阀、湖北省督军萧耀南为名誉善长,武汉警备司令陆沄为善长。

房县

1922年四川人严天臣来到该县传道,1948年前有信徒160余人,1948年2月改名"鼎新坛"。[③]

麻城县

1920年由同善社省号善长王哲清指派谢暄来该县发展组织,首先在城内蔡伯侯家中成立分社,并向县知事彭懋修备案,取得合法地位。1926年改名为先觉祠,全县设有7个事务所,37个静坐室,发展道徒1767人。[④]

红安县

1919年该县夏国忠在汉口加入同善社,回家乡后,吸收国民党军队某部副团长夏英才等人加入同善社,在县城及七里坪等6处设立分堂,发展信徒。[⑤]

罗田县

1921年传入该县。1949年6月,该县同善社100余人勾结英山大刀会,将罗田县5个事务所,1300名信徒转入大刀会,企图配合英山大刀会举行武装叛乱,被公安机关镇压。[⑥]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70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73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70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88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79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80页。

阳新县

1924年省同善社柯前昌派陶永光来到该县建立同善社分社。会首周来庭，士首潘宿岩，设立教授、文牍等六课，1935年六课改为六舍（包括宣讲舍、文书舍、道德舍、圣社舍、道经舍和庶务舍）。下设11个事务所，到1949年共有道首99人，信徒14169人。[1]

蒲圻县

1923年由李辉武从武汉传入该县，以何敬德为首建立先觉祠，下设羊楼洞、新店、车埠3个事务所，发展信徒198人。[2]

崇阳县

1920年传入该县，由陈星联任会长，并在白霓、路口、华陂等地设立事务所，抗战时期为日本侵略者效劳。[3]

洪湖县

1918年由汉口市同善社社长郭凤翦、刘雅南到该县新堤创办分社，社长为艾贵庭。社内设总理，掌管事务，各乡设立事务所。1927年因反对武汉国民政府被取缔，1939年又在日本侵略者支持下恢复活动。共有6个事务所，信徒3000人。[4]

监利县

1922年传入该县境内，隶属湖北省合一会，代号为先觉祠，对外称同善堂，在城关设堂传道。1945年在汪桥、观音寺等八处分设佛堂。[5]

远安县

1923年四川万县同善社恩职李纯熙等，先后到该县南门外庆寿寺设立事务所，发展组织。同年12月，该县知事许绍谦发布告示，宣布正式成立远安县同善社，社长王子澄，下设事务、收支二股。1927年同善社被北伐军查封，财产被没收。1934年湖北省社派恩职夏至诚到该县县城南门外马晋安家设立明善堂，恢复活动。到1937年已经发展信徒600人。1938年，明善堂又被该县县长谢月峰查封。[6]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82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83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86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88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90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93页。

秭归县

1920年传入该县,至1949年,在该县的一个镇、五个乡先后发展信徒75人,其中道首14人,一般信徒61人。①

随县

1920年同善社汉口组派卢伦来到随县建立分社,以静坐、诵经等方式,宣扬"大道平常,静坐可得大道。小可除病延年,大可成佛成仙"。入道者以妇女为多。1923年分社募款造房屋,建立"国学馆",以教育子弟。1927年分社易名为"先觉祠",管理县城、城郊等地的事务所。②

沔阳县

1921年湖北省社号首林锡祥授命沔阳绅士王爱民等人,在该县东岳庙与会首陈述银、范国章等,在该县整顿道社,健全机构,并在沔城、张沟等地建立事务所,因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一批军政官员、地方豪绅纷纷加入,并担任领导。解放前夕,全县有道首85人,道徒864人。③

天门县

1924年湖北省社派董大鹏来到该县发展组织,先后在岳家口、黄家店建立组织,发展信徒3000余人,该县最高首领称"无极",又名"师尊"。还建立武装组织,称为"柴门"。该社向社员搜刮钱财的主要方法是收取进层费(每进一层,需交银元一元)、香资(做会时每人交三角到一元)、乐卷、恩职费(社首升职要叫恩职费)、供奉款(高价销售供果)。并印制龙票法宝,向社员高价兜售。还散布"真命天子出在社内"等谬论。④

潜江县

1923年由湖北大同祥省社传入该县,初设史公书院,称事务所。1943年发展了熊振海等10余人,解放初期有信徒51人。⑤

咸丰县

1910年,四川涪陵小号"会星恒号"号首陈汝义派天恩庞泽普等人来该县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94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95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96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98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99页。

传道。不久,省号派周清波来到该县,先后在丁寨和县城建立事务所和先觉祠,并建立佛堂4个,静坐室11处,有信徒1200人,道首17人,正副善长40人。[①]

来凤县

清光绪末年传入,到1926年发展信徒300余人,对外称"德善堂",1947年改称"先觉祠",善长改称居士。每月初一、十五定期集会,每到会期,全体信徒在佛堂上香、诵经,会首趁机进行欺骗性宣传。[②]

鹤峰县

1925年由省社派人来该县发展信徒,由城关大豪绅李甫渠掌管,其组织分布在容美镇、新庄等地,共有信徒101人,中小道首33人。[③]

广东省

广州市

1917年由道首雷应霆在广州海珠北路设立大仁祥号,善长为湖南人黄华岳,后由潘金生继任,1933年善长改称号首,由龙伯台任号首,潘金生等为副号首。同年广东全省的同善社划分为5个区,分别管辖粤中、粤东、粤北、粤西和海南。

连南县

1936年道徒君一三从连县进入寨岗,设立事务所,到1953年取缔时,有信徒28人,天恩1人,名誉善长1人。[④]

汕头市

1918年由上海市社到该市设立市社,1953年取缔时有道坛14个,道首93人,信徒3795人。[⑤]

韶关市

1933年传入,随后发展到南雄、始兴、乐昌、仁化、英德、翁源、乳源、阳山、连南等地。抗战时期该处同善社同日寇相勾结,该市道首侯益卿带领日本宪兵在市郊东联村连续几天抢劫、奸淫。1953年被取缔时有信徒946人,道首63人。[⑥]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02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02—803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03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83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91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83—884页。

兴宁县

1920年传入,1922年在该县老街关帝庙成立县社,到解放时有信徒300多人,在黄陂、大坪两地建有分所。[1]

梅县

该县共有同善社事务所四所,隶属汕头的省社,分别于1910年、1917年由汕头、兴宁传入。共有信徒3000余人,分布于全县各区乡,1925年被县政府命令取缔,该社化整为零,让信徒们在家设坛自修。1928年该社蔡飞偕同江西省社头子徐新民来到该县恢复组织,改名为"嘉应先觉寺"。[2]

丰顺县

1920年由汕头道首来到该县丰良镇成立组织,委任原丰顺县一中教师丁培珊为社长,在双溪村江楼设坛,参加者300余人。该县有三层以上道首22人,信徒625人。[3]

五华县

1922年由江西人周海川传入,先在华城镇建立分社,负责人是张谷川。后发展到岐岭,设立事务所,有四层以上道首2人,信徒830人。[4]

澄海县

1920年由汕头市同善社派吴佐尧到该县建立县社,对外称"先觉祠"。全县共设有3个坛,有道首12人,信徒78人。[5]

阳春县

1942年同善社从广州派来一名道首,在春城等地发展组织,有四层以上道首37人,发展信徒150余人。[6]

茂名市

该市同善社组织属于省号广东同善社第四区社,1920年,广东省号道首刘藻芬到电白县城北街谢家公馆办社传道。有信徒71人。[7]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86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86—887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87—888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88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92页。
⑥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99页。
⑦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99页。

廉江县

1923年由高州(茂名)同善社派人到该县的安铺镇组建县社,属梅篆社领导。县内最高为七层,设在安铺镇,属县社级,下设廉城、石岭、大榄田三个事务所,每个所设佛堂一个,随后发展到附城、吉水、河堤、横山、营仔、新民、良垌、雅塘等地。当时有道首67名,信徒349人。到1929年设5个事务所,发展信徒915人。1953年取缔时,逮捕有罪恶活动的道首6人,自首道首40人,退道者688人。①

广西省

1911年从四川传入广西,1912年到1918年,湖南省同善社又先后传入桂林、平乐、全县、宜山、兴安等县。1917年,同善社"十地"阚宗骥从桂林来到南宁,开荒办道,成立广西省社,阚宗骥自任社长,"天恩"叶镜湜、袁维泽任副社长,此后,便从南宁向柳州、郁林、那马、隆山、临桂、田东、昭平、平南、容县、贵县、博白等地发展,分别设立县社。1921年,叶镜湜、袁维泽到苍梧传道,成立梧州同善社。1922年任命前清广西省咨议局议长甘羲为该县社长。1923年,省社派道首谢以度等人到恭城等县传道;广东省社的萧永国、陈省文到北海、钦县等地传道,梧州同善社名誉社长陈竹铭到岑溪传道。1925年,贵县同善社"引恩"梁步云到桂平、陆川传道。1929年彭泰荣企图登基称帝的阴谋暴露后,同善社总社及各地分社被取缔,并通缉各地号首,广西同善社即转入地下,省社和邕宁县社合二为一。1930年桂林成立同善社,1934年被查封。之后,转移到南宁,以大义祥号商店的名义为掩护,暗中派人到桂平等地发展组织。在桂林设立大义祥号办事处,逐渐向信都等地发展。解放初期,该组织参加匪乱,1953年被自治区政府取缔。②

南宁市

1918年湖南省社派人到桂林、平乐等地传道,十地(九层)阚宗骥从桂林来到南宁,成立同善社广西省社,自任社长,"天恩"叶镜湜、证恩袁维泽为副社长。1927年改称"大义祥号"。③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01—902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07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07页。

资源县

分别由全州和湖南新宁传入,1918 年道首蒋步清到西延传道,在大埠街建立同善社事务所。1923 年,梅溪街商人段介眉在新宁县加入同善社。而后,新宁县同善社派人到梅溪串通段介眉、吕川锦发展组织,在梅溪街建立事务所。此后,吕川锦又担任了全州县同善社的副社长,并建立第二个事务所。同善社先后在全州建立了三个事务所,发展信徒 131 人,有道首 5 人。1953 年被人民政府取缔。①

桂平县

1928 年,同善社南京分社社长阙宗骥派罗建雄到桂平设立浔州同善社,由李学文等人把持,解放初期该县有信徒 300 人,道首姚健生因组织土匪暴乱被处决。②

博白县

1919 年传入,善长苏月胜、副善长梁冠南最初以博白镇的节孝祠为活动基地,先后发展信徒 1264 名。1949 年博白解放前夕,该社骨干分子张贡三建立反动武装,购买枪支 200 余支,配合县保安队搜捕地下党员。解放后张贡三伪装改邪归正,却暗中接济土匪,1953 年取缔同善社时,将张贡三处决。③

防城县

1924 年同善社"证恩"萧永国从北海市来到该县传道,吸收陈相才、孙壁山等 30 多人入道。1925 年萧永国离开后,由陈相才、孙壁山主持道务。日本人入侵防城时,同善社道徒杨再新充当汉奸,带领日军进攻钦防路,任伪自卫总队副总队长,1950 年 11 月被枪决。④

昭平县

1916 年由江西省鸣山煤矿的瞿绍来到该县开道,1921 年传入昭平,先后在樟木、黄姚、巩桥、保善等乡镇发展信徒。1953 年取缔时有 284 人退道。⑤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12 页。
②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45 页。
③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17 页。
④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18 页。
⑤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922—923 页。

东北地区

同善社在东北地区自成体系，十分兴盛。当地军政长官、政客大多加入。黑龙江和吉林均设有省社组织。辽宁最初因为省长王永江不同意设立同善社的省级传道机构，所以直到王永江下台后，才在沈阳设立"大成顺号"，号首为刘绍周。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以奉天（沈阳）的同善社为总社，与北京的总社脱离关系，自成体系。①

① 陆仲伟：《同善社》，社会问题研究丛书。

第十章　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

一、教主马士伟的创教经历

"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兴起于1913年，是清末民初由秘密教门蜕变而成的重要会道门之一。教首马士伟，字冠英，山东省常山县(今邹平县)大丁王庄人，生于1873年，木匠出身，曾加入过圣贤道。他20多岁时离家出走，求师访道，声言他在1906年在33岁时，曾经见到过来自江南的三位"异人"，从他们那里"学得异术"。这三位"异人"便是赵乾坤、杨和尚和佟道士。赵自称是"老圣人"，马士伟便是他们来长山县所要寻找的"新圣人"，遂同马士伟密谋创立道门。从此，马士伟便蓄起全发，隐居在自己家里的南屋，三年之内足不出户，一日三餐也由妻子送饭至门口，不与任何人见面。由于三年之内不见阳光，以至须发全白。三年之后，他以雪白的长须长发，给人以飘飘欲仙的感觉，便自称"活佛"、"弥勒佛转世"。他首先把姑丈申光耀和济阳的王珠金度为弟子，接着又收徒多人，于1913年在大丁旺村创立"大灵山佛教一心堂"。他为了迷惑信徒，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房产、土地全部卖掉，携带妻女讨饭度日。所到之处，人们皆认为他们是"神仙"。1923年，他已拥有500多名信徒，遂以大丁旺庄为基地，分五路向外发展，每路50人，一共250人。一路以刘光辉等为首，带领50余人前往关外；一路以高文公为首，也带领50人到山东各地传道；一路以王珠金为首，前往江南；一路以朱贵家为首，前往河北省；一路以王海长为首，去山西传道。这些人来到各地建立分会，扩展势力。马士伟为了扩展道务，拼命攀附权贵，他利用捐赠陆军医院的名义，向山东当局贿送金条64根，大洋10万元，借此得到当权者的青睐。山东督军郑世琪曾为该会书写匾额"乐善好施"，军阀张宗昌为他书写匾额"博施济众，主善为师"。然而，马士伟的势力不断扩展，却引起了当局的警觉，1916年郑世琪下令解散"一心堂"。马士伟便想出一个金蝉

脱壳的妙计，把一心堂与长山县的红十字会合并，自任红十字会分会长，而暗中仍然保持一心堂的组织系统。次年，他派弟子赴山西建立一心堂分会，1922 年，又进一步派人到河北、绥远、河南、江苏、四川、甘肃、上海、南京、长春等地建立分会。声称"因四海之内皆同胞，故不独中国各地，即英法美俄诸国，亦皆为我活动之处所"。1924 年，马士伟趁军阀混战之机，勾结军阀，以救护伤兵为名，派弟子申耀光、高仁立等人，与上海红十字会会长颜惠庆取得联系，他得到颜惠庆的推荐，正式担任了长山县的红十字会会长。为了获得更多好名声，他又标榜"乐善好施"，出资兴办学校、医院，并在各处修桥补路，举办各种慈善事业，以博取慈善家的美名。

二、马士伟妄想当皇帝的政治野心

1928 年 5 月，日本侵略者在制造了济南惨案后，侵占了山东的大部分土地。马士伟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以山东红十字会长山分会会长的名义，出资赞助济南的汉奸组织"维持会"。翌年，他以为时机已到，便大肆鼓吹"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民国将灭，帝制复兴"，并制造黄天龙旗多面，准备登极称帝。1929 年 1 月 30 日，山东淄博一带的"黄沙会"首朱智静和红枪会首牛宝山投靠马士伟，使之实力大增。当时该教的信徒，在全国已经达到 56000 多人，[①]他于是开始梦想做起皇帝来。他还正式发表宣言，声称定于当年农历二月二日在该县周村即皇帝位，将周村改为"中京"，并修建皇宫，名曰"无为宝殿"，定年号为"天运"，封了"嫔妃"、"大臣"。以王幼年为内阁大学士、外务大臣兼长山县县长，把势力扩展到桓台、淄川、博山、邹平、临淄等县。还购买枪支，建立了一支拥有 1 万多人的军队，其中有二三十个日本人，准备定于当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举兵造反。当时山东新闻刊有访问"马皇帝"的报道称：马士伟现年 56 岁，20 年前得有异术，颇得当地居民信仰，现有全国信徒 40 万，群集大丁旺村者达 2 万。信徒称马士伟为皇帝，父老目他为天帝第二子。马以大丁旺村为"天京"，以其诞辰日二月初二为"圣寿节"。年号"熙顺"，国号"新明"，定长山县为"京畿"，有官制行四宰相、六郡、九卿，沿用旧明制度。组成黄沙会、红旗会为开国先锋，以平天

---

①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年，第 460 页。

下。其内部人称，皇帝实为朱洪武后代朱宗光，年24岁。马士伟赐其部下均改马姓，他自己任军机大臣，下有外务大臣马光云、财政大臣马士贞、大学士马士标、内务大臣马春田、驿务（交通）大臣马培臣等。①

山东省政府获悉马士伟图谋造反的消息后，立即咨请驻军的总指挥部，派四十六师丁翰东旅前往剿办，并派长山县县长赵桂成会同协剿。8月7日，官兵到达大丁旺庄时，马士伟令其妾之父、兄以“犒军”为名，来到官兵驻扎处，企图拖延时间，保存实力，结果被赵桂成所拘押。马士伟见阴谋已败，遂亲自率领万余人前来抵拒，打死打伤官军12人。官军便大举进剿，结果，击毙叛军300余人，生俘600余人，其余则狼狈逃散。马士伟本人逃往大连，后来辗转来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内的桃山街创立“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官兵在其巢穴中发现大量谋叛的证据，其中有写有“天道大明”的大旗和皇宫建筑图的图案，图中绘着紫薇宫、文朝房、武朝房、将军府及三宫六院等。还有所谓的“天书”，书中写有“三民主义魔王兴，叩求马主登大位”等内容。其后，山东省政府又委派省府委员陈鸾书带领工作人员前去查办此案。在离长山县18里的三处据点，又发现“共和同盟军暂编五十师”的绸符号数千个，表明马士伟尚有更大的野心。“一心会”在山东被取缔后，马士伟又把该会的总部迁移到山西省五台山的铜官店。为此在会内制订了“五台山上香可上，六十三真性归天，更改泄露，明公击斩，五雷轰死”的秘诀。1930年春，绥远一带遭到灾荒，马士伟又以为时机已到，便派弟子黄青云前往发展道徒。黄青云在绥远省托克托县（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了第一个一心堂佛堂。他以加入该会将来得道后，“骑上扫帚即可上天”等鬼话骗人入会。次年，适逢归绥东部发生瘟疫，许多群众被感染而死亡，一心堂便乘机大肆宣扬加入该会，蓄留长发即可免于传染得病，一些人为了躲避瘟疫而加入其中。1932年，马士伟来到北平，攀附军阀吴佩孚、张效坤等人，成立“普化救世佛教会”，由马士伟自任会长。1933年，马士伟的弟子黄青云在绥远省又从天文学家处获悉次年将会出现日全食，于是又到处扬言，明年将发生的日全食乃是天下要变的征候。结果，当年就有500多人入教。由于黄青云宣称信教虔诚的最高表现便是自筹钱财觐见教主，从而使许多信徒变卖土地房产，将所得之钱奉献给教主，弄得信徒倾家荡产。同年九月，马士伟又偕亲信陶

①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170—171页。

云祥等前往天津，与天津日本租界的警署署长野山及日本特务横山相勾结，将一心堂改名为“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同时又以“大东亚佛教总会”的名义公开活动。该会以马士伟任会长，陶云祥为副会长，日本人野山为顾问，会内还有不少日本人。马士伟对外宣称该会信奉儒释道，以举办慈善事业为宗旨。对内则“自称皇帝，擅封大臣”。并且改变历法，规定一年为 18 个月，一月为 48 天。将 1935 年定为“天盘”由东向西旋转的一年，又出版《回轮转》及《阴阳日历三合对照表》。《回轮转》以 1935 年(乙亥年)为界，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前知五千年”与“后知五千年”，宣称宇宙万物都是“老父”和“老母”(也就是马士伟和他老婆)所安排的。该书还预言乙亥年以后，蒋介石的“中央”是“假中央”，以后要出“新中央”，最后才是“真中央”，实际上是为自己登极称帝作舆论准备。该会还把每年的 10 月 22 日(亦说 2 月 2 日)马士伟生日那天，作为“圣寿节”，届时在总部张灯结彩，各地信徒都要前来祝寿，大肆招摇。在杨家花园 47 号该会总部内，专门为马士伟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内宅”，室内高悬“正大光明”匾额，犹如宫殿，内居少女数十人，作为马士伟的嫔妃。马士伟自称皇帝，平日不与外人见面，倘若有人询问其去向，则答以“去南海朝山”。为了标新立异，把“一”字写作“1”(读音为“YAN”)，该会把会名写作“1 心天道龙华圣教会”。1935 年 9 月马士伟死后，该会为了继续以马士伟的名义蒙骗信徒，秘不发丧，其妻贾氏以“老母”的名义，把持会务，教内宣称：“马士伟虽然死了，但借其妻体还阳”，又说：“马皇帝上南海去了，回来时就要当圣主封神，五十四国参拜，天下大变。”10 月 16 日，马妻贾氏遂口述《九传还阳回龙转》一部，由道首陶云祥等八人，在贾氏面前跪地抄录。内容主要是称颂马士伟为“当今皇上马是无生父母我主”，“真马是真銮，真銮是魁元，魁元是我主，我主是新主，新主是士伟，士伟字冠英，当今皇上马万岁，万世、万世万万世的江山。”其印章上镌刻的印文是：“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无为无生万岁万岁万万岁，倒不颠无生父母新真人新玉玺印”。[①]

马贾氏还自颂说：“主里生了主，母里生了母，母母都是我，我还是真母。家里生了家，我还是真家。国母是国母，我还是国母。国母是国主，国主还是我，我还是国主，主主都是我，我还是主主。”[②]10 月 20 日，贾氏宣称自即日起，整个世界已经进入“白阳期”，宣布马士伟为“白阳圣主”，她本人为“白阳圣母”，宣

---

①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年，第 466 页。

②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年，第 466 页。

称她坐的是“真朝廷”，登极称帝。并把每年改为18个月，每月改为45天。接着又“开科考试，封官赏爵”，先后举行9次考试，考中者96人称为“九十六贤”，她则从这96人当中选出“六大宰相”，“十二朝臣”，“十八罗汉”，“四十二宿”。为了庆祝她的登极，于11月15日由36个道徒身穿白色、96个身穿蓝色、8个身穿紫色道袍，18个打灯笼，由军乐队领先，两辆汽车开路，在大街游行，招摇过市。[①] 1937年天津被日寇侵占后，该教更凭借日本侵略者的势力，将会址迁移杨家花园47号，作为总部，进一步扩大势力。仅在1937年上半年就把道务推向了河南北部的十余县，以该县汉奸马星广(又名孟广智)为“引进师”，秘密引人入教。那里居住着信徒441人，其中男信徒254人，女信徒157人，女信徒多为二三十岁的年轻女子。该教标榜“清心寡欲”，要通过修炼以达到“清净无为”，因此规定，凡入该教者，需将自己的土地财产，全部捐献给会内，家中之生活则由会内供养。因此，人们称该教为“净地会”、“倾家会”。不论贫富，入道后一律过简单朴素的生活，虽然捐献巨万之富人，入教后亦只能身着棉质道袍，足登敝履，食物为小米豌豆粥，菜为萝卜、咸菜。该会还要求男信徒一律蓄长发，头发任其生长，故被称为“长毛道”。男信徒高帽左衽，而且从不洗手足，污秽不堪，见者会怀疑为原始人。该教供奉的神祇主要有“无极父母”、“天地父母”、“太白老君”、“太上老君”、“孔子”、“玉帝”、“观音”等。入道时必须立誓：上书“老父母尊前，某情愿入会，倘违誓言，明公即斩，空中电轰。”该道对外宣称，其宗旨是“忠君孝亲，和睦乡里，吃屈忍耐”。以巫术、符咒为人治病。

该会在各省设有分会，各县设有支会，村镇设有佛堂。对外有分会长、支会长、主持和一般会员，对内称圣、领袖、堂长、坛主。坛内办事人员分为文书、财管账、招待、开化、跑林、传道师、道徒。入道之后，不论父子、兄弟、母女、姐妹，彼此间皆以师兄、师弟、师姐、师妹相称，而且一律改称姓马。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为了配合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侵略，大肆散布涣散我军心民心的邪说，胡说：“民国以来，人民苦于涂炭，即兵士亦不知战意何在，此皆由于私斗私欲之结果，颇与天意不一致。”“盖天对众人一视同仁，绝无中国日本之分。而人类各种私欲，以至自相残杀。我会乃仰体天意，领导社会向善。若天下皆我会员，则必早已太平，而中日之事，亦必消灭净

①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459页。

尽。"把中国人民反对日本的侵略，说成是什么"私欲私斗"，"自相残杀"，只要大家都加入该会，便可以"早日太平"，完全是为日本侵略者辩护。难怪这套汉奸言论，颇受日本记者的称赞。前往调查一心堂的日本记者称赞他们："其说虽近迂腐，然亦有其真理在。"其信徒虽然"垢面敝衣"，却是一些"勇敢真挚之实行家"，是"专为理想社会之实现而奋斗"的人。而一心堂对于前来调查的日本记者，也视为亲人。据日本记者记述说："我等一行先至桓台县孙殿芳氏处，乘孙氏汽车行 18 里之土路，于薄暮中达丁王庄。此庄甚大，外无围子等设备，汽车抵达门前通报后，即有长须怪人 10 余来迎，笑问："回来了吗？""回家了吗？"我等被此辈怪人引至外客接待所，首先见到'五代齐昌'四字之匾额。旋有一人持茶进，一人持烟进，其意殷勤，颇使人有久别作归之想，亲切意味，溢于眉宇。俄推桌而入，罗列山珍海味 18 种，并有佳酒，我等颇为惶悚。"[①]一心堂还借日本侵华的机会，大肆发展信徒，宣称日本侵华乃是"三期末劫"将要来临，只有加入该会，才能躲过这场灾难，否则便会"永坠苦海，不能超生"。会内骨干陶云祥通过日本特务于宝泉与日伪天津维持会次长中山，将该会重新备案。1940 年，该会还得到了以东条英机名义发给他们的"奖状"。

三、典型的当代邪教

从有关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的种种活动来看，该教乃是一个典型的当代邪教。该教同当代西方国家的邪教的第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求信徒在该教总部过集体生活。教主过着如同帝王般的奢侈生活，而一般信徒则被迫过着清苦的禁欲生活。从当时负责调查该教的崔蔚云与该会总务组长马仙龙的谈话可知，在天津杨家花园 47 号的总部，有佛堂五六处，但皆"尘封蛛网，香火不盛"。调查者当日见到该处有信徒百余人，男女兼有，男皆蓄发，身穿蓝布道袍，女梳双髻，装束不限。该会自高级职员至一般传达差役，一律为内部之人，无一例外。会员中各以原有技能，各司其事，如裁缝、木匠、厨役等，自给自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马士伟居住在一所俨然宫殿的豪华楼房，内设多间居室，每间居室内有二三十岁的年轻女子 6 至 8 人，作为马士伟的嫔妃。该会崇奉的神祇主要有

---

①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0 年，第 173—174 页。

天地君亲师、孔孟、如来、老子,一般不设偶像,仅供该会年谱,会员总数约56000余名。其中务农者约占五分之四,余为从事工商者。要求会员集中过集体生活,一切费用均由会员自己负担。新入会者需缴会费50元,每月交纳生活费10元,春冬两季要向会内捐助款项,作为向社会慈善机构捐助的费用。

该教同当代邪教的第二个共同点,是具有一套严密的组织且企图推翻世俗政权,建立神权统治,为此,该教还建立了一套模拟的政权组织。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的组织情况:该会的组织系统分为对内对外两套班子。对外是公开的班子,形式上类似一般的民间组织,设有总务、文书、会计、庶务、交际、教义、赈济、宣传8个组。每个组均设正、副组长各1人,另设"领导助理员"、"办事员"若干人。各地分会也设有同样的机构。对内则是类似朝廷的组织,设有"八大部",分为内三部与外五部;十二朝臣、六大宰相、十八罗汉、九十六大贤。马士伟自称是"上帝"、"新无生父母"、"新白阳活佛"、"马皇上"等,接受信徒的朝拜。以丁王庄为"天京",长山县为"京畿",国号"新明",年号"熙顺",他赐给八大部首领、十二朝臣、六大宰相以马姓。如外务大臣马光云,财政大臣马士贞,大学士马士标,内务大臣马春田,驿务(交通)大臣马培臣。教主马士伟还利用女信徒的虔诚和愚昧,把许多女信徒以"嫔妃"的名义加以奸淫和霸占。

为了发展组织,扩展势力,该教还在各地建立领导机构。在省一级建立分会,县一级建立支会,在村镇一级建立佛堂。分别设有分会会长、支会会长、主持和一般信徒。道徒入道后,不论原来是父子、兄弟、母女或姐妹,彼此间一律改称师兄、师弟、师姐、师妹。而且入道后还要一律改姓马。

该教与当代邪教的第三个共同点是,利用各种骗术,欺骗、愚弄信徒。马士伟为了骗人入会,宣称自己能够施展秘术。在他袖中可以映出信徒四代之祖先;求他代书时,可以勿告原委,即能书出;他能知新来信徒的数目及所奉献之金钱数目;若从他处借得资本经商,三年之内可获十倍利润。他以此为诱饵,诱使大量信徒加入该会。

该教与当代邪教的第四个共同点是拥有非法武装,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队伍,作为教主的私人卫队。拥有5000名持枪的士兵,四门大炮,并且自造步枪和大刀。另外,还用重金延请军事人才,帮助他训练军队,计划把持枪士兵扩大到2500人。为了神化自己和为他那支队伍鼓气,马士伟还自我吹嘘

说他能够"吹风化雨"、"撒豆成兵"、"一念咒语,即能倒毙十里之外的敌兵"。①

主要歪理邪说:该教特别鼓吹"三期末劫"等邪说,宣扬"第一期是青阳世界,由高玉皇掌天盘,第二期是红阳世界,由张玉皇掌天盘,第三期是白阳世界,是马玉皇掌天盘"。而这个"马玉皇"也就是马士伟本人。并声称"现在红阳已尽,白阳出世收圆,三期末劫即将来临,大难临头,人人将要堕入苦海。只有入道,好比上了法船,就可以躲灾避难,死后还能升天堂步入地府。""白阳世界"来临时,要进入"白阳世界"就必须首先劝人入道,能够多劝人入道,就算立了"外功",如果不立外功,就难以逃脱三期末劫,自然更无法进入"白阳世界"。该教宣扬:"自古就有三期末劫,头期燃灯佛是青阳会,标记是三月三插柳枝;二期释迦佛是红阳会,标记是端午节插艾枝;三期是弥勒佛,降临凡间救人。"并且要求信徒念诵"天班佛号",内容是:"无生来掌盘,无生来掌盘,白阳一定万万年,谁知真妙玄;无生来掌盘,无生来掌盘,新无生出世坐宝莲,定主白阳盘;无生来掌盘,无生来掌盘,老圣人出世天下安,谁知真龙天;无生来掌盘,无生来掌盘,白阳活佛坐天坛,白阳得自然;无生来掌盘,无生来掌盘,新真人出世坐金銮,谁知真天盘;无生来掌盘,无生来掌盘,三赴龙华大团圆,出了新圣贤。"②总之,该教的基本"教义",与明清以来的秘密教门和会道门并无区别,只是更加强调"白阳世界"的降临。

马士伟在教内自称"无生父母白阳活佛",其妻马贾氏为"白阳圣母",马士伟死后,马贾氏又自称"新白阳活佛"或"老母"即"无生老母"。该教标榜崇奉儒释道三教合一,尊奉儒家的孔孟、佛教的如来和道教的老子,特别推崇老子的清净无为思想,强调清心寡欲,以达到"无为"。宣称该教的"一心"代表孔子的儒教,"天道"代表老子的道教,"龙华"代表释迦牟尼的佛教。

该教的主要"经典"有:《无生老母十指家书》、《五更家书》、《龙华经》、《醒世良言》、《醒世梦集》、《孔明碑文》、《刘伯温寿天数》、《布袋经歌》等。③

该会有一套神秘的入道仪式,要求信徒每天早饭、午饭各焚一炉香,每逢礼拜,还有叩头仪式,不同等级的信徒也各有不同:初入道者,叩一个头,作 4 个揖;领了道名者,叩一个头,作 10 个揖。在马士伟掌教时期,要求信徒每日三餐

---

①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0 年,第 172—173 页。

② 《无生老母十指家书》。

③ 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 5 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00 页,

均要向他"献饭"和磕头。在马贾氏掌道时,每逢吃饭时,要念诵"心向白阳活佛下饭"和"转天、转地、转人皇"或"十转",即"一转天,二转地,三转人皇,四转孔夫子,五转李老君,六转耶稣,七转李廷玉,八转李向善,九转马祖,十转弥勒"。

加入该会需有两个老道徒作为介绍人,缴纳"标名费",至少银圆一元,多则十元。缴纳"标名费"表示已经可以"天榜标名,地府抽丁",可以不再下地狱了。入道时还需要填写誓愿表,一般是四开的黄表纸,用红笔书写:

某某某

引进保人

某某某

无为新老父母新白阳活佛尊前,遵听法令,若有时刻丝毫须臾更改违误不遵,明公即斩,空中雷轰。

某某某自己叩恳发愿,情愿归家皈一,忠心保护孝顺。

或:

弟子某某某叩恳发愿,情愿归家皈一,真心保护,孝顺圣帝无为新无生父母、新白阳活佛马圣师尊前。遵法听令,若有须臾更改,泄露违误,明公即斩,空中雷轰。一子入道,九祖高升,见富不动心,遇难不移志。①

填写完毕,入道者由引进师引进佛堂,由传道师教导进道的礼节,接着入道者面朝悬挂"佛"的字轴,先做手式,以左手(称为"善手")握右手(因系操刀杀生之手,故称恶手)中间留下空隙,向上不过眉,向下不过膝。口念"新无生父母好"。然后跪下四拜,站起后再四拜(或四揖)。仍然跪着,听传道师讲述入道之好处,再由传道师将誓愿表取出,领着入道者念诵誓言发誓,念毕,由入道者在纸上画押。最后由传道师将黄表纸誓言在烛火上焚化。再传授"九字真经口诀":"新白阳活佛阿弥陀佛",或十字真经:"南无天元太宝阿弥陀佛"。上述真经口诀,为道内秘密,规定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儿女,如有泄露,明公即斩,空中雷轰!

① 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1—202页。

第十一章　红枪会

红枪会是以成员使用的武器——系着红缨的长矛而得名,除红枪会本名外,也因为系有黄、蓝、白、黑等颜色缨的长矛为武器而分别称为黄枪会、蓝枪会、白枪会、黑枪会、花枪会、一心会、大刀会、天门会、毛篮会、扇子会、庙道、孙真会、哼哈会、大仙会等几十种,其中以红枪会最为通行,故史料和著述中多将这些团体统称为"红枪会"。①

一、红枪会的性质问题

红枪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向来有不同看法。

早在20世纪20年代红枪会兴起,就受到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关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曾对红枪会做过调查研究。他们大都认为红枪会是北方广大乡村民众为抵抗土匪和溃兵骚扰而自发兴起的自卫保家的武装组织。李大钊说:"北方直接遭受兵祸最厉害的省份,如山东、河南、山西、直隶等处的农民,以不堪兵匪的骚扰,乃自然的有武装自卫的组

① 据路遥先生考察,红枪会有许多不同的名称,重要的有以下一些:1."红学"。盛传于山东的曹、单一带,因为加入枪会叫做"上学",入红枪会则曰"上红学",简称"红学"。在"红学"中又有大红学、中红学和小红学之分。大红学以拜神默法为主,中、小红学以练金钟罩、避枪炮之吃符默法为主。2. 坎门。或称"玄门",这是因为按照八卦的方位,坎位居北方。玄为黑色,按照五行的说法,北方属水,水能灭火,坎门属于武功,可以抵挡发火之枪炮。大刀会所敬的真武神,就是北方神,所以,大刀会就叫坎门。3. 黄沙会。属于金钟罩型,但敬五圣老母、西天佛祖、南海大士等。会内设有大掌盘、点传师、引进师等,会内禁止吃生葱、生蒜、生韭菜、青牛肉、黑牛肉、大头鱼等。所用功法有:闭眼、捧手、按阴阳八卦、念佛咒等,最后在东南角上吹两口气。4. 仙门道。与大刀会、黄沙会并立,需要"点场",学摆架子,称为"复场"。5. 杆子会。在山东郓城使用此名,因为使用的武器是长杆标枪,故名。6. 无极道。敬奉无生老母,禁食马肉、狗肉、大头鱼、雁肉等。7. 铁板会。盛行于山东淄川、平度一带,其真言、咒语大致同红枪会相同。8. 五门。最早在昌邑出现,所谓五门是指:红门、仙门、黄门、白门和黑门。(见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476—477页。)

织——就是红枪会的运动”。[1] 陈独秀更是认为红枪会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太平天国、义和团之后的又一次农民革命，是“武装自卫的农民”。[2] 1926 年 7 月 12 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中，提出：“过去及现在直隶、山东、河南一带的红枪会运动，他的要求和行动，都是直接间接反抗军阀政治的，他是真正民众的武装。”[3]

长期以来，学术界也一直采用上述说法，认为红枪会是“自发产生的真正民众的自卫武装”。[4] 近年来，日本学者三谷孝先生对红枪会的性质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无论是军阀的苛敛诛求、残兵败将土匪的骚扰、还是外国军队的入侵，当这些来自外部的压力，达到破坏村庄的传统社会关系的程度时，为了保卫这种社会关系，作为强化农村民众团结和战斗力的手段、潜伏在民间的具有独自信仰并代代相传的宗教秘密结社，与以全村组成的自卫性组织相结合而成立的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大众性结社。”[5]认为红枪会并非“农民的自卫组织”，而是一种“宗教结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会道门。鉴于红枪会是由大刀会演化而来，而大刀会又同清代的秘密教门八卦教有密切关系，所以，三谷孝先生的说法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王文玉在博士论文《20 世纪 20 年代的河南红枪会》中又进一步提出：“红枪会不是民众自发掀起，而是基层社会权力控制系统发动

---

① 李大钊：《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政治生活》第 80、81 期合刊，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 年。

② 陈独秀：《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向导》，第 158 期。

③ 引自秦宝琦、谭松林著：《中国秘密社会》第 1 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附录一，第 163 页。

④ 这方面的论著参见：邵雍的《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陆仲伟的《中国秘密社会——民国会道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濮文起的《秘密教门——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蔡少卿的《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申仲铭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会门武装》(中华书局，1984 年)，路遥的《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年)，乔培华的《天门会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罗宝轩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枪会》(《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 4 期)，李子龙的《二十年代的红枪会运动》(《江苏社会科学》1991 年第 3 期)，刘广明的《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河南红枪会的再认识》(《郑州大学学报》1999 年第 4 期)，倪佩的《河南红枪会与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湖北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 期)，梁福烈的博士论文《红枪会研究》(2002 年，未刊稿)等。

⑤ [日]三谷孝：《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3 页。

起来的。在基层社会,许多村社首领、地主乡绅是社会权力控制系统最低级的一环,承担着实际控制村落社会的职能。由于军阀、土匪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他们对成立红枪会持积极态度,且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红枪会最初的倡导者,多为地方之豪绅地主。他们为了减少自己对军队摊派的供应负担,便宁愿先出一笔款子请'老师'传授气功和打制刀枪武器。因而各地红枪会的指挥权多把持在豪绅地主之手。"①

对于上述论点,作者首先梳理了红枪会首领的阶级构成:

河南红枪会首领一览表

姓 名	籍 贯	个人经历与职业身份	在红枪会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
朱金刚	伊川白沙镇	没有田产,卖过馍,当过煤市经纪,担过杂货游过乡	1911年创立新庙道	《河南文史资料》第19辑,第93页
张宝同	登封县箕山	自幼诵读四书五经,能舞文弄墨	1915年加入新庙道,为朱金刚写神灵牌位,入道手续,入道誓言	同上
孙殿英	永城	早年为匪,后加入庙道,是会道门出身的军阀	庙道会头目	参见孔凡军的《军阀百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19页
李红梅	新郑	不详	新郑县南、县东庙道首领	《河南文史资料》第19辑,第129页
马大个	新郑小马庄	不详	新郑县北庙道司令	同上

① 王文玉:《20世纪20年代河南红枪会研究》,博士论文,2004年,打印稿。

续表

姓　名	籍　贯	个人经历与职业身份	在红枪会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
宋登贤	新郑县宋庄	读过私塾，当过泥瓦匠、厨子、粮食贩子，后来开店铺，曾加入同善社。为人讲义气，好交朋友	新郑“神团”的创立者和首领	《新郑文史资料》第1辑，第81页
梅金选	登封大金店梅村	貌不惊人，身材短小，留着小辫子，一身土气的乡村老实人，无学识，不会花言巧语，但对人忠诚	登封红枪会首领	《巩县文史资料》第6辑，第41页
郭官林	林县油村	富裕中农或中农，曾是东圣道徒，迷信鬼神，是个近于巫师之流的人物	建立天门会	《河南文史资料》第11辑，第56页
韩欲明	林县油村	曾是东圣道徒，目不识丁，家有二亩坡地，三间草房，除开荒种地外，还走乡串户，做木匠、石匠活，为人耿直侠义，好打抱不平	接替郭官林，成为天门会领袖	乔培华：《天门会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页
郭金昆	林县三井村	前清秀才，家是地主，与韩欲明是亲戚	韩欲明的“真正”军师，韩对之言听计从	《河南文史资料》第11辑，第63页
冯贵德	涉县合漳村	家有几亩山地，喜武术，好不平，讲义气	涉县天门会首领（武传师）	《邯郸文史资料》第5辑，第13页
冯保汉	涉县	失意秀才	涉县天门会首领（文传师）	同上

续表

姓名	籍贯	个人经历与职业身份	在红枪会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
范志和	磁县彭城	瓷工	磁县天门会首领	《邯郸文史资料》第5辑,第83页
李有录	磁县潘旺村	不详	磁县天门会首领	同上
杨贯一	浚县三角村	地主,土地多达500亩,家中还开有酒店、药铺	浚县天门会传师,其父杨茂林为天门会分会长	乔培华:《天门会研究》,第78页
崔振岗	辉县	地主士绅实力派,清末山东省墨县的候补知县,家里有枪若干	天门会西川(辉县也称西川)总会长	《河南文史资料》第11辑,第81页
崔弼元	辉县	有钱的大地主,素称"足智善谋"	与崔振岗主动投靠天门会	《河南文史资料》第11辑,第82页
老葛清	洛阳西南乡胡家嘴村	由洛河、黄河放筏,贩运货物。参加过义和团,1899年以拳师身份到豫西发展势力	宜阳红枪会领袖	《宜阳文史资料》第4辑,第66页
何凤鸣	洛阳北窑	镇嵩军旧部	洛阳红枪会首领	《河南文史资料》第10辑,第72页
娄百循	通许东乡娄拐村	清末的义和团道徒,家庭是小地主,平时好结交江湖人士,略识文字,粗通术数之学	在通许发起组织红枪会,控制杞县、陈留、通许三县的红枪会,是威震豫东的红枪会首领	《河南文史资料》第10辑,第84页
张孝文	民权宁庄	破落的大财主	民权东北部红枪会总团长	《民权文史资料》第2辑,第16页
秦同宽	民权秦老家	不详	民权红枪会首领	同上

续表

姓　名	籍　贯	个人经历与职业身份	在红枪会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
陈敬轩	民权陈庄	不详	民权红枪会首领	《民权文史资料》第2辑,第16页
杨宗晟	新安杨家凹村	不详	新安县红枪会首领,本人曾接受张治公的收编,后又反对张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20卷,第490页
杨道南	鲁山柳林村(现属子营乡)	张良区分管村民武装、枪支子弹并负责治乱安民的区民团团长	1924年建立鲁山红枪会	《鲁山文史资料》第4辑,第105页
朱润生	鲁山南山羊圈村(现属子营乡)	绅士	鲁山红枪会领袖	同上
吴桂勋	鲁山张官营附近张庄村	绅士	鲁山红枪会领袖	同上
霍文炳	山东单县	当过军官,吸食毒品,流氓成性	开始是山东单县红枪会头子,不久就成了河南滑县一带红枪会的总头子	《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第70、73页
张西府	滑县张庄集	大地主	滑县新庄集一带红枪会首领	《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第67页
李保安	滑县干鹅村	给人当雇工	滑县高平一带红枪会首领	同上
朱景尧	滑县大郎口	地主或富农	滑县红枪会的领导者	同上
马运武	滑县南阳庄	地主或富农	滑县留固一带红枪会首领	同上
贾永福	滑县寻村	地主或富农	滑县寻村集一带红枪会首领	同上

续表

姓　名	籍　贯	个人经历与职业身份	在红枪会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
赵廷弼	不祥	地主或富农	滑县列固中砦玉皇庙一带首领	《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第67页
陈敬身	滑县小田庄	地主或富农	滑县小庄一带红枪会首领	同上
马集勋	睢县	不详,但在地方有影响有实力	睢县南马庄一带红枪会的首领	《睢县志》,《河南文史资料》第10辑,第89页
苗铁峰	睢县	同上	睢县南苗楼一带红枪会首领	同上
白汝芬	睢县	同上	睢县北龙潭岗一带红枪会首领	同上
李西峰	睢县	同上	睢县西乡李康河一带红枪会首领	同上
徐钟十	睢县	同上	不祥	同上
吴绍周	睢县	同上	睢县西北老铁岭一带红枪会首领	同上
杜春山也叫杜来山	睢县	同上	睢县杜土楼一带红枪会首领	同上
张景旺	荥阳徐水镇	平日好打抱不平,开饭店	荥阳红枪会领袖	《申报》,1926年8月24日
张朝聘(外号张疯子)	鹿邑县小翟庄	读过两年私塾,开水果店	豫东、皖北几十县的红枪会领袖	《鹿邑文史资料》第1辑,第18页
鲍兰生	正阳范店东鲍庄	不详	正阳红枪会首领	《正阳文史资料》第1辑,第33页

续表

姓　名	籍　贯	个人经历与职业身份	在红枪会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
王杰英	不详	不详	漯河红枪会首领	《正阳文史资料》第1辑，第33页
吴廷弼	上蔡	不详	上蔡东塔桥一带红枪会首领	《上蔡文史资料》第1辑，第65页
何心榕	杞县何寨村	生于殷实之家	杞县红枪会首领	《杞县文史资料》第2辑，第69页
刘锡禄	杞县白塔	地主、富农或乡绅①	杞县西南部白塔红枪会首领	同上，第81页
徐老五	杞县聂庄	同上	杞县西北平城一带红枪会首领	同上，第84页
张玉镜	杞县傅集	同上	傅集红枪会首领	同上
李福瑞	杞县天池洼	同上	天池洼首领	同上
孔泽友	杞县西十里铺	同上	西十里铺首领	同上
胡国宾	杞县东祁楼	同上	祁楼首领	同上
王国安	杞县南闪庄	同上	闪庄首领	同上
汤振明	杞县汤庄	同上	汤庄首领	同上
吴体彦	杞县南李店	同上	李店首领	同上
郑四教	杞县大吴庄	同上	大吴庄首领	同上
马长久	杞县北肖寨	同上	肖寨首领	同上
鲁彦沙	阳武黑石村	1923年被委为省参议	原阳县红枪会首领	原阳县志第653页

① 因为杞县各地的红枪会首领状况只有总的概括，即红枪会的“学长、团长都是本地较富有而资望高的人，多数是地主，富农或乡绅”，而没有数据显示每个红枪会首领的具体情况。参见周济然：《杞县红枪会统述》，《杞县文史资料》第2辑，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第85页。

续表

姓　名	籍　贯	个人经历与职业身份	在红枪会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
雷云亭	邓县茶馆村	地主	邓县红枪会首领	
唐得亨 唐得利	汝南十八里庙	地主乡绅	汝南十八里庙一带红枪会首领	《汝南文史资料》第4辑，第46页
曾广林	汝南李旗屯	同上	李旗屯一带首领	同上
刘鹤林	汝南留盆	同上	留盆首领	同上
李德轩 李粹轩	汝南金铺	同上	金铺首领	同上
姚协唐 刘德兴	汝南桃园铺	同上	桃园铺首领	同上
乔云乡 戴永有	汝南燕亭	同上	燕亭首领	同上
郭敬庵	汝南大方庄	同上	大方庄首领	同上
刘茂修 刘茂学	汝南沙口	同上	沙口首领	同上
孔繁益	汝南水屯	同上	水屯首领	同上
荆纪官 邓国本 刘化龙	汝南韩庄	同上	韩庄首领	同上
祝全性 张东轩	汝南十里铺	同上	十里铺首领	同上
吕天怀	嵩县栗树街	不详，但野心勃勃，想坐朝廷，赶制蟒袍，从信徒中挑选健壮者数百人，扮有"朝廷"、"大臣"、"军师"等	嵩县红枪会首领	《嵩县文史资料》第3、4辑，第188页

续表

姓　名	籍　贯	个人经历与职业身份	在红枪会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
赵斐士	唐河陈岗	不详，虽与恶霸不同，但也别有用心，为了扩张个人势力，养了大批乡保长，都是不良分子	唐河陈岗红枪会的组织者，首领	《河南文史资料》第14辑，第99页
王三纲	荥阳贾峪	散布有坐天之命，要占领开封坐龙庭、登基为王	荥阳红枪会首领	《密县文史资料》第2辑，第63页
杨俨直	隶南乐县	清末秀才，地主	隶南红枪会首领	《濮阳文史资料》第4辑，第46页

表中所列76位红枪会首领，可确为地主、绅士的有52位，约占70%左右。其他下层群众有8位，约占10%左右。可见，红枪会的首领基本上是由地主、绅士等地方上有实力人物组成的。①

当然，仅仅用首领的阶级构成，尚不足以说明红枪会的性质。还要考察其执行的路线和社会功能。王文玉博士指出："红枪会活动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尽管它的参与者是广大乡村民众，然而，它在政治上鲜有与地主、富农对抗，因此，它不是农民的组织。再者，红枪会操纵在地主、绅士手中，是以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为主要宗旨，类似于民团。红枪会也不是维护农民利益的组织，而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②

第三，红枪会脱胎于乡团式的自卫组织，是地主、富农为了"保家自卫"而建立起来的。河南杞县一带红枪会的活动就说明了这一点。辛亥革命后，河南杞县一带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溃兵游勇遍地，土匪四起，经常绑架勒索。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一旦被"架票"，就要倾家荡产。"一些中、小地主就联合富裕农户开始筹款购置土炮、红缨枪、长矛、大刀，组织青壮年进行练功习武，值更巡

① 王文玉：《20世纪20年代河南红枪会研究》，博士论文，2004年，打印稿。

② 王文玉：《20世纪20年代河南红枪会研究》，博士论文，2004年，打印稿。

夜，守村看户。"1923年底前，杞县红枪会便是农村以中、小地主为中心的看家自卫组织，它限制贫苦农民入会，高阳集的红枪会甚至规定"二十亩地以上者只允许参加红枪会一人"。[①] 因为加入红枪会需要负担一些经济费用，如请师父、烧香画符、购置红缨枪等都需要钱，贫雇农无力负担这些费用。[②] 现存的一件红枪会《会规》就规定：加入红枪会必须"拥有相当财产和职业"。所以中小地主就成了这个组织的中心人物。如豫东通许、杞县、睢县一带的红枪会，创始人娄百旬，曾经是义和团成员，地主家庭，他平日好结交江湖人士，他所组织的红枪会，就是为了防范土匪，保护地主的利益。当地除了张法和杨法两大股土匪外，还有许多小股土匪，他们"夜聚明散，架票勒索"。有的遭到杀害，还被勒令赎尸。于是，村里的中小地主便联合富农、中农，组织起红枪会以自卫。娄百旬于是在娄拐村创立"坎门红学"，后来发展为娄团，以娄百旬为总团长，专门打击土匪，以保护地主、富户的利益。[③] 本书基本上同意上述看法，认为红枪会不是维护农民利益，而是保护地主、豪绅利益的组织。由于红枪会带有浓厚的教门色彩，因此应该归入会道门系统的地下社会，而不是农民的"革命组织"。

二、红枪会的历史渊源

红枪会从其阶级实质来看，固然是为了维护地主、乡绅利益的组织。而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则是由清代秘密教门演化而来的会道门组织。红枪会中流传："其教祖姓刘名义，太平天国时皆充天王洪秀全之军师，后见洪氏气数将尽，不可收拾，遂遁往四川峨眉，出家修道练气，已成仙体，乃授徒八人，分传其教，其大徒弟万某（教徒均称之万大师兄，传说现已有百余岁，早已不食人间烟火），山东曹州人，乃见土匪扰乱，人民不得安居，遂分传道术，以御土匪，能避枪炮，刀斧不入。惟学者须用以自卫，否则不灵也。"又传"大师兄名张老道，为天师张道陵之后，现在崆峒山出家，自幼得有仙人传授，能吞刀吐火，撒豆成兵，善避枪

---

① 周济然：《杞县红枪会统述》，《杞县文史资料》第2辑，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② 高一轻：《我所知道的永城红枪会》，《永城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

③ 韩晓亭：《豫东通许、杞县、睢县一带红枪会活动纪实》，《河南文史资料》第10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炮，常谓洋人气数已尽，将洋人杀尽云”。[①] 这些说法仅仅是红枪会的内部传说，未必确实。人们对于红枪会的历史渊源尚有不同说法。

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在1925年曾经提出，红枪会“溯其渊源，远则为白莲教的支裔，近则为义和团的流派。”[②]近年有人具体指出：红枪会起源于八卦教之流裔——大刀会与义和拳，是在金钟罩、硬肚、仁义会等组织的基础上融汇而成。[③] 有人提出：“红枪会脱胎自大刀会，支派很多，名称不一，但都来自白莲教和义和团。”[④]我国台湾学者戴玄之则认为：“红枪会是义和团的嫡子，乡团的嫡孙。”因为乡团是为了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平居多习拳技。每年二三月间农暇之际，练拳者传单聚会，比较技勇，名曰“亮拳”。由于时值梅花季节，故称为“梅花拳”。光绪二十四年，改梅花拳为义和团。民国初年，直、鲁、豫一带土匪蜂起，乡团组织义和团为了防御土匪，遂再度兴起。参加者每人备长矛一支，系以红缨，名曰“红枪”，遂称为“红枪会”。[⑤] 上述看法虽然略有不同，但共同点在于：红枪会的历史渊源同秘密教门和拳会有密切关系。

中国华北一带的秘密教门，很早就同习武密切相关。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山东的清水教就同教练拳棒和坐功运气相结合。清水教首领王伦本人就习武和教练坐功运气。他的弟子分为“文弟子”和“武弟子”，“武弟子”就是学习拳棒和坐功运气。到嘉庆年间，八卦教的分支天理教，也主张教练拳棒。该教首领冯克善就曾师从山东济宁人王祥学习拳法，他“徒手搏击，数十人无敢近者”。[⑥] 后来，山东的秘密教门一直沿袭习武的传统，其中，同秘密教门关系最密切的是金钟罩和梅花拳。

据路遥先生考察，金钟罩是清中叶开始流行于直隶、山东、河南及陕西等地的一种硬气功武术。首先由山东曹县的刘士瑞创立，练习后“用刀砍在肩胛、左肋等处，只见血痕，不受伤”。由于这种硬气功能够排除刀枪的伤害，所以又称谓“铁布衫”，俗称“硬肚”。在清代乾嘉年间，这种硬气功曾经依附于八卦教中的离卦教，成为“邪教的羽翼”。其代表人物是师来明和张洛焦。师来明是山西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
② 李大钊：《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
③ 李子龙：《试论红枪会的组织源流》，《齐鲁学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6期。
④ 申仲铭：《民间会门武装》，中华书局，1984年，第10页。
⑤ 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80—289页。
⑥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平遥县石渠头村人，大约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他7岁时跟随父亲来到陕西，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陕西周至县拜道士张阳贞为师，学习拳棒功夫，并且当了道士。嘉庆十二年(1807)，师来明来到直隶平乡县找到在该县无量庙当住持的弟子张普光，在庙里见到张普光之侄张洛焦及路老宾等25人，张、路等人随即拜师来明为师，尊他为“师爷”。师来明于嘉庆二十年(1815)被捕后，否认自己入过离卦教和会金钟罩武功。但据张洛焦(原名张爵五)供称：自幼随父亲张乃公在甘集镇三官庙当道士，17岁时随父亲拜河南武安县谷山黄姑庵施来头(师来明的化名)为师，入离卦教。说明师来明确实入过离卦教并会金钟罩武功。而且从档案史料可知，师来明(施老头子)参与过嘉庆十八年(1813)的天理教起义，他令刘玉陇前往山东曹县举事，嘉庆二十年师来明、张普光等人均因受到天理教起义的牵连而被捕。此外，金钟罩的咒语有：“北方郭长位，南方高之明，东方王炳海，西方邱来具，中央李廷玉，五大教主集于身”。其中，郭、高(部)、王、邱分别是坎、离、震、兑四卦的教主，李廷玉更是八卦教的创始人，说明金钟罩并非单纯的武术组织，而是依附于八卦教的教门组织。①

梅花拳同秘密教门也有着密切关系。

梅花拳大约始于明末清初，兴盛于乾嘉年间。被认为既是拳会，又是教门而以拳会为主的拳教组织。② 据武术史专家周伟良教授研究，梅花拳的名称并非如戴玄之先生所说，因为在每年二三月梅花开放的季节亮拳，而是具有宗教的含义。“梅花”一词是被该组织“赋予了神圣的‘开道度人’的宗教情感，成为一个具有特殊内容的宗教(教门)文化符号。”按照梅花拳内部《佛祖经》的说法，佛祖因为悲悯众生迷恋世俗红尘，虽劫难将至但仍不思归家认祖，所以降临尘世传授武艺、兵法，继而“广谊武艺开大道，香礼妙法度人来”，并且对“梅花”的宗教含义加以诠释。该经的头两句就写道：“佛祖西域坐法台，治世千枝梅花开”，显然，这里的“梅花”是作为其“治世”理念的一个象征；又如，“面前有棵梅花树，梅花能收万道来……开道法名为梅花，梅花能把人度开”，显然，这里的“梅花”已成为“开道度人”的一个观念符号，是对原教门文化中“神道设教”的延续。③

---

①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472—473页。

②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475页。

③ 周伟良：《梅花拳信仰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2006年第6期。

周伟良教授认为,梅花拳同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东大乘也就是闻香教有密切关系。梅花拳的文场、武场亦叫内功、外功,就来源于东大乘教经卷《皇极宝卷》,该经卷成书于明末,全名是《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共分24品。梅花拳内流通的《皇极宝卷》,就是由《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演化而来,但在内容上已有所变异,加上了本门拳种的起源传说。如:"想当初,老母留,大法正教;在江南,徐州府,普度众生。独自己,驾孤舡,铜山显化;把直钩,钩贤良,借假修真。路家团,镇逆贼,人人感念;小张山,立文武,大法流通。"又如:"仗江南,徐州府,邹祖大力;报西域,进钱粮,种的根源。"文中的"张山(张三省)"为明末人物,而"邹祖(邹宏义)"更是康熙年间人物,根本不可能出现在此前的《皇极宝卷》中,唯一的解释就是后来梅花拳对该经卷做了增补。总之,无论是梅花拳的始祖传说或拳名喻义,还是组织方式及经卷源流,都与民间教门的东大乘教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可以说梅花拳就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从东大乘教分化出来的一个具有习武特点的教门化拳会组织。因此,梅花拳的教门特征是从形成伊始就已经带有,这一点可与其内部流传的"文武教相"(《佛祖经》)、"惟有梅拳文武全"(《三百六十处》)等相印证,而非开始只是"单纯演习拳棒的结社",其教门化是后来"与白莲教派的一些秘密宗教广泛接触,吸收了不少宗教活动方式"才形成。也正因为这样,梅花拳的许多活动特征与教门相仿,形成了其内部独具特色的文化信仰。[①] 后来,梅花拳演化为义和团。所以,金钟罩和梅花拳都是具有教门色彩的拳会组织。

三、信仰和入会仪式[②]

红枪会的历史渊源既然同带有浓厚教门色彩的拳会组织——金钟罩和梅花拳有密切关系,那么也就不难理解红枪会在信仰方面同秘密教门的关系了。

红枪会同一般秘密教门在信仰内容方面颇为相近。如山东的曹县、单县的红枪会,除信奉真武神外,还信奉"无生老母"和"关帝老爷"。在其香堂的请神口诀中,写有:"一请西天李老君,再请南海观世音,主(祖)师罗祖都请到,哼哈

---

① 周伟良:《梅花拳信仰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② 本节内容主要参考戴玄之先生的《红枪会》和路遥先生:《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中有关红枪会部分的内容,未注明出处者,即引用该二书。

二将来保身。"[①]其中,"罗祖"就是罗教的创始人罗梦鸿。此外,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神灵及各种超自然的神灵,如太上老君、南极仙翁、玉皇大帝、文昌帝君、太乙真人、鸿钧老祖、梨山老母、王母娘娘、红莲圣母、李仙老母、李老君、三清道人、孔圣人、普贤真人、龙王、万法祖师、红女菩萨、送子观音、关圣帝君、火地真君、周公祖、桃花仙、四大天王、八大金刚、十二罗汉、上金顶祖师、西天佛祖、混天老祖、天师、圣母、泰山老母、青山老母、昆仑山师爷、药王、华祖、真公老母,以及明清以来演义小说中的人物,如:二郎神杨戬、哼哈二将、孙悟空、猪八戒等。[②] 所以戴玄之先生认为:"红枪会其思想信仰不出义和团的范围,仍以《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等神怪五侠小说为主。[③] 红枪会也奉各种自然神如日、月、星、辰、灯火、桃花仙、黑虎、龟、蛇,等等。[④]

红枪会比较普遍的信仰是崇奉真武神,这是因为红枪会中属于坎门的大刀会居多,大刀会创自刘士瑞,他把真武奉为主神。红枪会信奉各种神灵,主要是为了得到神灵的庇护,所以,义和团和红枪会都有一套自称"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法术。降神附体"有闭目缓行者;有目不斜视、端步前行者;有数人扶持一人者;有两人掖一人且斜步如酒醉者;有持大刀乱舞、行人躲避不及者;有数人持枪刀、鱼贯而行者;有乘马拥道者;有受伤或已死而肩以归者;更有匪执小棍,上缀血物,声言是毛子心肝者。或来或往,不知何为。纷纷扰扰,无复人状"。[⑤]为了达到"刀枪不入",他们还进行吞符念咒,练习排刀、排枪等气功。与此相关联的还有各种禁忌,如"法不传六耳",忌和女人接触,不茹三三厌:天三厌、地三厌、水三厌。[⑥]

红枪会的信仰更体现在入会仪式上。

红枪会的入会仪式颇具神秘色彩。一般要选择一处能够容纳数十人的房舍,多借宗祠或庙宇设立神坛,称为"会堂"、"学堂"或"礼堂"、"佛堂"、"法堂"

---

① 王永仁:《大刀会》,载《逸经》,第25期,1937年3月,转自申仲铭:《民国会门武装》,中华书局,1984年,第25页。

②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478页。

③ 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第2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75页。

④ 扈梓:《宜阳红枪会史》,《宜阳文史资料》第4辑,第68页。

⑤ 管鹤:《拳匪》,第477页,转引自[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页。

⑥ 雁、鹑、鸠谓之天三厌;狗、马、牛谓之地三厌;虾、鳖、鳅谓之水三厌。

或“香堂”，总名为“内厂”。神坛要设在空屋，置于房屋的上首，一般是用一个四五尺高的条几，靠墙而立，称为“神台”。在“神台”中间的墙上贴一个用黄纸或木牌写的神位，平时要用黄纸或红布遮盖，上书所敬的神名，各会堂所供神名并不完全相同，如戴玄之先生引用的一个神牌位如下：

齐天大圣

掌旗将

周公祖

玄天大帝

西天古佛敕令万法教主玄天仁威上帝关圣天尊全神　　之位

玉皇大帝

桃花仙

金刚将

火帝真君

在神牌位的两旁写有对联，如“众圣神临坛指教，群弟子焚香诵法”；“静坐常思己过悟大法，闲谈莫论人非真神仙”。横批有“虔诚则灵”、“佛法无边”等。在神台中央设有一个大香炉，烛台一对，神台两端放有香、表、纸等物。神台前面多置一方桌，上面供果品数种。屋内烧的香烟缭绕，在神像两旁，各挂一把刀，刀上系着红绸，使佛堂显得很神气！

入会须有两人作保，并得到老师同意。入会称为“上学”，上学之先必须斋戒，不茹“三厌”。“上学”之日要沐浴，戒绝女色，四十九天（有一百天者）不许行房事。入会者进入佛堂后，要赤臂跪在神像前，老师交给一张黄表纸，在案前立表，书写如下文字：“立拜表人某某某，弟子身小力薄，情愿在祖师老爷面前习神法、神诀。年死年用，月死月用，即死即用，常死常用，不许少说。弟子服法，情愿死于灵官老爷鞭下作鬼。”或“信士弟子某某，今愿学法，诚心奉佛，不得转告外人，不得谤佛，如有虚言，五雷劈身，恐口无凭，十字为证”。[①] 然后用朱砂在黄纸上画符，烧成灰溶在清水中喝，叫做“喝符”。最后要对老师行三跪九叩礼。礼毕，集体赤膊跪在神台之前，两手握拳，以拳触地，头放在两拳之上。神台上

① 申仲铭：《民国会门武装》，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5—26 页；扈桦：《宜阳红枪会史》，载《宜阳文史资料》，1988 年 4 期。

要燃烛焚香,右边放一大鳖灯(形状似鳖之油灯),左边放一大海碗,碗内注满冷水。老师念咒语、画符,并将符点燃,将灰溶于水中,入会者每人喝一口。再由老师面授法语,系个别耳语,因为"六耳不灵",有所谓"三人不讲道,六耳不传法"的规定。入会必须单独祭神,由老师引领掀帘入室,洗净手脸,向神敬香叩头。敬香是三道法:第一道为三根,第二道为五根,第三道为三根。① 入会者须隆重对神宣誓:老师所传之法,不许告诉外人,如果泄露真言,将五雷劈身。其誓词为:

弟子某某,今入大道,盼功修行,愿守一切会规:

一、不敢为非作恶,如为非作恶,炮打穿胸;

一、不敢采花折柳,如采花折柳,炮穿心口;

一、孝顺父母;

一、敬重师长;

一、地方有事,必须合力对付;

一、每日功课,必须虔心奉行。

宣誓毕,由老师传"请神"法。

"请神"乃是加入红枪会仪式的重要内容,大多在喝符后由老师传授。由老师燃香一把,分给各会员一半,老师插香入炉,对佛作一揖,吸气一口,吸时发声,同时以右足顿地作声。每揖皆然,各会员亦如此。然后持香出门,在门内持香一揖,再至门外空地请神。请神可以集体行之,也可个别行之。请神时,先面向北,俯首,举香至顶,并默念:"弟子某某谨请玉皇老爷出宫离位下天堂闻香,又请金童玉女出宫离位下天堂闻香。"

默念毕,持香一揖,跪地,行一叩首礼。然后再面向东南,仪式如前,并默念:"弟子某某谨请观音老母出宫离位下仙山闻香,又请金童玉女出宫离位下仙山闻香。"

最后面向西南,默念:"弟子某某谨请祖师老爷出宫离位下金顶山闻香,又请周公祖、桃花仙、掌旗将、金刚将、黑虎、灵官、龟蛇二将,众位神圣一齐下金顶山闻香。"

请神既毕,持香返回佛堂,人们举香默念:"弟子某某有请众位神圣一起进

---

① 周济然:《杞县红枪会统述》,《杞县文史资料》总第2辑,中州古籍出版社。

宫闻香。"默念毕,如前持香一揖,始进入佛堂。来到案前,又举香默念:"弟子某某有请众位神圣一起进宫案座赴位闻香。"然后插香于炉,请神仪式至此结束。

请神之后为"装身子",即入会者跪在神前,老师两手捏诀,就炉香上略炙片时,吸气一口,引右手至后方,口中默念咒语,以右手向灯焰一拂,旋以口就灯焰上,猛吸灯焰入口,至会员身前,以右手承口,遍吹会员身上。由顶至前胸腹部还至头顶为一次,由顶部至背部腰下还至头顶为一次,由手腕至肩窝下至腿足左右为一次。这就是所谓"装身子"。按照红枪会的说法,"装身子"就是将"凡体"变为"法体",如此神灵方可临降。所以,只有经过"装身子",才能学习"降身附体"。所以,"装身子"乃是降神附体的准备。

"装身子"之后,再传授做功夫。

做功夫时,入会者跪地,合掌当胸,默念《护身咒》:"天护身,地护身,前护身,后护身,左护身,右护身。观音老母护前身,黎山老母护后身,祖师老爷护身,紧护身,五雷刚。"

再念《当炮咒》:"无量佛,我请圣帝老爷护我身。五雷刚,我请祖师老爷当洋枪。青龙祭起五杆神,炮打在身旁,自落自吊,清泉水焚符三道,用在肠内轩衣当炮,急急如律令。"

每默念一遍,则举手一揖,随吸气一口,如此约时许,叩头起立,再跪地一叩首,谓之"送神"。至此,入会仪式完毕。

与其他教门、会道门不同,红枪会更加凸显"法术"。

红枪会的法术分为"内厂"与"外厂",内厂即礼堂,是会内传授法语、念咒、画符、练功的地方,不许外人进入。外厂为公开表演的处所,严禁妇女进入。法术由老师传授,先带领徒众沐浴漱口,再进入会堂礼拜。老师先念诵符咒,然后命徒众面对神坛下跪叩头。第一天跪到一炷香焚烧三指长起身,第二天跪到半炷香起来。以此类推,功夫愈深,其跪愈久。宣称跪满四天即可排刀,跪满48天即可排枪,甚至可以挺身避枪炮,浑身坚如铜墙铁壁,方告满师。但满师者甚少,一般会员永远处在练习之中。红枪会的派别甚多,其法术也大同小异,主要有以下一些。

抓功

会员每晚齐集会堂,净手漱口,并焚大把香于香炉之中,学长(亦称大师兄)领导抓功。令众人跪在神坛前紧闭双目,口授简单咒诀,然后每人伸手在空气

中抓一把,手掌心对口,用力吸之,愈响愈好,周而复始,进行约三四十次。每晚如此,决不间断。

吃符

红枪会宣称吃符后可以“刀枪不入,枪炮不伤”。据戴玄先生解释说:符是朱砂画在黄表纸上,朱砂是一种中草药,具有镇心、定惊、泻热的功能,多吃可以令人痴呆。黄表纸为黄色极薄的细纸,主要原料是火硝即硝酸钾,也是一种药品,服之能使人乱性。因此,吃符之后,能够登时形色改变,拧眉瞪目,形如疯狂之状。吃符能起到坚定意志,加强信心的作用,会首则称此乃神灵附体之故,使会员遇到危险不会产生恐惧心理,红枪会会员来到战场上,可以不畏炮火,勇往直前。所以,吃符具有一定的药物作用,会首则利用会员的迷信心理,用吃符作为增强会员的自信心和战斗力的一种手段。

念咒

即在神前密诵咒语,要求每天念诵32遍或64遍,念到100天才算成熟。红枪会的咒语虽然荒诞不经,但也有其特殊的功效。据戴玄之先生研究,念咒有两大功效:第一,会员遇到恐惧事件,认为只要念咒,就可以立即得到神灵的保佑,从而增加勇气,从容应对发生的事件;第二,会员每晚饭后跪在神前,闭口默念所有咒语,使两腮不断震动,口腔能产生大量唾液,因为唾液里含有荷尔蒙,不仅帮助消化,而且刺激新陈代谢,有益于健康,实为锻炼身体之奇妙方法!

红枪会的咒语基本上采自道教,红枪会的《五雷刚》咒语就直接来自道教。相传“五雷”是指天雷、神雷、龙雷、水雷、妖雷,也有说五雷是指雷公的五个兄弟者:雷大、雷二、雷三、雷四、雷五。因为雷大、雷二容易被召唤,而雷五性情刚躁,无危难之事难以召唤,如果它能出现,则一切危难之事就能化险为夷。所以红枪会便采用了五雷刚咒语,表示遇难呈祥,化险为夷。红枪会最重要的咒语是“老本”即真言,一般是“无量寿”或“无量寿佛”。也有“紧护身,无量佛,五雷刚”者。咒语只许默念,不许出口,更不许外泄。

红枪会的咒语在各地也有所不同,如杞县和宜阳县红枪会在神前的咒语是:“红君爷修炼在地堂,打春阳气只用口一张,练就三夏真火,万道霞光胸中藏。腹内只一动,口中喷火光。真火能喷三千里,霞光飘飘遮太阳……敌人无处藏”。练功时的咒语是:“昆仑山上传恩旨,师爷持我金刚体,金刚铁体都齐练,练似剑铁壮筋力,能避枪刀弓箭戟,枪炮火药不入体。”杞县红枪会在练功时

念的咒语是:“昆仑山,传恩旨,师爷传我金刚体。金刚体督练勤,能避刀枪和剑戟,枪炮火药不入体。”[①]并规定会员每天晚上诵咒、念法、练习枪刀、拳术。[②]

红枪会分支天门会的避刀枪咒文是:

“杏黄旗,天上来,文帝上神避枪来,四大金刚分左右,天兵天将两边排。周公古佛来助阵,诸位神仙下界来,神仙祠中陈宝贝,阵前披法避枪来。天符地符,上神赐我便符。天也灵,地也灵,天进地之灵,速请土地神,玉皇老爷闭枪门。”

天门会避弹咒文是:

“天门开,地门开,上神赐我神定来,玉皇老爷开天门,佛山老祖显灵验,弟子闻知忙念咒,拦住大炮不能行,大炮小炮都避了,快炮钢炮避个清”。[③]

降神附体

一般由大师兄、二师兄及平日信仰虔诚者,对神礼拜吞符,然后双手合十,闭目跪于神前,默念咒语,约 20 分钟。双手抖颤,唇动似语,经人扶上坐椅,双目紧闭,自称是某某神仙附体,有问必答。约一小时后,即行倒地,良久始语,俗称“退法”。

排砖

会员在吃符、念咒、对神礼拜后,跪在地上,把上身衣服脱光,掐诀念咒,右手拿砖打左肋三下,接着打脊背三下,最后打头(额门)三下。每打一下,口里发出“哈”声。每天练习,要练习一个月。表演时,会员头顶新砖数块,跪在地上,由另一人或师傅持大油锤用力向砖猛击,砖皆粉碎,而表演者并无损伤。据红枪会内人记载:排砖多在晚上进行,届时选择一个空院,非会内人不许进人。院子正中置方桌一张,后供神像。学习者站立桌前,大师兄净手焚香,向神像跪拜,默默祷告,然后口中念念有词,烧一道符在水中,表演者把符水分饮。大师兄随手拿新砖五块,放在表演者头上,大师兄猛力击下,砖块立即粉碎,学习者仍然跪着,一点不觉痛苦。

其实,排砖是利用力学原理,以锤击砖,新砖易碎,以锤击之,其力被砖传导于地,故人不受伤!

---

① 周济然:《杞县红枪会统述》,《杞县文史资料》总第 2 辑,中州古籍出版社。

② 周济然:《杞县红枪会统述》,《杞县文史资料》总第 2 辑,中州古籍出版社。

③ 金度:《天门会的兴衰及在邯郸一带的活动情况》,《邯郸文史数据》第 5 辑,第 11—12 页。

排刀

练习时也有人守卫，严禁妇女偷看，否则法术不灵。参加排刀者皆袒赤上身，先向神灵跪拜、吃符，持刀者以鬼头刀打击桌子，大叫："上法"，排刀者即念"上法"咒："金护身，无量佛，五雷刚"。或"无量真佛保命护身，哼哈二将保命护身"。然后将臂弯曲，手握拳头，把胳膊放在桌子上，持刀人深深吸一口气（称为"法气"），在刀锋上徐徐吹过。在空中绕一绕，向胳膊厚肉处猛砍三刀，左右皆然。接着肚子排刀，由两人架着两只胳膊（或自己将两手放于背后），吸气鼓腹，紧闭口鼻。持刀人大叫"上法"，仪式如前，向肚皮猛砍三刀，"叭叭"有声。被砍处仅现一道白痕，渐渐由白转红，或略呈紫色。

排刀之所以不致伤人，乃是气功与力学使然，即以柔克刚，任何人均可以袒身、闭气、鼓腹，用刀直砍，均不致皮破流血。据一位了解"排刀"内幕的人说：我的一个同乡牛冠军曾告诉我，他曾经参加过红枪会，他要求排刀、排枪，都被大师兄所制止。大师兄曾告诉他"排刀"的方法：左手握刀把后部，右手握刀把的最前部，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是一个托劲，一直往下平放。严禁前后推拉，更忌向有棱角的地方砍。刀过之后，皮肤出现一道白线，稍过一时就变成红色。也有时不慎，被砍的皮破流血，则斥责负伤者心不诚，或接近女色。关于排枪，牛冠军也曾帮助过大师兄做准备工作。事先必须在没有人的地方，把子弹里的火药大部分取出，留下的火药仅可以把弹头推出枪筒，并使人听到枪响声为限。这些是不告诉外人的。不知内幕的人便认为真的是"刀枪不入"！①

排枪

由大师兄选出十数人，先吃符，念咒、赤膊一字排开，对面十数人，皆富户而无佃户。手持新式步枪，令人检查枪弹之真伪，由大师兄念咒，排枪者皆"哈哈"前进，持枪者对准排枪者胸腹开枪，受枪者毫无损伤。排枪者高呼"有神保佑"，"枪不能伤"等口号。其实，排枪完全是骗局：在检查过后放入枪膛的子弹，是早已处理过的假子弹，所选持枪者皆富户而无佃户，原因即在此！如果在战场上被打死，大师兄则说其人心不诚，或犯了色戒！1929年，河南洛宁从洛河请来三位师傅，当地红枪会的胡炳奇组织了十余名红枪会成员学习"排炮"的功夫。老师和红枪会会员在一个空院子里人夜操练了两个月，于是年农历八月初开始拉

---

① 柴化周：《洛阳地区红枪会的兴起与消灭》，《河南文史资料》第10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场“排炮”。胡炳奇带头参加，又从会员中选出李中水等六七人，聘请东仇村枪法较好的张连森等二人为枪炮手，教场设在一个空地上。早饭后正式开始“排炮”，当时有周围村庄的数百群众前来看热闹。枪手和老师站在空地南头，向北射击。演练者脱光上衣，每人手中拿一口大马刀，口中发出“咳、咳”的声音。接着在老师的指挥下，开始射击。第一枪响后，只看树枝被打断，纷纷落地。快收场时，有人说：“照人打！”“照人打！”，枪手们出于好奇，想试一试他们的功夫究竟如何。于是瞄准胡炳奇开枪，结果打中了他的右下腹部，胡炳奇应声倒下，大家于是把老师捆绑起来，质问他：“为啥把人打死？”老师说：“是他露了法！”有人说：“你们是老师，既有功夫，也不会露法，把枪拿来在你们身上试试！”老师连连磕头哀求：“千万不可，千万不可！”[①]说明所谓“排枪”、“排炮”全是骗人的把戏！

排炮

由大师兄领导弟子们向神跪拜祷告之后，再用朱笔画符放于阴阳水中，弟子把符水分饮，站成一排，在相距十五步的地方，放置一旧式大炮，炮内装有火药和豌豆大的泥丸（这是老师秘密，不让别人知道，有的是没有炮弹的空炮）。弟子口念护身咒，大师兄亲自燃炮，声音雷震，弟子们身被泥丸击打，却不受伤。其实，这也是大师兄玩的花样：他先放少许火药，然后放泥丸，再放火药，以泥丸压药，泥丸随药出而无力，故不能伤人。有的是放空炮，只有火药而没有炮弹！万一伤人，大师兄就会说受伤的人不诚心，或犯戒所致。当时有人在炮内装上铁炮弹，结果造成伤亡！

抓香灰医治百病

以往中国农村缺医少药，农民患病无处求医，只好求神问卜。红枪会便利用农民的迷信心理，用降神附体来为人们治病。凡有求神治病的人，红枪会中人立即来到会堂，净面漱口，降神附体，自称华佗下界，口中念念有词，然后画符，令病人吞服，或令病人贴于门上或床头，或抓香灰少许，置于求医者的酒壶中，或用纸包若干包，令其执回煮水给病人服用。如果生疮，就令病人将香灰涂于患处。如遇重症，则请神炼“仙丹”，即用纸折成漏斗形状，在香火上绕圈念咒，神即赐下红色丹丸，名曰“仙丹”，诡称有起死回生之妙。实际上是一种骗人的手法，请神者先将红色药丸藏于纸中，然后在香火上绕圈念咒，再把药丸拿出

① 贾尚志：《记白水涧的一次排枪事件》，《洛宁文史资料》第4辑，1989年。

给病人服用。灵符、香灰虽然不具医疗功能，但可以增强病人痊愈的信心，起到心理疗法的作用，所以对于医治疾病会有一定的效果。

此外，红枪会还有许多“法术”，如“捉鬼降妖”、“祭飞刀飞剑”、“转桌子”、“推太平车”、“赤足走火”等。

四、组织和纪律

红枪会沿袭了传统的乡团组织形式，大多以村、镇为单位。一个村或一个镇设一个会堂，请一位老师来指导学习念咒、画符及各种法术。等到本村镇的会员学成后，老师辞去，由本地的会员推选有胆识而且法术高者为“大师兄”，其他人称师弟。会内事务由村镇的乡绅、村首办理，而会内需要开支的茶水、灯油、香资等费用，则由殷实富户自愿捐助。遇到有匪警事故，会员们均听从大师兄的指挥。日后参加者多，又设二师兄、三师兄。二、三师兄协助大师兄进行敬神、画符、念咒等事项，一切均承命于大师兄，而大师兄则秉承神的旨意，统辖一切。所以实际上所谓神的旨意，也就是大师兄的意思，大师兄对于会员握有生杀大权，遇有重大事故，由大师兄焚香祷告于神，大师兄代神说话，转达神的命令。在问事于神时，大师兄在神坛旁默坐，可否、生杀均由大师兄一言而定。红枪会组织由本地的地主或乡绅领导，各地的红枪会组织之间，只有横的联系，彼此间互不统属。因此，遇有重大事故，各地的红枪会可以互相联络，结合数十村庄或全县的红枪会，一致对敌。

红枪会最初是为了保卫身家而建立的武装组织，因此需要有良好的纪律加以约束。入会时需要宣誓，誓词中有：

不敢为非作歹，如敢为非作歹，炮打穿胸；

不敢采花折柳，如敢采花折柳，炮打穿胸；

孝顺父母，敬重师长；

地方有事，贺礼对付；

每天功课，戮力奉行。[①]

有的红枪会列有四条规约：一不准奸淫妇女，二不得抢劫财物，三不准杀人

---

① 扈桦：《宜阳红枪会史》，《宜阳文史资料》，1988年4期。

放火,四不准毁骂神像。对于违反者,轻则毒打,重则处死。后来,由于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纷纷加入,红枪会的势力日大,乡绅、族长不能控制,由土豪劣绅取而代之,一些地方的红枪会,开始杀人放火,抢劫财物,逐渐变为土匪。目前见到的一件较为完整的红枪会会规,有如下内容:

第一条:本会目的在于以武装团体,使人民实行自卫自治,得以安居乐业。

第二条:本会会员必须遵守下列公约:

一、孝敬父母兄长;

二、爱国爱乡;

三、重信守仁;

四、患难与共;

五、不为非作歹。

第三条:本会为排除自卫自治之障碍,必须执行之职务如后:

一、剿灭土匪;

二、歼除恶军;

三、拒绝苛捐杂税和强征民夫;

四、惩办贪官污吏及土匪暴民。

第四条:由中华民国人民,年满十八岁以上,拥有相当财产和职业者,由本会会员二人以上介绍,呈出入会誓书,缴纳会费一元者,都得为会员。其入会誓书如后:

某省某县某村人某某

兹有某某经某某等介绍入会,嗣后誓守会规公约,如有违背情事,愿受任何处分。此誓。

红枪会公鉴	入会者	某某印
	介绍人	某某印
	同	某某印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第五条:本会会员概按军制编组如下:凡会员以五人为伍,伍有伍长;五伍为队,队二十五人,有队长;五队为社,社一百二十五人,有社长;五社为乡,乡六百二十五人,有乡长;五乡为亭,亭三千一百二十五人,有亭长;五亭为郡,郡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五人,有郡长;五郡为路,路七万一千一百二十五人,有路长;五

路为镇，镇三十九万零六百二十五人，有镇长；五镇为都，都一百九十五万三千一百二十五人，有都长；五都为方，九百七十六万六千二百二十五人，有方长；五方为统，统四千八百八十二万八千一百二十五人，有统长。统长由五方方长中选出并兼任，方长由五部都长中选出并兼任。以下唯此。

第六条：凡本会会员均有服从其上级之义务。

第七条：本会之一切赏罚，概依军法处理之。

第八条：本会会员除焚香、吞符、念咒外，亦教以军事、政治之大意。

第九条：本会会员有事则聚为兵，以卫乡里；无事则散为民，各安其业，不得为野心家所利用。

第十条：关于地方自治事务，本会会员或据旧来遗规，或新订章程，组织机关，以执行自治事业。

第十一条：本会对黄枪、绿枪、花枪等会，以及其他一切之会，几标榜与本合同一自卫自治目的者，一律以朋友对待，相互扶助，以期发展。

第十二条：凡以朋友对待之各会，应选择适当地点组织各会联合会，会同处理公务，以谋相互间感情之融合，以举互助友爱之实。

第十三条：本会会员在紧急时刻，必须在本会指定地点集合，各待其上级之命。

第十四条：凡遇外患侵袭，本会必须召集全国会友，共以保国之策，一致抵御外敌。

第十五条：本会之经费按各会员个人财产之多寡共同负担，若为特别援助，一次缴纳十元以上者，推为本会主任委员。

第十六条：非本会会员，一次捐助十元以上者，推为本会名誉赞助人。

第十七条：本会会员违反会规者，由该管辖统领将其引渡至执法所审判之。

第十八条：对犯规者之审判，依陆军刑事条例或普通法律判决之。

第十九条：凡应用本会规之各条，本会视同一家，患难与共。

第二十条：本会规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如有不当之处，于开会时随时修正之。[①]

---

① [日]末光高义：《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满洲评论出版社，1930年，第125—129页。

五、兴衰与功过

红枪会兴起于何时？史料中缺乏明确的记载，因此，学者们也没有统一的看法。戴玄之先生认为："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死，国家分裂，变乱四起，向以多盗著称的直、鲁、豫交界地带，土匪蜂起，官府束手，'架杀焚掠，日有所闻，民不堪命'。以防御土匪为目的，乡团组织的义和团，经过十五年潜伏，至此死灰复燃，再度兴起，仍以'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为目的，隐义和团之名，改称红枪会。"又说：红枪会"初起于义和团发源地鲁西曹州、东昌一带，蔓延于冀南、河南、苏北、皖北"。到民国九年北洋军阀战起，土匪溃兵遍地，乡民苦匪苦兵，为谋求自保，各处红枪会蜂起。其后，"参加愈多，派别愈众，流传愈广，长城以南，五岭以北各省皆有。"[①]路遥先生认为，把红枪会的兴起确定在袁世凯死后，不完全确切。因为民国初年，社会混乱，政治黑暗，广大群众被迫揭竿而起，1913年的白郎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而红枪会的兴起，大致与白郎起义是同步的，所以，红枪会并非1916年袁世凯死后才兴起的。[②]

红枪会的兴衰前后大约经历了20年。在这20年里，既有积极功能，也有消极作用。

从积极方面来看。

首先是抗击军阀的压榨和土匪的抢劫，保卫家园。

军阀张宗昌在盘踞山东时，所征苛捐杂税的名目，多达51种。重要的如："地丁军事善后一次特捐"、"漕粮善后一次特捐"、"地丁讨赤一次特捐"、"漕粮讨赤捐"。除了征地亩税以外，又要征军事特捐，每亩纳银一两，另附加大洋一元二角；还要交纳"军鞋捐"，每纳银一两再附加大洋三角；军械捐，每纳银一两再附加大洋一元。建筑军营捐，每纳银一两附加大洋一元八角。甚至养狗护院也要纳捐(每只狗捐大洋五角，否则枪杀)等。从1925年到1929年三年之内，张宗昌掠夺山东人民的血汗钱多达三亿五千万元。[③]

为了反抗北洋军阀的压榨、剥削，红枪会进行抗官自卫。

---

① 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87—288页。

②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497页。

③ 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99—301页。

1926年山东鲁西李太黑(原名李德裕)带领红枪会数千人抗粮、抗捐,围攻聊城。由于人民痛恨张宗昌的暴政,鲁西南各县的红枪会、黄纱会、大刀会纷纷效仿,围城打官,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河南红枪会为反对军阀吴佩孚的苛政,多次举行暴动,1926年,杞县为了反抗特别捐,聚集万人,向县署示威。荥阳的红枪会,提出打倒劣绅讼棍。[1] 为了反对吴佩孚的统治,河南全省红枪会联合总部发布《劝告汴民书》,成为讨伐吴佩孚的檄文。其文曰:"自从前年吴佩孚到河南,是因他答应三年不征钱,免除苛捐杂税。现在他到河南,不但不免粮免税,倒比以前更坏十倍。想起八年前手提大刀上火线拼命,只是为了他来了好安身度日。现在他来了,对咱们的祸害,比老陕(指国民二军)还厉害。这个捐,那个税,今天要,明天催,把粮食变卖了,把衣服当了,还不够缴他妈的粮,你看他比土匪还厉害。看看各地的大小杆土匪,他也不管,咱们再也不能忍耐也!豫西兄弟们已经动手了,新安、宜阳、洛宁、登封、偃师的弟兄们,已受施行抗捐抗粮,咱们全省各县的弟兄们,也准备起来一致反抗。同胞们!吴佩孚对于你们的祸害,并不比乡下轻,什么借收一个月的房租、立下洋油特捐、拍卖四郊城地到五里以外、发行茶丝银行钞票五百万、强制行使有息征券,这都是安心立意要你们的命,不至大商小店完全亏本不止,你们就忍下去吗?你们若能鼓起勇气,敢于反抗,咱们在乡下的弟兄们,誓愿做你们的帮手。汴梁城的同胞们!横竖是个死,到底死于摊派捐税警察衙役之手,就不如和他拼中死了,倒还光荣,算一个男子汉。咱们以后不要听那带兵的做官的甜言蜜语,因为他们都是笑里藏刀。只有咱们联合一致,有了力量,什么也不怕。同胞们干起来呀!咱们乡下的弟兄,誓做你们的帮手。反对强收一个月房捐,反讨洋油特捐,反对拍卖护城地,反财分派有息征券,烧毁丝茶银行。打倒吴佩孚,大家团结一心干起来。"[2]

民国初年,在军阀统治下,土匪猖獗,红枪会为了保卫家园,同土匪进行斗争。由于军阀混战,天灾流行,导致农民破产,无以为生,少壮者便只好投身为匪。那些溃散的兵勇,摇身一变,也成为土匪。他们集小股为大股,到处烧杀抢掠。河南一省的土匪便多达几万人,通常数千、数百人为一伙,他们装备有大刀、短枪,后来还有数十门大炮、数十挺机枪者,或活动于本境,或纵横于数县,

---

① 据上海《新闻报》,1926年5月25日《开封通讯》报道。

② 向云龙:《红枪会之起源及其善后》,《东方杂志》第24卷(21),商务印书馆馆志,1927年11月。

数十县。其成员有农民、矿工、游民、散兵游勇、城乡地主和失意军官;甚至有十多岁的少年,也有五六十岁的老人(包括妇女)。据当时学者统计,1925 年河南有大股土匪 52 股之多,其中千人以上的有 23 股,[①]有些地方甚至"无村无匪,几无好人"。[②] 当时著名的土匪头子"老洋人",带领数万匪徒,攻打县城,先后攻陷项城、沈邱、息县等城。据地方志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九月二十二日夜,鲁宝巨匪绰号老洋人张名圣等,率贼数万,乘破上蔡、沈、项、息县、正阳十余城之势,分为三股,由东南蜂拥而至,一攻驻马店,一由黄山坡进攻确山,一在新安店接应。南北约延长九十里。"[③]据当时报纸记载,"豫北如武安、涉县等处,豫南如方城、南阳等地,豫东长葛、中牟等处,豫西如嵩县、洛阳、偃师等处,旧时虽有盗匪巢穴,然尚不敢彰明较着,白昼抢劫。前自官兵无饷可支,附匪殃民,助匪枪支之后,而匪胆斗张,四出抢劫,白昼入城绑票估产勒索,炮烙鞭打,残酷已极。稍一违拗,被害者死亡立见"。"士绅与匪徒达成协议,土匪成了保护人,豫北各县必须造其户口、地亩清册,凡有田地十亩,尽先纳保障费大钱十串,地百亩,纳费一百串,余皆类推。至常年保费,与县公署上下忙征收之钱粮同"。"豫东长葛等地,土匪猖獗,较之豫北尤甚。除每乡每户按月派捐之外,尚且奸淫烧杀,涂面借银。闻邓县北乡绅张东铭,对于该匪苛索稍一辩驳,而匪等立即变脸,喝令烧抢一昼夜,兽欲凶张,肆无忌惮,计格毙乡民一百七十余,烧去住房九十余间"。[④] 巨匪王老五"在下汤镇盘踞二十二天,寨中所有财物、牲畜、粟粮等项,席卷一空,枪毙良民男女至五十三人,架去幼妇十七名,寨中居户,即一贫如洗。匪等复行轮流攻击附近之寨,所过之处,村落尽成灰烬,计焚烧房屋两千数百间,损失财产数十万,……有的地方甚至鸡埘牛棚,无一存者"。[⑤] 1927 年,河南淇县塔岗老寨地方有一大股土匪,沿山区侵扰林县,当地官府无力抵抗,弃城而逃。土匪进城后,任意烧杀抢掠。天门会遂聚集会众,手持长枪短矛,并有少数步枪配合,杀进城中,将土匪赶跑。[⑥]

土匪除大肆抢劫外,还进行绑架勒索,赎价高达 30 万至 50 万元,最低也要

① 何西亚:《盗匪问题之研究》,上海泰东书局,1925 年,第 89—94 页。

② 《晨报》,1923 年 3 月 3 日。

③ 《确山县志》第 20 卷,清乾隆十一年,1746 年,大事记。

④ 《晨报》,1921 年 11 月 18 日。

⑤ 《申报》,1922 年 12 月 21 日。

⑥ 崔祖泽:《天门会在辉县》,《河南文史资料》第 11 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数千元。因此,最初是富农、地主遭到绑架,在他们因为遭到多股土匪的轮番绑票破产后,土匪绑票的对象便转向一般农民。据一位在河南生活了30年的外国传教士说:"过去土匪只袭击富人,而穷人欢欣鼓舞。因为土匪经常沿街散发钱物,土匪也保护传教士。然而现在(指1926年——引者)土匪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抢劫,发现谁有油水就绑架谁。"①

军阀混战造成的大量溃兵也加入到土匪的行列,他们到处抢掠,偃师县"被抢者三百余村,每村是数十家"。新安、渑池、洛宁、宜阳等县,"大凡一个村庄,一经他们进去,不惟拿银钱衣物等,还要烧房子、拉人"。宜阳白树镇,"被土匪打开,临走的时候,又放了一把火,延烧了九十余家,又将青年妇女,拉走四十七个之多"。② 1920年,皖系西北军两千溃兵蜂拥进入洛阳七里河,"不论贫富,见门即入,遇物便拿,逢人就打,村人伤残者不计其数,更有打其夫而淫其妻,捆其兄而奸其妹者"。③

土匪们一旦势力强大,便拉起一支队伍,成为军阀,刘镇华、张治公、憨玉琨、孙殿英等人都是土匪出身的军阀。军阀们为了扩充实力,便大量招抚土匪,仅在洛宁一地,由土匪受招抚而充任军、师、旅、团长者,就有万宗(李万如部旅长)、武鸿章(刘镇华部团长)、夏维礼(孙殿英部旅长)、王汉清(李万如部团长)、李其芳(王凌云部团长),以及金耀坤、韦凤岐、马德胜(豫西镇守使丁香苓部营长)等人。

面对土匪的抢掠和军阀的压榨,红枪会便奋起抵抗,他们赶走土匪和军阀委任的地方官员,将许多县城占据。据当时报纸报道说,"豫省旧汝宁府属之汝南、正阳、罗山、信阳、确山、新蔡、西平、遂平、上蔡等九县,现均为红枪会众所占据。正阳、罗山、确山、新蔡、上蔡等处县知事则已完全为红枪会所逐"。④ 在河南汝南,自1922年陕军军阀田维勤进驻后,为了扩充实力,到处"索粮草,拉人畜","每日向汝南县索要米面则以万斤计"。致使汝南县城方圆20里内"无囤积之粮,无拱把之木"。广大农民的生活已经陷入绝境。1927年中共汝南党组织发动各地红枪会,举行声势浩大的"亮兵示威大会",实现了南北80里,三万

① [英]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② 上海《民国日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20年。
③ 长沙《大公报》,1920年1月5日。
④ 天津《大公报》,1927年5月14日。

多人的大联合，形成一支反对军阀结合土匪的武装力量，震慑了汝南的军阀和土匪，致使“陕军之赴乡索粮草、拉人畜者，心惮之而不敢犯”。[①]

1926年12月22日，河南磁县岳城镇巡警局为奉军摊派各种税款，农民大为愤怒。红枪会的一支天门会招集会众，包围岳城镇巡警局，刺杀巡警四人，拘留警长，烧毁警局。并且攻击驻扎在附近的奉军，将其击溃，夺获奉军的枪炮、子弹和马匹。接着，又乘胜杀奔磁州县城，将县城包围，奉军一面求和，一面调集军队，天门会与之相对峙。在河南，红枪会反对直系军阀吴佩孚、冠英杰的暴政，多次举行暴动。1926年三四月间，河南杞县人民为了反对特别捐，要求改组公款局，集合万余人，到县署示威。[②]

民国十三年(1924)前后，宝丰县一带的土匪，由小杆联成大杆。经常到鲁山县沙河南张良管区一带“绑票子”，抢劫财物，闹得百姓不得安宁。当地民团团长杨道南，从山东济南请来红枪会的五位老师，建立了红枪会的组织。1925年2月，红枪会举行了一次“亮兵示威”活动，大大提高了村民抵抗土匪的士气，并且使得土匪再也不敢随意进入红枪会活动的范围！1927年，土匪头子李老末带领2000余人前来抢掠，结果被红枪会武装全部歼灭![③] 上蔡县绿枪会曾到党店至蔡沟中间地区清剿郁王村张浩然带领的土匪，“杀匪百余人，在党店亮岳，缉获着匪九人，砍头示众，匪气一时为之震慑”。[④] 当土匪到永城高辛庄的邻村抢劫时，高辛庄的红枪会马上“集合四五十人，手持红缨枪，口中发出‘哈’、‘哈’的喊声，到邻村攻打土匪，群盗惊惶而走”。[⑤] 1926年，土匪袁如意纠集匪徒十余人潜入登封县大金店梅村抢劫，红枪会首领率领会众数十人“击溃匪徒，打死了袁如意，至此，红枪会声威大震”。[⑥] 唐河枪社成立后，就和土匪冯黑脸交手。因潘庄农民戳死了冯黑脸之兄冯同实，冯“就调来枪支三十余，到潘庄报仇。当地枪社组织十余人，与土匪对仗，结果冯匪见势不好，拔腿逃跑了”。还有一次，社众千余人围攻驻扎在白秋的土匪潘士昌，双方交战，社众奋勇前进，

① 黄德柱:《汝南红枪会》,《汝南文史资料》,1989年4期。
② 申仲铭著:《民国会门武装》,中华书局,1984年,第4页。
③ 张明斋搜集整理:《红枪会在鲁山的发展及活动》,《鲁山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
④ 赵以浩:《绿枪会、红枪会》,《上蔡文史资料》第1辑,1987年,第65页。
⑤ 高一轻:《我所知道的永城红枪会》,《永城文史资料》第3辑,第91页。
⑥ 任铁松:《登封红枪会的兴起和抗暴斗争》第1辑,第37页。

匪等见势不好,逃窜了。[①] 汝南留盆红枪会曾组织兵力进剿老冯庄的土匪巢穴,捕获土匪冯八家、冯皮钱、冯站场三人,就地处置,大灭了土匪的嚣张气焰,促进了社会安定。[②] 1927年6月,土匪梁震环、范明新带领2000多人驻扎在民权县褚庙,进行抢劫。红枪会立即出动,"西从马道口东到张贡庄布防,加上褚庙区队助守,梁、范率众多次攻击半坡李店均未得逞"。[③]

其次,组织和领导农民的抗捐抗税斗争。

1925年,河南在秋粮歉收的情况下,当地的陕军赵树勋部反而加重勒索,卢氏县四乡人民遂各持刀枪棍棒,与红枪会、硬肚队等"不期而聚者十余万人,将县城包围,以致驱逐陕军",迫使陕军减收税款、杂项各半。此后,红枪会又曾进行了两次围城斗争。[④] 1926春,唐河县城被十七旅(旅长薛传峰)占据后,要预征三年的田赋,稍有迟缓,即鞭打绳捆。红枪会领导县东北一带的农民起来抗粮,十天之内已经蔓延全县,农民"祖孙、父子、兄弟都拿起土枪、刀矛,离开家乡,不约而同的进逼县城,把唐河县城围了水泄不通,声言活捉薛传峰,刀剐'陈猪油'(县长陈竹友的谐音)。迫使薛传峰乘夜间逃跑,县长急请郭滩镇保卫团总张鉴三前来,红枪会与张鉴三的保卫团展开血战,持续了两月有余。后来张鉴三不得不与红枪会议和,答应豁免一九二七到一九二九年三年的田赋(以后并未实行)"。[⑤] 1927年,谢景安任登封县长与建国豫军三十五师旅长薛宗五部同谋向农民强征粮差,每亩粮私自加征"银二厘五、粮三合",引起群众的不满。城内士绅刘儒协命其子至城西尚庄会见红枪会首领梅金选、王虎等,约定农历五月十一日乘当天上午城内举办庙会之机将县城包围。[⑥]

1926年12月,宜阳红枪会与豫西数县红枪会展开大规模的"反征"运动,声言:"各县知事欲借征本地支款则可,如借征解省,则誓死反抗。"当时的报纸报道说:"豫西洛阳、嵩县、永宁、新安、渑池一带之红枪会,人数本多,自从今春

---

① 陈华斋:《唐河枪社概况》,《河南文史资料》第14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6—97页。

② 杨世文:《红枪会活动纪实》,《汝南文史资料》第4辑,第55页。

③ 王春德:《民权东北部的红枪会》,《民权文史资料》第2辑,第17页。

④ 仁静:《河南卢氏县人民对军阀之反抗》,《向导》,第186期。

⑤ 雪门:《唐河红枪会的两次抗粮斗争》,《河南文史资料》第14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0页。

⑥ 任铁松:《登封红枪会的兴起和抗暴斗争》,《登封文史资料》第1辑,第37页。

岳维峻兵败，大受西路红枪会之害，军械被其得去者，统计在一万五千支以上。该县自得该项军火后，已将红会改组民团，守望相助，民间甚安谧，半年以来，各县土匪横行，而洛阳各县的民团之力，安然无事，第该民团近以财政厅预征丁漕，年征三四次之多，兵差给养，在在勒派，已于前日联合豫西十余团，作大规模之运动，所有赴会民团，悉在关坟集合，声势甚大，驻军不敢与抗，闻其集议之要，是厥惟反抗预征十八年之丁漕，故洛阳县知事月易四人，亦无一人敢办，现张英华以田沛纵容民团，将由撤省，委王幼侨，前往接署，并闻民团已具决心，县知事欲借本署支款则可，如借征解省，则誓死反抗"。[1]《申报》也报道说，"陕州、新安、密县、登封、偃师、巩县一带之红枪会，已一致团结，第一拒绝军队派粮，第二反抗苛捐杂税，第三有红枪会之镇市乡里，不容军队驻扎。声称人民出粮，赖军队保护地方，剿除土匪，今出粮奇重，而地方仍不得安靖，所以人民已联合自治，粮饷不出，亦不赖军队保护云云"。[2]

1927 年 3 月初，豫西各县红枪会又联合掀起抗捐、抗税运动。孟县红枪会提出："除现驻军队外，其余一切军饷粮秣誓不供给"。是月中旬，各县驻军强行拘捕了一些红枪会会员，导致各县红枪会同时举事，使县城驻军无可奈何。当镇嵩军李万如的第七师在渑池、新安派捐收税时，红枪会群起反抗，提出"不许军队驻扎，反对派粮征税"，于 3 月 29 日与李万如部猛烈交火，并得到邻近县红枪会的响应。战斗进行了半个多月，李万如仍无法取胜，只好请求驻陕师长何梦庚前来助战。同年 4 月 20 日左右，驻宜阳、新安交界处之镇嵩军王振部，就地征粮，各地红枪会奋起反抗，"红枪会员伤亡三百，王部则伤亡近千人。王振大怒，用重炮轰击，烧杀掠夺 30 余村，百姓死亡惨重"。洛阳、宜阳、新安、渑池四县红枪会联合前来相助，将王振军队悉行缴械。

第三，部分红枪会接受中共领导。

中共早期领导人一直关心红枪会的活动，并且给予较高评价，认为红枪会是"农民自卫武装"，号召一切革命者"引导农民向着健康的正确道路发展"。[3]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中共在武昌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邀请华北各省，特别是河南农运工作者和红枪会领袖人物开会举行座谈，配合北伐

① 《时报》，1926 年 12 月 18 日。

② 《申报》，1927 年 1 月 17 日。

③ 见《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 年。

军开展直、鲁、豫的农民运动。1926年冬,中共河南省委派党员杨介人到天门会做工作,参与指挥天门会对奉军的作战,将奉军驻扎在岳城骑兵第六旅的两个营击溃。中共又派河南省农协党团书记到林县慰问天门会,经过宣传和解释,天门会首领韩欲明对北伐战争与农民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表示愿意与北伐军联合反对奉军,阻止奉军南下。[①] 1927年秋,山东的共产党组织由省委王寅生及党员杨一斋领导,在鲁西举行的农民起义,就是依靠了红枪会的力量。1927年冬,中共领导的一支以红枪会为骨干的队伍,与当时张宗昌政权东临道(今山东聊城)道尹陆春元的军警和张宗昌的省军,激战了半个月以上。[②]

红枪会也有诸多消极作用。

首先,危害地方。

红枪会组织松散,成员结构复杂,往往容易被少数野心家所利用。在河南郑州附近的须水、荥阳一带,以李真龙为首的红枪会,拥有近万会员。李真龙感到自己势力已大,便萌发政治野心,企图登极当皇帝。他到处散布他有"皇帝之福,故名真龙,今日随从之会徒,他日即为功臣,封侯赐爵"。[③] 一般会员,"闻言深信,乃数百成群,手持红枪,背负白刃,分向民间稍有资产者勒索巨款,名为收皇粮,违者祭刀(该会杀人曰祭刀)。其对于各村严持征服主义,派饷方法,先用五六百人,整队入某村落,征集首户,捐派钱米。入郑北崔建齐家,勒索现洋七百余元,村长惧祸潜逃,半途被截,被索两千五百元,声言如不允诺,即按会章杀却祭刀。该会自须水来郑后,内有游民、退伍兵、山东镖师、土匪、乡愚暨各乡之有田地而受兵匪骚扰不得耕种者,均结伍投入会中。勒饷不遂,杀人祭刀,已数十次,昨又攻破李家集,在李家善家,勒索钱一千串。连掠宋寨各村,乡民有从被窝中为匪拉出者,死者数人,现均慑其凶横,不敢报官"。[④] 副会长张金龙之行为,更为骇人听闻。据传"自本年一月一日起,每日须吃活人心肝一窠,借以强胆壮量。前日至汜水县署,将知事李某捉获,就于堂上审问,鞭打藤鞭五百,因李知事曾贴出布告,禁止红枪会,故张金龙呈其凶残之手段,藐视国法,凌辱官吏"。[⑤]

---

① 《涉县文史资料》第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 申仲铭著:《民国会门武装》,中华书局,1984年,第40页。
③ 《骇人听闻之豫省红枪会》,《申报》,1926年1月16日。
④ 《郑州红枪会之猖獗》,《申报》,1926年1月23日。
⑤ 《骇人听闻之豫省红枪会》,《申报》,1926年1月16日。

1926年，奉军魏益三的第八军的炮兵团由罗山经过，前往信阳，军风纪不好，扰害群众。红枪会利用群众的不满，打败魏益三的队伍，声威大震，许多年轻人都争先恐后地投奔红枪会。红枪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罗山城关大肆屠杀，把魏益三炮兵团逃回来的官兵和留守人员全部杀掉，特别是驻在北街老武衙门内的后勤人员和伤病员个个被大刀砍死，连医务人员也作了刀下之鬼。红枪会越杀越眼红，杀完出来好像喝醉酒的样子。炮兵团的官兵有多人跑到老百姓家躲藏，被老百姓救下来不少。[①] 红枪会又以保卫罗山自任，要求城内居民赶快筹款办粮，供应他们。他们又在城内大事立堂安"学"，发展徒弟。并且与土匪头子刘善夫、侯祥符挂上钩，欺压百姓。城内的红枪会被"劣绅方少尧、李站台等拉拢利用，成为他们的护士"。[②]

豫东红枪会首领娄百循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也干了许多危害地方的事。1924年，以他为首的红枪会，控制了通许、杞县、陈留三县东西和南北有七八十里的范围。势力的扩大，使他逐渐萌发了独霸一方的政治野心。为了扩大自己的武装，一方面乘军阀混战的机会，搜罗溃军散兵的武器，来装备自己的队伍，另一方面又同军阀的势力相勾结。恰好这时直系军阀想利用他，便委任他为"豫东剿匪司令"。他就趁机树起豫东剿匪司令的大旗，招收土匪，扩充队伍；他还暗中指使土匪到不安红学的地区去架票，借此威胁人家成立红学保卫自己，好扩大他的势力范围。他又自设修械所，招收工匠，用手工造步枪，来装备自己的队伍。他们经常依靠自己人多势众，探听出哪村有土匪窝巢，就秘密调集红枪会队伍，突然包围剿袭，逮捕土匪，将他们杀死。有些贫穷农民与土匪同族或有亲戚、邻居关系，往往受到牵连，遭受迫害。[③]

在陕县，无论是"红枪会"或"白水符"，在抗粮抗捐活动方面，除了几次"团"（集中游行示威），喊些口号以外，并没有起到大的减免粮税的作用。嗣后两派又各被地主和地方官吏所利用，时时发生械斗，办了不少使亲者痛、仇者快

① 熊兆瑞：《我所见到的罗山县红枪会》，《罗山县文史资料》第2辑，政协罗山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第78页。

② 吕量如：《罗山"红枪会"的内幕和兴灭》，《罗山县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罗山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第39页。

③ 韩晓亭：《豫东通许、杞县、睢县一带红枪会活动纪实》，《河南文史资料》第10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5—86页。

的蠢事,直至土崩瓦解。[①]

其次,红枪会派别之争与武装冲突。

红枪会作为地主、豪绅控制的武装组织,各派之间为了权力之争,往往酿成武装冲突,结果,受害者往往是当地群众。河南新蔡县的红枪会与白枪会、太极道,"并时对垒,纠众格斗,时有所闻。其最烈者,败则窜逃,胜则穷追,沿途劫掠焚烧,残酷甚于土匪"。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不惜勾结土匪。"杆首戴某率匪五千余人,有枪四千余支,自皖边窜至该县,红、白枪会等左道团体,争相勾结,引为护符,以图报复,每日互相寻衅,以致县城周围,枪声四起,火光冲天,全县烧杀殆遍"。[②] 信阳彭家湾至明港一带的红枪会,分为红灯会和光蛋会两派,红灯会由来已久,光蛋会系"新集合之土匪,多无产阶级,强迫乡民入会,不入者烧杀并至"。两会意见分歧,时相仇杀。[③] 宛东红枪社、黄枪社、绿枪社之间,互相攻打,互有伤亡。甚至一家人中如果入的不是一个学,也要同室操戈。[④] 唐河县的枪社也因派别不同,酿成互相惨杀的惨剧。"马店北刘全庄村刘结巴率枪社与下屯社对打,均有死伤。县北源潭北社与南阳社旗镇社互相惨杀,双方各有死伤"。[⑤] 荥阳红枪会分为大红学和小红学。"彼此势如水火,两派之间复有黄枪会,三派之间,意见各不相同,蓄意时相吞并。大红学和小红学在荥泽、河阴两县边境,开始激战,黄枪会复援助大红学,加入战团,激战五个小时余,黄枪会首先败退,大红学亦势穷力竭,四散逃窜。但大红学会及黄枪会会员之住宅在战斗区域以内者,有六百余家,均被小红学查抄杀伤,鸡犬不留"。[⑥]

涉县的长仙会与天门会间的派别之争甚为典型。1931 年正月,该县段曲村农民王长栓组织发起长仙会,召集信徒,声称入了长仙会办好事,打不平,能够"闭火门",打不响枪,发不着火,很快发展到十几个村庄,100 多人。当地天门

---

① 苏兴:《对陕县"红枪会"、"白水符"的片断回忆》,《陕县文史数据》第 2 辑,河南洛阳地区文化专志丛书,第 127 页。

② 《十二军赴新蔡剿匪》,《申报》,1927 年 7 月 16 日。

③ 《豫南匪势猖獗》,《申报》,1928 年 2 月 10 日。

④ 胡子和:《对宛东红枪社活动的粗略回忆》,《方城文史资料》第 1 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38 页。

⑤ 陈华斋:《唐河枪社概况》,《河南文史资料》第 14 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98 页。

⑥ 《河南红枪会大械斗》,《申报》,1926 年 1 月 11 日。

会怕长仙会的势力压倒自己，而长仙会因迷信自己能"闭火门"，也故意与天门会闹不和。一次，林县任村有几个人到段曲加入长仙会，领了旗回到任村，被天门会员看见，把长仙会旗夺了。长仙会便组织了20多个人，于夜间去任村偷袭天门会的营盘。结果被天门会发现，当时天门会在任村驻着三个连，看到长仙会的人不多，便向他们扑过去，长仙会员一看不妙，便往回跑，天门会一直把长仙会追到段曲，杀了十几个人。次日早起，天门会把段曲村围了个水泄不通，双方展开激战，最后，天门会攻入村里，长仙会21人被杀，其余的逃跑。接着天门会便烧了长仙会会员的房子，一时间段曲村血流成河，火烟冲天。天门会的首领发出大杀三天的命令，彻底消灭了长仙会。①

红枪会之间也为了争夺地盘而发生争斗。

1927年春，林县附近几县如安阳、武安、涉县、辉县、临漳等设立天门会，时常与红枪会的其他派别发生冲突，多杀无辜。是年六月，韩欲明进入林县，知县缒城逃跑，天门会控制了林县城县城，然后又派遣会众数万，大举东进安阳西，击败夏堡村白缨会，焚其村舍。② 辉县除了天门会之外，还有黄枪会、白枪会、绿枪会等，以天门会势力最大。其中，西罗平村就有天门会和黄枪会两派，互相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报复私仇等事时有发生，造成了以后各会间互相残杀的局面。一次，山西晋军溃兵三四十人，携步枪30余支向两会投诚，由于"分枪不公，天门会和黄枪会发生纠纷，造成仇恨"。③

滑县的红枪会和一心会（大刀会）之间的矛盾，酿成相互仇杀。1927年10月，红枪会首领李保安带领会众3000多人，进攻滑县县城。一心会则协同守城的陕军向红枪会袭击，把红枪会打败，一心会得到了一些炮弹和战利品。从此，两家仇恨更深，"相互攻击，仇杀不已"。红枪会为了报复，会首李保安、薛明德、马运武等率领会众3000人将东付村（一心会所属范围）何姓、宋姓、王姓④的房屋烧毁，并将各家牲畜财物抢掠一空。一心会也采取报复行动，率众开往南苑

---

① 《涉县天门会活动纪实》（作者不详），《涉县文史资料》第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 申仲铭：《民国会门武装》，《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中华书局，1984年，第170页。

③ 崔祖泽：《天门会在辉县》，《河南文史资料》第11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3页。

④ 何姓、宋姓、王姓是一心会头领的家族。其头领有何起敬、宋太仁等。

村赵街寨内(红枪会所属范围),结果被红枪会包围,战斗三日,互有伤亡。县长调解无效,后经八里营等处红枪会首领调解,一心会包款赔枪,红枪会才解围而去。但双方的仇恨并未化解,这年冬天,双方在小刘寨五方等村屡起战斗,各有伤亡。而每次战斗"烧毁房屋、抢劫财物,难以数记"。[①]

第三,参与军阀的混战:红枪会与国民军二军的恩怨

"国民军"是1924年10月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后组建的军事联盟,冯玉祥属下称"国民一军",胡景翼属下称"国民二军",孙岳属下称"国民三军"。

陕西督军刘镇华是河南人,所部称为"镇嵩军",手下的憨玉琨、张治公等都是河南人。在北京政变后,刘镇华投靠段祺瑞,并向段子宏业行贿20万元,[②]由此获得段的支持。刘镇华与憨玉琨、张治公等在陕西属客籍,而且刘镇华虽然在名义上是陕西督办,但所据不过西安及周围数县,所以,一心想回河南。1924年11月8日,刘镇华致电段祺瑞表示:"愿调河南,陕西督理一缺,即与胡立僧,即陕人治陕,豫人治豫,顺理成章。"[③]于是派憨玉琨部出兵潼关,进驻河南,占据洛阳及荥阳、密县、登封、禹县、郏县、鲁山、南阳一线以西广大地区,并把持着豫西20余县的财政和行政权。[④] 这时,国民二军的胡景翼已经受命任河南督办,率领国民军二军从直隶进兵河南。于是同刘镇华镇嵩军憨玉琨发生冲突,于1925年3月爆发"胡憨之战"。[⑤] 国民军二军是以客军治豫,军纪又差。刘、憨遂借机挑动河南人民对国民军二军(陕军)的敌视情绪,利用已经兴起的红枪会对其进行抗拒。胡景翼则尽量减小与红枪会之间的冲突。当国民军二军一位营长在与红枪会一位老师争论红枪会避枪炮的迷信问题时,用手枪打死了这位老师及他的四名徒弟。胡景翼得知后,下令枪毙这个军官,说他破坏了国民军

---

① 孙修身等:《河南滑县红枪会的发展与覆灭》,《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76页。

② 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9页。

③ 上海《民国日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24年。

④ 《胡景翼述豫局经过之通电》中说憨玉琨把持着40余县的财政和行政,见孙曜《中华民国史资料》下,中华书局,1984年,第84页。

⑤ 刘敬中:《国民军史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页。

二军和人民的联盟。[①] 但是,这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其与红枪会的关系问题。

国民军二军进入河南后,收编了直系残部曹世英旅,并允许其收编旧部,扩充军队。曹遂命团长王祥生返回禹县,收缴民间枪支,筹措粮饷。禹县地主、富商曾组建了类似于红枪会的武警、商团组织。王祥生返禹县后就对这些武装加以收编,并推荐其副官充任武警队长。曹世英又巧立名目,索取银款,用河南银行印有"京津"等字的废钞到商会强行兑换,又以年关银款不敷分配为由,强行向其索借银元4000元,并限两天内交足。憨玉琨遂借机以"陕人压迫豫人"进行煽惑,[②]唆使禹县商团、民团反对曹、胡。1925年1月22日,王祥生团入禹县城将武警、商团包围,勒令其交出枪支弹药,并要强行开入繁华城区。谈判不成,双方开火。在民团的内外夹击下,王祥生不支而退。胡景翼急令驻军郑州的岳维峻师及驻许昌的蒋士杰旅各派兵一团增援。23日,曹旅与援军攻破县城,向居民实行报复。"及陕军去禹,城内车马财货如篦如洗","繁市半为灰烬"。[③] 据红十字会统计,在这次洗劫中,共焚毁房屋1万余间,打死民众(包括红枪会员)7000余人,被虏的财物则不计其数。[④] 这次件事以后,"人民引以为惧,觉与其坐以待毙,不若起而自卫,故加入此会(红枪会)者益多"。并成为了红枪会向全省扩大,乃至"遍满全省"的直接契机。[⑤]

在胡、憨两军激战之际,国民军二军在洛阳遭到红枪会的攻击。国民军在反击中击毙红红枪会会首黄某,会众溃散。国民军遂对红枪会进行查禁。[⑥]

3月8日,胡景翼攻占洛阳,刘镇华、憨玉琨分两路向西撤退。19日,镇嵩军张治公部在红枪会的帮助下,于新安、洛阳之间进行反攻,一度冲进龙门和洛阳车站。国民军二军在三军支持下进行反击,张治公部终于不支而退,红枪会也见机四散而逃。事后,胡景翼发布告示称,此次红枪会系被煽惑,"如悔悟均

---

① [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中国社科出版社,第85页。

② 张钫:《国民二军与镇嵩军之战》,《洛阳文史资料》第7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5—70页。

③ 民国《禹县志》第2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大事记。

④ 许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许昌市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页。

⑤ 《顺天时报》1926年3月29日,转引自[日]三谷孝:《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⑥ 《河南红枪会大械斗》,《申报》,1926年1月11日。

免究”。[①]

镇嵩军战败后,其残部由柴云升、王振等统率,退踞于豫陕边境熊耳山、伏牛山一带;张治公部盘踞南阳、襄樊等县;孙殿英、万选才两部则盘踞豫西嵩县地区,他们不断煽动各地红枪会“杀老陕”(国民军二军)。胡景翼死后,由岳维峻继任河南督办。岳维峻对于红枪会,最初也效仿胡景翼的政策,与红枪会和平相处,并欲利用红枪会御匪,以获后方安宁。但是,国民军二军与红枪会的关系很快急剧逆转。

由于大肆扩充,国民军二军在财政上已不堪重负。1925 年,河南省财政收入尚不及其整个军饷的一半。9 月,豫省金融奇紧,市面流通纸币占十分之七八,而现银不过十分之二三,各银行已无法维持。[②] 岳维峻却仍借口豫钞兑现,筹集金融公债 300 万元,挪作军用,同时又滥发纸币 1000 多万元,印铜元票数百万串,以致豫钞价值下跌,最后达到仅为面额的四成。[③] 各地不断摊派军饷,预征钱粮,1926 年 1 月,国民军二军在预征 1927 年国课的同时,又向各县摊派军饷,每县恒逾百万。国民军二军由于扩编太快,对收编的直系败军、土匪武装也不加整顿,军纪败坏,到民间抢掠、绑票的事情时有发生。红枪会趁机再度兴起,以求自保。洛阳 1300 余村“几无村无红枪会学塾”。[④]

面对红枪会的崛起,岳维峻于 1925 年 10 月初,以红枪会“左道惑人”为词,通令全省严禁红枪会活动。[⑤] 1926 年 1 月 12 日,岳维峻又同郑县知事宣称红枪会系“谬托妖术,欺罔蚩氓”,而“愚民不识,轻信盲从,驯至聚众勒捐,鱼肉善良,拒纳税赋,扰害地方,甚且破坏交通,围攻城邑,受人指使,袭击官兵。若不严加禁惩,祸患伊于胡底”。要求百姓“自此布告之后,未习者万勿误人(入)迷途,已习者急宜幡然悔改。倘竟甘心逆从,横行妄为,法律所在,决难宽贷”。[⑥]

这时,在湖北的军阀吴佩孚为了反对冯玉祥,正在搞“直奉联盟”,于是利用

---

① 《红枪会与豫乱》,《晨报》1925 年 4 月 8 日。

② 《豫省纸币价愈低落》,《晨报》1925 年 9 月 6 日。

③ 神州:《国民军第二军之失败》,《向导》第 147 期,合订本(三)第 1369 页。

④ 羽君:《红枪会在洛之势力》,《晨报》1925 年 9 月 22 日。

⑤ 《豫当局禁红枪会》,《晨报》,1925 年 10 月 12 日;《国内专电》,《申报》,1925 年 10 月 11 日;《国内专电》,《申报》,1925 年 10 月 19 日。

⑥ 国内要闻二:《豫省之三面形势》,《申报》1926 年 2 月 19 日;《豫西会匪溃窜》,《晨报》1926 年 2 月 25 日。

河南红枪会对国民二军岳维峻横征暴敛的不满,派人联络红枪会,许以三年不征钱粮为条件,驱逐岳维峻。红枪会和全省之农民,轻信吴佩孚的诺言,“皆群起以待吴氏入豫,共同驱逐国民军二军”。[①] 红枪会首领,纠集数十万众,帮助吴佩孚攻击国民军二军。当岳维峻、邓宝珊等率军从郑州退往洛阳时,红枪会缴获了大量大炮、枪支和弹药。“国民军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农民起来攻击,甚至妇人孩童亦拿着武器来打国民军”。[②] 有的地方还出现了见陕人(甚至是讲陕西话的人)即杀的现象。[③] 当时红枪会由于“仇陕”的积恨在心中燃烧,“杀老陕”就成了当时会众的口号。遇到流散溃兵,就厉声叱问,溃兵们如果说是鼻音的“我”(读如“饿”,陕西人称“我”的口音),会众执枪就戮,无一幸免。溃兵若回答是“我”,证明不是陕西人,只要留下武器,就可以通过。一时国民二军被杀者难以数计。

1926 年 2 月上旬,国民军二军邓宝珊部在确山被红枪会缴械,驻马店的一个预备司令部在夜里遭到红枪会的袭击,官兵被消灭殆尽;刘继邦旅则在驻马店附近为红枪会击败,刘也身遭刀斩。[④] 3 月 2 日,国民军二军被迫放弃郑州,分西、北两路撤往陕西、直隶。河南红枪会大队人马集中在郑州以西及洛阳附近,配合吴对其进行截击。国民军二军所经的村寨都大门紧闭,墙头有红枪会守卫。红枪会见“陕军人少则与作战,而夺其枪;陕军人众则各返其宅,仍为良民”。[⑤] 聚集在铁道沿线的豫西红枪会,更是“夜夜放哨,发行口令,盘查行旅。一有不合,即行戳死”。以致驻洛阳城内的国民军二军都不敢出城巡防,即使是驻守西宫的冯毓东旅亦不敢到三里外的地方放哨。[⑥]

国民军二军受到红枪会的袭击,损失惨重,便对红枪会进行报复。1926 年 2 月 18 日,国民军二军康振邦旅派兵一团,赴豫西陕县镇压红枪会,并焚毁民房

---

① 神州:《国民军第二军之失败》,《向导》第 147 期,合订本(三)第 1369—1371 页。

② 霁帆:《介绍河南的红枪会》,《中国青年》第 126 期,第 9—17 页。

③ 向云龙:《红枪会的起源及其善后》,《东方杂志》第 24 卷(21),商务印书馆馆志,1927 年 11 月,第 39 页。

④ 老梅:《论北方民众的潜势力》,《星期评论》第 1 期(1927 年 5 月 16 日),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苏]A. B.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 年)》,第 74 页。

⑤ 国内要闻:《河南陕军失败之现况及原因》,《申报》,1926 年 3 月 11 日;《河南陕军失败之现况及原因》,长沙《大公报》,1926 年 3 月 17 日。

⑥ 南邨:《豫东豫西战事形势》,《晨报》,1926 年 3 月 3 日。

200余间，杀害村民老幼39人。[①] 同年3月初，国民军二军岳维峻、李虎臣、冯子明等撤退到洛阳附近时，周围十余县的红枪会闻讯后集结两万余人，对其发起进攻。双方激战几个小时后，国民军二军即损失大炮三尊，机关枪五架。岳维峻见红枪会人数甚多，遂与李虎臣先后退到洛阳东门外。次日上午10时，李虎臣调兵助战，打死红枪会3000余人。但在红枪会猛烈反攻下，李虎臣、岳维峻被迫向西败退，并于临行前放火西宫、东屋，将其在巩县所运20余辆军械付之一炬。[②]

① [韩]梁福烈：《红枪会研究》，博士论文(未刊)，第83页。

② 本馆要电二：《开封路息》，《申报》，1926年3月14日。

第十二章　民国初年的其他会道门

一、企图复辟专制帝制的九宫道

九宫道是由清末离卦教分支圣贤道演化而来，民初蜕变为会道门。

民国初年，九宫道道首李向善仍然死抱着专制帝王思想不放，对辛亥革命持敌视态度，大骂革命党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制是"阴阳颠倒"，打算建立"黄天党"，颠覆民国政权，恢复专制帝制，[①]逐渐完成了从清末秘密教门向会道门的转化。1912年李向善死前曾嘱咐弟子说，他如今归期将至，但三年后定要回来。李向善死后第三年，他的弟子李书田捏称李向善之灵魂已经返附其体，徒众们也趁机附和说李书田已经于民国三年(1914)"接得普济(李向善)，便向外传道"。[②] 李书田(1884—1945)字成明，号玉甫，河北省蠡县人，自称是"弥勒佛九转十世"，得到普济真传，主持外九天，法号"利济"，掌管总中皇极。他还自称弥勒佛下世，有"九五之尊"、"皇帝之分"，因此必须有27个妃子作伴，为此他先后娶了5个小老婆。李书田为了攀附权贵，于1915年投靠军阀曹锟、吴佩孚，并得到黎元洪的支持，在北京成立"普济收元会"。1924年又在北京成立"京师普济佛教总会"，由当时的总统曹锟担任会长、吴佩孚任副会长，"上将军"江朝宗为"名誉会长及会盟"，李书田本人担任"会师"。曹锟还为该会题写匾额"道衍诸天"。段祺瑞、吴佩孚也分别题写匾额"慈航普渡"、"洛社耆英"。1934年该会改称"北平普济佛教总会"，推举曹锟、吴佩孚为正、副会长，"上将军"江朝宗为"总会监"，蒙藏主席、德王为名誉会长，李书田任"会师"，自称"收元祖"。他到处组织刀会、枪会等武装，反对共和制，在河南攻击国民革命第二

---

① 李昭主编：《邪教会道门黑社会》，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278页。

② 《利济三周三济根本经》，转引自路遥：《山东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

军。该教攀附权贵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夺取政权，九宫道的历代道首皆自称是“弥勒佛转世”，准备要治理天下，登极称帝。李书田死后，继任的道首李福昌自称“弥勒佛十一世”，故该道道书中有“前李后李又后李，有李能走遍天下”之说，目的是要在“中京内木子君登了金殿”。①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福昌还阴谋称帝，妄图建立国号为“大顺”的朝廷，设立“九宫十八院”和封260个皇妃。②

九宫道的许多大小道首都有登极称帝的政治野心。除李书田自称将来要当皇帝外，中会会主张志博也企图凭借九宫道的势力，实现其当皇帝的梦想；该道的五会总领宋坤树自封“未来帝”，封其妻妾四人为“后妃”。余九天（又名玉九天，是“十八天”中势力最大的一支）的“天督”刘国俊，自称“紫薇大帝”，将来要得天下，为此，他还要求道内信徒向八卦旗磕头，把八卦图焚化后喝下，并默念朱熹的《八卦取象歌》。说这是为了保“白阳佛紫薇大帝”登极，建立“莲花国”。并且号召各股头成立队伍，以备将来打天下。③

民国年间，在九宫道的“十八天”中，以“外九天”的“天督”李书田势力最大。1926年，以于效坤、张殿卿为主，在山东历城县建立了红枪会、大刀会，然后又赴青州、潍县等地组织武装会门，并在济南投靠了日本在济南的特务机关。1928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该会门因为对日本特务报效有功，日本特务机关还专门赐给该会门一块匾，以示奖赏。这一支后来划分为正中、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五大分会，道徒总人数达百万之多。

“七七事变”后，李书田一度跟随国民党南逃，企图借助于军阀石友三的力量建立会道门武装，反对共产党的抗日运动。不久，石友三的队伍南移，李书田只好又回到天津，通过一贯道道首梁国栋与日军驻天津的司令部建立了联系，在天津的英国租界恢复了“普济佛教会”，由李书田任会长兼法师，日军司令部派二宫博夫担任“顾问”，李书田又通过二宫博夫与济南的日本特务机关“仁字四二二一部队”取得联系。1941年夏，李书田又派手下道首高振亮等建立“未来和平宗教会”，由军阀吴佩孚的继子吴道诗任会长，梁国栋为副会长，李书田为传法师。日本特务中村章雄、北岛信夫及伪山东省教育厅长、一贯道道首郝书暄等为“顾问”。成立大会颇为隆重，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和伪山东

①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302—303页。

②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341页。

③ 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省主席唐仰杜等均前往参加。该会的实权掌握在姜德威(青岛人)、刘金香(武城人)、李广元烟台人、李光年(烟台人)、高振亮(诸城人)与于效坤(济南人)等常务理事和3名日本顾问手中。日本驻济南宪兵阪垣司令部的石桥与日本特务山田九井经常到会"指导",道首高振亮等40多人都在日本特务二宫博夫等的支持下,当上了"仁字四二二一部队"的联络员,日本特务机关发给他们特务证件。1944年3月,李书田派人去北京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部特务正兼菊太取得联系,经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批准,于是年4月在北京怀仁堂成立"弥勒收元总会",靳云鹏被推为会长,李书田为会师,日本特务正兼菊太等为"顾问"。由此可见九宫道的分支"未来和平宗教会"乃是地地道道的汉奸组织。[①]

九宫道的组织体系

在李修正、李向善传道之初,组织比较简单,只设一个盘,名为"瑞聚天盘"。同治六年,李向善创立"后天九宫道"后,组织逐渐复杂,出现了"十八天"和"五会"。

"十八天"(即十八支)

最初只有余九天、外九天、北九天和东北天四支,后来发展到十二天,最后才出现十八天,包括:中皇天、内九天、外九天、左中天、右中天、上九天、地九天、保中天、护中天、东九天、南九天、西九天、北九天、东北天、东南天、西北天、西南天、余九天。各"天"均设有"天督"一人,负责本天(支)的道务。下设干"总盘"。总盘之下设小盘。[②]

"中皇天"

是十八天之首,地位处于各天和会之最高领导机构和核心,最初由李向善亲自主持,1912年李向善死后,由其弟子王生宝接替其位。不过,此后,中皇天便处于与其他各派相同的地位,1926年,王生宝在北京加入杨万春的中会组织。1935年杨万春死后,王生宝又恢复了中皇天的组织,并企图重新取得号令其他各派的地位,但遭到拒绝。

"余九天"

又叫"玉九天",也是九宫道的十八天之一。其"天督"先为吴英俊,吴死后,李向善指派外九天道首胡瑞林接替其职务,从而引起该道道首李荣的不满,1936年3月,李荣伙同余九天道首徐仲三、来伯祥成立"正字慈善会"(简称"正

①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318—323页。

②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292—293页。

字会")李荣自任会长,公开与胡瑞林相抗衡。

余九天的领导机构为董事会,由董事若干人组成,董事长由会长兼任。董事会下面设有慈善、交际等组,由正副组长领导。组下设股,由正副主任各一人负责,下辖干事若干人,主要组织分布在北平、天津、河南、河北。对内该会仍沿用九宫道的组织系统,李荣自称"总主",下设辅圣、副学、监督,协助总主传道。基层组织为小盘,上有大盘、督盘及坛,最高一级坛为"承启坛",可以直接与总主联络。此外还设有乩手,由其直接领受"神意",下达给下一级坛。随后,余九天在中原以胡瑞林为首的一部分道徒,加入了"中会"组织的"五台山普济佛教会",并逐渐发展为九大分支之一。该分支下辖若干分盘、盘,主要在北平、天津、河北等地活动。

"外九天"

是九宫道的"十八天"中实力最强的,1912 年李向善死后,河北省蠡县的九宫道道首李书田自称"弥勒九转十世",得普济亲传真经,成为外九天的道首,广收道徒,发展组织。并且勾结军阀,于 1924 年在北京成立"京师普济佛教总会",1934 年又改名为"北平普济佛教总会",聘请军阀曹琨、吴佩孚分别担任正、副总会长,李书田自任会师,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建立分会。

"五会"

大约在 1903 年开始出现五会,属于"外九天"所传,所传地区最初主要在关外,后来发展到关内。

"中会"

中会又称头会。清末,中会会主为陆永昭,1927 年陆永昭死后,由杨万春继任会主。此后,中会原有道徒大都归顺于杨万春,小部分道徒投奔陆永昭之子陆广义,陆广义遂另立门户,自任道首,但其势力一直没有大的发展。而杨万春的势力却发展很快,主要在东北地区活动,并逐渐发展为四大支派,即东、西、南、北四支。后因各支发展道徒日渐增多,又扩充为 45 坛 18 支;每坛、支下设若干分支、领、盘。1928 年,杨万春与军阀、政客相互勾结,在北京成立"五台山普济佛教会",以办医院、育幼院、粥厂等慈善机构为掩护,从事道务活功。会内采用理事、监事制,会长杨万春兼任理事长,下设常务理事、常务监事、理事、监事、募账员等。其基层组织为"组"和"股"。后因余九天内部权力之争,部分道徒也加入了该会。1935 年杨万春死后,道内权力纷争。原理事姜子原于 1941

年将他发展的道徒拉出来,另立"普济念佛会",姜子原自任会长。1943 年该会又改名为"华北普济念佛会总会",并在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开封、济南、太原等地设立分会。1947 年,该会又改名为"普济佛学会"。会内领导机构为理事会,由会长、副会长统领,理事会下设教务、总务、文书、交际 4 组,各组设主任;理事会内还特设劝导员若干人。各地均设立分会,由分会长统领本地道务。小的乡镇设有念佛堂,设主任一人负责。对内仍沿用九宫道的组织。姜子原自称"万象总盘副教主(正教主是佛)",以下设有大、小盘,均有盘主负责。

"南会"

会主王鸿起先前在东北地区开展道务活动,1912 年王鸿起将该会分为"南支会"、"支会真"、"支会成"、"支会明"四个支会分头传道。致使 1925 年以后,该会的势力已经蔓延河北省境内。1930 年,王鸿起在北京成立"五台山向善普化佛教会",王鸿起自任会监,其子王春暄任会长,并相继在长春、沈阳、唐山、青岛等地设立分会及佛堂 20 余处。1936 年王鸿起死后,由其子王春暄继任南会的"会主"。1938 年以后,该会主要在东北活动,设在北京的"五台山向善普化佛教会",主要由副会长负责。对外称设有正副会长、董事、理事,下辖总务、文牍、慈善、交际等股,各股设有主任;各地均设有分会,由分会长(大的分会设有会监)领导本地道务。分会下设若干公立佛堂,由主任负责。对内王春暄称为洪道盘主,其下按九宫道大、小盘组织分布。

"西会"

会主是东北人邢福,分布在山西一带。

"东会"

会主是奉天泰安人张国文,分布地区主要在奉天、山东、河北。

"北会"

会主说法不一,有说是东北人胡金灵,有说是付兴,分布在新疆、绥远。

五会各会之下均设支会、分会,分别由正、负会主负责。

1914 年李书田捏称李向善之灵魂返附其体,遂自称"弥勒佛九转十世"的"利济佛",得到普济(李向善)的真传,主持外九天,掌握中皇极,下辖四正、四斜的八方大盘。每个大盘领导九个盘,每盘设盘主一人,副盘主二人。每盘下又设小盘,按照法、本、心、印、智、慧、开、通、玄、关、灵、性、色、相、空、门、正、道、传、礼、普、度、众、生 24 字辈分,依次排列。1945 年李书田死后,外九天分为两

支:一支以李书田的儿子李振江为首,另一支由李书田的弟子李懋五为首。由于李懋五自称"弥勒佛转世",逐渐把大部分道徒拉到自己这一派来,将道徒划分为六大坛:中央戊己总坛、天坛、地坛、人坛、风坛、火坛,每个坛下面设若干小坛。主要在河北、山东、山西及辽宁等地活动。

1946年3月九宫道的余九天、中会等支派成员组成"万善联合会",由孔桐萱任理事长,徐仲三、刘陪中等人任理事,总会设总务、交际、宣传等机构。不久,因各支派矛盾重重,遂取消了"万善联合会"的牌子,各支派独立活动。但刘陪中支派仍沿用万善联合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其组织主要分布在北平、天津、沈阳等地。该会内部的领导机构称为"天都盘",由徐仲三为盘主;天都盘内设天理觉悟、后援教导、先锋初导三部,每部设部长一至二人,由三部部长共同负责会内道务。天教盘下设若干盘、分盘。1947年,万善联合会分裂,刘陪中另立天都盘,盘内设圣代道、凡代道共掌道务,下设9个都盘,分别掌管各地基层盘。

九宫道主要道层分布:

(1)天

设有天督,又名掌天或天主1人,负责掌管"天"内全权道务。"天"之下分若干总盘,总盘内设正、副盘主各1人,负责主持总盘内的道务。总盘之下设若干分盘,分盘内设正、副分盘主各1人,负责主持分盘内的道务。分盘之下辖小盘若干,每小盘内设正、副小盘主各1人,管24名道徒。

(2)会

内设总领1人,若干名直属"大头绪",辅佐总领掌管会内主要道务。总会辖若干支会或分会,分别设有正、副会主各1人,负责本会道务。有的支会又下设盘,由盘主主持道务。此外,会内还设有传道师或称传教师。总会的传道师多兼任支会主,或分会主职务。

(3)卦

内设有卦主和传法师,负责卦内全部道务。卦之下辖若干会,内设正、副会长各1人,具体负责本地道务。

(4)宗门正教黄山派

设卦主或教主1人,统领全道。

宗门正教黄山派下设十八十都察,负责向各地传道。该道将全国划分为华北、华中、华南3个区,由卦主和都察负责协调。每区下设3个分区,如华北区

有东北分区、河北分区、西北分区。每个分区下设东、西、中、南、木、天、地、人、和9路。每路下又分9特,每特下分20个大政,每大政下分20个中政,每中政下分20个手政,每手政下管6名道徒。路至手政均设有军、政、财三长,负责本管区内道务。

(5)道级

将道徒按入道年限长短,分为老头绪、大头绪、二头绪、小头绪及散众道级。通常天督职务由老头绪担任。总盘主、传道师职务,由大头绪担任。分盘主职务,由二头绪担任。小盘主职务,由小头绪担任。散众则指一般道徒,其中男道徒又称为大众;女道徒称为二众。

从20世纪20年代起,九宫道即与军阀势力相勾结,纷纷在各地成立公开机构,大肆发展组织,进行道务活功。抗日战争时期,又勾结日寇,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等卖国主张,鼓动道徒向日寇捐献铜铁和钱财,指使道徒参加日寇的特务组织,搜集抗日情报,并组织道徒成立反动武装,配合日寇进攻解放区。①

二、道德学社与万国道德会

1. 道德学社

道德学社又名"孔孟圣道会"、"道德会"、"四成会"、"德化佛堂"以及"大同民主党"等,于1916年在北京成立。其前身是1912年段正元在成都建立的"人伦道德研究会"。段正元(1864—1939)又名段明山,自称15岁时得到"龙元祖师"的真传,并于当年入峨眉山参禅,后又入青城山继续修炼。他于1911年成立"伦理会",同年改名"人伦道德研究会",宣扬旧思想、旧道德。后来他网罗了一批官僚政客、国会议员与高级军官,如总干事雷保康,曾留学日本,为陆军中将;龚百龄为陆军少将;刘永谦为海军中将;唐仲揆为中将参军;杨三生为民政部主事。据传国民党元老张群、何键、熊斌、何应钦等,也都曾"受教"于段正元。1916年,段正元、杨献廷、雷保康、陈晓初等,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参谋总长王士珍(1917年任国务总理)、步兵总监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等,发起组织"北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京道德学社”，以王士珍为社长，段正元为社师，杨献廷为学长，雷寿荣为总承员。后来又攀附国民党上层，充当湖南省主席何键及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高级将领顾祝同等人的幕僚。其基层组织也大多被官僚、政客、军阀和地主、富商所控制。

该社标榜崇奉儒释道三教合一，宣扬“儒佛合宗”、“五教合一”和“万教归儒”，以弘扬“孔孟大道，人道真义”为己任，声言要将孔孟之道，特别是要把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广到全世界，达到天下成一家，中国成一人，人人皆君子，个个称圣贤，以实现世界大同。段正元在所著《周一》中写道：“盖儒虽名为一教，实既至平至常而又至神妙之大道。真正儒教大行，统一中国，协和万邦，成人类大同世界，真正自由平等和平，岂不人人君子，个个圣贤，立成大同世界。”①

该教也同民国初年其他会道门一样，大肆攻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传入中国的科学与民主新思想。段正元在《大同真谛》中说：“至今欧风东渐，功利之习传染遍于中华，人民脑筋，印入一种优胜劣败之学说，遂至以礼让为迂谈，以道德为无用，演出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之世界，而祸乱几不可收拾矣。”又说：“中国有真儒大道，可以修齐治平，胜过西方万万。”“中国自一划开天，大圣人循生迭起，将治平大道，发扬已无余蕴，焉用西学？”②

段正元自称“太上天真师尊”，是天地间诸神的总代表，被社内道徒尊奉为“太上原始主宰”，该社在坛堂中供奉段正元的“神像”，神前供奉太极图，并设立黄龙旗两面。每逢朔望，社员要集中，焚香跪拜，坐功运气，颂经念咒。该社拥有总社及各地分社，总社设在北平，由于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支持，势力发展很快，在上海、南京、杭州、汉口、郑州、西安、重庆、天津、山东、江苏等省市均有分社。在常熟支会的本堂，夜间聚众百余人，中间设一龙椅，作为段正元的座位。逢农历每月初一、十一和二十一，即所谓“三一”朝圣日，及孔子诞辰，社众都要聚集在一起，由段正元开沙盘扶乩。段正元鼓吹扶乩乃是“圣为天口，代天宣化，飞鸾降乩，道之所有”。并借此宣扬“三期末劫”等邪说。

---

① 段正元：《周一》第1册，第29页，转自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2页。

② 段正元：《周一》第1册，第1—13页，转自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道德学社作为民国初年成立的会道门，其主要活动也同当时其他会道门大同小异。

首先是扶乩。

道德学社扶乩的场所称为“殿堂”，殿内悬挂段正元本人的画像，每逢农历初一、十一、二十一以及八月二十七日和孔子诞辰，信徒们皆要聚集在殿堂内，举行扶乩活动。开盘时，先由女信徒念诵咒语，然后举行六拜十八叩的大礼，再由学长或分社负责人讲解“三期末劫”等邪说，最后由乩手用桃枝在沙盘里写乩语。

其次宣扬劫难来临等邪说。

该教宣扬不久将要天翻地覆，世界大乱，届时将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如果加入该道，便可以躲避劫难，并且可以长生不老。借此诱人入教。

最后敛钱渔色。

该道规定了13种礼仪，成员参加礼仪必须交费，并借举办义学、印刷经书以及救灾等名目，向信徒大肆敛钱。又以开办女校为名，招收年轻的女信徒入学。入学后则要立誓“甘愿舍身救世，终身不嫁”，而道首则以所谓调和阴阳为借口，奸淫这些女学员。段正元本人就在北京总社内设有密室，专门用来奸淫女信徒。

1939年段正元死后，该社分裂为两派：段正元的弟子雷保康带领一部分道徒另立“道德学会”；道德学社即由陈尧初掌管。因此，各有一套基层组织系统。

道德学社的组织结构：领导机构是理事会和监事会。陈尧初为理事长，执掌各地的道务活动。下设秘书室、总务部、教务部等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各省设省社，县设县社或分社，均由正副社长领导。村镇设讲学所，由正副所长领导。总会设大学长一人，执掌全会会务。总会下设分会，分会设学长一人，社师一人，总承管三人，总领省内社务。分会另设有庶务礼、交际礼、文牍礼、会计礼、编辑礼等，作为办事机构。在学长领导下处理日常会务。[①]

社内有严格的等级制。社众分为：太牧、中牧、少牧、社员四级。总社社长称“太牧”，省社社长称“中牧”，县社、分社社长及讲学所所长均为“少牧”。社员也分为四级：首元、礼仪、威仪、徒众。

---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2. 万国道德会

万国道德会又称“孔教道德会”，是民国初年一些清朝遗老、封建余孽和官僚政客、地主豪绅等，为了反对当时的共和制及新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旧道德、旧文化而建立的新型会道门之一。

万国道德会正式成立于1921年，发起人为山东历城县人江寿峰即江钟秀。他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贡生，自称自16岁起即潜心研究“圣学”，以弘扬孔子之道为己任，论述道学，著有《尊孔大义》10卷、《道教正义》4卷、《庶人礼略》1卷、《孔孟图歌》2卷。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下令停止尊孔读经，江寿峰将所著《尊孔大义》择其纲要，名为《尊孔》寄给当时的大总统、副总统、教育部及各有关机关。又在山东省议会中提出继续尊孔读经请愿书，遭否决后，又上书中央临时教育会及参议院，要求维护孔教。“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江寿峰又提出“道德无新旧之别”的谬论，以对抗新文化运动对旧思想、旧道德的批判。1918年，江寿峰、江希张父子在山东泰安县召开“万国道德会”的成立大会，推选衍圣公孔德成(孔子后裔)为会长，康有为等为副会长，江寿峰本人任监理，以维护孔教为宗旨。江寿峰的儿子江希张，字慕渠，1907年生，1913年随其父江寿峰到山东曲阜参加孔教大会，自称9岁时著有《四书白话解说》，1916年，又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撰写《息战论》及《大千图说》，曾被誉为“神童”。

1919年，山东省政府以江氏父子非法集会结社，将万国道德会筹备处取缔，后经山东省督军田中玉出面保护，又恢复活动。1920年，山东省警察厅准予万国道德会筹备处立案，同年，该会在山东泰安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达万余人。推举当时仅有12岁的衍圣公孔德成为会长，康有为、田步蟾为副会长，江寿峰为监理。总会设在济南，各地亦设有分会。“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分会成为日寇的御用工具。

该会标榜“世界大同”，在该会编写的《会员问答》中写道：“万国是全世界的代名词，是将道德普行于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以达成世界大同，故名曰万国道德会。”并且提出：“由合流东西文化入手，为永息世界战杀，以同化一切主义，合融宗教，使归于仁爱信义和平为极轨，为牟全人类之幸福。”[①]实际上，该会是为了与民国初年以来，特别是为了同当时正在兴起的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

---

① 《万国道德会概况》，藏辽宁档案馆。

封建思想、封建道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抗。在该会的《会员问答》中明确提到:“当民初一批过激分子,主张根本推翻固有道德以图富强,竟将中国贫弱原归罪孔子,遂倡废孔废经。而万国道德会即以此为对象,凭中华民族不死之魂,以恢复五千年将丧之文化,此即为本会之背影。”①这些内容清楚说明该会成立的宗旨,就是为了与民初以来的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相对抗,以阻碍中国历史的前进。

万国道德会的组织结构比较简单,1921 年成立总会时,设有正副会长、监理。总会内设有七院,即总院、孔教院、道教院、回教院、科哲学院等。总院领导其他六院。1928 年改为理事制,总会设立董事、理事、干事三大部,董事由会众推选,会长由董事会聘任,理事及干事由会长聘任。

万国道德会推崇孔子及其四大弟子,并将佛、道、耶、回四教的教义精神,融合于儒教之中,声称要将该教推行到全世界。

三、孔孟道

1910 年由四川省威远县刘从云所创立。刘从云又名北河,化名刘仲伯、金汉尊、金克成,自称“白鹤道人”。刘从云自幼读四书、五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幻想登极称帝。1907 年,他在威远县参加三师道,并与道师刘玉华、刘元发、梁玉光、梁玉光、梁泽光、邹佐廷、邱发三、蓝正衡、陈春延九人结拜兄弟,他被推为兄长。他妄称自己是“白鹤仙翁下界”,使命是“代天宣化,传经度人”。到 1915 年为止,刘从云已在四川威远、富顺、荣具、内江、自贡等地发展道徒 3000 余人。1916 年,刘从云召集 9 名道首开会,声称他已“修成正道”,能知万事因果,预察天运定律和未来祸福。决定仿照孔子收徒三千、七十二贤人的圣教,更名为“孔孟道”。设立明道静馆作为孔孟道的总堂,效仿清朝五府六部,建立六个通部,作为分支。②

刘从云为了实现登基称帝的梦想,除了指派六部的道首在四川南部各县发展道徒外,还亲自到成都、重庆、武汉等城市传道。他先在成、渝两地发展川军刘湘属下的一批中级军官,再利用这些人向刘湘吹嘘他的法术魔力,并在川军

① 《万国道德会概况》,藏辽宁档案馆。

② 贺善铎:《近代四川会道门研究》。

中发展组织。1925年，他又在刘佛澄的引见下，拜见了军阀刘湘，两人互相勾结利用，各怀鬼胎，妄图借神威保佑，用武力统一四川，进而夺取江山，建立刘氏王朝。为此，他在川军中大肆发展道徒，并从中选拔骨干3684人，进行训练。

1928年，四川军阀杨森联合罗泽洲等地方势力，攻打刘湘，刘佛澄建议派人到武汉请刘从云来到重庆，帮助刘湘指挥作战。刘从云为了抬高身价，推辞不就。但写信给刘湘，提出作战方案，刘湘依计而行。果然于同年10月打败了杨森、罗泽洲等地方军阀的联合进攻，使刘湘占据了川东北29个县的地盘，从此，刘从云被认为"料事如神"，刘湘派人把他从武汉请到重庆，封他为军师。还用4万银元在重庆江家巷购置"神仙府"，每月赠送300元银元供刘从云享用。随后，刘从云在涂山真武寺庙举办酬天大会，以显示其神威。不仅各地道首前来烧香拜神，而且还指示文武官员整队参加敬神拜师的活动。刘从云见拜师求神者甚众，又召开"收缘法会"，他以神仙自居，登坛降谕。通过这次法会，入道者多达千人。刘湘则利用孔孟道，增进内部的团结，并且同其他军阀联手。他从威远县请来乩手、体生（神童），设坛降谕，为潘文华、王缵绪、唐式遵、王陵基等高级将领，举行调丹封号仪式，建立了孔孟道的事园馆，由刘湘、潘文华、唐式遵任正副馆长。1930年，为了促成刘湘与邓锡侯的合作，共同对付刘文辉，刘从云经余安民介绍，将邓锡侯拉入孔孟道，封号"玉齐"。1939年，孔孟道又发展杨森等人入道，及立静候馆，刘文辉任馆长。

刘从云以孔孟道道主的身份，活跃于各军阀之间，主要是充当刘湘的军师，妄图实现以道治军，统一天下的梦想。为此，他调集骨干道徒在重庆举办百子训练班，用道费购买3000支步枪和400支手枪，组建二十一军模范师。该师师长名义上由刘湘兼任，实际上是刘从云以代理师长的身份直接指挥，所属第一、第二及第三旅旅长及各旅、营团级干部，都是孔孟道的骨干。①

刘从云灌输刘湘"圣贤治国"之道和做功入神之玄妙，而刘湘则欲求神保佑其称帝，两人选拔出3000名骨干道徒，建立核心团体；又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形成川军主体，操纵四川局势；对杨森、刘存厚、刘文辉等地方军阀，则争取他们归属或中立。必要时又联络云南的龙云、贵州的王家烈，把西南几省连成一片。一旦时机成熟，即可挥师东下、北上，问鼎中原，建立大业。

---

① 周元德：《记刘湘的神仙军师刘从云》，《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34 年,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令其指挥川军各部堵截、围剿入川红军。当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时,刘湘任命刘从云为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利用孔孟道师徒关系,指挥邓锡侯等地方军阀,与红军作战。刘从云抵达南充县,首先设坛降乩,传谕旨意,然后率领 5 万军马,测算吉日良辰和每日行军路线,向通江、南江、巴中进发,致使许多部队陷入山谷或面向绝壁,被红军逐个击溃,引起各军的抱怨,刘湘为了平息众怒,密令刘从云逃往武汉躲避。

刘从云离开四川后,孔孟道继续在四川的威远、荣县、富顺、内江、泸县及自贡一带活动。1937 年,刘从云回到四川,在成都建立玉卢圣学院,自任院长,讲授儒学和巫术,训练各地道首和骨干,使该道在民间继续发展。

1949 年以前,孔孟道共有道馆 28 个,道堂 288 处,道徒 33500 人,在川南地区形成很大势力,解放后,孔孟道被人民政府明令取缔。[①]

四、红卍字会

1916 年创始于山东滨县(今宾州市),原称"道院",创始人吴福森,字幼琴,江苏武进县人,创教时任滨县县长。另一创始人刘绍基,字绵孙,道名福永,安徽凤阳人,创教时任滨县驻军营长。每月朔望二人在滨县县署设坛扶乩,以大仙降坛惑众,敛取钱财,前往求拜者颇众,最初有信奉者 12 人。1917 年秋,刘绍基奉调济南后复在寓所设坛,纠集当地的军政、商界及旧时好友,每月开坛三次。刘绍基与郭兆栋学习当地同善社的坐功运气方法,道务逐渐兴盛。并开始撰写《太乙北极真经》,作为传道的经卷。1920 年由道内核心分子 48 人发起,在济南上新街成立道院,由杜秉寅任掌籍(院长),张济康等任副掌籍,刘绍基为院监,并把美籍基督教传教士李佳白拉入道院。从 1923 年起,先后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 40 多处道院,到 1939 年已经发展到 400 多所。1925 年杜秉寅病故,由天津道院的徐世光(徐世昌胞弟)继任掌籍。

1923 年日本东京大地震,道院派遣代表侯延爽(道号素爽)、王揖唐等人,携带现金 2 万元,大米 2000 石赴日本救灾。其间在神户拜访了日本大本教教主王人三郎,发现双方观点一致,道院的祖师就是大本教的祖师,两者崇奉的神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5—17 页。

祇也一致,修养方法也都是以爱和信为目标。于是,在侯延爽返回时,大本教派出代表北村隆光随同来到中国,会见了道院的上层领导,达成了道院在日本设立组织的协议。1924年道院以"万道归一"为口号,在日本布道。1929年9月,道院在日本神户、大阪建立分院,同年10月又在东京建立总院。道院同日本大本教建立了密切关系。

1928年国民政府发出禁止邪教的禁令,禁止道院活动,但道院仍在各地打着"红卍字会"的旗号继续活动。"红卍字会"是1921年由道院领导人钱能训、徐世光等在北京发起建立,1922年以慈善机构的名义向内务部申请立案,获得批准,名称为"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道院的主要成员为社会上层,各地分院多为县级以上旧军政人员所把持。由于北洋军阀的垮台,大批政客、解甲军人纷纷加入其中,还吸收了一批有名的军阀官僚,成为"特方潜修弟子",赐予道号,如张作霖道号"敬修",吴佩孚道号"智玄",山东督军兼省长田中玉道号"华善",湖北督军萧耀南道号"皓能",浙江督军卢永祥道号"道灵"。北京督军熊希龄任"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长,曾任国务总理的江朝宗任北京总院的责任统掌。①

① 陆仲伟:《中国秘密社会》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7—124页。

第十三章　会道门在海外

一、一贯道

1. 一贯道在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

20世纪60年代初，一贯道被台湾当局强行解散后，一贯道道首们便想到国外去求发展。从1968年起，开始了向东南亚的传道工作，当时的主要目标是印度尼西亚，因为那里的华人、华侨较集中。一贯道道首吕树根曾多次前往印度尼西亚，不过，效果并不大。一贯道为了在印度尼西亚取得合法地位，遂称为"老母教"、"白阳教"，于20世纪70年代初再次从台湾传入，并在那里建立了"道务训练中心"，负责人是华裔印度尼西亚人吴静妙，据称拥有道徒10万人。一贯道在印度尼西亚的传布如下：

文化道场。1984年在山口洋设堂，建有大型公共佛堂，并向泗水蔓延。

兴毅道场。1987年在泗水设堂，接着在雅加达、东爪哇的巴东等地建立佛堂。

发一灵隐道场。1987年在泗水设立宏慈堂，同年在雅加达等地也建立佛堂。

基础忠恕道场。1988年在雅加达设堂，其后又设立了30所家庭佛堂。

宝光崇正道场。1988年在雅加达建立和善堂，1995年扩大为和善佛院，先后建有400多座。

发一天恩道场。1989年在泗水建立弘毅堂，后来陆续建立了50所佛堂。

发一崇德道场。1989年在雅加达建立晋德堂，后来陆续建立了36所公共佛堂和90座家庭佛堂。

发一天元道场。1980年在雅加达建堂，先后建有28座佛堂。

宝光明本道场。1991年在泗水建立明仁堂，后陆续建立36所家庭佛堂。

基础天基道场。1991年在雅加达建立陈氏堂，1993年建立公共佛堂宏仁堂。

常州道场。1991年在泗水成立天印堂，后扩展为三座佛堂。

发一德化道场。1991年在雅加达建立佛堂,后在坤甸、加里曼丹、爪哇、峇里岛等地建立佛堂。

发一慈法广济道场。1991年在雅加达建立法德堂,其后又在泗水等地建立佛堂。

宝光建德道场。1992年在泗水建立天平堂,后在万隆等地建立佛堂多处。

浩然育德道场。1993年在雅加达建立钟氏佛堂,后在泗水建立佛堂。

发一同义道场。1994年在三宝垄建立博化堂。

宝光元德道场。1994年在雅加达建堂,后成立妙光佛院及明光佛院。

发一光耀道场。1997年在雅加达建立天一堂。[①]

新加坡的一贯道也是从台湾传入的。1961年吕文德从马来亚来到新加坡开荒,设立归慈堂。1971年,台湾桃园县一个名叫"阿粉姨"的一贯道坛主,要求前人吕树根在去印度尼西亚的途中,到新加坡的珍珠街引渡一位蔡姓阿姑入道。这位蔡姓阿姑原来在戏班子里唱小生,退休后休闲在家,曾告诉台湾的阿粉姨说,她希望加入一贯道。吕树根在新加坡找到蔡姓阿姑后,蔡姓阿姑即表达了要求入道的愿望。吕树根认为此乃一次难得的机缘,可以利用她在新加坡开出一片道场。所以,并不立即答应她的要求,点她入道,而是向她提出,必须再渡十个人以上,才能为她点道。遂给她留下了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联络地址而离去。一周后,蔡便写信给吕,称她已找到30人,皆已经斋戒3天,专等吕前来点道。吕闻讯立即赶回新加坡,在当地"圣教会"信徒黄添福家中,为蔡等点道。"圣教会"便是同善社,与一贯道都是由青莲教演化而来。吕树根便将黄添福一家也拉入一贯道内。吕树根又把随同他前来新加坡的点传师邱耀德留下来,在新加坡开展道务。1972年,台湾的一贯道宝光建德支线又集资在新加坡设立"天然化工公司",作为开展道务的据点。建立该公司的宗旨是"照顾海外传道者的生活,同时筹措财源积极传道"。所以,公司的人员分成两组,一组做生意,为办道筹措资金;一组管"圣事",专门办道。该公司专门经营薄荷和香料,因经营不善,从台湾带去的资金几乎全部赔光,公司陷于困境,难以维持。同年底,又从台湾调来资金,买了一栋房子,把它改建成"天国佛堂"。有了佛堂后,开销更大,公司仍无起色,甚至到了无法运营的地步。1980年,因国际上薄

① 慕禹:《一贯道概要》,台湾飙巨书局,第184—191页。

荷价格暴涨三倍，使该公司大为赚钱，把原来赔掉的钱，也全部赚了回来，并把“天然化工公司”，改名“天银化工公司”，几年间获得数十倍的利润，皆投入一贯道的道务。1982 年，重建了“天国佛堂”，1994 年又新建立了“天慧佛堂”，发展到 5 万名道徒，有 2000 个“家庭佛堂”。其中的“公共佛堂”规模宏大，设备先进，内部装修也十分华丽，大堂中还有闭路电视，有可容纳 1200 人听讲的讲堂。建设这些规模宏大的佛堂，当然需要巨资。一贯道便向当地银行贷款，“天慧”、“天国”两间佛堂每月即需向银行付利息 50 万元新币，这笔款项自然“要由道亲们来负担”的。①

新加坡共有以下一贯道的到场：

兴毅道场、宝光建德道场、正义道场、发一崇德道场、发一灵隐道场、浩然育德道场、发一天元道场、宝光绍兴道场、发一慈法广济道场、发一天恩道场、基础忠恕道场、文化道院等佛堂。②

2. 一贯道在马来西亚

1948 年上海宝光坛的吕文德首先在该国巴生港开荒，设元光坛，后以“儒释道道德会”的名义开展道务。1973 年，台湾的宝光建德支线从新加坡传入马来西亚。先在柔佛州巴株成立“陈氏佛堂”，1976 年，又在马六甲成立“翁氏佛堂”，然后又到吉隆坡成立“陈氏佛堂”。最初由吕树根总负责，吕于 1982 年故后，由邱耀德接任。到 1995 年，已建成 500 座家庭佛堂，和六座规模宏大的公共佛堂。这些佛堂分别是：芭都巴的“天关佛堂”（1976 年建），吉隆坡的“天上佛堂”（1985 年建），芙蓉的“天宫佛堂”（1991 年建），马六甲的“天理佛堂”（1995 年落成），麻坡的“天宣佛堂”（1995 年落成），槟城的“天威佛堂”（预定 1996 年完工）。另外，还在柔佛州首府的新山买到土地，准备修建可以容纳 5000 人的大佛堂，预定 1997 年完工。所传道徒不仅有华人，而且还有当地的印度族人。为了吸引当地的印度族人入道，不仅免收他们的“功德费”，还可免费乘车游览，并得到一顿丰盛的午餐。所以，1995 年麻坡的天宣佛堂举行落成典礼时，前来求道的人中，印度人占 1/3。说明，当地穷苦的印度族人加入一贯道，主要是为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或出于好奇。

① 宋光宇：《天道传灯》（下），台湾三扬印刷企业有限公司，第 442—448 页。

② 慕禹：《一贯道概要》，台南飙巨书局，第 153—155 页。

3. 一贯道在柬埔寨

一贯道的宝光建德支线,利用柬埔寨经济上的困难,乘虚而入。柬埔寨由于连年战争,经济上十分困苦。1995年9月,一贯道以慈善救济为名,向柬埔寨教育部长捐赠60吨大米、一所小学、十台抽水机、一部计算机和许多药物,借以进入该国传道。柬埔寨宗教部长说:"将来一贯道在高棉传教活动,将可受到保护。"不久,一贯道便在柬埔寨取得合法地位,成立了"一贯道柬埔寨王国总会",建立了10座佛堂,一万多人入道。许多柬埔寨人入道,也仅仅是为了吃上一顿大米饭。据宝光建德的一名坛主说,他的一部仅能载7人的旅行车,曾经一次装载了49名高棉人前去点道。"对这些高棉人来说,基本生活的温饱,要比先圣先贤的道理重要的多"。"更重要的是能借着点道的机会,吃上一顿大米饭"。①

4. 一贯道在缅甸

一贯道最早是1947年传入缅甸的。当年,张光璧住在成都,他让昆明的道首田九河派李世英等以经商为掩护,前往缅甸开荒办道。但是,收效不大。一贯道大量传入缅甸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国境内正在大规模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运动,大量一贯道的道首、道徒越过云南边境,逃往缅甸,在那里开始办道。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在缅甸境内的一贯道徒,约有10万人左右。

1950年,云南省龙陵县河头区的一贯道金线派禅德坛点传师刘秉洪、正义派道基坛点传师张荣安、杨世超等一批一贯道的道首、骨干、道徒,一行30多人,为了逃避打击,逃到缅甸,在缅甸东北部中缅边境地区的木姐、南坎、黑猛龙、猛古、棒线、贵概、大猛尼、腊戌、抹谷等地安顿下来。为了求得生存,他们暂时放下了派系间的分歧,纠集了一批逃亡的一贯道分子,在南坎附近的弄登寨建立起"精灵总坛"和"仁和坛";在贵概建立了"贵概五戒佛坛",并且以此为基地,派出点传师到南坎山、贵概山、猛博山、黑猛龙、大猛尼、棒线等地,开办训练班,培养点传师、三才和坛主。1957年,刘秉洪在南坎建立的"精灵总坛"不断派遣骨干、道首潜入云南省龙陵、潞西、梁河、保山等县,进行策反和串联活动。他们在龙陵、潞西、梁河三县交界的背阴山,建立由5个情报传递站联线的交通线,专门从事策反和情报活动,还成立了"武装护道卫教"的武装组织。在境外道首的指挥下,云南省龙陵县石洞乡的一贯道也建立了由50人组成的"护道工

① 宋光宇:《天道传灯》(下),台湾三扬印刷企业有限公司,第458—459页。

作队”，在盈江县莫孔乡的一贯道，还配备有手枪、步枪和机关枪等武器。这些一贯道武装与周围的国民党残余武装，沆瀣一气，策划武装暴动，杀害我基层干部。1952年一贯道“师母”孙素贞从香港窜到缅甸南坎与刘秉洪策划进一步对内地进行渗透，她对刘秉洪在缅甸的活动，大加赞赏。在境外一贯道道首的指挥下，云南省一些已经被取缔的一贯道组织，又重新开始活动。1953年10月，刘秉洪一次就派遣了30名点传师，潜入云南省龙陵、潞西、盈江等县，与当地一贯道相配合，进行传道活动。1957年，在云南省的潞西、梁河、龙陵、盈江、腾冲五个县，就发展点传师以上的道首84人，大小坛主839人，道徒8096人。20世纪60年代初，金线派禅德坛头目刘秉洪与正义派道基坛头目张荣安、杨世超又因派系的不同而分裂。刘秉洪在腊戌建立了“龙华宫”大坛堂，把活动基地从南坎转移到腊戌，又在此建立了“兰兰佛坛”，作为一贯道在缅甸的总坛，并以此为基地，向缅甸的当阳、昔博、胶脉、眉眉、东枝、景栋、曼德勒、密支那，以及莱莫山、莱吉山等缅甸腹部地区流窜。先后在这些地方建立了仁、义、礼、智、信五个分号(佛坛)，以及“皇极宫佛坛”等各种坛堂多处。并且在小村、小镇派驻点传师。20世纪70年代初，刘秉洪被流窜在当地的国民党军队残部绑架后，遂将活动基地由腊戌转移到曼德勒，在该地修建了一座大坛堂。1980年又在眉眉庙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天然宫”，作为道徒朝拜的“圣地”。此后，一贯道又向缅甸纵深方向发展，在首都仰光建立了“纯一佛坛”。1982年刘秉洪通过缅甸内政部长波尼的关系，在仰光购买到一块地皮，建造起一座规模宏大的总坛堂，将活动中心又转移到了仰光，并且向泰国延伸。

正义派道基坛的张荣安、杨世超于20世纪60年代与刘秉洪分裂后，在缅甸贵概建立了一座“贵概五戒佛坛”，使贵概成为道基坛的活动中心，并进而向仰光、大猛尼、瓦城、胶脉、帕坎、猛洪等地发展，先后在这些地方建立了“猛尼佛坛”、“帕坎佛坛”等坛堂，使一贯道的势力已经遍及缅甸北部。

一贯道在缅甸除了发展道务外，还建立了许多学校，专门培养一贯道骨干。20世纪50年代末，刘秉洪在黑猛龙建立了第一所为一贯道培养办道人员的学校。60年代初，又将该校迁到腊戌，改为“五戒佛堂学校”。该校除了讲授一贯道的经书外，还教中文、数学、中国历史，后来又增设缅语、英语、日语等课程。70年代，一贯道在缅甸的活动基地转移到曼德勒后，刘秉洪又在该地创办了一所“五戒佛经学校”，该校规定全体师生必须一律参加一贯道，并接受一贯道道

规的约束。一贯道的道基坛也在贵概设立了一所“从华学校”，由“前人”张荣安任校长。还以“五戒佛经学校”名义，在瓦城、东枝、腊戍、猛埂、抹谷开设了五所中学，每校皆拥有上千名学生。此外，禅德坛还与道基坛在贵概、瓦城、仰光等地创办有刊物，设立经书出版处，出版一贯道的书刊，各个坛堂里还有专人负责抄写道书。

一贯道在缅甸的坛堂和组织情况：

一贯道在缅甸仍然分为金线派与正义派。其中，金线派共有七大坛堂。其中最大的是“禅德总坛”，设在仰光，是一贯道在缅甸的总部，由刘秉洪直接控制。全坛有前人30名，点传师200多名。下设仁、义、礼、智、信五个分号，建有腊戍的龙华宫，眉眉的天然宫，瓦城的无极宫，仰光的文化宫，邦海的和义宫，东枝的慈善宫，密支那的大同宫，昔卜的浩然宫，瓦城的药王宫，当阳的善化宫，还有木姐、南坎、叫脉、格沙南等地的六个佛堂。刘秉洪又名刘秉宏，汉族，1919年生，云南省龙陵县龙山镇人，1946年入道，曾两次参加一贯道的训练班，一直在龙陵县从事道务活动。1950年带领30余名道徒逃到缅甸，与从陕西西安逃到缅甸的一贯道点传师姬文德建立联系，建立了“精灵总坛”。1972—1973年，缅甸的一贯道七大前人在仰光禅德坛聚会，推举刘秉洪为缅甸一贯道的总前人。

正义派的总坛“道基坛”最初设在贵概，后来迁到毛淡棉，其余坛堂分布在仰光、勃登、叫脉等地。道基坛的主持前人先是张荣安，四川人，1950年逃到缅甸。最初，他与金线派的刘秉洪合作，在缅甸的南坎等地合办道务。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一贯道势力的发展，两派又发生矛盾，以致分裂。分裂后的正义派由张文炳主持，他曾多次与金线派的刘秉洪磋商，准备把道基坛改为金线派的一个佛堂，请刘委派新的主持人。但是，刘始终未答应。

一贯道在缅甸还拥有道产业100余处，遍及缅甸各大中城市，包括面粉厂、饵丝厂、小型针纺厂、织布厂、造纸厂、毛巾厂、印刷厂、糕点厂，以及旅馆、商店、诊所、药店、茶场、农场等。还在泰国的米赛、清迈府等地设有商店，从而为一贯道在缅甸的生存和发展，打下了经济基础。缅甸和泰国都是佛教国家，国内的佛教徒甚多，两国的素食食品，几乎都是一贯道的道办产业所生产出来的。一贯道的道办产业、商业，几乎控制着缅甸农村的经济命脉。如一贯道在东枝的一个较大农场，生产谷物、奶酪、水果等，它生产的花生，“可供全缅所有佛堂食用有余”。在仰光、东枝、眉庙等处所办诊疗所，每家拥有10—30个床位。所设

的演出队拥有 70 多人，每逢道内庆典，或接待外国来的道首或缅甸政府官员时，便为他们进行专场演出。同时也经常应邀到一些华人聚居区进行营业性演出。为了扩大宣传效果和盈利，东枝的“慈善宫”、瓦城的“无极宫”、眉庙的“天然宫”，皆建设得十分豪华，借对外国游人开放，赚取外汇。

一贯道在缅甸为了适应当地的情况，不得不进行了一些“改革”。1986 年 10 月，缅甸一贯道首刘秉洪邀请新加坡一贯道前人王高山、马来西亚一贯道坛主陈淑敏、印度尼西亚一贯道训练中心负责人吴静妙等，在缅甸举行了一次“道务改革研讨会”，提出“不强求入道者戒荤食素”，可以“进坛戒口，出坛随俗”；“不提倡人人舍身办道（即永不婚配——引者），实行婚配自由”；“反对道长专制，实行民主管理”。

缅甸政府对一贯道的政策。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基本上采取既不干预，也不承认的默许态度。70 年代以来，刘秉洪多次指使各支派、各分号道首，在大力发展华人、华侨入道的同时，特别注意发展缅甸当地人和缅甸政府官员入道。刘秉洪利用缅甸政府官员经常到仰光禅德堂参拜的机会，率先同原奈温将军的同窗、奈温执政后任宗教部长的吴拉孟拉上关系。当时，吴拉孟已经 60 多岁，尚无子嗣，刘秉洪为了投其所好，向他许愿说：“入道后自有子嗣。”吴拉孟信以为真便入了道，随后，缅甸政府的官员，也有不少加入了一贯道。并且于 1975 年正式承认一贯道为缅甸“五戒佛院”，一贯道在缅甸各地开办的学校，也被承认为“五戒佛经学校”。在吴拉孟夫妇入道后，刘秉洪又指使自己的表侄女、专门为一贯道负责外事工作的范体会，认吴拉孟为“干爹”，博得吴拉孟夫妇的欢心，从而巩固了一贯道在缅甸的地位。使一贯道在坛堂建造时使用钢材、水泥，以及道徒乘坐飞机、轮船，道徒食用植物油等方面，可以享受官价优惠，低于市价 3—5 倍。

在缅甸的一贯道，同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一贯道，保持着密切联系。每当缅甸一贯道举行“大典”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一贯道道首，都要前来互通道务，轮番讲经。新加坡的前人王高山、林旭和印度尼西亚的一贯道训练中心负责人吴静妙等曾经两次到缅甸讲经。刘秉洪还设法与日本驻缅甸大使馆建立了联系，每隔两三个月，便派道徒思秉章到仰光的日本大使馆去一次，日本大使馆每年也给在缅甸的一贯道以经济上的资助。缅甸一贯道在对待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关系方面，表示“中立”。刘秉洪

表面上标榜“在目前国共两党交锋期间,本道严守中立,不可介人”。“既不愿得罪共产党,也不愿得罪国民党”。但是,实际上刘秉洪与国民党设在中缅边境缅甸一侧的“情报局滇边站”,是有勾结的。该站特务在遭到缅甸政府追捕时,便可逃到一贯道的“龙华宫”去躲藏。

5. 一贯道在泰国

泰国的一贯道是由台湾一贯道金线派的发一组与正义派的正义组分别传入的。后来,缅甸一贯道的刘秉洪也把触角伸向泰国,1985 年在泰国的米赛、清迈、米岩设立了三个坛。1986 年,刘秉洪又派坛主段惠召(女)以行医为名,进入泰国,将原来在泰国的三个坛,合并为一个大坛,然后在清迈府购买地皮,准备建立总坛。1987 年初,刘秉洪又派遣 5 名骨干,到泰国帮助段惠召组织建坛和发展道务。

此外,一贯道在亚洲的菲律宾,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南美洲的巴西,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甚至非洲的莱索托华人中,皆有所传播。

6. 一贯道在韩国

一贯道在韩国有两大支派,一支是“国际道德协会——一贯道”,另一支称“大韩道德会”。

“国际道德协会——一贯道”

一贯道是在 1947 年开始进入韩国的。是年,天津道德坛派遣金恩善(韩国人)偕一贯道点传师金福堂前往汉城开荒传道。金福堂(1885—1991)是河北省武邑县人,自幼在农村读书,及长,来到天津市红桥区,靠开麻袋庄为生,1939 年加入一贯道,后来被提拔为点传师。1947 年,二人由天津乘船前往朝鲜的仁川,然后又到汉城。1950 年金恩善回天津失踪,由金福堂接任。金福堂在韩国的传道活动并不顺利,不仅他领导的这一支一贯道在韩国发生分裂,而且他本人曾经几次被韩国当局拘留或扣押,甚至躲进山中,在山洞里进行传道活动。韩国当局为了弄清一贯道的活动情况,还派人打入道内,卧底 20 年之久。后来,金福堂加入了韩国国籍,并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加上有一些政府官员及个别军队的将军要求入道,在得到他们的帮助后,一贯道终于在 1952 年 9 月 1 日在韩国取得合法地位,改称“国际道德协会——一贯道”,金福堂遂成为韩国“国际道德协会——一贯道”的创始人,称为“前人”或“总裁”。后来,韩国的一贯道同当局关系日益密切,金福堂还担任了汉城警察局的行政顾问委员。如今韩国

“国际道德协会——一贯道”自称拥有120多个分支，100多万名道徒，其中多为韩国人，也有为数不多的华人。其总部设在汉城市永登浦区黑石洞173蕃地81号的“仁本钵法坛”内。由经常在总部活动的20多人负责管辖各地一贯道道务。道内分别设有“政务院”、“理事长”、“支部长”、“秘书”、“会计”、“翻译”等事务性职务，道内职务则称“道长”、“前人”、“点传师”、“坛主”等。不过，韩国一贯道道内的最高职务是“前人”，他们认为“道长”应该是在台湾地区。现任院长是李更衽，是个老点传师，负责总部事务。理事长是吴正顺（女），负责对外联络事宜。“国际道德协会”在韩国各大城市皆设有支部，每个支部管辖若干坛堂，支部则设在较大的坛堂内。韩国共有坛堂120个，除总坛“仁德法坛”外，还有以下坛堂：普光、天德、南山、醒世、马山、济金、扶余、光州等法坛。“协会”还办有《道德报》（周刊）及演出队，专司宣传工作。各坛堂还设有男女驻宰各一人，均系点传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金福堂病重不理道务，内部发生分裂。一派由现任“前人”申福均为首，他自幼跟随金福堂入道，一直是金福堂的追随者，资格较老；另一派以理事长吴正顺（女）为首，吴在朴正熙时代，曾任全国妇女代表，在韩国社会上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朴正熙下台后她才加入一贯道，不久，便成了一贯道的理事长。还有一派以斧山支部的姜泰模、梁斗礼夫妇为首。梁斗礼本来是所谓“舍身”道徒，是要终身不婚的。后来与大皮货商姜泰模相识，并结为夫妇，遂把姜泰模拉入道内。姜泰模财大气粗，为道内捐献了大量“功德费”，很快就被提拔为点传师，并担任了斧山一贯道支部的支部长，在韩国一贯道内，势力较大。还有一派，是以山东籍的杜树人为首，杜曾经担任过韩国总统朴正熙的警卫，入道后任金福堂的朝鲜文翻译，后因贪污失宠，当上了支部长。他持有台湾“护照”，曾以台胞身份回大陆探亲，先后到过哈尔滨和山东的青岛、荣城等地。1991年3月12日，金福堂在汉城一贯道扶余总部病故。他在天津原籍尚有子女5人，病故前其子曾前往汉城探望。

“国际道德协会——一贯道”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的一贯道关系密切，曾多次组织道徒到台湾一贯道去“受训”，提出“开荒、渡人为最大功德”、“凡有人群的地方，都要去开荒办道”的口号。并把到中国大陆开荒作为主要目标。

“大韩道德会”

大韩道德会是一贯道在韩国的另一支派，其规模小于“国际道德协会——一贯道”。

大韩道德会是由天津一贯道的道德坛、文化坛传入韩国的，初期到韩国传道的有李德福、李振芳父女及高云程、张瑞荃、王义臣、赵永泰等人，其总部设在汉城附近的赡养市名人坛内，下辖数十个坛堂，拥有信徒十余万，除分布在韩国各地外，还发展到东南亚及日本、美国等国。

李德福，1885 年生，天津尼沽村人，1936 年加入一贯道，后来把全家七口人都带入了一贯道。他以办道积极，很快被提拔为点传师，1943 年受金线派道首王义的派遣，到朝鲜办道，在新义州的富兴杂货铺内设立道坛，讲经传道。不久被侵朝日军驱逐回天津，1946 年再次从天津前往朝鲜办道。这次他带领女儿李振芳、徒弟施龙涛、张连同行。他们先在中国边境城市安东（今丹东市），伺机越境。1948 年安东市解放，并且开始取缔会道门，报上点了李德福的名字，他见事不妙，便带领女儿、徒弟一同逃往韩国，投奔在汉城开饭馆的弟弟李德森处，同时开始办道。旋因人手不够，便写信给在国内的王义，要求增派办道人员。王义遂又派赵永春、王义臣、刘金弟三人，于 1950 年到达汉城，协助李德福办道。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期间，使一贯道在韩国未能得到发展。后来，李德福、赵永春相继病故。

1971 年，李振芳又纠集了曾于 1948 年到韩国办道的张瑞荃、高云程等人策划办道，并网罗韩国各地的一贯道徒。为了在韩国取得合法地位，该道曾使用过“孔孟圣道”、“佛教一贯宗”等名目。在韩国取得合法地位后，称为“大韩道德会”，得到韩国政府的庇护和支持。为了对韩国政府表达感激之情，“大韩道德会”在 1988 年汉城举办奥运会时，由李振芳以个人的名义，捐款 40 万美元。在早期到韩国办道的张瑞荃、张连死后，便由李振芳主持道务。

大韩道德会虽然道徒大多为韩国人，但因最早到韩国传道的皆是华人，加上台湾地区一贯道势力较大，因此，大韩道德会与台湾地区的一贯道也有密切关系，其经费中有一部分便是由台湾留学生中的一贯道徒捐赠的。该会还定期派道徒到台湾一贯道总会接受训练，每期 4 个月。双方道首也经常来往，1989 年，李振芳应邀到台湾一贯道总会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访问活动。现在，李振芳已把道长王义臣的内侄女张河秀确定为继承人，张河秀原籍山东，1945 年在朝鲜出生。

7. 一贯道在日本

日本的一贯道最早是从中国大陆传入的。1948 年，天津道德坛的河北人阎俊卿经过韩国转赴日本，到福冈开荒，建立福冈的道德会馆。约在同一时间，又

有天津人王锦章在日本东京开荒，王锦章故后，由日本人大稻接掌道务。该支线建有400多坛堂。天津人张正昆也于同年由韩国前往日本东京、大阪等地传道。张氏故后，由康辛生（女）接掌道务，同年还由天津仁义坛的朱相印在大阪设立增子坛，委任日本人增子光夫为点传师。

从台湾地区直接前往日本的有：

正义辅导会。1949年由陈庚金率方英朗、周兆昌等人，由台南赴日本神户开荒，设立天道日本总坛，并向邻近地区传布，成立"日本天道总坛"作为道务中心，并于1958年向日本兵库县政府登记为合法宗教法人，全盛时期拥有佛堂300座，信徒60万人。

基础组。1966年，台湾基础忠恕道场派道徒到大阪建立圣德堂，1982年建立"先天圣道院"，1986年在东京设立天慈堂，在千叶县建立佛堂。2000年在东京建立忠恕道院。

兴毅组。1949年派孔宪周等人，在东京吉祥寺及横滨开荒，1981年建立道范堂及亲德堂。拥有2万多名道徒，分布在北海道、静冈等地。信徒以华侨与留学生为多。日本人约占三成。

常州组。1980年在东京新宿区成立天音堂。

宝光组。1962年在东京建立天关堂，后来又在长野设堂。

发一组。在1976年东京市郊南青山，后在埼玉县设立天一宫，作为总堂，由日本人高村晴世领导。有点传师10人，讲师60人，家庭佛堂90多所，道亲2万多人，九成以上为日本人。①

还有一支在日本的一贯道，是由新加坡的一贯道前人王高山和台湾一贯道道长韩雨霖（韩荣恩）于1976年传入的。他们在日本发展的第一名道徒，是日本妇女高村富士子。到1990年，高村建立大小坛堂300多处，拥有道徒2万余人，总坛设在神户。由于高村活动能力极强，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如此成果，被一贯道内视为"后起之秀"，有"能人"之称。高村之所以成功，一是她一开始就取得日本政府的承认，拥有"宗教法人"的合法地位与资格，可以公开活动；二是她拥有巨额的资产，用来吸引人们入道。她在1985年已经拥有两家银行，一家茶叶、咖啡进出口公司和若干商店。高村规定，凡是进入她所经营的银行、公

① 慕禹：《一贯道概要》，台南巍巨书局，第137—140页。

司和商店,必须首先加入一贯道,从而对日本这个就业困难的国度来说,一贯道对普通公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此外,一贯道在亚洲的菲律宾,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南美洲的巴西,皆有所传播。其中,巴西的一贯道,系40多年前由徐铭人前往开荒,总坛设"圣德佛堂"设在圣保罗市,信徒有数千人。1961年吕树根曾亲往"开道",一贯道在巴西已经登记为合法组织,公开传道。

二、真空道[①]

真空道是清代以戒除鸦片为宗旨的秘密教门,因受到清朝当局的查禁,于晚清时期流传国外,在东南亚一带华人、华侨中传布。

1. 真空道在马来亚

18世纪末到19世纪晚期,闽、粤等省穷苦人民纷纷前往马来半岛从事锡矿开采业与橡胶种植业以谋生,真空道亦随着移民来到马来半岛。最早在马来半岛传布真空道的,是黄道云。黄氏原籍福建武平黄坊乡,生于同治九年(1870),少年时因患咳嗽久病不愈,遂拜碧岽背道堂的蓝元利为师,皈依真空道。为求病愈,学道三年,乃往广东之蕉岭布道。适值当地久旱不雨,黄氏代为祈祷,偶然得雨,由是"道法大显",信者颇众,继而有徐秀葵、邓十余人进行传道活动,并在当地建立"会仙洞"道堂。光绪末年,他开始在马来亚传布真空道。[②] 1918年黄道云故后,道坛由徐道权接掌。道徒陈佛佑、黄盛发、赖复道等前往南洋英、荷两国属地布道。其中有前往英属新加坡之张四,往马六甲之徐康贤,往吉隆坡之刘侣仙等,往沙捞越之魏双娇等,往打问(帝汶)之刘水等;荷属三发(婆罗洲西北部)之温庚娘等,以及前往槟榔屿、仰光等地之黄盛发弟子黄达忠。据凌腾骏所编《空道教传》记载:黄达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入道,民国元年(1912)在江西瑞金建立天灵山。民国十五年(1926),有南洋的杨先觉等一班人到祖山求道,并要求黄达忠下山前往南洋。黄达忠先抵新加坡,倡建可然坛、如真坛、和真坛、真和坛及道南坛等。道徒陈新炮建天南坛、南洋坛。又有杨先觉协建柔佛的真和坛,吉隆坡的天缘坛,以及郑清南在马六甲三宝井建的诸坛。

在马来西亚各邦,真空道著名的道堂有以下一些:

---

① 有关真空道本身的情况,详见本书第二卷。

② 野口铁郎:《东南亚流传的两个中国人宗教》,台湾《民间宗教》第2辑,1996年。

柔佛的登义山道堂与和真堂。前者是林有谅于1927年创立。

马六甲三宝井的真空教道堂、芽惹马弄的复本原道堂、甘光于汝之一天堂及武郎格之明和坛。

雪兰莪(Seangor)吉隆坡之显真道堂,天河堂、智南坛、桂南坛、天灵坛、天恩坛、登义坛、天缘道坛、和一坛、何返本原道堂。

在霹雳(Perk)有真空道堂、真如坛、宣道坛、桂南坛、桂南道堂、及复本原总道堂等。

2. 真空道在新加坡

真空道在新加坡设立最早、规模最大者,当属章宜律之天灵总道堂。此外还有乞来踏礼士律之虚灵道堂,巴株望律之天南坛戒烟所,杨厝港之灵光道堂等。以上各堂道长,均对国内江西黄畲山总道堂之兴建,多所尽力。

新加坡各真空道道堂鉴于道务的发展,于1954年组织"真空教联合会"。1962年9月24日,在天南坛举行庆祝大会。

黄达忠于1928年依据廖帝聘的遗教,及黄畲山总道堂所颁《道规》,制定《守道及修道良箴》,其中《受到规则》有十条:

尊常规。常洗扫、参拜、坐悟、供奉、诵经;

尊主教。备服用,列香茶,随护法;

睦同侪。同声相应,联络团体,无论富贵,无分贫贱,毋言亲疏,化除意见;

别男女。另招待,各坐悟,无私谈,各参拜,异食宿;

重卫生。时静坐,常清洁,透空气,祛污秽,节劳逸,养元气,戒嗜欲,蓄精神;

戒烟瘾。真意求道,烟瘾易脱,数日之间,烟毒自消,精神爽快,肌肤肥润;

除疾厄。诚心跪拜,厥疾易痊,不用药方,疾病自除,不延数日,身体健康;

守久违,心与道合,求福有准,归正慕善,护法有灵,有志往上,修厥性天;

劝治化。伦常法制,律例禁令,国家建设,各界遵行;

守职业。求道人等,无论农工士学,每逢祖师寿期,宜集坛庆祝。由特别事故,可免逐日来坛,荒废职业。

其《修道细则》有以下内容:

平心。无偏私,无横曲,无反侧,无辗转,无乖戾,无憎恨。

和气。无势力,无胜负,无妒忌,无骄吝,无异同,无恶毒。

敬上。尊主教,尊师表,尊规律,尊道德。

礼下。感化门徒，扶持众生，指渡迷津。

常循。遵规尽职，顺行践言，安分守己，本末始终。

警告。心从下，朝干夕惕，戒慎恐惧，爱时惜阴。

守静。莫轻言，莫亏行，莫妄想，莫罣碍。

惩贪。酒不过量，色不可恋，财毋苟得，气需自化。

修道。却心火，除烦恼，忘名利，免忧愁，扫灾殃，减邪魔。

皈依。锁心猿，拴意马，遵五皈，耐四考。

南洋各地的真空道道堂，多以此为接收道友的规则。1926年，华侨颜悦闻在马来亚的柔佛、麻坡创立登义堂，由施得力主持布道工作。1949年以后，与新加坡各道堂募款，刊印《空道入门》、《首本经注释》、《空道图说》、《空道入门说明书》及《法要大乘真经上下集》等，作为"宣化教理"的典籍。

3. 真空道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等地

主要由徐糯侃、黄达忠和何凤荪等人传入。在泰国，除曼谷建有灵光道堂及真空道堂外，在南部之和艾等地均建有真空道堂。

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的巨港有显传山等道堂，在日里（Belawnn）有真如坛，石马丁宜有登义山道堂，在加里曼丹亦建有道堂，如三发的清桂园道堂，山口洋的复本山道堂。

在沙捞越之古晋，建有复本山道堂与干元道堂。在诗巫、泗里奎等地建有明心道堂。北婆罗洲之纳闽建有如真坛。①

---

① 罗香林：《流行于赣闽粤及马来亚之真空教》，香港中国学社，1962年，第169—186页。

本卷结语

民国年间的帮会是从清代秘密会党发展、演变而来，因此，它同清代的秘密会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民国年间的洪门，来源于清代的天地会与哥老会，青帮也来源于清代漕运水手中的行帮组织——安清道友等。不过，民国年间的洪门或青帮，均已经不再是下层群众的互助和抗暴性质的组织。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和帮会中人都曾试图把旧式帮会改造成新式社团，但是，由于帮会本身的落后性，使这些努力均归于失败。结果，这些旧式帮会当中，有的蜕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有的蜕变为黑社会组织，只有从海外洪门演化来的中国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走上了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蜕变为军阀官僚工具的帮会以四川的袍哥为典型。这些袍哥首领，虽然最初也出身于下层社会，可是一旦成为袍哥的首领，拥有相当的实力之后，便利用帮会组织的人力、物力，使自己跻身于军阀、官僚的行列，成为劳动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那些一般的帮会成员，则成了袍哥首领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或者成为军阀混战中的炮灰。蜕变为黑社会组织的帮会，以上海青帮为典型。上海青帮的代表人物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等，最初也出身于社会下层。可是，他们一旦成为帮会的头子，便使青帮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后来又由于得到蒋介石集团的重用，而成为国民党当局的“党国要人”。他们由于同当权者相互利用，在当权者默许之下，从事各种“黑色事业”，在积蓄了大量财富之后，又从“黑色事业”转移到“白色事业”方面，投身于工商业、金融业、新闻业和娱乐业。

民国年间的会道门也是同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不仅表现在两者大多有组织方面的渊源关系，而且会道门歪理邪说也大多来源于秘密教门的基本教义。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已经不同，因此，其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也就必然有所区别。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处在我国封建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属于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带有宗教

色彩的秘密结社,所宣扬的“弥勒救世”、“天盘三副”或“龙华三会”等教义,虽然也是在宣扬迷信和愚昧,但是,客观上反映了下层群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秘密教门所举行的造反活动,尽管也是为了推翻世俗政权,建立神权专制统治,但是,客观上也具有反抗封建压迫的积极意义。而民国初年的会道门,则成为官僚、军阀聚集实力,角逐政坛的工具,或成为具有政治野心的教主企图建立神权统治的工具,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会道门中大多数投靠日本侵略者,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他们所宣扬的“三期末劫”说,完全是当代邪教所宣扬的“末世论”,是为了用这种恐怖邪说,诱骗、胁迫人们加入其中。如果说明清秘密教门曾经把为人看病作为吸引徒众的手段,而民国年间的会道门则利用为人看病,残害生命。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民国年间的会道门,也就是当代邪教的组成部分。但是,有些会道门也在朝主流社会靠近,逐渐摆脱“邪”的内容,演变为民间信仰。